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下一個家 在何方？

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



2017 普立茲得獎之作

Matthew Desmond

馬修·戴斯蒙——著 胡訢諄、鄭煥昇——譯

房租居高不下，是貧窮的成因，
而我們不能看著租屋變成一種露骨的投資工具，
一種「搖錢樹」或「金雞母」似的存在。

時報出版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下一個家 在何方？

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

Matthew Desmond

馬修·戴斯蒙——著 胡斯譯、鄭煥昇——譯

導讀

驅離與居住正義：從美國經驗關照華人社會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美國知名的頂尖新聞獎項——普立茲獎，將非虛構類的書籍大獎，頒給了一本年輕社會學者的傑出著作，《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2016，直譯為《驅離：美國城市裡的貧窮與財富》)，作者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在二〇〇八年到二〇〇九年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深入採訪密爾瓦基市的貧民區，主要是一個拖車公園與出租社區，故事主軸環繞著八個貧困家庭，以及拖車公園與出租社區的房東，加上法庭與社工等政府機構，構成美國城市底層生活的縮影——換句話說，本書詳盡描繪近年美國魯蛇的悲慘世界。

近年來，公共社會學的書寫，逐漸受到學術社群與一般讀者關注(王宏仁2016)。儘管受到學術象牙塔的保障，社會科學工作者無論對自己、對同儕、或對提供研究資金的納稅人，都應該清楚地回答，我們的研究能夠提供當代社會怎樣的省思？以證據為基礎的社會科學分析，又能對公共政策提出什麼建議？

《下一個家在何方？》這本書提供了極為傑出的公共書寫典範。在本書中，馬修·戴斯蒙發現，美國在一九六〇年代民權運動末期所建立的社會住宅政策已然瓦解，原因是以少數族群——非洲與拉丁裔家庭為主的社會住宅建立後，中上階級白人就會搬離該社區，稅收流失導致缺乏地方政府預算挹注，這

些社區學校與治安也每況愈下，社會住宅最後多半被視為「城市之瘤」，面臨被拆除的命運。過去二十年來，美國政府對貧窮家庭補貼金額從未增加、反而開始附帶嚴格條件或「以工代賑」，所以他們多數只能依賴私人房東所提供的租屋市場，一旦付不出房租或水電瓦斯費，房東就會去法院申請強制驅離命令，而被驅離的往往是最無助的單親媽媽。諷刺的是，這些貧民區的房東及其員工，本身往往也出身於少數族裔的貧困社區，靠剝削自己族群與社區裡更弱勢的人來累積巨大的財富。由於本書的參與及觀察非常精采，值得讀者自行品味，導讀僅是提供大致脈絡，至此不再暴雷了。

新時代的社會科學傑作

本書作者馬修·戴斯蒙目前任教於哈佛大學的社會科學院，除了普立茲獎之外，他曾在二〇一五年獲得美國公民團體與學界著名的麥克阿瑟獎，此一獎項來自生前曾為美國前三大富豪之一、目前仍為美國第十二大的麥克阿瑟基金會，該基金會每年選出大約三十名各學科最優秀的『天才』年輕學者，給予高額獎助，而且這些學者多半與美國重要的公民團體或公共政策關係密切，可說是美國傑出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的榮譽。他也是極少數在哈佛擔任助理教授之後，成功升等為副教授的特殊案例，遠在二〇一〇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前，馬修·戴斯蒙便已經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發表了描繪美國野外消防隊員生命史的民族誌 (Desmond 2008)，而且與指導教授穆斯塔法·艾米爾巴耶 (Mustafa Emirbayer) 合寫美國族群研究的著作 (Emirbayer and Desmond 2009)。有趣的是，他此前相關民族誌期刊論文未受充分重視，直到二〇一二年才登上美國社會學刊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破天荒連續兩期刊出兩篇論文 (Desmond 2012a; 2012b)，是美國青年社會學者的空前成就。

近年的都市民族誌研究，深入房東與被驅離者生活世界的著作，確實相當少見。本書最終，馬修·戴斯蒙透露，他本人是鐵鏽地帶白人勞工家庭出身，而且在剛上大學之際，親身經歷過父母付不出房貸而全家被驅離的事件，導致他對可能解釋自己家庭貧困與流離失所經驗的社會學產生強烈興趣，因此申請進入美國最佳的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攻讀社會學博士。然而他很快發現，芝加哥學派的城市民族誌傳統，已經是快半個世紀以前的傳說，多年以來，社會學界並沒有持續深入美國城市底層。尤其是沒人注意到他關注的房東與租客「弱者相殘」，使前者成為暴發戶、而後者深陷貧困泥沼，這是導致美國貧富差距與種族關係持續惡化的一個特殊機制。

馬修·戴斯蒙在本書展示了優秀的民族誌傳統，採取第三人稱寫作，也暗示對後現代主義人類學民族誌過度自我中心的憂慮。在本書精彩的附錄裡，作者介紹他目前持續進行的《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 MARS），以量化社會調查方法，追蹤近一千一百個貧困家庭在密爾瓦基市的生活與居住動態，還取得該市警察局一百萬通報案電話紀錄，來篩選驅離案件，做出近乎大數據的統計分析；作者甚至使用過實驗法——利用假名進行低收入戶申請等方式，揭露種族因素對行政程序的負面影響。此外，他廣泛引用各種實證文獻，從有關營養不良影響兒童早期發展的公共衛生研究、實驗經濟學裡窮人的消費行為、美國犯罪學裡最突出的警民關係與族群歧視、到社會住宅政策對兒童教育與犯罪效果的研究，跨學門且包羅萬象。因此，本書不僅故事好看、對社會科學感興趣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研究方法附錄與註腳。總之，以都市社會學傳統民族誌為主，作者提供了非常傑出的跨學門與多元研究方法的公共書寫範本。

華人社會脈絡下的驅離

近年來，隨著二〇〇七年美國房地產次級貸款引爆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與二〇一〇年代前半，台灣房價逆勢上漲的泡沫現象，「崩世代」青年貧窮成為輿論焦點（林宗弘等 2011），居住正義也成為台灣公眾與媒體注意的重要問題之一。最近，以底層勞動者觀點討論其生活的著作如《過勞之島》（黃怡翎、高有智 2015）、《做工的人》（林立青 2017）等，在台灣市場上相當暢銷，然而，《下一個家在何方？》深入記錄底層民眾所面臨的房租議題，在華人社會尚未獲得充分關懷。

台灣社會大規模的居住正義抗爭，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也帶動城市社會學與批判理論城市研究之崛起，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湧現一批探討都市結構、地方派系、農地買賣、都市計畫變更及房地產炒作的城市社會學經典文獻（陳東升 1995；王振寰 1996；黃樹仁 2002；章英華 2015、1995），其中少數以「非正式部門」這個概念來分析五分埔成衣與流動夜市等城市經濟活動（柯志明 1993；戴伯芬 1993），亦有涉及台灣都市裡的弱勢族——都市原住民（傅仰止 1987），或是城市街友的文獻（戴伯芬 2014），與本書所呈現美國少數族群的都市隔離分析，觀點較為類似。然而，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台灣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房價在二〇〇三年探底，相對而言，非民眾關注的社會政策焦點，城市社會學的整体發展有所停滯，研究重點轉向高科技產業的園區建設與土地炒作（楊友仁、蘇一志 2005；楊友仁 2013），例如苗栗縣張藥房抗爭事件等，因都市更新或公權力強制徵收土地——特別是區段徵收政策，所導致少數家庭或社區家破人亡的悲劇（鍾莉娜、徐世榮 2013；徐世榮 2016）。不過，除了少數論文提及高房價與生育率降低的現象（林佩萱、張金鵬 2016），與本書類似的城市青年貧窮、居住隔離與私人租屋市場亂象，迄今較少獲得媒體與學界的重視。

在中國，房地產開發已經成為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為了防止經濟衰退，寬鬆的金融政策與一線城市的限購措施，更使得房價狂飆。北京大學周飛舟（2012）等社會學者調查發現：中國地方政府幹部為了財政與個人利益勤於「圈地」，建立土地儲備中心與開發公司，以強制徵收的土地來反覆抵押貸款，使銀行與金融機構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擴大房地產泡沫與金融風險（孫秀林、周飛舟 2013）；另一方面，地方幹部與開發商壓低給農民的補償費用，壓制上訪，造成失地農民暴力抗爭（周飛舟、王紹琛 2015）。周飛舟將這種地方幹部土地掠奪的後果稱為「驅趕效應」（周飛舟 2012）。至於進入城市工作、無本地戶口、薪資又無法追上房價的外地青年或民工，經常只能蝸居在一些廉價又居住品質極差的「城中村」，成為所謂的「蟻族」（廉思 2009），隨著房價上漲，這些蟻族貧民窟不斷成為地方政府拆遷與驅離的對象。目前，針對中國大陸青年蟻族的慘況，有不少描述性著作與少數問卷調查，但是與本書相比，理論分析尚有不足。

居住政策的他山之石

近年來，由於兩岸三地的房地產市場狂飆，強拆事件觸動人心，居住正義問題屢屢成為民怨的引爆點，台灣有關社會住宅建設的爭議、香港的農村保育或公屋與居屋政策如何安撫青年的不滿、或有關中國大陸戶籍與土地制度改革的討論，引起公眾關注，本書優秀的翻譯，及時提供美國學界當前倡議的政策方向。

馬修·戴斯蒙明確指出，穩定的居所，是人們建立身分與地方認同、發展互助網絡與政治結社、參與公共領域與脫離貧窮的基礎，面對美國社會住宅成本過高與融入社區失敗的經驗，作者認為政府應該

採取兩手策略，一手立法壓制租金上漲，另一手提供貧困家庭限定用途的租屋卷，降低貧困家庭的租房支出負擔，如此才能如少數書中案例，保留部分收入投資於技能以逃離貧困。馬修本人身體力行，投入數個推動租屋政策改革的民間團體。雖然各國房地產市場結構與政治過程差異甚大，很難橫向移植美國的居住政策，其主張仍值得我們借鏡。

延伸閱讀

- Desmond, Matthew (2008). *On the Fireline: Living and Dying with Wildland Firefight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mritbayer, Mustafa and Matthew Desmond (2009). *Racial Domination, Racial Progress: The Sociology of Race in America*. New York: McGraw-Hill.
- Emritbayer, Mustafa; Desmond, Matthew (2015). *The Racial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smond, Matthew. (2012a)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1295-1335.
- Desmond, Matthew. (2012b)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88-133.
- Desmond, Matthew (2016).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Crown/Archetype.
- 王宏仁，2016，〈社會學的公共書寫：以學術科普部落格為例〉，《台灣社會學刊》，59: 1-27。
-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周飛舟，2012，〈以利為利：財政關係與地方政府行為〉，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周飛舟、王紹琛，2015，《農民上樓與資本下鄉：城鎮化的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第一期：66-83頁。
- 林立青，2017，《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
-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台灣勞工陣線。
- 林佩萱、張金鵬，2016，〈沒有房子不生孩子？買了房子不敢生孩子？購屋對家庭婚後生育時間影響之研究〉，《台灣社會學刊》，59: 93-138。

- 柯志明，1993，《臺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以五分埔成衣製造業為案例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徐世榮，2016，《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台北：遠足文化。
- 徐進鈺，1995，〈流動的鑲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勞動力市場與高科技發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5:75-118。
- 孫秀林、周飛舟，2013，《土地財政與分稅制：一個實證解釋》，《中國社會科學》，第4期：40-59頁。
- 章英華，2015，《洞見都市：臺灣的都市發展與都市意象》，共350頁，高雄：巨流圖書公司。
- 章英華，1995，《台灣都市的內部結構：社會生態的與歷史的探討》，共286頁，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陳東升，1995，《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黃怡翎，高有智，2015，《過勞之島：台灣職場過勞實錄與對策》。台北：社團法人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 黃樹仁，2002，《心牢：農地農用意識形態與臺灣城鄉發展》。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楊友仁，2013，〈金融化、城市規劃與雙向運動：台北版都市更新的衝突探析〉。《國際城市規劃》，28(4):27-36。
- 楊友仁、蘇一志，2005，〈地方成長聯盟轉化與空間治理策略：以台南科學城計畫為例〉。《都市與

計劃》，32(1):1-23。

傅仰止，1987，〈都市山胞的社經地位與社會心理處境〉，《中國社會學刊》，第11卷，頁55-79。

廉思，2009，《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鍾麗娜、徐世榮，2013，〈都市政治與都市計畫之政經結構分析——以南科樹谷園區為例〉，《台灣土地研究》，16(2):63-87。

戴伯芬(1993)，《流動攤販與都會區趕集夜市的形成——台灣非正式經濟的個案分析》，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暨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伯芬(2014)，〈底層勞動、消費貧窮與都市漫遊者——台北市街友田野記實〉，《臺灣社會學刊》，54:233-265。

目錄

導讀 驅離與居住正義：從美國經驗關照華人社會／林宗弘

序曲 冷冽之城

PART 1 房租

第1章·房東這一行

第2章·拚房租

第3章·熱水澡

第4章·大豐收

第5章·第十三街

第6章·鼠窩

第7章·難過死了

第8章·四〇〇室的耶誕節

PART 2 驅離

第9章·外送的來了

第10章·毒蟲等於免洗勞工

第11章·貧民窟，是好物

第12章·免洗的人際關係

												0	0
												1	0
												8	3
2	1	1	1			1	1	0	0	0	0		
1	9	8	5			3	1	9	8	6	5	4	2
2	3	1	4			2	4	4	0	9	6	1	8

第13章・E-24車格

2
2
4

第14章・能忍則忍

2
3
6

第15章・妨害設施

2
4
7

第16章・雪地上的灰燼

2
6
2

PART 3 後來

第17章・這就是美國

2
7
2

第18章・用食物券買來的龍蝦

2
8
2

第19章・小不點

2
9
7

第20章・顧人怨的北部

3
1
8

第21章・大頭男寶寶

3
3
6

第22章・如果他們要處罰媽媽

3
4
2

第23章・寧靜俱樂部

3
5
5

第24章・地獄倒楣鬼

3
7
1

結語 一個家，一個希望

3
8
4

關於我的故事——研究始末與回顧

4
2
1

誌謝

4
4
8

謹以本書獻給陪著我一路走來的蜜雪兒。

「房租要是能從天而降，多好。」

——（很重要的）小情歌，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¹

1 譯註：1902-1967，美國詩人與小說家、劇作家，黑人，哈林文藝復興健將。該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反對種族歧視，批判並否定傳統馴順的舊黑人形象。這首詩的原名是 Little Lyric (Of Great Importance)。

序曲

冷冽之城¹

喬瑞和同輩的親戚小孩挖起地上的雪，搓成雪球朝經過的車輛扔去，喬瑞所在的街角位於密爾瓦基²的中偏南部，車輛行經第六街，街道兩旁是低矮的雙拼公寓，公寓的門廊前有台階，台階向前延伸到人行道布滿蒲公英的一邊。往北行的車輛前方是聖若撒法教堂（Basilica of St. Josaphat），而教堂的圓頂在喬瑞眼中就像巨大的馬桶吸盤。時值二〇〇八年一月，那是有史以來雪下得最兇的冬天。時不時會有車子從第六街轉入亞瑟大道（Arthur Avenue），卻發現自己成了雪陣中的甕中之鱉，而這時就是男孩發射的時機了，喬瑞揉了個格外結實的雪球扔了出去。車子倏地一停，一名男子跳出車外，兩名男孩轉身衝進喬瑞和母親阿琳、弟弟賈法瑞同住的公寓。門上的鎖是個便宜貨，男人踹了幾下就開了。後來男人悻悻然離開，但事情卻尚未結束，房東發現門壞了，決定將阿琳和她兩個兒子逐出家門。就這樣，母子三人將告別這個他們住了八個月的家。

搬家期限的最後一天，外頭天寒地凍。但阿琳再不走，房東太太就會把有配槍的郡治安官³找來。治安官會領著一票穿著靴子的搬家工人上門，還會出示一紙法官的命令，告知她這裡已經不是她家了。她有兩個選擇：卡車或者路邊。「卡車」指的是她的東西會被裝進十八尺的貨櫃，然後送進擔保倉庫⁴裡。進了倉庫，她就得掏出三百五十美元才能拿回自己的家當。她哪來的三百五十美元？所以她選了「路邊」，也就是看著她的東西統統被堆在路旁，包括她的床墊、直接放在地板上的那種老電視、一本

《第一次管教孩子就上手》⁵、她美麗的玻璃餐桌和尺寸剛好的的蕾絲桌巾，還有她的假花盆栽、聖經、冰箱裡切好的肉、浴簾、賈法瑞的氣喘藥。

阿琳帶著十三歲的喬瑞和五歲的賈法瑞住進遊民收容所，大家都稱那裡為「旅社」，因為這樣爸媽就可以跟孩子說：「我們今晚要去住旅社，」彷彿是住進某間汽車旅館一樣。事實上，要不是因為掛著救世軍⁶的招牌，你還真會以為這是間汽車旅館。阿琳在這一二百二十床的收容所住到四月，也就是住到她在密爾瓦基北部以黑人為主的舊城區⁷找到房子為止。她的「新」家位於第十九街和漢普頓街口，離她兒時的住處不遠。新房子的窗框與門框寬厚，原本顏色應該是肯德爾綠⁸，但因久經歲月，油漆早已龜裂斑駁，木頭的邊緣裸露，外觀宛如迷彩屋。顯然曾經有人嘗試要把房子漆白，但半途而廢，因此房子大半都沒被漆到。在此處，沒有自來水已是家常便飯，所以喬瑞常得拿著桶子提水沖馬桶。不過阿琳喜歡這棟房子寬敞而且獨門獨院。「那裡不吵，」她還記得，「而且一整棟才租五百二十五（美元），樓上兩間房，樓下兩間房。我超喜歡那地方。」

幾周後，市政府判定阿琳超喜歡的這個地方「未達最低居住標準」，勒令她搬遷。這間房子的門窗被以綠色木板封住，房東則收到了罰單。阿琳只得帶著喬瑞和賈法瑞往更靠舊城區搬。這次母子三人來到埃金森大道（Atkinson Avenue）一處沉悶單調的公寓社區。只不過她很快就聽聞此處是毒販的天堂，於是開始擔心起兒子的安全，尤其是喬瑞：喬瑞的膚色像核桃，臉上掛著滿分的微笑，而且來者不拒。

阿琳在埃金森大道挨了四個月，度過夏天，然後才搬了一英里遠到第十三街跟基輔大道（Keele Avenue）口一棟雙拼公寓的一樓。阿琳和兒子徒步把東西搬過去，但開燈前她緊張到不敢呼吸，直到燈亮了，她才笑著鬆口氣。這下子她可以靠別人付的電費撐一段時間了。客廳窗戶上有個拳頭大的洞。若想把前門鎖上，就得拿一片醜醜的木板卡進金屬的凹架上。骯髒的地毯上藏污納垢。不過優點是廚房空間

很大，客廳的採光不差。阿琳拿了塊布把窗戶的洞塞好，接著掛上了象牙白的窗簾。

房租是一個月五百五十美元，不含水電及瓦斯。以美國第四窮城市的底層社區來說，這算是二〇〇八年兩房的行情價。阿琳找不到更便宜的房子，至少找不到更便宜而且還能住人的地方，再說大部分的房東看她帶著兩個小孩，也不願意租她小一點的房子。阿琳每個月可以領六百二十八美元的社會福利補助，而光房租就會占掉八成以上。但她應該還可以撐到冬天過完吧，撐到報春花跟鬱金香從融雪的大地冒出頭來，春暖花開。那是阿琳最喜歡的春天。

外頭響起了敲門聲，上門的是房東太太舍蓮娜·塔佛。嬌小的舍蓮娜是位頂著鮑伯頭，指甲修得漂漂亮亮的黑人女性。這會兒她帶來了大包小包的生活雜貨。她自個兒花了四十美元去食物廚房，領了些東西。她知道阿琳會需要這些吃的用的。

阿琳謝過舍蓮娜，關上門。好像有了個不錯的開始。

從前，即便在美國城市裡最荒涼的區域，被驅離也是很罕見的。曾經，將房客逐出家門是會引發眾怒的。上個世紀經濟大蕭條¹⁰期間，雖然被逐出家門的戶數跟今天相比真是不值一提，但還是有因為驅離而引發的暴動。一九三二年二月，紐約布朗克斯區有三戶人家遭到驅離，結果街坊群起抗議，對此《紐約時報》評論是：「可能是天氣太冷了吧，現場抗議的才一千人。」¹¹有時鄰居會直接槓上聯邦法警¹²，他們會一屁股坐在被驅離家庭的家具上，讓人想搬都搬不走；又或者他們會無視法官的命令把當事人的家當搬回去。聯邦法警本身對強硬執法也拿不定主意。他們也不覺得身上的徽章跟槍該用來對付老百姓。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郡治安官之下有一個個小隊的全職工作，就是執行驅離跟押品止贖¹³，搬

家公司裡也有專接驅離案子的業者，而且員工周一到周五都不得閒。有上百個數據探勘公司製作房客篩選報告，條列過去的驅逐紀錄與法院檔案，將資料出售給房東。¹⁴現今的住房法庭人滿為患，特聘法官¹⁵被逼著在走廊上或簡陋的辦公室裡處理案子，用的是舊書桌跟爛檔案櫃——但房客會出庭的少之又少。對於轟隆隆的卡車引擎聲、大清早就有人敲門，還有街邊一整排自己的鍋碗瓢盆，低收入家庭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相對於居住成本的飆升，美國家庭看著他們的薪水停滯不前，甚至不增反減。今天美國大多數的貧困租屋家庭得砸超過一半的所得在「住」這件事上，甚至每四戶就至少有一戶得花七成以上的所得來租屋跟維持燈火。¹⁶每年因為繳不出房租而被逐出家門的美國國民，數以百萬計。對照密爾瓦基的租屋家庭還不到十萬零五千戶，房東也有辦法每年驅離大約一萬六千名成人或兒童，相當於每天有十六個家庭經法庭程序驅離。不過，比起走法院這條路，房東其實有更省錢省事的辦法，可以讓租屋家庭消失在他們面前。有些房東會拿兩百美元打發房客，叫他們在一周結束前搬走。有些房東會把大門給拆了，讓人住不下去。密爾瓦基有半數租屋家庭所經歷的「迫遷」都發生在法律管不到的死角，也就是屬於「非正式的驅離」。如果把各式各樣非自願的遷徙全部算進去——正式的、非正式的、房東的房子被查封、房子被宣告為危樓等等——你會發現從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一年，密爾瓦基每八名租屋者就至少有一名經歷過被迫遷。¹⁷

說到被逐出家門，密爾瓦基並不是特例。把鏡頭轉到堪薩斯城（Kansas City）、克里夫蘭、芝加哥等各個美國城市，被驅離的數據也都相去不遠。二〇一三年，全美每八戶貧窮的租屋家庭，就有一戶沒辦法付清租金，自認不久就會因此遭驅離的家庭比例也差不多。¹⁸儘管這本書的背景是密爾瓦基，但裡面的故事卻是全美國的縮影。

本書記錄了八個家庭的身影與足跡——這裡頭有黑人家庭、有白人家庭，有人攜家帶眷，有人孑然一身，同樣的是，所有人都被捲進了驅離的風暴之中。這些人，有的從拖車公園、有的從貧民窟的公寓遭到驅離，而這些遭遇不只影響到房東跟房客本身，而是連他們的親朋好友、舊愛新歡、律師、法官、毒販跟教會裡的長老都被牽扯進去。驅離的影響所及，每一種後果都不容小覷。一旦沒了棲身之所，許多家庭的下一站會是收容所、廢棄的空屋，甚至有人會流落街頭。驅離會召來憂鬱與疾病，會迫使美國家庭搬遷入治安死角的區域。驅離會拔除街坊鄰里的根本，會讓年幼的孩子們成為無辜的受害者。驅離讓我們看到了人在懸崖邊緣的脆弱與無助，也讓我們見證了身而為人的機智與膽識。

對愈來愈多的家庭來說，有個屋頂能遮風避雨已不再天經地義，這絕對是美國現今最迫切必須面對與處理的問題。能夠體認到居住問題的擴散之廣與影響之深，我們才能用一個新的角度來檢視貧窮。過去幾十年，我們眼裡盡是就業、社福、親職與監獄人滿為患等問題，我不否認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議題，但我們似乎忘了去關心事情的癥結。我們沒有能全盤了解，在抽絲剝繭之後有多少貧窮問題的核心其實跟居住正義綁在一起。破落社區的居民不見得跟道上兄弟、假釋官、老闆、社工師或牧師有所往來，但人人生命中（幾乎）都會有位房東。

註釋

1 聲明：本書並非小說。書中的真實事件多集中發生於二〇〇八年五月至二〇〇九年十二月。除非於註解中另有說明，否則所有事件均為作者親眼所見。引用的資料皆本於數位錄音檔或官方文件的影本。為保護個資，房客及其子女或親族、

房東及其員工均使用化名。

- 2 譯註：Milwaukee，美國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郡的郡治所在，但本身也有一部分面積位於威斯康辛州的華盛頓郡（Washington County）跟沃基肖郡（Waukesha County）境內。
- 3 譯註：Sheriff，美國廣義警察體系中普遍經由選舉產生的執法人員，唯某些州（如加州）仍要求擔任郡治安官者必須具有司法警察任用資格。一譯「警長」，郡治安官之下通常有若干其親挑選的助理郡治安官（deputy sheriff）。
- 4 譯註：Bonded storage，存放的貨物均有擔保，減損可獲得賠償的倉庫。
- 5 譯註：Don't Be Afraid to Discipline，作者是心理學家茹絲·彼得斯（Ruth Peters），書講的是爸媽如何不要被小孩牽著鼻子走，如何在家裡建立起前後一致而公平的規矩。
- 6 譯註：Salvation Army，基督教的國際性公益組織。
- 7 譯註：inner city，也可譯市中心，指的是緊鄰中心商業區外圍的區域，通常是城市較早開發的地區。工業革命以降，鄉村人口與工人遷入這些區域，創造城市經濟活動，支持都市發展。然而隨著世界大戰後經濟結構轉變，以及追尋「美國夢」的跨國移民湧入，這些地區遂出現產業外移、高失業率、高犯罪率、高住宅密度、種族衝突、住宅與環境品質惡化等問題。詳見〈導讀：重新發現生活城市的魅力〉，吳鄭重著，收錄於《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Jane Jacobs 著，吳鄭重譯注，聯經出版。
- 8 譯註：英格蘭西北鎮名，以羊毛（線）產業聞名，並習於使用一種取自松藍（woad）的綠色染料。
- 9 譯註：類似食物銀行，慈善機構發放物資的地方。
- 10 譯註：1929-1933 年間發生在美國的嚴重經濟衰退。
- 11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2nd ed. (New York: Vintage, 1993 [1971]), 53, 63-65, 71; St. Clair Drake and Horace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45), 85-86; Beryl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雖然關於被驅離這件事情，具全美代表性的歷史資料付之闕如，但像在《紐約時報》這些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描述裡，被驅離是一種罕見而會使人訝異的事。到了二十世紀的後半葉，某些地區性的

研究記載了非自願遷徙在美國的發生率已經不容小覷。參見 Peter Rossi, *Why Families Move*, 2nd ed. (Beverly Hills: Sage, 1980 [1955]); H. Lawrence Ross, "Reasons for Moves to and from a Central City Area," *Social Forces* 40 (1962): 261-63.

12 這裡的聯邦法警不是法院的法警 (bailiff)，而是在美國法警局 (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 任職的司法警察。美國法警局隸屬於美國司法部之下，算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聯邦執法單位。

13 譯註：foreclosure，指以房屋為抵押品的貸款者，未能履行還款義務而喪失贖回房屋的權利。

14 Rudy Kleysteuber, "Tenant Screening Thirty Years Later: A Statutory Proposal to Protect Public Records," *Yale Law Journal* 116 (2006): 1344-388.

15 譯註：Court commissioner，為分攤正式法官工作量而特聘的輔助性質法官，常見於處理重複性高的特定案件（如驅離法庭業務）。特聘法官不具有等同法官的權威，但其背景仍多為正式法官或律師出身。

16 這些估計所參考的是《美國住房研究》(American Housing Survey, AHS)，1991-2013。這些算是比較保守的數據，理由是當中排除了自陳無現金所得、零所得或負所得的租屋家庭。《美國住房研究》中有記錄居住成本占家庭所得比起過百分之百的租屋家庭。對某些家庭來說，這個現象反映的可能是誤答；但對另外一些家庭來說，靠積蓄過活跟租金加上水電瓦斯帳單大過所得，這個現象就不是什麼誤會了。許多分析在檢視居住支出超過家庭收入的租屋家庭後，竟發現僅少數家庭表示有獲得租金補助（百分之十一）或水電瓦斯的補助（百分之五）（包括持續性與一次性的補貼）。如果把居住支出大過家庭所得的家庭算進去，你會發現在二〇一三年，七成的窮困租屋家庭得花半數所得在居住上，需花七成以上所得在居住的租屋家庭也達到五成三。如果排除掉表示居住支出大過家庭所得者，則你會發現有五成一的租屋家庭把至少半數的家庭所得用於居住，而居住花費占七成所得比率的家庭也將近四分之一。真實的狀況應該會落在這兩種假設之間，亦即在二〇一三年，花過半所得在居住上的租屋家庭，應該在五成到七成之間，而花七成所得在居住上的租屋家庭，比例應該落在二成五到五成之間。

即便租屋家庭總數從一九九一年到二〇一三年間成長了將近六百三十萬戶，但花不到三成所得在居住上的租屋家庭數，仍從一九九一年的一百三十萬戶下降到二〇一三年的一百零七萬戶。同樣在這一段期間，花七成或以上所得在居住上的租屋家庭數，從兩百四十萬戶增加到四百七十萬戶（若把居住成本大過家庭收入的家庭納入計算），另一種算法則

是從九十點一萬戶增加到一百三十萬戶（排除居住成本大過家庭收入的家庭）。居住成本（housing costs）包含簽約明訂的租金，水電瓦斯費、產物保險、流動房屋（拖車）的停置費用。所得（income）在此處指的是戶長（一家之主）、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親屬（戚）以及與戶長沒有血緣關係但居住於同一家庭的家長等所能獲得的各種工資、薪酬、福利與實物性質的補助（如食物券）的總和。在計算居住支出負擔時，《美國住房研究》選擇使用的就是這種以戶長為核心的「家庭所得」（family income）取代以可能為無關係者同居的「家庭所得」（household income）來進行計算，以利於「逼近可用以支付居住與其餘共同生活費用的所得」（唯《美國住房研究》對貧窮的定義仍根據家庭所得）。參見 Frederick Eggers and Fouad Mounen, *Investigating Very High Rent Burdens Among Renters in the American Housing Surve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0); Barry Steffen, *Worst Case Housing Needs 2011: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3)。

Milwaukee County Eviction Records, 2003-2007 and Geolytics Population Estimates, 2003-2007; 《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 MARS), 2009-2011. For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methodology, see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Matthew Desmond and Tracey Shollenberger, "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 Prevalence and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 *Demography*, forthcoming. 在本書，我從頭到尾都使用了特別設計的權重來利於得出可以推廣至密爾瓦基全體租屋人口的估計值。所有取材自《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的「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都經過加權處理。《美國住房研究》用了一個問題來蒐集「租屋者為何搬遷」的資料，這個問題是：「你最近一次搬離原址（一或多個）的原因為何？」並根據受訪前一年內曾搬家過的租屋者之最近一次搬遷來公布資訊。二〇〇九年版的《美國住房研究》（見表 4.1）顯示全美在受訪前一年內曾搬遷過的租屋者當中，約有百分之二點一到百分之五點五的人因為三種原因被迫遷出之前的住處，分別是私人原因（如屋主欲遷入自住、租屋處被改成各戶產權獨立的 condo 公寓）、政府主導（租屋處被判定低於最低居住標準）、遭到房東驅離。百分之二點一的數據所根據的是租屋者自稱的「搬遷主因」，而這太過局限，因為被迫遷的人若是把上述這三種原因以外的原因（如屋況過差）列為他們的搬遷主因，就會被排除在數據統計之外。而百分之五點五的數據則是把所有的搬遷

原因都算進去之後的結果，而複選搬遷原因的人就可能被重複計算。由此最適合的統計方式應該會是上述兩種方式的折衷。根據《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在一年內曾搬遷過的受訪者之中，最近一次搬遷屬於迫遷性質者有百分之十點八。我的這個估計值較高，但也比較準確，理由是《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掌握了非正式的驅離。非正式的驅離若是排除在外，那我的這個估計就會降為百分之三，而這也就呼應了《美國住房研究》的數據。《美國住房研究》就跟多數的「物質困苦」(material hardship)研究一樣，都因為過度倚賴開放式的問題而顯著低估了被驅離在租屋者間的普及狀況——開放式的問題會無法完全掌握到非正式的驅離，是因為很多租屋者並沒有認知到非正式的驅離也是驅離。

關於貧困的租屋家庭無力支付全額租金、並認為他們短期內會遭到驅離之比率，這一點的全美估計值來自《美國住房研究》二〇一三年版，表 S-08-RO。該研究同時顯示全美有超過兩百八十萬個租屋家庭認為他們「非常可能」或「有點可能」會在兩個月內遭到驅離。Chester Hartman and David Robinson (“Evictions: The Hidden Housing Problem,” *Housing Policy Debate* 14 [2003]: 461-501, 461) 估計美國人每年遭到驅離的數目「很可能高達數百萬

人」。亦請參見 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53.

關於威斯康辛州的驅離估計值：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裡的鄰里法諮詢服務 (The Neighborhood Law Clinic) 已經開始記錄州層級的驅離法庭出庭數目 (驅離法庭的出庭數目不同於驅離的判決確定)。在威斯康辛州的所有城市裡，驅離法庭的出庭數都高於驅離的判決確定數。我對於密爾瓦基由法院判決確定的正式驅離比率統計，是根據驅離判例數做成，而驅離判例作為一種統計指標，在威斯康辛州其他城市的取得與確認都有更高的難度。二〇一二年的驅離數據分析如下：阿拉巴馬州：兩萬兩千八百二十四次開庭 (人口數四百八十萬)，明尼蘇達州兩萬兩千一百六十五次開庭 (人口數五百四十萬人)；奧勒岡州兩萬三千四百五十二次開庭 (人口數三百九十萬人)；華盛頓特區一萬八千零六百次開庭 (人口六百九十萬人)，威斯康辛州兩萬八千五百三十三次開庭 (人口數五百七十萬人)。參見 the Epilogue for eviction estimates in cities other than Milwaukee. 關於迫遷的評估方式，參見 Desmond and Shollenberger, “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 Hartman and Robinson, “Evictions: The Hidden Housing Problem.”



房東跟她說，有錢再還他就好，於是當多琳手頭還可以時，就一百元一百元的還。

她努力上班，但意外總是會一件件冒出來，錢感覺怎麼樣也還不完。就這樣，幾個月過去了，幾年也過去了。

第一章

房東這一行

密爾瓦基的冬天像汽車保養員手中的扳手一樣冰冷晦暗，但在冬天來臨前、在阿琳說服舍蓮娜讓她跟小孩搬進第十三街的雙拼公寓之前，密爾瓦基的舊城區顯得生意盎然。九月初的密爾瓦基是秋老虎的城市，音樂從車內的音響流瀉到街上。孩子們有的把人行道當成了遊樂場，有的則在高速公路的匝道口做起了瓶裝水的生意。門廊的椅子是老奶奶的觀眾席，她們會坐看經過的年輕人裸著上身並帶著笑意，朝向籃球場而去。

舍蓮娜一邊開著車在密爾瓦基的北部繞，一邊搖開車窗聽節奏藍調。對密爾瓦基的中產階級來說，走高速公路通過舊城區是常態，只有房東們才會開進巷弄；但他們不會開著自家的紳寶或奧迪來到這裡，而是開專用的「收租車」。以廂型車或卡車為主的收租車有幾個常見的特色：車體生鏽，會漏油，車內裝有延長線、梯子、蛇式水管疏通器、工具箱、防狼噴霧劑、釘槍等，有時甚至連裝好子彈的手槍都具備。舍蓮娜多半會讓大紅色的雪佛蘭 Camaro，也就是電影《變形金剛》裡的「大黃蜂」跑車在家裡留守，然後另外開有著二十二吋圈胎、一九九三年出廠的米黃雙色雪佛蘭 Suburban「巡房」。Suburban 的真正主人其實是昆汀，而昆汀的另一個身分便是舍蓮娜的老公兼事業夥伴，同時也是名物業經理。昆汀拿來發動 Suburban 的不是鑰匙，而是螺絲起子。

有些當地的白人還是習慣稱呼密爾瓦基的北部為「市區」(The core)，這是從六〇年代流傳下來的說

法。往裡走，你會看見每條街上參差不齊的雙拼公寓、褪色的壁畫、全天營業的日托中心，以及懸掛著接受婦幼營養補助「招牌」的商店。密爾瓦基曾經在美國城市裡排名第十一，但其人口卻從一九六〇年的七十四萬人降到如今六十萬人不到。這座城市的衰敗，可說是「有目共睹」：廢棄的住宅、雜草叢生的空地，一點點布滿了密爾瓦基北部。典型的住宅區往往有幾間獨棟房屋，屋主年紀偏長，喜愛蒔花弄草並懸掛美國國旗；更常見到雙拼公寓或一棟四戶的公寓，油漆斑駁的外牆掛著床單充當窗簾，出租給家境窘迫的家庭；還有一塊塊空地、跟門窗被釘上板子的空屋。

這些全都看在舍蓮娜的眼裡，但她看到的不只是這樣而已。如同「身經百戰」的房東，舍蓮娜知道哪一棟非透天的公寓屋主是誰，哪間教堂、酒吧跟哪一條街又各歸誰管。她知道每一處各自歷經過什麼樣的興衰起伏，也知道每個地方的色調與氛圍。她知道哪幾條熱門街區是毒品的集散地，也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安靜穩定。她深知貧民窟的價值所在，也知道如何從看起來像廢物的房地產中賺到別人沒本事賺的錢。

嬌小的舍蓮娜有著黝黑如栗子般的膚色，身上穿著與褲子搭配得宜的輕薄紅藍色外套，而她的褲子又跟頭上斜戴的 NBA 棒球帽是一套的。她喜歡張嘴大笑，有時候她會笑到得扶著人的肩膀，彷彿快跌倒。但當她轉出北方大道，要去第十八街和萊特街（Wright Street）口探望房客時，她放慢了速度，大大嘆口氣。驅離房客是這一行常見的事，但拉瑪沒有腿，而趕走一個沒有腿的男人並不讓人開心。

最早，當拉瑪開始繳不出積欠的租金時，舍蓮娜並沒有發出驅離通知單，也沒有搬出「在商言商」的那套台詞。她左右為難，嗯嗯啊啊地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我真的很不想這麼做，」到了最後關頭她是這麼跟昆汀說的。「你懂我的苦衷，對吧？」舍蓮娜皺起了眉頭。

昆汀沒開口，靜靜地讓老婆說她想說的。

思索了半晌，舍蓮娜的結論是：「事情還是要講求公平嘛。」「我覺得小孩很可憐，而且拉瑪還跟兒子同住……何況我覺得拉瑪挺討人喜歡。問題我賺的是錢，不是喜歡，喜歡沒辦法付帳單。」

舍蓮娜要付的帳單有：房貸、水費、維修費、房地稅。有時候還會莫名其妙地冒出來一筆「大條的」，比方說鍋爐壞掉、市政府巧立名目要收個什麼費用，然後她就不得不勒緊褲帶才不會破產，直到下個月初收到租金。

「我們沒辦法等他，」昆汀說。「我們等他，稅可不會等我們，房貸也不會等我們。」

作房東的，沒有避險這回事。房客不付你五百美元，房東便立刻少了五百美元的收入。無法收租，房東就只能吃老本或靠正職去補房貸，否則就等著銀行發通知說要查封房子。這一行也沒有一堆術語可以讓事情講起來好聽點：沒有所謂的「縮小營業規模」、也不存在什麼「單季淨損」。賺或賠都是一翻兩瞪眼。不該賠的賠了、跟該賺的沒賺到，對房東來說都會是「切身之痛」。經驗老道的房東都喜歡講他們第一次大賠的故事：有房客自行將天花板拆了，拍照留存，然後跑去住房法庭告狀；還有夫妻趁被房東逐出家門前拿襪子塞住洗碗槽，將水開到最大。新手房東要不是挺直腰桿，否則就乾脆退出。

舍蓮娜先是點頭如搗蒜，然後也不知道是在對昆汀說話、還是在自言自語，「我看我應該少替這些人擔心才對，我擔心他們，誰擔心我？如果我沒記錯，借錢給我們的公司可沒說房貸不用付了。」

舍蓮娜與昆汀多年前在芳杜拉大道（Fond Du Lac Avenue）上認識。等紅燈的時候，昆汀把重型機車騎到舍蓮娜的旁邊。開著車的舍蓮娜有迷死人的笑容，車裡音響開得很大。舍蓮娜說她記得昆汀騎的是一台戴托納跑車（騎的時候往前傾的那種），但昆汀堅持他騎的是台Regal街車（像騎哈雷那樣向後傾）。

「我怎麼會騎戴托納跟人搭訕，」他一臉不服氣地說。昆汀把自己的門面打理得很好，雖然不是肌肉發

達的類型，但很精壯。鬚髮的他戴了不少珠寶在身上：一條不算細的鍊子、一條算得上粗的手鍊，一堆戒指。舍蓮娜覺得這個人看起來有點像販毒的，但還是給了他電話號碼。昆汀足足打了三個月的電話才讓舍蓮娜答應跟他去吃冰淇淋，又花了六年時間讓舍蓮娜變成老婆。

昆汀在紅燈前攔下她時，舍蓮娜還是名四年級的小學老師。她說話的樣子的確像老師，會叫陌生人「親愛的」，滿嘴殷切的建議或教訓。她會說，「你知道要被我念了吧？」當她察覺你心不在焉，她會碰碰你的手肘或大腿，把你給拉回來。

跟昆汀交往進入第四年時，舍蓮娜算是愛情得意，但工作上卻完全提不起勁。於是她告別了待了八年的教室，自己出來開了家日托中心，但她回憶「一點小小的違規就讓他們關門大吉」。創業未果的她回到學校教書，恢復教師身分。後來因為她跟「前任」生的兒子變得有點叛逆，她索性回家教子，而這也是她接觸房地產的開端。被問到，「為什麼會選房地產？」舍蓮娜會一本正經地談起「長期剩餘所得」，意思是置產最終一定划得來，她會說除了房子，你在外頭找不到更好的投資了。但她其實還有句話藏在心裡沒說，那就是跟許許多多的房東一樣，她堅信就算沒有學校可教、沒有公司可靠，就算自己沒有聘書、沒有退休金，而且也不是工會成員，她依舊可以靠自己過活。她與宇宙萬物有個默契：她可以赤手空拳地向前衝，靠自己的拚勁跟聰明才智滿載而歸，然後享盡榮華富貴。

一九九九年，舍蓮娜在房價低檔時買了間房。幾年後房市起漲，她用增值的房子去重談貸款（借新還舊），結果手上立刻多出了兩萬一千美元可以周轉。六個月後她第二次重新貸款，這次套出了一萬兩千美元。靠著這些現金，她買下了人生第一處用來收租的房子：是租金最便宜的舊城區裡，一棟可分成兩戶出租的雙拼公寓。在此之後，靠著收租的獲利、重貸、以及投資客放的高利貸，舍蓮娜的房子開始愈買愈多。

她慢慢弄懂，租屋市場裡有一種人是中產階級，他們租房子時考慮的是自己的喜好與需求，第二種人是「逐水草而居」的年輕人，第三種是都市裡既買不起房子、又沒資格住公共住宅的窮人。²不同的房東會在不同的地方活動，而他們一般都會把房產集中在一個區域內來經營。在密爾瓦基這樣一個種族與各種界線涇渭分明的城市裡，房東得鎖定特定的族群來做生意：白人或黑人、窮人或大學生。³舍蓮娜最後決定專攻貧窮的黑人。

四年過去，舍蓮娜累積了三十六個出租單位，而且全部集中在舊城區。她開始需要兩隻手機外加備用電池、讀《富比士》雜誌、租辦公室，也開始朝九晚九的接受電話預約。昆汀辭掉了原本的工作，搖身一變成了舍蓮娜的物業經理，同時自己的名下也開始置產。在收租之餘，舍蓮娜還做起了「信用重建」，也就是類似代償的生意，同時成立了一家投資公司。另外她購置了兩輛十五人座的小巴，開了家公司叫「獄友連線」(Prisoner Connections LLC)，接送到威斯康辛州北部探監的女朋友、媽媽或小孩，一張票收二十五到五十美元不等。舍蓮娜算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她決定當個靠舊城區吃飯的企業家。

舍蓮娜把車停在拉瑪家門口，伸手拿出兩張驅離通知單。拉瑪住的這棟房子距離萊特街很近，而街上除了幾塊空地，還有兩處空地上放著紀念兇殺案死者的物品：有人放了泰迪熊、Black & Mild的平價雪茄，還有人寫了字條綁在樹幹。這裡是兩棟獨棟的雙層樓房，一共四戶，一前一後。兩棟房子都是長方形的格局，粗木陽台漆成了跟房屋輪廓一樣的藍灰色，外牆的牆板則像麥片碗裡吃剩的牛奶般白裡透棕。臨街的那棟房子有兩個門，分別給樓上和樓下用。兩道門前各有木頭台階，其中舊的那個已經掉漆，新的那個根本沒上漆。

拉瑪住在後棟的一樓，位置正好緊緊鄰巷弄。舍蓮娜將車開來時，他人正在外頭。幫他推輪椅的恰巧

是另一張驅離通知單的主人，名叫派翠絲。雖然坐著輪椅，但拉瑪有先把自己兩腿的義肢裝上。身為一個上了點年紀的黑人，拉瑪的上半身結實年輕，膚色像濕溼的沙。他理了個大光頭，臉上有一層薄薄的斑白鬍鬚。他身穿黃色的運動衫，鑰匙則直接掛在脖子上。

「喔，算我運氣好，一箭雙鵰。」舍蓮娜一派輕鬆地說著，將驅離通知單遞到拉瑪與派翠絲的手上。「妳差點就遲到了，」派翠絲說。她包著頭巾，穿著睡褲與白色的背心，露出右手臂的刺青：十字架上纏繞著緞帶，緞帶上寫著她三個小孩的名字。二十四歲的派翠絲年紀剛好是拉瑪的一半，但她的眼神比拉瑪更滄桑。她跟孩子住在前棟的二樓，一樓住著她媽媽多琳·辛克斯頓與她的三個弟妹。派翠絲將驅離通知單摺起來，塞進口袋。

「我現在要去練習，」拉瑪坐在輪椅上說。

「練習？練習什麼？」舍蓮娜問。

「我兩個兒子要練美式足球。」他看著手中的文件。「那個，我們要開始清理地下室了。我已經動工了。」

「他沒跟我說，」舍蓮娜答道。她口中的「他」是昆汀。房客有時候會幫房東做些雜工來抵房租，清理地下室就是其中一種。「那你要打電話跟我說啊，不要搞錯誰是老闆好嗎？」舍蓮娜開起玩笑。而拉瑪也很買帳地對她笑了笑。

派翠絲推著拉瑪離開的同時，舍蓮娜爬回到 Suburban 的駕駛座上，開始在腦海盤算起還有哪些待辦事項等著完成。她是個大忙人，要應付的人事物有：維修、收租、搬遷、廣告、建（築）物檢查員、社工、警察。她的工作漩渦裡有一百萬件小事，而這還沒算入會定期打斷她處理這些小事的大事。大小事加總一起，害她周日晚上沒空跟母親共進被稱為「靈魂食物」的傳統非裔料理。不過就在一個月前，她

租出去的房子裡發生了槍擊案。一名房客的新男朋友挨了三槍，當場血流如注。所幸這位新男友大難不死，目前在加護病房觀察。警方問完問題，收起黃色封鎖線後，舍蓮娜跟昆汀便得開始收拾善後。昆汀找來兩名幫手、幾副橡膠手套，還有一台 Shop-Vac 吸塵器。「妳背著我帶了個男朋友來？」舍蓮娜在同一時間質問起女房客。昆汀負責把地方恢復整齊，舍蓮娜負責盤問。夫妻倆的分工就是這樣。

槍擊案的幾天後，她接到另外一名房客打來的電話。對方跟舍蓮娜說她的房子要被勒令停租了。她一開始還不太相信，但開車來到房前，果然看到穿白色制服、戴工程帽的人，正將綠色板子釘上她房子的窗戶。這間房子的房客被抓到偷電，所以 We Energies 能源公司⁴的工作人員，從電線杆那裡斷電，然後又打電話通知市政府的社區服務部（the 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 Services，簡稱 DNS）。這幾名偷電的房客得當天走人。⁵

在美國大部分的地區，包括密爾瓦基，多數房客必須自付水電瓦斯費，但房客愈來愈拿不出這些錢來了。自二〇〇〇年以來，燃料與水電瓦斯費上漲超過百分之五十，這歸功於全球需求增加與價格上限調整。一整年下來，美國平均每五戶貧窮的租屋家庭，就會有一戶因欠繳費用而收到公共事業發來的服務中斷通知。⁶因為沒有能力兼顧房租跟這些公共事業的帳單，所以有些人會鋌而走險，付點小錢請親戚或鄰居幫他們偷接管線。全美每年被竊取的電量總值高達六十億美元，只比汽車跟信用卡的竊案金額低。⁷偷瓦斯要難得多，所以也較為罕見。罕見的原因還有冬天一到，瓦斯就不需要偷了，因為政府規定冬天不准斷瓦斯。但只要四月一來，不准斷瓦斯的命令取消，瓦斯公司就會大陣仗地帶著一疊疊中斷服務通知、跟一箱箱工具回到貧困的社區，每年大約有五萬戶的家庭會因為欠繳費用而被 We Energies 能源公司中止瓦斯供應。很多房客是冬天乖乖繳房租，暖氣的瓦斯費就擺爛；夏天改而欠房東錢，然後努力把瓦斯費還清。他們的目標是在天氣變冷前再次連上瓦斯的管線，這樣才能在冬天裡享受到政府不准中

斷的瓦斯供應。這樣的背景也說明了為何驅離的件數會在夏季跟初秋飆高，而後在十一月瓦斯開始強制供應後下降。⁸

舍蓮娜看著頭戴工地帽的社區服務部人員巡來巡去。沒有什麼比手上拿著手寫板的建物檢查員更讓房東灰心了，他們每天不是在勒令房子停租、就是張大眼睛檢查公寓的裡裡外外有無違法之處。每當接到報案，社區服務部就會派出建物檢查員。這個機構成立的宗旨在於保護城市裡最弱勢的租屋族群，視疏於管理的房東為假想敵。但包括舍蓮娜在內的房東們，總是認為房客報案的理由盡是些雞毛蒜皮或房子外觀的問題——而且經常認為這是為了不被驅離的緩兵之計或是挾怨報復。就這麼一眨眼，舍蓮娜便算起自己又得虧多少錢了：電線重拉可能得花幾千美元，還有偷電房客賒欠的租金也收不回來。她還記得自己是怎麼決定給這家人一次機會的。一個已經當媽媽的人說她想離開會動手的男友，舍蓮娜一聽就心軟了。儘管對方這兩年就被有過三次的驅離紀錄，舍蓮娜還是決定將房子租給她與孩子。我又感情用事了，舍蓮娜心想。

舍蓮娜轉動休旅車的方向盤，離開萊特街向北開去。既然已經來到這附近，索性再多跑一個點：她位於第十三街跟基輔街口的雙拼公寓。舍蓮娜上個月只收了押金跟部分租金，就讓一名新房客住進這裡。新房客身穿法蘭絨的長袖襯衫，坐在門階上一邊哄著胃絞痛的孩子，一邊跟倚著車身的母親說話。一看到舍蓮娜來，她立刻蹦出一句，「我兒子會生病，都是因為這間房子太舊了。」這位媽媽的聲音聽得出疲憊。「窗戶上有個洞，等這麼久，我算很有耐性了。我的意思是我要閃了。」

舍蓮娜歪頭，感到困惑。窗戶是有洞，但不大，而且外頭也不冷，密西根湖裡還有小孩在游泳。房子裡面是能有多冷？

「我已經打電話去市政府了，」嬰兒的外婆從旁補了一刀，同時離開原本貼著的車身。她的身材修長，頭髮因為夏天尾聲的濕氣而顯得毛躁。

舍蓮娜深吸口氣。這個街區裡的爛房子很多，而這間位於十三街的房子並未完全符合規定，她心知肚明。但認真講起來，密爾瓦基幾乎沒幾間符合規定的房子，畢竟密爾瓦基的多數房屋極度老舊，在地的建築法規又超級嚴格。「感謝」房客母親的雞婆，建物檢查員會在幾天之後上門。他會推推看樓梯的扶手穩不穩，對著窗戶上的洞拍照存證，還會搖一搖樞紐不知道跑到哪裡去的前門。反正每抓到一項違規，舍蓮娜都得花錢。

「妳這樣做沒意思啦，」舍蓮娜說，「妳女兒才是我的房客。」

「妳先把窗戶修好再來說，」嬰兒的外婆不甘示弱。

「窗戶我們不會不修啊！但妳女兒又沒打電話跟我們說……」

「她沒電話，所以我只好幫她打給市政府啊！」外婆沒讓舍蓮娜把話講完。

隨著兩人愈吵愈兇，旁邊開始圍起一圈看熱鬧的人。「她誰啊？」問這句話的是個小男生。「房東，」有人替他解答。

「媽，妳要打給建物檢查員怎麼沒跟我說。」女房客的口氣聽起來不知所措。

「現在說這個都太晚了，事情做了就是做了，」舍蓮娜說。她手插在臀上，搖了搖頭，看著眼前這對年輕母子。「每次給我製造問題的，都是那些我心想幫忙的人。我不是說妳給我製造問題，但雞婆愛管閒事的是別人，而住在這裡的是妳，所以妳也只能概括承受。」

「話不是這麼說的。」外婆逼近舍蓮娜，後面看熱鬧的也跟了上來。「我問妳，假如今天她是妳女兒，這些是妳的孫子孫女，妳會怎麼做？」

舍蓮娜沒有被嚇退。她抬頭看著這名外婆，還注意到她的金色門牙。舍蓮娜的回答是，「我一定會好。好跟房東溝通，不會動不動就打電話給市政府。」

舍蓮娜推開群眾，大步走向休旅車。她一回到家便開門大吼，「昆汀，我們又倒大楣了。」

舍蓮娜坐進她到處堆滿資料的居家辦公室。她與昆汀的家裡有五個房間，辦公室就是其中一間。他們住在開彼托路（Capitol Drive）裡一個靜謐的中產階級黑人社區，屋裡有裝潢過的地下室，地下室裡安裝有按摩浴缸。舍蓮娜和昆汀為自家挑選了米色的皮革沙發、大器的黃銅水晶燈具，還有金色系的窗簾。廚房空間很大，但因為他們多半外食，所以整個看起來像新的一樣。打開冰箱，通常你只得到餐廳的打包。

「怎麼了？」昆汀邊回答邊下樓梯。

「你知道那個住十三街樓下的女生嗎？她媽媽打電話給建物檢查員……她媽媽剛才在外頭滿口屁話！」

聽完故事，昆汀說的第一句話是，「趕她走。」

舍蓮娜想了想後同意。於是她伸手從抽屜裡拿了張五天後驅離的通知單，馬上填了起來。法律明令禁止房東對通報社區服務部的房客「秋後算帳」，但如果是欠繳房租／或者房客有其他違反租約的情事，那房東隨時都可以申請將他們逐出家門。

稍晚等昆汀跟舍蓮娜把休旅車開到第十三街的時候，天色已經暗了。公寓的門沒關，舍蓮娜沒敲門就直接走進去，將驅離通知單遞到年輕女房客的手裡。「拿去，看妳能不能申請到什麼補助。」

舍蓮娜離開的時候，後頭跟出了一名男人。他從沒點燈的門廊上喊了聲不好意思，叫住剛與昆汀在街上會合的舍蓮娜。「你們現在是要趕她走就是了？」

「她跟我說她想搬走啊，所以我想她應該是沒打算繼續付租金了，」舍蓮娜回答。

「她是要妳把窗戶修好。」

看著舍蓮娜的昆汀突然冒出一句，「這不關他的事吧。」

「這太關我的事了，媽的，我是她繼父！」

「這位大哥，你又不住這兒！」昆汀吼了回去。

「這種爛地方誰想住啊……幹！你說不關我事是什麼意思？」

昆汀開車門，抽出他的防身腰帶，上頭的裝備有手銬、小隻的警棍，還有像小滅火器般大小的防狼噴霧劑。過往的經驗告訴昆汀，來這裡還是要小心為上，他在這遇過一名男房客說要從昆汀的口袋裡把押金搶走，還遇過一個人說要朝他的臉上開一槍。

此時漆黑的前廊上又加入了女房客的媽媽。「妳要趕她走嗎？」她劈頭就問。

「她沒交房租，」舍蓮娜說。「你們要幫她繳嗎？」

「我才不管咧，拜託，」繼父的口氣像在自言自語。他不想管的並非是繼女要被驅離這件事，而是事情在這個漆黑的深夜，場面會鬧得有多難看。

「你不管那我也沒在怕的，」昆汀噙了回去。

「我要揍到你他媽的屁股開花，死黑鬼……敢說我跟這件事沒關係。」

「本來就不關你的事，」被昆汀往車上拉的舍蓮娜大喊。「根本不關你的事！」

幾天後那名女房客搬走了。接著舍蓮娜接到當地一家庭間社會服務機構「溫暖滿懷」(Wraparound)打來的電話。該機構的社工說有個案主與她的兩個孩子正在找地方住，「溫暖滿懷」會付押金跟第一個月的房租，後面這段話讓舍蓮娜聽了很開心。這個新房客的姓名，就是阿琳·貝爾。

- 1 婦幼營養補助 (WIC) 是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的縮寫，這指的是由美國農業部食物與營養局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of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所辦理的低所得者營養扶助計畫，補助的對象包括懷孕中、哺乳中與產後半年的婦女、足歲以下嬰兒及五歲以下的幼兒。補助的形式包括營養(食)品、門診諮詢與疾病篩檢暨醫療/社福/社會機構的轉介。
- 2 密爾瓦基租屋者的中位數家庭年所得是三萬零二百九十八美元，較全市整體人口的水準低了將近五千五百美元。詳見 Nicolas Retinas and Eric Belsky, *Revisiting Rental Housing*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nd the Harvard University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2008)。
- 3 房子買在密爾瓦基的哪個地區，會取決於你的身分背景，特別是你的所屬族裔。密爾瓦基的房東裡，會租給同種族或族裔者為多，會租給與自身不同種族或族裔者為少數。密爾瓦基大部分的白人房客(百分之八十七)是向白人房東租房，而大部分的黑人房客(百分之五十一)是向黑人房東租房。整體而言，密爾瓦基過半(百分之六十三)的房客向白人房東租房。但相對於將近五分之一的人向黑人房東租房，向拉丁裔房東租房的人僅將近九分之一。在拉丁裔的租屋者當中，約半數向同屬拉丁裔的房東租房，半數則向白人房東租房。密爾瓦基百分之四十一的拉丁裔租屋者認為，他們的房東生於美國境外。以當房東為業，一直是移民者打入美國中產階級的一條路徑。在二十世紀初，密爾瓦基的波蘭裔移民紛紛墊高房子，蓋起了陽光屋(地下室)，然後再把這間地下室當公寓給租出去。隨著密爾瓦基的南部從以波蘭裔為主轉變成以拉丁裔為主，來自墨西哥與波多黎克的移民也變成了把「波蘭公寓」租出去的人。參見 John Gurda, *The Making of Milwaukee*, 3rd ed. (Milwauke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999]), 173。
過去幾十年，典型的舊城區房東都是白人。但如今你愈是深入舊城區，就愈有可能發現自己的房東是黑人：在至少三分之二的居民屬於非裔的社區當中，有四分之三的房客的房東是黑人。關於過往在黑人社區裡的白人房東，參見 St. Clair Drake and Horace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45), 718。

- 密爾瓦基大部分的房客都是向男性租屋（密爾瓦基百分之八十二的房客表示是向個人而非一對夫婦租屋，而在「獨行俠」的房東之中有百分之六十二屬於男性）。按照上述的趨勢，舍蓮娜應該是一個例外。但當她在拉瑪的家門外以黑人房東的身分下車與她的黑人房客見面時，她又從例外變回了常態。《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 譯註：We Energies 能源公司是威斯康辛州與部分密西根州的電力供應商，也是威斯康辛州的瓦斯供應商。
- 5 我並沒有親眼目睹這場事件。該場景的重建是透過與舍蓮娜、昆汀還有社會服務團體「社區倡議」（Community Advocates）的社工所進行的訪談。
- 6 在這當中，約每七戶就會有一戶的水電瓦斯會被切斷。一個家庭如果住在危險的街區，租的房子又搖搖欲墜，那他們的房租負擔自然會小於住在鬧區閣樓豪宅的富裕家庭，但兩者的水電瓦斯支出卻往往是大同小異。在某些案例中，底層租屋家庭的水電瓦斯支出甚至會高過金字塔頂端的租屋家庭，原因是前者可能負擔不起裝設有較厚絕緣隔熱與雙層玻璃窗戶的建築、或有能源之星（Energy Star）認證的家電。以全美而言，須自行負擔水電瓦斯且年所得在一萬五千元以下的租屋家庭，平均每個月得花一百一十六美元在水電瓦斯費上；需自行負擔水電瓦斯且年所得在七萬五千元以上的家庭，則平均每個月花一百五十一美元在水電瓦斯費上。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nsumer Price Index, 2000-2013*; 《美國住房研究》2013, Table S-08-R0; Michael Carliner, *Reducing Energy Costs in Rental Housing: The Need and the Potential* (Cambridge: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3).
- 7 We Energies 的服務區域不僅限於密爾瓦基，而是延伸到威斯康辛州的其他區域乃至於密西根州的上半島（Upper Peninsula）。該公司每年處理的竊電案約四千件（個人通信：Brian Manthey, We Energies, July 22, 2014.）參見 Peter Kelly, "Electricity Theft: A Bigger Issue than You Think," *Forbes*, April 23, 2013, n.a., "Using Analytics to Crack Down on Electricity Theft," *CIO Journal*,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 2013.
- 8 冬天不得中止服務的規定，適用於透過瓦斯與電力所供應的暖氣。切斷瓦斯的件數估算是根據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與 We Energies 公司的布萊恩·曼提（Brian Manthey）進行的了解。關於逐月的驅離案件趨勢，參見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Figure A2.

第二章

拚房租

在舍蓮娜送來驅離通知單的幾晚後，拉瑪回到了他在第十八街跟萊特街口的公寓裡，跟他兩名兒子還有兒子的朋友打起了撲克牌，他們玩的是類似橋牌的黑桃王¹。跟平常一樣，他們在一張木頭小餐桌前圍成一圈，一會兒用力摔牌在桌上，一會兒又像賭神般用手腕的巧勁把牌給轉出去。住附近的男孩子都知道，無論白天晚上，他們都可以到拉瑪家吃點東西，運氣好的話還能抽根大麻菸，然後很快來一局黑桃王。

「黑鬼，你的黑桃打光了吧？」

「看好，我們要痛宰他們了。」

拉瑪的對家是巴克。十八歲的巴克是附近年紀最長的孩子，綽號是「大哥」(Big Bro)。面對面坐著另外一組人，是拉瑪十六歲的兒子路克與路克的好友狄馬克斯。十五歲的艾迪在旁邊弄音響，他是拉瑪的小兒子。另外四個人也是附近的男生，他們在等輪到他們上場。拉瑪坐在輪椅上，把從腳延伸到脛骨上端的義肢直挺挺地擱在他的床邊，在粗木地板上投射出像人一般的剪影。

「警察都瘋了，」巴克端詳著自己的手說。他是名即將畢業的高中生，平常會在學校的自助餐廳兼差打工。若你在自助餐廳見到他，會看見他戴著髮網，包住髮量豐厚的辮子頭。巴克晚上睡在他爸媽家，但白天都在拉瑪家度過。被問到為什麼，他會直盯著自己十二號的靴子，淡淡地回上一句，「不為

什麼。」這群男生常一道去店裡購物或者練美式足球，他們會動輒九個十個人湊在一起，趾高氣揚地走在萊特街上。這樣的他們被密爾瓦基警察攔下來簡直是家常便飯。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買大麻時要單獨行動。「下一次，我就會說，『你攔我做什麼？』」巴克接著說，「我們有權利問他們嘛……他們一定要看到什麼、聞到什麼或聽到什麼才能臨檢吧。」

「他們才不用，」拉瑪回答。

「他們要啦，老爹！學校是這樣教的。」

「那就是學校教錯了。」

狄馬克斯笑了一聲，接著拿打火機點了根他剛捲好的大麻菸，吸一口後將菸傳下去，牌局正式開始。一開始大家出牌都很快，隨著手上的牌愈來愈少，出牌的節奏也愈來愈慢。

「警察過來的時候，」巴克很堅持地說，「就算你在開車時被臨檢，車窗也不能全開。只能開一點點。」

「你想得美，」拉瑪忍不住笑了出來。

「你說什麼呢，老爹！」巴克顯然不服氣。

「跟你說，不要想當出頭鳥啦，」從中插進來的是狄馬克斯。狄馬克斯之前才因為拉瑪說的「油嘴滑舌」而被警察抓起來。「講不聽，到時候苦的是自己。」

此時拉瑪又落井下石地補上一句，「出了事可別打『對方付費』的電話給我喔。」大夥兒笑得更大聲了。語畢他吸了一口大麻菸。「孩子啊，」他放輕了音量說，「我都五十一（歲）了，什麼事我沒碰過。」

「警察不會保護我們的啦。」巴克說。

「我懂你為什麼這樣想，但警察也不是都一個樣……要是我住在一個很亂的地方，我也會希望警察好好掃蕩一下。」拉瑪丟出了方塊 K，看了看左邊的狄馬克斯。「來吧，孩子，出牌吧。」方塊 A 已經有人出過了，他估計方塊 Q 是在狄馬克斯手上。狄馬克斯回頭看了拉瑪，厚厚的眼鏡後方是一幅撲克臉。

「老爹，只有跟你同角頭的人才會罩你……如果有人膽敢帶槍來撒野，同條街的只要有槍，大家都會拔槍相助的。」

「小子，我打過越戰耶，開槍我還可以。」

一九七四年，十七歲的拉瑪看了一則廣告，接著跑去加入海軍。對他來說，海軍生涯裡百無聊賴的海面，有滿是異國風情的風景、上岸休假的派對、吞進肚裡的迷幻藥丸，還有花錢如流水。拉瑪不懂為什麼麥迪遜²那群披頭散髮的大學生會那麼反對越戰，為了反戰被警棍打破頭，甚至還在大學裡炸掉了一棟大樓，拉瑪去打仗可是玩得很開心。但也可能太開心了，一九七七年他遭到勒令退伍。

「但子彈可不長眼，」拉瑪接著說。「那個，你們聽我說，先前我們不是陪狄馬克斯出庭嗎？」拉瑪一說起故事，大家的牌就打不下去了。在開庭前，拉瑪說，他們一夥人看到有個年輕人不過才十來歲就被判刑十四年，原因是他哥哥把一個毒蟲活活打死，而他人在旁邊看著。「他在法院哭得撕心裂肺的。」

「他們會這樣亂栽贓，是因為那小毛頭是黑人吧，」巴克說。

「那你還不好好想想自己該怎麼做，你不是黑人嘛。」

在巴克笑出來的同時，狄馬克斯將牌壓在桌上，是黑桃八。「這是我老媽教的！」他興奮地大叫。黑桃王顧名思義就是黑桃最大。勝負已定，狄馬克斯開始收牌。

「嘖！」拉瑪說。發洩完，他把眼光移回巴克身上，「別做傻事啊，不值得……坐牢可不是開玩笑的。進到牢裡你每天都得拚命，不拚你會活不下去。」

「這我知道。但有時候氣到一個程度我會忍不住想出手，誰也攔不住。」

「你要長大啊，孩子。」巴克深吸一口大麻，拉瑪馬上「機會教育」，「還有，抽這寶貝要慢一點，你這老菸槍。」拉瑪特地拖長了老菸槍三個字，還拉高音調，做出有如鴨子般扁扁的音色。

被這麼一逗，巴克笑到快翻過去，大麻菸也抽不下去了，但他有聽進拉瑪的話。大麻又輪到他的時候，他客氣地說，「我不用了。」

兩名兒子在學校上課的時候，拉瑪會邊聽老歌邊打掃，並來上一杯加糖的即溶咖啡。他會推著輪椅到定位，拉好煞車，然後將灰塵掃進長柄的畚箕裡。拉瑪沒讓兩個孩子擠在一間單人房裡，而是路克與艾迪一人一間，兩人都有自己的床，而且還是金屬床架。客廳的一角放著拉瑪的床，另外一邊則擺了青苔色的沙發、與美式足球隊友的合照、白色的假花，外加養了孔雀魚的小魚缸。這算是間有點空蕩但不失整潔的公寓，採光很充足。看一眼放食物的儲藏室，你會推理出這裡的住戶有強迫症：午餐肉疊得整整齊齊，各安其位；紙盒裝的早餐麥片也像立正站好般等待校閱；高湯跟豆子罐頭則按照種類分門別類，正面朝前。拉瑪自己改裝了一個加州波拉酒莊（Clos du Bois）的紅酒酒架，現在上頭放的是一台小音響、餐盤，咖啡罐裡裝的則是菸草跟 Midnight Special 牌的捲菸紙。

這個家並不是一開始就有今天的模樣。拉瑪第一次來看房子的時候，這間公寓簡直是一蹋糊塗，廚房裡堆著沒洗的碗盤，蛆都長出來了。但拉瑪需要個家——跟兩名孩子窩在自己媽媽家的地下室房間裡不是辦法，而且住媽媽家有「宵禁」，規定所有人都要在晚上九點前回家。再來就是拉瑪看出了這間公寓的潛力。舍蓮娜免了拉瑪的押金，主要是她判斷拉瑪應該申請得到英文縮寫是 SSI 的「社會安全生活

補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也就是美國逐月發放的「聯邦救濟金」，發放對象是年長且有精神或肢體障礙的低收入民眾。沒想到審查結果並不如人意。

一放學，男孩子就會開始到拉瑪家「集合」——有時是跟著路克與艾迪一起回家，有時是不請自來。經常到了晚上天色暗下來之後，這群男生就會湊錢買一、兩根大麻菸抽，然後撲克牌也會跟著出籠。拉瑪的管教風格，無論是對自己的親生兒子、還是他當自己兒子看待的其他孩子，都算是很開明，就像沒脾氣的叔叔在跟姪子溝通一樣。「凡事都瞞不過上帝，所以有事也不要瞞著老爹，」他會這麼跟他們說，「你在家怎樣，在這裡也一樣就好了……同樣的事情我寧可你們到我家來，在我的眼皮底下做，也不要跑到外面的街頭做。」拉瑪邊抽菸邊與孩子們談笑風生，順便「傳授」一些跟工作、性、毒品、警察有關的人生經驗。遇到孩子抱怨女生，拉瑪會試著「平衡報導」，「你們都講女生怎樣怎樣，但搞亂她們生活的好像都是男人。」拉瑪會看孩子們的成績單，念他們沒把功課做完。「他們覺得我在跟他們玩，但其實我是在看顧他們。」拉瑪有辦法當這些孩子的「保姆」，是因為他不會一直出門，工作上他會值長班，這樣就不用一天到晚出門。跟拉瑪同街區的人大多都得工作；孩子們很少能見著上班的大人，除了他們穿著燙過的制服衝著去開車時以外。

海軍退伍後，拉瑪做過好幾個工作。他打掃過密爾瓦基公鹿隊³的主場布萊德利中心，也在阿提亞實驗室⁴裡開過堆高機，負責在生產過程中倒入化學原料。不過這都是他還能走路時的事。失去雙足後，他申請過兩次聯邦救濟金，但兩次都遭到拒絕。拉瑪回憶他被告知的理由是他「還能工作」。這一點拉瑪不會想跟對方爭辯，但好工作並不是到處都有。

說到好工作，密爾瓦基還真的曾經到處都有。但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老闆們在便宜勞動力的驅

使下，不是遷廠到海外，就是把生產線搬到位於美國的「日照帶」⁵。日照帶的一個特色是工會的功能微弱，或甚至根本沒有。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之間，密爾瓦基的製造業減少了五萬六千個工作機會，情況比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還嚴重。密爾瓦基是個戰後幾乎人人有工作的城市，失業率卻於此時突破二位數。有些幸運兒在新興的服務業找到工作，但薪水也比不上從前。一位歷史學者是這麼說的，「一九八七年之前，在阿利斯·查默斯⁶的老工廠裡當機具作業員，時薪少說有十一點六零元，但在工廠舊址上重建的購物中心裡當店員，你只能賺到每小時五點二三元。」⁷

這類的經濟轉型——當年橫掃全美各城市的這種經濟變革——讓密爾瓦基的非裔勞工蒙受了重大打擊，畢竟他們有半數的人都在製造業上班。每當有生意要收攤，老闆都會將舊城區的工廠關起，而舊城區正是密爾瓦基黑人的大本營。黑人的貧窮比率在一九八〇年升至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九〇年再惡化到百分之四十二。李察茲街 (Richards Street) 跟開彼托路口 (Capitol Drive) 曾經有一間「美國汽車公司」⁸的工廠，位於密爾瓦基以黑人為主的北部，如今這裡已經變成沃爾瑪超市 (Walmart)。今天你去密爾瓦基看看，你會發現梅諾莫尼河谷 (Menomonee River Valley) 的岸邊有一排過往的鞣皮工廠，就像陵寢一樣埋葬著密爾瓦基工業的黃金歲月。舒利茲 (Schlitz) 跟佩伯斯特 (Pabst) 的釀酒廠也都早就關門大吉。密爾瓦基現在每兩名處於工作年齡的非裔男性，就有一個為失業所苦。⁹

一九八〇年代的密爾瓦基曾是「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 的「震央」所在；一九九〇年代，這兒又成了「反社福運動」的熱點。當年，在柯林頓總統微調其「終結現行的社福制度」計畫的同時，一位名為傑森·透納的保守派改革者，也在密爾瓦基啟動了一場席卷全美各級民意代表的社福政策實驗。透納的計畫被命名為「威斯康辛辛要工作」(Wisconsin Works, 簡稱W2)。這裡說的「要工作」可不是開玩笑的：想領到社福支票，你就得去工作。你可以自己去私部門任職，也可以去做政府提供的社區服務工

作，但就是不能無所事事。作為配套，托育補助跟醫療補助都擴大了規模，但 \llcorner 意味著人只有打卡上班的時數才能換算成社福補助，即便這所謂的工作只是把小玩具分成不同的顏色，好讓領班可以打亂之後讓你明天又有「工作」可做。 \llcorner 也意味著不乖乖照著這劇本走的人就會連食物券都領不到。 \llcorner 讓密爾瓦基多達兩萬兩千戶家庭從社福名冊上被除名。就在密爾瓦基建立了美國社福史上第一個真正「以工代賑」計畫的五個月後，柯林頓總統正式簽署福利改革，列入聯邦法律。¹⁰

就這樣，在一九九七年，W2正式取代「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¹¹福利，開始提供兩種不同的津貼：工作者可月領六百七十三美元，未工作或（多半因為身心障礙而）無法工作者可月領六百二十八美元。像拉瑪被認定是未工作者，所以他領的是較少的六百二十八美元，也就是代號為「W2-T」(W2-Transitions)的津貼。在扣掉每個月五百五十美元的房租之後，拉瑪還剩下七十八美元可以過活，相當於一天只能花二點一九美元。

拉瑪搬進舍蓮娜的公寓後沒多久，上述的津貼就開始了，但也就在同時，他收到了兩張誤寄的支票。而在威斯康辛州兒童家庭署(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編纂的《權利與義務指南》(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當中，兒童家庭署告訴民眾的是：「無論是本署或是您自己造成誤發，溢領的津貼都必須歸還。」¹²聽起來貌似有道理，但你可以試著把這段話說給要靠社福支票養兩名青春期男孩的單親爸爸聽。拉瑪兌現了兩張支票，然後替路克跟艾迪買了鞋子、衣服跟他學生用品，也給新家添了些窗簾與家具。「我怎麼可能不花，上面都印著我的名字了，」他對發現錯誤而打電話來找他的社工這麼說。社工將溢付的金額從下個月的支票中扣掉，而這也讓拉瑪積欠了一個月的租金沒辦法繳。

拉瑪自認幫舍蓮娜跟昆汀整理地下室，應該也值大約兩百五十美元。畢竟地下室到處都是發霉的衣服、垃圾，還有狗大便，簡直就跟他的噩夢一樣（他總是夢到自己得爬進一個怪誕而陰暗的地下室買毒

品)。他沒讓孩子幫忙清理地下室，覺得不應該委屈他們，於是他獨自一人將地下室弄乾淨，搞到他的殘肢都痠痛到不行。然而，他前前後後忙了一周，舍蓮娜卻只算他五十美元，算起來拉瑪還欠舍蓮娜兩百六十美元。

基本上，每個月多繳些房租來補欠款是不可能的任務。扣除固定的房租，拉瑪剩下的錢都得購買家用與付電話費帳單。為此拉瑪按密爾瓦基的行情價，以七十五美元賣掉面額一百五十美元的食物券。冰箱跟食物儲藏室到月底就會唱空城計了，但路克跟艾迪可以去跟祖母蹭飯吃。至於平日來串門子的孩子，都已經知道不要亂吃拉瑪家的食物。

但這麼拚恐怕依舊不夠。拉瑪要是想保住這個家，他還得再找些別的差事，而派翠絲住的二樓空出來，算是給他一個靈感。接到舍蓮娜的驅離通知單之後，派翠絲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她最早就是帶著三名孩子跟母親多琳以及三個弟妹擠在一樓的兩房裡。收到粉紅色的通知單後，她也就默默帶著孩子又回到樓下。

知道這個情況後，拉瑪盤算著舍蓮娜會需要重新粉刷二樓。於是他自告奮勇要舍蓮娜將工作交給他。舍蓮娜答應了，並且說她會讓昆汀送油漆跟工具過來。「叫他多送點，寶貝，我要組個工班。」

結果巴克跟狄馬克斯都跑來了，一道的還有路克跟艾迪，再來就是六個住附近但是把拉瑪這兒當成自家的少年。他們在空曠的兩房公寓裡一字排開，將滾筒跟油漆刷往約十九公升的大油漆桶裡一沾，然後大肆粉刷起來。他們工作得很認真，無聲的二樓瀰漫著一股嚴肅的氣氛。過不久，有人索性將帽 T 跟上衣都脫了，打著赤膊比較好工作。¹³

這時拉瑪停下手，打量眼前畫面。不過是去年冬天的事，他曾吸食快克¹⁴吸到嗨，爬進一間荒廢的房子，毒品藥力退了之後，他才發現自己被困在裡頭，因為腳凍僵了爬不出去。從海軍退伍後，回到家

鄉的拉瑪仍舊天天在外頭飲酒作樂。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快克入侵了密爾瓦基的街頭，而拉瑪也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他在阿提亞的同事會知道他不對勁，是因為剛發薪水沒發幾天，拉瑪就連買香菸的錢都沒有。他因此丟了工作，公寓也沒法租了。這之後，他開始帶著路克跟艾迪流連於收容所與廢屋之間。晚上太冷，沒被子可蓋，他們就會把地毯給拆了。路克跟艾迪的母親當時還在，但毒癮終究讓她失去了健康與理智，也讓她拋下兩名兒子。被困在廢屋的那幾天裡，拉瑪吃的是雪。凍瘡讓他的腳腫到發紫，像是爛掉的水果。到了第八天，神智不清的他從樓上的窗戶縱身一跳。回首這段過往，他會說是上帝將他扔了出去。在醫院醒來時，他已經沒了腿。在此之後，除了短暫兩次的毒癮復發外，他沒再吸過快克。

「我很幸福，」拉瑪看著路克跟艾迪有感而發。從滾筒上飄散出的白漆，像霧一樣弄花了兩個兒子的黑色皮膚。「我有兩個好兒子。」

事隔一個月，舍蓮娜在滂沱大雨中開著車。車流發出的聲音就像有人從後門丟出上千個拖地的水桶般那麼誇張。她這麼拚，是要去參加一場會議。說得更精確點，是要去密爾瓦基最南邊的機場旁的西佳飯店，參加由「密爾瓦基不動產投資人聯誼會」所主辦的會議。出席的五十人裡，有投資客、有（房屋）黴菌檢測師、有律師，或者其他與不動產有關的從業人士。不過話說回來，這群人身分的最大公約數仍是「房東」。這是個陽盛陰衰的活動，現場一堆男人——少年輕打領帶的男人只是房東的寶貝兒子，但筆記還是抄個不停；還有身著皮外套，用靴子在點腳的中年男人；以及戴棒球帽，穿法蘭絨襯衫，指節像樹瘤的老男人。¹⁵ 萬穠綠中一點紅的舍蓮娜已經夠突出，更別說她還是名黑人。除了她三十年前從牙買加搬來的朋友洛拉以外，舍蓮娜是在場唯一的黑人，其他人幾乎都是白人，開口閉口都是像艾瑞克、馬克、或凱西這些白人的名字。

像這樣的會議，在兩代人之前會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從前很多人都是兼差當房東：有些是工廠的作業員、傳道的牧師、警察，在陰錯陽差成了屋主之後（比方說因為繼承了老人家的財產），才開始覺得可以靠房地產賺點外快。¹⁶但這四十年來的變化是物業管理成了一門專業。從一九七〇年至今，以物業經理為職業的人數成長了三倍多。¹⁷隨著房東的資產愈買愈多，並且愈來愈以房東自居（相對於意外變成樓下屋主的人而言），各種職業協會與團體也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而以這些協會或團體為中心，社會又因此應運而生各種外圍的後勤服務、認證資格、職訓教材，乃至於融資工具。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出版資料顯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七五年間，以管理租賃公寓為主題的出版品只有三本，但到了一九七六與二〇一四年間，這個數目卻暴衝到二百一十五本。¹⁸姑且不論某個都市裡的房東覺得自己是「專業人士」，「住」這件事成了一門生意是不爭的事實。

这天晚上的講者是全美自助倉儲經紀人公司的肯·雪爾茲。在賣掉名下的保險公司後，雪爾茲便開始想方設法要打進不動產市場。他一開始嘗試的是雅房出租（公寓分租），客群以沒什麼錢的單身男人為主。「這是收現金的，錢很好賺，但我已經不玩這個了，」他這句話逗笑了全場。「做這個我有賺到錢，而且請別誤會，我很愛賺錢，但我不愛的是到處跑來跑去，每天得跟這些住雅房的人渣打交道。」¹⁹本身同樣有幾間分租公寓的舍蓮娜也笑了。就在此時，雪爾茲發現了自助倉儲這個「寶」。「自助倉儲有可以跟租屋比擬的利潤，但……」他放低聲音，眯起眼睛，「但你不用跟人瞎攪和，你只收他們的東西！……這是美國這麼大個經濟體裡的甜蜜點，是會讓你收錢收到手軟的水龍頭。」

在場的房東們都把肯·雪爾茲當成了偶像，也不管他其實住在伊利諾斯州（而不是密爾瓦基所在的威斯康辛州）。最後當他的演講畫下句點，全場也瞬間掌聲如雷。

其中有個人拍手拍到站了起來，他是密爾瓦基不動產投資人聯誼會的會長，一名留著八字鬍、挺著

大肚臍的男人。每當講者難找時，他會將會議改成「盍各言爾志」的座談，讓大家有機會集思廣益。某晚，就在這樣的座談會上，一位來自「鉛與石綿資訊中心」的女士一開口就對全場常因為想替房子除鉛而虧錢的房東說，「鉛其實可以幫你賺錢。」有名房東問到，如果檢測石綿的結果是陽性，自己有沒有義務通報給市府或房客知道。「沒有，不需要，」這位女士回答。

現場的對話繼續向下推進，有其他人問到了扣押薪資的事情。一名律師在此時跳出來為全場解惑，原來房東有權申請扣押房客的銀行存款與最高兩成的固定收入，只要最後給對方留下一千美元即可。至於社福補助的領受人則完全不可以碰。

「那房客的退稅可以攔截嗎？」丟出這個問題的是舍蓮娜。

律師有點被這問題嚇到，「喔，這不可以喔，有這權力的只有州長一個人。」

舍蓮娜其實是明知故問，她早針對這個問題做過功課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多此一舉呢？她並不是真的在問問題，而是在對現場的「艾瑞克、馬克跟凱西」傳遞訊息，除非收到房租，否則她可不會輕易善罷干休。不少白人房東知道房價便宜的舊城區是塊賺錢的寶地，但不要說有時得送驅離通知單去給房客，光是想到要去密爾瓦基的北部收租，許多人就會緊張地打退堂鼓。舍蓮娜希望這些白人房東知道可以找她幫忙，只要價格合理，她會替他們管理房子，或是讓他們諮詢貧民窟的何處可以置產。她會願意以仲介的身分當他們跟密爾瓦基黑人之間的橋梁。會議結束後，白人房東果然把舍蓮娜團團圍住。當天舍蓮娜穿了件背上用水鑽貼成「Million Dollar Baby」²⁰字樣的牛仔外套。她一邊談笑風生，一邊收名片，同時嘴裡還不忘提醒大家，「北部沒什麼好怕的！」

就在其他人離席後，舍蓮娜跟洛拉在走廊找了個安靜的角落講話。

「超扯的，」舍蓮娜開始不吐不快。「比扯鈴還扯！我跟那個拉瑪·李察茲又槓上了——就是那個

沒有腿的男人。他這個月沒交齊房租。」

「他少給妳多少？」洛拉的聲音稍稍帶著一絲威斯康辛東南部的口音²¹，平日的她是名圖書館員。她比舍蓮娜年長，那晚她的打扮是深色長褲、金耳環，還有層次分明的紅色女性襯衫，整體優雅。她一邊說話，一邊將絨毛襯裡的大衣在大腿上摺好。

「三十美元。」舍蓮娜聳聳肩。「但重點不是金額，我在意的是原則問題……他之前給我油漆得亂七八糟，當時算起來就已經欠我兩百六十元了。」

話說跟孩子們粉刷完之後，拉瑪打了電話讓舍蓮娜過來驗收。舍蓮娜到現場一看，發現孩子們不但沒有把牆上的洞給補起來，而且還把白漆滴到牆壁的咖啡色收邊上，甚至忘了刷食物儲藏室。拉瑪的說法則是昆汀沒將補土跟咖啡色的油漆送來。「他沒送你不會問嗎？」舍蓮娜噙回去。她連一毛錢也不肯從拉瑪欠的金額中扣除。

「然後啊，」舍蓮娜接著說，「他也沒跟我說一聲，就把浴室的地板給鋪了，還自己從房租裡扣了三十元。」原來是拉瑪在油漆的時候發現派翠絲的舊家有一盒磁磚，於是他就拿這當材料，重鋪了浴室的地板。他拿刷剩的油漆將磁磚一片片給貼上去。「我跟他說，『不要再自己亂扣房租了！』再說這傢伙還欠我錢耶，他有什麼資格自己扣房租？」

洛拉先把翹著的腿放下，又翹回去。「我知道他這種人，他就是要在耍花樣啊。可以叫他滾了……他們這些人滿腦子就是要占便宜、占便宜、占便宜。」

「問題是，」舍蓮娜又將話題繞回拉瑪粉刷牆壁的事情，「刷個油漆我怎麼可能花兩百六十元。」

「我找人刷一個房間只要三十元，五個房間刷到好也才一百五十元。」

「才沒有，才沒有，才沒有，我們黑人二十元就能刷一間了，頂多二十五元。」

「就是說啊！」

「反正我的認知是他還欠我兩百六十元。不好意思，我少算了，加房租他現在欠我兩百九十元。」
這兩名老朋友聊到都笑了，而舍蓮娜現在真的很需要笑一笑。

註釋

- 1 譯註：Spades，類似（合約）橋牌，但叫牌時只有墩數而沒有哪個花色為王的問題，因為王牌規定是黑桃。
- 2 譯註：Madison，密爾瓦基所屬的威斯康辛州首府。
- 3 譯註：Milwaukee Bucks，美國職籃 N B A 東區中央組的球隊名。現任總教練是傳奇球星傑森·基德（Jason Kidd）。
- 4 譯註：Athea Laboratories，主要生產貼牌產品（代加工）的化學產品供應商，營運項目有殺蟲劑、擦拭劑與地板的保養劑。
- 5 譯註：Sunbelt，北緯三十五到三十七度以南的美國南部地區。這個緯度以下的日照較長，因而得名。加州的洛杉磯是美國日照帶的第一大城。
- 6 譯註：Allis-Chalmers，生產農業、礦業、紡織、營建、電力與變速箱等大型機具設備的傳統製造業者，創立於一九〇一年。
- 7 John Gurda, *The Making of Milwaukee*, 3rd ed. (Milwauke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999]), 421-22; see also 416-18; Sammis White et al., *The Changing Milwaukee Industrial Structure, 1979-1988*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Urban Research Center, 1988).
- 8 譯註：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一九八七年被克萊斯勒收購，一九九〇年完全併入並更名為鷹牌（Eagle）汽車，商標權現握於飛雅特克萊斯勒汽車（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手中。

- 9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987]); Marc Levine, *The Crisis Continues: Black Male Joblessness in Milwaukee*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8).
- 10 Jason DeParle, *American Dream: Three Women, Ten Kids, and the Nation's Drive to End Welfare* (New York: Penguin, 2004), 16, 164–68.
- 11 譯註：美國自一九三五年起實施的聯邦弱勢補助方案，一九九六年走入歷史。
- 12 State of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 Help Guide*, 2014, 6. 我並沒有親眼看到拉瑪與其社工的互動，這裡的引言是根據拉瑪對該段對話的敘述。並且我也沒有親眼目擊粉刷的過程，這段現場的重建是根據拉瑪、拉瑪的兩名兒子，以及附近少年的說法。
- 13 譯註：Crack Cocaine，也有人譯可卡因，是固態可當菸抽的古柯鹼類毒品，「快克」之名是取其製造過程中嗶嗶剝剝的聲音。
- 14 以房東為業是美國家庭資本主義（family capitalism）的一項遺跡。可供出租的房地產會代代相傳，而第三代或第四代的房東也不算少見。參見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chapter 2.
- 15 一份一九六〇年代的研究顯示，在紐澤西州的紐華克，每十處供出租的房產，就有八處的屋主其房租占所得不到四分之三。George Sterlieb, *The Tenement Landlor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7 同時間整個美國的勞動力僅成長百分之五十。David Thacher, “The Ri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Screening in Rental Housing,” *Law and Social Inquiry* 33 (2008): 5–30.
- 18 此計算乃是根據國會圖書館索書號 HD1394（非自用不動產，不動產管理）。會朝這方面去思考，靈感來源是 Thacher, “Ri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Screening in Rental Housing.”
- 19 二〇〇九年，密爾瓦基舊城區的兩房租金行情是五百五十美元，不含水電瓦斯。同一區的公寓分租雅房，租金行情是四百美元，含水電瓦斯。雅房的利潤比較高。《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

20

譯註：「Million Dollar Baby」是一九三一年由亨利·華倫（Henry Warren）寫成的一首歌，歌詞裡說到「我找到了一個價值百萬元的寶貝／地點在一間商品只賣五分或十分錢的雜貨店」（I found a million dollar baby / In a five and ten-cent store）。克林伊斯威特於二〇〇四年導演並與希拉蕊·史旺共同演出的電影《登峰造擊》，也以 Million Dollar Baby 為名，劇情描述拳擊教練在不起眼的練習場中發掘出天才女拳擊手，同樣取其在砂礫中發現寶石之寓意。舊城區的黑人社區或許殘破，但懂得門路的人卻能從中大撈一筆。

21

譯註：原文為 island accent。因為威斯康辛東南部的口音特別，所以被稱為語言學上的「孤島」。

第三章

熱水澡

連尼·勞森踏出了拖車公園的辦公室，點起一根寶馬牌香菸。裊裊升起的煙霧飄過了他的八字鬚與淡藍色雙眼，消失在棒球帽的帽緣。他望著一排拖車屋擠在一條窄窄的柏油路上。幾乎所有的拖車都面朝同一個方向，彼此間只有著幾步路的間隔。機場就在附近，每當有飛機低空掠過，露出機腹，連窗戶都不禁震動時，即便是已經住很久的人也會抬頭仰望。四十三歲的連尼一輩子都沒離開過這裡，至於擔任拖車公園的經理，則是這十二年的事。

連尼知道毒蟲們大多住在拖車公園的北邊，那些在餐廳或老人安養院兼兩份差（一個人輪兩班）的人則大多住在南邊。撿破銅爛鐵做回收的人則住靠近入口。至於拖車公園裡的「天龍國」則位於辦公室後方，裡面住著噴砂除鏽工人、修車黑手等工作最「傲人」的一群，他們的拖車屋前廊都有打掃過的痕跡，而且還擺了花盆來增添綠意。領聯邦救濟金過活的人則散落在園區四處，還有那些上了年紀、部分居民口中「跟著雞群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老人家也都住在園區各隅。大部分的時候，連尼想把性侵犯安排跟毒蟲當鄰居，但事情不可能每回都如他的意。他曾經得把一名變態安排在拚命打工的「蜜蜂區」附近，所幸那傢伙也算是個「繭居族」，總是待在拖車裡，百葉窗閉得緊緊的，每周會有人送來食物跟生活必需品。

柯立吉流動房屋園區 (College Mobile Home Park) 坐落在密爾瓦基的最南端，緊鄰第六街，走出去就是

同名的柯立吉大道。¹ 園區的外圍有一邊是無人修剪的林木、樹叢跟沙坑，另外一邊則是幅員遼闊、調度卡車的發車中心。無論你想去最近的加油站或是速食店，都得步行十五分鐘。柯立吉不是這一帶唯一的拖車公園，外頭的街上盡是不起眼的褐色磚房以及像是可以溜滑梯的屋頂。在密爾瓦基，這裡是窮白人的生活區。

梅諾莫尼河谷切穿了密爾瓦基的中央，就像「梅森·迪克森線」² 一樣將其一分為二，一邊是以黑人為主的北部，一邊是以白人為主的南部。密爾瓦基人愛開玩笑說，延伸於梅諾莫尼河谷之上的「第十六街高架橋」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條橋，因為「橋的一邊是非洲，另一邊是波蘭」。一九六七年，曾有近兩百名黑人站出來抗議這道黑白藩籬，他們聚集在高架橋的北端，朝著另一頭的「波蘭」走去。到了接近橋南端的地方，抗議群眾還沒看到另一陣營的面孔，就聽到他們發出的聲音。以從喇叭渲洩而出的搖滾樂作為背景，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殺！殺！」跟「我們要奴隸！」接著這群人終於露出了他們的廬山真面目——一大群白人面孔，有些統計認為超過一萬三千人。在一旁看熱鬧的人，開始對遊行的黑人丟擲瓶子、石頭，甚至對著他們撒尿或吐痰。但黑人遊行隊伍還是堅持走著，而按耐不住情緒的白人暴民則開始躁動。而後突然間不知怎麼地，一道無形的圍欄倒了下來，局勢一發不可收拾。現場的白人開始暴衝並對遊行的黑人施暴，而警察也於此時發射了催淚瓦斯。

隔天晚上，遊行的群眾捲土重來。就這樣再接再厲，他們連續在十六街高架橋上進行了兩個百個夜晚。最先他們撼動了整個密爾瓦基城，然後美國看到了他們，最終連世界都聽見了他們的訴求。但現實幾乎完全沒變。一九六七年，《紐約時報》在社論裡公開說密爾瓦基是全美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城市。挾帶參眾兩院的超級多數，詹森總統通過了一九六四年的《民權法案》³，與一九六五年的《投票權法》⁴，但部分國會議員因為背後有不動產遊說團體的支持，所以不肯跟總統一起推動讓居住歧視成為非

法的「開放住房」法案。後來是犧牲了一條人命（一九六八年四月，小馬丁路德金在曼菲斯某旅館的陽台上遇刺），加上後續的暴動，國會才迫於壓力在同年的民權法案增修中，納入了真正意義上的開放住房政策。一九六八年版的民權法案，就這樣成了大家所熟知的「公平住房法」。⁵

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以白人領薪階層為主的密爾瓦基南部，開始遷入為數不多的拉丁裔家庭，主要是鞣皮廠需要拉丁裔男性所提供的勞動力。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拉丁裔的人口開始有了成長。這次白人沒有選擇硬幹，而是默默遷往更南或更西邊。於是波蘭變成了墨西哥，密爾瓦基南部成了屬於拉丁裔的「城中之城」。相對之下，密爾瓦基的北部仍舊是黑人專屬。東部跟西部，加上連尼那間拖車公園所處的最南端，成了白人的去處。即便有了開放住房法，種族隔離也未曾遠離密爾瓦基。⁶

連尼捻熄了菸蒂，鑽回到辦公室裡。辦公室位在拖車公園的中央，距離僅有的出入口不遠。辦公室的內部局促，也沒有窗戶。紙類東一堆，西一堆、天花板上有一顆沒有燈罩的燈泡。老舊的傳真機、計算機跟電腦都覆蓋著斑斑油污。如果是夏天，冷氣機會在底下的深紅薄地毯上滴出一圈濕。到了冬天，一台運作中的電暖器會在塑膠桶上發出輕輕的嗡嗡聲。隨著時光流逝，連尼給辦公室添購不少裝飾品：牆上的鹿角、佩伯斯特藍帶啤酒的銘牌，還有一張雉雞展翅的海報。

「嗨，」連尼一邊在辦公桌前坐下，一邊跟蘇西打招呼。

蘇西·鄧恩跟平常一樣站著分檢郵件，放到辦公室另一面牆上的信箱裡。但與其說她是把信「放進」信箱，不如說把信「塞進去信箱」，又快又用力。這是她的風格。說到風格，蘇西抽菸時會將手緊貼住唇，把香菸整支吸進嘴裡。她的習慣是說話時要一邊掃地、一邊刷東西、或一邊重排院子裡的家具，否則會像啞巴般說不出話來。那感覺就好像她是顆玩具陀螺，如果不想倒下，只能轉個不停。蘇西的先生喜歡稱呼她為「拖車公園的女王」，其他人則叫她「辦公室蘇西」，加上「辦公室」三個字是因為拖車

公園裡還有另外一位「海洛英蘇西」。

「你的失業救濟金支票來了，」蘇西對著一封信自言自語。「欸，你不要交點租金啊？……你主人她要是再不繳房租，就要待不下去了。她可以搬回南部，要不然舊城區的貧民窟也可以。」

此時辦公室的門開了，走進來的是赤著腳的麥茲太太。七十一歲的她是位像小辣椒般的硬朗女性，有著一頭白髮、滿臉交錯的皺紋，牙齒則一顆不剩。

「嘿，奶奶，」連尼笑著說。他跟園區裡的所有人都有個共識，那就是麥茲太太是個瘋子。

「你猜我今天幹啥了？我把張帳單扔進了垃圾桶！」麥茲太太用皺成一團的臉，斜眼朝連尼的方向看過去。她幾乎是用吼的把這句話說完。

「是喔？」連尼看著她回答。

「是啊，我又不傻！」

「喔，嗯，我這邊有一些帳單要給你耶，你可以繳我的喔。」

「哈！」麥茲太太哈完這聲便走出去，準備展開推推車檢破爛的一天。對麥茲太太來說，聯邦救濟金還是生活的主力，用鐵鋁罐換到的錢則會拿去給她已經成年但患有精神障礙的女兒當買點心的零用錢。若是哪天「大豐收」，那她就會帶女兒去「出奇老鼠」⁷開心一下，也打打牙祭。

連尼笑了笑，重新處理起各種文件，只有門再被推開時他才會抬起頭。即便在別處說話沒人理的人，連尼也會好好聽你說話。他的工作是收租跟修繕，是篩選房客跟發驅離通知單。但這麼做是因為他還有一項職責是「耳聽八方」，他得知道拖車公園裡的一舉一動——無論是哪個人有無交房租、誰懷孕了要生孩子、誰在美沙酮⁸裡混了贊安諾⁹、誰正在坐牢的男朋友剛被放出來了。「有時候我像個心理醫生，」連尼會說，「但有時候我是村子裡的大混蛋。」

拖車公園的業主是托賓·查爾尼。他本身住在伊利諾斯州的斯科基 (Skokie)，距離拖車公園約七十英里。雖然有點遠，但他每天都會來園區巡查，只有周日才會休息。他付給「辦公室蘇西」的時薪是五美金，另外還給她每個月四百四十美元的「房租優惠價」。托賓免了連尼的租金，另外還付他三萬六千美元的年薪，統統給現金。托賓算是出了名的「有彈性」跟通情達理，但沒人會覺得他好欺負。他總是板著臉孔、斜眼看人，行事風格粗魯。他跟麥茲太太同年，今年七十一歲，但保有運動習慣，因此他凱迪拉克的行李廂內，都會放著一袋健身房用品。他不跟房客混熟，更不會跟他們嘻嘻哈哈；遇到房客的小孩，他也不會停下腳步揉揉他們的頭髮。他只做自己，毫不裝模作樣。他算是「房二代」，他爸爸也是房東，最多的時候累積了六百套房子。托賓沒這麼貪心，他只要有同一個地址下的這一百三十一輛拖車屋就心滿意足了。

但二〇〇八年五月的最後一周，他發現自己連這樣卑微的心願也可能保不住。密爾瓦基市府的「發照委員會」¹⁰ 一共五名委員，結果五個人都拒絕讓他換發拖車公園的營業執照。其中力主不予換照的市議員泰瑞·威科夫斯基是名臉色紅潤、一頭銀髮的資深南部人。威科夫斯基指出，按照市府社區服務部的紀錄，托賓光是近兩年的違規事項就多達七十筆。他提到，在過去一年當中，拖車公園內就撥出了兩百六十通向警方報案的電話。他說托賓的拖車公園無異是毒品、賣淫與暴力的大本營。他表示園區內的污水管沒有接好，結果導致穢物倒灌，十輛拖車屋的車底成為重災區。為此在市府發照委員會的眼裡，拖車公園已經十足像個不穩定的「環保災難」。

密爾瓦基的市議會將就此在六月十日進行投票表決。如果發照委員會的決定獲得認可，那托賓就會一夕失業，而他的房客們也都會無家可歸。這時候記者來了。他們頭上抹著髮膠，肩膀背著像武器般的相機。他們訪問住戶，其中有些人對托賓的砲火大開。

「新聞把我們報得好像是沒知識的雜種一樣，」瑪麗在她的拖車外跟提娜這麼聊著。

「他們說這裡是『南部的恥辱』，」提娜回應瑪麗。

瑪麗跟提娜都在拖車公園裡住了不少年，兩個人也都有著堅強而飽經風霜的面容。「我兒子為了這事都睡不著了，」瑪麗說。「我跟我老公也是……妳也知道，我兼兩份差耶。我的意思是，我已經很拚了，但其他地方我實在是住不起。」

這時麥茲太太走過來，她的臉眼看著就要貼到提娜的臉上，提娜不禁向後退了一步。「那個王八蛋！」麥茲太太一開口就沒好話。「我要打電話給那個市議員，我要好好跟他講講！那個王……」

「妳這樣做沒用啦。」提娜打斷了麥茲太太的話。

「我要去，而且我要好好教訓他，」麥茲太太答道。「那個王八！」

提娜跟瑪麗搖搖頭。看著麥茲太太氣呼呼地離開，兩人這才正經了起來。「要叫我們搬到北部，那可不是開玩笑的，」她說。「這玩笑開大了，」她稍稍搖頭，欲哭的雙眼不敢再看著提娜。

問題就出在這裡，這就是拖車公園居民最害怕的事情。拖車公園裡的每一個人，包括瑪麗、提娜、麥茲太太都是一樣，他們表面上是在講可能得被迫搬家，實際上擔心的則是得住進北部。「辦公室蘇西」是園區裡少數幾個住過北部的人，她已成年的兒子就曾在那裡被人用槍指著。「市議員說我們這兒是個貧民窟，」她不吐不快。「我真想帶他見識一下什麼叫真正的貧民窟！」這件事讓蘇西氣憤加痛心到不行，他兒子擔心得將她平常吃的止痛藥給藏起來，就怕她會想不開而吞下一大把。

在議會表決前，拖車公園還剩十天可以努力，居民們於是做了幾件事情。他們辦了場烤肉大會來招待媒體，四處打電話給地方的民代，另外還開始背誦要跟市議會講述的心聲。像盧法斯就把想說的話寫成稿子來練習。平日盧法斯靠撿垃圾回收維生，他留著修過的紅色鬍鬚，還有一雙深邃的藍色眼睛。「我

會說，『誰有欠過五百元的房租？』那些人會舉手，我就可以接著說，『欠過七百元的人在哪兒？欠過一千元在哪兒？』這樣子所有人都會舉手。」盧法斯打算做出的結論是：「他（托賓）不是什麼貧民窟的土霸王，也不是什麼壞人。」

假如這番話不管用，拖車公園最後還是關門大吉，盧法斯打算把拖車鋸一鋸，然後把剩下的鋁拿去賣來換錢。

托賓確實會給房客方便。他會讓欠錢的房客今天先繳一點、改天再補繳一點。遇到房客失業，他會讓對方用勞務來抵租金。有時他會跟連尼說，「這些人也許會拖欠房租，但他們都是好人。」他曾借錢給一名女房客，讓她可以去參加母親的告別式。遇到有人喝醉了在拖車公園裡破壞草皮或翻垃圾被警察逮捕，托賓也會保他們出來。

托賓跟房客談的條件很少寫成白紙黑字，所以有時會變成雙方各說各話。房客會記得她欠的是一百五十美元，但托賓會說是兩百五十美元或甚至是六百美元。有一次，一名房客在申請到勞保職災理賠後，預付了一年房租，但托賓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拖車公園的居民對此發明了一種用語，把「托賓」當動詞用：托賓忘記欠你的東西，就是你被托賓了。大部分人都會說這是因為托賓老了記性差，或者他單純是健忘。但要說健忘的話，托賓也是選擇性的健忘，因為別人欠他什麼，他可是記得一清二楚。

要把密爾瓦基最底層的拖車公園當成生計，需要點專業技術，也需要堅持。托賓的「策略」很簡單，無論是有毒癮的人、靠拾荒為生的人、或身體不方便的老太太，他都會直直走過去跟對方說「我來收租了」。他會用手不停捶門，而且他會持續敲不停，直到對方來開門為止。想要裝作不在家幾乎是不可能的，想要隱瞞什麼也非常困難。補助寄來了，你騙不過「辦公室蘇西」，因為信箱裡的支票是她放

的。然後，連尼也能一眼看出，你有錢去買香菸或啤酒犒賞自己、或買新的腳踏車給小孩，但就是不想繳房租。房客一把門打開，托賓就會把手一伸說，「你是不是有東西要給我？」有時候他會一敲門就是好幾分鐘不停；有時候他會繞著拖車拍打鋁質的外牆；有時會找連尼或另外一名房客去後門「聲東擊西」，他自己則在前門「守株待兔」。他會打電話到房客上班的地方，甚至會直接找他們的主管談話。遇到社工或牧師來電緩頰拜託時，托賓的回應會是，「不然你幫他繳。」

賠了幾百或幾千美元的事情，托賓都會像記仇般牢牢刻在心裡。他不會讓欠租的人只還一半就算了，也不會用低於行情的價格把拖車便宜租出去。遇到有人拖欠租金，托賓有三條路可走：放過對方而讓自己少賺；選擇將對方逐出家門；或者他可以去找對方談談。

選項一只是擺著好看的。托賓是全職房東，收租對他來說是一門生意，而心太軟的話他生意會做不下去。但即便如此，托賓也很少真的因為有人欠租而將他們驅離。把房客趕走代表你得重新找人進來，而這個過程也會產生成本。通常每個月積欠托賓租金的會有四十個人（相當於園區住戶的三分之一），而平均每位房客欠繳三百四十美元。¹¹但托賓每個月只會驅離當中的幾個人。太強硬或太軟弱都是當房東的大忌，錢要走中庸之道才賺得到。所以托賓被欠租既不會就這樣認了，也不會隨便趕人，他會選擇第三種方法，與對方好好談。房客一開始或許不會開心，但到最後他們都會對托賓表示感激。

像傑瑞·華倫就是一例。傑瑞曾經是「亡命之徒」(Outlaws) 飆車族的一員，渾身刺青的他有好幾處是在牢裡添上的。托賓曾經一手拿著驅離通知單，另一手狂敲猛打傑瑞那約二十坪的水藍色拖車（水藍色還是他親手漆上的）。後來驅離通知單被傑瑞揉成一團丟到托賓臉上。激動的傑瑞吼著，「托賓，我當這通知單是屁！還有連尼，不管你多老我都照扁不誤！」連尼跟傑瑞相互噴了些垃圾話，但托賓倒是在一旁看得老神在在。對他來說，雙方這就已經開始「談」了。果然不出幾天，冷靜下來的傑瑞自己開

口。¹² 他提出由他幫托賓打掃拖車公園並處理一些維修需求，以交換不被驅離，托賓也同意了。

面對拉蕊·詹金斯，他採取的是另外一種策略。在市議會表決通過將拖車公園勒令停業的一個月前，托賓曾經開著凱迪拉克載她去驅離法庭。拉蕊的學習障礙讓她通過了聯邦救濟金的審核，而她會有學習障礙，是因為童年時從閣樓墜樓。她每個月會領到一張面額七百一十四美元的支票，每個月要付的租金則是五百五十美元，不含水電瓦斯。拉蕊遞交房租已經好幾次了，托賓才狠下心來帶她出庭。「要把錢拿去繳房租，讓人覺得很不甘心，」拉蕊說得坦白。「你會想說那些睡街上的人是不是比較聰明，在街上生活，沒有房東也不用繳房租。」拉蕊坐在副駕駛座，後座則有另外一名房客潘·蘭奇，她是位留著齊瀏海、臉上看得見雀斑的孕婦。托賓讓她們有「明文協議」的機會。所謂「明文協議」，可以理解為民事版的「認罪協商」。只要她們願意接受、也能夠遵守協議中嚴格的還款時程，那托賓就願意取消驅離。但要是她們不按協議走，托賓可以不需要再載拉蕊或潘出庭，直接獲判驅離生效。到時候他就能把郡治安官手下的驅離隊叫來（帶著某種叫「財產返還」〔Write of restitution〕的令狀）。

在跟威科夫斯基議員周旋的過程中，托賓曾經擔心房客會「趁火打劫」。他怕房客會等到拖車公園的命運決定後，再看要不要繳房租，但他顯然是多慮了，因為大部分的房客都正常交租。只是這「大部分」並不包括拉蕊。已經欠租的她將六月的租金也先扣了下來，主要是她覺得園區可能會被關閉。她想如果橫豎都得搬家，那還不如口袋裡攢著這五百五十美元。拉蕊這算得寸進尺，欠租金不說，她還跟其他幾個人上了晚間新聞，講園區的不是。她在電視上直言看過娼妓跟毒販在園區裡出沒（讓拉蕊去淌這渾水的是菲莉斯·格萊德史東，支持威科夫斯基議員的她是最會給托賓添麻煩的大嘴巴）。¹³ 在知道一切是怎麼回事之後，托賓想起了拉蕊並沒有遵守上次出庭時的和解協議，而這也意味著他有權請郡治安派員將她逐出家門。既然這是他合法的權力，他也就行使了。

隔沒多久，密爾瓦基郡治安官辦公室便很有效率地發給拉蕊驅離令，鮮黃色的紙張印著如下內容：

致現行住戶

密爾瓦基郡治安官辦公室

特此通知您本署已接獲法院命令（財產返還令／協助執行令）。
您應立即自行遷離；若您未能配合執行，則本署有權將您的財物自現地移出。

驅離若進入強制執行階段，您的個人財物將由本署移置至他處保管，
屆時相關的損壞或遺失將由身為被告的您自行負責。

搬遷人員不會將您留在冰箱或冰櫃中的食物取出，

請務必自行帶走食物。

看得出來，這些話嚇壞了拉蕊。她的情緒就像電影螢幕般會投射在臉上：當她高興時，她的臉色明亮，露出缺牙的笑容；當她難過時，她的眼皮下垂，彷彿被上百個鉛墜往下拉。五十四歲的拉蕊獨居在一輛乾淨的白色拖車裡，但她真心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可以跟她兩名成年的女兒還有金孫團圓。這幾位親人加上上帝，占據了她宇宙的中心。她圓臉、身材臃腫，白皮膚上長著雀斑。許多年前，算是有幾分姿色的她，也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讓男生從車窗裡探出頭來。而即便是現在，拉蕊也還是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她會刻意不戴眼鏡出門，因為她覺得眼鏡會讓她看起來沒有精神。當她希望美一些時，她會戴上未

婚時的珠寶首飾。也會用別針把項鍊變長，這樣她就戴得上去了。

帶著一身汗味跟酸味，棕髮亂成一團的拉蕊走進園區辦公室。她把黃色的驅離令像條抹布般擰在手裡。簡短交談之後，托賓領著拉蕊走出辦公室，然後開始呼叫蘇西的名字。

「蘇西？蘇西！」托賓連聲喊著。

「有什麼事嗎，托賓？」

「替我帶她跑一趟銀行好不好？她得領點錢繳房租。」

「來吧，」蘇西一邊招呼拉蕊，一邊快步去開車。

當蘇西帶著拉蕊回來時，托賓人在辦公室裡翻看資料。「領了多少？」他問的是蘇西。

「我有四百元，」但回答的是拉蕊。

「這樣我不取消驅離喔，」托賓說，眼睛還是盯著蘇西。拉蕊當月還差一百五十美元的欠款。

拉蕊不知所措地站著。

托賓終於正眼看向拉蕊。「妳什麼時候可以補剩下的一百五十元？」

「今天晚上……」

托賓沒讓她把話講完，「好，妳就把錢交給蘇西或連尼。」

拉蕊已經沒錢了。她從準備繳納的房租裡挪了一百五十美元去補欠繳的瓦斯費，主要是希望被切掉的瓦斯可以恢復。她想沖個熱水澡，刷去身上的味道。她想要再一次感覺自己乾乾淨淨，甚至能跟漂亮沾上點關係。女兒還在襁褓中的時候，她曾經站在桌子上給男人跳過舞，她如當年一般感覺自己清爽美麗。她希望熱水可以讓醫生口中的「纖維肌痛」（風濕痛）好些，那種痛像是背上被人千刀萬剮般。醫生給她開了利瑞卡（Lyrica）跟希樂葆（Celebrex）這兩種止痛藥的處方箋，但她不是每次都有錢領藥。熱

水或許會有點效用。但事實證明一百五十美元改變不了什麼，We Energys 能源公司收了錢但沒有將瓦斯打開，付了錢的拉蕊覺得自己有夠蠢的。

蘇西拿了張廢紙做成的收據，把它跟拉蕊的驅離令訂在一起。「要不要跟妳姐姐周轉一下，把剩下的一百五十元付掉？」她一邊這麼建議，一邊抓起傳真機的話筒撥打她嫻熟於心的號碼。「喂，哈囉，我這裡是柯立吉流動房屋園區，我要中止一筆驅離命令，」她通話的對象是郡治安官的辦公室，「對，案主是 *McCoy* 車格的拉蕊·詹金斯。她有繳納租金了。」「辦公室蘇西」一通電話取消了郡治安官辦公室的出勤。但只要拉蕊拿不出剩下的一百五十美元，托賓還是可以照樣重啟驅離。

拉蕊悻悻然地走回拖車。車內熱到她奢望著蓮蓬頭能噴出溫水來。她沒有開電扇，因為吹風會讓她頭暈。她也沒有開窗，只是坐在沙發上。她打電話給在地的幾家社會服務機構，但在試了幾間都沒有下文之後，她對著地板呆呆地說，「我沒辦法了。」言畢拉蕊無視悶熱，在沙發上躺了下來，沉沉睡去。

註釋

- 1 在之前的學術著作中，我曾經以假名稱呼過這個拖車園區。但在這裡我用的是真名。
- 2 譯註：Nason-Dixon Line，美國賓夕維尼亞州與馬里蘭州的分界線，也是南北戰爭時期解放黑奴與堅持蓄奴的黑白分界線。
- 3 譯註：Civil Rights Act，終止了美國自開國以來的黑白隔離政策。
- 4 譯註：Voting Rights Act，保障黑人與其他少數族裔的投票權利。
- 5 Patrick Jones, *The Selma of the North: Civil Rights Insurgency in Milwauke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6 Press, 2009), 1, 158, 176-77, 185; *New York Times*, "Upside Down in Milwaukee," September 13, 1967.
- 6 關於拉丁裔族群在密爾瓦基的發展歷史，詳見 John Gurda, *The Making of Milwaukee*, 3rd ed. (Milwauke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999]), 260. 關於種族隔離，參見 John Logan and Brian Stults, *The Persistence of Segregation in the Metropolis: New Findings from the 2010 Census*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2011); Harrison Jacobs, Andy Kiersz, and Gus Lubin, "The 25 Most Segregated Cities in America,"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22, 2013.
- 7 譯註：Chuck E. Cheese's，香港店名是「出奇老鼠」，結合室內娛樂場跟披薩店的複合式餐廳，口號是「讓孩子能當個孩子的地方」。
- 8 譯註：methadone，用來治療海洛英毒癮的鴉片類藥物。
- 9 譯註：Xanax，恐慌症用藥。
- 10 譯註：Licenses Council，發照委員會，負責密爾瓦基轄下酒精銷售、居家修繕、套房租賃、路邊裝卸貨區、同居伴侶關係等各類生活相關執照與許可的核（換）發。
- 11 這個數字根據拖車公園從二〇〇八年四月到七月間的租約清冊得出（連尼·勞森讓我影了一份）。由於這些欠款的估計是根據夏季月分的總數，而這段期間正好是缺繳跟驅離的高峰，所以這裡的數據會有高估之嫌。
- 12 我並沒有親眼目睹雙方的言詞交鋒，而是跟傑瑞、連尼與其他拖車公園的住戶談過之後重建現場。引號內的字句根據的是傑瑞的回憶。
- 13 菲莉斯每個月都有準時交租，但後來托賓還是找理由要驅離菲莉斯。連尼提議以她養狗為由發驅離通知單給她。托賓拿出滿滿三頁全用大寫寫成的褪色租約，上面規定得非常清楚：犬類或家畜的飼養都在禁止之列。但其實托賓和連尼都口頭說過可以，所以養寵物的居民還不少。「基本上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托賓會這麼說。連尼是建議托賓可以否認說過什麼，然後咬住合約上的書面字句。租約同時也禁止在拖車公園內喝酒。

第四章

大豐收

市議會決定拖車公園命運的那天，托賓穿的是POLO衫、褐色休閒長褲跟棕色懶人鞋（Loafer）。他坐在前排長凳的中央，太太跟律師陪在一旁。寬廣的粉色大理石柱向上延伸到看得見橫梁的天花板，其上則有精巧的紅黃色圖案。房間的前端安放著一張大大的橡木桌，面對著十五位市議員一人一張的小橡木桌。前一天晚上，律師遞交了一份附件給市議會，但因為送來得太晚，大多數市議員來不及看，於是托賓的律師起身清了清喉嚨，口頭說明。按照他的解釋，這份附件內包含了托賓將立刻（或者盡快）採取的十項措施。托賓會報名由市府辦理、要上一整天的房東訓練課程，並跟全天候的保全公司以及獨立的物業管理業者合作，驅離行為引發嫌惡的房客，也會處理園區內有關房地產法的違規事項。律師說托賓不會報復那些開口批評過他的房客，然後，一年之內會完成園區的出售。

「園區裡住的都是弱勢：老人家、身障者、小孩子，」除了做出這樣的結論，律師也不忘強調托賓已經「積極配合」威科夫斯基議員來「擬定協議的內容」。

對於這種臨時抱佛腳的方案，市議會並不買帳。陽光穿透彩色玻璃窗灑落，議事廳裡的市議員們開始各執一詞。一名議員說托賓提出的方案證明他是個決決君子，另外一位同僚則質問，此例一開，以後是否每位公民都不用怕出事了，反正只要能生出十點改善方案就好了。最後威科夫斯基議員也忍不住開口。

「查爾尼先生任憑一個原本很好的流動房屋園區變成今天這幅光景，」他十分不客氣，「我的選區內有四間拖車公園，只有他這間有這些問題。」他的視線穿過眼鏡上方，看向托賓的律師。「大律師，園區裡住的並非全都是老人家、身障或小孩。」他轉頭看著他的議員同仁，「但確實有些人的手頭不寬裕，也沒什麼求職能力。關閉園區等於要趕他們離開。」威科夫斯基不是托賓的盟友，但他可以接受附件的內容。

議員間再度唇槍舌劍起來，大家都十分激動且針鋒相對。托賓繼續牽著老婆的手坐在後頭，臉上神情不悅。

主席宣布逕行表決。

聽證會結束後，托賓開車來到拖車公園。他既沒有集合大家來宣布議會的決議，也沒有進到辦公室愁眉苦臉。他的當務之急是驅離。市議會同意讓托賓保留營業執照，條件是他要採取積極的作為來改革園區，包括把會惹事的傢伙清一清。

市府或州政府的官員給房東壓力——無論是要他們聘請外面的保全業者或派建物檢查員去徹查他們的物業——很多房東的反應就是把壓力轉嫁到房客身上。¹重新取得控制權也是。要伸張土地所有權，或說重新伸張，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叫人走路。²

「我的二十八天驅離通知單放哪裡去了？」連尼問。他在辦公室裡翻找著一疊疊的文件。只要搬出預告二十八天的無事由解約通知，房東就可以任意進行驅離，不需要跟房客解釋什麼。要把引人嫌惡但又沒有欠繳房租的房客趕走，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連尼轉頭看向托賓，「你這下子可要填不少張二十八天預告喔。」

「他們有欠我房租吧，」托賓答道。「給他們預告五天的通知單就好了。」

托賓口中的「他們」，指的是潘跟她的家人。在開車載潘去完驅離法庭後，托賓曾請她去跟媒體講話。潘現年三十歲，懷孕七個月，說起話來有美國中西部特有的鼻音，長著一張像是從高中畢業冊上複製貼上的臉蛋。面對媒體，潘是張很好打的「同情牌」，但托賓現在不得不清理門戶。

托賓抬起頭來。「連尼，錢沒有因為這件事而收不到吧，」他說。

「沒有，我自己也嚇一跳。」連尼答道。「報表我才剛弄出來，看起來我們還蠻穩的。」

辦公室蘇西也補了一句，「我這邊也是大豐收。」

為了讓托賓改變心意，潘把剛收到、還熱騰騰的一千兩百美元支票轉讓給托賓。會有這張支票，是因為歐巴馬總統當時在推行一項景氣刺激法案。她想說一千二百美元應該夠，主要是她以為自己只欠一千八百美元。但托賓卻說她欠的應該接近三千美元，還有就是辦公室蘇西說潘有在吸食快克。托賓收下了潘的支票，但還是繼續驅離手續。潘一家住在拖車公園已經兩年。

潘跟男朋友奈德·克羅會落腳在托賓的拖車裡，是因為托賓將一輛拖車送給了他們。潘跟奈德一直都想要從綠灣市（Green Bay）搬到密爾瓦基來就近照顧潘生病的父親，而就在此時，他們在地方報上看到了托賓登的廣告，於是開車前來了解。

潘跟奈德來到柯立吉流動房屋園區的時候，托賓跟連尼表示他們適用「修繕專業人士方案」（Handyman Special），因此可以無償得到一輛拖車屋。按照這個方案的內容，房客會成為拖車屋的所有權人，而托賓則單純是拖車停放地的地主。由此托賓收的便不是房租，而是地租。雖然名字換了，但地租的金額跟一般房客繳的房租是一樣的。要說哪裡不同的話，那就是拖車屋的所有權人反而得自行負責車輛的保養。理論上，手握所有權代表你可以任意把拖車移到別處，但實務上根本不可能，拖車的所有權人對這點都很清楚。首先拖吊費就要一千五百美元起跳，重新將拖車屋固定又得再花兩到三倍的錢。要

是遭到驅離，屋主也只能無奈地把拖車留在原地。到時候托賓就會回收這個大型的「廢棄財產」，然後再依樣畫葫蘆地送給下一位住戶。

在潘面臨驅離的同時，園區裡將近有二十輛拖車為房客所有。但要說身為車/屋主有什麼好處，頂多也就只是一種心理作用而已。「我搬到這裡是為了能擁有一個家，就算是輪子上的家我也認了，」潘的一個鄰居常這麼說。³

托賓的「拖車屋大放送」讓園區裡的拖車屋都不會空太久——只要一有拖車空出來，即便是爛到像個大型的垃圾車，他也一樣能在短短幾周或幾天內找到人要——當然有些真的很窮的家庭也會自動找上門來。

在全美包括密爾瓦基在內的各個城市裡，由於各方力量任由租金合理的房屋存量愈變愈少，乃至於銷聲匿跡，低收入家庭於是開始搶占便宜的住處。放眼全美，低價房的空屋率已經降到百分比的個位數。⁴ 在連尼的辦公室裡，天天都有人打電話來問有沒有空房(車)。拖車公園上新聞之前就已經如此，上新聞之後也還是這樣。事情在電視上報出來的那一個月，托賓的拖車公園一位難求，全部滿租。「園區都住滿了，」連尼說這話時還呵呵了兩聲，「電話也都繼續響著。」連尼替托賓保管的租約清冊顯示，平常每個月只會有五輛拖車屋空著，換算成空屋率，連百分之四都不到。⁵ 便宜住房的供不應求也讓房東們了解一件事，那就是在每一個租屋家庭的背後，都還有幾十個同樣的家庭在排隊等著。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你很難想像房東們會願意降租、原諒房客遲繳，或者是把屋況弄好一點。

「果然不出我所料，」叨著根菸的奈德含糊地說著。他會這麼說，是因為發現潘又懷了個女兒。他十六歲就生過個兒子，對方是他在 ZZ Top 合唱團的搖滾演唱會上認識的墨西哥女生。只不過女方的家庭

覺得他是個污點，壓根不想承認他，後來除非收音機上響起 ZZ Top 唱的〈拉格蘭奇〉，否則奈德也就很少想起自己那個無緣的兒子了。「那之後，可能是老天爺懲罰我吧，」他曾經打趣說，「我怎樣都生不出兒子。」加上潘肚子裡的那個，奈德將變成五個女兒的爸爸，當然這還得算上潘另外生的兩個黑人女兒，而奈德並不是每次都曾把這部分算進去。

潘跟奈德在綠灣市認識，機緣是潘的爸爸讓奈德幫他調校自己那台哈雷機車。比潘大上十歲的奈德有卡著油污的指甲、棕色的鬚渣、長頭髮與微禿的額頭。另外他還是那種上完廁所也不把門關好，或者是會在大庭廣眾之下抓屁股癢、看起來還非常愉快的那種人。

潘已經有兩名女兒：二十三歲時生下的布麗絲，還有比布麗絲晚兩年來到世上的珊卓拉。她們共同的黑人父親是潘十九歲時認識的毒販。潘後來才知道自己雖然名為女朋友，但對方其實腳踏好幾條船。

「你可以說爸爸那次用瓶子打妳，打到妳頭破血流的故事嗎？」珊卓拉曾經在潘開車去食物廚房的路上提出過這樣的要求。說這話時的珊卓拉才六歲。

潘很心酸地擠出個微笑。「妳當時還那麼小，怎麼會記得這種事情。」

「我記得很清楚，」珊卓拉回答。在其他女生邊發抖邊抱成一團的時候，珊卓拉是那種會隨手抓起鞋把蟑螂拍得粉身碎骨的女生。她跟布麗絲是拖車公園裡僅有的黑人小孩。有一回園區的鄰居在窗前掛了幅納粹旗幟，像這種事情連尼是不允許的；不過南北戰爭時的南方邦聯旗⁶倒是可以掛，前提是上頭要搭配「老光榮旗」⁷。

「不可能，妳當時還是個嬰兒而已。我說布麗絲啊，妹妹當時就是個嬰兒。她只是太常看到我身上冒血，已經見怪不怪了。」

潘想辦法離開了那個男人。在這之後她擔任認證護理員⁸，工作內容有倒便盆、把地板上的嘔吐物拖

乾淨，還有替行動無法自理的人翻身來避免褥瘡。另外私底下她還學會了怎麼煮一大鍋義大利麵或通心粉沙拉。潘的媽媽還沒來得及教她做菜，就出車禍過世了，那年潘還是名高中生。潘的爸爸也沒空管潘的廚藝，因為他長年坐牢，罪名不是吸毒就是酒駕。潘僅存的親人是弟弟，而他也有在努力上進。他正在用美沙酮戒毒，而且他還說自己一點也不懷念吸海洛英的感覺。

那是段希望與重生的日子，是一步一腳印的安穩日子。只是沒想到走著走著，腳下又地動山搖起來。潘有天接起電話，就聽見另一頭的人說她弟弟死了。潘問是怎麼走的，對方說是吸毒過量。他才二十九歲啊。潘先是對著電話嘶吼，然後掛掉電話。但她立刻又抓起電話，撥另外一個號碼。彷彿快溺斃的她需要一根浮木，而這根浮木就在電話號碼的彼端。

毒品的各種別名「快克」、「石頭」，會讓人誤以為毒品都是些怪石嶙峋、表面崎嶇的東西，但一旦你將之握在手心，毒品看起來既滑順又優雅動人。這些毒品會讓人想到一顆顆芝蘭口香糖，也就是小朋友可以去轉蛋機那兒投錢、然後用雙手接住捧著的那種糖果。明明跟毒販交往了那麼多年，但潘一直都沒有碰毒。她知道毒品會讓人變成另外一個人，她親眼看過人為了吸毒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但她也看到過毒品能讓人忘卻一切。「當時我沒有一天不渾渾噩噩，也沒有一天不搞砸事情，」潘回憶道。「有時候我會想說，『哇嗚，我從來沒有為這男人哭過耶。』我還真的沒有。要我為他哭，我寧可去吸毒變嗨。」

就在這時候，她認識了奈德。

跟奈德交往的第一年，快克是把兩人擰成一股繩的力量。他們為了快克而活，也按照快克的指示而活，同時還一邊帶小孩。沒多久他們就從吸毒變成販毒。認識滿一年，兩人被逮後遭到定罪。奈德因為有過毒品前科，所以必須入監服刑。潘因為是第一次犯重罪，所以被判緩刑四年，但還是得先在牢房

裡蹲十個月。在牢裡，她終於第一次掉下了眼淚。

出獄之後，潘很努力希望讓毒癮不要再犯。她找了個在綠灣最不可能吸毒的朋友當室友，但沒想到在她坐牢的期間，這位朋友也「淪陷」了。「我在綠灣認識他媽的每個人都吸毒，無一不例外，」潘氣呼呼地說。她請她爸爸匯五百美元給她，好讓她有錢搬家，而她爸爸還真的匯了，這點連她自己都感到意外。但綠灣是個小地方，潘很快就又跟之前的某個藥頭狹路相逢。「他立刻喚醒了我的毒癮。」

換到奈德出獄後，潘又跟他復合了，接著潘發現自己有了身孕。奈德要求做親子鑑定，結果孩子是他的沒錯。他們給這孩子取名為克莉絲汀。隔沒多久，奈德跟另外一個女人生的女兒也跑來跟他們同住。蘿拉有個小巧的鼻子跟一臉的雀斑，年紀比布麗絲大一歲。蘿拉搬來同住的幾個月後，奈德把蘿拉、潘，還有潘的兩名女兒扔在一個剛因為吸毒認識的女人家裡，自己一個人跑了。潘帶著三名小女生住在陌生女人家裡好幾夜，最後出於無奈，潘只好陪著蘿拉走到她生母的住處敲門。潘記得她人站在門口跟蘿拉的生母說，「我肚子裡的孩子快要生了，但我現在無家可歸，因為妳以前的男人把我甩了。我身上沒錢、沒吃的，什麼都沒辦法給妳的孩子。我真的很害怕……妳可以把女兒帶回去嗎？」¹⁰

從頭到尾都在講手機的蘿拉生母，只是拿了袋罐頭給潘跟蘿拉，然後就把門關上。潘跟三名小女生只好繼續住在陌生女毒蟲的家裡。奈德回來已經是一個月後的事了。

托賓帶齊了一票保全，告知潘與奈德，退稅的支票得歸他的，而且他得驅離他們。雖然托賓最後只給他們二十四小時搬走，否則就要打電話叫郡治安官來，但事情並沒有搞得很難看。要不是因為奈德另一宗販毒起訴還有尚未執行的逮捕令，他一定會興風作浪一番。為了即將被驅離的命運，潘跟奈德開始互相責怪。

「都是妳搞砸的，」奈德斥責潘。

「搞砸的是你好嘛，」潘反擊。「你好意思說我。我可是把錢都交給你管……結果你把我們搞到要被驅離。」

「搬吧，臭女人。」

「都是你害的，奈德。」

「快搬啦。」

「我沒辦法，都是你害的。」潘停下來。「我也不知道。有問題的是我嗎？我也搞不清楚了，也許是吧。把事情搞砸的真的是我嗎？」

他們變賣了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電視跟電腦，還有潘的耶誕節禮物。他們需要現金。潘每個月得工作三十個小時，才能拿到六百七十三美元的社福支票 (W-2)，另外食物券則有三百九十美元。奈德替人改車或修車，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可賺個五十美元。他們倆之間是潘的錢歸潘、奈德的錢歸奈德。他們各有銀行戶頭，所有的費用都是 A A 制，一人一半。

坐過牢後，毒品前科讓潘不好找工作。最後肯用她的是「夸德影像」(Quad Graphics) 這家商業印刷公司。夸德一向以願意聘用沒有高中學歷的更生人聞名，前提是他們得輪大夜班。潘願意。於是從晚上七點到隔天的凌晨七點，潘會操作高溫且嗡嗡作響的印刷機台。

夸德影像位於密爾瓦基西北方的薩塞克斯 (Sussex)，從拖車公園開車要四十分鐘。潘很珍惜這段開車通勤的時光，因為這段時間只屬於她，她可以暫時丟下奈德跟孩子不管。

然後她的車子選了個最爛的時機拋錨，正好是冬天，而冬天他們的手頭最緊。奈德原本在一個工地的工班工作，但天冷的這幾個月工程幾乎全部停擺，他們拿不出錢修車，於是潘就這樣丟了飯碗。也就

是從此時開始，他們積欠托賓租金。政府的急難救助金讓他們撐過了第一個月。到了二月，潘把退稅的一千美元錢給了托賓，但他們還是入不敷出。潘其實可以多還一點，但她想要回去夸德的印刷廠上班，所以她需要輛車子。她砸四百美元買了輛二手車，但才過了一周，奈德就聽見引擎蓋裡啞啞作響，於是他就叫潘趕緊將老爺車脫手，否則難保車子不會開到一半解體。

然後也有不少錢被拿去買了毒品。有時候上完大夜班的潘一早抵達家門時，就發現奈德要不是在海洛英蘇西那兒，就是自己在客廳裡醒著，一副通宵開毒趴的模樣，沙發上還會有幾個不省人事的女人。某些晚上，則換成潘嗨到連走路都沒有辦法。

把電腦跟電視都變賣掉的潘，將剩下的東西塞進大垃圾袋裡，走去找住對面的史考特幫忙。潘問他可不可以收留她跟她的家人，讓他們能度過這段難關，或至少讓他們住到把孩子生下來。快四十歲的史考特有吸海洛英的習慣，另外還有一名上了年紀的室友叫泰迪。史考特跟泰迪會認識，是因為他們都住過「旅社」，也就是救世軍的收容所。雖然史考特曾當他們的面昏到過一回，但潘還蠻放心讓女兒們待在這兩個男人的身邊。對於潘的請求，史考特跟泰迪都一口答應，完全沒提到錢的事情。

這件事透過辦公室蘇西之口傳到托賓耳裡，讓托賓非常不是滋味。對托賓來說，他的拖車就是租給史考特跟泰迪的，他可沒有說拖車裡可以住別人。托賓於是對史考特跟泰迪祭出驅離通知，還把潘跟奈德欠的租金都算到史考特跟泰迪的帳上。驅離會傳染，就是這麼回事。

- 1 綜觀美國歷史的發展，市級的政治人物都會有心要頒布各種規範來制衡房東並改善房客的生活：包括掃蕩貧民窟（Slum Clearance）與執行建築法規等。這些為政者以為根本的問題不是充斥於美國的貧窮與平價住房的欠缺，而是秩序跟效率不彰。這樣的做法往往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最終等於是對已經身處窘境的房客落井下石。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Volume 1: 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147; Beryl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135-45.
- 2 個人對於土地所持有的主權，最為有力地彰顯在驅逐的行為上。人類歷史記載最早被驅離的就是亞當跟夏娃。參見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MJF Books, 1961), 107-10. 關於主權與驅逐之間的關聯，參見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Orlando: Harcourt, 1968).
- 3 美國人對於家的渴望不分窮人或中產階級都一樣明顯。從拓荒時期以來，自由、公民權與土地所有權的地位就在美國人的心靈中並駕齊驅。要成為美國人，就必須要是一家之主。租房子得到的評論是「不利於自由的發展」，一八二〇年，湯瑪斯·哈特（Thomas Hart）在國會面前有過這樣的發言。他說「租屋會產生社會階級分立的惡果，會摧毀對於國家之愛，會弱化獨立的精神。」引用於 Lawrence Vale, *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ojects: Public Housing and Public Neighb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96.
- 4 就以全美三百到三百四十九美元之間的月租水準而言，出租的空屋率就從二〇〇四年的將近百分之十六下降到二〇一一年不到百分之六。這份計算是根據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2004-2013。
- 5 拖車公園的空屋率計算是根據租約清冊（二〇〇八年四到七月資料）。
- 6 譯註：Confederate flag，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南方邦聯旗，現被認為是種族歧視的遺毒，遭到許多抗議。
- 7 譯註：Old Glory，美國國旗的別名。原始的老光榮旗為一八〇三年出生的田納西州海軍上校威廉姆·德賴弗（William

Driver) 所有，上有二十四顆星。他在海上服役期間懸掛這面國旗，內戰期間他已定居南方的田納西州，並守護這面旗幟不受邦聯奪取，藉以表達對北方的忠誠。

8 譯註：Certified Nursing Assisant，直譯為認證護理師助理，相當於台灣的護佐，從事的是類似看護的工作內容。

9 譯註：Rock，跟快克一樣是可以當菸抽的古柯鹼結晶。

10 這個事件發生在我的田野調查工作之前，也非我親眼所見。引言的內容是根據潘的回憶。

第五章

第十三街

阿琳可以接受住在第十三街。她所住的街區有一頭是阿拉伯人開的西班牙式雜貨店¹，另外一頭則是給上了年紀的人去的酒吧。住在這裡，她可以走路送賈法瑞上學。當然阿琳會希望隔壁的廢棄房屋裡不要有毒蟲（有幾個快克成癮的人最近把那兒當家住了下來），不過隔幾間房也有小女孩在學拉小提琴就是了。

她的公寓新家也愈來愈上軌道了。從前這間房屋一度看起來相當高貴，是棟希臘復興式²的建築；以建材而言，這棟兩層樓的公寓是用砂岩蓋的，前門有由兩根柱子撐起來的遮棚。一樓面向街道，有一對窗戶就像相框，窗戶上方裝飾有尖尖的山形牆。二樓臨街的窗戶開口就更大了，想推開窗戶可以靠邊緣的樞紐。只不過歲月不饒人，年久失修讓屋況每下愈況。樓下的兩根柱子就有其中一根的基底坍了，原本撐住的棚子也就這樣歪到一邊。柱子、門廊跟窗戶的山牆都一併漆成了灰色，對外則很惹眼地裝了道鐵閘門。門前的階梯是個問題，油漆剝落不說，左右的的扶手各自成形，根本不成一套。所以阿琳不喜歡爬門階，她都走側門進到屋內。

阿琳一心想把這公寓弄得更像個家。之前的房客留下一個大衣櫃、一個五斗櫃、一張床，還有一台冰箱。地下室的東西就更多了：餐盤、衣服，以及一張沙發。阿琳決心物盡其用。她把家具調動了位置，把新找到的盤子疊在她原本的寶貝瓷盤旁邊。這些瓷盤是多年前家暴收容所送的。她占了比較靠外

頭的臥室，然後把裡頭的房間給兩個兒子。她替他們擺好了一人一張單人床墊，衣服也整整齊齊地收進了五斗櫃。再來她把音響從行李中搬出來，聽起燒在光碟裡的老派嘻哈單曲，她心中的裡第一名是 2Pac³ 的《抬頭挺胸》(Keep Ya Head Up)。她在廚房掛了幅不起眼的畫作，上頭是黑人農夫在鋤田，浴室的門上則安放她在藥妝店買到的「金玉良言」：昨日愁今日，今日全無事。

剛剛說到地下室有很多東西，其實阿琳還挖出了滾筒、油漆刷、跟一桶五加侖的白漆。她把所有東西統統拖到樓上，在頭上包好頭巾，開始粉刷牆壁。她希望能讓屋子裡煥然一新。做著做著，她索性把通往二樓的樓梯間也刷了。大功告成之後，她點了根薰香棒來掩蓋油漆的味道。最後她環顧四周，心滿意足地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日子一天天過去，阿琳跟孩子慢慢在第十三街有了家的感覺。放學之後，當哥哥的喬瑞偶爾會找街坊的其他男生玩「丟罐子」的遊戲，弟弟賈法瑞則會在一旁當觀眾。這個「丟罐子」的遊戲需要一顆籃球跟兩個壓扁的汽水罐。喬瑞跟單挑的對象會在人行道上面對面，相隔幾公尺站著，然後輪流用籃球瞄準對方面前的扁鋁罐，打到就可以得分，同時愈遠打中分數愈高。喬瑞在男孩子裡身材瘦長但缺乏運動細胞，主要是他的手臂跟手指好像長得比身體的其他部位都快。敏感的他會為此穿特別大件的長袖上衣跟外套，希望這樣別人就看不出來。他完全不打理自己的頭髮，任憑生長。個性則蠻隨和的，討人喜歡。但如果事情牽扯到他最愛的媽媽，喬瑞就會非常拚命。只要能讓阿琳笑，喬瑞會不惜偷東西也要博得阿琳的笑容；要是有人敢欺負阿琳，喬瑞會站出來捍衛她。有些生於貧窮的孩子會千方百計地想要趕緊離家，而且愈遠愈好，但喬瑞完全沒有這種想法，他覺得自己是為了媽媽跟弟弟才生在這世上，他想守護他們。十四年來，他天天都扮演這個家裡的男人。

賈法瑞是個「大」孩子，至少幼稚園班上他的個子最大。相較於喬瑞的瘦長，賈法瑞的胸膛跟肩膀

都有肉多了。高顴骨讓賈法瑞的臉顯得有型，但辮子頭卻永遠亂得需要整理。無聊的時候，賈法瑞會去地下室或後巷「尋寶」，找一些如拖把的柄、生鏽的工具、狗鍊、三夾板等，然後拿這些東西當戰車跟直升機打來打去。晚飯飯後，阿琳會重播電視節目（並把聲音轉小），把賈法瑞的「個人化教育計畫」⁴評估表拿出來讀一遍，也包括翻一翻她的祈禱書。有些夜晚，她會爬上既沒人住也沒上鎖的二樓，在那裡待上一會兒。阿琳覺得樓上沒有鄰居這點很棒，她喜歡環境清靜一點。

有一天，阿琳的朋友送了隻貓咪給她：一隻黑白相間的「乳牛」貓。舍蓮娜答應讓他們養貓後，喬瑞馬上給牠起了個名字叫「小不點」，同時用餐桌上的剩飯餵牠。每當小不點朝鞋帶撲過去，或者把拉麵麵條給囫圇吞下肚，喬瑞都會被逗得很開心。賈法瑞會把小不點抱起來，然後用鼻子去磨蹭牠的耳朵。不過兄弟倆還是最喜歡看到小不點抓老鼠。牠會把老鼠拖到屋子的中央，然後用貓掌追打獵物。老鼠會四處竄逃，希望能摸清小不點的行動。啾！啾！小不點每拍一掌，屋裡就會上演「翻滾吧！小鼠」。玩到一個程度，可憐的老鼠就會鑽到小不點前腳下，小不點也會讓老鼠在那兒休息取暖。再不然，小不點可能會用嘴把老鼠從底下叨起來，然後朝空中扔去。牠會覺得這樣很好玩，所以玩個不停，直老鼠終於攤在那兒一動也不動。這時候高傲的小不點才會冷眼看著自己的玩具，納悶牠怎麼罷工了。

喬瑞進了家門，第一句話就是喊，「賈法瑞氣喘發作了！」他陪著賈法瑞從學校走回來，阿琳則繼續坐在雙人沙發上，等著看今天颯的是「輕度、中度還是強烈颱風」。如果只是稍微發作，那賈法瑞的嘴巴會像離了水的魚兒一樣一開一闔；如果是中等程度的發作，那他的嘴巴就會張成像英文字母的「O」形。如果真的很嚴重，那他的兩片嘴唇就會向後翻，空氣會穿過他大小不一的牙齒進入身體。

走進門的賈法瑞做出O形臉。他把書包往後一脫，往雙人沙發上靠，模樣就像剛剛爬完一整層樓梯的老人。

「賈法瑞，去拿我的包包，」阿琳說。

兒子點頭朝臥室走去。等他一把東西拿來，阿琳就抽出一支氣管擴張劑搖了搖。賈法瑞用嘴巴含住吸入器，開始向內吸藥。但第一次他錯過了時機。「把氣吐出來，別再玩了，」阿琳稍稍責難。

第二次賈法瑞還是沒有抓準時間，所幸第三次終於讓藥吸進肺裡。吸好藥後賈法瑞屏住呼吸，讓兩頰像小孩準備跳進泳池前那樣鼓著。身為母親的阿琳則在一旁數，「一……二……三……」數到十後，賈法瑞吐氣並重新換氣，最後露出笑容。阿琳這也才對賈法瑞報以放心的微笑。

她每天早晚都會讓賈法瑞各吸一次氣管擴張劑。至於睡前的例行公事則是用德國的百瑞牌 Pouch Ultra 霧化器來吸一種類固醇叫「強的松」(Prednisone)。這台霧化器的配件包括塑膠管線，另外還得戴上在飛機機艙裡的那種氧氣罩。阿琳都管這玩意兒叫「呼吸機器」。賈法瑞的氣喘有比從前好了。阿琳還記得送賈法瑞去急診曾是她每周的例行公事。

賈法瑞的名字是他生父取的，但慢慢地，阿琳開始擔心起他生父給他的不只是名字而已。他的爸爸有學習障礙跟情緒管理問題，而賈法瑞在學校的表現也顯露出類似的狀況。他在閱讀上的表現很好，但其他的科目則跟不上。另外，他也會用手去推別的小朋友。學校有做過評估，但最終認定他還不需要額外加以關注。有老師建議可以讓他服藥控制，但阿琳對這種意見很跳腳，「我不想讓小孩吃藥，尤其反對吃利他能。我覺得他需要的是多點一對一的關心……除非他先接受心理輔導，否則諮商沒做完前我不想讓他吃藥。」

阿琳跟賈法瑞的生父認識是在密爾瓦基梅費爾購物中心 (Mayfair Mall) 裡的電影院，當時她是餐飲部的員工。「事情好像很自然就發生了，」阿琳回憶道。「但我們說不上在交往。」他們其實有試著認真發展，但阿琳發現對方有暴力傾向。總之，分手後沒過多久，男方就被抓去關了。除了讓賈法瑞來到這個

世上外，這位爸爸真的沒有多給他什麼。

阿琳自己的爸爸也半斤八兩。他將她媽媽的肚子搞大後，人就跑了，結果她媽媽才十六歲就生下阿琳。當時阿琳的外婆在哥倫比亞聖瑪麗醫院（Columbia St. Mary's Hospital）裡的自助餐當外場，但她媽媽幾乎都待在家裡，不太出去賺錢。她先是領政府的補助度日，之後嫁了個有穩定工作的老公。這位「老公」後來搖身一變成爲牧師，而這也就是阿琳能不進教堂就不進教堂的原因。

十七歲離家的時候，阿琳把母親逼她穿上學的舊衣一口氣全扔了。「叭叭，」同學凡是看到她經過，就會拿她身上那件二手喇叭褲笑她。阿琳被逼著拿橡皮筋把褲管綁住，但這只是讓她被笑得更大聲而已。後來她從高中輟學，但阿琳的媽媽一句話也沒說。「她哪在乎這個。」

輟學後的阿琳找到保母的工作，並搬進雇主家。也在這段期間，她認識了傑若德的父親。傑若德是她一堆孩子裡的老大，阿琳習慣叫他的小名「傑傑」。在阿琳發現自己懷上了傑傑的同時，她的男人也正好踩到法律的紅線。「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跟一個老是進出監獄的男朋友交往，所以當有別人出現時，」阿琳說的是傑傑的父親在某次坐牢的期間，「我就改投向其他人的懷抱了。」

阿琳說的「其他人」，就是賴瑞。賴瑞是個精瘦的男人，眼神沉穩，眉宇開闊。賴瑞自學當技工，然後在巷弄裡替人修車度日。遇到發薪的日子，他會帶阿琳去吃她最喜歡的中國菜。她會把長長的菜單從頭到尾看完，然後永遠都點同一樣東西：芝麻雞。他們雖窮但很相愛，很快地阿琳就懷上了賴瑞的兒子。他們也給他取名賴瑞，但稱他爲波西。後來賴瑞跟阿琳又再生了三個孩子，分別是一女兩男，其中小兒子喬瑞，名字是阿琳的媽媽取的，他們倆都覺得不錯。

「嫁給我好嗎？」某天賴瑞問。

阿琳的第一個反應是笑。她以爲他是在開玩笑，所以也開玩笑地說了「不」。「他說的不是豪華的婚

禮，甚至連去法院公證都不是。」阿琳還記得。但賴瑞是認真的。弄清楚這點後，阿琳收起了笑容說她得考慮考慮。但讓她裹足不前的不是賴瑞，而是賴瑞家的母女檔。「她們老覺得自己懂得比我多……在我們眼裡我永遠不夠好。」

求婚未果讓賴瑞待不住家裡，而這對阿琳是很大的打擊。只不過賴瑞每次回來，她都還是會為他敞開大門。在交往了七年之後，某日賴瑞再也不回家，而這一次的「小三」還是阿琳的姐妹淘。

那都是陳年往事了。現在賴瑞偶爾會把車開到阿琳住處的外頭，她會爬進他的廂型車，然後兩人一起兜風聊天，而他們聊的多半是喬瑞。賴瑞時不時會帶喬瑞上教堂，或讓兒子跟自己住一晚，又或者他會因為喬瑞在學校裡惹了什麼麻煩，而打他打到嘴唇都腫起來。喬瑞要是在家附近看到開車經過的賴瑞會大喊，「那是我爸！」然後在後頭追趕。

賴瑞把她跟孩子扔下不管的時候，阿琳人正在機場旁邊的「曼絲帶旅館」(Mainstay Suites) 上班。結果萬念俱灰之下她辭掉了工作，開始靠社會福利過活。經過一段時間的振作後，她找到了在「第三街碼頭」(Third Street Pier) 餐廳打掃的工作。但此時阿琳的媽媽驟逝，她悲痛萬分，工作也做不下去了。她很後悔回去領社會福利，但當時真的是她人生的一段低潮。

搬進第十三街的時候，阿琳領的是 WFT，這主要是因為她患有長期的憂鬱症。這時(二〇〇八年)她領到的社福補助，跟美國在推動社福改革前沒有兩樣：一天二十點六五美元，一年七千五百三十六美元。自一九九七年以來，全美各地含密爾瓦基在內的社福補助，幾乎都停滯不前，但居住成本卻大幅飆升。多年下來，主政者無一不知美國家庭不可能只靠社會福利度日。從二〇〇〇開始的十年間，我們見證了房租與水電瓦斯費的大幅上漲，但從前就不可能靠社福來支撐一個家了，在此之後不過是雪上加霜而已。

關於在「住」這件事上得到政府的補助，阿琳很早就斷念了。要是能領到租屋券的補貼，或是能擠進公共住宅的窄門，那房租就只占她所得的三成，這當中的差別就像是「窮歸窮但能安穩生活」跟「被貧窮折磨到死去活來」，或者「能在社區裡落地生根」跟「像失根的蘭花般被浪打來打去」，還有賺的錢「能多用點在小孩身上」跟「轉手就得繳給房東」的差別。

許多年前，阿琳才十九歲的時候，她曾經租到過一間政府有補貼租金的公寓，月租只要一百三十七美元。當時剛生下傑傑的她很慶幸自己可以不用再跟母親同住，凡事可以由自己作主。但這時在找室友的朋友叫她退租，她一口答應。就這樣，她從政府補貼的公寓，跳進了民間的租屋市場，而這一跳就是二十年，想回都回不去。「我以為搬家沒什麼關係，」她回憶道。「但我後悔了，每天都後悔。當時真是年輕不懂事！」說著說著，她開始搖起頭來，彷彿十九歲的阿琳就在自己面前。「要是我腦袋清楚一點，現在我應該還住在裡面。」

有一天心血來潮，阿琳跑了趟密爾瓦基市府的住房管理局（Housing Authority），她想去問的是租屋補助的排隊名單。結果透明玻璃後的小姐告訴她，「名單動也不動。」原來有超過三千五百個等待住宅補助的家庭，已經申請超過四年。阿琳點點頭，離開的時候雙手插在口袋裡。⁷不過這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在美國一些真正的大城市裡，比方說華府，你要等的可能不是四年，而是幾十年。在這些大城市，妳可能登記時還是個帶著小小孩的少婦，審到的時候頭髮都白了。⁸

阿琳的處境，也是美國大部分窮人的處境：他們沒有公共住宅可住，也沒有租屋券可以補貼房租。每四戶條件符合租屋補助的家庭，就有三戶被政府「放生」，什麼幫助都得不到。⁹

如今想領到租屋券，阿琳首先得存下一個月的所得來繳給住房管理局，這是她年輕時無故放棄補貼公寓得付出的代價。再來，她得花兩到三年等排隊名單解凍，然後再耗二到五年等待排在她前面的申請

表消化完畢。最後她還得祈求上帝保佑，祈禱審查的大哥或大姐可以一邊喝著走味的咖啡，一手拿著如鉛重的印章，在審理她的申請書時，不知怎地忽視過去她靠社福補助在租屋市場捉襟見肘時留下的驅離紀錄。

第十三街二樓的房子並沒有空太久。阿琳刷好的牆壁油漆一乾，舍蓮娜就安排一位年輕小姐搬進去。她就是特瑞莎。

阿琳跟特瑞莎從聊天開始建立友誼，逐漸進展到一起吃飯。對剛認識的人，阿琳沉默寡言，心防緊閉；反之特瑞莎則像是樣本書一樣，誰都可以翻閱。特瑞莎跟阿琳說睽違八年，她終於有了真正的家。她上次有個像樣的家，是住在她姐姐那兒。特瑞莎跟她說了她們的爸爸對自己幹了些什麼好事之後，姐姐就不讓她繼續住了。當時才十六歲的特瑞莎於是開始浪跡天涯，不時以收容所或廢棄房屋為家。但話說回來，她最有經驗的還是跟男人回家。兼具黑人、墨西哥與白人血統的她，在街頭弄懂了：纖瘦的骨架、濃密的大波浪黑髮，古銅色的皮膚，外表是她最大的本錢。去年的她在二十三歲時當了媽媽，但生完後，她就把孩子過繼給姐姐，主要是她吸毒，尤其常吸快克。孩子出生之後，特瑞莎跟在地一個叫「缺口修補者」(Repairs of the Breach)的遊民服務機構搭上了線。在這機構的協助之下，她成功成為聯邦救濟金的給付對象。

特瑞莎不識字，而且容易受傷。喬瑞曾經把她弄哭，只因為他問了一句「妳是有哪裡跟別人不一樣嗎？」不過她也有讓人感覺很輕鬆、貼心可愛的一面。重點是因為她在，阿琳才有人陪。遇到兩個人想抽根菸打發時間、或月底想用抽菸來讓自己感覺沒那麼飢餓時，特瑞莎會拿零錢去街角的店頭買散菸，要不然就是去速食店門口的直立式菸灰缸裡撈菸屁股出來，抽到只剩菸蒂。阿琳如果需要出門辦事，特

瑞莎會替她看孩子，而在喬瑞的眼裡，特瑞莎是個平輩甚至晚輩，總之他沒把她當大人看。喬瑞會叫特瑞莎在賈法瑞旁邊時嘴巴放乾淨點，對此特瑞莎的回應是，「老娘生出來就是要罵髒話的。」

有一天，阿琳跟特瑞莎眼在路上開來一輛「Ute」搬家卡車，上頭下來三女一男，走到公寓前面敲起阿琳家的門。意會到他們是來做什麼的之後，阿琳立刻衝入家門，在門後以雙腿跟雙腳當成門擋，就怕他們會硬著推門進來。

來人當中有一位年輕小姐。她自我介紹說是之前的房客，並且說她今天是來收東西的。按照她的說法，衣櫃、五斗櫃跟冰箱都是她的東西。

阿琳騙她說舍蓮娜把東西全清掉了，但對方不信這套，所幸有特瑞莎跳出來附和阿琳的說詞。前房客一行四人於是就這樣被呼嚨過去，轉身空手而回。等對方走了以後，合作無間的阿琳跟特瑞莎相互點點頭。¹⁰

在這件事之後，特瑞莎逢人便說她們是老朋友了。她會說她們是幾年前在街角的某家店前認識的，還說自己當時是名少女，而阿琳則誇她，「妳這個漂亮的女孩。」她口中的故事還不單這樣而已——她還會說阿琳在牢裡見過自己的母親，還說自己曾經有天在醫院醒來，而阿琳就在旁邊——但這些其實都是鬼話連篇。至於她知不知道自己是在編故事，旁人也很難得知。

特瑞莎會成為舍蓮娜的房客，主要靠貝琳達·霍爾牽線。舍蓮娜很少中獎，但貝琳達對她來說就是個頭獎。身為黑人女性、圓臉且戴著眼鏡的貝琳達才三十歲不到，就自立門戶做起生意。她提供的服務是代表聯邦救濟金的受益者來擔任受款人，負責替這些遭判定無法自理的人經手財務。舍蓮娜本來就很愛透過社會服務機構的仲介來找房客，主要是社會服務機構常替房客擔保，而且還會先替他們墊現金。但貝琳達的好不止於此。「我一直盡可能滿足她的需求，因為我希望每間房都不要空著，」舍蓮娜有感

而發。「每個月的租金會直接從她那兒過來，這對我來說絕對是第一志願。」舍蓮娜曾經豪氣地對貝琳達說，只要她開口，自己願意清出所有房子給她的案主。「我是認真的。因為我知道貝琳達的錢我收得到。」貝舍兩人認識三個月來，特瑞莎是貝琳達介紹來的第四名房客。

有些人夠窮，身心障礙也夠嚴重，所以領到聯邦救濟金不成問題；但因為他們不夠乾淨整齊，所以不受公共住宅歡迎。這些人就是貝琳達的客層，也是貝琳達的利基所在。¹¹貝琳達算過，她的案主一般得拿六到七成的月收入來繳房租。大部分的案主在貝琳達代繳完房租、水電瓦斯跟食物的錢後，身上也所剩無幾了。¹²如何找到穩定而負擔得起的房子，對她的案主來說永遠是個難題，所以貝琳達很努力與諸多房東打好關係——書到用時方恨少，房東也是一樣。貝琳達曾經清晨五點打電話給舍蓮娜，原因是有一棟公寓的暖氣壞了，她當天就必須另外安置住在其中的女性案主。排解疑難雜症的效率愈高，貝琳達就愈容易收到案主；而收愈多案主，她的收入也就愈好。貝琳達的收費是一個月三十七美元。在認識舍蓮娜的當下，她手上已經累積有兩百三十名案主。

房東們圖得是貝琳達所代表的穩定現金流，而貝琳達圖得是愈來愈多的案主。案主愈多，她賺得也就愈多。

「留言請按一。」舍蓮娜按「1」，然後留下這則的訊息，「阿琳，我是舍蓮娜。妳房租準備好了嗎？別忘了我們說好了妳要一次還一點來補貼之前積欠的三百二十元，就是上次妳……」舍蓮娜緊急煞車，把剛到嘴邊的話吞回去，她原本要說的是「上次妳好姐妹辦後事的錢」。重新開口後她說，「嗯，總之我等妳的六百五十元，記得回電給我。」

做過的事情，阿琳並不後悔。平日有告別式要出席的時候，她是連給賈法瑞買雙新鞋都沒辦法的，只能把他最好的鞋子盡量刷乾淨一點。甚至有時候因為喬瑞跟賈法瑞沒衣服穿，他們索性不出席某些喪

禮。但這次走的不是別人，是她的好姐妹，雖然不是親生姐妹，但情同親生。過胖又有糖尿病的她，身體一直不好。這次是因為肺炎跟一堆併發症住進醫院，最後就在那裡沒了心跳。

阿琳當然沒有辦後事的錢，問題是大家也都沒錢。告別式上家族都會見面，阿琳不贊助一點會覺得很丟臉。於是她把那个月的支票拆成兩半，一半給了舍蓮娜交房租，另一半則給了紐琵茲葬儀社（New Pits Mortuary）。

得知阿琳遭逢的劇變，舍蓮娜也有點於心不忍，於是她決定給阿琳這位新房客一點方便。她們約好只要阿琳可以「分期付款」把欠繳的房租補上，也就是接著的三個月都改繳六百五十美元，那她就可以繼續住下去。問題是，即便阿琳把每个月的社福支票（六百二十八美元）全轉讓給舍蓮娜，這錢還是不夠。舍蓮娜也知道這點，她只是以為阿琳會打電話跟親戚周轉、或向非營利機構求援。而阿琳之所以會如此承諾，是因為她也不知道還能怎麼辦。

隔月的月初，阿琳終於打電話來了，舍蓮娜跟昆汀正在開休旅車。舍蓮娜跟阿琳講完話後，看向昆汀。「阿琳說她沒收到支票。」

這話其實有語病。阿琳不是沒收到支票，她只是沒收到正常那張六百二十八美元的支票。原來這段期間她放了社工鴿子，把跟社工約好的時間忘得一乾二淨。政府的出席通知單寄到她之前住的埃金森大道，總之沒寄到阿琳手上。而缺席面談，社工祭出的裁罰就是刪減補助。¹³阿琳當然也可以把金額縮水的支票給舍蓮娜，但她想反正橫豎都是欠租，那口袋裡有幾百元肯定強過兩手空空。

昆汀沒有移動視線，繼續專心開車。「狗改不了吃屎，」他說。

- 1 譯註：Boogers，外觀看起來像在賣酒的雜貨店，*la Boogers* 在西班牙文裡就是雜貨店之意。
- 2 譯註：Greek-revival，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初期，北歐與美國曾經流行過一陣模仿古希臘建築的風潮，即為所謂的希臘復興式風格。
- 3 譯註：1971-1996，美國西岸的黑人饒舌歌手。曾經是饒舌歌曲銷量的金氏世界紀錄保持人，後被阿姆（Eminem）取代。他的作品觸及暴力、貧民窟、種族與社會福利等主題，在樂壇跟歌迷間享有一定的歷史地位。一九九六年遭人槍擊身亡，年僅二十五歲。
- 4 譯註：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自一九七五年起，美國法律規定身心障礙特教生要實施個人化教學計畫，親師雙方都要定期評估教學的成效。
- 5 譯註：Ritalin，成分為派醋甲酯，利他他是此藥最常見的商標名稱。利他他是中樞神經興奮劑，常用於治療過動症。
- 6 一九九七年，密爾[瓦基的聯邦公允市場租金（Fair Market Rent, FMR）——也就是全市租金分布中第四百分位數的租金與水電瓦斯費——是一房公寓要價四百六十六美元。如果阿琳租下那間公寓，那她每個月就可以結餘一百六十二美元。相隔十年，同一間公寓的公允市場租金已經漲到六百零八美元，阿琳的社福支票卻仍舊是六百二十八美元。若要租在這裡，就代表她得用二十美元過一個月。公允市場租金與社福補助的資料取材自美國聯邦住房與都市發展署、威斯康辛州兒童家庭署，以及威斯康辛州平權司。關於靠社福補助幾乎無法過活的狀況，詳見 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 7 二〇一三年，密爾瓦基約有三千九百戶家庭以公共住宅為家，約五千八百人領取租屋券。全市租屋家庭共約十萬零五千戶。詳見 Georgia Pabst, "Waiting Lists Soar for Public Housing, Rent Assistance,"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August 10, 2013.

- 8 Adrienne Todman, "Public Housing Did Not Fail and the Role It Must Play in Interrupting Poverty," Harvard University,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Seminar, March 24, 2014.
- 9 對最底層者來說，雪上加霜的是在聯邦租屋補助出現破洞的同時，社會安全網也開始與雇用資格連動起來。在「薪資所得稅扣抵」或「低收雙親的公共住宅保留戶」等方案的引導下，政府補助的資源開始流向了家長有工作的家庭。這樣的結果便是比起二十年前，如今剛好在貧窮線下下的家庭會接收到較多的協助，而遠低於貧窮線的家庭獲得的資助則遠不及二十年前。對於身陷貧窮的家庭來說，自身所得跟政府的租屋補助都較以往大打折扣。關於家庭的支出模式，詳見 Janet Currie, *The Invisible Safety Net: Protecting the Nation's Po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bert Moffitt, "The Deserving Poor, the Family, and the US Welfare System," *Demography* 52 (2015): 729-49. 關於租屋補助與需求之間的落差，詳見 Danilo Pelletiere, Michelle Canizio, Morgan Hargrave, and Sheila Crowley, *Housing Assistance for Low Income Households: States Do Not Fill the Gap* (Washington, DC: 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2008); Douglas Rice and Barbara Sar, *Decade of Neglect Has Weakened Federal Low-Income Programs: New Resources Required to Meet Growing Needs*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09).
- 10 我並沒有目睹整件事情。場景的重建是根據與阿琳跟特瑞莎進行的訪談。
- 11 密爾沃基住房管理局對僅僅是貧窮而想找住處的家庭，已經沒有補助缺額可以提供，但高齡的低收入者與身心障礙者的居住補助申請，仍持續開放。不過住房管理局有各種藉口可以讓申請無法通過，比如有犯罪前科、吸毒或有遲繳房租的紀錄，都構成申請者被打回票的理由。Housing Authority of the City of Milwaukee, *Admissions and Continued Occupancy Policy (ACOP)*, October 2013, Section 7.4: "Grounds for Denial."
- 12 隨著服務貧困者的社福機制在州政府層級遭到裁減，像貝琳達這類社會服務仲介開始在全美的貧困社區裡應運而生，以填補需求。這些仲介有些是非營利性質，也有些純粹是將本求利的商業投資。Lester Sala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73 (1994): 111-24, 109; John McKnight, *The Careless Society: Community and Its Counterpar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Jennifer Wolch, *The Shadow State: Government and Voluntary Sector in Transition*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Center, 1990). 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出版的都

市民族誌都很明顯地沒有提及社會服務仲介。在閱讀過這些民族誌之後，唯一合理的結論就是距今五十年前，社工並未在都市底層窮人的生活中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Carol Stack's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裡僅提到一位社工，對兒童保護局或類似的機構幾乎是隻字未提。Liebow 於一九六七年出版了（主要）在講失業黑人男性的《泰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一書，當中完全看不到就業中心或就業輔導人員在奔走的身影。參見 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一九九七年前後）當美國國會在進行社福改革時，議員們要求各州必須設計裁罰制度來適用「臨時性貧困家庭補助」（TANF）方案的領受人，主要的手段包括對被認定不配合的領受人暫停全數或部分的補貼。在威斯康辛第一年推出 W-2 就加入的受益者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在日後四年當中的某個點上遭受到裁罰。Chi-Fang Wu, Maria Cancian, Daniel Meyer, and Geoffrey Wallace, "How Do Welfare Sanctions Work?" *Social Work Research* 30 (2006): 33-50; Matthew Fellowes and Gretchen Rowe, "Politics and the New American Welfare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 (2004): 362-73; Richard Fording, Joe Soss, and Sanford Schram, "Race and the Local Politics of Punishment in the New World of Welfa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 (2011): 1610-657.

第六章

鼠窩

三代同堂的辛克斯頓家住在第十八街跟萊特街口一棟棕白色的房子裡，拉瑪家就在他們後頭。家族中的大家長是多琳，她的肩膀寬闊，腰圍也是。多琳帶著眼鏡，有張大餅臉，膚色稍淡的雙頰上帶有深棕色的雀斑。從多琳有記憶以來，她就沒有瘦過，每天的生活也是慢慢來，很少為了什麼事情著急。多琳有四名孩子：二十四歲的派翠絲、十九歲的娜塔莎、十四歲的C. J. 跟十三歲的露比。外加老大娜塔莎生的三個孫子：十歲的麥基、四歲的潔妲、兩歲的凱拉梅。這個家裡還養了隻狗狗叫做Coco。身形像美式足球員的Coco兇起來會咬人，而他對娜塔莎忠貞不二。

在派翠絲收到舍蓮娜的驅離通知單，並跟三個孩子從公寓樓上遷到樓下與多琳同住後，辛克斯頓一家八口（加上Coco）算是完成了合體，但他們也發現自己的生活空間又小又擠。派翠絲、娜塔莎跟C. J. 的因應之道是盡量少待在家裡，天公作美時，三個人會在外頭散散步，天黑了就到家後頭找拉瑪打黑桃王。只不過到了夜裡，大家還是得擠在一起睡覺。兩間臥房，派翠絲占了當中那間小的。她咕噥著如果要她負擔一半的房租，那至少得要有個房間歸她，就算這房間沒門也沒關係。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面，多琳跟娜塔莎合睡一張床，露比則蜷曲在椅子上湊合著睡，手腳都無法伸直。麥基在客廳裡跟C. J. 分享一張沒有床單的床墊，旁邊就是玻璃茶几與堆得如山高的衣服，乾淨跟髒的都有，反正房間裡放不下就是了。派翠絲的兩名女兒睡在飯廳一張四角都已經開花的床墊上，內裡的彈簧跟褪色的泡棉都已

「臟器外露」。

所有人都沒辦法好好睡覺。娜塔莎的習慣是睡著睡著會出腳踢多琳，多琳的習慣則是會滾到娜塔莎身上或把枕頭偷過來，假如娜塔莎想要回去，多琳就直接用枕頭反擊。因為睡不好，所以年紀較大一點的孩子常錯過清晨的學校巴士，小小孩則白天也隨時可以睡著。多琳有時候從廚房走出來，就會看到他們睡得東倒西歪。有的會把頭靠在茶几上，有的則會隨便在地板上找件衣服當成枕頭。

生日的前夕，往往也是人一年當中睡眠品質最差的一晚。壽星要是一個不小心睡著了，我保證派翠絲會溜進房裡，用美乃滋或番茄醬把對方的臉塗花。已經六年了，辛克斯頓家都沒有慶祝過耶誕節——他們慶祝不起。但到了生日那一天，辛克斯頓家的一份子會頂著張黏呼呼的大花臉笑著起床，會看到有生日蛋糕出現在桌上。喜歡彼此鬧來鬧去算是他們家的傳統。娜塔莎曾經在派翠絲的內衣裡撒過胡椒，派翠絲則是挑娜塔莎負責照顧弟弟妹妹時，把露比偷偷帶出家門，結果娜塔莎在附近繞了好幾個小時找得快發瘋。

辛克斯頓家的後門已經從門軸上脫落，牆壁上坑坑巴巴的，浴室裡還有個大洞。他們家的天花板有點塌陷，主要是樓上漏水，因此地板也蒙上一層薄薄的黑垢。廚房的窗戶裂開，飯廳有幾扇歪七扭八又缺了幾片的百葉窗。派翠絲掛上厚重的毯子，蓋住窗戶，室內因此顯得灰暗。客廳裡，用三夾板做成的五斗櫃上有台小電視，電視旁則是沒有燈罩的檯燈。

在派翠絲搬到樓下之後，舍蓮娜發現她在偷電。修理電表得花兩百美元，但只要派翠絲還跟多琳住在一起的一天，舍蓮娜就不願意花這錢。「我才不出，」她說。「這錢統統要那些黑人出，要不然冬天冷是他們的事。」辛克斯頓家後來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攢到兩百美元。他們也就在屋子內（包括廚房）都沒有電的狀況下撐過兩個月。冰箱裡能壞的都壞了，一家人晚餐只能以罐頭果腹：每天不是義大利方餃

罐頭，就是 SpaghettiOs 通心粉罐頭。

面對發臭的冰箱，辛克斯頓家的態度就跟他們面對整間公寓的心態相同：忍就對了。無論面對的是家裡的床墊還是小雙人沙發，他們也都是相同的想法。床墊跟沙發縫裡的蟑螂多到不像話，而他們只能希望搬家時統統甩掉。事實上是先有這些蟑螂，辛克斯頓家才搬進來的：碗槽、臉盆、馬桶、牆壁，乃至於廚房的抽屜拉開，蟑螂的身影無所不在。「他們就是看哪裡房租便宜就到處搬啊，」舍蓮娜這麼講多琳這一家，「他們早就知道蟑螂很多了。」

在辛克斯頓家搬進舍蓮娜位於萊特街旁的公寓前，他們有七年的時間住在第三十二街一棟有五個房間的公寓。那個家當然不是什麼豪宅，但空間寬敞，房東人也不錯。集所有人之力，他們每月要付八百美元的房租。派翠絲在一家速食店當午餐的外場，而娜塔莎在中輟之後也開始賺錢。多琳沒有念完高中，不過多年前她在免費職訓課程裡受過訓練，英打有每分鐘七十二個字的速度。即便十四歲就懷了麥基，派翠絲還是念到十一年級，就快畢業；可惜為了家計，她最後選擇輟學賺錢。娜塔莎則是才十六歲就拿九點五美元的時薪，在夸德影像上班，每天輪十二個小時，疲累時會直接在印刷機上睡著。公司沒問過她年齡，她也沒主動提。多琳的月收入是一千一百二十四美元，其中四百三十七美元來自州政府給的育兒補助，六百八十七美元是聯邦救濟金，後者是因為她的腿受過舊傷——八年級時復活節那天，她穿著新買的厚底高跟鞋，因此摔傷了髖部，骨折無法完全癒合。父親當時並沒有將她緊急送醫，而是讓她在家待了好幾天，否則傷是可能痊癒的。這位爸爸跟醫生不對盤，連他自己後來膝蓋不行了，也只是鋸下餐桌的桌腳當拐杖。

在第三十二街，街坊鄰居都認識辛克斯頓一家。他們的小孩在鄰居家跑進跑出，而多琳會站在自家

門前與街區其他住戶交流。她會跟街坊的奶奶們有說有笑，遇到住附近的孩子欺負流浪貓，她也會吼他們兩句。到了夏天，小孩子會跟某位鄰居買冲天炮。多琳三不五時會舉辦派對，而且歡迎所有人。

到了二〇〇五年八月，這天多琳打開電視，看到紐奧良整個泡在水裡。市區變成一片泥濘，黑人的屍體載浮載沉飄過在屋頂上等待救援的百姓。她二話不說打電話要好朋友芬妮趕快過來。多琳跟芬妮一起看新聞，「真的是太慘了，」多琳記得她是這麼想的。在幾個無眠的夜晚之後，多琳覺得自己不該只是在家擔心跟禱告，她覺得自己應該為洪水的災民做點什麼，於是把家交給派翠絲，跟芬妮一起搭上前往南方的客運。那年她四十一歲，派翠絲二十歲。

「行動派」並不是她的風格，待在自家門廊上哼歌才比較像她。「我喜歡窩在自家門前，」她自己也這麼說。但一路走來，這樣的她也曾不願向命運低頭，豁出去跟人生對抗過幾回。像在一九九八年一月的某個夜晚，她就曾急忙連夜打包，一聲不吭地帶著全家搬到伊利諾斯州。她想要躲的是C. J. 跟露比的生父，一個後來會在密爾瓦基北邊監所蹲很久的傢伙。

在巴士上待了兩天之後，多琳跟芬妮來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法葉市（Lafayette of Louisiana）。她們加入了志工的行列，幾十個人一起分發毛毯與食物。

跑這一趟，讓辛克斯頓家拖欠了一個月的房租。但他們住那兒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房東也很替他們著想。「他沒有為難我，」多琳回憶道。男房東跟她說，有錢再還他就好，於是當多琳手頭還可以時，就一百元一百元的還。她努力上班，但意外總是會一件件冒出來，錢感覺怎麼樣也還不完。就這樣幾個月過去了，幾年也過去了。

二〇〇八年初春的一個晚上，三十二街上兩名當地少年持槍互射，結果流彈貫穿了辛克斯頓家的前門，窗戶玻璃碎了一地。當時十七歲的娜塔莎正在掃玻璃，警察上門查看。按照辛克斯頓家人對當時情

況的描述，警官們嚴格搜索房屋，而他們想要找到槍枝或毒品（派翠絲懷疑槍手跟某位鄰居有關，而且把事情賴到辛克斯頓家的三名男性身上：派翠絲的男朋友、娜塔莎的男朋友，還有一個是男性的同輩親戚）。但屋裡並沒有槍枝或毒品，警察能找到的只有一堆髒東西：水槽裡成堆沒洗的碗盤、桶裡多到滿出來的垃圾、在一旁飛舞的蒼蠅。辛克斯頓家本來就不太愛乾淨，恰好昨晚又舉辦派對。當然，辛克斯頓家不是只有這些表面問題而已。如果觀察入微，你會發現房東隨便拿三夾板釘在廁所天花板凹陷之處。也許是因為這個家實在太亂了，也可能是因為派翠絲從凌晨兩點起便對警官大小聲，又或者是因為警方認定辛克斯頓家跟槍擊案脫離不了干係——總而言之，後來的發展是：警察打電話給兒童保護局，兒童保護局打給鄰里服務局，鄰里服務局派出建物檢查員，建物檢查員下令房東改善，而房東則填了預告五日的驅離通知單要辛克斯頓家走人，理由是房租未繳清。原來槍擊案發生時，多琳的欠租只補上了一半。他們從來不覺得這錢得急著還。

住房法庭的特聘法官一蓋好判決驅離的章，就代表辛克斯頓家得趕快找房子了。說到找房，他們只能靠自己——但他們既沒有車，也沒有網路，所以能找的範圍有限。他們向社工求助，而某位社工給的就是舍蓮娜的聯絡方式。約好以後，舍蓮娜帶他們看了萊特街的房子，但辛克斯頓家一點也不喜歡那個地方。「就算是瞎子，我也不會推薦這間房子，」派翠絲說。但這家人知道在這個節骨眼上，任何房子都會比露宿街頭或收容所強，所以他們還是住了下來。舍蓮娜當場就給了多琳鑰匙，外加一張用廢紙草草寫成的收據，上頭記著的是「茲收到租金暨押金共一千一百美元。」多琳將這收據夾進了聖經裡。

驅離之後的窘況，往往讓窮困家庭被逼著去接受低下的屋況。密爾瓦基的租屋者在遭到迫遷之後，長期陷於居住困境的機率會高出一般低收入租屋者將近百分之二十五。² 多琳說她之所以在舍蓮娜的公

寓住下，是因為他們家真的走投無路。「但我們也不會在這待太久。」被驅離會讓人先搬一次家，然後再搬第二次家：其中第一次搬家是不得已被迫搬到破落或甚至有安全疑慮的屋裡，第二次則是自發性地想要逃離。³ 只不過第二次的搬家如果要順利，通常得等上一段時日。

搬進舍蓮娜的公寓沒多久，辛克斯頓家又開始找房。這次他們的做法是按照出租傳單上的電話打去問，另外就是翻紅皮書找公寓出租的廣告——所謂的紅皮書是指舊城區雜貨店的免費刊物。只不過剛搬完家讓人精疲力盡，新添的驅離紀錄又對租屋不利，所以想找地方並不容易。不久後，派翠絲就搬到了二樓，全家一下子都多了點空間可以呼吸。到了秋天，辛克斯頓家慢慢習慣了這一帶，但他們仍舊不覺得住這兒是長久之計。只不過想歸想，日子還是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這裡跟三十二街不一樣，多琳並不會很努力地想要認識街坊，也不會去留意社區裡的孩子在做什麼。派翠絲被驅離的時候，辛克斯頓家已經搬來十八街跟萊特街口六個月了，但鄰居裡多琳只叫得出拉瑪的名字，而且她也只知道名字而已。「我都沒在串門子了，我以前很愛去別人家的，」多琳對這個新社區有感而發。「以前看到陌生的面孔，我會主動過去打個招呼。但現在我只會在一旁站著看。」冬天一來，多琳更是好幾周都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警察的存在固然有其必要，但公共的安寧，包括人行道上的和平與街道上的秩序，能在城市裡獲得維繫，靠的主要不是警力，而是人群間一股精微到幾乎難以察覺的內控與規範，且這股內控與規範的執行者正是民眾自己。」這是珍·雅各 (Jane Jacobs) 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裡寫下的文字。珍·雅各認為這種健康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區要成形有個前提，那就是得有人「有心」住在這裡，要有人願意看顧、守護這裡。事實證明她說的沒錯：只要弱勢的社區鄰居間能相互信任，對社區的發展願景產生共識，那這當中就能生成所謂的「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

而集體效能愈高，弱勢社區的犯罪率就愈低。⁴

單單一次驅離，鬆動的不只是一個街區，因為受影響的不僅是家庭被驅離的那個街區，包含這個家庭心不甘情不願搬進去的街區也會一併受累。在這樣的過程中，搬遷會直接「催生」出珍·雅各口中的「永久性貧民窟」(perpetual slum)，因為我們會看到居住環境中流動率升高，同時生活中的忿恨跟淡漠也會隨之爆表。「永久性貧民窟的問題癥結在於太多人能搬就搬；不能搬的也夢想著能早點搬。」⁵多琳被驅離，三十二街損失了一股穩定的力量——一個深愛在地，想要與在地榮辱與共，以一己之力在讓社區變得安全的居民——而萊特街卻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得到。

露比、C.J.跟麥基三個都還穿著學校的制服——因尺寸不合看起來很鬆垮的白色T恤與黑色牛仔褲——輪流在臨街的窗前巴望著午餐餐車到來。每周三天，在地的教會會到社區裡發袋裝的午餐。這一天，眼尖的露比第一個察覺餐車出現。「餐車來了！」她忘情地喊了出來，接著就跟其他小孩一起衝到屋外。最後孩子們滿載而歸，他們幫每個人都領了一袋。孩子們發起午餐，但他們都沒有偷看袋子裡裝了什麼，因為看過就不好玩了。拿到青蘋果的會與拿到紅蘋果的交換，拿到Frito洋芋片的會跟有SunChips多穀類脆片的人換，拿到蘋果汁的人會跟有果汁汽水的人交換。

「我給妳兩瓶果汁，」娜塔莎對露比開條件。

「換我一片Oreo蛋糕嗎？」露比確認。但是想過之後她覺得不划算，搖了搖頭。

「露比妳很爛耶！」

露比閃過一抹露齒笑容，並開始左右腳換著跳。她的利他能藥效正在消退，有些夜裡在藥效全沒了之後，她跟麥基會在客廳的床墊上後空翻。

娜塔莎不開心地噘起了嘴。十九歲的她固然比露比大六歲，但行為上並沒有大人風範，反而更像個小孩。相對於派翠絲十來歲就當起了小媽媽，娜塔莎對於小孩很反彈。「小孩超亂的，超髒！」她說。「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們生出來會長得很可愛還是醜八怪。所以天啊，不用了……自由自在的獨立生活比較適合我！」娜塔莎會去拉瑪家跟男生們開派對，夏天則會光著腳在家附近溜達。同母異父的她跟派翠絲一樣是所謂的「紅骨」(redbone)，也就是只有一半黑人血統，膚色因此比較淡。有男人開車經過會放慢速度，伸長脖子想看看娜塔莎看個清楚。有時也會有老太太下車來，拿鞋子給娜塔莎穿，眼神看起來似乎很心疼這個小女孩。那一幕總是能讓派翠絲笑出來。

教會的女士在白色的袋子裡塞了祈禱文，禱告完後，辛克斯頓家就會開始吃免費的午餐，並聊起那些難發音的單字。「Royal」、「Turquoise」，任何事情只要能讓他們忘記屋子的沖天臭氣跟凌亂不堪，都是好事。廚房跟浴室的狀況已經糟糕到多琳考慮要打電話給舍蓮娜跟昆汀，而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打電話給這兩個人。辛克斯頓一家或許不太想承認，但這兩名房東真的還挺嚇人的。「昆汀什麼事情都可以念，」派翠絲經常這麼抱怨。昆汀每次來，都會碎念屋子裡很難聞。帶工人來修東西，也常不收拾乾淨再走，滿地都是剩下的材料讓她們收，多琳跟派翠絲都覺得這樣很不尊重人。「他是把我們當成女傭嗎？」派翠絲說。昆汀會這樣，很難講是不是為了要讓房客即便屋況出問題也不想打電話給他，但的確有這種效果。⁶

有時候多琳打電話給舍蓮娜抱怨屋況，反而會變成舍蓮娜抱怨的對象。「每次我們打過去說房子哪裡有問題，她都會繞一圈把事情怪到我們頭上，說東西根本就是我們用壞的。」多琳說，「我聽得都煩了……所以後來我們哪裡壞都自己修。」

所謂「自己修」，常常就是「不修了」。第一個塞住的是廚房的碗槽。過了幾天，露比跟派翠絲就開

始把碗搬到浴缸去洗。但廚餘多少會流進水管裡，因此沒多久就輪到浴缸也塞住。浴缸裡開始積起水泥色的髒水，於是辛克斯頓一家就開始在廚房用瓦斯爐燒水，然後拿海綿擦澡。這之後，有人把做飯時的用水往馬桶裡面倒，再拿吸盤去通馬桶，而吸盤一拿起來，一小群蟑螂就會四處竄逃。拿著吸盤的人得很用力通，一般來說，你得通上整整五分鐘，才有辦法讓水成功往下沖。遇到通不了的時候，全家人就得把用過的衛生紙集中在塑膠袋裡，跟著垃圾一起拿出去。

多琳終於忍無可忍，為了水管不通的事情打電話給舍蓮娜，但她怎麼打都找不著。在留了一周的語音信箱之後，舍蓮娜終於回了她電話。舍蓮娜說，她跟昆汀去了趟佛羅里達，所以沒接到電話。他們剛在那兒置產，買了間度假用的三房獨立產權公寓。至於多琳打來申訴的事情，舍蓮娜並沒有直接回應，她只是提醒多琳一件事：多琳讓派翠絲母子住在她那兒，已經違反了租約規定。

對派翠絲來說，舍蓮娜的反應似曾相似。在搬進二樓之前，派翠絲也曾先看過屋況，而她當時看到的情形是那地方「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棉絮般灰色的地毯磨損嚴重且髒到一個境界，小孩房的天花板塌陷，陽台門脫落，甚至於陽台本身都有種往上頭扔袋麵粉就會垮掉的感覺；而舍蓮娜曾答應過要處理。即使房屋違反建築物規定，甚至不符合「最低居住標準」，但只要房東願意處理，還是可以出租。⁷

既然舍蓮娜這麼說，派翠絲也就信了。派翠絲於是拿了押金加上第一個月的房租，一共是一千一百美元給舍蓮娜，但修理房子的進度慢得可以。派翠絲的浴缸水已經流不掉了，但舍蓮娜還是沒回她電話。那一次她是跟昆汀照慣例去牙買加度假。「妳在牙買加，而我們連在家洗個澡都沒辦法，」派翠絲說。她曾經連續兩個月都沒有正常的洗碗槽可用。而且派翠絲也曾發現某面牆上有個大洞，但舍蓮娜卻只是拿了本手冊給她，裡頭講的是如何不要讓她的小孩受到含鉛的油漆傷害。甚至於門從樞軸上脫落的時候，「她竟派了些有毒癮的人來修理，」派翠絲要抱怨真的抱怨不完，最後她選擇攤牌。

「我要找律師告妳！」派翠絲吼出來。

「要告去告，請便。」舍蓮娜笑了。「但妳有錢跟我這樣耗嗎？」

「我房租都交了，為什麼東西不修好？」

隔了一個月，派翠絲試了個新的策略。她想如果乖乖交房租沒用，那不交呢？不交是不是能逼著舍蓮娜對她有所回應？派翠絲扣住一半的房租沒繳，說這個月的房租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等房子修好再給。房租花了派翠絲每個月六成五的收入，花這麼多錢住在這種爛環境，她嚙不下這口氣。

結果派翠絲的新作戰不但無效，甚至還弄巧成拙。舍蓮娜反過來說派翠絲不把房租付清，房子她就拒絕修理。對派翠絲來說，這真的是挖洞給自己跳。準時交租，舍蓮娜就來陰的，月初一過就不接電話；扣住房租，舍蓮娜就來硬的，明擺著不修。「我那麼拚命幹嘛，妳房租又沒付清，」舍蓮娜說。但即便被搶，派翠絲還是沒有要搬走的意思。她喜歡住媽媽家的樓上，也覺得這地方修一修還是不錯。但屋漏偏逢連夜雨，她工作的潛艇堡店 Cousins Subs 班表被砍，讓她連原本那一點談判的籌碼都沒了。在收到舍蓮娜拿來的驅離通知單後，派翠絲已沒錢把房租補上。她跟舍蓮娜說一收到退稅，她就有錢可以還了，但舍蓮娜再也不想聽。原來她的好朋友貝琳達已經打電話來說有案主在找房子，而舍蓮娜自然不會讓到手的鴨子飛了。她保證只要幾周，派翠絲的公寓一定能空出來。

在浴缸不能用、洗碗槽不通，馬桶也只勉強能用的狀況下忍了兩個月，多琳決定自己把水電師傅找來。頭一次水管不通時，水電師傅的錢是舍蓮娜支付的，而她不打算再花這種錢。在三十二街的教訓之後，多琳也不想找建物檢查員來，那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總之，水電師傅最後收了一百五十美元，成功用像胃鏡般的蛇式器材疏通了水管。師傅說這兒的管道老舊，經不太起折騰，所以叫多琳別讓有的沒

有的東西流進去。師傅走了以後，多琳第一件事就是放好熱水並在裡頭泡了一個小時。

多琳覺得她自掏腰包的一百五十美元要從房租裡扣才合理，所以即便舍蓮娜說只要她這麼做就將她驅離，多琳也還是扣了。她想說，如果都要被驅離的話，那這一百五十美元還是留給下次搬家用好了。⁸在手頭很緊的租屋者之間，多琳的想法很正常，因為房租幾乎吃掉他們所有的收入，所以弱勢家庭往往得故意被驅離，才能騰出錢來搬到別的地方。這一頭有房東吃虧，另一頭就會有房東賺到。⁹

如果非搬不可，多琳也知道她不可能找到比現在便宜很多的新家，畢竟他們一家八口。在當時，密爾瓦基兩房公寓的月租中位數是六百美元，其中月租在四百八十美元以下的物件有百分之十，月租七百五十美元以上的也占百分之十。¹⁰同一座城市裡最便宜跟最貴的房子，月租差距不超過兩百七十美元。而這意味著即便你不追求住在最好的社區，甚至願意犧牲生活品質住到很差的地方，省下的房租也沒多少。以密爾瓦基最窮困、並且至少四成家庭處於貧窮線以下的區域來講，兩房公寓的月租中位數也比全城水準低五十美元。¹¹舍蓮娜是這麼形容的，「兩房公寓就是兩房公寓，搬到東是兩房公寓，搬到西也還是兩房公寓。」

這樣的情況，早就不是一天兩天了。十九世紀中期，也就是廉租公寓開始在紐約出現的時候，當地最底層的貧民窟租金還比紐約上城高出三成。到了二十世紀的一九二〇與一九三〇年代，密爾瓦基、費城或其他北美城市中的黑人區，年久失修的房子租金還是超過白人社區裡屋況比較好的住處。甚至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以美國大城裡相同的居住條件來看，租金也是黑人付得比白人多。¹²窮人不是為了房子便宜才群聚到貧民窟裡，窮人（特別是黑人窮人）會聚集在那裡，是因為社會對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的放任與縱容。

降租可以滿足市場需求，也可以讓自己避免被欠租還有驅離房客各種成本，但做底層市場的房東

大多不會這麼做。因為想要避免欠租跟驅離人的成本，也是有成本的。對眾多房東來說，比較「經濟」的做法不是維護屋況，而是直接趕人。面對萬年欠租的房客，你想在維修費上摳門是辦得到的，而高房租就能「確保」租屋者永遠處於欠租的狀態之中。

法律能夠保護的是有辦法正常繳租的房客。法律的設計就是要保障住房的安全與人道，而有能力繳租的人不僅能光明正大找來建物檢查員查看屋況，還有權利大大方方地扣住房租直到屋況修繕完畢。¹³只不過只要一拖欠房租，這些保障就會瓦解。欠租的房客會被剝奪扣住房租或暫時將租金信託給第三方的權利。向建物檢查員申訴更是形同引火自焚，因為驅離的命運可能先行上身。低收入的租屋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他們只是更知道那代價他們背負不起。

「我在想，叫檢查員來只會讓事情愈來愈難收拾，」多琳這麼跟派翠絲說。

「是啊，」派翠絲附和。「把檢查員找來的話，她可以叫我們滾。」派翠絲的意思是多琳違約在先：她任意讓派翠絲母子這四名「未經許可的住宿者」(unauthorized boarders)搬進來，所以舍蓮娜有理由可以驅離他們。而只要建物檢查員現身，舍蓮娜就有可能會出此下策。

凡是房客欠租或違約在前，讓法律的保護傘失效在後，房東就可以對壞掉的東西愛修不修。或者就像舍蓮娜對房客說的，「你讓我好做事，那我也不會為難你。」由此有些房客便會拿自身的尊嚴與孩子的健康去交換一個棲身之所。¹⁴在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一年間，密爾瓦基近半數的租屋者得忍受「嚴重且長期性」的住房問題。¹⁵超過五分之一的租屋者曾苦於破窗、電器故障或家鼠、蟑螂、野鼠為患達三天以上才獲得處理。三分之一的人水管不通達一天以上，十分之一的人至少曾一整天沒有暖氣可用。這當中首當其衝的有非裔的美國家庭，也有養孩子的家庭。但無論租屋處的屋況是好是壞，有無上列問題，密爾瓦基的公寓租金都不會有所差異。¹⁶

一旦沒辦法準時繳租，房客們就得勉強自己接受不舒服、不理想，甚至不安全的居家環境。要是想勉強自己，那另一條路就是等著被驅離。但在商言商，這一整套做法確實有（暴）利可圖。四個家庭的物件（雙拼加上兩層樓），也就是像多琳跟拉瑪所住的那種公寓，是舍蓮娜手裡最會下蛋的金雞母。至於她第二賺錢的物件類型，則是阿琳在第十三街所住的地方。諷刺地，在舍蓮娜的資產當中，條件最差的物件也是她投資報酬率最高的搖錢樹。¹⁷

在多琳對舍蓮娜說要扣住部分房租後不久，娜塔莎發現自己竟然已經有四個月的身孕。把這事情跟媽媽說了以後，多琳的反應是笑著說，「就跟妳講吧！」果然面對各種生理變化，娜塔莎一直都是駝鳥心態，但旁觀的多琳看得一清二楚。多琳覺得這是個天大的好消息。「我又有金孫了，我又要當外婆了！」她開心地大叫。娜塔莎的男朋友也很興奮。小倆口即便還沒成婚，新生命的孕育仍永遠是喜事一樁——除非妳像娜塔莎一樣，是個想要獨立自由的女孩。¹⁸ 娜塔莎沒心情慶祝，反倒情緒低落。

「也許這小子會長顆大頭！」多琳忍不住開起玩笑。

「我不懂自己到底是怎麼懷孕的，」娜塔莎嘆氣。「我不喜歡大肚子。」

娜塔莎跟馬立克交往大概有一年了。他們是在 Cousin Sub 潛艇堡認識，而馬立克正是娜塔莎姐姐派翠絲在這間店的同事。馬立克沒娜塔莎高，膚色比娜塔莎黑，辮子頭底下有張驕傲的臉龐。他進退應付算是蠻溫和的，而且雖然年過三十三歲，但這還是他第一次當爸爸。娜塔莎倒是不討厭他，只是她的芳心還在兩年前才十七歲就搶劫失敗遭擊斃的泰亞身上。她的錢包裡依舊放著泰亞告別式的訃聞，上頭在遺族中把娜塔莎列為「特別的女性友人」。露比也是泰亞的妹妹，而有時候在娜塔莎的慫恿下，露比會去找泰亞說話。娜塔莎會在一旁靜靜地聽著，微笑著，就像個硬要將痛苦往肚裡吞的大人一樣。這種時刻，彷彿某種虎頭鉗般的殘酷力量橫亘兩姐妹之間，用力張開，要娜塔莎長大。¹⁹

按照辛克斯頓家的傳統，輪到派翠絲可以給小寶寶取名。但馬立克也有自己的想法。娜塔莎去跟媽媽、姐姐說馬立克想讓小孩（如果生出來是男生）叫作「馬立克二世」，但多琳跟派翠絲嗤之以鼻。「我們家不來『二世』這套，」多琳說。「上次的教訓還不夠啊，我到現在都還沒原諒自己。」她口中的教訓是C. J.，C. J.就是凱勒（Cleo）二世。辛克斯頓家之所以叫這孩子C. J.，是因為他們不想再聽到凱勒這個名字。

如果非當媽媽不可，娜塔莎有一件事很確定：她死也不要讓孩子住在這間屋子裡。如今有了身孕，娜塔莎更加擔心這間公寓的情形，也更擔心舍蓮娜會不會驅離他們——跟到時候他們能往哪兒住？但多琳有過一肩挑起全家的經驗，娜塔莎相信要是真的情況不妙，媽媽也一定靠得住。「我媽媽是很堅強的，」娜塔莎說。「從前比現在更糟，但她也帶著我們走過來了。我是說像住收容所、流落街頭，把教會或車子當家之類的。我對媽媽很有信心。是啦，我們流落過幾次街頭，但最後她都會有辦法。」不過話說回來，娜塔莎這次倒不是很欣賞媽媽。自從知道家族即將在田納西州的布朗斯維爾（Brownsville）聚會之後，多琳就盤算要舉家南遷。派翠絲覺得這主意不錯，她足夠密爾瓦基了。「這裡死氣沉沉，」她說，「毒蟲跟妓女多得跟什麼一樣。」但娜塔莎的想法是不希望小孩才出生就離開爸爸。

多琳跟派翠絲不覺得這事有什麼好擔心。「他（馬立克）反正也靠不住，」多琳說。但自從知道要當爸爸以後，馬立克變得非常有責任感。他開始一個人輪兩班以便存錢，也會帶食物來找娜塔莎，並且找適合兩大一小的出租公寓。但事實就是，多琳跟派翠絲對馬立克不抱期望，不是因為馬立克做了什麼十惡不赦的事，而是因為這對母女都吃過男人的苦頭。多琳先是被派翠絲跟娜塔莎的父親拋棄，然後露比跟C. J.的爸爸人在監獄。派翠絲的三個小孩也不是同一個爸爸生的，而且這些男人全都可有可無。至於派翠絲現任的男朋友就更不用說了，他最近才推自己的女朋友去撞餐桌，桌子還破了。²⁰多琳跟派翠絲

完全不能理解養小孩為何需要男人，小孩的命名就更不用說了。多琳對娜塔莎說，「妳在我肚子裡踢來踢去的時候，我旁邊也沒有男人幫我按摩。」派翠絲跟妹妹說的版本則是，「我們從來沒有過爸爸。我的小孩沒有爸爸，你的小孩肯定也不需要爸爸。」

婦產科來了通電話。「他們叫我回去重做超音波，」娜塔莎邊掛上電話，邊跟多琳說了這件事。

「他們說之前好像漏看了什麼。」

「漏看是什麼意思？」

「漏看？漏看到小孩後面還有個小孩嗎？」多琳忍不住叫了出來。「娜塔莎，妳肚子裡的是雙胞胎嗎？」

「可是我一個都不想生！」娜塔莎跺腳。

「現在說這個太晚了吧！」多琳笑了。

「夠了！」娜塔莎一屁股往沙發上坐，Coco則跳到她的大腿上。「Coco，來這裡，媽咪今天不開心。」

多琳不希望娜塔莎不開心。「我保證搬家以後給妳個超大的房間，」她說。「跟我以前的房間隔條走廊，說不定讓妳住樓下。沒錯，我希望可以找到跟三十二街一樣的房子。」

「能那樣就太好了，」摸著Coco的娜塔莎說。

「是啊，那就太好了。」多琳轉頭看著在地板上抱膝而坐的露比。「露比呢？妳想搬家嗎？」

「當然想啊，」露比說。「這裡討厭死了。」

1 譯註：卡崔娜颶風 (Hurricane Katrina) 橫掃美國南部。

2 欲對各種模型與方法論有完整的了解，詳見 Matthew Desmond, Carl Gershenson, and Barbara Kiviat, "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Social Service Review* 89: 227-62. 《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資料庫中的租屋者會被歸類為有長期性（或稱延續性）的住房問題，其條件是他們必須在受訪的前一年當中遭逢過下列其中一項問題：（一）（廚房的）爐子或其他家電故障；（二）窗戶破損；（三）對外的大門或鎖頭損壞；（四）有家鼠、野鼠或其他害蟲的侵擾；（五）電線外露或有其他與電氣相關的疑慮，且未處理須為期達三天或以上；（六）沒有暖氣；（七）沒有自來水；（八）水管堵塞至少二十四小時。為了評估迫遷對居住品質的影響，我們使用了多個「雙重穩健迴歸模型」（doubly robust regression model），並於模型中應用了廣義精確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的技巧。持租屋券的房客也納入這些分析當中。

3 非自願遷離會破壞居住的穩定性，這一點不言而喻，但其實迫遷對安居的衝擊並不會隨著驅離與緊接著的搬家而煙消雲散。對於驅離直接造成的（非自願）遷離與其後續間接造成的（自願）遷離而言，將兩者連結起來的共通點就是居住的滿意度，主要是遭迫遷的租屋者會先出於無奈而接受次等的屋況，日後再設法換地方來改善情況。《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以雙重穩健迴歸模型分析了經由廣義精確匹配處理過的資料組，而我們在針對《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進行過剖析之後，得到的結論是，比起沒有迫遷經驗的租屋者，遭到迫遷的租屋者有高出二十四個百分點的機率會在短期內自行再度搬遷。此外在先遭到迫遷、然後又自行二度搬遷的租屋者裡，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人表示想再搬一次，理由是想住在好一點的房子或社區裡。相較之下，出於自願連搬兩次的人裡，僅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給出這樣的答案。換句話說，在第二次搬遷屬於自願的人中，第一次搬遷是被迫者，會比第一次搬遷也是自願者更可能直指屋況與社區環境就是他們想再搬的理由。窮人原本就不成比例地占遭迫遷者的大宗，而迫遷本身又會再造成後續居住的高流動性。見 Desmond et al., "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4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31-32; Robert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 Chicago Press, 2012), especially 127, 146-47, 151, 177, 231-32. 關於公共空間用途的民族誌觀點，參見 Mitchell Duner,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 5 Jacobs,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271, 強調「夢想著」這三個字是我的主意。
- 6 如果昆汀是故意的話，那他這種「策略」會有一個問題。主要是有些屋況如果房客不反映，其實會侵蝕到舍蓮娜與昆汀的獲利，像馬桶漏水就是一例。這時候昆汀的策略就會打自個兒一耙。
- 7 房東有義務在與準房客簽約前揭露屋況中違反建築法規的部分。City of Milwaukee, *Landlord Training Program: Keeping Illegal and Destructive Activity Out of Rental Property*, 7th ed. (Milwaukee: Milwaukee of Milwaukee, 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 Services, 2006), 12; Wisconsin Administrative Code, ATCP134.04,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 8 在密爾瓦基的租屋族群當中，屋況的問題是搬家的一大動機。這裡的關鍵字是「被動遷離」(responsive moves)。被動遷離既非遭到迫遷(包括遭驅離、建物遭宣告為危樓)，也並非完全屬於自願(出於居住環境上的特殊考量)，而是落在這兩者之間。《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的資料顯示，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一年間，密爾瓦基被動遷離最普遍的成因就是住房問題。從受訪之日回推兩年，住房問題占被動遷離成因的比例有百分之二十三，占全數遷離原因的比例有百分之七。被動遷離的背後不是一股正向的衝動(小屋換大屋)，而是一種負面的動機(屋況每況愈下，造成人想出走)。參見 Desmond et al., "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 9 這個道理就跟房市泡沫化造成房價崩跌時一樣，一旦房價低於房貸，數以千計的屋主都會理性地寧可違約，也不願意繼續把錢往無底洞裡扔。Timothy Riddiough and Steve Wyatt, "Strategic Default, Workout, and Commercial Mortgage Valuation,"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9 (1994): 5-22; Lindsay Owens, "Intrinsically Advantaged? Middle-Class (Dis)advantage in the Case of Home Mortgage Modification," *Social Forces* 93 (2015): 1185-1209.
- 10 《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在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一年間，一房公寓的中位數房租是五百五十美元，二房的物件則是七百七十五美元。租屋市場的專業／職業化，加上資訊科技的普及，都可能是城市中房租價格帶收縮的原因，進一步觀察則可以看到商業競爭與聯合行為(price coordination)等因素在作用。凡是大型的房地產管理業

- 者，都愛用打著「造雨人／租金創造者 LRO」(Rainmaker LRO)、「租金推進器」(RentPush) 或「租金放大器」(RENTmaximizer) 等名號聳動的軟體來輔助日常營運。這些繁複的運算法會套入數以百計的現行與歷史市場指標來逐日(甚至每小時)調整租金。其中全球服務對象超過八百萬筆住宅物件的 RENTmaximizer 主打能「快速針對市況進行調整」以協助屋主取得「更高的營收表現」(www.yardi.com)。對於喜歡凡事自己來或自己動手做的屋主來說，不動產業自學手冊或書籍等出版品會建議房東要每個月進行市調。布萊恩·查維斯(Bryan Chavis) 在 *Buy It, Rent It, Profit! Make Money as a Landlord in Any Real Estate Market* (New York: Touchstone, 2009, 51) 一書中建議「你可以打電話到附近的建案或社區，就其租金進行了解，藉此避免你本身物件的租金偏高或過低。」打電話是給特別勤勞的人做的，因為其實網路上不只一個網站有現成的資料可查詢租金高或低於周遭的水平 (www.rentometer.com)。
- 11 《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混以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06-2010) 的鄰里層級資料與 Milwaukee Police Department 的犯罪紀錄 (2009-2011)。另外一項參考統計數據：中位數兩房房租在密爾瓦基治安最差的地區是五百七十五美元(暴力犯罪達到第七十五百分位數或以上者)，在治安最好的地區則為六百美元(暴力犯罪數落在第二十五百分位數或以下者)。
- 12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1890]), 11; Allan Spear, *Black Chicago: 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 189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24-26; Joe William Trotter Jr., *Black Milwaukee: The Making of an Industrial Proletariat, 1915-45*, 2nd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179;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4; Marcus Anthony Hunter, *Black Citymakers: How the Philadelphia Negro Change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80。
- 13 在本書田野調查的同時，財團法人「社區倡議者」擬定的租金刪減條例 (rent abatement guidelines) 規定房客可以主張在房子少了個門或蟑螂太多時，扣留百分之五的房租，馬桶故障可以扣百分之十，沒有暖氣可以扣百分之二十五。
- 14 若是沒有滿租，也就是還有空房，那房東其實是有降租空間的，但有些房東寧可讓房子空著。舍蓮娜曾經帶一名卡車司機看過某個四戶物件(兩層樓的雙拼)的一樓，當時該物件已經空著有兩個月了。司機看到了被狗狗摧殘過的地毯，

摸了摸摸搖搖欲墜的廚櫃門，還用腳在黏膩的廚房地板上擠出了尖銳的響聲。「這種環境比我之前住的差多了，」他說，「要不然算三百八十元一個月？」

「怎麼可能，」舍蓮娜回答得不太高興。

單以那個物件的條件來說，一個月收三百八十美元絕對樂勝一毛錢都賺不到——問題是此例一開會打壞這整棟雙拼公寓的身價。這處公寓的另外三間房都收六百美元的房租。要是舍蓮娜接受了卡車司機的條件，讓另外三戶知道了也會要求降價。如果她統統答應，那四間房各收三百八十美元的總收入，還不如她三間房都收六百美元。如果她悍然拒絕，那原本這三戶裡就會有人搬家，這樣她空屋反而變多。所以舍蓮娜最後沒有收那位司機當房客，只是送客後直接鎖門。

15 精確的數字是百分之四十四。何謂「嚴重且具長期性」的住房問題，已於本章註 2 提供過定義。《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

16 《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有比較過兩房的物件，2009-2011。在一九七〇跟一九八〇年代，租金成長的主因是住房品質提升 (Jencks, *The Homeless*, 84-89)。但在那之後，住房的品質以全美而言就幾乎停滯不前——真要說的話，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九年的這十年間還有小幅的退步——但同時間租金卻全面飆升。《美國住房研究》的資料顯示，在一九九三年，大約九十點九萬處的租屋存在嚴重的硬體問題。這個數字在二〇一一年提高至一百二十萬戶。此問題的比例在過去二十年當中持平（占大約百分之三），至於其他居住品質指標也是一樣，比方說在一九九三年，百分之九的租屋者表示曾因為暖器故障而「冷到不舒服長達二十四小時或更久」。到了二〇一一年，同個數據微升到百分之十。在二十世紀的前十年，全美供出租的房屋都未曾歷經過符合房租漲幅的修繕或升級。

17 一旦這些房子的獲利能力歸零，無論是因為累積了太多罰單或屋況差到不大修不行，舍蓮娜就會「放生」它們，讓它們「回歸城市」。這麼說的意思就是關於這些資產所附帶的稅費，舍蓮娜會停止繳納，倘若市府要因為欠稅而查封，就任其查封。妳會問舍蓮娜個人不會有責任嗎？答案是不會，因為她已經為自身設好了防火牆。說白了舍蓮娜早將這些房產登記在一間間不同的有限（責任）公司名下，所以就法論法，欠稅的不是自然人舍蓮娜，而一間間的企業法人。像這樣欠稅被查封的房地產，密爾瓦基每年會出現一千一百到一千兩百筆。一旦承接了這些「免洗」的爛房子，市府的做法不是拍賣就是拆除，而無論哪種做法都會讓平價出租房屋的庫存減少。對舍蓮娜來說，這樣把房子處理掉既不是一種錯誤，更不是什麼（財務上的）挫折。相反的，這是她「商業模式」中的基本支柱，是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凡是我對

某一處房產倦了，我就放手。」她親口說，「把大好的錢浪費在劣質的資產上，說不過去，是吧？」開公司對舍蓮娜來說並不麻煩，因為一切都可以連進「威斯康辛州金融機構管理處」（DFI: www.wdfi.org）的網路上完成。威斯康辛州金融機構管理處只會記錄申請人登記的代理者，而不會記錄下每家公司的負責人或威斯康辛州的稅務資訊。密爾瓦基的欠稅查封件數估算取自助理檢察官凱文·蘇立文（Kevin Sullivan）（個人通信，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August 13, 2015）。很多從政者雖然處理的是窮人的居住問題，很多學者雖然研究的是窮人的居住議題，但他們可能終其一生都沒有踏進過多琳住的那種公寓。按照這些官員或學者的說法，美國在促進窮人居住品質的工作上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亞歷克斯·史瓦茲（Alex Schwartz）曾寫道，「比起硬體的狀況或擁擠的問題，今日美國更令人憂心的是住房的『可負擔性』。」這說法可以說呼應了主流的看法。（Alex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6）。我並不是說這個看法不對，但我必須點出的是這類說法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那就是誤以為「屋況的惡劣與擁擠」是一個問題，而「住房的可負擔性」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並且在這兩個問題之間並沒有直接關係。有人會以為美國既然已剷平了廉價公寓（tenement），也已經頒布了含鉛油漆的禁令，那我們現在就專心處理平價住房不足的問題就行了。但事實上這兩類問題——惡劣的居住環境跟高聳入雲的居住成本——其實是相互交纏的。在最底層的住房市場裡，這兩個問題有著「相濡以沫」的共生關係。

18 Kenneth Clark, *Dark Ghetto: Dilemmas of Social Pow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72;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46-47; Kathryn Edin and Timothy Nelson, *Doing the Best I Can: Fatherhood in the Inner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chapter 2.

19 社會學家琳達·波頓（Linda Burton）把這種年輕人過早暴露在成人世界裡的過程，稱作是「童年的成人化」（childhood adultification）。見 Linda Burton, “Childhood Adultification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A Conceptual Model” *Family Relations* 56 (2007): 329-345.

20 我沒有親眼目睹這件事情，但我倒是看到了那張壞掉的桌子，也跟多琳、派翠絲、娜塔莎還有派翠絲的小孩討論這件事情。按照派翠絲十歲兒子麥基的解讀，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是，「你知道，人有時候就是會有壓力，會生氣，然後他們生氣就要發洩。」麥基說這件事讓他覺得，「很丟臉，因為全家都沒有面子。」

第七章

難過死了

史考特會四處打工賺取現金，但他主要的工作是照顧泰迪。平常煮飯的是他，打掃的是他，去採買補貨的也是他。早上起來，史考特會先扶泰迪下床沖澡。史考特覺得照顧人是他的天職，而這也是他之前成為護理師的初衷。三十八歲的史考特頭髮稀疏，有著紅潤的皮膚、一對酒窩，還有宛如藍色火焰般的雙眼。在這樣的外貌下，史考特有顆溫柔但傷痕累累的心靈。至於泰迪則是名瘦可見骨的小個子，兩隻結滿痂的手臂上有一個個變形的刺青。他已經不太能走路了，但史考特還是勉強他盡量走動，所以泰迪會在拖車公園裡緩緩拖著左腳前進。儘管才五十二歲，但泰迪看起來已老態龍鍾。

潘跟奈德已經在幾天前搬走，目前暫住在便宜的汽車旅館。但放話要驅離他們的托賓並沒有因此放過泰迪跟史考特。他們從兩個月前便缺繳房租，主要是頸部 X 光跟腦部掃描花了泰迪五百零七美元。一年前，泰迪在十六街高架橋附近的階梯上滾落，醒來人已經在醫院；從那之後，他的健康就回不去了。他喜歡在高架橋下喝酒，也喜歡頭上有車子呼嘯而過、腳下卻是河床的感覺。去橋下時他帶了瓶酒，還找了密爾瓦基救援協會（Milwaukee Rescue Mission）認識的朋友。在醫院裡，泰迪得知他身體的左半邊癱瘓了，幾個醫生不得不動融合手術，來修復他的頸部，用骨釘跟螺絲固定各個部位。

史考特把驅離通知單往凌亂的桌上一擺，桌上還有帳單、啤酒罐、拍立得相機，跟一只煙灰缸。時間接近正午，兩名男人坐著喝號稱「密爾瓦基第一」的花旗啤酒（Milwaukee's Best）。泰迪戳了戳通知

單。「我覺得他是想要多收一點。他的口袋比我深得多。」

說這話時，泰迪的眼神盯著前方，背部則直挺挺地靠著椅子。有時史考特一走進拖車，會看到泰迪人坐在沙發上一動也不動，兩隻手臂攤在身旁，既沒在看電視也沒在翻雜誌，就是很單純地呆坐著。頭兩次遇到這幅光景，史考特還曾彎下腰來確認泰迪的呼吸。

「也許吧，」史考特應聲。「但托賓有做錯什麼嗎？」

「他就是個標準的王八蛋。你喜歡他是你的事情，隨你便……要不是身體這樣，我早就上前去賞他一拳了。」

「嗯，打人最能解決問題了，」史考特酸他一下。

「我就是個鄉巴佬。牛牽到北京還是牛，我就是那隻牛。」

泰迪話匣子開了就有點欲罷不能，而且他能說。史考特總在旁邊靜靜聽著。每當泰迪一個勁兒在長篇大論，長到就跟他的田納西口音一樣會「牽絲」的時候，他也不會打斷。史考特掃視客廳，木板拼成的牆上顯得空蕩，唯一的擺設是大大的一幅畫，那是之前房客留下來的。畫裡是耶穌跟兩名偷兒一同被釘在十字架上，滿身的血污跟瘀青。一年前，史考特跟泰迪幾乎是孑然一身的搬進這裡，這一年間，什麼家具都沒添。泰迪最鍾愛的是他的釣竿跟各種釣魚配備。史考特的寶貝則是滿滿收在一個大塑膠桶裡的照片、證書，跟能證明他曾經好好生活過的各種紀念品。

泰迪碎念完後，史考特將眼神從啤酒上移開，看向窗外。他看到路的另一邊停著奈德跟潘的拖車，如今這輛車已人去樓空，然後另外一台拖車的主人是彤恩。史考特有時候會去彤恩那兒買咖啡來「注射」，或者緊急時他會買凡可汀²將就一下。而覺得死去老爸還住在暖氣通風口裡的「落屎」藍迪，髒兮兮地在前廊抽著丁香香菸³，一邊還不知道在自言自語些什麼。一架飛機轟隆隆地低空飛過。

「我……」史考特開口。「……才不想住這兒呢。」他拿起了驅離通知單。「你知道這是什麼嗎？這是一隻腳，一隻要把我踢出去的腳。」

史考特生於愛荷華州一座後來改養豬的酪農場裡，他曾養過一匹馬，那是他的耶誕禮物。史考特不知道生父的模樣，因為父親是在一次約會時「硬上」了史考特的媽媽。為了讓家族留點顏面，史考特的母親瓊被迫嫁給了強暴自己的人。那年她才十六歲。雖然成了婚，但史考特的父親很快就跟母子倆一刀兩斷，音訊全無。瓊的第二任丈夫是個惡劣的傢伙，會動手打老婆，兩人後來離婚，但瓊還是跟他生了一個小孩，一個名叫克蕾莎的女兒。再之後瓊邂逅了卡姆。卡姆是名牛仔，瓊跟他又生了三個小孩。在這些孩子當中，史考特的一個弟弟進了消防隊，另一個弟弟替康瀘根公司（Culligan）送水，他最小的妹妹則是護理師。至於酗酒的克蕾莎，住在史考特老家環境最差的公寓社區裡。當地人都管那個社區叫「蜂窩」，因為租在那裡的人進出都匆匆忙忙地，就像蜜蜂一樣。

史考特跟繼父卡姆始終處不來。他是個敏感的孩子，不太可能討卡姆這種趕牛的大老粗歡心。十七歲時，史考特考上明尼蘇達州的維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他很快就發現維諾納太小，自己的心太大，就像愛荷華鄉下的大豆田跟水塔也早就容不下他。身為同性戀，史考特從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向。「我得去找跟我一樣的人，」他記得自己在搬來密爾瓦基前是這麼想的。他先是念完了密爾瓦基區技術學院（Milwaukee Area Technical College），然後以三十一歲的年紀取得護理師證照。

這之後，史考特在一家安養院踏上了護理師之路。他每天的工作包括檢查血壓、脈搏之類的生命徵象，也包括配藥、分藥，測血糖、幫病人注射胰島素，弄點滴，幫無法進食的病患用鼻胃管「吃飯」，還有照護氣切處跟傷口。他學會了眼明手快，也學會忍住不噁心反胃，還有替針孔找靜脈。史考特覺得自

已對社會有貢獻，而且別人也真的需要他。

租屋時，他的公寓都選在像灣景 (Bay View)、以及同樣臨湖的東側 (East Side) 這種新興的優質社區。最好的那一年，史考特賺進了八萬八千美元。當時他還會寄錢回家給媽媽。

經過五年來不斷扶行動不便的爺爺奶奶與各類病人上下床還有進出浴缸後，史考特滑脫了一節椎間盤，為此醫生開了波考賽特 (Perocet)⁴ 給他止痛。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愛滋病奪走了史考特兩位好友的生命。「我崩潰了，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現實。」這時波考賽特不只治療了他的腰痛，也麻痺了他的心痛。

理論上，所有的病痛都會隨著時間好轉，史考特原本也以為時間可以平復一切。但當開波考賽特給他的醫生說要退休時，史考特整个人慌了，因為這位醫生是上天給史考特的一份大禮。如果說史考特是坐在吧檯的客人，那麼這名醫生就是會把酒倒滿到杯緣的酒保。換了其他醫生，鴉片類的藥物或許就會給得這麼大方。「所幸」他還有別條路可走。史考特開始跟護理師同事買藥，或在上班時監守自盜，最後連安養院的病人都成了他固定的「供應商」，一顆凡可汀賣他三美元。再後來史考特也不用買的了，他會直接從病人的藥裡偷拿。

服用波考賽特的幾個月之後，他遇見了「吩坦尼」(Ecstasy) 這個新歡，這次他是真的跟此藥談起戀愛，因為吩坦尼作用在中樞神經系統的速度是嗎啡的一百倍。⁵ 吩坦尼讓史考特沉醉在純粹而平靜的幸福感裡，他覺得自己簡直超脫了一切。「我這輩子都不知道原來人可以過得這麼愉快，這麼滿足，」他說。

在安養院裡，史考特會把要給慢性疼痛病人使用的「多瑞喜」(Duragesic patches) 穿皮貼片拿來，然後用針筒抽出其中的吩坦尼成分，再用吞的或用針直接將吩坦尼打進自己體內，最後把只剩空殼的貼片

給黏回去。而沒了止痛藥的病人只能在床上虛弱地痛苦呻吟。「你會在內心深處強辯自己比病人更需要它（吩坦尼），」史考特回憶說。「有了它，我就能照顧三十個跟你一樣的病人。」

就跟真正的戀愛一樣，史考特跟吩坦尼很快便結束熱戀期。他們的關係不再充滿了新奇與刺激，而開始顯得深沉磨人。很快地，他使用吩坦尼已不是為了追逐快感，變成在逃離戒斷。「難過死了，」史考特是這麼形容的。一旦沒有了吩坦尼，他從頭痛到腳都會發抖、盜汗、拉肚子。「一停藥，真的是生不如死。」走到這一步，史考特已經不吞藥就沒辦法正常生活了。為了不要那麼難熬，他發現自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包括那些他以前覺得自己不可能去做的事。

二〇〇七年八月的某天，史考特的幾名同事發現站著的他雙眼緊閉，身體像搖椅般前後搖晃。他們暫且讓他回家，然後檢查吩坦尼貼片，果然貼片都已經被吸得一乾二淨。史考特的主管叫他去驗毒，結果吩坦尼驗出來（自然是）是陽性。同樣的戲碼在十一月又重演了一遍，但史考特沒有立刻被開除，主要他的主管是藥物濫用的過來人，所以願意再給他一次機會。過沒多久，同一年的耶誕節期間，病人抱怨有個男護士會亂動他們的止痛貼片，安養院於是叫了台計程車載史考特到診所進行第三次體檢。到了診所，史考特關門下車，人站在冷冷的空氣中。

診所的候診室裡擠滿了垮在塑膠椅上的毒蟲，另外就是戴著手套但面無表情的護士，你在她們臉上看不出同情、但也嗅不到嗤之以鼻。耶誕歌曲還在播放，這點倒是在史考特的意料之中。總之，最後他一個轉身離開診所。

驚嚇之餘，史考特加入匿名戒毒會，希望可以擺脫藥癮，只可惜天不從人願。「我的人生並沒有因此改變，」他回憶說。又過了四個月，史考特穿著自己最體面的襯衫，來到威斯康辛護理委員會面前。這天開的是他的懲戒聽證會。委員會最終的裁定是：「認證執業護理師『史考特·W·邦克』在威斯康辛

州境內執業的證照，將無限期遭到吊扣。」⁶ 那一瞬間，史考特放棄了自己，他決定就這樣加入社會的底層，放手讓自己想吸毒就吸毒。「護理師執照對我真的很重要，」他回憶。「他們一句話就奪走了我的護理師資格，萬念俱灰的我心裡想的是：『幹，隨你們吧，我不玩了。』」

在丟了工作、高檔公寓也沒了之後，史考特幾乎變賣完所有值錢的東西，住進救世軍開的收容所，也就是「旅社」。他在旅社認識了剛出醫院的泰迪，而他之所以會想接近泰迪，有一個很合理的原因：泰迪既虛弱、又病，需要人攙扶爬樓梯，甚至拿餐盤都有困難。即便沒了執照，史考特的內心仍是護理師，他習慣照顧人。

泰迪跟史考特不同的是，他對無家可歸並不陌生。自從三年前搭便車從田納西州的戴頓（Dayton, Tennessee）來到密爾瓦基之後，他便一直以收容所跟橋底下為家。小時候，泰迪的家很窮，他的父親是酒鬼，有十四名孩子。酒駕的父親開著小卡車撞上十八輪的聯結車，年紀輕輕就送了命。「以物理實驗來說是蠻酷的，」泰迪說起這件事，都會下這樣的結論。

他們的組合很奇怪：一個是住在街上好幾年、來自南方的直男；另一個是年輕，初來乍到社會底層的同志。但他們成為朋友，並決定一起離開收容所當室友。

泰迪的月收入是聯邦救濟金的六百三十二美元，而史考特只有食物券可領。他們需要找間便宜的公寓，而且房東不會嚴加過問。因此柯立吉流動房屋園區完全符合他們所需，因為柯立吉是有名的「誰都進得去」。他們來到園區看看狀況，而辦公室蘇西則帶他們看了一間沒有爐具的小拖車。拖車狀況頗糟，但托賓說拖車可以送給他們，而車位的租金只收每個月四百二十美元。所以他們當周就搬進去。

離開安養院之後，藥變得很難到手。史考特原本會去「伍迪的店」（Woody's）、「碼頭房」（Harbor

Room) 或其他的同志酒吧碰運氣，看誰可以供應他。但搬家後他發現，拖車公園裡就有好幾位鄰居有美沙酮的處方箋，還有些人直接做起賣藥或販毒的生意。跟人借杯糖有多容易，買毒品就有多容易。

某天早上，史考特一起床就又覺得藥癮犯了。他平日的藥頭沒貨，於是他問彤恩那兒有沒有嗎啡，但她的庫存也已經空空如也。於是他灌了幾瓶泰迪的啤酒，但效果不大。到了晚上，史考特獨自坐在臥房裡發抖。最後他戴上棒球帽，兩手往口袋一插，出了拖車，繞著拖車公園散步。

在前院外頭的一張草坪椅上，海洛英蘇西看到了史考特的身影。她把香菸捻熄，進拖車跟比利說了兩句。等史考特第二次經過蘇西跟比利的車前時，這兩人叫住他。

蘇西跟比利養了條小狗，一條米克斯獾犬，而他們住的拖車算是乾淨，裡頭家具新穎。年屆中年的蘇西有長長的深色金髮，黑眼圈濃厚。她的舉止與氣質像貴婦般不急不徐，甚至會吹噓她有療癒人的本事。比利是名精瘦的男人，而與一般人相比，穿著無袖T恤的他好像不怎麼眨眼。比利的聲音粗獷，監獄時代的刺青有些褪色。蘇西跟比利交往多年，但仍會牽著彼此的手。

蘇西開口問史考特是否毒癮犯了。他點頭回應。她朝比利使眼色，比利便取來一個小皮箱。打開箱子後，裡頭是一組新的針頭、酒精棉片、瓶裝的無菌水、小棉球，以及「黑焦油海洛英」⁷。

死也別用針打。在鴉片類藥品全面控制他的生活之際，史考特曾在心裡這樣跟自己約定，絕對不用針筒注射海洛英，他不想落得愛滋病朋友的悲慘下場。

比利舉著湯匙在爐火上燒，裡頭熬著的是加了水的海洛英焦油。比利小聲哼著歌，拿著棉球吸飽烤好的海洛英，最後再用針筒把棉球裡的液體抽起。成品的顏色深得像咖啡。史考特後來才知道顏色愈深，代表海洛英的藥效愈強。史考特將針頭對準右膝後的一點扎入。完事之後他閉上雙眼，等了一會兒，然後得到了解脫，整個人輕飄飄地彷彿進入無重狀態。他就像個剛從泳池中浮出水面的孩子，同時

間池邊的跳板還繼續擺盪著。

蘇西、比利成了史考特的新朋友。史考特後來知道蘇西的一些事：蘇西會寫詩，蘇西喜歡說七〇年代賣大麻磚的往事，另外就是她施打海洛英已經有三十五年的「資歷」。比利習慣從手臂注射，蘇西則是大腿。經過多年的施打，她的大腿已經千瘡百孔，毫無血色到連曾是專業醫療人員的史考特都退避三舍。蘇西有時候得花好幾個小時才找得到地方下針。每當她找得不耐煩了，比利會將針筒拿過來，一把朝她脖子上的頸動脈插下去。

三不五時，比利與史考特會去撿破銅爛鐵或鐵鋁罐來換錢買毒（黑焦油海洛英不貴，裝在氣球裡大概零點一公克的量，行情是十五到二十美元）。偶爾，他們三人會去商場誑人。他們的分工是先由比利去百貨公司裡偷些像珠寶一類的值錢東西，然後蘇西會負責假裝是發票弄丟了但又想退貨的客人。因為沒有發票，所以不能退現金的店家會拿禮券把商品換回。禮券到手之後，蘇西會交由史考特在賣場的停車場裡兜售。說是兜售，其實也就是想辦法賤價脫手。如果是八十美元的禮券，他會只收五折，接著帶這四十美元直奔芝加哥，因為那兒有蘇西「評價最高」的藥頭。

蘇西跟比利能住進拖車公園，是連尼批准的，就像史考特跟泰迪的申請也是他批准的一樣。事實上，托賓所有的房客都是由連尼篩選。他從來不會請徵信社調查房客，因為徵信要錢。他也不會打電話給之前的房東，因為他估計大部分人填的都是「暗樁」，打過去接電話的若不是房客的母親、就是友人。連尼的審核過程只有一項主要程序，那就是把申請人的姓名打進「CCAP」（Consolidated Court Automation Programs）。

CCAP 是一個法院案件的管理系統與資訊公開平台。跟美國不少州一樣，威斯康辛也認為公民對州內的各種刑民事案件有「知的權利」。在這樣的思維下，州政府架設了 CCAP 將超速罰單、撫

養責任爭議、離婚官司、驅離案件、重罪與各種司法相關業務統加以分門別類，然後供人免費查詢瀏覽。其中驅離紀錄跟輕罪會公告二十年，重罪則會公告至少五十年。驅離案即便經判定不予受理，或是刑案最後獲得不起訴，CCAP也還是會記上一筆。如果有人是被逮捕了之後但沒有定罪，CCAP還是會將案件公諸於世，並可有可無地在後面聲明，「檢方的起訴未經證明，不具法律效力。」某某「仍適用無罪推定。」但這些內容若是被雇主或房東看到，他們會怎麼想就很難講了。CCAP網站上的「常見問題」裡有這麼一條留言，「我不希望『威斯康辛巡迴法庭資料庫』（Wisconsin Court Circuit Access）裡有我的個資，想申請移除的話應該如何辦理？」結果下方的回答是，「基本上無法辦理。」你要是問連尼這網站好不好用？有沒有在上頭找到過申請人的案底？他會覺得你在開玩笑，然後告訴你說，「幾乎是百發百中。」你要是再問他什麼樣的前科或起訴紀錄會讓他拒收，他會說吸毒或家暴的那些。但事實上，蘇西、比利，乃至於拖車公園裡的其他住戶，不少都有染毒的紀錄。

某個周六早晨，連尼起了個大早。在辦公室蘇西也抵達之後，托賓開著凱迪拉克接兩人參加密爾瓦基公辦的「房東訓練課程」（Landlord Training Program）。他們都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在托賓能跟威科夫斯基議員達成的協議裡，上課是條件之一。這套由美國司法部出錢舉辦的課程可上溯至一九九〇年代，宗旨是「杜絕出租物件中的不法與破壞行為」。

托賓、連尼跟辦公室蘇西抵達在條頓尼亞大道上的「密爾瓦基安全學院」（Milwaukee Safety Academy）時，大教室裡已經有六十名房東。九點整一到，一名身著深色套裝的高大女性便起身宣布，「我們準時開始，準時結束。」凱倫·隆恩是課程主任，她會連珠砲似地說話，雙手緊緊鎖在身後。「找房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地點、地點、地點，」凱倫說。「那找房客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人選、人選、人

選……該做的功課要做，做了功課你才會知道誰壞誰乖，哪些人可以租，哪些人得列為拒絕往來戶。」

凱倫告訴全場的房東要掌握房客의 出生年月日（方便查犯罪前科）、身分證字號（查信用良窳），然後得要求出示雙證件。「一定要請對方提供充分而且可供查驗的所得資料。面對自稱為自由業或自己當老闆的，你得小心謹慎，因為賣毒品的都是自由業或自己當老闆。」凱倫這時提到了CCAP案件管理系统。另外在場的房東們也都拿到了提供房客篩選服務的「有效篩選」（Screening Works）廣告宣傳單，上頭註明會提供「最完整的租屋者身家背景」。「有效篩選」主打只要二十九點九五美元，申請者的驅離紀錄、犯罪前科、信用評估、租屋舊址等多項資訊就都會在報告上一覽無遺。「有效篩選服務由『租金成長』（RentGrow）房客篩選公司提供，」廣告上印著。「『租金成長』在房客篩選上有超過十年以上經驗，每年服務的出租物件超過五十萬筆。」¹⁰

「聽好，」凱倫說，「遇到近期有被法院下令驅離或有犯罪紀錄者，你連考慮都不用考慮了。會被驅離的人，你覺得他們會有錢付房租嗎？」¹¹凱倫本身也是個房東，而她的習慣是在帶看房子時觀察對方的行為舉止。報到時，學員們會拿到一本厚厚的訓練手冊，當中也提到了同樣的重點，「他們有每個房間都仔細查看嗎？……他們有在比畫著將來家具要放哪兒、哪個房間給孩子睡、廚房的格局要如何規畫嗎？還是他們才剛進門就立刻說『租了！』而對房子的細節意興闌珊？正當當生活的人，一定會在意自己的家是何模樣，而這不難從他們看房子時的態度看出。如果房子會被拿來做一些不法勾當，租的人通常都會忘記要『演』一下、忘記假裝他們如何嚮往將來住在這裡的生活。」¹²

篩選房客的這個動作，一開始看起來沒什麼，但其後續的影響卻至關重大。現代美國城市裡普遍有著涇渭分明的高級住宅區跟貧民窟，會將居民分成上層階級跟弱勢族群，那輪廓就是千千萬萬個房東的一念之間勾勒出來的：運氣好，孩子可以上好學校，運氣不好，可能整間學校亂七八糟；運氣好，你

家外頭會是安全的街道，運氣不好，你出門得擔心遇見兇險。¹³房東手上掌握著資源分配的生殺大權，他們決定了誰可以住在哪邊。這也是為何社區或街區在犯罪與幫派活動的氾濫程度上天差地遠、在公民參與跟守望相助的精神上有天壤之別，因為房東在篩選房客時堅持了不該堅持的事（或是該堅持的沒有堅持）。甚至於在同一個低收入地區的一條街上，有些公寓社區會一天到晚有警察找上門來，有些公寓社區就還好，這背後也有著同樣的理由。¹⁴

篩選的過程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容易讓犯罪跟貧窮共生。把罪犯跟窮人都貼上「拒絕往來戶」的標籤，其結果就是把弱勢家庭推入火坑，讓他們不得不住進那些「來者不拒」的區域，與毒販、性侵犯或其他作奸犯科的人比鄰而居。不少地區會深陷貧窮與高犯罪率，不單是因為「貧窮會引發犯罪（飢寒起盜心）」，而犯罪前科又會回過頭來讓人無法脫貧」這樣的惡性循環，也是因為房東的各種手法在成功杜絕「不法與破壞行為」的同時，也堵住了貧窮者的求生之路。這也代表暴力犯罪、毒品交易、深度貧窮與其他各種社會問題，會在比鄰里社區更小的單位上結合成一體——這些社會問題會集合在同一個住址裡。

對經常處於飢餓與匱乏、或經常流連於毒癮與監牢中的族群來講，這往往等於他們從此被阻斷了回歸職場之路，而且還暴露在罪惡與暴力之中。但另一方面，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他們可以暢所欲言，就問題互相交流：他們可以在吃穿上互通有無，交換各種資訊，可以在爛工作、爛社工、爛監獄的話題上聊得十分投機。往往一個人起了頭，另一個人就知道他說什麼（「裡頭不管煮什麼菜……」「都一定會澆肉汁！」）。這還意味著他們原本可能只是處於戒斷現象的初期，想要在拖車公園裡走幾圈來舒緩一下發抖的症狀，卻沒想到會遇到其他吸毒的人有他們想要的東西。

有些房東不太把篩選房客當回事，就像高利貸公司會無保借款給負債或信用很差的家庭一樣，也像次貸公司會貸款給根本還不起的人一樣，還像主打「先租後買」的家具／家電業者 Rent-A-Center 會不查信

用就讓你把海信（Hisense）冷氣機或名牌 Kausner 的高檔 Lazarus 躺椅帶回家一樣。無論是什麼買賣，底層都自會有一套商業模式存在。¹⁵

「有問題嗎？」凱倫用眼神巡了教室一遍。

「我應該跟房客打長約還是短約？」

「重點是要有合約，好嗎？不管什麼條件都一定要寫成白紙黑字。威斯康辛州有六、七成的租約都只是口頭說說而已。」

有個戴著迷彩帽的男人舉手，問了跟驅離有關的問題，「我們真的得給他們三個月的緩衝期還是什麼鬼東西嗎？」

「沒有，假如不付房租就沒有什麼寬限期。」

「遲繳房租的罰款有上限嗎？」全場發出尷尬的笑聲，而凱倫也不屑地皺起了眉頭，連答都不想答。

「我們可以通知房客就進到公共區域，走廊，或開放的地下室嗎？」

凱倫為了做效果而刻意頓了一拍，先對提出問題的女性笑了笑。這位五十來歲的黑人女士坐在前排，抄了一整天的筆記。

「所以答案是什麼？」凱倫反問全場。

「可以，」幾名房東異口同聲地說。

凱倫點點頭，視線轉回發問女士的身上。「來，跟我念一遍：這是我的房子。」

「這是我的房子，」女學員很聽話。

「這是我的房子。」凱倫放大音量，舉起雙手，示意全班也念一遍。

「這是我的房子，」現場的房東齊聲說。

「這是我的房子！」凱倫手指著地板低吼。

最終全場陷入了「大合唱」，「歌聲」中稱滿了驕傲與力量。「這是我的房子！我的房子！」

在收到驅離通知單之後，泰迪考慮了幾天，最後決定要回田納西老家。泰迪家裡有好幾名姐妹，他打電話給其中一位，然後對方說會叫老公開廂型車北上來接他，為此泰迪寄了張五百美元的匯票過去。

「我不想像個窮光蛋一樣去投靠家人，」他這麼跟史考特說。而這也等於告訴史考特一件事情：泰迪沒錢了。

史考特知道得為自己打算。於是他打電話給在匿名戒毒會認識的朋友皮托，問他有沒有什麼工作可做，而皮托介紹他認識米拉。來自波多黎各的米拉是名女同性戀，感覺酷酷的。她讓史考特去打掃法院查封的房屋。米拉付給史考特和其他員工現金，金額不一。對此史考特不明所以，但也沒多問。工作時，史考特把金屬送給回收破銅爛鐵的人，賣掉值錢的東西，剩下的則拖去丟掉。

被查封的屋裡會留下千奇百怪的東西，讓史考特在驚訝之餘也長了不少見識：沙發、電腦、不鏽鋼爐具。標籤都還在的童裝、三輪車、一箱箱的節日裝飾品、冷凍豬排、青豆罐頭、床單還在的床墊、檔案櫃、裱框的海報、禱告文、金玉良言、窗簾、衣架上的女性上衣、鋤草機、照片。有些矮房子簡陋到不行，窗戶破了沒修，天花板有一層油垢；但有時也會遇到豪宅，地毯厚實，浴室豪華，後院還有露台。對史考特而言，這一切彷彿整個城市都在出走。

「有時候你走進一間房子，感覺他們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什麼都沒拿就拍拍屁股走了，」說這話的史考特正跟泰迪喝著啤酒，這也是他們的早餐，距離兩人收到驅離通知單大概過了一周。「這當中的奧妙我還沒有摸透。」

「我也好想工作喔，」泰迪說。「我也想去外面工作，但我這種身體誰會錄用我。」

史考特還是對廢墟比對工作有興趣。「那些人到底是怎麼了呢？」他顯得有些欲罷不能。「這實在是……」他的話懸在半空中。

「史考特，」泰迪邊說邊將身體慢慢轉向他。「我們就像家人一樣。我真的不想丟下你，但我要回家了。」

「是喔，我覺得你還蠻討人厭的耶，」史考特笑著說。

「你嘴硬什麼。我知道你也希望有我在。但我不回去不行，我知道你會懂的。」

周六早晨，天剛破曉之時，一輛白色的廂型車停在拖車前面。史考特幫忙把一袋衣服跟釣魚工具放進車後，再扶老朋友進副駕駛座。泰迪舉著彎不了的手，像木偶一樣說著無聲的再見，箱型車則慢慢駛離，朝著哈雷機車最經典的橘色天空開去。

同一天大約傍晚，就在史考特跟著米拉手下人員出勤時，他的拖車被闖空門。泰迪走了，拖車公園裡的人都知道史考特也撐不了多久。小偷一開始還比較客氣，拿的是像襯衫、電影光碟、夾克、後背包這些小東西，後來像桌子啊、沙發啊、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畫像等比較大的東西也能搬就搬。

拉蕊的姐夫連恩從他雛菊黃色的拖車那兒看著。連恩這人瘦瘦的，留著深色頭髮，金色的項鍊掛在身上。「這些禿鷹，」他邊說邊搖頭。「你晚上睡覺要是沒把嘴巴閉緊，這些人會連你的金牙都偷。」

當晚史考特一回到家裡，便發現事情不對勁，立刻衝去看他房間裡的塑膠盒還在不在——他擔心的盒子裡裝著的照片、文憑與回憶，因為這些東西是他曾經是另外一個人的鐵證。小偷搬走了床，但盒子還在那兒，那感覺就像他們留下了禮物似的。稍微鬆口氣的史考特，這才慢慢把各個房間巡了一遍，察看有哪些東西不見，或是哪些東西連這種人都懶得偷。書跟拍立得都沒人動，但他們拿走了空的啤酒

罐，估計是要去回收換錢。史考特把玩著剩下的東西，就像他在工作時會做的事情一樣。他研究這些東西，彷彿手中握的是出土文物或遠古化石。

他想起當天晚上他最後清理的那棟屋子。從外頭看來，那間房子沒有什麼異狀，但走進屋裡，他發現有一根跳脫衣舞用的鋼管，立在「土製」的舞台之上，舞台旁邊還圍了一圈沙發。限制級的黃色書刊四散。樓上有三個房間，其中兩個也是滿滿的色情刊物。史考特開了門進到第三間房，他看到的是張單人床、以及沒了主人的玩具，還有做到一半的功課。大部分遭棄置的住家都沒留給他太多的線索，他不太知道誰在這裡生活過。但在收拾的過程中，他會自己腦補，會想像這裡曾有過餐桌上的笑聲、睡眠惺忪的早晨、在浴室鏡子前刮鬍子的男主人。最後這間屋子不言而喻。想著那第三間臥房，史考特坐在空蕩的地板上，在被洗劫一空的拖車中流下了傷心的眼淚。

註釋

- 1 譯註：植入融合物或再加上骨釘骨板來固定脊椎的手術。
- 2 譯註：Vicodin，麻醉類的止痛藥，容易成癮。
- 3 譯註：Clove cigarette，將丁香油混入菸葉而製成的香菸，毒害比一般香菸更大。
- 4 從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開始到現在，鴉片類用藥的處方籤數量已經在美國增加了兩倍，用藥過量的案例也一樣增加了兩倍。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Policy Impact: Prescription Pain Killer Overdos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2011);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alysis of Opioid Prescription Practices Finds Areas of Concern* (Washington, DC: NIH New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11).

- 5 Stacey Mayes and Marcus Ferrone, "Transdermal System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Postoperative Pain," *The Annals of Pharmacotherapy* 40 (2006): 2178-86.
- 6 這裡的引言跟關於史考特在擔任護理師期間濫用藥物的各種描述，都出自於在威斯康辛護理委員會前進行的懲戒程序紀錄。細節部分我跟史考特求證確認過。
- 7 譯註：black-tar heroin。海洛英是嗎啡加工而成，而嗎啡是從特定幾種罌粟中萃取得到的天然鴉片劑。海洛英是美國為患最廣、成癮率最高的毒品，而其常見的「市售」的形式有粉狀跟此處提及的深色焦油。「使用方式」有用吸的或用針打。
- 8 見 Wisconsin Statutes 19.31-19.39 and 59.20(3)
- 9 City of Milwaukee, *Landlord Training Program: Keeping Illegal and Destructive Activity Out of Rental Property*, 7th ed. (Milwaukee: Milwaukee 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 Services, 2006).
- 10 「租金成長」公司後來變成了亞爾迪住戶篩選公司 (Yardi Resident Screening)，繼續提供「恐怖分子、運毒者、性侵犯與社福詐騙案的篩選服務」(www.yardi.com)。美國目前有大約六百五十家房客篩選業者。雖然經常錯誤百出，但房東對業者報告的依賴程度仍與日俱增。參見 See Rudy Kleysteuer, "Tenant Screening Thirty Years Later: A Statutory Proposal to Protect Public Records," *Yale Law Journal* 116 (2006):1344-388; Mathew Callanan, "Protecting the Unconvicted: Limiting Iowa's Rights to Public Access in Search of Greater Protection for Criminal Defendants Whose Charges Do Not End in Convictions," *Iowa Law Review* 98 (2013): 1275-1308.
- 11 「這些房客，很多都像是住在娃娃屋裡的豬（房子很美但人很醜）」威爾布·布希 (Wilbur Bush) 這麼跟我說。理著平頭的布希是名上了年紀的黑人。穿著皮夾克，掛著黃金十字架。布希開始當房東已經是一九六〇年代的事了。他會親自到每位準房客現居的住處去看，而且看的時候一定會開冰箱（我會陪他去看現場，他面試房客時我也會坐在他的辦公室裡）。「不知道這樣說你懂不懂，」他接著說，「所以我在做的事情，是在一堆老鼠屎裡找到一兩碗能吃的粥……我去過很多地方，給零分都嫌高。」
- 12 有些篩選技巧在那個周六早上並沒有介紹到。我從一個二代房東那裡聽到這麼一招：遇到媽媽帶著孩子來租房，他第一個看的不是她每個月賺多少錢？也不是她之前住在哪裡？而是她緊急聯絡人是誰。「如果上面列出來的是自己的爸媽，

那我就知道這個約簽下去沒問題。」但要是上頭列的只有自己的媽媽，那這位房東就會再確認一下準房客的姓氏。如果房客的姓氏跟被列為緊急聯絡人的母親不一樣，那這位房東會推論出要租房子的的是離過婚或再嫁的女人，這樣是加分。萬一準房客跟緊急聯絡人母親的姓氏一樣，那這位房東就會認定這名女子是單親媽媽生的單親媽媽，基本上他不會收。比起傳統視角如何看待為什麼有些人被分到某些鄰里，我想從另一種角度提醒大家注意是誰在做這個揀選的工作：那就是房東。在芝加哥學派 (the Chicago School) 的眼裡，城市是一個「感性空間」(a space of sentiments)，是外在的和社會的分隔，主導上萬人決定他們最適合的落腳地點。「假以時日，」勞勃·派克 (Robert Park) 寫道，「每個個體都會在城市生活呈現出的不同面貌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發展或休憩的環境。」見 Robert Park,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in *The City*, eds. Robert Park, Ernest Burgess, and Roderick McKenzi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41. 這種出於感性

而選擇的鄰里，就像是都會生態系中的植物棲息地。這些棲息地會發展出自己的意識與生命，把適合在此生存的個體吸引過來。R. D. 麥肯錫 (R. D. McKenzie) 認為居住地「分揀」的方向盤握在「源自不同社區之間」一股股揀選或吸引的力量」的手裡，「這些力量會把適合的人口元素吸收過來，排斥跟自己不合的人口元素。而在這樣一拉一推的過程中，都會人口中的小團體間就會呈現出生物性與文化性的邊界」。R. D. McKenzie,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in Park, Burgess, and McKenzie, eds., *The City*, 63-79, 78. 在討論「居住流動性」(residential mobility) 時，「居住成就模型」(residential attainment model) 作為影響力最大的一派觀點，本身也可以說深受到芝加哥學派對於「流動性」跟「鄰里揀選」看法的影響，但在此模型傳統下的學者，還是抽掉了芝加哥學派強調的感性與道德，然後帶入了重視「實用性／工具性」與經濟發展的一面。居住成就模型視(居住)流動性是「人往高處爬」的結果，都市在他們眼裡不是一座道德孤島的拼貼，而是強勢與弱勢者的地理分布。依這種觀點來看，人會搬家的動機是想要「更上層樓」、是拿經濟資本去換得居住資本。參見 John Logan and Richard Alba, "Locational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Minority Access to Suburban Community Resources," *Demography* 30 (1993): 243-68; Scott South and Kyle Crowder, "Escaping Distressed Neighborhoods: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Metropolitan Influ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1997): 1040-84. 但無論是哪一種觀點都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都會鄰里是一種市場，是一種商品，而且(以舊城區而言) 掌控在不居住於其中

- 的所有權人手裡。因此各種市場因素，特別是房東，應該要被視為是各種鄰里揀選與居住流動性理論中的核心變數。參見 John Logan and Harvey Molotch,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33-34.
- 14 關於不同鄰里社區之間的差異，參見 Robert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eter St. Jean, *Pockets of Crime: Broken Window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the Criminal Point of 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15 見 John Caskey, *Fringe Banking: Check-Cashing Outlets, Pawnshops, and the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3); Gary Rivlin, *Broke, USA: From Pawnshops to Poverty, Inc.* (New York: Harper, 2010).

第八章

四〇〇室的耶誕節

舍蓮娜決定了，她要驅離阿琳。喪禮費用跟後續的社福裁罰讓阿琳愈欠愈多，總共累積了八百七十五美元。舍蓮娜覺得是時候「放生阿琳，好迎接下一位房客了」。當月稍早她整理好了必備的文件，等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開庭通知，算是趕上了驅離法庭在耶誕節前的「末班車」。舍蓮娜知道這個時節法庭的「生意」會非常好。不少做爸媽的租屋者都會在這時寧可跟房東賭一把，也不願在耶誕節的早上兩手空空的面對孩子。「一名新來的房客已經問過舍蓮娜能否先把一部分的房租還她，好讓她可以買禮物給孩子。舍蓮娜回了她一句，「房子都沒了你禮物要放哪兒……十一個月前你早該知道現在會是耶誕節吧。」

舍蓮娜跟阿琳出庭的前一晚，外頭下雪。隔天一早迎接所有人的，是一座埋在雪裡的密爾瓦基城。厚重的羽絨外套跟針織帽紛紛出籠，人行道上的路人步履蹣跚。包緊緊的孩子依偎著母親，一起在公車站的頂棚下候著，重心時而壓在左腳，時而切換到右腳。城市裡的煙囪吐著蒸氣煙霧，在蒼白的天空中有如厚實的棉花。節日裝飾如黑人版的耶穌、閒置在土地上的微笑雪人等，點綴著密爾瓦基的北部。

舍蓮娜在密爾瓦基郡立法院前停車。法庭建於一九三一年，但外型刻意設計得好像亙古以來就矗立在這兒似的。環繞法庭一周的是比橡木樹幹更高、更粗的古希臘科林斯式圓柱，撐起的高聳屋頂足以睥睨市區。這無疑地這是座壯觀的作品，氣勢懾人的立面上刻有建築師題在石灰岩上的拉丁銘言：vox populi

vox dei——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

舍蓮娜在想阿琳會不會來呢？大多時候房客都不會來，而那就正中舍蓮娜的下懷。她的經驗是到了這個份上，你之前對房客有多好都不重要了。在法庭上，「那些事情就跟沒發生過一樣。」舍蓮娜帶過牛奶跟生活用品給阿琳，甚至還讓工人從空房搬一台沒人在用的爐子給她。但她知道只要來到特聘法官的面前，阿琳會講的只有壞掉的熱水器或窗戶上那個昆汀至今未修的洞。儘管如此，舍蓮娜那天早上還是打電話給阿琳，提醒她今天記得出庭。她自然沒有責任這麼做，但說到阿琳，她總是會有一點心軟。此外更讓舍蓮娜擔心的是那些特聘法官。她總覺得這些法官內心比較同情房客，所以老是用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來為難房東。舍蓮娜有過一、兩件申請案被駁回的紀錄，原因都是書面資料上出了差錯。一旦遇到這種狀況，舍蓮娜的驅離工作就得全部從頭來過，而時間就是金錢，舍蓮娜因此又會少收一個月的房租。但要是順利，舍蓮娜也有可能十天之內就讓郡治安官的驅離隊出現在房客門前。

通過安檢之後，舍蓮娜的目標是位於四〇〇室的密爾瓦基郡小額索賠法庭 (Milwaukee County Small Claims Court)，也就是堪稱威斯康辛州最忙碌的法庭。² 她的步伐在大理石地板上喀拉作響，迴盪於圓拱屋頂。一路上她與律師們擦身而過，他們身穿大衣、眼睛盯著地板的同時手機也沒有停過。年輕的爸媽帶著小孩，一副目瞪口呆的觀光客傻樣。法庭裡擠得水洩不通，男男女女不是被擠到長長的排椅上，就是沿著牆壁站成一列，體熱讓法庭內的溫度都升高了。舍蓮娜找好位子坐下，然後跟熟識的同業揮揮手。

在法庭的後方，不少房東正在跟房客「溝通」，希望他們能在最後一刻簽約和解，也就是只要房客能把房租給補上，他們就願意把驅離一筆勾銷。這當中有一位穿著皮外套的白人房東，剛在幾個月前上過地方報，原因是他違反建築法的件數累計有好幾百筆。一名房客朝他走去的同时，他正跟自己的年輕女助理聊天。房客是名黑人女性，看上去大約五十來歲。她穿著一件看得出歲月痕跡的大衣，肩膀很高，

不知是否有墊肩。

她將手伸進皮包裡，掏出要拿給房東的七百美元，全部是現金。

「我是在想……」她開口說，但房東打斷她。

「想沒有用，寫支票比較實在。」

「再給我兩周，我可以補你六百元。」

房東要她簽下和解的協議，當中載明遲繳房租要多罰她五十五美元。她沒有異議接過了筆。³

在法庭前一個特定的區域裡，擺著幾張桌子跟一堆空椅子，裡頭坐的是身穿條紋西裝、打著「權力領帶」⁴的大律師。這些人是房東請的。他們面前會放著一大疊文件夾，有些人為了打發時間，不是看報紙、就是在玩填字遊戲。還有些律師跟法警有說有笑，但聊著聊著，有些法警會停下來要房客們在室內脫帽或小聲一點。專區裡的律師與法警全都是白人。律師的前面擺著一張大木桌，對著群眾，木桌的兩端各坐著一名女性，負責當日的案件傳喚並做出席紀錄。只不過大部分的名字念了也是白念。約七成的房客即便遭到傳喚，也不會大費周章地來到驅離法庭。其他的大城市幾乎相同。在某些都會區的法庭裡，房客的出席率低到只有十分之一。⁵至於房客不來的理由，有些是因為工作不能請假，有些是小孩找不到地方顧，有些是根本搞不清楚狀況，甚至有人覺得爛命一條無所謂了，當然也有些是因為丟臉而不願前來。⁶遇到房客不見人影而當庭的只有房東本人或律師時，傳喚人員就會在檔案上連蓋三個章——意思是缺席的房客已逕行遭裁定驅離，然後一旁像蓋房子般的檔案數量就會愈疊愈高。驅離法庭裡常有幾十個人在同一時間裡嘆氣、咳嗽、低語、跟孩子說悄悄話，當中穿插著高低跌宕的傳喚唱名、停頓與蓋章聲，最後合奏出一股像是背景音似的嗡嗡聲響。

在法庭前方的木桌後頭，兩根雄偉木質圓柱之間掛著一大幅畫，上頭畫的是領受完十誡的摩西走下

西奈山，俯視著沙漠中的以色列人圍著金色的牛犢跳舞。傳喚人員的木桌兩側各有一條門廊，分別通往不同特聘法官的辦公室，也就是實際聆訊進行的地方。當自己的案件被傳喚時，房東跟房客就會走這兩條門廊去面見法官，通常都只會在裡頭待幾分鐘而已。

一名聆訊剛結束的黑人女性牽著孩子的手，重新踏回法庭。她包著頭巾，一直沒脫下身上厚重的藍色冬衣。她一路從四〇〇號室的中央走道穿越，與貌似貧血的白人刺青男性、坐輪椅且穿著睡褲跟布希鞋的白人女性、還有一名大腿上擱著一頂軟帽子的視障黑人男性、一名身穿「為我們禱告」腳踩工作鞋的拉丁裔男子擦身而過——他們全都是為了驅離案件在這裡候傳。一般而言，租屋的都是窮人，而且幾乎沒有例外（百分之九十二）都是因為未正常交租而遭法庭傳喚。他們大部分人的家庭所得，有半數花在房租上，三分之一更得把家庭所得的八成上繳給房東。⁷ 在每六名出庭後遭到驅離的房客當中，只有一名馬上可以入住收容所或親友的公寓，因而不至於前途茫茫。剩下的，有些會淪為遊民，而絕大部分的人尋找不到容身之處。⁸

身穿藍色冬衣的那名女性發現某排椅子的末端，坐著另外一名黑人女子，兩人目光交集。於是經過的時候，她彎下腰來對這位非裔同胞小小聲說，「別緊張，親愛的，幾分鐘就結束了。」一如往常，法庭內是黑人女性的「天下」。從任何一個月來看，密爾瓦基驅離法庭內的組成都是黑人占四分之三，而黑人裡，女性又占四分之三。在驅離法庭，黑人女性的人數位居各種身分之冠，其他背景的總和都沒有黑人女性多。⁹ 圍繞著這些黑人女性的兒童橫跨各個年齡層。一個頭上彷彿用了整盒髮夾的小女孩安靜地坐著，構不著地板的雙腿在椅子下方盪啊盪。有位皮膚黝黑的男孩身穿大兩號的有領上衣，坐得直挺挺的，臉上表情一本正經；旁邊可能是他妹妹的小女孩正在打瞌睡，一隻手臂蓋住眼睛，一隻手抓著狗造型的絨毛玩具。

在密爾瓦基最貧困的黑人社區裡，驅離已經是家常便飯，而女性遭到驅離更是見怪不怪。在這些社區中，每年平均每十七名女性租屋者，就有一名會被法院判定驅離，這比例是同一群社區中男性的兩倍，更是密爾瓦基底層白人社區中女性的九倍。來自黑人社區的女性占密爾瓦基人口僅百分之九，但占所有被驅離的租屋者的比例卻高達三成。¹⁰

如果說貧困黑人社區裡的男性生活是進出監獄，那黑人女性過的就是被驅離的日子。黑人男性照例被關，黑人女性習慣被趕。¹¹

一名特聘法官從側邊的門廊走出來，並且從傳喚人員那裡拿走一個檔案。舍蓮娜點腳等待自己被唱名。月初時，她就曾為了八件驅離案出庭，當中也包括派翠絲的案子。重點那天房客只有一個人出庭，那就是單腳瑞奇。他一跛一跛地來到舍蓮娜面前抱怨，「把我拖來這裡幹嘛？」瑞奇講話聲音有點尖，又有點沙啞。他呼吸裡聞得到啤酒的味道，木頭義肢是他二十二歲的「生日禮物」，那天他的腿上中了四槍。

「怎麼？要我揍你另一條腿？」舍蓮娜回擊。她雙手握拳舉起，瑞奇則作勢要用拐杖去刺她的腳。

打鬧一番後，舍蓮娜說的是，「愛你呦，瑞奇。」

「我也愛妳啊，寶貝。」

「你知道的嘛，形式上還是要跑一下。你總不能到雜貨店裡白拿東西，然後說，『嗯，這些東西我要了喔，而且我沒錢付喔。』」

「我懂啦，寶貝。今天要是我當老闆，我也會在商言商……我老爸也都跟我說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恩將仇報。」

終於輪到他們，舍蓮娜跟瑞奇朝著排椅前的木桌走過去。因為驅離的案子是按照原告（房東）來分

的，所以傳喚人員要先點名，看是不是舍蓮娜所有要驅離的房客都到齊了。

「希賽兒·克萊門特？」咚、咚、咚。

「派翠絲·辛克斯頓？」咚、咚、咚。

沒有出庭的派翠絲人在 Cousins Sub 潛艇堡服務客人，因為她既不想失去這份工作，又找不到人換班。要知道她在 Cousins Sub 的店長已經對她的 A 級輕罪¹²（開「芭樂票」¹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對她來說，在 Cousins Sub 工作只有通勤這點是好處：她可以安安靜靜地坐一個小時的巴士，道路兩旁盡是磚房跟斜掛的美國國旗在飄揚。

「去她的（舍蓮娜），去她的法庭，」派翠絲後來說。「我媽有去出過庭啊，結果那個法官超沒品的。」開庭未到，代表派翠絲的「租屋人生」將以一筆驅離紀錄開場。但她對此沒想太多。「我發誓，一堆我認識的人，扣掉白人朋友不算，幾乎人人都有驅離紀錄。」派翠絲知道自己要是真的跑去出庭，那她就不會只是損失班表跟惹毛店長而已，她還得在一票學歷比她高、法律比她懂、在法院比在家裡自在的人面前爭輸贏。當然有些其他的房客更慘，可能得跟房東的律師大眼瞪小眼。

這還不算派翠絲得踏進那棟古老而雄偉的法院，而她並不想。派翠絲這輩子待過最講究的建築是芬杜拉大道上的麗娜生鮮超市（Lena's Food Market）：那裡有購物推車、耀眼的日光燈，還有打蠟磨亮的塑膠地板。在她白人朋友的口中，麗娜超市就像貧民窟的雜貨店，但這在密爾瓦基北部已經是難能可貴了。在麗娜超市裡，派翠絲從來不會覺得自己來錯了地方。舉凡密爾瓦基市裡會讓她覺得自己格格不入之處，她都盡量不去。派翠絲的住處離密西根湖岸有四英里：前往那兒走路需一小時，公車半小時，開車十五分鐘。但她一次都沒有去過。

「舍蓮娜，」有人輕輕叫了一聲。舍蓮娜轉過身，看到阿琳把頭探進四〇〇號室。

舍蓮娜走出四〇〇號室，來到外頭的走廊，接著走向將臉藏在紅色帽T裡的阿琳。「親愛的，」舍蓮娜說，「我要嚇得讓你搬走，要嚇得把錢要回來。我說的是實話……我也有生活要過。我現在就可以拿帳單給妳看，妳看了一定會嚇到眼睛脫窗。」

舍蓮娜把手伸向她的檔案，抽出一張市府已經宣告為危樓的房地產稅單遞給阿琳，上頭列出了雨洪與下水道的疏通費用、封屋的費用，還有一些雜項，加總起來是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五點六七美元。阿琳兩眼無神地盯著帳單，她一年也賺不到這麼多錢。

舍蓮娜抬起頭問，「妳看到了嗎？我的狀況……這或許不能怪到妳的頭上，但……」她揮動掐在食指跟拇指間的帳單，「我也不好過。」

講完這些，舍蓮娜回到四〇〇號室坐下。她還記得第一回的驅離。緊張又不知所措的她已經把書面資料來回看了幾十次，所有的流程也都很順利。接著一回生二回熟，沒多久之後，她就申請了第二次、第三次。在填寫法院表格時，舍蓮娜學到了幾招，要在房客的名字後面加上「等人」的字眼，這樣驅離判決的效力才會及於租屋處的所有人，包括她不見得認識的那些人；她學到文件上問她損壞估計金額時，要回答「不超過五千元，」也就是法定的上限；經驗告訴她驅離法庭的特聘法官不認同超過五十五美元的遲繳罰金；並且花八十九點五美元的手續費把拖欠房租的房客拉到法庭上是划得來的，因為一旦這麼做，很多房客就會努力把錢生出來。再說這手續費只是先墊的，之後她還是可以把這一條列到房客的帳單上。

阿琳對驅離法庭也不陌生。十六年前她才二十二歲的時候，就體驗過驅離的程序。從滿十八歲算起，阿琳掂量著她租過不下二十個地方，意思是她跟孩子差不多每年都得搬家一次——要是超過一次就

代表她們那年有被驅離。但話又說回來，阿琳的驅離紀錄並不如想像中「滿江紅」。這些年下來，她在跟房東交手時用過不少化名。她沒有取什麼亂七八糟的假名，只是把真名稍微動點手脚，改一兩個字母讓「阿琳·貝爾」變成「阿琳·畢爾」或「厄琳·貝爾」，而這些名字也真吃下了不少驅離紀錄。主要是忙到一個程度，法院的職員跟不少房東都一樣不會那麼認真地要求出示證件。阿琳記得早年在密爾瓦基，驅離會在耶誕節前後喊停，那是一種慣例。但那是一九九一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名房東一狀告上非營利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而該組織便開始主張這種暫停驅離的做法是有違公平正義的宗教慶祝活動。¹⁴ 老一輩的有些不知道是人太好、習慣了，還是沒人告訴他們，總之有些人會因為耶誕節而暫時不趕人，但這不包括舍蓮娜就是了。

時間繼續向前推進。律師一個個都已經回家休息——因為他們的案子會優先叫號處理，於是四〇〇號室前面只剩下法警跟傳喚人員在場。這天的法警是一名嬌小而有點暴牙的白人女性，閒得發慌又沒人講話的她開始對等待的房客找碴。「手機不想被沒收的話，就給我關靜音！」早在一個小時前，兩位傳喚人員就大喇喇地打起哈欠，連遮都懶得遮。「走廊要淨空！」女法警喝令一聲。小孩子的鞋底在座椅上點啊點的。「要討論案子的到外頭走廊去講，」女法警又補了這句。

最後阿琳抬起頭來。她看到舍蓮娜稍微走出四〇〇室，手握著半開的門把說，「輪到我們了。」等了兩個小時才被叫到。舍蓮娜抽到的特聘法官是蘿拉·葛姆林—裴瑞茲，這名白人女士姿勢端正，穿著深色西裝，頸戴著珍珠項鍊，露出線條輪廓。葛姆林—裴瑞茲法官一開口便先請阿琳在她辦公室前候著，她另外有件事情要先跟舍蓮娜處理。舍蓮娜於是跟著特聘法官來到辦公室內。這是間頗為大氣の木質辦公室，四壁點綴著法律著作、裱框證書，還有家族合照。這名特聘法官在偌大的硬木桌前坐下，並問，「發票有著落了嗎？」

舍蓮娜連續第二天來到這間辦公室了，昨天她來是希望特聘法官能核准她向另一名從危樓中遭驅離的房客索討五千元。以民事訴訟而言，每筆驅離申請都可拆成兩部分來看，其中「第一請求」(First case of action) 專門處理「房客應予驅離與否」的判定，再來的「第二暨第三請求」則處理房東遭欠的款項認定，這包括：欠繳的房租、開庭費用、其他損失賠償項目。¹⁵ 換句話說，多數房客在驅離法庭上都屬於雙重被告：第一重被告的是房子要歸還，第二重是欠款。而這也代表他們得出庭兩次。前面說過很少人來的是第一個出庭日，至於第二個出庭日，可以想見會來的就更少了。也正因為第二次出庭的房客少之又少，在庭上就容易演變為房東說多少就是多少，沒有人跟他們唱反調。想告房客來討回欠租跟法庭費用，一點都不麻煩。房東可以合法要求房客支付欠繳的租金、法庭核定的遲繳罰金，還有租約終止後滯留時期每日兩倍的租金。但要是說起房屋損壞賠償計算，那就是一筆爛帳了。有的時候，舍蓮娜會在來法院的路上還在猶豫不決。「後門應該算多少錢呢？一百五十元？兩百元？」有時候她會多算一筆除蟲的錢，但其實這一條昆汀可以自己處理。總之只要金額別太誇張，傳喚人員都會咚咚地讓「第二暨第三請求」快速通關。而要是金額大到讓傳喚人員愣住，那他們就會把資料上呈給特聘法官去把關，而這也就是葛姆林－裴瑞茲在做的事情。她跟舍蓮娜要發票，是希望她能提出憑據來證明前房客有必要賠到五千元的上限。

「我跟她要這點錢根本是零頭好嗎？她把我的房子弄得亂七八糟，」舍蓮娜一邊回覆法官，一邊拿出了滿目瘡痍的房間照片跟她剛剛給阿琳看過的帳單來佐證。

葛姆林－裴瑞茲仔細看過照片跟帳單，但她的結論仍是，「這樣不夠。」

舍蓮娜嘗試再爭取一次，但依舊徒勞。「反正事情就是不能順我的意，」她最後終於氣到了。

「嗯，恐怕是吧，」特聘法官說。「那麼……」

「這樣真的很不公平！都沒有人要管管這些房客。每次都是房東吞苦水。這個制度真的是有問題……隨便，反正這些錢我橫豎是拿不回来了，這些人本來就是社會上的廢渣！」

葛姆林—裴瑞茲把舍蓮娜的索賠金額從五千砍到一千兩百八十五元，另外月初那八筆驅離案則一共判了超過一萬美元的賠償金額。舍蓮娜當然知道判賠不等於錢進口袋。除了把房客的押金沒收之外，房東其實也沒有太多管道可以拿到錢。舍蓮娜可以嘗試扣押房客的薪水，但那也得前房客有工作、生活又不在貧窮線之下才有可能。她可以扣押銀行帳戶，但問題是很多前房客根本沒戶頭可扣。就算有，房東也不能碰州政府發放的社福補助，而且永遠要在戶頭裡留一千美元，不可以扣得一乾二淨。¹⁶

但即便如此，舍蓮娜跟許多其他的房東仍前仆後繼地發動第二暨第三請求。這對房客而言還是有差，主要是金錢判決會登錄在驅離紀錄上。驅離紀錄上的積欠租金是兩百美元或兩千美元會讓房東的感受天差地遠。另外金錢判決也可能會事隔多年又重新出現在遭驅離者的生命裡，尤其如果房東花點錢讓這些判決結果納入法庭正式紀錄的話。金錢判決一旦被法院正式記錄，房客的信用紀錄裡就會被烙上一個印記。十年內他／她只要在密爾瓦基郡境內置產，該筆金錢判決就會跳出來對這筆房產享有「優先權」，而這將大大限縮新科屋主利用重貸或變賣房產來理財的空間。¹⁷對房東來說，讓金錢判決納為正式紀錄是放長線釣大魚，房東賭的是未來。畢竟誰都不知道或許某年某月，某個房客會突然想要振作起來恢復信用，會自己跑回來想要把帳結清。到時候房東還可以要求「連本帶利」還，因為金錢判決內建的年利率會讓所有投資人口水流滿地：高達百分之十二。對於大半輩子都窮到趴在地上、早就沒什麼信用可言的最底層人來說，金錢判決有沒有登記在案，只是地獄十七層跟十八層的差別而已。但對於後來無論找到了不錯的工作、遇到好對象走入婚姻、申請學貸念書、或買了人生第一個家，總之希望能再拚一次看看的人而言，這就像是原已崎嶇不平的安定之路上出現難以跨越的天險。

舍蓮娜一直想著要請像「租金回收服務」(Rent Recovery Service)公司這類的業者，來幫忙她把第二暨第三請求的錢給拿到手。自稱是「全美最大也最努力」的這家租金回收服務業者，會向三間全國性的信用管理機構舉報欠錢的房客，然後將房客資料輸入到橫跨全美的追蹤系統裡。有了這個系統，業者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掌握前房客在財務上的一舉一動。從此前房客無論是想要借錢、求職、還是要去銀行開戶，都不可能瞞過業者。就像讓金錢判決列入正式法庭紀錄的房東一樣，這些租金回收業者也把眼光放得很遠，他們等的是有一天房客能「賺到錢自力更生」，到時候他們就可以開始收帳。租金回收服務公司自稱「只要債務還在，檔案就不會關」。¹⁸這當中有些檔案裡的債務金額經過合理的計算並且帳目一目了然，但也有些檔案裡的第二暨第三請求「膨風」得很嚴重，或者利率高得離譜。但既然法庭都認證過了，租金回收服務公司也不會管這麼多、分這麼細。

終於輪到處理她的案子，阿琳在特聘法官的桌前坐下，而且她決定就坐在舍蓮娜身旁。這兩名女人互看了一會兒，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她們是老朋友甚至是姐妹，只不過其中一個人的命比較好罷了。舍蓮娜還在為了剛剛的五千美元犯嘀咕，而特聘法官閱讀阿琳的檔案，頭也沒抬地問說，「房東太太說妳欠繳房租要驅離妳，所以妳交租有不正常嗎？女士。」

「有，」阿琳答道。

才講一個字，她這案子就已經輸了。¹⁹

特聘法官看向舍蓮娜，「妳這邊願意和解嗎？」

「不願意，」舍蓮娜回答。「主要是她欠得太多了。上次她的好姐妹過世時，我有給過她方便，她那一個月的租金就沒有全繳了，然後現在又過了一整個月，算起來她足足欠我八百七十元了。」

「好，好，」特聘法官要她暫停，然後將目光轉向阿琳。「所以房東太太的意思就是要妳搬走。」

「好。」

「妳家裡有未成年的小孩嗎？」

「有。」

「幾個？」

「兩個。」

法庭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多一個孩子要扶養、就多給被驅離者兩天的緩衝。法官們有時候會給這麼一點點「優惠」，而葛姆林—裴瑞茲也是其中一位。

「我跨年前會搬走，」阿琳說。「最晚新年當天。」

「等等，但這樣就卡到下個月了，那又是新的租期了，」舍蓮娜反應。

「那要是她可以在一月一日前搬走，妳願意提個和解方案嗎？」特聘法官還沒死心。

「可是，」舍蓮娜連僅有的耐力也沒了。「還有一票人在排隊，想在一日搬進來。」

舍蓮娜看似堅定，但特聘法官看到了突破的缺口。她知道阿琳是走定了，她只是希望讓阿琳不要留下驅離紀錄的「污點」。抱著這個想法的法官再試了一次，「如果她願意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離開，我是說她自己乖乖走人，妳要不要得饒人處且饒人？」

「我要饒她什麼？」舍蓮娜冷冷地問道。

「比方說妳要不要把驅離判決撤銷？」

「那她欠我的錢怎麼辦？」驅離判決撤銷，就代表金錢判決也一併撤銷。但會這麼辛苦的透過法庭來驅離房客，舍蓮娜為的就是要取得金錢判決，即便對方是靠社福度日的單親媽媽也在所不惜。

「嗯，我想說的是，妳要是願意少拿阿琳兩、三百美元，一月入住的房客就可以保住。」法官這麼說是因為她知道舍蓮娜可以沒收阿琳的押金，這樣她實際上少收的租金只有三百二十元。「交換的條件是她不會擋著妳……」

阿琳突然打斷法官。「我並沒有要擋她的財路，」她說得非常用力，同時臉上掛著受辱的表情。阿琳看出來了，眼前這位戴珍珠項鍊的白人女士說個不停，但她顯然沒能力發號施令。

一直若有所思的舍蓮娜挺身。「我什麼都不撤銷。我就是不想……我是說，我真的受夠了，不要每次都要我吞下去……」她一邊說，一邊開始以手敲桌打節奏。

阿琳看著特聘法官。「我也沒有想賴著不走。我知道她說的意思，那畢竟是她的房子。」

「我了解，」特聘法官說。

「我沒有硬要待在那兒。」

「我了解。」

特聘法官沒再說些什麼，只是自顧自地翻起了資料。在三人的靜默之中，阿琳稍稍的轉守為攻。她想起了破掉但沒補的窗戶、還有時靈時不靈的熱水，以及骯髒的地毯，於是她說，「我也有理由可以責難她，只是我不願意提，算了。」這就是她對自身僅有的辯護。²⁰

特聘法官看著阿琳說，「女士，條件是這樣，妳要在一月一日前自行搬離……要是做不到、一月一日妳人還在那兒，那房東太太就有權直接回來法院領驅離令，不需要再另行通知妳，然後郡治安官就會出動。」

舍蓮娜跟阿琳走出法庭，輕柔的雪仍在下著。舍蓮娜依約要載阿琳回去，而進到車裡，舍蓮娜第一件事是先揉了揉脖子，阿琳則把額頭埋進手掌裡。她們都頭疼得要死，但舍蓮娜頭痛是因為上法院，她

還在為了葛姆林——裴瑞茲砍了她的金錢判決而耿耿於懷。阿琳則是餓到頭痛，她一整天都沒有吃飯。

「我也不想讓妳們母子天寒地凍時沒地方住，」舍蓮娜一邊跟阿琳解釋，一邊讓車子在融雪的泥濘道路上緩緩前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些房東都私下亂來，跟土霸王一樣想幹嘛就幹嘛；但也有像我這樣照規矩來的房東，我們會去法院，讓像剛剛那樣的女法官說得天花亂墜，畢竟法律就是這樣規定……她也知道這個爛體制有問題，但她就是偏袒。」²¹

隔著車窗，阿琳瞅著雪像默片般落在黑鐵燈柱上、落在公共圖書館的華美圓頂上、也落在耶穌教會（Church of the Gesù）的哥德式雙尖塔上。

「有些房客真的髒到一個境界，」舍蓮娜自顧自地說著，「他們一來，蟑螂也跟著來，老鼠也跟著來。除蟲的錢誰付？像那個多琳·辛克斯頓，她把吃剩的泡麵都往洗碗槽倒，又一直打來說水管堵住……結果變成我要打電話找水電師傅來。不然就是炸雞吃一吃也把油往碗槽裡倒，他們倒得很開心，要叫水電的還不是我。」

轉進中央街，車子行經教會，感恩節或耶誕節時阿琳會來此領禮物籃，籃子裡裝著食物，還會有禦寒衣物。她一直都希望有天也能在教會裡做那樣的事情，她想當發禮物的人。

「所以說啊，阿琳，」舍蓮娜把車停到阿琳位於第十三街的家門口，「妳可不要哪天想不開來當房東，這是一份難賺的苦差事，發生事情永遠是房東吃虧。」

阿琳下車，轉身對舍蓮娜說，「耶誕快樂。」

- 1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 2 二〇一三年，密爾瓦基郡審理了將近六萬四千件民事案件，數量幾乎是刑事案件的兩倍。以全美而言，二〇一〇年的新增民事案件量是一千三百八十萬件，刑事案件則相形見绌地只有一千零六十萬件。cases. Wisconsin Circuit Court, *Caseload Summary by Responsible Court Official, County Wide Report* (Madison, WI: Wisconsin Courts, 2014). Court Statistics Project, *National Civil and Criminal Caseloads and Civil/Criminal Court Caseloads: Total Caseloads* (Williamsburg, VA: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2010).
- 3 有名密爾瓦基的房東在低收入的社區中擁有大約一百個收租物件。他告訴我說，每個月他發給房客的五天預告驅離通知單，大約占全部房客的三成，而通知裡都會註明要收取五十美元的罰款。他估計九成的驅離通知都會以和解收場，剩下的一成則會真的遭到驅離。所以算起來，他每個月可以收到的遲繳罰款是一千三百五十美元，一整年下來光罰款收入就超過一萬六千美元。
- 4 譯註：Power ties，傳統上以紅藍色為主的保守條紋領帶，很好認但不太好形容。刻板印象是打著權力領帶的人會身穿西裝、手戴俗氣的勞力士手錶，身上古龍水味濃得嗆鼻，然後握起手來出奇地用力。
- 5 《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Milwaukee Eviction Court Study, 2011)。除了查訪房客以外，這項研究還記錄了從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七日到二月二十六日之間每個上班日(僅一天例外)的出庭狀況。在這總共六周、一千三百二十八個案子裡，有九百四十五個案子的房客沒有出庭，結果大多數都接獲驅離判決。至於在有出庭的房客當中，略高於三分之一的人簽下了和解協議，但他們有些後來還是會走上被驅離之路。四分之一的人得擇日再度出庭，理由是文件資料有誤，或者因為他們的案件過於複雜而必須由特聘法官轉呈正式法官審理。百分之十二的驅離案會遭到撤銷，其餘的百分之二十九則收到驅離判決。其他州或城市的正式紀錄顯示，驅離法庭的缺席率落在百分之三十五到九十之間。參

見 Randy Gerchick, "No Easy Way Out: Making the Summary Eviction Process a Fairer and More Efficient Alternative to Landlord Self-Help," *UCLA Law Review* 41 (1994): 759-837; Erik Larson, "Case Characteristics and Defendant Tenant Default in a Housing Court,"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3 (2006): 121-44; David Caplovitz, *Consumers in Trouble: A Study of Debtors in Defaul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4).

6 我跟強納生·米吉斯 (Jonathan Mijis) 一起彙整了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二十六日《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中所有驅離法庭的紀錄，並對照房客所處社區裡的各種資訊。其中房客社區資訊是在將驅離紀錄中的地址加以地理編碼 (geocoding) 後取得。另外在跟「哈佛大學地理分析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 的合作之下，我也一併計算了房客住址與法庭所在地之間的距離(以車程英里數與時間計算)。然後我建立了統計模型，嘗試根據各案件中的不同面向或房客身處的社區資料來解釋特定房客出缺席庭訊的機率高低。但最終這模型所得出的是個空集合。無論房客欠房東多少錢，房客前往法庭來回要多久的時間，或是房客的性別，任何一項因子都與出庭率沒有顯著相關。我另外調查了房客所處社區裡的幾種指標——比如該社區的驅離率、貧窮率與犯罪率，看看這些數據會不會造成房客缺席驅離法庭。結果一樣是無關的。我試了各式各樣的變數，但在統計學上都看不出它們與房客出席率是否相關。資料中欠缺明顯的趨勢，顯示缺席驅離法庭在某種程度上是隨機的行為。其他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像財團法人「社區倡議者」裡的一名成員就跟我說過，「說到出席驅離法庭……嗯，他們得吃飯，得坐公車，得找人看孩子。這一樣樣考量都只能看當場的狀況來決定。」參見 Barbara Bezdek, "Silence in the Court: Participation and Subordination of Poor Tenants' Voices in Legal Process," *Hofstra Law Review* 20 (1992): 533-608; Larson, "Case Characteristics and Defendant Tenant Default in a Housing Court."

7 《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2011。欲進一步深入了解《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的內容，參見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Matthew Desmond et al., "Evicting Children," *Social Forces* (2013) 92: 303-27. 根據二〇一三年《美國住房研究》(table S-R8-RO)，百分之七十一的貧窮租屋家庭在三個月內曾收到過驅離通知單，皆是因為未準時交租。

8 《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2011。二〇一三年的《美國住房研究》詢問了所有的租者一個問題：若遭驅離，他們會搬到哪裡去？(Table S-08-RO)。大部分受訪者都極其樂天地說他們會「搬到新家」。但若把假設性的東西換成實際的問

題，已經收到驅離判決的房客們會說對於要搬到何處毫無頭緒。

《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2011。

在密爾瓦基最窮困的黑人社區裡，每年每三十三名男性租屋者裡，就有一名會被法院判處驅離。相較之下，在密爾瓦基最底層的白人社區裡，每一百三十四名男性與一百五十名女性房客中，只會分別有一名遭到驅離。所謂「最窮困」的底層社區，我的定義是人口普查區塊團體 (census block group) 裡，至少四成家庭活在貧窮線以下；所謂的「白人/黑人社區」，我的定義是至少三分之二的居民屬於白人或黑人。由於驅離紀錄中並未涵蓋性別資料，我採用了兩個辦法將性別因素納入計算。首先，我讓兩名研究助理依據總共九千名的房客的名字決定性別。第二，在非立克斯·艾爾沃特 (Felix Elwert) 的協助下，我參考了美國新生兒申請身分證的資料。雙管齊下的結果是我得出了幾乎完全相同的估計值。年度家庭遭驅離率的計算是將某年當中的驅離件數除以該年度的出租物件數。另外針對每個社區 (人口普查區塊團體)，我估算男性與女性房客驅離率，是將某性別的遭驅離者數除以該性別的成年租屋者人數。所有的統計數據都按照各年度與個別的區塊團體分別計算，集結成各組之後，再計算出年度的平均。關於得出這些估計值的方法，更詳盡的解釋請參見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就二〇〇三到二〇〇七年之間的年平均而言，法庭下令驅離的案件數在以拉丁裔為主的社區中，是兩百七十六件，而白人社區是一千一百八十七件，黑人社區是兩千七百五十九件。就跟黑人社區中的女性一樣，拉丁裔社區的女性遭驅離比率較高。平均而言，在高度貧窮的拉丁裔社區當中，每年每八十六名男性跟每四十名女性租屋者中，就會有一人被法庭判定驅離。關於非正式驅離與房東房產遭到查封的估計值，更令人觸目驚心，在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一年間，密爾瓦基大約百分之二十三的拉丁裔租屋者在受訪的前兩年中曾遭到迫遷，包括經由正式或非正式的驅離、房東房產遭到查封，或是建物遭宣告為危樓。他們的非自願流動率幾乎是黑人租屋者的兩倍，主要得歸咎於密爾瓦基的拉丁裔租屋者受到查封的機率較高。房東房產遭查封的狀況若未計入非自願遷離的普及率計算，則受訪前兩年曾經經歷迫遷的租屋者比率會從百分之十三點二降至百分之十點二。這樣的排除造成了非自願流動性的比率在白人與黑人間分別從百分之十二跟百分之十下降至百分之九跟百分之七。但其真正更大的影響乃呈現在拉丁裔族群的非自願流動性上，因為此一比率會因為不計入房東房產遭到查封而從百分之二十三一口氣降至百分之十四。《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2003-2007；《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

在貧困的黑人社區裡，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在正式的經濟體系中任職，主要是男性不少人都背著前科，所以失業率很高。許多房東都不會接受失業業者或有前科者的租屋申請。以在舊城區而言，女性也比男性更有可能提供簽約時所需的書面資料，包括薪資所得的支票或社福補助等政府津貼。在密爾瓦基，處於工作年齡的黑人男性有半數失業，同時三十幾歲就有半數坐過牢——這兩種「學生」的趨勢多少有些關聯。WUMN, *Project Milwaukee: Black Men in Prison*, Milwaukee Public Radio, July 16, 2014; Marc Levine, *The Crisis Continues: Black Male Joblessness in Milwaukee*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8). 稽查研究顯示密爾瓦基的雇主比較可能回電給有犯罪前科的白人求職者，而相對比較不會回電給背景清白的黑人求職者。黑人求職者若背負犯罪前科會變成雙重弱勢。Devah Pager, "The Mark of a Criminal Reco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2003): 937-75.

通常法庭紀錄只記下簽訂租約的人，而這表示來自貧困黑人社區的女性其實並沒有比男性遭驅離的比率高，而是比起沒被記載在租約上的男性，這些女性更容易累積正式的驅離紀錄。只不過，在黑人社區裡，即便考慮到未載明於租約上的成年人，兩性在正式驅離的比率上仍舊存在差距。《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2011. 考量了家庭中所有的成年人，包括未列名於傳票與訴狀 (Summons and Complaint) 上的人，結果發現各種族裔與性別族群中遭正式驅離者，黑人女性仍舊最多。在出席驅離法庭的家庭裡，黑人女性占居住於其中的成年人的半數；而在收到驅離判決的家庭當中，黑人女性占了居住其中成年人的百分之四十四。黑人女性不僅在驅離紀錄的比例上明顯較高，實際上遷離的比率也真的比較高。黑人女性遭驅離的高比率，不是簡單一個租約上勾男或勾女就可以解釋過去的。

另外一個要考慮的點是：在舊城區，女性承租人比男性承租人更不容易正常繳租。雖然許多黑人男性被排除在職場以外，但有工作的黑人男性工時較長，薪資報酬也優於黑人女性。在二〇一〇年，密爾瓦基全職勞工的中位數年所得，黑人男性是三萬三千零一十美元，黑人女性是兩萬九千四百五十四美元——這段差距相當於密爾瓦基公寓平均五個月的租金。許多舊城區的女性也必須負擔更多的費用，單親媽媽的家庭尤其如此，而單親媽媽的家庭又占密爾瓦基黑人家庭的大宗。單親媽媽往往沒辦法穩定依靠孩子的爸爸，而且也因為身邊有這些孩子，所以比起非監護人的爸爸，她們必須要找更大更貴的房子來租，沒辦法像獨善其身的爸爸一樣隨便找個朋友家的沙發睡、或租間雅房就能搞定。舍蓮娜位於密爾瓦基舊城區的分租公寓，月租是四百美元（還含水電），這比阿琳等單親媽媽得花五百五十美元（還不含水

- 電) 租兩房公寓要便宜得多。考量到密爾瓦基的居住人數上限——俗稱一間臥房只能有兩組「心跳」，許多房東會拒絕把小坪數的物件租給單親媽媽。而一個家庭裡「心跳」的組數愈多，就代表他們需要更多的臥房，也代表他們的租金負擔愈重。參見 City of Milwaukee Code of Ordinances, Chapter 200: Building and Zoning Code, Subchapter 8: "Occupancy and Use." See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 12 譯註：美國刑法中將重罪分成 A 到 E 五個等級，輕罪則分為 A B 兩級，其餘則算是更輕微的違規。輕罪中 A 級輕罪之關押時間不超過一年，B 級輕罪的關押時間則不超過三個月。
- 13 譯註：兌現不了的支票，也就是俗稱的「跳票」。
- 14 Manny Fernandez, "Still Home for the Holidays, When Evictions Hal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08.
- 15 「第二請求」針對的是未付的房租，而「第三請求」所對應的是房產的損壞賠償。在法庭之上，這兩種請求是一併受理的，所以法律術語才會合稱「第一暨第三請求」。
- 16 在二〇〇六到二〇一〇年之間，密爾瓦基小額索賠法庭每年處理大約一萬兩千筆驅離案件，但房東扣押房客薪資或銀行帳戶的件數只有區區兩百筆。我在計算年平均時排除了二〇〇九年的扣押成功筆數，因為那一年的扣押成功不知為何高達五百三十七筆。關於驅離與扣押的申請件數，參見 State of Wisconsin, 2010 Annual Report: Milwaukee County Circuit Court, *First Judicial District*, 2. 關於扣押與驅離的明文法令，參見 Wisconsin Statutes § 814 and § 815.
- 17 密爾瓦基的房東訓練課程會鼓吹房東要將金錢判決納入法庭正式紀錄。「我最要提醒各位去做的一件事情是，花個五美元的小錢，去申請將判決納入紀錄的手續，」講師凱倫給了學員這樣的建議。「聰明的話，你就應該把法院的金錢判決加入房客的信用紀錄中，這樣無論他們走到哪裡，大家都知道他們欠你錢……我希望大家能舉手之勞登記判決，不只是為了你自己，也是為了我們所有在工作上需要調用信用報告來看的人……而且搞不好隔個兩年，你會接到對方打電話來，「我是喬治·瓊斯，還記得我嗎？」「嗯，您是？」「嗯，我三年前跟您租過房子。您名下有一筆七百五十美元的判決是我欠的。我是想說可不可以還您五百美元，然後請您高抬貴手放我一馬？」凱倫還建議房東要把判決可以納入紀錄的事情告知房客。她建議的講法是，「我會把法院判決的結果登記在你的信用紀錄上，這樣你以後就不用想借錢或任何東西了。所以建議你不要讓自己的信用紀錄產生污點。」
- 18 其實就算房東沒有取得任何金錢判決，「租金回收服務」公司也還是會將房客的資料通報給主要的信用管理局處

(www.rentrecovery.service.com)。

19 在密爾瓦基跟全美各大城市，法律都不怎麼保護欠租的房客。房東之間流傳的一句話是：「重點是有沒有欠，而不是為什麼欠。」換句話說，法庭一般不會去管為什麼繳不出房租，在他們眼中遲繳就是遲繳。儘管阿琳可以把房子的問題攤開來講，甚至可以帶佐證的照片來，但這麼做也無濟於事。曾經有一名老嫗在沒有電的狀態下住了一個月，只因為房東維修線路的動作慢吞吞，最後她也遭到驅離。但特聘法官葛姆林·裴瑞茲在得知此事後的反應是，「這或許是事實，但卻不是今天重點。」還有一次是在驅離法庭上，一名法官聽完了房客描述她浴缸裡有污水跟地板如何腐爛，感覺還蠻有耐心的；只不過一開口，他的反應竟是，「講這麼多，妳房租就是沒準時交嘛。」

20 房客可能會有一些「相罵本」可以講，但他們講的方式可能會產生反效果，這包括他們會講得太籠統或太曲折，他們的口氣可能會太衝或太弱。你要是以為說話的方式跟口氣不會在租屋者、房東與法庭人員之間的社會階級、性別、種族關係產生「化學反應」的話，那你就太天真了。在房東訓練課程當中，擁屋的學員學到的是，「愈大聲、愈吵鬧、愈激動，你就輸得愈快。所以請你咬緊牙關，撐到最後。」很多房東就算不熟悉驅離案件的處理，也至少都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這一點就足以跟法院的職員、特聘法官、正式法官拉近距離。社會階級愈是接近，他們說的就愈是同一種「語言」，說話的措辭與口氣也愈是相近。

21 在密爾瓦基，我認識的房東跟物業經理之間，這一點是所有人的共識。他們都覺得法庭體系擺明了偏向房客那邊，都覺得有產階級在司法中沒有得到公平的立足點。他們覺得驅離法庭的特聘法官老愛在應該直接發布「財產返還令狀」的時候搞「我們來商量一下吧」的把戲。連尼·勞森算是這當中的異數，他跟我說法庭體系，「曾經偏心房客，但那已經是過去式了。」



「這是怎麼回事？」其中一人問道。

「你們家被查封了，」約翰回答，邊說邊舉起查封的公文佐證。

「什麼？我們才剛付完這個月的房租耶！老天爺，祢也幫幫忙吧。」

現場兩名助理治安官退到一旁，交換意見。「這些人被弄了，」約翰跟搭檔說。「房東收了租金卻沒繳房貸。」

第九章

外送的來了

天尚未亮，拉蕊已經清醒並往臉上潑涼水。比太陽早起是她的習慣，因為早晨最讓她神清氣爽，當然跟托賓「交手」完的那天例外。那天拉蕊幾乎一整天都沒有下床，因為她只想躲在被窩裡逃避現實。這天她早起，是為了讓迪哥出去遛遛，但在那之前她還是透過百葉窗的縫隙偵查了一番。在確定沒瞧見托賓跟連尼之後，她才握著狗拴踏出門外。迪哥是她哥哥畢可的狗，一隻黑色的小米克斯。但畢可正為了心臟住院，所以拉蕊答應替他照顧迪哥。

拉蕊的拖車可以用兩個詞來形容：一塵不染、井然有序。一有客人誇獎她家看起來乾淨整齊，她就會笑著說是手持式蒸氣拖把的功勞，要不就是會興致勃勃地分享起居家小常識，比方說，她有一招是在洗白衣服的時候丟下一顆阿斯匹靈。以拖車為家已經將近一年，她也慢慢喜歡上這裡的生活。尤其是人煙稀少的早晨。她覺得現在的一切都恰到好處。她找了白色的餐具來搭配她白色的碗櫥，還有張小書桌可以擺她的舊電腦。只不過這些都只是小確幸，月租金占她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七，租金負擔仍舊重得可以。

隨著太陽慢慢升起，拖車公園開始騷動起來，孩子的聲音與車輛引擎聲傳進耳裡。拉蕊望著電話若有所思。她知道密爾瓦基對被驅離者有兩款方案，第一種是急難救助，這種方案針對的是即將無家可歸的高風險家庭。若收到法院驅離令的美國公民，所得低於貧窮線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五（含）以下，且能

以離婚文件、犯罪報告、解雇通知等證明你的收入頓時減少，那就有資格申請每年一次的急難救助。但其實申請急難救助還有另外一個額外的條件，那就是你家中有孩童需要撫養，所以急難救助對拉蕊來說就免談了。

第二種經費主要由聯邦提供、財團法人社區倡議者發放的「無家可歸預防方案」(Homeless Prevention Program)。但要適用這個方案，你不僅得證明收入減少，還得證明所得無法繳納房租。再者，你必須要找到房東願意接受這方案才行，光這最後一點拉蕊就辦不到了。如同急難救助，無家可歸預防方案的立意也是要保留給遭逢意外者，比如遭到資遣的勞工或是搶案受害人；至於長期負擔租金的人則不在此列。換句話說，這兩個方案都是「救急而不救窮」。何況以第二種方案而言，社區倡議者每年能投注的資源也只能照顧到九百五十個家庭。密爾瓦基不到六周就可以驅離這麼多家庭。」

拉蕊撥了一個她已熟記在心的號碼。「喂，我想請問，聽說你們有提供房租協助？……喔，沒有是嗎？……好，我知道了。」她掛上電話。拉蕊的第二通電話撥給社會發展委員會(Social Development Commission)，這是個以打擊貧窮為宗旨成立的民間組織，但他們也愛莫能助。她想起有人說過在二十七街上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提供急難貸款。「喂，有人跟我說可以打來這裡，聽說你們有房租協助……我的房租，對……ㄘ九，二聲房，P×，一聲租。」結果又是誤會一場。拉蕊倒是沒有打給租屋者聯盟，因為密爾瓦基沒有這個單位。但這也不奇怪，因為美國許多大城市也沒有。

上午才過一半，拉蕊已經打遍了所有她想得到的非營利組織、市府單位跟州級局處，但四處碰壁。這時候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她又多撥了一個號碼。她抓起電話，透過話筒聽到了無情的嘟嘟聲，這個號碼果然又在「電話中」。拉蕊無奈地聳聳肩，瑪西亞·P·卡格斯人道服務中心(Marcia P. Cogg's Human Services Center)——俗稱「社福大樓」——的電話本來就不好打，忙線中並不讓人訝異。

搬家師傅們一大早就發動卡車。在柴油引擎聲的低吼背景音裡，他們群聚在一起，菸跟馬克杯裡的黑咖啡是他們的基本配備。昨夜下雨，因此今天的密爾瓦基濕答答的。有些年輕師傅看起來像是運動員，跟著潮流穿了耳洞；有些中年師傅胸膛後實，皮手套插在牛仔褲口袋裡；這當中年紀最長的是提姆，身材精瘦，表情嚴肅，棕色的皮膚略帶紅色，留著一頭短髮，胸前口袋還有一包新的涼菸。幾乎所有的工人都是黑人，穿著靴子和作業用外套。外套上除了印有「老鷹搬家倉儲」的公司名稱外，還看得到些許自以為聰明的口號，「搬家這事，就交給鳥吧」、「服務業就是要發出呻吟」、「外送的來了」。

湯姆、戴夫跟吉姆·布列敦三兄弟，從父親手中繼承了這家搬家公司。一九五八年，也就是老鷹搬家倉儲在上一代成立的時候，每周最多只有一、兩次驅離，父親將公司設在家裡，而全公司就兩台卡車跑來跑去。需要多點人手的時候，他們會在出車的路上繞去密爾瓦基救援協會請遊民當臨時工。幾十年過去，公司的員工人數已經成長到三十五人，而且大部分是全職。車子從兩輛變成有廂型車跟十八呎卡車的車隊，總部也從自宅搬到超過三千坪、前身是家具工廠的三層樓建築。驅離業務占了公司四成業績。

老鷹搬家公司的員工會固定搭配兩名助理郡治安官。助理郡治安官會先敲門宣布執行驅離，然後搬家工人便開始將室內清空。搬家的錢是房東要付。但能「調動」郡治安官辦公室，房東得先跟有擔保的搬家公司簽約。而像這樣的業者在密爾瓦基有四家，老鷹就是其中最大的。若要請動老鷹五人一組的搬家人員，房東得先繳一筆三百五十美元的押金，這也就是每一趟驅離委託平均的費用。押金到位後，老鷹會提供一張授權書。房東得備齊搬家公司給的授權書、必要的法庭文件，以及額外的一百三十美元規費，前往郡治安官辦公室辦理。手續完成後，郡治安官可以在十天內驅離房客。如果把法院的裁判費跟要給法庭執達員的費用都算進去，出動郡治安官跟搬家師傅的正式驅離令，至少會花掉房東六百美元

上下。理論上，房東可以把這錢加到金錢判決裡，但實際能拿回來的少之又少。

有著灰髮、喜愛大步走路的戴夫·布列敦是白人。在他的指揮下，工人們鑽進卡車裡。提姆負責開廂型車，而戴夫則照例坐在廂型車的副駕駛座。

日常的驅離行程會從最北的地址展開，然後一路向南推進。從早上開始到中午過後，老鷹搬家的卡車會溫吞地在密爾瓦基北部的貧民窟裡鑽，接著駛過梅諾莫尼河谷，開始在以拉丁裔為主的西南部「掃街」。至於最後一站則是最南部的白人地區，他們會在那兒的某個拖車公園裡為一天的工作畫下句點。

這一天，兩名助理郡治安官在銀春路（Silver Spring Drive）上的公寓社區外頭與搬家師傅們會合。在兩名執法人員裡，約翰比較年長，看起來也比較像公部門的人——寬大的肩膀、厚實的雙下巴，戴著太陽眼鏡，還有警察常留的八字鬚、口香糖等一應俱全。約翰敲門，應門的是一名睡眼惺忪、手還在揉著眼睛的黑人女性。約翰四處巡了一下，沒想到這房子整整齊齊，架子上還有洗好的碗盤，連一個打包的箱子都沒有。他轉頭問搭檔說，「我們應該沒有找錯地方吧？」為此他還打電話回辦公室確認。

假如房子裡一張張床墊橫在地上，天花板有油污，不只一隻蟑螂在牆上爬，衣服、假髮、玩具丟得滿地都是，那他就不會特地確認了。有時候房客早已不見人影，他們在廢棄的房子裡只得到死掉的動物跟臭酸的食物。其噁心的程度，甚至讓搬家師傅吐一地。「驅離守則第一條，」約翰常這麼掛在嘴上，「就是開冰箱時要小心。」倒楣一點的話，遇到比較故意的房客，整間房子會充滿廢棄物跟狗屎，或是現場有師傅發現針頭，那身為老闆的戴夫就會揮揮手說，「垃圾屋，撤退，」然後把爛攤子留給房東處理。

確認完畢，約翰掛上電話，揮手叫搬家工人進來。也就在這一剎那，房子不再是房客的了，搬家師傅們會一擁而上，用他們準備好的台車、移動笨重家具用的捆帶，以及箱子等工具去逐間把房子淨空，

而師傅們的動作可說是「快狠準」。那天早上的屋裡沒看到小孩，但現場有玩具跟尿布。應門的女性腳步緩慢，看似備受打擊。她打開冰箱門，發現裡頭被師傅們收過之後已經空無一物，甚至連製冰器的盤子都沒留下。²這對她打擊不小，空洞的面容下爆出啜泣聲響。她的東西後來被堆到巷弄裡。這時天空開始下起雨來，約翰先抬頭向上看，再朝提姆的方向望了一眼。「暴風雪也好，西北雨也罷，我們都無所謂，」提姆邊這麼說，一邊還點了根涼菸。

第二站他們來到一間沒人應門的屋子，那是間淺藍色的雙層透天。事實上有二分之一的機會，執行驅離時是看不到房客在現場的。有些人在治安官來之前就搬走了，有些人則是根本不知道會有人來，還有一種會主動打電話去詢問郡治安官辦公室自家有無在當天的驅離行程上。不過，最多的還是治安官上門才手足無措的那種。這當中有人會堅稱自己沒有收到通知，或者有人會一針見血地指出通知上並沒有說明哪天要趕人，甚至沒有給出一個時間範圍。對此治安官們無所謂，他們知道是房客都想鑽漏洞，能拖一天是一天。而戴夫的分析比較深入一點，他覺得知道要被驅離之後，房客們會產生一種集體性的逃避心態，就像是他們沒辦法接受或想像再過些日子，兩名荷槍實彈的執法人員就會帶著一群搬家工人出現在自家門前，然後將他們曾經住在這裡的痕跡統統抹去。比較起來，戴夫的角度比較接近心理學家的看法：研究顯示在物質生活匱乏的狀態下，人類會緊盯著當下，而忘記要看一看前方，而這種「短視」(How the Other Half Lives)，「為了基本生活所需而奮鬥，是一場尖銳且永無休止的爭戰，遠方看不到任何值得你眺望的風景……邪惡的審判日可能就在明天，也可能永遠不會有這一天。若是有天審判終於降臨……那也不過是給從出生以來就源源不斷的苦難上再多添一筆而已。」³

然後還有一種案例不需要任何心理學的專業分析，很單純就是房客被房東給誑了或誤導了。

戴夫叫萊烏布朗堤爬窗進入淺藍色的屋子，然後再幫其他人開門。進到屋內後，他們看到一台戴爾電腦、一張乾淨的皮沙發，還有鞋櫃上一整排鞋子。電視是開著的，顯然原本有人在看。戴夫指著螢幕上的節目脫口而出，「是他媽的瑪莎史都華⁴！」

幾分鐘之後，一台森林綠色的舊款積架（Jeep）駛進車道，從車中跳下四名年輕黑人男性。

「這是怎麼回事？」其中一人問道。

「你們家被查封了，」約翰回答，邊說邊舉起查封的公文佐證。

「什麼？我們才剛付完這個月的房租耶！老天爺，祢也幫幫忙吧！」

另一名男子悶著頭走進房內，沒多久出來時懷抱著一個鞋盒。他用雙手手臂抱住盒子，模樣就像美式足球的跑鋒要從中線突破時用手護著球似的。最後他打開了積架的行李廂，把鞋盒鎖在裡面。

現場兩名助理治安官退到一旁，交換意見。「這些人被弄了，」約翰跟搭檔說。「房東收了租金卻沒繳房貸。」

「是啊。但是約翰，這也是間毒窟喔，」另一名治安官挑明。

約翰揚起眉毛，兩人同時鎖定廚房。提姆正在那兒組箱子。

「這是間毒窟嗎，提姆？」約翰低聲問說。

提姆一聲不吭，但很順手地拉開了廚房裡的一個抽屜，完全感覺不出這是他第一次來到這裡。抽屜裡有一個個Ziploc牌的小型夾鏈袋，還看得到一些刮鬍刀片。兩名治安官互望一眼。有時遇到這種狀況，也就是房東房子被查封、而完全被蒙在鼓裡的房客顯得很無辜時，約翰會幫房客爭取一點緩衝時間。但今天他決定該驅離就驅離，並且對剛剛鞋盒裡的東西睜一隻眼閉一隻，反正他又不負責抓毒品，而且被房東擺了一道，對這些年輕人來說也已經是一種懲罰了。

第三站是一間剛剛說過的「垃圾屋」。至於第四站則非常快，因為年長的黑人房客也沒多少東西可收。「老兄，這不合理，」房客一面看著搬家師傅把他五斗櫃裡的東西倒進箱子裡，一面不斷碎碎念。事情弄完，戴夫開始朝著廂型車走去，準備前往第五站。也就在這個時候，戴夫指著年長黑人被堆在地面上、已被雨淋濕的東西說，「有些人在帆布上作畫，而我也不是藝術家，那堆東西就是我的創作。」後來他在第五間房子那兒堆出了更有看頭的作品，那裡頭有個吃剩的生日蛋糕，外加一顆充飽的氦氣氣球。

拉蕊小時候住在南密爾瓦基一處以黃磚砌成的低矮公宅社區裡，對街是棒球場。家中除了她還有兩男兩女一共五名孩子。她的母長年臥病，甲狀腺失調讓她全身浮腫。父親是名洗窗工人。拉蕊記得有次回家他帶了很多包 Nutter 大巧克力棒，原來他那天洗窗的地方是糖果工廠。如果某天他帶回家的是多到抱不住的新鮮麵包，那就代表他當天打理的是某家餐廳。拉蕊的童年過得還算開心，畢竟家裡有位疼愛孩子的父親。「我們根本沒意會到自己窮，」她是這麼說的。

拉蕊的書念得不好。讀到十年級的時候，她終於覺得自己念不下去了。「我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出頭地，就我一人像無頭蒼蠅。」產生這種想法的她先輟了學，做起縫衣女工，時薪一點五〇美元。後來她在專做企業招牌的 Everdric 公司工作。在一次罷工中，她離開了那裡，去舍曼大道上的 RWS 實業當作業員。她的父親常一想到女兒在那裡噴砂、處理金屬片、操作沖床，就永遠有操不完的心。或許正是因為如此，當一個金屬碟盤壓到她的手上，夾掉了拉蕊兩根中指的上半部時，她唯一記得的就是自己哭著要找爸爸。

二十二歲的時候，拉蕊嫁給了一個叫傑瑞·李的男人。這個男人先是開口要她辭掉在 RWS 的工作，在家就好；而當拉蕊學開車時，傑瑞又問她考駕照要幹嘛，於是她放下了手上的書本。婚後三年，他們

生下了大女兒，隔兩年又生了二女兒，也就是梅根與潔美。只不過二女兒出生後不久，這段婚姻就開始貌合神離。到後來，傑瑞甚至會大喇喇地帶女人回來。於是這對結婚八年的夫妻最後還是走上離婚一途，拉蕊也展開了單親媽媽的生活。那是段兼差兩份工作依然貧窮、可是卻自由又充滿歡笑的日子。拉蕊說那是她人生中最開心的一段時間。也就是在此時，她開始去那種要在桌上跳舞的地方上班。一方面是她覺得薪資不錯，另一方面是她喜歡那種被簇擁的感受。白天她會去別人家裡打掃，而且會帶著女兒去。兩個孩子會幫忙媽媽，而拉蕊也會把領到的薪水跟女兒們分享。

有一天，拉蕊跟兩名女兒去參加七月四日的國慶日烤肉活動。當時是一九八六年。她們之所以受邀，是因為有位女性朋友想幫家裡的男生找女朋友。結果朋友的媒人當得不錯，拉蕊跟葛倫一見鍾情，打得火熱。葛倫跟傑瑞·李完全是不同的類型。在葛倫身邊，拉蕊一點都不覺得自己蠢，反而覺得自己是美麗、有用的女人。這時的葛倫還在假釋，主要是因為他搶了一間藥房。假釋前他正為了此案坐牢，事實上，他這輩子都在牢裡進進出出。在一起後，拉蕊很努力想要讓他少惹些麻煩。假如葛倫整日求職無門，拉蕊會幫他按摩。葛倫鼓勵拉蕊學好開車，而她也很有爭氣地在三十八歲那年拿到了駕照。

葛倫生性浪漫，愛喝酒。但他們的爭執往往會變成動手。有時候葛倫會追著拉蕊跑，而拉蕊會拿電話打到葛倫見血。某次他們就因為打得太兇，把事情鬧大了，結果被房東驅離。但床頭吵床尾和，他們總是會在隔天早上親親對方，說聲對不起，一切又像沒事一般。只能說他們是真的相愛，但這種愛在旁人看來是夾雜著耗損與暴力的愛。

至於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拉蕊從當時一直自責到現在。那天葛倫醉醺醺地從他親姐妹家裡回來。吸了毒後的他看起來狼狽不堪，一副跟人打了架、心情很不好的樣子。葛倫不時會陷入憂鬱的情緒當中，嚴重時甚至會幻聽。那天回家，葛倫一手拿起了處方藥，而拉蕊以為他心情不好想吞下一大把，於是抓

住他的手。就這樣，他們為了藥丸扭打起來，結果過程中葛倫不小心滑了一下，頭撞到地板，血濺當場。拉蕊打了九一一，在急救人員幫葛倫包紮好之後，警察也隨即給他上了手銬。他吸食麻醉性毒品違反假釋規定，所以又被送回牢裡。

拉蕊最後一次探監時，葛倫看起來就不太對勁。除了坐立難安以外，眼睛也黃黃的。最後葛倫說他不舒服，一反常態地讓會見提前結束。隔天早上，拉蕊在家接到一通電話，她還記得另一頭的女性聲音告訴她，「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啟齒，但是葛倫死了。」獄方說他用藥過量。

之後幾年，拉蕊慢慢覺得葛倫是被同房的獄友毒死的。但無論葛倫的死因為何，改變不了的事實是在一起十六年的男人走了。拉蕊鬆開電話，用全身的力量嘶吼葛倫的名字。「那瞬間我像是死了一次，」拉蕊說。「我的心裂成兩半，我的身體裂成兩半，我整個人的存在也撕裂兩半……他一死，我的人生像掉進了無底洞裡，到現在我都還爬不出來。」

老鷹搬家的卡車停在密爾瓦基北部一個米白色外牆的雙拼公寓外。應門的是名大孩子：精確地說是名十七歲上下、留著超短髮的少女。她的皮膚黝黑，臉上則有雙天不怕地不怕的灰眼珠。

戴夫與搬家師傅們不急著進去，他們照例在後頭等約翰說「可以了」——他們之間的分工向來都是治安官們走在前頭吸收掉可能的抗議或反彈。比較常見的場面是房客會大小聲，但很少真的動手。不同的治安官會使出不同的招式來稀釋或壓制對方的氣勢，而約翰基本上吃軟不吃硬。他曾經當著一名身穿浴袍、頭上包了毛巾的女人面前打電話回辦公室，對著總部回報說，「這幼稚女要是再不閉嘴，我就把她的東西全往街上扔！」跟灰眼少女的對話比平常久，而在一旁的戴夫看到有一名穿著法蘭絨襯衫的白人男子停好卡車，朝著公寓大門走近。是房東吧，他琢磨著。這之後又過了幾分鐘，約翰終於向戴夫點

頭，於是師傅們就都跳了起來，準備上工。

進門後，搬家師傅發現有五個孩子待在裡頭。提姆認出了其中一個小學生的爸爸是自己請過的搬家工人。驅離驅到熟人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大部分的師傅都住在北部，所以多多少少都有「服務」到同教會的教友、或同街區鄰居的尷尬經驗。提姆甚至驅離過自己的親生女兒，只不過這間公寓有股說不出的怪異。按耐不住好奇心，戴夫上前詢問，而約翰則解釋說驅離令上的當事人是這幾名孩子的母親，但她已經去世兩個多月了。這些孩子在沒有大人的情況下住了兩個月。

隨著搬家師傅開始逐室清空，灰眼少女在一旁像孩子王般對其他小孩發號施令，其中最年幼的是名看起來八、九歲的男孩。上到這間雙拼公寓的二樓，師傅們發現橫在地上的有破爛不堪的床墊，還有擺得像是獎盃一樣的烈酒空瓶。地下室裡衣服扔得到處都是，室內跟院子裡除了垃圾外還是垃圾。「噁心死了，」提姆看著在廚房牆上爬行的蟑螂有感而發。

房東用電鑽換了鎖，搬家師傅把屋內的物品推到濕漉漉的街旁，但孩子們卻笑著跑來跑去，好不歡樂。

淨空房子後，搬家師傅們聚集到卡車旁。他們反射性地跺腳，就怕身上還有蟑螂。某個在抽菸的師傅正在尋找下根菸。他們不知道孩子們跑哪去了，也沒多問。

搬家工作會讓你澈底了解什麼叫一樣米養百樣人。有個男的家裡有一萬卷「幽浮活動」的錄音帶，嘴裡還不斷大喊，「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準備好了！」有個女人裝了一罐罐滿滿的尿。還有個男的自己跑去住在地下室，房子則任由一群吉娃娃跑來跑去。而不過一周之前，一名男人要助理治安官約翰等他一分鐘，沒想到他要這一分鐘是要把門關好後拿槍往自己頭上轟。⁶

只不過真正讓人受不了的還是「髒」這件事。無論是聞到的味道或看到的景象，師傅們下班後都得

去喝個痛快，只求能把記憶「格式化」掉。

灰眼少女倚著前廊的欄杆，一口口深吸著她自己拿出來的香菸。

拉蕊考慮找兄弟姐妹幫忙，首先是大姐奧黛莎。奧黛莎住得不遠，距離拉蕊不過幾英里而已。大姐每天的生活就是穿著睡袍躺在燈芯絨布的躺椅上看脫口秀，燈座旁則是一罐罐處方藥。她每個月領聯邦救濟金過活，所以就算她想幫忙，恐怕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但別誤會，她一點都不想幫忙。畢可的狀況比奧黛莎更糟。老菸槍的他身材高大、皮膚鬆垮，得靠助行器才能走路。他們家是典型的中西部人，喜歡嘲弄他的健康。「我們都設好殯儀館的快撥鍵了！」但就算畢可還沒有慘到要住院，也沒什麼好高興的，因為他領的社福補助比拉蕊還少。他還付得出房租，但付完也就差不多了。髒兮兮的拖車外有衣服、菸盒跟菸屁股，車外的餐盤上黏著食物殘渣、野狗的狗屎，車內則有他辛苦的人生。

蘇珊的日子稍微好過點。她跟老公連恩住在拖車公園裡稍微「高級」一點的區域。夫妻倆拚命想要領養他們的親生孫女，也就是連恩口中生下來「就像個小燈泡在發亮」的孩子（蘇珊跟連恩的二女兒——「我們內心的痛」——是個重度的古柯鹼吸食者）。先不說這樣的處境已經耗盡夫妻倆所有的資源與精力，就算有錢有閒，蘇珊跟連恩也信不過拉蕊，所以不可能拿錢給她。明明是親姐妹，蘇珊卻有好幾周沒跟拉蕊說話。讓蘇珊這麼嘔氣的原因是她發現拉蕊只因為看了電視廣告就花幾百美元在化妝品上——精確一點說是 Luminess Air 的噴氣粉底筆。

兄弟中較為幸運的是魯賓。說他幸運，不只是因為家裡只有他沒有遺傳到他們克羅埃西亞爸爸的鼻子，也是因為他不用在拖車公園裡跟兄姐當鄰居。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住在任何拖車公園裡，甚至於沒有跟大姐奧黛莎一樣住在卡德希（Cudaly）。魯賓真正的住處是在橡樹溪（Oak Creek）的自宅。那是間

大房子，大到夠可以當感恩節晚餐的場地，而且能讓所有親戚都聚在一起。弟弟有這種財力，理論上拉蕊可以跟魯賓借錢付房租，但問題是她跟自己的弟弟不熟。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向日子好過的親族求助並不是那麼單純的事。通常這些關係都會被保留下來作為緊急之用，或者被當成有機會可以小小翻身時的本錢。一般而言，窮人都會小心翼翼地不要透支自己的人脈，因為家族裡的有錢人一旦煩了，覺得不堪其擾，想要借到錢就是很久很久後的事情，他們會覺得親戚這麼窮是他們自己不爭氣。這說明了何以家族中最有條件的人，往往也是不太會被開口借錢的人。⁷

左思右想之後，拉蕊覺得最有指望的還是自己的小女兒潔美。於是她想辦法找便車載她到潔美上班的阿比漢堡 (Aby's)。在出發去見女兒之前，她特意好好打扮一番，換上了淡藍色的襯衫、乾淨的深色牛仔褲、黑色的低跟女鞋，還抹上了一點口紅。

「可以讓潔美來幫我點餐嗎？」拉蕊問了櫃檯後面的店員。

「潔美，」這名店員呼喚。

潔美從一堆髒碗盤中抬起頭來，對著自己的母親翻了個白眼，你看得到她厚厚的深褐色鬚髮塞在阿比的帽子底下。比起母親拉蕊，潔美的身形高不了多少，臉上除了細框眼鏡，還掛著如修女般的表情：溫暖中帶著距離。沒打算走出來的潔美從櫃檯後面小小聲說，「妳來這裡幹嘛？」

「我知道不應該來，」拉蕊突然沒了笑容，滿臉愁苦。「但是我剛收到驅離通知單，只給我二十四小時籌錢，要是沒錢，他們就要把我逐出家門。所以，那個啊，妳可不可以幫我一點？」

排隊的人龍開始愈拉愈長，潔美退到一旁替其他客人結帳。等潔美把人潮消化完畢之後，店經理也出現了。女性的店經理是名瘦得像竹竿的白人，稻草般的髮質加上青春痘，讓她看起來不像社會人，反而像是高中女學生。

「這是我主管。」潔美對拉蕊說，感覺得出她有點丟臉，畢竟這位店經理至少小她十歲。

「您是來看潔美的嗎？」經理開口問。

「我是來點餐的。」

「喔，好。」稚氣未脫的店經理用整隻手臂搭上了潔美的肩膀。「我愛死妳女兒了，我最喜歡的員工就是她了。」

拉蕊照自己剛剛說的點了東西，然後掏出皮夾要付錢。但店經理俐落地在收銀機上敲了幾下，把帳給沖掉了。「這餐我請。算是感謝能請到潔美這麼好的員工。」

「拜託不要炒她魷魚，」拉蕊回應。

主管向拉蕊點點頭，然後就自顧自地去「得來速」窗口忙碌了。

回到母女倆的「兩人世界」後，拉蕊再度向前壓低身子，對著櫃檯另一頭的潔美說，「所以剛剛我跟妳說的那件事……」

「我沒辦法。」

「喔，好吧。」

「我是真的沒辦法啦。」

拉蕊低下頭，好像地板上有什麼東西似的。

潔美取了蘋果派過來。「我沒騙妳，我手邊真的沒錢。等發完薪水我可以寄支票給妳，但能不能先找別人幫妳，我要等薪水下來後才會有錢。我現在想幫妳也沒辦法，妳先問問看別人好不好？」

「我一定會想辦法還妳的，我保證。」

「我沒有要妳還我啦。」

拉蕊把備齊的餐點拿起來。「好啦，」說完便轉身要走。

「媽，等一下，」潔美叫住她。「抱一個。」她從櫃台裡繞出來抱自己的媽媽，親親她的臉頰。

在阿比工作並非出於潔美自願，而是她外役工作安置的一部分。沒錯，她身上扛著兩年半的有期徒刑，而現在只剩下最後幾個月了。傍晚下班，仍具受刑人身分 she 會被遣送回位於基輔大道的女子監所。兩年前她第一次被逮捕，也是她第一次入監服刑，在牢裡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讀經。潔美會被抓是因為她在廁所生產，然後將新生兒遺棄在此處，家裡的人都不清楚原因。她當時已經有個走路搖搖晃晃的孩子，已經為人母了。潔美從小一直是個愛念書的小孩，大大的圓眼鏡戴在臉上，讓人感覺超齡早熟。

在她服刑快要期滿的同時，潔美只有一個目標：存夠錢租間公寓，好讓現在跟爸爸同住的六歲兒子可以來過夜。這些事情，來找潔美幫忙的拉蕊統統知道。

潔美入監前把她的車子交給了拉蕊，還給了她五百美元當保養費。但接手沒多久，拉蕊就把車子賣了，保養費也被她拿去繳了一筆忘記是什麼費用。拉蕊對潔美的姐姐梅根也做過類似的事，同樣跟女兒借了錢然後沒還。梅根為此耿耿於懷，好幾年都在跟拉蕊冷戰。但潔美的個性沒辦法記仇這麼久。

在阿比的停車場裡，拉蕊盯著前擋風玻璃外的景色。雖說辦公室蘇西叫她去找親友幫忙，但類似的話她在社福體系聽到滾瓜爛熟。遇到在玻璃後頭的社工問她，「妳沒有家人或兄弟姐妹可以幫妳一下嗎？」拉蕊有時候會認真回答，「當然有家人，但他們都幫不上忙。」

搬家師傅們站在空無一物的廚房裡，檢查著一個敞開的碗櫥。「老人的家。」戴夫·布列敦會這麼猜是源自於玻璃杯具跟容器的風格。這間房子等於是沒人住了，但狀況卻好像樣品屋。房客走時顯然拖過地板。

老鷹搬家一行人剛剛還在北部，現在已來到密爾瓦基的南部，陪同他們的助理治安官也換了一組人。再下一間房，一名近五十歲的拉丁裔女子來開門，手裡還握著一根木頭湯匙。

「可以寬限我到周三嗎？」她問。

助理治安官搖搖頭。對方於是勉強自己點頭，也不知道是下定決心，還是打算就這麼乖乖認命。

戴夫踏上門廊。「女士，」他說，「我們可以把妳的東西搬上車或堆到路旁，妳想要哪一樣？」她選了路旁。「好，路旁！」戴夫大聲喊，讓師傅們知道「客人的需求」。

戴夫接著走進屋內，但才踏進去就絆到一張〈愛探險的朵拉〉(Dora the Explorer)的卡通椅。他伸手越過坐在桌邊的老人家，扳亮屋內燈光。屋子裡挺暖和，聞起來有大蒜跟香料的味。兩名助理治安官的其中一位，指了指廚房內建的碗櫥。「這種玩意兒我最愛了，」他跟搭檔說。「可惜廠商現在都不做了，明明很棒。」

這名女子開始在原地打轉，似乎思索著要怎麼開口。最後她跟其中一位助理治安官說，她知道房子要被查封，但她不知道是哪一天。以查封房屋而言，將通知書送達的責任不屬郡治安官辦公室，而在債權銀行。女子的律師有跟她說過要有心理準備，但沒人知道她能在這裡再住一天、五天，還是一周，而她想撐過一天算一天。她跟三名孩子住在這裡已經五年，去年有人說服她去找次級貸款再融資。就這樣，她的月付愈來愈高，但同時她在波塔瓦托米賭場酒店(Potawami Casino)⁸的打工時數卻在產假後變少。

在美國，拉丁裔跟非裔社區曾經是次級貸款業者鎖定的目標：租屋者會被哄著去購買有問題的房貸產品，而屋主則會半推半就地用更離譜的條件再融資，結果是陷自己於更大的險境。之後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房市崩了。在二〇〇七與二〇一〇年間，白人家庭的財富平均縮水了百分之十一，而真正可怕

的是黑人家庭平均折損了百分之三十一，拉丁裔家庭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將近腰斬。

在女屋主歇斯底里地衝去打電話找人幫忙的同時，搬家師傅們則交換著哀怨的眼神，想罵，卻又不敢大聲。他們最討厭的就是一整天好不容易要收工了，卻又遇到滿滿一整屋的東西要搬，而這一家子就是標準的燙手山芋。一名師傅從某間女孩房開始下手，房間牆面漆成粉紅色不說，門上還張貼告示，「公主的閨房」。他的一名同事決定挑戰亂七八糟的辦公室，《第一次寫履歷就上手》(Resumes for Dummies)被他隨手裝進一個箱子，箱子上有個小黑板在倒數著學校還有多少天才放假。三名孩子的老大是名七年級的男生，很懂事地幫忙把垃圾拿出去。老二、也就是這個家的「公主」，正在前廊握著兩歲小妹的手。鏡頭拉到樓上，搬家師傅們小心翼翼地怕踩到兩歲小妹妹的玩具，這些「地雷」被踢到後會聲光大作、效果十足。

隨著清空工作持續進行，女屋主的步調也慢了下來。一開始她面對變故顯得專注且精力十足，甚至可以說是用跑的在屋內橫衝直撞，手上拿著東西，還抓著電話講個不停。但過了高峰期，她變成在走廊上漫無目標地晃來晃去，彷彿喝醉一般。她的臉上有著「那種表情」，搬家師傅跟治安官們已經見怪不怪。會出現這種表情，代表一個人已經會到自己跟親人即將無家可歸，代表這個人正從「逃避現實」過渡到「覺得眼前光景很不真實」：這一切的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太猛。嚼口香糖的治安官靠著你家的牆，手放在槍套上；一群滿身大汗的陌生人把家裡的東西往外頭搬，想喝水就開你的水龍頭，用的還是你的杯子，上的也是你的洗手間。這副表情代表一個人被一堆問題給打敗了：我今晚過夜需要哪些東西？如果要撐過一周呢？我該打電話給誰？藥呢？我們能去哪裡？這副表情就像是一位母親從地窖裡爬出來，卻發現龍捲風已經把家夷為平地。

每個周日早晨，拉蕊都會站在廚房亞麻地板跟客廳淺薄綠色地毯間的分隔線上。她會從那兒望出前窗，等待著戴伯斯的卡車出現。戴伯斯是她所屬教會的成員，他會開著自己的卡車來到拖車公園，脫下帽子，然後輕輕敲拉蕊的門。

等他們抵達拖車公園西北方約一英里半處、南部基督教會¹⁰那棟貌不驚人的斜頂磚造建築時，戴伯斯會幫忙推門，讓拉蕊可以優雅地走進室內，然後從陳列成員肖像的牆邊經過，其中當然也有拉蕊的照片。來到樸實無華的聖所，陽光會從偌大的後窗傾瀉於一列列排椅上，天花板的弧度彷彿翻覆的大船。拉蕊會走到倒數第二排的座椅，在蘇珊跟連恩的身旁坐下，這向來是詹金斯家人的座位。但蘇珊會無視拉蕊的存在，假裝在讀著教會內部的通訊刊物，同一時間，紅髮蓄鬚的戴瑞牧師會在通道間走來走去，一會兒跟人握手寒暄，一會兒拍拍會員的背。

因為這是間基督教會，所以在這裡看不到管風琴或鋼琴，也看不到木吉他。遇到教徒們站起來要唱《我站立敬畏祢》（*I Stand in Awe*）或《來敬拜榮耀王》（*O Worship the King*）等詩歌時，你聽到的都會是「阿卡貝拉」（A Cappella），也就是清唱。禱告的時候，拉蕊會輕輕把手掌放到大腿上。到了要奉獻的時候，拉蕊會讓捐獻籃從她面前經過，而蘇珊則會放點錢來表示心意。

近期戴瑞牧師在講授的是「成為門徒的代價」。他會一手拿聖經，一手拿著簡報用的遙控器，邊走邊覆誦著一些像是誇飾的訓諭，「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門徒」、「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我認為基督信仰的一大恥辱是，很多人決心不夠，只是半吊子，」戴瑞牧師在某個主日有感而發。「……你身邊有鄰居需要幫助，你生命中有人需要幫助、需要愛護，而身為基督徒，你可以展現你的愛給他們。」在聽戴瑞牧師講道的時候，拉蕊會始終堅持著幾近完美的坐姿，從頭到尾都喜樂充滿且毫

不懈怠。她喜歡上教會，而且自小就愛。

當拉蕊打電話詢問戴瑞牧師，教會能否借錢讓她別被驅離時，他說他得考慮一下。拉蕊上次打這樣的電話，是跟牧師說她被搶了，於是戴瑞牧師從教會的存款裡拿了幾百美元給她付房租。拉蕊的確有被搶，但搶她的人並沒有拿槍，也不是陌生人。實情是拉蕊的拖車被蘇珊跟連恩的女兒、也就是拉蕊那個吸毒的外甥女給闖了空門，而打電話給戴瑞牧師，戳破拉蕊「謊言」的不是別人，正是做母親的蘇珊。

戴瑞牧師天人交戰，一方面他覺得照顧窮苦跟飢餓的人不是政府，而是教會的責任。對他來說能做到這點，才符合「最純粹的基督信仰」。但另一方面就拉蕊的個案而言，戴瑞牧師覺得很多的苦難是拉蕊自作自受。「她不少決定都不聰明，包括亂花錢……讓她苦段時間也許才能真正認清『喔，我做出愚蠢的決定，會自食惡果。』」伸手幫助「窮人」很容易；但如果你知道這名窮人是誰、長得什麼模樣、他過往的事蹟、犯過的錯與那些錯誤的決定，事情就會複雜多了。

為此，戴瑞牧師打了通電話給蘇珊。他跟蘇珊說拉蕊收到法院的驅離令，並且開口跟教會借錢。蘇珊的回覆是她覺得教會一毛錢都不該給。於是戴瑞牧師「從善如流」地在電話裡跟拉蕊說愛莫能助。

在拖車公園的辦公室裡，連尼伏案寫著他的租約清冊，辦公室裡來了一位名叫布列妮·貝克的女性，看起來不到三十歲，臉上戴著廉價的墨鏡。布列妮先從信箱收信，接著轉身與連尼商量。

「我會付房租的，你知道吧，」她說。

「那很好啊。」連尼應聲。

「我這周會付錢。不要發五天的預告通知單給我喔。我的狀況托賓都知道。」

說完後布列妮便轉身離開。連尼搖搖頭，低頭看租約清冊，上頭寫著布列妮的欠款餘額是兩千一百

五十六美元。

欠租跟驅離之間的關係，從來都一言難盡。在拖車公園裡，每個月都會有房客欠超過一千美元，但還是住得好好的；也會有人明明欠得比較少，卻反而得捲鋪蓋走路。¹¹把這個問題拿去問托賓，他會說，「人都是互相的，人家對你講情，你當然要有義。有些人可以商量，有些人我完全無法妥協。」至於連尼的說法是，「這要看他們搬出什麼理由。」以拉蕊的狀況而言，連尼跟托賓會覺得她是「累犯」。「同樣的戲碼每個月都要來上一遍，」連尼說，「每次都說沒錢。」但其實布列妮也是每個月都重複一樣的事情，卻能住得安穩。

房東跟物業經理會衡量不同的因素來評估要不要驅離某名住戶。租屋者如果能說動房東，讓房東相信他們馬上會有錢進來，比方說常見的退稅，那他們就有機會可以躲避被驅離的命運。但假若租屋者積欠太多、又看不出有辦法償還，難免要被驅離。但話說回來，驅離這個「果」，其前因並不會只是住戶的行為不當、或是房東的財務規畫。在決定要不要把事情做絕之前，房東會有多層考量，因此他們會對某些房客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對其他房客又會不假辭色地公事公辦。¹²說到這點，住戶收到驅離通知單後的反應是一大關鍵，其中女性較少跟房東談判，這點男性就明顯不同。欠租的女性比較愛躲房東，而這在房東心中絕對是大扣分。

房東跟物業經理都很忌諱租屋者失聯，也就是「躲躲閃閃」。連尼若是遇到房客躲他會非常不悅。「去你媽的，」他曾經吼過一名從百葉窗中瞄著外頭、就是不肯開門的房客，「你惹毛我了，五天後你就給我滾！」

就跟許多有著類似處境的女性一樣，拉蕊也躲躲閃閃地不想被托賓跟連尼逮到。她分明有在籌錢，但她一次都沒有跟他們或者辦公室蘇西講過，也從來不開口請求寬限。而鄰居傑瑞的租金跟收入與拉

蕊所去無幾，唯一不同的就是傑瑞一收到驅離通知單就去跟托賓與連尼談判。傑瑞把驅離通知單揉成一團，威脅要砸爛連尼的臉，這種簡直是要開戰的反應，反而很合托賓直率魯莽的脾氣。物業管理這一行不但是男人的天下，而且還是粗獷大男人的天下。在這樣的環境裡，傑瑞自然占到便宜。¹³

事實上，傑瑞不僅在收到驅離通知單後的第一時間就跑去找托賓，後來還主動表示願意擔下拖車公園的清潔與維修，希望換得托賓取消驅離。傑瑞之前就替托賓做過替拖車勾上油漆、或是做水管的防凍處理等工作，以證明自己的「手藝」。於是時間久了，他就多了一個手頭緊時可以抵房租的選項。相較於拉蕊只能打電話去社會服務機構詢問、或是跟兄弟姐妹求援，傑瑞的做法直接且有效：托賓後來解除了傑瑞「待驅離之身」。而拉蕊的做法若要奏效，則只能被動地期待當地的非營利機構、家族成員或她所屬的教會可以善心大發。

男性經常可以透過砌水泥、補屋頂或漆房間等勞務來與房東交換驅離，但會拿這些籌碼去跟房東商量的女性則非常稀少。有些女性是因為照顧孩子、應付社福補助的要求、或者上班，抽不出時間來替房東做這些事，但更多女性是根本沒考慮到用勞務抵租的可能性。許多找房東商量工作抵債的女性，有時會牽扯到性交易。¹⁴

房東手握誰走誰留的生殺大權，可以決定要趕盡殺絕或是網開一面。這是一種古老的權柄，而這項決定有時只在房東的一念之間。¹⁵要不要給住戶方便，對托賓來說是看心情。他的出手輕重並不是很穩定，不過至少還有賭一把的空間就是了。事實上，拉蕊之所以會甘冒被驅離的風險而先交瓦斯費，就是因為跟托賓交過手的住戶跟她說，「托賓人很好。妳看能力先給一些，他會通融的。」

這也是何以當托賓按照市議員威科夫斯基的要求，去找外面的物業管理公司進駐後，整個拖車公園都顯得風聲鶴唳。新的管理團隊有新的玩法——他們會把拖車公園弄得更乾淨整齊，更講求專業跟公

平。這對住戶們來說，代表更苦的日子要來了。

有天，一名陌生男性在連尼的辦公室外現身，並且在煤渣磚上鑽洞，安插牌子，上頭寫著，「比克管理，專業第一。」拖車公園裡一名年長的住戶看到招牌，便進辦公室裡哭哭啼啼。「我上一個家會待不下去，就是被他們趕走的，」她這麼跟連尼哭訴。「他們很兇。」

「嗯，我聽說他們蠻狠的，」連尼說。「他們一點彈性都沒有，很多人被他們弄到要在街上睡。」

「你呢，連尼？」這名女士在稍微冷靜之後，拿這話題問連尼。

「我看得出來，他們在想办法要把我弄掉。」連尼把矛頭指向外頭的牌子。「但他們不會稱心如意的。你總是需要地頭蛇在這裡顧著，」他這話既像是在回答那名女士，也像是在安慰自己。

在所有人都見死不救的時刻，唯獨魯賓有了回應。魯賓因為在 P P G 工業集團 (PPG Industries) 有一份全職的工作，算是稍微翻身，躋身了中產階級。總之要代繳房租給托賓的事，他勉為其難地答應了。為此魯賓親自來到拖車公園，但托賓不肯把錢收下，只跟拉蕊說他不要這錢。他自顧自地步行離開，徒留拉蕊跟魯賓在早晨的空氣中杵著。魯賓把錢放回口袋，緩緩地與拉蕊一起走回她的拖車。¹⁶

幾個小時之後，拉蕊聽到有人敲門。而門一開，兩名助理治安官赫然站在她小小的門廊上。而在助理治安官身後，不只一輛老鷹搬家的卡車駛進拖車公園。要把卡車開進園區，非常考驗駕駛技術，一方面是因為入口狹窄，再者司機得留意別撞到小狗或者孩子，最後還得倒車停進指定的地點。不過老鷹搬家其實是園區的常客，所以行車順利。這裡是今天出勤的最後一站，大夥都疲憊不堪，而且歸心似箭。¹⁷

搬家師傅很希望能來到一間「垃圾屋」，這樣他們就可以撒手不管，但拉蕊要求她所有的東西都要送

交存放。魯賓把拉蕊的電視跟電腦放進自己的車裡，然後離開去接自己的孩子。搬家師傅開始把拉蕊的其他東西裝箱：白色的餐具、要送孫子的耶誕禮物、葛倫送她的項鍊。同一時間，一名助理治安官在她的門上貼了張橘色的告示。

通知

貴住戶已遭到法院命令驅離，密爾瓦基郡治安官辦公室依法執行。

未經房東允許續留視為入侵民宅，執法人員得逕行逮捕（按威斯康辛州法第九四三點一四條規定）。¹⁸

拉蕊想多要點時間來整理她的東西，但助理治安官搖頭說不行。然後她又說有東西被送上卡車，她想拿回來，這回是一名搬家師傅說不行，理由是東西一上車就跟保單有關，倘若下車後壞了無法受理賠償。

拉蕊站在拖車外，靜靜地當一名旁觀者。師傅搬出了她的椅子、洗衣機、冰箱、爐子跟餐桌。接著搬出一箱箱混裝品：冬衣、鞋子跟洗髮精等。圍觀的鄰居開始聚集。有些人還拿了啤酒、拉張椅子準備看戲，一副像在看NASCAR賽車似的。

師傅們的手腳很快。前後還不到一個小時，拉蕊就被逐出家門了，而她只能看著卡車開走。她的東西會被送到老鷹搬家昏暗而廣袤的倉庫存放。進到倉庫，你會看到粗壯的木頭梁柱撐起天花板，天花板上垂吊著顯眼的燈泡，而燈泡下方則是數以百計的物品堆疊，每一疊都代表著一個遭驅離或被查封的家。

庭。堆在這裡的東西會刻意維持在眼睛的高度，然後個別用膠膜包住，彷彿是被蜘蛛絲裹住的昆蟲。靠近點看，你還能清楚看到緊繃的透明膠膜內有哪些物品：被刮花的家具、燈具、放在浴室的體重計、還有幾乎是家家必備的兒童用品：玩具木馬、嬰兒推車、鞦韆床、彈性嬰兒椅。在布列敦三兄弟的眼裡，公司的倉庫就像個「巨大的胃」，消化著整座城市。他們每塊棧板的存放費是每個月二十五美元，而平均每個遭驅離的家庭會需要用上四塊棧板來儲放全部財產，合計大概是四百立方英尺。

拉蕊的當務之急是想辦法籌到存放費，否則老鷹搬家可以在九十天後把她的東西銷毀，以便騰出空間來堆別人的東西。事實上，凡是因為驅離或查封而被送到這裡的東西，七成的下場都是「被處理掉」。多年前，布列敦兄弟曾經想跟財團法人 Goodwill 二手物資處理¹⁹合作，但結果也是狠狠被打了一巴掌，因為老鷹搬家這邊的東西量實在太大，Goodwill 根本吃不下來。布列敦兄弟並沒有就此死心，他們又主動接洽了收廢五金的廠商，還問到有人願意論摺把舊衣買走做成抹布。他們請人在雜物中尋寶，看當中有沒有什麼可以拿去賣的東西。每個月，他們會辦兩場公開拍賣，少則十堆、多則四十堆東西任人挑選。只不過即便這麼拚了，丟掉的東西永遠比再利用的東西多。²⁰

隨著助理治安官離去，拉蕊也顧不得橘色通知上的警告，闖進已經不屬於她的拖車裡。大件的東西都已被清空，但搬家師傅倒是留下了衣服、毯子等小東西。拉蕊彎下腰拾起她的蒸氣拖把。

她只有一條路可以走了：拉蕊想著把剩下的東西收一收，借放在哥哥畢可的拖車。還沒出院的畢可無法對這樣的請求說不。拉蕊找了兩名男孩子幫忙，三個人就在兩輛拖車間來回搬了好幾趟，凡是拿得了的東西就統統往畢可的客廳堆。

大功告成之後，拉蕊給了兩名男生一人五美元，獨自在畢可的拖車裡坐下，但飛舞的果蠅讓她不得不用手拍來拍去。她吞下止痛藥，在一片寂寥之中，靜靜地等著止痛藥發生作用。感覺到藥效後，她望

向四面的混亂與不堪，那些被搬家師傅當成垃圾、而自己搶救出來的東西。拉蕊悶聲怒吼，把沙發當成沙包，一拳又一拳地打在上面。

註釋

- 1 按照莫德維拉·克肯道爾 (Maudwella Kirkendoll)、也就是財團法人社區倡議者執行長的說法 (個人通信，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二〇一三年有九百四十六個家庭受益於「無家可歸預防方案」。此計畫當年的年度預算是六十四點六萬美元，而財源全數來自於經由州政府與市府發放的聯邦經費 (住房與都市發展署)。
- 2 郡治安官辦公室寄給房客的通知上寫著，「搬家工人不會取走冰箱或冷凍庫裡的食物。」實際上搬家工人當然不會把食物送到擔保倉庫去，但他們照樣會把食物堆在路邊。
- 3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1890]), 129. 關於人在匱乏時的心理狀態，參見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Scarcity: Why Having S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3).
- 4 譯註：Martha Steward，美國商業、電視、平面媒體的多棲名人，其事業主軸為居家生活的各種衍生產品，曾因內線交易遭定罪服刑。
- 5 在歷經過金融風暴時的法拍屋危機之後，美國好幾個州終於通過立法，房東應 (於事前) 將房屋遭查封之事告知房客。二〇〇九年五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房屋查封時之房客保護法》(Protecting Tenants at Foreclosure Act)，法拍屋的「買賣不破租賃」正式入法，亦即法拍屋的新屋主必須尊重原有租約的效力。但在二〇一四年我跟著密爾瓦基驅離隊行動的貼身觀察中，好幾名房客都說他們搞不清楚自己的房東是誰。法拍屋的危機造成都會房地產在不動產業者、物業管理公司、與炒房客之間不停轉手，光業主是誰就把租屋者搞得一頭霧水。參見 Vicki Been and Allegra Glaschauser,

- “Tenants: Innocent Victims of the Foreclosure Crisis,” *Albany Government Law Review* 2 (2009): 1-28; Creola Johnson, “Renters Evicted En Masse: Collateral Damage Arising from the Subprime Foreclosure Crisis,” *Florida Law Review* 62 (2010): 975-1008.
- 6 助理治安官約翰跟幾名搬家師傅跟我說了這一段驅離場景。
- 7 《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顯示雖然部分低收入家庭苦於既住在破落社區，又身陷窮困人脈圈的「雙重弱勢」；但也有些低收入家庭雖住在相對低劣的環境中卻擁有不錯的人脈；也有些低收入家庭住在還不差的環境中，但欠缺經濟條件較佳的人脈。Matthew Desmond and Weihua An, “Neighborhood and Network Disadvantage among Urban Renters,” *Sociological Science* 2 (2015): 329-50. 亦可參見 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189; Xavier de Souza Briggs, “Brown Kids in White Suburbs: Housing Mobility and the Many Faces of Social Capital,” *Housing Policy Debate* 9: 177-221; Matthew 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2012): 1295-335;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77-78.
- 8 譯註：Potawatomi Casino，波塔瓦托米是密爾瓦基的原住民族，「密爾瓦基」的地名本身就源自法文中的原住民的外來語。這家飯店位於梅諾莫尼河谷，也就是在密爾瓦基中部鬧區附近的運河街（Canal Street）上。
- 9 Jacob Rugh and Douglas Massey, “Racial Segregation and the American Foreclosure Cri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 75: 629-51; Signe, Mary McKernan et al., *Less than Equal: Racial Disparities in Wealth Accumulation*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2013); Thomas Shapiro, Tajana Meschede, and Sam Osoro, *The Roots of the Widening Racial Wealth Gap: Explaining the Black-White Economic Divide* (Waltham, MA: Institute for Assets and Social Policy, 2013).
- 10 譯註：Southside Church of Christ。南部基督教會是萌生於美國基督教復興運動（Restoration Movement）的一支教派。
- 11 連尼的租屋清冊顯示，在拉瑟開始拖欠租金的那個月，拖車公園裡同時有四十七個家庭沒有正常交租，其中拖欠金額最

少的是三點八八美元，而欠最多的第一名就是布列妮。

12 我問房東是根據什麼資訊或哪些因素來決定要驅離與否，他們的回答往往都是些「標準答案」，都推說是財務考量。但根據我長時間跟房東們相處的體會，真相絕對遠比這複雜並且無可依據。

13 雖然在地位上還是有分高低，但男性的房東跟他們的男性房客都經歷過「男子漢」的社會化洗禮，懂得男性間互動的節奏與姿態，所以他們在溝通上障礙較低。以有驅離紀錄的密爾瓦基房東而言，男尊女卑的情形可以量化為男性接近三分，而女性的地位只有一分。Milwaukee County eviction court records, 2003-2007.

14 我觀察到某些男性會在收到驅離通知單後躲著房東，而同時某些女性會在收到驅離通知單後去跟房東攤牌。但由於性別會引導人際互動，讓人對他者產生期望或成見，因此當女性去找房東時若過於急切，就經常就會被貼上行為無理或太過分的標籤。以包柏·海夫哥特 (Bob Helfgott) 為例，他當房東二十多年，在窮困社區裡有幾十筆房地產。他覺得女同性戀都是些難搞的房客。「那些搞 gay 的女人，」他邊說邊嘆氣。「她們好像永遠有生不完的氣，我真的會被她們逼瘋。她們就是很糟糕，什麼都可以抱怨。」參見 Cecilia Ridgeway, "Interaction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Conside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218-35.

15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MJF Books, 1961), 107, 110.

16 托賓與連尼已經忍無可忍。但不得不提的一點是，拉蕊差點就可以躲過被驅離的命運了，就像她從前也都會跟家人借錢來度過難關一樣。跟熟人或親友開口求助不失為一種成功率較高的做法，但這條路對黑人女性來說相對走不通。比起白人女性，黑人女性之所以會更「躲躲閃閃」，其背後的原因是黑人女性的社交圈資源明顯較為匱乏。白人女性往往結交的是社經地位較高、較有能力的友人，她們也因此較有機會從驅離的威脅中脫困。參見 Colleen Heflin and Mary Pattilo, "Poverty in the Family: Race, Siblings, and Socioeconomic Heterogene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5 (2006): 804-22;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17 我並沒有親眼目睹這場事件。文中的現場重建是參考了與拉蕊、戴夫·布列敦，還有幾位搬家師傅跟拖車公園住戶所進行的訪談。

譯註：威斯康辛州法第九四三點一四條規定的是刑法上的「侵入住宅罪」(Criminal trespass to dwellings)。

19 譯註：Goodwill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Inc. 專門回收二手物資，轉賣所得協助弱勢就業的美國非營利機構，在全美各地設有如超市般的銷售點。

20 根據新法(威斯康辛州第七十六號法案，州議會第一七九號提案)，威斯康辛的房東得任意處理掉遭驅離房客的物品。

亦即他們現在已經可以選擇直接移除住戶的財物，不需要再負儲存之責。在新法辯論的期間，布列敦兄弟曾自掏腰包來挹注反方陣營，希望能擋下這個法案，只可惜他們的對手實在太過強大與有錢。西南威斯康辛出租公寓從業人員公會(Apartment Association of Southwestern Wisconsin)、威斯康辛不動產經紀人協會(Wisconsin Realtors)、威斯康辛出租公寓從業人員公會(Wisconsin Apartment Association)等業者團體不僅合流支持新法，甚至有下指導棋之嫌，最後新法亦如他們所願成形。對於這項發展，有人做了以下的評論，「新法的受益者是房東跟『好』房客。而『壞』房客(也就是無法正常交租的房客)會覺得新法很礙事。」參見 Tristan Pettit, "ACT 76—Wisconsin's New Landlord-Tenant Law—Part 1: Background and Overview," *Tristan's Landlord-Tenant Law* (blog), November 21, 2013.

第十章

毒蟲等於免洗勞工

萊特街布滿雪花。十二月初的風雪已經來臨，天氣預報說累積達十英寸。這時下的是那種潮濕而半融的雪，分量十足，所以剷雪的時候得一小塊一小塊挖，否則很容易閃到腰。拉瑪看著窗外的雪持續飄落，喝著即溶咖啡，不急著把手邊的工作完成。

一跟孩子們油漆完派翠絲的舊家，拉瑪就打了通電話給舍蓮娜，於是她立刻趕來驗收。在很快地巡一遍公寓後，她搖搖頭，發表她的看法，「別說我不給你機會，但你做這他媽的什麼爛工作來敷衍我！」

「我做這工肯定不止值兩百六十元，」拉瑪不甘示弱地拉高嗓門。「為了幫妳油漆我可是跪著爬來爬去！現在妳這樣搞我？」

舍蓮娜火大到掉頭就走。幾個小時後，拉瑪主動撥了舍蓮娜的電話號碼。他求她讓他把工作做完，讓他把孩子們沒弄好的地方補好。「拜託，」他在電話上說，「我不喜歡欠人東西。」聽他這麼說，舍蓮娜決定給他機會。拉瑪想保住現在的公寓，只能靠這次了。

拉瑪喝完咖啡，扣上義肢。接著他拿起拐杖，開門踏上前廊，眼前的雪讓他表情變得有點猙獰，他得緊抓著階梯欄杆，否則可能跌倒。外頭的人行道上，麥基正賣力地剷雪。看到拉瑪在前廊階梯上舉步維艱，麥基停下手上的工作，但一時間也不知道該不該上前幫忙。最後麥基並沒有伸出手，所幸拉瑪沒事，甚至還幫忙麥基推了幾下雪鏟。

等拉瑪說要回樓上的時候，麥基問他需不需要援手。

「來吧，」拉瑪欣然接受麥基的協助。

到了二樓，麥基看著自己跟家人被驅離前的舊家。

「你們今天不用上學嗎？」拉瑪會這麼問，是因為這天是周二。

「我睡過頭了，」麥基答道。說這話的他正在讀小學四年級。

「啊，小朋友，沒讀到書很可惜喔。」

麥基低頭。「我們今天是美術課啦，」他說。

「可是美術可以讓你賺大錢耶，你不知道喔？你長大可以當個……嗯……那個叫什麼，藝術家？還是建築師？」拉瑪搞錯了很多字的念法，但意思都傳達到了。

麥基露出燦爛地笑容，而拉瑪則開始拿刷子粉刷食物儲藏室。為了要刷到底下的部分，拉瑪解開了義肢，好方便他在地板上爬行。麥基盡量幫忙，他會遞抹布跟滾筒給拉瑪，而且態度之積極，彷彿他有一份工作的試用期似的。拉瑪如果在地板上動彈不得，麥基會幫他把拐杖取來。

「弟弟，你媽媽跟其他家人在哪兒？」拉瑪問。

「媽媽？她去找達斯拿她的食物券卡片，」滔滔不絕的麥基說的是派翠絲的食物券跟男朋友。「達斯把她的卡都拿走了，害她沒東西可吃。所以啊，然後她的卡片……」

「麥基，好，可以了，」拉瑪盡可能溫柔地打斷他。「其實你就說她出門了就好。媽媽的事不要到處跟人講，知道嗎？你要知道我是你們的朋友，但其實我也不想知道太多。」

雖然似懂非懂，但麥基還是緩緩點頭。

拉瑪在地板上挪動著身體，然後暗暗地咬著牙，舉起油漆刷。隨著時間愈來愈接近中午，拉瑪開始

大汗淋漓，呼吸也愈來愈用力。他祈禱著自己能再擠出點氣力，「上帝啊，拜託祢今天要讓我撐過去。」

「這太誇張了啦，拉瑪，」麥基想說點什麼來安慰拉瑪。

「不，社會就是這樣，人們能壓榨你多少就壓榨你多少，沒有在客氣的，麥基。」

工作完成之後，拉瑪把腳裝回去，返回自己的公寓。他從家裡撥了通電話給舍蓮娜，通知她房子漆好了。舍蓮娜並沒有把話說死，只回應晚點會過去看。喔，她最後補了一句要拉瑪把地板拖乾淨。

到了傍晚，拉瑪家附近的孩子王巴克來了。他注意到拉瑪的身上跟衣服上都有油漆痕跡，有點疑惑地問，「我們不是把樓上都刷好了嗎？」

「她凹我去把上頭的食物儲藏室給漆一漆。人就是愛貪小便宜啊。」

「好耶，老爹！」巴克笑著說。他開心是因為覺得拉瑪跟他兒子可以住下去了。畢竟拉瑪家對他自己也別具意義。

拉瑪嘆氣，然後按按膝蓋的下方，就像一般人在按摩舊傷般。「不過他們不會付我錢的，」拉瑪說。

「這怎麼能不付錢！」

「算了吧，他們找毒蟲來幹一樣的事情，根本花不到什麼錢。」

拉瑪知道自己的辛苦被便宜賣給了舍蓮娜，但他也知道更廉價的人力多得是。舊城區的房子遇到管線壞了，屋頂漏了，房間需要粉刷了，聰明的房東不會撥電話給專業的水電、屋頂或粉刷師傅，他們的口袋有兩種什麼都願意做而且不用白不用的人選：房客本人跟找不到工作的人。菜鳥房東會嚷嚷著他們「認識某個很厲害的水電師傅」，但有經驗的房東會說他們「知道可以找誰來」。拉瑪知道舍蓮娜「有一堆人可以找來」，所以他心裡有數，她不太可能讓自己續住。他之所以還是把油漆做完，是一種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

巴克皺起眉頭，看著外頭的雪說，「不會吧，老爹，」他的口氣聽得出不可置信。

「毒蟲！」拉瑪吼出口。「毒蟲把整個市場都打壞了。現在連（身障的社福）公車票想拿去變現，都賣不到好價錢了……我跟舍蓮娜爭好久才爭到兩百六十元的價碼。但她肯定覺得有人一百元就願意做，而且是做全套的喔，從裸牆開始弄到漆面漂漂亮亮。」

隔周二，拉瑪醒來時屋子是暖的。冬天為了祛寒，他一整晚讓瓦斯爐嘴開著不關，這是密爾瓦基北部常見的做法。凡是像拉瑪這樣住在漏風的雙拼公寓裡、暖爐又老舊的人，這算是很常見的變通之道。已經過了一周，但舍蓮娜完全沒有動靜。

拉瑪最習慣的早餐組合是即溶咖啡配菸。但因為路克跟艾迪留在家裡沒去上學，所以他得當家庭煮夫，他做了煎蛋跟熱玉米粥。培根的香氣能喚醒兩名孩子。隔一會兒，巴克也加入早餐的行列，讓人不禁懷疑他從街尾都聞得到拉瑪下廚的香味。

後門被輕輕敲著，其中一個孩子跑去開門，門後是新搬來的鄰居卡瑪拉——短短五個月內，卡瑪拉已經是第三個搬來的新朋友。要是從遠處看，你會以為卡瑪拉是個才七年級或八年級的小女生。卡瑪拉的身材嬌小，膚色「比紫色還黑」，一件白色的小可愛貼著她瘦小的骨架。她既沒有上妝，也沒有在指甲上搞任何花樣。要說她僅有的打扮，那就是細細金鍊子上垂著的鎖盒了吧。她的目光深沉，整個人的靈魂也透著沉重。這樣的卡瑪拉，一開口便先向拉瑪討根菸。

「喏，拿去，親愛的，」拉瑪遞了菸給卡瑪拉，他很開心能看到她。

卡瑪拉道謝，轉身便要離開。「我得上去顧孩子，沒人看著我怕他們會把屋子給掀掉。」卡瑪拉是三名小小孩的媽媽，年齡分別是三歲、兩歲跟八個月。

「你們就下來啊，我的房子讓他們掀。妳打不打撲克牌啊？」

卡瑪拉露出淺淺的笑容，準備要爬回樓上，但她還沒來得及這麼做，家裡的兩歲孩子已經跑來會合。拉瑪滾著輪椅來到小女生面前。「有沒有人想當我的乾女兒啊？哈囉！妳今天好不好啊？」

小女孩稀哩呼嚕地說了些話，但咬字不清的她講話像一團棉花，讓人完全聽不懂。她連說了好幾遍，拉瑪才聽懂她說的是「肚子痛」。

「妳餓不餓？」拉瑪這麼問她。「我們得想辦法讓這小傢伙長點肉。妳昨天有開伙嗎？」拉瑪會這麼問是真的想知道答案，沒有任何弦外之音，也沒有拐彎抹角的指控。

「是有，但樓上就只有一台微波爐能用，」卡瑪拉看似心平氣和地說著。

就跟很多舊城區的房東一樣，舍蓮娜跟昆汀也盡可能不讓房客在屋內擺太多電器。少一樣東西在用，未來就少一樣東西得修。所以無論是瓦斯爐或冰箱，房東大多都能免則免。

「是喔，」拉瑪把輪椅轉個方向，推著自己來到食物儲藏室。再度出現時，他大腿上多了台電磁爐。前幾天跟卡瑪拉初見面時，拉瑪對她說不會跟他們「混得太熟」。「我不來『可以借我杯糖嗎？』那一套，我們這兒不搞敦親睦鄰……我只管自己，這樣對大家都好。」但明明才撻過狠話，他現在卻又拿出比一杯糖貴很多的東西送卡瑪拉，感覺有點自打嘴巴。

「這原本是我媽在用的，」拉瑪說，「火力很強喔。」

「不會搞出火災來吧？」卡瑪拉問。

「不會。」

「好，我會好好珍惜，跟你說聲謝謝。」

「不客氣，親愛的。你們今天就都下來吃晚飯吧。」

卡瑪拉拿著電磁爐，帶著小女兒回到樓上。

早餐之後，撲克跟捲得像雪茄的大麻菸紛紛出籠。派翠絲的弟弟C.J.也跑來觀戰，但大麻不會傳到他的手上，他自己也不會開口要。路克的女朋友跑來找他，小倆口把自己關進臥室裡兩人世界。在一屋子乳白色煙霧跟大麻特殊的嗆味之間，拉瑪家的早晨展現了特有的悠閒步調。

就在拉瑪跟少年們的大麻捲菸快要抽完、大家正嗨之時，外頭有人老實不客氣地敲起門，聲音不小。聽這氣勢，門後可能是房東或治安官：指節敲出四、五下叩叩的清脆「鼓點」，連續而急促。屋子裡的大家都愣住了，一時間面面相覷，全像啞巴似的說不出話來。

過了一會兒，巴克才出聲，「是誰？」

「我是教會的柯林。」

「靠！」拉瑪的口氣在解脫中帶著幾分惱怒，跟被抓包的小孩沒有兩樣；而一旁的青少年們則很辛苦地憋著笑。艾迪趕緊打開窗，只見一群人瘋狂地徒手搨風，而他們在「手動排煙」的同時也愈笑愈大聲。「好了！好了！」拉瑪壓低音量要大家冷靜點，然後示意艾迪去開門。

雖然聞到大麻味，但柯林會裝傻。他是名三十歲不到的白人，頭上沒抹髮膠，姿態端正，手上戴著一只婚戒。柯林一手拿著聖經與名為《全靠主恩典》的讀經教材，另一手拿著餅乾。等所有人都在拉瑪家的客廳裡就座之後（當然路克跟女朋友還在房裡），柯林翻開聖經，迫不及待開始讀經。柯林帶他們讀遍了經典的章節。「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少年們一面安靜地坐著，一面忍不住暗暗地嗨。柯林指定部分段落讓他們讀，他們相視而笑，但也乖乖地用手描著柯林要求的段落，一字一句地念出來。拉瑪全心投入聖經的描述裡，一會兒若有所思地點頭，一會兒背出剩下的字句。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拉瑪說。

「真的，我也一直這樣覺得，」巴克鑽進沙發的靠枕裡，突然冒出這麼一句。

「有話就說啊。」拉瑪緊閉著雙眼，但還是鼓勵孩子發言。

「我不懂怎麼會有人不信上帝。」

「你相信惡魔的存在，是吧？」拉瑪問他。

「我知道這世界上有惡魔，但我不想認識他，」巴克答道。

「現世就是地獄，」拉瑪補了一句。

「嗯，說地獄可能過分了點，」柯林忍不住跳出來糾正。

拉瑪張開眼睛，看著面前這位幼齒的牧師。現場突然一陣安靜，大家彷彿聽到了什麼，原來是路克的房間裡傳來青少年的呻吟與尖叫聲。聽著這一切，孩子們除了地板還真不知道視線該往哪兒擺，想笑又不能笑，就像爆發前夕的火山。在帶領所有人進行完最後的禱告、並且把可以來教會領取物品（衣服、毯子等）的清單交給拉瑪後，柯林就離開了。他前腳一走，拉瑪家裡就爆出哄堂大笑。歸隊的路克在廚房跟大家會合，大家又狂笑了第二輪。「我們都聽到了，你在房間裡『幹活』，」巴克笑到腰都彎了。「牧師就在外面，你這個笨蛋！」

拉瑪搖搖頭，然後發起撲克牌。

那個月月底，昆汀來到了阿琳在第十三街的住處。他把車子停在公寓的外頭，按喇叭催促。不過他今天要來找的不是阿琳，而是特瑞莎的新男朋友——克里斯。「老天爺，我宿醉超嚴重的，」克里斯承

認，爬進了昆汀的休旅車。「我女朋友帶了六罐海尼根，還有五分之一瓶阿姆斯特丹牌伏特加。」

昆汀打 D 檔讓車前進。這天，他把頭髮中分，在後腦勺左右各綁了一球黑人的泡芙頭。快四十歲的克里斯穿著大件的冬衣外套，並且用毛帽蓋住他的禿頭。克里斯在出獄後先搬來跟特瑞莎同居，然後打電話跟昆汀說他在找工作。如今昆汀是克里斯僅有的收入來源。

Suburban 休旅車在一間公寓側邊停好，克里斯跳下車要去接泰尼，也就是今天計畫中的另一名人手。幾分鐘之後，克里斯回來了，但卻不見泰尼人影。「那傢伙說他今天沒心情，不去了。」

昆汀聳聳肩。「那小子在搞什麼，真要命。」

昆汀打電話給舍蓮娜，把叫不動泰尼的事情跟她一五一十說了，而舍蓮娜的回應是，「找個人補他的空就好了。」你沒聽錯，工人就是這麼好找，這麼免洗。就算泰尼不來，舍蓮娜還有個親兄弟有吸快克的毛病，再不然昆汀的叔輩有一個叫沃拿的酒鬼，他會很樂意為了買酒賺些零用錢。除此之外，房客原本就會打電話來問有沒有工作可做，包括單腳瑞奇等都是。這些都不講，舍蓮娜還有一組毒蟲「團隊」可以墊檔，她管他們叫「快克三腳貓」，說白了就是濫竽充數，但這些人很甘願為了超剝削的薪水上工。就算再走投無路，昆汀也可以從街上直接拉人。路旁找人沒有想像中難，因為舊城區的失業人口很多。舍蓮娜跟昆汀會備好工具、材料，還會負責接送，有意願的只要人來就好；至於薪水的話，不分論件或論日計酬，鐘點費都落在六到十美元之間，視工作的性質或難度而定。「對這些人來說，一美元也是錢，」舍蓮娜說過，「他們不會錯過任何工作，你不用擔心錢少他們會沒興趣。」

教育程度低的黑人失業率很高——這種報導模糊了一個事實，許多人雖然不在正式的勞動市場裡，但很多人其實經常有工作，有些人在黑市裡頭從事非法交易，他們所欠缺的只是在正式勞動市場裡的一個職位與雇主罷了。但即便是城市裡混得最好、最大咖的毒販，都會把付現就有一堆廉價勞工可用的房

東當成羨慕的對象。²

昆汀讓克里斯下車的地方，是他跟舍蓮娜剛購入的新屋，兩人準備把這地方租給一個領租屋券的女人。昆汀給克里斯的指示是讓樓梯間的欄杆不再晃動，並修好一扇門，以便為美國住房法「第八節」³的出租房檢做好準備。「你應該很清楚租屋補貼方案有哪些要求吧？」昆汀跟克里斯交代，「所有小地方都要顧到……他們的檢查清單可是非常龜毛。」

「就這樣，靠你囉！」昆汀一邊說，一邊跟克里斯來個「兇神惡煞」幫派的花式握手。

昆汀在高中時曾混過街頭，當時他會跟「兇神惡煞」這個發源自芝加哥的幫派一起行動。他在幫派裡算不上活躍，他的兩次中槍也跟幫派無關。昆汀第一次中槍時才十九歲，那時他與朋友槓上了另外一群人，就在局面一觸即發之際，一台廂型車衝上前來，他記得自己聽到九釐米手槍的砰砰聲，昆汀被擊中了腿。事隔一年的第二次中槍跟一場搶案有關，這次子彈卡在他的肩胛骨。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讓昆汀變得神經質，最後醫生診斷出他得了胃潰瘍。這些年下來他學會了放輕鬆一點，遇到被房客摺狠話，他會要自己「得饒人處且饒人」。但三不五時總會遇到些事情讓他忍無可忍，這時候昆汀就會套上他的黑色帽 T，配上黑色牛仔褲。舍蓮娜會在門口狠狠地瞪他一眼，但不會真的開口阻止他，因為事情到了這個地步，經驗告訴她閉嘴就好。到了門口，昆汀會鑽進他的 Suburban 休旅車，打電話摺他的兄弟來把事情搞定。黑帽 T 上一次出動是有名不爽的房客搞破壞，故意把他的某間公寓弄得面目全非。

到了大約日落時分，昆汀已在他跟收銀員都熟到可以直呼名諱的家得寶⁴跟勞氏（居家修繕）公司之間奔波了不少趟，載工人上工或者遞送工具，最後昆汀把頭探進派翠絲的舊家。他口中的沃拿叔叔這兩天都待在這兒把 PU（聚氨酯橡膠）塗料往硬木上抹，以便把拉瑪與少年們滴在棕色收邊上的白漆給蓋掉。雖然拉瑪順手也把食物儲藏室給漆了，但昆汀已經不想跟拉瑪談，他決定把跟拉瑪打交道的事留

給舍蓮娜去做。有一點很確定的是：他們只會付一次錢。沃拿領得到錢，就代表拉瑪領不到。為此拉瑪得想想辦法，而且還不能想太久。

沃拿帶著巴爾的摩烏鴉隊 (Baltimore Ravens) 的棒球帽，但那完全包不住他不聽話的油膩頭髮。他的褲子跟法藍絨襯衫上都沾滿了棕色的油漆，不清澈的雙眼則布滿血絲。有「液體快克」之稱的鋼牌特選 211 啤酒 (Steel Reserve 211) 在樓梯間裡散落一地，裡頭一滴不剩。

「我要酒，」沃拿這麼跟昆汀說。

昆汀看了看四周，沃拿的事情做得不夠漂亮，但還不至於有頭無尾。「夠給房客住了，」他打了這樣的分數。

「呵，你當這裡是布魯克菲爾德 (Brookfield) 區喔！」沃拿笑了，他想說的是以白人為主的富裕郊區。

「說正經的，」昆汀順著他的話說，「確實也沒差，反正那些人最後也會把房子弄得天翻地覆。家具、桌子、會亂抓東西的狗，統統都往屋子裡塞……我們沒必要浪費時間在這裡弄那些要花大錢的東西，弄好了也是被搞得一塌糊塗。」說著說著，昆汀掏出了皮夾。「哇嗚，你已經要收尾了嘛！所以整個弄完算你七十元？」

「七十元？不行不行，光這個房間就三十元了。」沃拿示意著大客廳。

「什麼，這個房間二十元啦。我們昨天講好的，你忘了。」

「不不不，我一個房間要收二十元，你收十元，加起來不就是三十元，」難掩緊張的沃拿笑得有些故作鎮靜。

「這樣的話，我叫泰尼來做就好了啊！」凡是遇到對方想多要點錢，昆汀跟舍蓮娜就會出狠招，他

們要點醒對方這工作多得是人做。

沃拿馬上縮回去。「好啦，好啦！」

昆汀數好鈔票，付了錢，然後免費載沃拿到賣酒的店家。

昆汀跟沃拿在樓上的每一句話，樓下的辛克斯頓一家都聽得一清二楚。兩人離開之後，派翠斯跟娜塔莎溜到樓上，想探個究竟。看到剛粉刷好的牆壁跟地板，這兩名女生吞了吞口水。新的女房客（或少替她管錢的貝琳達）顯然比派翠絲的手腕高明得多：她知道房客講話最大聲的時候，就是還沒有搬進去時。

「看起來好漂亮喔，」娜塔莎說。「我快要瘋了。」

「這是真的嗎，」派翠絲說。

「樓上也太夢幻了吧……但妳原本住的地方跟老鼠差不多！」娜塔莎笑道。

派翠絲沒有被娜塔莎的話牽著走。想到舍蓮娜，她說，「在我們家，她肯定一天都住不下去。」

註釋

- 1 在貧困社區裡，你常聽到大家會對外宣稱「我只管自己」（I keep to myself），但實際去這些社區裡走一遭，你會發現這真的只是一種表態的「宣言」而已，真正自掃門前雪的人其實甚少。亞莉山卓·莫菲（Alexandra Murphy）發表過一篇論文是“‘I Stay to Myself: What People Say versus What They Do in a Poor Black Neighborhood.’”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當中探討的就是這種「說歸說，做歸做」之間的拉扯與張力。

2 在黑市裡，大部分的「就業機會」都會扯上毒品或性交易。但在街上販毒或接客的年輕孩子是你看得到的冰山一角，更多你看不到的是被職場放逐的失業者淪為房東的廉價勞工。為了賺點現金或能抵點房租，這群人會甘願為房東整修房產。關於正式與非正式經濟之間那條模糊的分界線，參見 Sudhir Venkatesh, *Off the Books: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of the Urban P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譯註：美國住房法的第八節 (Section Eight of the US Housing Act) 明定了包含「租屋券」在內的住房補助支付方案 (Housing Assistance Payments Program)。此方案始於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其前身為第二十三節出租住房方案 (Section 23 Rental Housing Program)。這屬於聯邦層級的租屋補貼計畫，主管機關正是美國行政體系裡的住房與都市發展署。

4 譯註：Home Depot，世界第一大的居家修繕零售業者

5 譯註：Lowe's，美國第二大的居家修繕零售業者。

第十一章

貧民窟，是好物

飛機一落地，舍蓮娜望著舷窗外嘆口氣。那天早上，她跟昆汀人還在牙買加。相較之下，密爾瓦基又冷又濕，彷彿廚房裡一塊可有可無的抹布。舍蓮娜打開手機，裡面積了四十筆語音留言。

牙買加真的是度假勝地中的極品。舍蓮娜跟昆汀會在溫暖白皙的沙灘上散步到忘我，包船出海暢遊（而且還是可以一覽無遺海底景色的玻璃船底船型）。想要刺激一點，他們會騎海上摩托車，乘風破浪。昆汀在旅途中買了一只手杖當紀念品，花錢請人鐫刻他的姓名。舍蓮娜則在當地做頭髮，新髮型是兩道厚實的辮子在後腦綁為一束。這是趟非常充實的八日之旅。

在規畫度假行程時，舍蓮娜與昆汀都不會忘記要在月初之前回來，因為無論是開驅離通知單、有新房客要入住、還是有租金要收，月初都是他們工作最忙碌的時候。他們的房客大多沒有銀行帳戶，所以得親自收房租。

舍蓮娜手機裡有一些塔巴莎的留言，她是辛克斯頓家的社工，每周會固定來探訪。舍蓮娜回電時，塔巴莎提到了十八街跟萊特街口公寓的水管問題，並且敦促她處理。多琳之前雖然自掏腰包找了師傅，但水管堵塞的問題很快又故態復萌。只不過社工的話，舍蓮娜一句都聽不進去。「我沒想到妳會在我的電話上留言，跟我抱怨水槽不通，冤有頭債有主，讓水管不通的是住在裡頭的人吧！」舍蓮娜說。「他們那些人把門弄到都關不上……衣服堆到有天花板那麼高。門一開屎味就撲鼻而來……你們這些單位就任憑

他們把房子搞成這個樣子，我真的覺得有點扯。」

接著塔巴莎搞了個烏龍，她把多琳在另外找房子的事情說溜了嘴。舍蓮娜掛上電話，立刻往法院跑。她的計畫是如果多琳有為了準備搬家而把租金扣著的話，那她一定要拆穿多琳。舍蓮娜付了法院的規費，預約好開庭的時間，同時也在 C C A P 案件管理系統上公開驅離多琳。這麼一來，搬家對辛克斯頓家的難度就瞬間跳了好幾級。辛克斯頓一家想離開可以，但怎麼離開舍蓮娜說了算。

收到昆汀送來的粉紅色驅離通知單後，多琳打了電話給舍蓮娜，她想親口跟舍蓮娜把事情解釋清楚。「我們是真的需要大一點的地方，」她說，「娜塔莎就要生了，所以我們沒辦法繼續擠在這裡。我並不打算馬上搬，我也不可能大冬天的搬家……她（娜塔莎）的預產期大概五月吧，到時候我們或許會想辦法找個大點的新家。」

舍蓮娜跟多琳說，她的驅離申請既然送出去了，就不會再收回來。

「我知道妳的意思，」多琳說。「妳要的錢我有。」

但舍蓮娜不肯收，她說她在意的是辛克斯頓家的存在是對她資產的一種威脅。「萬一州政府的人跑來怎麼辦？」她提出質疑。「他們一來，可能會勒令房子不准出租，這樣大家不就一塊兒倒楣……我沒辦法讓你們一大家子住在我的公寓裡，人太多了，房子都給你們住壞了。」言盡於此，多琳能做的也只剩下祈禱舍蓮娜會突然哪根筋不對地改變心意，那將是辛克斯頓家在出庭前的唯一生機。

月初的第一天，舍蓮娜跟昆汀兩人有說有笑的驅車「巡房」。雖然已經回到密爾瓦基，但他們把牙買加「打包」了一點回來。兩人的皮膚還看得出日光浴的成果，興高采烈的心情也還稍有悸動。他們在屋子外頭遇見了單腳瑞奇，他在等聯邦快遞把買給女兒的電腦送來。

「電腦？」舍蓮娜詢問正爬回休旅車裡的昆汀。

「是啊。」昆汀笑說。

「你看看！他有錢買新電腦，沒錢繳房租。好，沒關係，要玩大家來玩，我房租漲定了。」舍蓮娜頓了一下，「通膨有聽過吧！」

效果十足的發言讓車內充滿兩人的笑聲，此時休旅車又回到馬路上，繼續接下來的行程。昆汀把座椅往後放低，幾乎是躺在車上。芳香劑掛在車內的後視鏡上顛顛晃晃，後座則有揚聲器的大喇叭在播送重低音。這當然這是給兩人都沒在講電話時聽的，但他們好像永遠都有講不完的手機就是了。

說到手機，昆汀接到一通雅房房客打來的電話。他扶著藍芽耳機講完電話，發表這樣的評語，「這些人好像錢放在口袋裡不花就會被燒掉一樣。妳知道的，狗改不了吃屎。」

昆汀把車子停在分租公寓前，進行他的小小「儀式」。他把脖子上的鍊子塞進襯衫裡面，脫下小指上的尾戒，戴上護腕遮住手鍊。經驗告訴他「有些人覺得你收了他們的房租，然後拿去買一些很貴的玩意兒」。不久前才有一名房客指著昆汀身上的飾品說，「我們對你來說就是錢吧，你只是想收我們的租，然後悠悠哉哉過你的日子。」他把這件事轉述給舍蓮娜聽，舍蓮娜只覺得莫名其妙，「不然他想怎樣？」她的意思是：不然當房東的日子要怎麼過？

分租公寓的房客們不知道抽了什麼菸，但總之還沒有把租金揮霍一空。這間分租公寓裡的音樂、笑聲與無憂無慮的心情，說明了每個月一日發放的社福補助有何種魔力；只不過等到五日各種帳單一來，殘酷的現實又會把人打回地獄。房客裡只有一人看起來比較清醒，那是名剛搬進來的老男人。他坐在自己的床上，襯衫釦子扣到最上頭。「晚上來偷襲喔？」密西西比的南部口音拖得長長的。

「你打算何時付房租？」昆汀沒搭理他的問題。

「隨時都可以啊，我欠人錢可是專業戶。」

另一名房客朝著昆汀走來，眼神看起來百無聊賴。「嘿，黑鬼！」這麼叫著昆汀的他身體倚牆，手裡則握著根沒點的香菸。「我、我剛剛在酒吧，老兄，他們也他媽的跟我在一起！聽到了吧！」

「這麼老實？」昆汀邊問，邊將老人的錢塞進口袋，朝門口走去。

回到休旅車上，昆汀上繳一大疊鈔票。這讓舍蓮娜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快克鬼倒知道要房租該繳要繳！」為此兩人都笑了。

接近晚上九點，但舍蓮娜還是讓昆汀開車去找一名準房客。拉多娜請舍蓮娜進門，並且介紹了她八歲的兒子傑拉德。既是職業婦女、又是單親媽媽的拉多娜很急著搬家。「他們大白天的就在那兒開槍，而且在大馬路中間，」她說。「我們在樓上是有地方可以躲。但動不動就得跑上跑下，躲躲藏藏，我真的受夠了。」

「他們得派國民軍來這兒才對，」舍蓮娜回答。

「是該派人來。總之我要閃了。」然後拉多娜給舍蓮娜五百美元。「妳的房子我租了，我不是開玩笑的。這周五我會再給妳一百元，下周五再一百元，然後再隔一周，我給妳一百七十五元。」

舍蓮娜爬回昆汀沒熄火的休旅車。「她真的很喜歡那棟房子，」舍蓮娜說，「好多領租屋補助的人打電話來問，多到你會嚇到。」

「呃，我也有接到不少電話，」昆汀說。

「他們是要找獨門獨院的房子嗎？」

「他們只要有地方住都好。」

拉多娜有租屋券可用。話說舍蓮娜跟昆汀手中大部分的房子，都不收領租屋補助的房客，因為他們

覺得社福方案的要求太多，他們不想把事情搞得那麼複雜。「租屋補助真的是在找麻煩，」舍蓮娜說。持租屋券的人只占租屋市場的一小塊（大概是密爾瓦基租屋家庭的百分之六而已），但處理起來超級頭大，根本划不來（相對於領租屋券的人，「領聯邦救濟金的人才是金礦，真心不騙，」這是舍蓮娜表露的心機）。

但舍蓮娜最近剛入手了一間拉多娜非常垂涎的房子、一棟兩層樓的寶貝，而舍蓮娜有信心這房子一定能通過檢查。只要檢查能過關，這棟房子的回收會非常可觀。憑著租屋券，拉多娜只需要付少部分的房租就好——精確一點說是她所得的三成——剩下的則統統由納稅人埋單。這代表舍蓮娜幾乎不用擔心收不到房租，而且這房租還會高於市場行情。

針對每一處都會區，聯邦住房與都市發展署（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都會設定一個「公允市場租金」：也就是房東對領有聯邦租屋券的家庭所能收取租金的上限。² 公允市場租金的計算是以市為單位，而在行政區的畫分上，一個市往往會包含遠近的郊區；換句話說，這代表無論你所處的社區是慘絕人寰還是得天獨厚，統統都會被送進同一個算式中。紐約市的公允市場租金計算包含了蘇活區³、跟南布朗克斯⁴，而芝加哥的公允市場租金計算，則同時包含富裕的黃金海岸跟南部的貧民窟。這種設計的初衷，是要讓領租屋券的家庭可以在安全繁榮的市區裡、或其鄰近的郊區中，找到棲身之所。但在促進種族或社經地位的融合上，這樣的政策確實有其力有未逮之處。持有租屋券的人基本上不會搬太遠，頂多是搬到像樣點的拖車公園或安靜些的貧民窟裡。但對房東來說，公允市場租金的計算就已經等於中頭獎了。⁵

這話怎麼說呢？這是因為郊區的租金比舊城區高，所以一高一低平均起來，公允市場租金會高過底層社區的租金行情。也就是說，窮人拿著租屋券在底層社區租屋，房東可以跟他們收比在民間租屋市

場裡更高的房租。二〇〇九年，也就是拉多娜希望搬進舍蓮娜新購入公寓的那一年，密爾瓦基一個四房單位的公允市場租金，是一千零八十九美元，但其實同樣條件的公寓行情只有六百六十五美元。⁶ 只要有機會多收錢，房東自然是能撈就撈。雖然舍蓮娜並不覺得市府的住房管理局會核准到公允市場租金的上限，但她還是打算跟拉多娜收七百七十五美元。這比市場行情高出一百美元，但還是遠低於公允市場租金的極限。拉多娜對這價錢沒有什麼意見，因為拿著租屋券，她實際的房租負擔只跟她本人的所得有關，跟舍蓮娜開多少租金無關。⁷ 拉多娜的房租負擔不受舍蓮娜的開價多寡影響，會受影響的是美國的納稅人。

在密爾瓦基拿租屋券租房子，平均每個月會比類似條件與地點的一般租屋者被多收五十五美元。因此多收領租屋券房客的钱，等於是在揩納稅人的油。每年光在密爾瓦基，三百六十萬美元的民脂民膏就這樣被浪費掉——這些錢拿去當作租屋補助的預算，可以再多幫助五百八十八個更弱勢的家庭。⁸

「租金憑證計畫」(Rent Certificate Program)的概念首見於一九三〇年代，但提出這個想法的不是某個華府官員、也不是什麼租屋者聯盟的代表，而是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前身全美不動產委員會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Boards)。⁹ 成立迄今，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現已累積超過一千萬名會員，堪稱美國國內最具規模的不動產經紀人同業公會。總之，按照這些房仲從業人員的說法，租金憑證計畫會優於公共住宅計畫。在房東跟房仲的眼裡，政府興建的廉租公宅，是對他們存在意義與實際生計的一大危害。¹⁰ 事情的一開始，聯邦政府的官員並不認同全美不動產委員會協會的看法。就在二十世紀中葉，美國政府決定要大興土木，也就是以政府預算挹注公宅社區的建設。只不過在同一時間，不動產利益團體仍舊反覆對國會進行遊說，並且獲得不同政治立場的眾多團體奧援，如民權運動人士就認為租屋券的發行將有助於種族融合。¹¹ 到了最後，美國的公宅實驗在遭政府抽掉銀

根後，宣告以失敗收場，房仲們終於迎來春天。隨著公宅計畫一一停擺，租屋券便趁勢興起，一舉成為美國對低收入家庭最主要的住房補貼政策。在政壇裡頭，租屋券政策的定位是「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但在不動產從業人員的口中，這不折不扣地是一場「勝仗」。

舍蓮娜買下要租給拉多娜的房子，是她飛去牙買加度假前幾周的事情。這是棟外觀有著十八世紀晚期殖民地風格的大房子，圓形的塔樓跟氣派的前廊也都是特色。黑白相間的配色是不久前才有人漆上去的。這房子不但屋頂重新鋪過，其他像熱水器、木框窗戶也都不是舊品。從前門進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客廳，抬頭則有一個圓拱的屋頂，拼貼著馬賽克瓷磚的壁爐也別具巧思。臥房的分布是樓下一間、樓上三間，一、二樓間連接著一道蜿蜒的階梯。厚實的地毯覆蓋著樓上的臥室，其中兩間看油漆的狀況，曾有孩子住過。整體而言，這棟房子的屋況好到連一名檢查員看完都會想住，至少他是這麼跟舍蓮娜說的。

這棟黑白相間的房子，位於舊城區一條安靜的街道上。舍蓮娜判斷這個街區的治安還算穩定，主要是兩個原因；一個是「因為這房子已經空了一年，但所有玻璃都他媽的還沒被打破，」一個是「這一帶住戶的警覺性很高。你只要稍微靠近（某間房子），住在裡面的人就會跑到前廊上擺出『有何貴幹』的模樣。他們就像人體監視器一樣盯著街區。」這個舍蓮娜的「心頭好」，花了她一萬六千九百美元，全部付現。她買過比這便宜的房子，八千美元、五千美元的物件她都買過；但也許是一分錢一分貨吧，最令她驚豔的非這棟新屋莫屬。就在拉多娜預定搬進來的數日前，舍蓮娜繞來這兒檢查整修的進度。她巡過了所有房間，然後露出不可思議的笑臉。驕傲的心情讓舍蓮娜難以按捺，最後她甚至手舞足蹈起來。

自從次貸風暴造成法拍屋危機以來，舍蓮娜就持續在密爾瓦基的北部置產，而她買進的速度約莫是

一個月一間。¹² 在某些城市裡，每兩間遭查封的房子裡就有一間是用來出租的，也就是說裡頭住的不是屋主，而是房客。名為危機，但大增的法拍屋對房東來講可是天賜良機。「現在這個時機，會誕生很多百萬富翁，」舍蓮娜突然正經起來，「你知道，你現在要是拿得出錢來，就可以踩著別人的失敗賺到自己的成功……反正人丟我撿，撿多少是多少。」

你現在要是拿得出錢來，這句話就是癥結所在。房貸作為一個行業，已經在金融危機的時候萎縮得差不多了。光在二〇〇七年，放款機構的數目就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¹³ 因為怕借出去的錢收不回來，一間間銀行都變身為「小氣財神」，放款的標準變得超嚴格。想從他們手上借到錢，你不但得信用紀錄完美無缺，而且頭期款也得多準備一些。「想在今年申請房貸，」《華盛頓郵報》報導說，「你必然得有成本會增加的心理準備，有些人會需要多付幾千美元。」¹⁴ 房東講話不會像記者那樣文謔謔，他們會直白地說，「銀行真的很笨，他們只會不斷秀下限。」這就是房東對當時市況的分析。而房東會指著銀行罵笨、會說銀行在秀下限，是因為銀行先是毫無風險觀念，之後又過度謹慎。這些放款者前一秒還膽大包天，後一秒又變成膽小鬼，可以說是瞬間自我打臉。總之，對於手上沒有大筆現錢的房地產投資人而言，銀行縮起來讓他們很困擾，因為明明有那麼多百年難得一件的便宜等著他們去撿。在法拍屋危機的前夕，房租展現了強勁的上漲動力，其中一大原因是房市的榮景跟炒房者在短線上的買進賣出，讓房東背負的房貸月付跟稅金都膨脹得很厲害。而在房市崩盤之後，房地產價格一落千丈（連帶房貸月付跟稅款也大幅縮小），但房租卻繼續居高不下。二〇〇九年一月，在密爾瓦基不動產投資者之間流通的「免費法拍屋名單」上，列出有大约一千四百筆物件開價「比鑑價低至少三萬美元」。這些物件會依照最便宜到最貴來排列，所以最上頭、也就是最便宜的兩房物件開價才兩千七百五十美元。往下數十筆，你會看到一個三房的物件開價八千九百美元。再往下十筆，四房的物件開價是一萬一千九百美元。¹⁵

遇到沒辦法全部付現的時候，舍蓮娜會用幾種辦法籌錢，包括她會去申辦傳統或機動利率的房貸。看上某個物件但拿不出頭期款的時候，舍蓮娜會去找「別人的錢」(Other People's Money) 或所謂的「硬錢」(Hard Money)：這指的是布魯克菲爾德或雪伍德(Sherwood)一些有錢的白人放的高利貸；他們不會要你付頭期款，但他們會要你房子的「優先權」。舍蓮娜是這樣解釋的，「通常你去找銀行借房貸，他們會說，『我們希望你自付兩成。』但跟民間的金主借錢，他們會說，『嘿，我全部幫你出，但我要收十二分利(百分之十二)，而且你得半年或最多一年就把錢還清。』」到時候舍蓮娜要是還不出錢來，房子就變成高利貸的了。

在窮困的黑人社區裡買房，不算很聰明的投資，畢竟那兒的房子沒什麼增值空間。但也因為那兒的房子便宜，所以買那兒的房子收租倒是個不錯的選擇。同樣條件的房子搬到密爾瓦基的白人中產社區，房價可能就是兩倍或三倍起跳，但兩邊的房租水準卻不會差到兩、三倍那麼多。同樣條件的兩房公寓，一名房東可以在沃瓦托薩(Wauwatosa)的郊區收七百五十美元，也可以在密爾瓦基郵遞區號53206的貧困地區收五百五十美元。表面上差了兩百美元，但你要知道持有沃瓦托薩的房子，代表你得負擔高出許多的房貸月付跟稅金，遑論屋況的維護也得適用較高的標準。談到投資報酬率，舊城區的房子基本上無敵。「你會選擇買在北部，是因為那兒提供理想的『現金流量』。」這是一名包租公的經驗談，他在舊城區有一百一十四間出租單位。「在布魯克菲爾德，我是賠錢的；但如果你做低收入者的生意，每個月錢就會穩穩地進來。房東置產不是為了等房子增值，而是為了收租，我們買的是現在，不是未來。」

舍蓮娜置產的標準是扣除費用，每個月至少要創造五百美元的淨現金流入。按照這個標準，她準備要租給拉多娜的房子可以輕騎過關。舍蓮娜買這棟房子毫無貸款，買完之後也只花了一千五百美元整修，但這裡每個月收租竟能達到八百七十五美元。舍蓮娜會為了這棟房子手舞足蹈，是因為她知道自己

的投資大約兩年就可以回本。她已經很習慣這樣的投資報酬率了。在買下黑白屋後不久，她又用八千五百美元的代價購入了基輔大道上一棟雙拼公寓，這次她花了三千美元整修，並且估計只要八個月就可以回本。八個月後，「就都是在賺錢了。」

舍蓮娜估計她的身價應該在兩百萬美元左右，但房屋的價值只是點心而已，真正的主菜是租金。舍蓮娜每個月可以收到約莫兩萬美元的租金，而她的房貸月繳大概是八千五百美元左右。在付完水費後，舍蓮娜估計她每個月可以淨賺約一萬美元——她在舊城區有三十六個單位出租，裡頭住的全是在貧窮線上下掙扎的弱勢者。而這每個月一萬美元是什麼概念呢？包括阿琳、拉瑪在內，舍蓮娜很多房客的年收入都不到一萬美元。舍蓮娜自個兒的註腳是：「貧民窟，是好物。那兒是我的金雞母。」

昆汀將休旅車駛進了一條陰暗而杳無人煙的街上。他還有一站要跑：櫻桃街上的泰芮。這裡是舍蓮娜名下最偏遠的房子。從地圖上看，這裡位於密爾瓦基的西部，鄰近華盛頓公園（Washington Park），步行十五分鐘可到壯觀的米勒啤酒廠（Miller Brewery）。舍蓮娜像在打拳擊似的敲起了泰芮的門，第一下很大聲，第二下更驚人。接著前廊的燈一扳開，燈光便照在了舍蓮娜的身上。她穿著有皮毛襯裡的 COACH 靴子，手上抓著成套的包包，這個包包是她在牙買加入手的戰利品。

「誰啊？」屋裡迸出了一道沙啞的嗓音。

「是我，房東。」

「喔，」對方回答，但語氣中的戰意頓失。

「是的。」舍蓮娜自言自語，然後聽到了鎖被轉開的聲音。

進到裡頭，屋子算是暖和，同時聞得到有炸物的油耗味，應該是晚餐。一盞獨立的小燈亮著，但散

發的光線並不亮，所以房裡還是有些陰暗。這時舍蓮娜發現泰芮今天不是一個人，在場還有她的幾位年長親戚與一些大孩子。肉肉的泰芮算是個漂亮的女人，其他的特徵還包括黝黑的皮膚、長長的辮子，以及空洞的雙眼。智力發展有點遲緩的她領著聯邦救濟金，而她的男朋友——也就是剛剛應門的安東——是個骨感而梳著油頭的男人。他靠著牆，剛好處在光線的邊緣外。

「嗯，這是怎麼回事？」舍蓮娜問泰芮。

「我身上沒錢了，然後……」泰芮的聲音愈來愈虛，最後根本不知道她在講些什麼。

舍蓮娜把手插在屁股後方，身體朝泰芮傾斜。「泰芮，」她像要訓話的老師般開口。

「我知道啦。」

「把錢給我就是了……我開張收據給你。」

沉默了一會兒，泰芮說，「好啦，」然後掏掏口袋。看到這一幕，幾個大孩子離開了房間。

舍蓮娜收下了厚厚一捲鈔票。「誰幫妳弄的頭髮？」她邊問邊伸手玩泰芮的其中一條辮子。「妳喜歡她這種髮型嗎，安東？」

安東正拿著菸往嘴裡送。打火機的火焰短暫地照亮了他的臉龐，使他的五官瞬間脫離黑暗。那是張因為覺得受辱而擠成一團的臉。

想辦法爬回到休旅車裡的舍蓮娜跟昆汀說，「我們收到一千……一千四……這種房客我怎麼捨得趕走啊。」泰芮向舍蓮娜租的是間四房的公寓，月租是七百二十五美元。她還欠舍蓮娜三百五十美元，而且這還沒算進遲繳房租的罰款。泰芮還說她明天會把剩下的錢備好。

「喔喔，不錯喔！」昆汀為老婆歡呼一下。

舍蓮娜覺得蠻有成就感的，但也覺得有點理所當然就是了。她也不是頭一回一口氣收走房客全部的

薪水了。某次有位年輕媽媽甚至掏出了簽帳卡，要給舍蓮娜刷。

在第十八街跟萊特街口，麥基正在廚房裡寫數學功課。他不覺得習題有多難，只是很難專心，因為家裡吵翻天。公車還沒停好就能以飛快速度解決掉作業的露比，現在正在電視前練習嘻哈團體 C.S. Boys 的單曲〈Stanky Leggs〉的舞步，派翠絲的老二潔姐正在用山露汽水 (Mountain Dew) 的空瓶敲打不同的物品，而娜塔莎則試著要幫凱拉梅梳頭髮。請不要小看梳頭髮，遇到凱拉梅，這經常會是場長達三小時的抗戰。娜塔莎的肚子愈來愈大。超音波檢查顯示肚子裡只有一名胎兒，而且一如多琳所料，是名大頭的男娃娃。

多琳跟派翠絲跟麥基坐在同一張桌前，大人小孩各據一邊，小孩在寫功課，大人則是討論舍蓮娜發來的驅離通知單該怎麼處理。多琳的新公寓找得並不順利。她照著紅皮書上登錄的號碼打了通電話，但首先聽到的卻是預錄好的入住條件：「近三年不得有遭驅離的紀錄。不得積欠房租。近三年內也不得有逮捕紀錄。」雖然在找完水電工之後，多琳確實把租金給扣住了，但舍蓮娜會這麼快就把事情鬧上法庭，她跟派翠絲始料未及。派翠絲覺得這是社工塔巴莎害的。多琳說舍蓮娜之所以會沒來修水管，是因為昆汀把休旅車出借了一個月，但派翠絲聽完只是翻了個白眼。「他們賺那麼多，還說這種蠢話，」派翠絲說，「我要是信她這一套，看誰一巴掌打死我好了。」她的手狠狠地落在了廚房的桌上。麥基被嚇到抬起頭來，數學也做不下去了。

麥基拿著功課，轉移陣地到潔姐跟凱拉梅的床墊上。在繼續開工之前，他去自己的藏寶處拿出一幅小國旗，這是學校老師在歐巴馬就職典禮那天發的。在就職典禮前，密爾瓦基的北部滿是競選海報、深藍色的標語或旗幟，有的穩穩插在草坪上、有貼在破裂的窗戶上，有的釘在民眾的臥室裡，也有點綴在

髒亂的人行道上。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的瞬間，萊特街上爆出了歡呼聲。鄰居們拉開門門，跑到門廊上看彼此興奮的表情。麥基躺在床墊上伸懶腰，然後像立正般舉著星條旗，目光則直挺挺地盯在天花板上。

驅離法庭開聽證會的那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七日，手腳不靈光的多琳走出房子前往公車站。她將頭髮包好，穿上白色的魔鬼氈運動鞋，但感覺像是穿別人的鞋般的不合腳。原來只要進了室內，多琳就會打赤腳，而她大部分的時候都宅在家，所以對穿鞋走路有點生疏。對她來說，鞋子比較像是擺設，就像公寓裡的地板或門框一樣。想到要搭公車前往市區的驅離法庭，她非常不樂意，更別提她有隻腳在隱隱作痛。出庭的前一晚，家裡的後門脫落，結果想要去把門弄正的露比首當其衝，被掉下的門板砸中，還被門壓得動彈不得。多琳想過去幫忙女兒脫困，卻滑了一跤，重重的門片就這樣砸到她的腳。她的腳腫到起水泡，醫生在電話上建議她去看急診，但多琳說不用了。「我最後一定是在急診室耗一整晚，然後什麼醫生也等不到，」多琳說。她遺傳了父親對醫生的不信任。¹⁶

多琳看著冰凍的街景在巴士車窗外像跑馬燈般不停向後滾去。去到驅離法庭會有什麼遭遇，她毫無頭緒，於是放任自己滿腦子都是即將出生的小嬰兒。娜塔莎要當媽媽了——一點也不穩重、年紀又輕的娜塔莎竟然也要為人母，這讓她忍不住笑了出來。多琳記得生派翠絲時，因為這孩子個頭太大，所以醫院不得不幫她剖腹，嬰兒的衣服也得去換成大一一點的尺寸。事實上辛克斯頓家的娜塔莎跟C.J.也都是巨嬰。所以出生時只有六磅重的露比，讓多琳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抱她。「她那時候搞得我有點火，因為太小了，我不會抱。」娜塔莎最近才剛申請了 $\$2$ ，而這也就代表她不能算在多琳的撫養親屬裡了。法律上少了一個人要撫養，多琳的食物券就會變少。如果娜塔莎可以留在家裡，幫忙分攤家計，那一來一回就還能打平。但馬立克最近一直問娜塔莎要不要搬到自己的媽媽家。娜塔莎信誓旦旦地說這不可能，但多琳明顯感覺她很認真在考慮。

舍蓮娜後來離開了。這會兒她一邊開車到市區，一邊講電話。電話另一頭的女人說，她剛剛辭掉在蘭馬克信用合作社（Landmark Credit Union）時薪十美元的約聘工作，而且她是趁休息時間閃人，說走就走，連個招呼都沒打。「雀兒喜！」舍蓮娜叫了出來，聲音中滿是失望。「妳這樣不太好吧……我驅離法庭結束之後再跟妳談，但妳知道等會兒要被我念了吧？」

「我知道啦，」雀兒喜說。

「妳歸我管喔。我要扒妳一層皮，雀兒喜！」

舍蓮娜是想要幫雀兒喜「恢復她殘破不堪的信用」。舍蓮娜表示她願意幫雀兒喜看她的信用報告，只要支付一百五十美元，舍蓮娜並用一種叫做「快速分數重建」（rapid rescore）的技巧，來提升雀兒喜的信用分數。像雀兒喜這樣的客戶找上舍蓮娜，錢會花得很值得。舍蓮娜是個「戰績導向」的「鐵血教頭」，她會確保客人得到想要的成果。她知道信用分數良好的價值所在，尤其是遇到要把名下資產售予這些客戶的時候。

舍蓮娜一直都有在兼職讓人「先租後買」的生意。她會挑選比較穩定的房客，然後把房子租給他們六個月。在這六個月當中，舍蓮娜會努力透過快速分數重建來恢復房客的信用分數。要是成功的話，她的下一步就是幫助該名房客申請房貸來支付舍蓮娜開出的房價。聯邦住房管理局¹⁷通常只會要求房價百分之三點五的頭期款，大多數有工作的房客都可以用退稅來支應。在房市泡沫化的期間，舍蓮娜曾經有些資產的價值翻了一倍，而她知道泡沫總有破滅的一日，所以舍蓮娜才會想到要趁著高檔來賣屋變現。她當時有間房子要賣一名房客九萬美元，但這房子她是用地板價買進、而且也沒欠銀行或誰任何錢，所以賺頭非常大。基本上賣房賺到的錢，她會拿去買其他房子，累積更多資產，而新屋主則會承接一大筆房貸的爛攤子。舍蓮娜自己都說背這麼大筆的房貸，比當個無殼蝸牛還慘。

若干年前，舍蓮娜曾經把她的「從信用重建到房貸申辦成功」的一條龍服務，拿去推銷給領聯邦救濟金的身心障礙者。「一大票人跑來置產，最後也是保不住房子。但問題是，你得盯緊這些人……還是會有人在他們身邊提醒，『強尼，該付房貸了喔！』但他們就是不精明。」很多人說法拍屋的危機始於華爾街、始於帶著權力領帶的傢伙買賣「有毒」的問題資產，並設計出許多「信用違約交換」¹⁸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來轉移風險。但其實在貧民窟裡，你只需要一名像舍蓮娜這樣幫人快速重建信用分數的「教頭」，再加上一個希望一圓美國夢的低收入房客，效果其實不輸華爾街。

多琳跟舍蓮娜在法庭見面的時候，舍蓮娜的心情並不佳。跟雀兒喜的談話讓她不太愉快，更別提前一天市府才從她戶頭強制收取了兩萬美元的水費跟欠稅。這錢扣得舍蓮娜措手不及，結果就是她名下只剩生意戶頭裡不多不少的三點四八美元，個人帳戶裡的一百零八點三二美元，外加口袋裡揣著幾張還沒兌現的支票而已。舍蓮娜並不習慣破產，所幸過幾天又是月初的一日，到時候她就可以解套。

在四〇〇號室外的走廊上，多琳解釋了她急著搬家並不是想詭騙舍蓮娜。她說她找房子是想為全家的未來打算。多琳會這麼說，早就在舍蓮娜的盤算之中，因為多琳所不知道的是，塔巴莎當天早上給舍蓮娜打了通電話。塔巴莎是想為多琳求情。她的想法是，既然自己是始作俑者，那她就有責任幫忙辛克斯頓家脫困。講到舍蓮娜似乎有意願簽約和解之後，塔巴莎趕緊拍她馬屁，「對於錢的事情，妳真的像個大姐大耶！」舍蓮娜覺得這話是恭維，露出驕傲的笑容。

舍蓮娜擬了一份和解的協議。她可以撤銷多琳的驅離申請，條件是多琳下個月必須多繳四百美元，並且接下來的三個月，每月都得多繳五十美元。多琳簽下合約。她們暫時躲過了被驅離的命運，但這也代表想搬家得等等了。

- 1 學術圈或司法界普遍有一種觀念，那就是他們會以為租金水準回應的是市場的壓力（某座城市的空屋率）或政府政策的各種干預（提供法律扶助）。但房東有時候漲價是因為他們直覺認為房客有能力多付一點。就算單腳瑞奇付不出來，貝琳達那邊也付得出來。舍蓮娜喜歡說，「瑞奇要面對殘酷的現實，那就是他的房租得漲，不然他也可以搬走，我無所謂……反正我確定貝琳達那兒一定還有新的房客。總之我要漲五十元房租。」
- 2 技術上來講，若房屋的屋況通過租金合理性檢查（*rent reasonableness inspection*），且持有租屋券的人願意付差額，那麼毛房租（*gross rent*）確有可能超過公允市場租金。
- 3 譯註：SOHO 是的 South 跟 Hoston 兩字的縮寫，意為休士頓街以南。蘇活區位於紐約市五個行政區中的曼哈頓，為藝術家、特色店與年輕專業人士的聚集地。
- 4 譯註：South Bronx，布朗克斯是紐約市五個區當中最北的一個，貧民窟所在地，也是有色人種聚集跟犯罪率最高的一區。
- 5 Deborah Devine, *Housing Choice Voucher Location Patterns: Implications for Participant and Neighborhood Welfar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03); George Galster, "Consequences from the Redistribution of Urban Poverty During the 1990s: A Cautionary Tale,"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9 (2005): 119-25
- 6 《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 2009-2011;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Final FY 2008 Fair Market Rent Documentation System*.
- 7 Robert Collinson and Peter Ganong, "Incidence and Price Discrimination: Evidence from Housing Voucher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4; Eva Rosen, *The Rise of the Horizontal Ghetto: Poverty in a Post-public Housing Era*, PhD d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14).

《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可以去探究持有租屋券的人是否被多收了不合理的房租，主要是該研究裡涵蓋了領取與未領取補助的租屋者樣本。在跟克莉絲汀·柏金斯 (Kristin Perkins) 合作的過程中，我們聯手將《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中出現的地址跟不動產登記資料中的地址進行了交叉比對，藉此我們對於居住的商品質掌握了精確而詳細的資料，這包括室內的面積 (平方英尺)、建築的年分、每平方英尺的房屋鑑價結果、建築的類型 (雙拼或獨棟)、便利措施 (壁爐、空調、車庫) 與居住問題的有無或多寡。我們另外也蒐集了關於鄰里生活品質的數項指標，包括特定地區的貧窮率、人口的種族構成，中位數的房屋價值等。再來我們納入了社區中的便利設施表現 (距離最近的公園、公車站、雜貨店，以及學區內學校學生的平均考試分數) 等變數來進行觀察。最後是我們計算了租屋者的一組人口學變數。我們使用經濟學上的「享樂迴歸模型」(hedonic regression models)，估計出持有租屋券跟出租房間數存在顯著的關聯性，而租屋券的溢價，估計每個月四十九到七十美元，依模型的設定而略有不同。但持有租屋券的人也歷經了更多的居住問題，這讓人不得不質疑起多付錢到底沒有換得較新的設備，或資料中未呈現出的其他好處 (欲詳閱完整的模型資料，參見 Matthew Desmond and Kristin Perkins, "Are Landlords Overcharging Voucher Holder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2015)。二〇一〇年，密爾瓦基有五千四百五十五戶家庭以租屋券補貼了住房支出。根據我們有二十七個控制變數且發現租屋券的月均房租溢價為五十五美元的主模型，我們估算出每年光是在密爾瓦基，「住房選擇代用券方案」(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 就會多花掉納稅人三百六十六萬美元 (每月溢價五十五美元 \times 十二個月 \times 五千四百五十五戶領取租屋券的家庭)。根據密爾瓦基市府的資料，以租屋券補貼單戶家庭的平均成本是每個月五百一十一美元 (二〇一〇年資料)，換算成全年的成本就是六千一百二十六美元。將三百六十萬美元除以六千一百二十六美元，得到的商數大約是五百八十八，也就是如果持有租屋券的人沒有被超收房租的話，市府就能多幫助五百八十八個需要援助的家庭。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得到有不動產投資的手冊裡，以專章來說明把房子租給持有租屋券的人是如何有利可圖。這類手冊的範例可參見 Carleton H. Sheets, *Real Estate: The World's Greatest Wealth Builder* (Chicago: Bonus Books, 1998), 121.

- 9 Charles Orlebeke, "The Evolution of Low-Income Housing Policy, 1949 to 1999," *Housing Policy Debate* 11 (2000): 489-520, 502.

10 國會在辯論「塔夫塔—艾連德—華格納法案」(Taft-Ellender-Wagner Bill)，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住房法案 (Housing

Act of 1949) 的前身時，全美不動產委員會協會的主席稱公共住宅是「共產主義的最前沿」。該協會進行了激烈的「錢鬥」——他們將自身的訴求透過廣播與「罐頭社論」向社會傳送，另外也發動了會員去影響各地的國會議員。事實上，若非營建業與其工會想要有工程可做，因此沒有出手，否則全美不動產委員會協會定有勝算的。「塔夫塔—艾連德—華格納法案」最後以五票之差通過。要是歷史走上另一條路，聯邦條例中的公共住宅法源就會付之闕如了。參見 Louis Winnick, "The Triumph of Housing Allowance Programs: How a Fundamental Policy Conflict was Resolved," *Cityscape* 1 (1995): 95-118, 101; Lawrence Vale, *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ojects: Public Housing and Public Neighb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8-41. 二十世紀中葉，也不是沒有不動產開發商支持公共住宅建設釋出珍貴的都會區土地給私人企業，但這些只是個案而非通例。再者，這些建商並非支持公共住宅本身，他們只是想藉由支持公共住宅的建設來澈底剷除貧民窟並把土地拿到手。Arnold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4-34.

11 參見 Philip Tegeler, Michael Hanley, and Judith Liben, "Transforming Section 8: Using Federal Housing Subsidies to Promote Individual Housing Choice and Desegregation," *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 30 (1995): 451-86;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 of 1974, Pub. L. No. 93-383, § 101(a)(1), (c)(6), 88 Stat 633, 633-34.

12 關於出租房遭到查封的情況，參見 Gabe Treves, *California Renters in the Foreclosure Crisis, Third Annual Report* (San Francisco: Tenants Together, 2011); Vicki Been and Allegra Glashausser, "Tenants: Innocent Victims of the Foreclosure Crisis," *Albany Government Law Review* 2 (2009); Matthew Desmond, "Housing Crisis in the Inner City," *Chicago Tribune*, April 18, 2010; and Craig Karmin, Robbie Whelan, and Jeannette Neumann, "Rental Market's Big Buyer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3, 2012. 各家的不動產投資手冊都早在崩盤前許久就鼓吹要投資法拍屋與危樓。「危樓真真正正可以讓人致富，」一九九八年的一本投資專論就這麼大言不慚地說過。"Banks don't like foreclosures. But real estate investors do, because foreclosures can be quick bargain buys." Sheets, *Real Estate*, 231, 234.

13 Dwight Jaffee, Anthony Lynch, Matthew Richardson, and Stijn Van Nieuwerburgh, "Mortgage Organization

- and Securitization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Restoring Financial Stability: How to Repair a Failed System*, eds. Viral Acharya and Matthew Richardson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9), 61-82.
- 14 Kenneth Harney, “Even with Great Credit and Big Down Payment, Home Loans Will Cost More in 2011,”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8, 2011.
- 15 某估計顯示經查封後，法拍屋的平均折價是百分之二十七。John Campbell, Stefano Giglio, and Parag Pathak, “Forced Sales and House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2011): 2108-121.
- 16 我並未在現場目睹門先後倒在露比與多琳身上的事，但之後我確實有看到門板從門軸上脫落，以及多琳腫起來的腳。另外我也跟辛克斯頓家的其他人證實過此事件為真。
- 17 譯註：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成立於一九三四年的聯邦機構，為住房與都市發展署之下的分支機構，其職責是監督自然人的房貸申請資格符合政府規定。
- 18 譯註：Credit default swap，與信貸跟保險相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買賣在兩名法人之間為之，買方是信貸違約時受保護的一方，賣方則有義務負責買方遇到信貸違約時的損失。

第十二章

免洗的人際關係

隔天阿琳就不能住在這兒了，但她還沒有收到社福支票。阿琳在「溫暖滿懷」社服機構的社工送了她兩個兒子耶誕禮物。阿琳本身沒錢送禮，喬瑞跟賈法瑞各自的父親也沒有表示。這兩名孩子都沒收到來自他們叔叔伯伯或阿姨的任何禮物，但他們也沒有特別期待就是了。阿琳的三名兄弟剩下的一個姐妹都有他們自己的孩子要顧。三兄弟裡有一個在領聯邦救濟金，一個在販毒以外也幫房東修理房屋，另外一個則無業。至於唯一的姐妹是校車隨車員，要靠這份薪水養三個孩子。

茱瓦阿姨倒是有錢。她從阿琳有記憶以來就一直在工作，而且小時候也都會帶食物跟禮物來給她跟她的兄弟姐妹。「但我們都沒份兒，」阿琳回憶，她的生母跟繼父會先把想要的拿一拿。但別說耶誕禮物了，就算需要錢繳房租，阿琳也不會向茱瓦阿姨開口。這些年來，經驗教會她非到最後關頭絕不找自己最喜歡的茱瓦阿姨，而被驅離還沒有那麼大不了。阿琳要是太常開口跟人要東西，風聲都會傳到茱瓦阿姨耳裡。到時候輕則被嘮叨幾句，重則電話打去阿姨都不理。

舍蓮娜以為阿琳會「有某個親戚可以投靠」，但阿琳家族成員裡沒一個人陪她出庭，也沒人幫她付房租，沒一個人對阿琳跟兩名男孩敞開大門，也沒人要幫她找下一個棲身之處。「他們這些人就是這麼好玩，」阿琳說。「我的家族不幫忙，沒有人能幫我，我只能四處找，直到有人願意（幫我）為止。」

去應門的時候，阿琳發現舍蓮娜站在前廊上，身旁還有一名身穿棕色冬衣的女子。習慣在舊房客還

沒搬走前就開始帶新房客看屋，的舍蓮娜隨便打個招呼，便跟準房客繞了公寓一圈，途中踩到阿琳的東西也不以為意。看過房子之後，舍蓮娜才解釋說阿琳已經被驅離了，明天起就不會住在這裡。

那年年輕的女子問了阿琳要搬去哪裡，阿琳說她還不知道。這位小姐又看了看房子四周，尤其是看了幾眼牆壁上緣，感覺好像在判斷地基牢不牢固。她跟舍蓮娜說這房子她租了，然後對阿琳說她跟小孩可以待到找到新家為止。阿琳看了眼舍蓮娜的臉色，舍蓮娜揚起眉頭，好像弄不懂這個年輕人葫蘆裡在賣什麼藥。總之舍蓮娜說她無所謂。

有人伸出援手，舍蓮娜也沒有從中作梗，所以阿琳得動作快點，省得待會兒有人改變主意。阿琳看這位小姐穿得不錯，身上有件長裙，頭上則包了絲質的頭巾。她面容溫暖，馬鞍般的棕色皮膚在顴骨邊顯得色調更深一些。她說話輕聲細語，很有親近感，衣服也不會破破爛爛。她確實看起來很年輕，同時阿琳還在無意間聽到這是她第一次租房子。阿琳聽到的另外一個情報是她周二讀經班的成員，所以她應該不是那種狂野的類型吧。阿琳對陌生女子有很多不確定，但她只能選擇跟她當室友，不然只好去收容所了。很現實的是，阿琳只要說聲謝謝，耶誕節以來壓得她喘不過氣的壓力就能解除。

「謝謝妳，」阿琳說。阿琳笑了，陌生的小姐也笑了。阿琳給了素昧平生的對方一個擁抱，小小聲地歡呼，這名陌生的小姐也跟著歡呼。阿琳的心情既是鬆了一口氣，同時也非常感激，為此她也擁抱了沒意見的舍蓮娜。阿琳這才問了陌生小姐的芳名。²

克利絲朵·梅柏利搬進第十三街的家當只有三個垃圾袋的衣服；沒有家具、電視、床墊或微波爐。雖然阿琳財產也不多，但這幾樣東西她還是有的，所以她想，克利絲朵是不是因為如此才讓自己跟兒子留下。阿琳讓喬瑞與賈法瑞搬進她自己的房間裡。另外一個房間變成克利絲朵放東西跟需要隱私時的空

間，但因為沒有床，所以阿琳的雙人沙發就成了她在客廳睡覺的地方。

阿琳並不打算久住，所以克利絲朵也沒有要她分攤房租。但社福支票寄來時，阿琳還是會給克利絲朵一百五十美元，然後她會負責自己的電話費跟過期的電費。這樣算下來，阿琳剩下的錢還能給喬瑞換雙新的運動鞋，感覺還蠻神奇的。

一九九〇年春天出生的克利絲朵十八歲，比阿琳最大的兒子傑傑還小一點。她出生時是個早產兒，主因是媽媽被搶匪在背上刺了十一刀而引發陣痛。經此劫難的母女倆都活了下來，但這不是克利絲朵的媽媽首次被攻擊。從克利絲朵有記憶以來，她的爸爸就一直打她媽媽。然後她的爸媽都在吸快克，就連外婆也是。

五歲的時候，克利絲朵被安置到寄養家庭裡，自此她經歷了在不同的寄養家庭間輪流來去。她跟羅姐阿姨住了五年，然後羅姐阿姨把她還回去，這是她跟寄養家庭「緣分」最長的紀錄。在那之後，克利絲朵待最久的寄養家庭是八個月。進入青春期，克利絲朵開始跟會「團體家庭」³裡的其他女孩打架。她被以傷害罪起訴，右臉頰上則留下了一道疤痕。她身邊的人，還有這些人的房子、寵物、家具跟碗盤，對她來說都只是不斷地來來去去。唯一比較穩定的是「吃」，而這也是她開始從食物上尋求慰藉的起因。

十六歲的時候，克利絲朵就從高中輟學了。滿十七歲時，負責她的社工開始慢慢將她轉出社福系統。在當時，她經歷過的寄養安置已經超過二十五次。克利絲朵因為有傷害案在身，所以暫時不得住進給低收入者的公宅。為此社工想辦法安排她搬進一個由某兒童福利機構補貼的公寓，前提是她得找到工作。問題是，她對在夸德影像輪半日班或在漢堡王炸洋蔥圈一點興趣都沒有。最後她只投了一份履歷。另外就是她已經因為躁鬱症獲得了領取聯邦救濟金的資格，而克利絲朵覺得她不管找到什麼樣的工作，

都不可能比這個每月七百五十四美元的社福支票更穩。就這樣死拖活拖了八個月之後，社工跟克利絲朵說公寓她不能待了，於是克利絲朵離開了寄養體系，正式開始無家可歸的生涯。⁴她開始睡在收容所裡或隨地睡在街上。另外她曾先後短暫投靠過自己的外婆、教會的一名女性教友，然後是一個同輩的親戚。

阿琳跟克利絲朵認識的機緣或許並不尋常，但其實很多窮人為了讓自己跟孩子活下去，都會採取這種「同為天涯淪落人」的求生大作戰。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會常態性地搭上線，這點在舊城區尤其不少見，無論是在大街上、職訓中心、還是在社福大樓裡，他們都會發揮創意來互通有無。在遇見阿琳之前，克利絲朵曾經在公車上認識了一名女子，兩人就這樣同住了一個月。⁵

在一九六〇與七〇年代，一文不名的家庭常能依靠大家庭的人脈來苟延殘喘。身無分文的黑人家庭會「在親族的網絡中，依靠眾多親友的接濟度日，」人類學家卡蘿·史戴克（Carol Stack）在其所著的《我們這一族》（*All Our Kins*）中是這麼寫的。在這樣的親族網絡中，每個受牽絆的個體都會在日常基礎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相互幫忙。這種程度的互助自然不太可能讓人脫貧，但至少可以讓人不至於被壓力拖垮。⁶只不過，隨著社會變遷——毒品（如快克）的氾濫、黑人中產的崛起、還有進進出出監獄——都嚴重耗損了貧困社區中的親族安全網。另外就是由州政府實際執行的聯邦「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ids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等社福政策，也都限縮了人對親族的依賴，因為比起跟親戚同住的人，政府會給予獨居或與跟非血親同居的媽媽較高的給付金額。⁷

時至今日，血親或家庭已經不再是窮人的生活支柱。對於窮人親戚，中產階級的親族常不想插手、或不知該從何幫起。⁸而本身已經深陷各種麻煩或毒癮的窮親戚根本自顧不暇，更不可能去多管閒事。司法體系也經常扮演礙事的程咬金，像羅姐阿姨不肯在克利絲朵超過寄養系統規定的年齡後對她敞開大門，可能就是因為法條太過僵硬。原來警方在羅姐家抄出了她兒子的毒品，為了幫兒子頂罪，羅姐被判

了緩刑兩年，而這也代表執法人員可以合法臨檢她的公寓。知道蘿妲有這樣的苦衷，克利絲朵曾問過能不能讓她睡在前廊也好，但蘿妲還是說不（怕被發現收容超過寄養系統規定的成年人）。

要靠一己之力在赤貧的狀態下活著，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要是沒有家族親戚可以依靠，那去跟陌生人碰運氣，建立免洗的人際關係總可以吧。但話又說回來，開口要一個你幾乎不認識的人幫忙，有時候真的是強人所難。¹⁰

克利絲朵搬進來一周後的某天，阿琳坐在廚房的桌前圈出報紙跟紅皮書上的公寓招租廣告，其中只要提到「身家調查」四個字的她都一律跳過。賈法瑞在玩昆汀留下的那支居家修繕用的矽膠槍。阿琳的計畫是在下個月一日前搬離。「我不想再住在舊城區了，」她說。遇到克利絲朵算是她運氣好，所以她想趁勝追擊，精挑細選下一個家。她心目中的理想目標是在鬧區找個兩房的公寓，月租以不超過五百二十五美元為宜。

喬瑞進門時，阿琳挺直腰。他穿著新鞋，拖著背包進了廚房，頭低低的不敢抬起來。「你知道老師打給了我吧？」阿琳的聲音頗為嚴厲。喬瑞急著想要解釋，但阿琳沒給他機會。「我不想聽，你根本是累犯，你去哪個學校都要鬧事。」

「不是，是因為同學踩我的鞋子。情急之下我一轉身就說，『你踩夠了沒！』然後老師就說，『你說什麼？你說什麼？』學校裡的大家都說，那老師對學生說話的口氣很差。」

「這些都是藉口，我不想聽。」

「反正我說什麼妳都不信，」喬瑞也很叛逆。「學校裡連老師都在欺負人！他們對小孩也照飆髒話！」

「還不是你先惹事，你不能稍微忍耐一下嗎？」阿琳也大聲起來。

喬瑞吸了吸鼻子，想讓自己別再哭了。阿琳叫他去做功課，他垂頭喪氣地走進了母子三人的臥室。

抓起報紙，阿琳出門開始找房子，兩個兒子就交給克利絲朵照顧。她的第一站是條頓尼亞大道，就是以對角線切過密爾瓦基北部的主幹道。出門後，阿琳的第一個念頭跟雪有關。她覺得自己從小到大都沒看過眼前有這麼多積雪。到達條頓尼亞大道後，她造訪一個個租屋處，但結果並不順利，主要是有些房東沒有回應，而有些房東的開價她負擔不起。

找著找著，阿琳發現自己來到了她兄弟馬丁住的社區。她注意到了這裡有些出租招牌，但決定跳過這一區。「馬丁會覺得他隨時都可以來吃我們的、用我們的，」她想。稍早阿琳也曾經看過大兒子傑傑生父住的地方，她對那裡也敬謝不敏。「那兒真的離那傢伙太近了。」¹¹

在阿琳看了九間房子之後，電話終於響了，而電話一接起來，就聽到克利絲朵大吼，「妳他媽的今天晚上就給我搬走。今天晚上！東西收一收，今天晚上就滾蛋！」

阿琳多等了幾秒，然後才把電話掛掉。「這也太扯了吧，」她這麼對自己講。克利絲朵說喬瑞對她沒禮貌，但阿琳感覺克利絲朵只是隨便找個理由發飆，她真正想說而沒說的是：我餓了。克利絲朵不只一次抱怨家裡什麼吃的都沒有。但買吃的從來不在她們說好的範圍內。在食物方面克利絲朵一毛錢都不出就算了，就連食物券也被砍了。¹²「只要家裡有吃的，她就像隻乖貓，」阿琳想。「但只要食物沒了，她就像吃了炸藥。」

阿琳來到附近街角的一家商店，點了九十九美元的肉品組合。這是舊城區熱賣的「土產」，裡頭有超過二十公斤的雞翅、雞腿、豬排、豬頸、鹹豬肉、豬腳、火雞翅、培根等各個部位的肉。站櫃檯的男子邊用阿拉伯語講著電話，邊丟了兩袋免費的馬鈴薯到袋子裡。結帳的時候，阿琳又多帶了汽水跟洋芋

片。買這些吃的，她付的不是美元，而是食物券（她每個月可領兩百九十八美元額度的食物券）。她另外用現金買了包菸，而她選的是 Newport 100s 的長版涼菸。

阿琳腳一踏進公寓，喬瑞就急忙上前喊冤。「她說什麼都不給賈法瑞穿外套、鞋子，什麼都不讓他穿，然後要把他趕到外面去！」

「賈法瑞是自己出去的，」克利絲朵噙回去，「是喬瑞在那邊說什麼，『賤人，看我不揍扁妳！賤人，看我不這樣，賤人，看我不那樣。』」

阿琳靜靜聽著兩造的說法，完全就像小孩吵架時負責調解的媽媽。喬瑞說他想要替賈法瑞出頭，畢竟克利絲朵威脅要把弟弟趕出去。克利絲朵則說她只是開玩笑把兩兄弟鎖在屋外，喬瑞就爆炸了。

「好了，」阿琳說，「你不可以對她不禮貌，」她跟喬瑞講。然後她又轉頭對克利絲朵說，「妳也不准動我的小孩。」喬瑞意猶未盡地還想開口，但被阿琳先發制人，「你給我閉嘴。」

「她事情根本才講一半！」喬瑞懇求著。

「你叫她賤人做什麼？」阿琳問。

「她叫我也很難聽啊！」¹³

「妳知道嗎？」克利絲朵吼著。「對，我很賤。但對你們敞開大門留下你們的，不就是我這個賤人嗎？我跟你們素昧平生耶。我就是那個收留你們的賤人啦，怎麼樣！房東會管你們這麼多嗎？她有必要理你們嗎？」

「妳提這些幹嘛，這些我心裡有數，」阿琳答道，她的聲音堅定而清晰。她先支開喬瑞，派他去雜貨店買東西。

克利絲朵在空中揮舞者電話。「等會兒我媽怎麼跟我說，我就怎麼做，因為今天的事情真的太超過

了！」克利絲朵的意思是，她要把阿琳母子的命運交由她的「乾媽」、也就是她在團體家庭裡認識的一位年長女性決定。她撥了號碼，把電話按在耳朵上，但同時仍不斷在對阿琳說話。「他要是只叫我一聲賤人，那就算了，我會叫他閉嘴。但我能讓他這樣連叫一個小時嗎？」

電話通了但沒人接，克利絲朵於是按了重撥。

阿琳走進自己的房間裡，開始對著天花板嘶吼發洩。「她老是抱怨沒有吃的，但我為什麼要養她啊，我養我的孩子天經地義，她是什麼東西！」

「我有叫你買東西給我嗎？」克利絲朵從外頭吼回去。「拜託妳不要自以為是好嗎？拜託！老娘想要什麼東西沒有，妳說啊？什麼東西？頂多我去賣屁股而已。我要什麼都有辦法！沒有我得不到的東西，懂嗎？」

阿琳看著兩個兒子。「算了，我受夠了！」她又吼出來。「早知道要受妳這些鳥氣，當初我還不如去睡馬路算了。我這是何苦？在家掃地拖地是我，花錢買吃的回來也是我，我這是招誰惹誰？」

克利絲朵又重撥一回，但還是沒有人接。這會兒換成她對天花板大小聲。她開始對上帝祈禱，「主啊，請祢現在就回答我。主啊，拜託，我需要跟乾媽、我的主教說話。主啊，我沒騙祢，我真希望祢沒有教會我要愛人愛到這個程度……我應該因為吃了這麼多苦而憤世嫉俗。喔，主啊！」

克利絲朵唱起了讚美詩。她一邊繞著公寓踱步，一邊哼著歌，然後用鼻子吸氣。偶爾她會停下來閉上眼睛，這麼做是為了讓自己能冷靜下來。

阿琳望向喬瑞。「你對人家不禮貌，人家現在說『你們得滾』，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她……」喬瑞又忍不住。

「沒聽到我說什麼嗎，我們要去哪兒？」

喬瑞一下子洩了氣，眼淚不爭氣地掉下來。阿琳的社福支票已經花掉了，這個節骨眼要是被克利絲朵趕出門，那她真的不知道能帶兩個兒子到哪裡。她看著賈法瑞，才發現剛剛大家吵成一團時，他一個人在本子上畫著東西玩，合計他這段時間共畫了：一大一小、兩隻戴帽子而且都有穿鞋的怪物。

「妳知道嗎？」克利絲朵終於開口。淚滴在眼眶打轉的她沒再吼了，而是以著貓咪般微弱而療癒的聲音說，「好啦，聽我說。呦，主啊，我真希望祢沒有賜予我愛的精神……你們母子倆傷了我的心，但我要把你們統統趕出去，這種事我實在做不下去……畢竟我剛剛說過我內心充滿了聖靈，而聖靈要我不能那麼狠心。」

「充滿聖靈，結果嘴巴還超級不乾淨，」阿琳壓低聲音咕噥著。在阿琳看來，讓克利絲朵這位「二房東」改變心意的，才不是什麼聖靈的指引，根本是肉塊、洋芋片跟沙發床的魅力吧。畢竟剛剛吵得正兇時，她也沒忘了提醒克利絲朵，「我走的話，絕對會把行李收得乾乾淨淨，什麼都不會留給妳。」

喬瑞坐在臥房裡的床墊上。他有種失落到極點的感覺。這之後、在事情有了結果以後，阿琳在喬瑞身旁坐下，她打算要跟兒子懺悔。「媽媽不應該只聽她而不聽你的，做父母的不應該這樣，」她輕聲細語地說著每一個字，「但我們現在就是沒有自己的家，所以也沒有辦法，這就是人生。」

註釋

- 1 這麼做的用意是讓房客可以無縫接軌，讓公寓不會有任何空檔沒有人住。
- 2 我並沒有親眼目睹此一事件，而是事後根據與阿琳、克利絲朵、舍蓮娜的談話重建現場。

- 3 譯註：Group home，除了寄養家庭之外，團體家庭是針對兒少進行家外安置的另一種模式。團體家庭的人數通常不超過六人，其中至少一名會是二十四小時常駐的專業照顧人員。
- 4 一份近期的研究估計，年輕人在長大離開寄養家庭後，有三分之一到半數的人會在二十六歲前有過無家可歸的經驗。Amy Dworsky, Laura Napolitano, and Mark Courtney, "Homelessnes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Foster Care to Adulthood,"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 (2013): S318-23.
- 5 在日常的談話當中，拖車公園或舊城區的居民都會一會兒說自己沒有朋友，一會兒又說自己有很多朋友；一會兒說自己身邊全都是至親，一會兒又說自己跟他們很疏離。實情是心情的起伏會造成他們對於社群關係或人際支持體系的描述顯得極度不穩定，前一天可能萬里無雲，今天卻又是傾盆大雨。我於是學著對他們的人際關係描述抱持懷疑態度，我會將他們口中說出來的話當成是主觀的意見，但不會將之視為客觀證據，換句話說，我不會用他們的話來判定其社會關係的真貌。我遇到困難的地方不只在於如何判定某人是否與另一人有交情，也在於如何去問出別人為他們做了什麼、而他們做了什麼去報答人家。這是因為付出會提升人的自我價值，而收取則會降低自我價值——在救世軍舀湯給人、跟讓人舀湯給你，感覺完全不同——所以我們不難想像人有可能會因此高估他們的付出，低估他們的獲得。民族誌給了我機會去驗證什麼是「說一套，做一套」，而驅離則提供一個很特殊的情境，讓我們可以比較他們說自己從親友處得到了什麼幫助，跟他們實際上獲得的雪中送炭。驅離的幾種效果包括讓人在短時間內變熟、考驗人與人的感情深淺，還包括承諾的執行度。平常我們「肉眼」觀察不到的許多真相，都會在驅離時浮上檯面。Matthew 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2012): 1295-335
- 6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93, 33, 43.
- 7 像是聯邦救濟金與食物券這樣的公共計畫便是如此。如果你住在別人的屋簷下，在他或她的餐桌上吃飯，那你的聯邦救濟金就會減少三分之一。家庭人口數多，領到的食物券就愈多——但大家領到的食物券總額再多，也多不過每個成員分開領食物券的加總。比方說，一對男女登記成一個家庭，那他們每個月領到食物券的金額上限就是三百四十七美元。但如果他們分開領，那每人每個月可以領足一百八十九美元，乘以二就是三百七十八美元。扣除少數的例外，幾乎所有人只要是住在一起，就必須合併申請發放食物券的「補充營養援助計畫」(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 Program)・而不得分開請領。參見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Applicants and Recipients*, December 30, 2013. 關於聯邦救濟金的生活規定・參見 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implifying the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Program: Options for Eliminating the Counting of In-Kind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68, November 2008; Brendan O'Flaherty, *Making Room: The Economics of Homeles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22. 關於依賴親屬與「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 的詳情・見 M. Lisette Lopez and Carol Stac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ulture of Power: Lessons from the Field," in *Social Capital and Poor Communities*, eds. Susan Saegert et al.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31-59. 即便排除掉所得這項變數的影響・在密爾瓦基領取聯邦救濟金的租屋者仍較其他地方的人住得較不擁擠。《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 說到基本需求的滿足・窮親戚一向是比中產親戚更可靠的資源。參見 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Stack, *All Our Kin*, 77-78.
- 9 單親媽媽如阿琳是沒辦法靠社福收入讓收支打平的：平均而言，社福補助、食物券跟聯邦救濟金加總起來，只能支應約單親媽媽約五分三的生活費用。就算是加上兼差賺錢或向社會服務機構求助，很多人還是得咬牙度日。挨餓跟不添冬衣、不看病，都是常態。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 10 範例可參見 Lee Rainwater, *Behind Ghetto Walls: Black Family Life in a Federal Slum* (Chicago: Aldine, 1970), 73; Sandra Susan Smith, *Lone Pursuit: Distrust and Defensive Individualism Among the Black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7)。欲了解詳情，可參見 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其他民族誌學者也曾在窮困社區中記錄過類似的人脈動態：參見 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163-65, 182; Rainwater, *Behind Ghetto Walls*, 73. 當然這些情感流動可以在社會的各個層級觀察到。比方說中產階級就經常有向素昧平生者尋求情感撫慰的傾向，這在飛機上相當常見，所以又被稱為「飛機上的陌生人」現象。窮人依賴「免洗人際關係」的做法雖然在性質上並無不同於富人向陌生人求助，但兩者在程度上還有所差別。主要是窮人才會經常性地依靠免洗關係來滿足吃住等基本的需求。

11 在人的眼裡，鄰里跟社區並不只是孩子的學區或普通的環境生態指標而已。人會用很私人的角度去觀察社區，覺得社區的許多東西都無法量化但又非常強大，這股強大的力量會讓他們對城市中的某塊地區趨之若鶩或避之唯恐不及。

12 克利絲朵在前一年祖母過世後，就擺爛沒再去管食物券的事情，於是這項福利就這樣過期失效了。她記得祖母的死讓她陷入了憂鬱的深淵。「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整天睡、洗澡、吃，然後回家又繼續睡。我整個人都關機了——我對所有的人事物都沒了興趣。」克利絲朵的例子，再次說明了心理創傷會如何使貧窮惡化。

13 喬瑞這麼說，顯然克利絲朵也用了侮辱人的字眼稱呼喬瑞。

第十三章

E-24 車格

在發現拉蕊偷偷搬進他的拖車之後，畢可在病床上咒罵起來。憤怒卻無助的他摸摸胸前，三重繞道手術在那兒留下了一道長達九英寸的縫合疤痕，就像條粉紅色的蟲在皮下爬著。畢可跟拉蕊通電話時，拉蕊忙得氣喘吁吁。「畢可，」她說，「我們展開新生活吧！我把東西全都丟了。」她一整個上午都在清理廚房，但她本來只是先丟了被遺忘而發黑的蘋果醬跟停滿了蒼蠅的肋排，最後才覺得留來留去留成愁，索性一股腦兒全丟了，畢竟屋裡的食物罐頭上有蟲在爬。畢可要拉蕊住靠裡頭的臥房，但她因為髒而不願意。於是她拿出蒸氣拖把，開始大肆清掃起沙發。她打算在那兒把從舊拖車裡搶救出的東西堆成一座小山，然後自己就陪著家當睡在沙發上。

出院回家後，畢可在廚房的桌子前一屁股坐定，把香菸塞進免洗的塑膠碗裡，也就是熟食店裡讓你裝一堆橄欖的那種。畢可是從小被叫到大的綽號，他的本名其實是羅伯特。鬱鬱寡歡，乃至於沉默寡言的畢可留著向後梳的黑灰油頭，幾年前才因為健康問題從市公車司機的崗位上退休。

畢可要拉蕊分攤租金，但拉蕊說她沒有辦法，因為她不能讓老鷹搬家倉庫那邊的保管費斷掉。他們為此吵了一架，最後畢可妥協讓拉蕊負責第四台跟電話費就好。說到第四台，他們之後又吵架，為的就是要看哪一台。畢可喜歡像《冰路司機日記》¹ 這類的節目，而拉蕊則是《會跳舞的照過來》² 的鐵粉。還有一次吵架的原因是畢可不肯跟她分享慈善團體³ 送來的餐點。而畢可之所以鬧彆扭，是因為他還在

為拉蕊丟光他罐頭的事情不爽；在此之前，拉蕊的食物券資格早已經被註銷了——被驅離那段時間可以說是昏天暗地，她因此忘記跟社福單位有約。而沒了食物券，她只好向鄰居要剩菜剩飯，再不然就是去教會的食物廚房覓食。

第一次去老鷹搬家的倉庫時，拉蕊報上了姓名給櫃檯後頭一個反戴棒球帽、身上掛著金色十字架的黑人員工。

「付了保管費，我就可以去看看我的東西嗎？」拉蕊問。

「沒辦法喔，女士。這裡的倉庫是有投保的，所以我沒辦法讓你進去。」財產一旦入庫，就不讓人隨便翻了，所以你也不可能因為天冷而進去抽件冬衣出來。

「好吧。」

「我們這兒進來要錢，出去要錢，然後妳還得繳第一個月的保管費，」櫃檯後的黑人說。「這樣大概是三百七十五元。然後第二個月起的保管費會以每月一百二十五元的金額往上加。」拉蕊得到的建議是東西能早點領走就早點領走，這樣才不會多花冤枉錢。問題是她剛繳給他的錢就已經超過她這個月聯邦救濟金支票的一半，所以拉蕊知道自己也只能先這樣耗著。並且因為同時要拿錢給哥哥畢可跟老鷹搬家，所以她得存好幾個月的錢，才有辦法搬進新的公寓。

在拖車公園裡，拉蕊使出渾身解數保持低調，因為她不能讓連尼跟辦公室蘇西看到。她知道要是被這兩人發現她躲在園區裡，托賓就會得到消息，然後她跟畢可能會被一起趕出去。

對托賓而言，連尼跟辦公室蘇西就像他的左右手，但這兩人對園區的房客們來說也同樣不可或缺。無論是要趕你走，還是要修好你的馬桶，對他們來說都一樣輕鬆。潘跟史考特會被驅離，蘇西在後頭推

了一把；但如果她覺得托賓多收了某人的錢，或是前廊欄杆拖了很久都沒修，她也會纏著凱迪拉克裡的托賓大小聲。不過比起這些，兩人在拖車公園裡最重要的角色還是「文化翻譯機」。他們就像托賓跟房客們之間的橋樑，遇到托賓拿捏錯分寸，他們就會出來緩頰：就像某次托賓跑到某名房客的孩子面前說他爸爸遲繳租金，他們就跳出來打圓場。連尼甚至不只一回用肉身擋在托賓跟房客之間。「以夷制夷」是這一行常見的做法——外來的房東會聘「當地人」來擔任管理，而且人選通常會直接從房客裡找。⁴

那位被托賓向孩子們告狀的爸爸是唐尼。三十多歲的唐尼身形有些福泰，滿臉鬍渣，重點是拖車公園裡幾乎沒人不喜歡他。唐尼會沒付房租、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拒付房租，不是因為沒錢，而是因為他覺得不受托賓尊重。原本要繳的租金被唐尼託放在交易中介機構，那兒，他主張的理由是拖車的屋頂漏水，水槽底下也長了黑黴。為此唐尼對鄰居羅比說，「你知道他怎麼跟我說嗎？『你租的時候就是這樣啊。』拖車公園裡也有人不靠社會福利過活好嘛，這傢伙是有多無知啊！」

「就是啊！」羅比脫口而出。「他還問我有沒有工作。我回他說，『工你個頭，我可是有加入工會的人！搞不清楚狀況！』」確實，羅比有工作，他是個坑道礦工，也確實有加入當地的第一一三號工會。「你當我是坨屎，我他媽的就不甘願付錢啦！誰來我都不管，恁伯不可能讓你在那兒像尊佛似的看我衰小！」

「恁伯就是鄉下來的啦，怎樣！」

「住拖車又怎樣，拜託，住拖車的他媽的也是人好嗎！」

同樣是鄉巴佬，連尼了解這些人的出身。他否認托賓有點失控，但為了護主他也有話要說。「一堆人說，『托賓喔，就是個壞蛋啊。』但托賓怎麼會是壞蛋呢，他是苦主，欠錢的是你們啊。」唐尼、羅比跟整個園區都不知道的一個內幕是，他們交的租，連尼其實可以分紅。以月來算，連尼要是能替托賓收

到五萬美金，那他就可以抽一百美元，而若在五萬元以上，就是每兩千美元再多分一百美元。

有些日子裡，市府的鄰里服務局會派人來，然後你就會看到連尼跟在調查員的身邊，而且還有問必答。調查員羅傑低頭看了隨身的手寫板，主要是在看上次來都記錄了什麼。「我來看看，嗯，W.S.的規格是……」

「是個棚子，」連尼趕忙說。「我們已經撤掉了。」

「喔。」

「嘿，羅傑，」一名房客從前廊叫了檢查員。「有看到什麼嗎？」

「你說的看是什麼意思？」

羅傑在拖車公園裡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每個人的廚房抽屜裡都多少有張他的名片。遇到房子問題讓他們受不了的時候，他們不會威脅說要打給鄰里服務局，而是說要打給羅傑。羅傑是名微禿的白人，留著整齊的鬍子，上半身穿鄰里服務局的 polo 衫，下半身則是三十到三十三腰的 Levi's 牛仔褲。

「我是說有發現違規嗎？」房客把話說得更清楚，一副很想插手的熱心模樣。

「這個嘛，這裡當然不像鄉間別墅，但只要屋子還能住人，那我就沒話說。」

「所以一切都合乎規定囉？」

羅傑不置可否地聳聳肩，腳步完全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違規當然有，怎麼可能沒有。比方說他注意到熱心房客的拖車後頭有處垃圾堆，然後原本應該要是窗戶的地方變成了三夾板。他看到有拖車的窗戶玻璃破了不只一塊，有晚上用來生火的汽油桶，還有垃圾浮在久久不退的積水中，以及從園區兩頭各一輛的巨無霸垃圾子母車中滿溢出來的垃圾。偌大的園區會只有兩輛子母車，是因為托賓拒付年費來設

置個別的小垃圾桶；問題是，子母車會在垃圾車來之前的幾天就爆滿，然後就會招來浣熊跟負鼠。羅傑來巡的前幾天夜裡，就有一名拖車公園的住戶拿刀宰了負鼠，就連連尼自己也曾用槍幹掉過一隻。清潔隊員來收垃圾時，面朝子母車的住戶會好說歹說，希望垃圾車的駕駛把子母車移到別處。他們會指著某間拖車說，「那裡面沒住人！」通常他們說的是真的。

羅傑嘆口氣。「你們也差不多一點，不然我真的會愈寫愈多。」

「那你就不要那麼勤快嘛。」連尼耍嘴皮子，意思是要羅傑放水。

「連尼，我是為你們好，真的。我每回來看，每回都有問題。」而且這還是在外頭走馬看花而已，畢竟羅傑通常不會巡到拖車的內部，不然他會看到塌陷的浴缸被車子的千斤頂給硬架起來，還有熱水器根本沒連到通風管上。

羅傑停在一輛拖車前面。「這些窗戶好像被槍打過？」

「嗯，」連尼答道，「住戶沒錢換新玻璃啊，我能怎麼辦？總不能叫我幫他們出這些錢吧。」這輛拖車的所有權在住戶名下，意思就是住戶除了要付房租，就連維護費也要自掏腰包。

「我也不希望你破費啊。」

「所以就沒事了嘛。」

「我是隨便啦。」

回到園區辦公室之後，羅傑嘆口氣，臉埋進手掌裡。

托賓掛上電話問，「所以怎麼樣？我們表現如何？」

「我說啊，」羅傑開口，「你要讓這種糟糕的拖車停進來，那你至少得讓園區可以住人，不要太離譜。」說完後，羅傑開始條列較大的毛病：垃圾問題、存放東西的棚架沒有遮蔽、窗戶玻璃破損嚴重。

連尼打岔，「這個冬天大家都不好過啊。」

「這一條我不會報上去啦，」羅傑回答，他指的是窗戶破損這一項。他知道把種種違規的罪狀寫得鉅細靡遺，不但不切實際，也不見得符合租房者的最大利益。

檢破爛維生的盧法斯踏進辦公室。「我們不會有事吧？」他問了羅傑。雖然市府已經讓托賓換照了，但不少房客還是很擔心要搬家。

「嗯，」羅傑回答他。

「那就好，不然我的貓屋真的超大的，怎麼搬啊。」盧法斯的母親過世時留下了七十二隻貓咪，他身邊如今還剩下三隻。

接手拖車公園後不久，比克管理公司就開除了連尼跟辦公室蘇西。過目完合約終止書後，連尼便著手把東西從他工作了十二年的辦公室裡移走。他收拾自己的各種工具，牆上用螺絲鎖住的鹿頭也被他取下來。

這時門被推開，一名戴著墨鏡的男人問，「我想辦續租，可以嗎？」

連尼頓了一拍。「我不清楚，」他終於還是開口，「這兒不歸我管了。」

曾經是再熟悉、再平常也不過的日常，現在卻彷彿懸在半空中般令人手足無措。推門進來的男子臉上浮現了愁容。離開之後，他把所見所聞告訴了遇到的第一個人。人事異動的消息不逕而走，接著恐懼便撼動了整座拖車公園。新的管理公司會承認口說無憑的租約嗎？房租這下要漲了嗎？驅離潮要來了嗎？連尼跟辦公室蘇西在園區裡自然不是萬民擁戴，討厭他們的人也有，但至少兩人是熟面孔。「換一批人來，可能以後都要公事公辦了，」藥頭彤恩說。「辦公室以前會給我們方便，是因為這裡大家都是窮

人。」消息傳到了彤恩的鄰居譚美耳裡，這位懷著七個月身孕但有毒癮的準媽媽，走進園區辦公室，給了連尼一個大大的擁抱。

上班的最後一天，辦公室蘇西從語音信箱系統裡刪除了她的招呼錄音，連尼則把一串沉甸甸的鑰匙留在了辦公桌上。

比克管理找來接替連尼的、是最近才從威斯康辛大學清水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Eau Claire）畢業的社會新鮮人，事實上這名才二十三歲的年輕小伙子就算要當連尼的兒子都沒有問題。突然間要接手這樣一個地方，年輕的經理有點弄不清東南西北，而且好像有點把大家當成幼稚園小孩在管，但總之，他撐下來了。至於沒有撐下來的，是只來了一周的新維修師傅，他的「臨別贈言」是，「我的意思是，這裡的拖車屋九成九都無藥可救，修無可修了……我修拖車屋也有七年的資歷，但沒看過像這裡這麼爛的。」

連尼跟蘇西掰掰之後，托賓處理某些事情只能親自下海。這點他倒是不介意，他一直都是那種事必躬親的房東。在經營柯立吉流動房屋園區的這十二年裡，托賓摸清了要如何讓一百三十一輛殘破的拖車變成一門賺錢的生意。他最強的一點就是能把一輛幾乎全廢的拖車變成會吐租金的提款機，而且前後只需要幾天的時間——成本還幾乎是零。

在從¹⁰的車格驅離了一名叫作提歐的房客跟他女友之後，托賓的下一步就是得把拖車清理好。提歐在園區是出了名的「一滴汗都不願意流」的懶鬼，他除了不工作以外，拖車的狀況也是一場災難。

托賓花錢請了麥茲太太來收拾提歐的爛攤子。比起園區裡某些只知道吃醫生開的藥、在電視前睡，說難聽點像在等死的同齡人而言，麥茲太太可以說是名精力十足、火氣也很大的老人家。有時候她早晨醒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她成年的女兒麥德琳來場髒話互飆的爭執。在開車上下班的途中，拖車公園的住戶們不時會在離家好幾英里處，看到麥茲太太的身影推著鉛罐多到要滿出來的購物推車。她有她

的生存之道，她是個堅強的老人家。

有機會能多賺點錢，麥茲太太非常感激，所以即便要打掃的是EVA，她也沒有怨言。說到EVA，麥茲太太從十英尺外就能聞到異味，而進到車內，那種凌亂會讓人抱怨住這兒的人「有病嗎」。地板上都是菸灰缸跟香菸，碗槽裡堆滿表面結了層食物的碗盤，馬桶整片都是黑垢，還有一眼望不盡的垃圾，地毯上沒乾的貓屎有好幾灘，天花板上垂著一條條蜂蜜色的捕蠅膠帶。提歐跟女友走得倉促，所以很多東西都放著沒拿：一雙輪式溜冰鞋、一頂機車安全帽、一張沙發，一盒完整的工具箱、玩具直升機、駕照。麥茲太太開始把東西全拖到垃圾子母車扔掉。丟了幾輪之後，她去跟辦公室蘇西要了雙橡膠手套。

這時撿破爛的盧法斯出現在門口。「哇嗚，」他看了看四周說。「就當我口無遮攔吧，但黑人住的地方都不會這麼髒。」

麥茲太太爆笑了一聲，「哈！」但沒有停下動作。

盧法斯是來回收金屬的。從一九八四年就開始專門收破爛的他，很自豪一件事，那就是自己沒有過著「以信箱為圓心」的日子，他不想像鄰居那樣，每個月就只巴望著聯邦救濟金的支票寄來。托賓的指示是要盧法斯把微波爐、電冰箱、烘衣機等大件的東西給拖出來，而他跟洗碗機奮戰到一半，托賓正好穿著燙好的卡其褲跟POLO衫前來。托賓眯起眼睛，但完全沒有為了眼前的光景大驚小怪，這種事看多了，他早已見怪不怪。「盧法斯，」托賓說，「先把這堆東西清一清，我們再來看要怎麼處理。」

花了兩個小時，盧法斯終於把全部的東西都搬上他那輛藍色老雪佛蘭的車斗。托賓沒為了這件活付盧法斯一毛錢，但回收廠給的廢鐵回收金倒是接近六十美元。麥茲太太忙了五個小時都沒有休息，托賓只付了她區區二十美元。

拖車清好後，托賓便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沒多久，就有一對對的夫妻或情侶上門來看房，而托賓也

又搬出了「修繕專業人士方案」來吸引他們。拖車的屋況很差，為此托賓只得低頭道歉——屋裡仍有貓屎跟抽菸的味道殘留，有些窗戶玻璃破了沒修，馬桶上的黑垢依舊頑固——為了補償，托賓免除前兩個月的租金。提歐走了幾周後，托賓為 Tony 找到了一對新的住戶。這對男女用之前存下的租金把房子整理一番。兩個月後，他們才開始付托賓每個月五百美元的車位租金。

在辦公室蘇西看來，托賓給麥茲太太的那點錢實在少得離譜，但她也沒說什麼。托賓私下有一群人幫他割草或撿垃圾來賺點啤酒錢，蘇西叫這些人是「拖車公園裡的零工班底」。在威科夫斯基議員規定托賓得從外面聘請專業的維護人員之後，托賓便開除了這些班底。只不過還是有人照常做著這些工作，他們可能閒著也是閒著，或只是想先做了再說，搞不好托賓還是會付點錢。其中像特洛伊是個失業的摩托車黑手，他甚至幫忙過托賓把鬧上電視新聞的污水外溢給拖乾。這樣拚死拚活，他只換得了珊曼莎對他一頓嘀咕，其他什麼好處都沒有。珊曼莎是他有實無名的老婆。

「現在是怎樣！」珊曼莎這麼吼的時候，身上還穿著連鎖早餐店喬治韋伯 (George Webb) 發放的制服。這對貧賤夫妻還欠托賓租金沒還，而他們抱著的一點希望是托賓可以在特洛伊做了八個小時非人工作的份上，給他們一點折扣，但其實托賓沒開口要他們做。「你清的是大便，人的大便耶！」

「我跟你說，」特洛伊說。「以前在馬場打工的時候，我用鏟子清過馬糞，雞糞我也掃過。但人的我真的是沒試過。我只能說噁心到爆！」

「我知道，因為我聞得到你臭死了！」珊曼莎吸了口氣。「要是我就會耍賤，我是名狠角色，」她接著說。「你呢，特洛伊，你就是好欺負。」

特洛伊低頭喝了口珊曼莎從店裡帶回來的奶昔，一個字也沒說，就像在默認老婆的說法。「托賓老愛裝可憐，」他開口。「那傢伙根本超級有錢，但是他還是不斷想賺錢。他每年靠這裡就賺超過一百萬了

吧。」他用動作示意外頭成排的拖車。「全部加起來的話。」

威科夫斯基議員也提到過類似的年收數字，他估算托賓的拖車公園每年可淨賺九十萬美元。特洛伊跟威科夫斯基會算出類似的數字，都是用托賓的一百三十一輛拖車去乘上平均月租五百五十美元。這是很粗陋的算法，因為這當中完全沒扣掉任何費用跟成本，也沒考慮到會有空租期的問題，更別說這還得每個人都是好房客，不能有人欠房租。

托賓身上已經沒有房貸要背：他一九九五年以兩百一十萬美元的價錢買下了拖車公園，然後花了九年的時間把貸款還清。⁶但他逃不掉的有財產稅、水費、定期的維修支出、連尼跟辦公室蘇西的年薪跟租金優惠、廣告支出，乃至於驅離衍生的成本。扣除掉上述成本，再考慮空租、欠租等因素之後，托賓可以放進口袋裡的年所得在四十四萬七千美元上下，大概是議員所說的五折。⁷不過話又說回來，托賓這樣的收入在美國絕對是前百分之一，而繳租給他的人卻幾乎比九成的美國人都窮苦。

特洛伊把老婆的愛心奶昔喝得一乾二淨。「是這裡痠嗎，親愛的？」珊曼莎問，她希望自己的肩頸按摩有揉對地方。

註釋

1 譯註：Ice Road Truckers。二〇〇七年六月開播的真人實境秀，節目記錄的是卡車司機沿季節性路徑駛過結冰湖泊與河流的過程，加拿大與阿拉斯加等北境為其主要場景。

2 譯註：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由美國福斯電視網製作的選秀節目，號稱「《美國偶像》的舞蹈版」，第四季的

冠軍曾獲得電影《舞力全開 3D》(Step up: 3D) 的演出機會。

3 譯註：這兒指的是 Meals on Wheels，也就是為獨居的老殘窮等弱勢送餐的服務。

4 在密爾瓦基北部，白人房東經常雇用黑人當物業經理來替他們管房子。舍蓮娜說，「不少年輕白人會從布魯克菲爾德跑到舊城區買房……然後他們會聘黑人經理來替他們管這些房子……尤其他們會找外表看起來有點兇神惡煞的黑人來讓事情順利。這些黑人經理會吼人，而且非常有效。」舍蓮娜的意思是這些物業經理會毫不猶豫地對不乖乖繳租的房客大小聲。參見 Jennifer Lee, "Cultural Brokers: Race-Based Hiring in Inner-City Neighborhood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1 (1998): 927-37.

5 譯註：Escrow，一種在交易條件完成前由中立的金融機構保管貨款的設計，對買方而言是「履約保證」的概念。

6 房貸跟繳清的紀錄取自密爾瓦基郡房地契登記處 (Milwaukee County Register of Deeds)。
7 托賓跟連尼的租金紀錄顯示在多數的月分裡，閒置沒租出去的拖車數大約為五輛，而拖欠租金的房客達到四十名，平均單月欠租金額為三百四十美元。在單月空租五輛拖車的狀況下，剩下的一百二十六輛拖車會平均創造五百五十美元的租金收入，但這當中要扣除未實際繳納的租金金額為全年十六萬三千兩百美元 (40 人 x 340 美元 x 12 個月)。不過實際上的全年租金拖欠金額應該不會這麼誇張，原因有二：首先，托賓並沒有每個月都執行四十筆驅離，所以這代表大部分房客都有找到辦法去「處理」他們的欠租。再者，拖欠租金的預估是根據夏季月分的總和 (拖車公園從二〇〇八年四月到七月的租約清冊)，而這期間正是欠租跟驅離的高峰。儘管如此，我還是選擇用這些可能高估的租金損失來推導出較為保守的預估值。托賓的固定營運費用，包含連尼跟辦公室蘇西，兩人合併的年薪跟租金折扣將近五萬美元，其中連尼的年薪跟被免掉的租金合計為四萬兩千六百美元 (薪水三萬六千美元加上免除的房租六千六百美元)，而辦公室蘇西的薪水跟租金減免一共六千四百美元 (托賓認為蘇西是兼差員工，他付她的報酬是時薪五美元，每周工時則是二十個小時：5 美元 x 20 小時 x 52 周，加上租金減免一千兩百美元，算出來就是六千四百美元)。在設施的維修方面，園區內有將近二十輛拖車是租屋者「自有」的，所以他們得自行負責大部分的維修帳單。按估計，就算把請人割草與撿垃圾的錢都算進去，例行性的維修成本也鮮少超過一個月五千美元，但我一樣也把這個恐怕是高估的估計值保留下來。托賓的財產稅 (property tax) 在二〇〇八年是四萬九千四百五十七美元，水費是兩萬六千七百零八美元 (兩筆數據都出自公開紀錄)，至於瓦斯跟電費則是由房客負擔。那驅離法庭的各種費用呢？托賓平均每個月會申請三筆正式的驅離，但

除非事情真的非常棘手，否則他不請律師，而這也意味著他每年花在驅離法庭、治安官跟律師上的費用不會高過七千美元（如果托賓平均每個月驅離三個人，那他年度的基本法庭費用就是 $3222 \text{ 美元} + 895 \text{ 美元} \times 3 \text{ 筆案件} \times 12 \text{ 個月}$ 。考慮到不定期的治安官、搬家師傅跟律師費，我把這個數字乘上兩倍，然後再取個整數到七千美元）。垃圾呢？連尼告訴我他處理兩台垃圾子母車的帳單是每個月八百美元，因此全年是九千六百美元。照明呢？托賓付費裝設戶外的夜間照明（安裝在電線桿上），所以園區晚上是會亮的。按照 We Energies 能源公司的標準費率計算，我導出照明費的年度預算是五千元（已含園區辦公室的電費）。雜支？我給廣告與連尼領取的租金分紅列了額外一萬五千美元的預算。這樣算下來，整年還可結餘四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五美元。我把一次性的大筆維修支出排除在上述的計算以外——包括托賓在園區裝設減速路障，理由是這些大筆花費是不定期的，而且發生的頻率也不高。連尼覺得我的評估太客氣了，他認為托賓每年至少可以「淨賺個六十萬吧」。

第十四章

能忍則忍

史考特無意抗拒被驅離的命運。他跳過出庭的日子，也沒去找托賓商量。相對於此，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灌注在找新家上。而在打了幾通電話後，匿名戒毒會的皮托那兒傳來了好消息。皮托跟某些房東有合作關係，這包括他會幫房東修理房子，也會替房東找房客。這會兒他向一名熟識的房東擔保了史考特。這間兩房的二樓公寓位於密爾瓦基的中偏南部，空間不大，室內一無長物以外，還有個搖搖欲墜的陽台，淋浴間也付之闕如。好處是房東每個月只收四百二十美元，而且也不堅持做背景調查。

這間公寓還附帶一名室友，喚作D. P.。長著張娃娃臉的D. P.是皮托的姪甥輩，D. P.是他「行走江湖」的名號。其實D. P.才十九歲，但他身上已有幾處刺青，耍酷的耳環也沒少。D. P.最近才剛出獄，而他坐牢的罪名是非法持有槍械跟改造槍枝，說得更精確一點，是他鋸短了獵槍的槍管。D. P.混的是眼鏡蛇幫(The Cobras)，為此他覺得自己需要把槍，因為他們隨時會跟國王幫(The Kings)擦槍走火。D. P.趁坐牢的期間拿到了高中同等學力，另外還多添了個「重新開始」(beginning)的刺青。

有一天，皮托從另外一名房東處得知有名老人死在附近一座拖車公園裡，遺物無人認領。於是他在安排讓史考特跟D. P.去清理那輛拖車，假若有想要的東西就歸他們。在往生者的櫃子裡，史考特找到了裝在拉鍊袋內一套燙好的西裝，另外還有一個絲質襯裡的公事包。在浴廁，他發現《美國退伍軍人協會》(American Legion)雜誌，上頭的郵寄貼紙印著這名已故男性的姓名。不過說到最讓史考特覺得「原來如

此」的，還得算是床邊由香菸燒出的痕跡。從這些跡象，史考特想到死者生前應該有吸食嗎啡。在史考特的眼裡，這個世界經常都是由毒品在負責推動的：這個男人為什麼「孤獨死」，潘跟奈德為什麼從拖車公園被趕出去，他又為什麼會在陌生人的家裡檢破家具並搬回他的新公寓，可以串連這一切的就是毒品。

這對新的室友合力將一個五斗櫃跟一張沙發扛上了福特F50貨卡。準備好滿載而歸後，D. P. 發動引擎，同時大聲放饒舌音樂。史考特比較想聽點別的，他最喜歡的一首歌是英國歌手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的〈索斯伯里山丘〉（*Salsbury Hill*），但他並沒有多說什麼。

史考特還在米拉的人手名單上，但工作量顯少了很多。米拉讓手下的工人一天做十二小時，不管是搬洗烘衣機、床墊，還是沙發床都有，所以案量很快就消化光了。遇到工人說他們搬不動或腰痠背痛，米拉就會向他們兜售止痛藥。但史考特覺得她賣得太貴了。每當遇到自己需要「鬆一下」時，他不會找米拉，而會把海洛英蘇西約出來碰面。

「我想跟皮托做一樣的事情，」D. P. 說。「我想要全身乾乾淨淨地出門，乾乾淨淨地回家。我沒辦法想像自己哪天三十歲了，結果還在幹這種破事。」

這種事情，史考特也曾經沒辦法想像過，畢竟他也曾經十九歲過。

在把家具卸下來後，D. P. 跟史考特在門階上喝啤酒。這間瓦德街（Ward Street）上的公寓位於在地人簡稱為「KK」的齊尼齊尼克大道（Kinickinic Avenue）西側。房子的對面有一塊土地閒置，四周是鐵軌，而史考特幾年前租過的舊公寓也距離那兒不遠，當時他還做著護理師的工作，跟學有專精的年輕人、藝術家、文青們在崛起中的灣景一帶比鄰而居。史考特跟D. P. 能從門階的最上層看到聖若撒法教堂的圓頂。一百年前，波蘭裔的在地教友慷慨解囊，傾注了所有的積蓄在這一壯觀的地標上，於是密爾瓦基才有了這座「小一號的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史考特一邊喝著啤酒，一邊開玩笑地說他也要「學神

職人員一樣安貧樂道……偶爾讓我買點吃穿，再來點藥嗨就行了。」

D. P. 靜悄悄的，一個字都沒吭。

「要命，」看 D. P. 沒接話，史考特自己換了個話題，「我脖子跟背都痛得要死。」長期為米拉工作果然還是有被操到。

「你幹嘛不去看醫生？」D. P. 問。

「看醫生幹嘛，他們會有辦法嗎？」史考特說完頓了一拍，好像突然有什麼靈感。「他們可以幫我開波考賽特！不過他們開的量只夠我吃一天就是了。」

所以最後，史考特的凡可汀依然是在拖車公園買的。他想拖車公園裡應該只有一個成年人沒吸（過）毒，那個人就是麥茲太太。史考特本身對毒或藥愛得不得了。嗨起來是他逃避人生恥辱的「小假期」。因此只要付得起，他就會去「度假」。

在潘跟奈德收到驅離通知單，沙發、床、櫃子等大件家具都被擱置而急忙閃人之前，史考特還跟這一對毒鴛鴦在嗨。史考特覺得奈德跟潘算也算自甘墮落吧，所以被驅離也只是剛好而已。在他「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前，史考特可能會比較同情潘跟奈德；但一路走來，他開始覺得同情心是天真的變形，是不痛不癢的中產階級從遠處在表達濫情。「他們有本事悲天憫人，是因為他們的人生海闊天空，」史考特評論的是那些不用住在拖車公園、自詡心態自由開放的覺醒青年。說回奈德跟潘，史考特覺得他們會落得被驅離，就是吸快克造成的，簡單明瞭。海洛英蘇西跟他的看法一致。「說穿了，會弄到被驅離常常是同一個原因，」她說。「連我有一次都差點被驅離，房租被我拿去買了『別的東西』。」

無論走的人是有名的毒蟲也好，不是也罷，拖車公園的住戶都鮮少會對鄰居被驅離有太多意見，

因為他們的觀念是被驅離是罪有應得，是那些人自己不長進。甚至有人會說驅離是好事，因為驅離可以「把人渣清一清」，等於是替園區去蕪存菁。最覺得窮人該死的，往往就是窮人自己。²

在以往，租屋者會自認為是一個「階級」，他們會著眼於共同的利益跟理念而團結起來與房東們對抗。二十世紀初，房客曾經組織起來抗議驅離與不衛生的生活環境。遇到租金說漲就漲，甚至漲太高，房客們會冒著被房東驅離、被警察逮捕、被用錢請來的流氓扁的危險，也要串連起來拒繳租金，並且會在租屋處外圍拉「糾察線」，看有沒有人會偷偷跑去繳房租。這些人並沒有什麼特別極端的背景，他們許多是一般為人母、為人父者，他們只是覺得房東當然有權利享有租金漲幅跟合理利潤，卻不應該任由他們坐地起價，以漲租之名斂財。以紐約為例，租金戰爭在「咆哮的二〇年代」³烽火四起，最後也逼著州議會立法進行了租金管制。時至今日，紐約州仍是全美租金管制最強大的地方。⁴

請願、糾察線、公民不服從——這類政治性的動員必須以對所見所聞的心境轉變作為契機。「要以日復一日的苦難創傷作為土壤，讓社會運動得以萌芽成長，」美國社會學者中的夫妻檔法蘭西絲·福克斯·畢文與理查·克勞瓦的觀察是，「被視為公正而不容質疑的社會體制，必須先衰變，先在民眾的眼裡顯得不公不義而且不再是鐵板一塊。」⁵這樣的非常狀態，最常出現在大時代，因為大規模的社會變遷與經濟上的變動（比方說戰後的住房供不應求），會從根本上撼動社會現狀。但光是目睹不公不義的怪現狀還不足以動員群眾，要把反對者集結起來，而且必須要讓眾人都覺得他們只要團結起來，就有機會改變命運。對於窮人而言，這代表他們必須認同所有的受壓迫者，並且還必須認同自己也是受壓迫的一員——但這點也正好是大部分拖車公園居民絕不願意做的事情。

在罷繳租金的過程中，租屋者們會覺得大家是同志，而同志們之間存在著一份道義。⁶話說當年的租屋者會願意站出來反擊過高的租金與不合理的驅離，是因為他們的切身利益跟住處、社區綁在一起；

換句話說，他們對住處懷抱著一份歸屬感。而將鏡頭拉回拖車公園內，這樣的情操可以說蕩然無存。對大部分的住戶而言，包括史考特在內，拖車公園是他們要逃離的場所，沒有人要在這裡落地生根或改變什麼。有些人明明已經在此處度過大半生，卻依舊以「過客」自居。這當中有一名無業的父親帶著三名孩子過活，他在偷電供應拖車所需之餘說，「我們不會請親友來這裡玩，這兒的生活不代表真正的我們。這裡是社會底層過的日子，而我並不出身於這裡。」曾經嫁給連尼、所以也等於一度嫁給了拖車公園的連尼前妻喜歡對人說，「妳會忘記自己也曾經愛去歌劇院聽戲。」至於在懷孕又吸毒的譚美心目中，拖車公園「就是間旅館」。

對住戶而言，貧困的社區其實是個寶庫。在拖車公園裡，居民會遇見三教九流的人教他們第四台要如何偷牽、知道最值得去的食物廚房何時開放，或知道聯邦救濟金該如何申請。放眼整座城市，就屬住在貧困社區裡的居民最樂於幫忙有帳單急著付、有生活用品不足、有車子壞了不動，乃至於有林林總總問題的鄰居；相對之下，比較「優質」的社區，往往較少對人伸出援手。⁷ 這樣的互通有無，可以讓手心上的人不至於連最基本的物質生活都過不上，也可以讓付出者欣喜於自己發揮了人性本善。

不過這樣的互通有無能夠順利啟動，住民們必須將他們的需求公開，也必須要坦承自己人生中的種種失敗。

拉蕊想跟鄰居借浴室來淋浴，她就不能不先說明自己欠繳瓦斯費。而當她頂著沒吹乾的頭髮走回拖車時，所有人都會知道她剛剛發生了什麼。另外一個案例是一名叫蘿絲的房客，孩子被兒童保護局帶走，就在她哭哭啼啼時，拖車公園的鄰居都坐在她旁邊陪她、安慰她，讓她不會做傻事；但也因為事情的始末大喇喇地攤在眾人眼前，所以蘿絲也會變成某種公審的對象。「這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情，」彤恩這麼告訴她。「但上帝把他們（孩子）帶走一定有祂的理由。」⁸

社區一旦在居民們的眼裡成了剝奪與罪惡的代名詞、成了「各類觸礁人生」的報到處，那他們就會對社區裡的政治能量喪失信心。⁹ 在密爾瓦基，凡是租屋者在社區感受到的「鄰里創傷」氣場愈強——這包括認為他們的鄰居曾經歷經監禁、施虐、成癮與其他重大的打擊——那他們就愈不可能去相信同社區的居民可以團結起來改善生活品質。¹⁰ 這種無法建立社區信心的情形，無關乎鄰里實際上的貧窮與犯罪率，比較是因為住戶感覺到身旁圍繞著濃重的不幸氣息。一旦心酸痛苦推滿了居民的眼，他們就無法意會到自身社區的潛力。

三不五時，托賓會有房客八卦起他這個房東的獲利，要不然就是會給他扣上個猶太人的帽子，罵他貪心。「那台凱迪拉克的輪圈還真亮，但我知道那也是便宜貨而已，花不了兩個錢。」「賺錢就是他的興趣。」但整體而言，房客對不公不義是很能忍耐的。他們會盡可能不去質疑自己跟托賓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也不會問自己花掉收入的大部分為何只能租到老舊的鋁皮拖車。他們會把心思放在具體的瑣事上。聽到威科夫斯基議員說托賓的年收逼近百萬美元，一個在拖車公園裡跟史考特同住一區的房客說，「我還好耶……只要他管好這地方，不要讓我擔心他媽的天花板會塌下來，那我就無所謂。」

在密爾瓦基，大部分的租屋者都寧可相信房東是好人。¹¹ 畢竟有時間去抗議不公平，還不如想辦法把地板上破掉的洞給補起來，免得女兒的腳又陷進去不是嗎？只要房東願意給點寬限，讓他們有時間可以找到生活的停損點，那房東賺多少錢是他的本事，關別人什麼事？在拖車公園裡，永遠沒有最慘，只有更慘；人生的低點在此沒有下限，電梯向下永遠都有空間。之前可能要被集體驅離時，居民們就已經「複習」過一次這種現實慘狀了。如今比克管理公司的人員開始收房租，生活的艱辛更是讓人想忘都忘不掉。¹²

這周真的是禍不單行。首先是弄丟了鑰匙，史考特不得不一拳打穿前窗才進得了家門，然後是他的電沒了，最後是米拉炒他魷魚。米拉不是故意找碴：她另外找到一群毒蟲願意接受二十五美元的日薪，她只是在商言商而已。在匿名戒毒會裡，史考特學過讓毒癮惡化的四大天王是：飢餓、憤怒、寂寞、疲倦，英文簡稱「H A L T」——而這四樣竟在史考特身上合體了。在被米拉開除之後，史考特用上了他僅剩薪水的一部分去朋友家買醉跟嗨一下。在這名朋友家，他打電話回愛荷華給他在鄉下醫院當清潔工的媽媽。在電話裡，史考特跟媽媽說了他酗酒（但沒提吸海洛英），也說了他因為止痛藥癮被吊銷護理師證照的事情。她原本都不知情，因為這是母子倆睽違一年多的首次聊天。

「媽，」史考特哭著說。「對不起，我把自已搞成這樣，是我太沒出息了。」

史考特還沒說夠，他媽媽就打斷了他，她沒意會到兒子是耗盡了所有勇氣（外加十二罐啤酒的酒精），才按全部的電話號碼，而非像平常一樣按到一半時就掛掉。她解釋說自己現在正在滿載著親戚的廂型車裡，所以暫時不方便講話。她跟親戚一行人是要去密蘇里州的布蘭森（Branson, Missouri）度周末。「但是史考特，」她說，「別忘了只要你願意，隨時都可以回來喔。」

史考特考慮過媽媽的好意，但他現在既沒有車可開，又沒有錢買火車票，是要怎麼回去呢？而且若真的回到愛荷華，海洛英要去哪裡買？毒癮只要一天的時間就會發作，然後痛苦會慢慢遍布全身。此外回老家還有另一個問題是得面對別人同情的眼光。史考特想到這一點，是在他掛上電話後去逛超市時。他答應了海洛英蘇西要用食物券買午餐給她，來交換讓他抽一口海洛英。「我是說，要回家也不是不行，但我他媽的都四十歲了……難道要我現在回去跟大家說，你知道，我把人生搞得一塌糊塗，把自己的前途都毀了嗎？」史考特從來沒有跟家裡人開口尋求幫忙。他在腦海裡把親戚們的草坪、工作、孩子、還有那些屬於正常人的問題都想過一遍，然後下了一個結論是：「他們根本不知道要從何幫起吧……最好

是可以期待他們。」中產階級的親戚遇到這樣的問題，作用其實不高。

史考特加入結帳的人龍，並且注意到前面有個男人要買諾比舒咳。

「你感冒了？」史考特問。

「嗯，對啊，」這位先生說。「而且好像都好不了。」語畢還繼續咳，好像是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似的。

「來，」史考特說。他掏出筆，在一張廢紙上寫下了：維他命 C、鋅，跟紫錐花萃取物（可用於治療感冒）。「我會建議這樣，你試試看，」史考特說。

史考特放棄了回愛荷華的念頭，他決定去戒毒。在他要去出發去入院的那個早上，史考特天未亮就起床，修了鬍鬚，將 T 恤塞在褲子裡。他想要離開這樣的生活，他的心情緊張但也不再猶疑。

早上七點史考特踏出電梯，距離診所開門還有一個小時，但他發現自己已經遲了，現場有十五個人在排隊。這當中有不只一位年長的黑人盛裝跑來；有名嘴巴不乾淨的白人女性，五十多歲了還穿著牛仔靴；一對年輕的墨西哥男子跪坐在地上用西班牙文禱告；一名二十來歲的黑人男性的褲子掉了；一個眉頭深鎖、心事重重的白人少女撥開遮住眼睛的瀏海，袖子長過她的雙手。史考特往牆上一靠，加入人龍。排了幾分鐘之後，電梯門又開了，這次走出來的是一名墨西哥裔的老女人。她有一頭幾乎全黑的長髮，只在中間有一道灰色。她的腳上打著石膏，視線從厚重的眼鏡上方望出來，那是雙有如洪水般混濁的眼睛。她在史考特身旁找塊地方，百無聊賴地坐下來。

這位女士告訴史考特說她昨天就來過了，但診所昨天只收了四個人。社工開始在玻璃窗後的桌前就位時，她又發表了評論，「他們在打電話給密爾瓦基郡，看那邊說今天有幾個人的額度。」

「額度？什麼額度？」史考特問得有點不耐煩。

「給你的額度啊，你來這是要接受治療的，不是嗎？」

史考特抬頭看著天花板上的螢光燈，緩緩地，刻意地吸了口氣。說什麼他也要忍下來。「是。」

「你看那個女生，」這女人用身體示意著前面那名陰鬱的白人少女。「她看起來一副快要想不開的模樣，所以我猜他們會把她收下來。你的話可能要睡在這裡才排得到。」

史考特開始點腳。

時間來到上午八點十分，一名戴著金色耳環、身穿絲質上衣的女子來開門，然後宣布說今天能收的人數是五名。這時換成一名男子拿著手寫板現身。「一號、二號，」他開始數起人頭。排隊的人紛紛站起來。史考特朝電梯走去，按鈕準備下樓。隔天他原本是可以重排的，但他選擇連灌了三天的酒。

註釋

- 1 John Gurda, *The Making of Milwaukee*, 3rd ed. (Milwauke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999]), 174.
- 2 在我的經驗裡，弱勢社區的特色是不太有「抗爭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的存在，反倒是明顯缺少了這樣一種文化。
- 3 譯註：Roaring Twenties。在西歐與北美，戰後的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九年間稱得上是波瀾壯闊的十年，兩地在經濟、社會、藝術與文化的陣線上都累積了長足而令人驚豔的發展，都會區尤其開始脫胎換骨。法國的第三共和把這段時間稱為瘋狂的十年，強調的正是這人類文明在這十年間的活力。內燃機汽車、電話、電影、廣播、電器、航空業等都從此時開始普及。
- 4 Robert Fogelson, *The Great Rent Wars: New York, 1917-192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85.

- 86.
- 5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1979), 12, 4.
- 6 Fogelson, *Great Rent Wars*, 88.
- 7 我將負二項迴歸模型套用在《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的完整樣本裡，因而有了這項發現。為了測量「社區支持」的強度，我讓受訪者回答他們是否曾經幫助過現居社區裡的某人完成下列的事情：(a)付帳單或買生活雜貨、(d)找到工作、(c)修房子或修車、(d)給予情感支持，或(e)幫忙照顧小孩。至於「鄰里劣勢」的測量，我則用上了內含中位數家庭所得、暴力犯罪率與低於貧窮線家庭比例、十八歲以下人口、未具高中學歷居民比例、接受政府補助之居民比例、空屋率等多重因素計算的量表。我在與安衛華(Wei-hua An)聯名的一份報告中提到，鄰里劣勢與社區支持間存在正相關，且不受所得、教育程度、居住流動性、種族、年齡、性別、就業狀態與人脈組成等因素影響。弱勢社區的居民即便與屋主有密切關係，或具備大學學歷，他們願意與鄰居守望相助的程度也不會跟少了這些關係(或教育背景)的人有什麼差別。這顯示鄰居間交換禮物的情形在弱勢鄰里中相當普遍，這一點相對不受居民的人脈影響。參見 Matthew Desmond and Weihua An, "Neighborhood and Network Disadvantage among Urban Renters," *Sociological Science* 2 (2015): 329-50.
- 8 原生自貧困鄰里的支持體系有助於居民填飽肚皮跟因應變局，但這些體系也會讓窮人暴露在重度的創傷體驗與偶發的暴力當中。Bruce Western, "Lifetimes of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Released Prisoners," *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尚未但即將出版。
- 9 Harvey Zorbaugh, *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cago's Near North Si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70.
- 10 我將定序邏輯迴歸模型(order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套用在《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的完整樣本裡，因而有了這項發現。結果變數(outcome variable)是政治能量(political capacity)。受訪者被問到，「社區居民組織起來，聯手改善社區環境跟生活品質的機率高低？」選項則包括：完全不可能、有點可能、還算可能、相當可能、非常可能。主要用作解釋變數(explanatory variable)的是居民主觀感知到的「鄰里創傷」

(neighborhood trauma)。受訪者被問到，「在居住在本社區的這段期間，你是否曾有鄰居曾經(a)被驅離、(b)入監服刑、(c)於交往關係中受虐、(d)毒品或藥品成癮、(e)未成年兒女遭到社會服務單位帶走安置、(f)有親近的親友遭謀害身亡？」接著我將所有的答覆進行了結算。完整的模型紀錄顯示，在排除政治參與經驗、鄰里居住時間、鄰里貧窮程度暨犯罪率外加若干人口學因子等綜合考量後，政治能量與主觀的鄰里創傷間仍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參見 Matthew Desmond and Adam Travis, "Perceived Neighborhood Trauma and Political Capaci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2015. 關於社會秩序的好壞，主觀感受為何比客觀上的實情更重要，參見 Lincoln Quillian and Devah Pager, "Black Neighbors, Higher Crime? The Role of Racial Stereotypes in Evaluations of Neighborhood Cri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 (2001): 717-67;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在《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進行的過程當中，受訪者被問到，「你會用哪兩個字來形容你的房東？」兩名分開獨立作業的程式設計人員會給受訪者回答的兩個字各賦予一個值，最低是一分，最高是十分。像「貧民窟的土霸王」(slumlord) 與「混蛋、混帳東西」(asshole) 這類的字眼會只給一分，而像「非常好，無可挑剔」(excellent)、「很有愛心」(loving) 這樣的讚美就可以拿到十分。如果是比較間接或隱晦的批評或誇獎，則取中間值當分數。程式設計人員所給出的分數會經計算得出平均，然後產生整體的評價。根據這樣得出的排行，密爾瓦基典型的租屋者會擁有一位「六分」的房東。居住支出負擔處於極端值的房客並不會因此特別討厭或喜歡房東，但房子住起來問題多多的房客確實會以較為負面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房東。

房客確實知道在拖車公園有閉園危機時該團結起來，畢竟這是他們的「非常時期／關鍵時刻」(extraordinary moment)。問題是風頭一過，園區裡的狀況就又回歸正常。大夥兒又開始租房東予取予求(租金)、又開始得過且過(屋況)，又開始無視驅離事件中可能隱含的政治論述(與政治能量)。他們怨的不是房東，反而是議員。有一度他們確實針對某事一起寫了請願書，但這份請願的訴求是要求某位被視為「抓耙仔」與麻煩製造者的女人搬走。「我們希望車位編號 S12 的裘依(Joy) 可以從拖車公園予以驅離，以免日後衍生更大的事端……」請願書裡這麼寫著。「我們覺得要澈底解決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趕在有人私自出手前請她走人，我們真的覺得事情沒必要搞到那種地步。」這份後來被稱為〈裘依問題請願書〉(Petition Against Joy) 的文件獲得了四十名房客簽名。

第十五章

妨害設施

克利絲朵跟阿琳吵完架的隔天，特瑞莎在克里斯隨昆汀出去工作後來到樓下。特瑞莎喜歡克利絲朵。比起阿琳，克利絲朵不但年輕很多，而且也比阿琳傻氣得多。那天早上，這兩名女人在一起鬼混打發時間，玩起了 partycake、也就是美國女孩子之間一邊拍手、一邊「念歌」的遊戲，這天她們唱的是：

討厭鬼，討厭鬼，討厭鬼

墨西哥是什麼鬼

我不想回，不想回，不想回

有名大隻佬警察跑來我家門口

趕不走，趕不走，趕不走

他抓起我的衣領來

要我給他個銅板

墨西哥是什麼鬼

我不想回，不想回，不想回

阿琳在一旁臭臉看著。她瀏覽一則則公寓廣告，並且在某個最上頭用粗體字寫著「房子」的記事本上做筆記。如今她後悔沒有在開完庭之後無縫接軌前往收容所；但話說回來，她也真的討厭收容所，尤其不喜歡住進那裡的人。抓起資料，阿琳向克利絲朵點點頭，出門找起新家。

在返回第十三街之前，阿琳一共走訪了二十四個點。其實這有點亂槍打鳥，但她依舊士氣高昂。「只要我堅持不懈，一定找得到房子，」她給自己打氣。同時她也以為舍蓮娜撤銷了驅離申請，但關於這點她想太多了。

阿琳回來的時候，公寓裡一片寂靜，只見克利絲朵在煩惱著某樣事情。克里斯下班之後，特瑞莎也就回到樓上去陪他。之後克利絲朵聽到克里斯對特瑞莎大小聲，他氣的是克利絲朵抽了他的菸，又喝了他的啤酒。此外克利絲朵也聽到了其他可疑的聲音。

「樓上在打女人，」克利絲朵對阿琳說。

「別人的閒事少管，起碼我沒空管，」阿琳這麼回答。她經痛得很嚴重，只想躺著休息一下。「他搬來的時候我就有預感會變成現在這樣。」但無論是出於理性或感性，阿琳都沒有多餘的心思去管特瑞莎的事。她自己的問題就已經烏煙瘴氣了。」

入夜之後，天花板的另一端接連傳來更多聲響。頓挫聲穿插著音量大到無法充耳不聞的撞擊聲，聽得出是特瑞莎重重摔到地上。阿琳拿枕頭把自己悶起來，但克利絲朵完全被影響到了。「我沒辦法眼睜睜看著男人打女人，」她說。她想做點什麼，想幫特瑞莎，但她同時也忍不住對如此軟弱的特瑞莎感到反感。她覺得特瑞莎很可憐，也很可悲。「男人這樣打妳，妳還讓他進門，不就代表妳犯賤嗎？」克利絲朵

不禁這麼想。到某個點上，她實在聽不下去了。於是走樓梯上二樓，隔著鎖住的門高喊，「我要插瞎妳的眼睛，妳這個膽小又沒用的賤貨！還有克里斯你也給我聽好，有種你來打老娘啊，你試試看！」² 阿琳得用拉的才能把克利絲朵給拉回一樓。

克利絲朵打電話給舍蓮娜，但舍蓮娜沒有回應。接著她撥了「九一一」。在連打三通電話後，警察終於上門，帶走了動手的克里斯。警察收隊後，阿琳望向克利絲朵。「妳是真的很想搞到自己沒地方住喔，」阿琳這麼說。

隔天警方用電話聯絡了舍蓮娜。打來的是一名警官，而且是女性警官。她的口氣聽來十分嚴厲，但舍蓮娜也不是省油的燈，這種事她早就經歷過了。去年她就曾經收到密爾瓦基市警察局寄的信，內容跟她後來租給阿琳的公寓有關。「根據密爾瓦基市自治條例第八十款之十的規定，」這封公文開門見山地寫著，「本人（承辦人）特此函通知您，密爾瓦基市警察局受理了發生於您財產上的妨害行為……三十天內累計已達三件。」信中接著詳列了接獲報案的是哪些妨害行為，當中包括某場鬥毆、外加有名女性遭到刮鬍刀片割傷。接下來，這封公函又告知舍蓮娜在她的資產上，若再發生「關於信中所列的任一違規情事，未來執法所衍生的成本將向您索討費用。」市府一項項列出了警方大大小小的服務價目表，其中打九一一報案的要價是四美元一通，並要求舍蓮娜必須以書面回覆要以何種方案來「減少名下物業上發生的妨害行為」。萬一妨害行為還是不斷發生，市警局公文的結論是舍蓮娜將被處以一千至五千美元不等的罰鍰或遭到羈押。

依照要求，舍蓮娜回信給密爾瓦基警局，並在信中解釋說那些九一一報案電話是因為有人家暴，「這些問題如果無法改善，」她寫道，「我會請當事人搬離。」管區的男性主管在看了舍蓮娜的回函後，拿筆在請字下面標了橫線，又在線下方的留白處打了個問號。「無法接受，」他快筆在紙上寫下意見。

在得知改善計畫遭駁回之後，舍蓮娜拿訂書機釘了張驅離通知單在她給警方的第二封回函上。管區主管對此回信，「本函主旨為通知台端，您的書面行動方案已獲警方認可。」

這一次因為克利絲朵，第十三街的公寓又恢復了「妨害設施」的身分，而且是樓上樓下都有問題。克利絲朵的九一一電話大多是替特瑞莎打的，但也有一回是因為她跟阿琳吵得不可開交。電話上的女警官質問舍蓮娜，為什麼她的前任房客跟現任房客會住在一起，而舍蓮娜也交代了克利絲朵跟阿琳的前因後果。女警官再問到舍蓮娜為何坐視這樣的情形繼續，她回答說她覺得阿琳很可憐。「她們兩個窮到連個尿壺都沒有，」舍蓮娜說，「當然連可以把尿壺扔出去的窗戶也沒有。」³

女警噗哧笑了出來。

「她不對的地方是當起二房東，」舍蓮娜說。「妳知道的，克利絲朵搞不清楚狀況。家是她的，但房子是我的。」

這通電話讓舍蓮娜覺得很沒面子。「我本來還期望能跟他們這些沒水準的人合作，」她掛上電話後說。她原本覺得「睜隻眼閉隻眼讓阿琳留著」沒什麼大不了，誰知道現在連警察都扯進來了。女警官建議舍蓮娜把新舊房客都趕一趕，而舍蓮娜決定先對阿琳開刀。她撥電話給阿琳，透過話筒對阿琳拉高嗓門，「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我受夠了，」舍蓮娜說，「去妳媽的我真的受夠了……現在是妳欠我錢耶，怎麼搞到好像這裡妳才是老大，凡事都要聽妳的。妳的小孩沒東西吃，是誰去教會搬了一大箱食物、牛奶跟有的沒的給他們？妳剛來的時候，是誰自掏腰包也沒跟妳收錢？而且妳知道嗎——喂？喂？」

警方在周六打給舍蓮娜，而舍蓮娜叫阿琳周一前就滾。周日早上，阿琳在清潔地毯，特瑞莎在旁邊看。廚房流理台上的煎鍋裡還卡著玉米麵包⁴，顏色從邊緣的棕色過渡到中間海綿般的黃色。前一天晚

上，阿琳還做了馬芬蛋糕，煮了斑豆跟帶骨豬頸，然後她的幾名兄弟跑來吃飯、抽菸，又去樓上的特瑞莎家打黑桃王。他們另外喝了酒，但知道不要招呼阿琳。阿琳幾乎滴酒不沾，她不喜歡那種感覺。「我最討厭密爾瓦基的一點，」阿琳說起另外一件她不喜歡的東西，「就是房租有夠貴。」

「貴翻了好嗎！」關鍵字戳中了特瑞莎的痛處，她為此嘖了一聲。「我住樓上，也才一房，也好意思收我一個月四百五十元？」

因為克利絲朵跟喬瑞去了教堂，所以屋子裡頓時顯得安靜。喬瑞是跟他生父一起去的。賈法瑞坐在地上一聲不吭，注意力都在著色畫上。阿琳估算著自己還剩多少時間。如果舍蓮娜隔天拿出財產返還令狀，「那在治安官來之前，我還有五天可以把東西搬走。」

特瑞莎點點頭。

阿琳在桌前坐下來，一邊看著賈法瑞，一邊跟特瑞莎說話。「我們這段時間有房子住，所以我沒怎麼去想搬家的事，也沒怎麼想小孩要轉學去哪的事，這些事情我全都沒有想。可是現在哭也沒用啦，」她邊說邊振作起來。「我看我還是把眼淚擦一擦，去做該做的事。」

阿琳打電話給舍蓮娜，最後卻欲言又止，原本想說的字字句句都卡在喉嚨裡。不過她最後還是擠出了一點聲音，問舍蓮娜能不能讓自己留到周四。舍蓮娜拒絕，為此阿琳發出了不平之鳴，「搞出這飛機的是克利絲朵！除了克里斯打特瑞莎的事情以外，又沒有因為別的事情打電話給警察，整妳的是克利絲朵好嘛！」

在二十世紀尾聲的幾十年當中，司法體系採行了一整組略嫌粗暴的政策，讓警力膨脹，讓受刑人數爆炸；但同時間維護治安的責任愈來愈多落到了老百姓頭上。⁵把槍賣出去的當舖呢？槍流到外頭殺死

了人，老闆都沒有一點責任嗎？「遠距遙控」的房東有在過濾他的房客嗎？有如藏鏡人一般的房東，在毒窟的誕生中沒扮演一點角色嗎？警方跟法院的看法都愈來愈傾向於「當然有」。⁶ 而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房屋妨害條例問世了。有了這個條例，警方可以為了房客的行為依法處罰房東。⁷ 某處房產會被歸類為妨害設施，多半都是因為在一定時間內出現異常數量的報案電話。以密爾瓦基為例，房產被列為妨害設施的「門檻」是三十天內出現三通或以上的九一一電話。相關的法令迫使屋主「改善妨害行為」，否則等著被罰（錢）、撤銷租賃執照、查封房屋，或甚至有可能關進牢裡。支持者主張這些新法有助於警察部門將人力投入更優先需要處理的犯罪案件上，他們認為這樣不但是幫納稅人省錢，同時也省下了寶貴的警力資源。

在二〇〇八與二〇〇九年，密爾瓦基警局的做法是，每三十三小時開出一張妨害設施的告發單給房屋所有權人。⁸ 其中最常見的妨害行為是「人際糾紛」，這是個包山包海的分類項目，適用於五花八門的事件，當中包括有人拒絕離開住處而相持不下、或者發生嚴重口角。這之後排名第二的是居家噪音，排名第三的則是家庭暴力。事實上家暴的件數（大部分是拳打腳踢或使用某種武器），比各式各樣的傷害、妨害安寧與毒品相關犯罪加起來都多。曾經有一個案例中有名女子被用漂白水往臉上潑，另外還有一名女性「被用食物罐頭砸頭」。兩件案子皆牽涉到孕婦遭暴力相向，而且包括美工刀、一般的刀子、槍等，都被施暴者用上。另外一起案件是「報案人在電話那頭說她男朋友剛用打火機的液體潑她，還找了張紙點火。」

大部分的妨害（活動）告發單都是寄到密爾瓦基北部的地址。在白人的社區裡，每四十一處符合開單標準的房產，只有一處真的會收到告發單。但換到黑人社區，每十六處可開單的房產，就會有一處真的被開單。住在舊城區的女性若報案說遭到家暴，其房東收到告發單的機率就更高了。⁹

在絕大多數（百分之八十三）的案件裡，房東接獲告發單的反應不是驅離房客、就是威脅再接到警察來電就要驅離他們。有時候這意味著男女雙方會一起遭到驅離，但多數時候房東只會驅離遭施虐的女方，因為男方反正也沒跟女性同住。¹⁰

有一名房東去函密爾瓦基警局說，「這只是我其中一間公寓裡的某位女孩子跟她男朋友出問題。多年來她都是我的好房客，是後來交了男朋友才有這些狀況。但我估計事情也好不了，所以隨函附上我今天送出（給她）的租約中止通知副本。」另外一名房東則寫說，「我跟她（房客）討論過收到的報告書……她的男朋友威脅要傷害她的人身安全，所以才會有（九一一的）報案電話打去。我們達成的協議是她男朋友不得進入公寓，而萬一這男人跑回來造成房屋損害，將由她全權負責，同時我也會將她驅離。」再一名房東寫下了，「開門見山，我們決定驅離席拉·M，也就是那名數次報警求助的女士。她的『男人』跑來毆打她，踹了門，然後被羈押了一、兩天（逮捕完就放人的話效果不大）。我們建議席拉去買把槍，然後以正當防衛的方式將這男人擊斃，但很顯然她沒有接受我們的建議，所以我們也只好將她驅離。」

上述三名房東從密爾瓦基警局收到的都是同樣形式的回函，行文都是：「本函主旨為通知台端，您的書面行動方案已獲警方認可。」¹¹

警方打電話給舍蓮娜的同一年，威斯康辛州每周平均超過一人死於（現任或前任）交往對象或親戚之手。¹² 在這樣的統計數據曝光之後，密爾瓦基的警察局長接受地方電視台訪問時顯得一頭霧水，他納悶受害者怎麼都不向警方求援，而且是一次都沒有。一名夜間新聞記者這麼總結了局長的觀點：「他認為若聯繫警方的頻率再高一點，那受害者就可以獲得援助來避免日後遭遇致命的危險。」但我們的局長有所不知，或者根本是在裝傻，他手下單位那不成文的內規，正是造成受虐女性進退兩難的主因：沉默

以對會被渣男打，報了案卻又會失去家。¹³ 如此一來遭施暴的女性找警察，根本就像「請鬼拿藥單」。

克利絲朵開門衝進來，一陣寒風也隨之灌進室內，全屋的人都抖了一下。上教會花了克利絲朵不少力氣，她餓到「前胸貼後背」。她給自己倒了碗克朗齊船長（Cap'n Crunch）早餐脆片，然後一屁股癱坐在雙人沙發上。這時她身上還穿著黑金雙色的絲質上衣、過膝的長裙，外加一條紅色的頭巾。克利絲朵在回家的公車上回了舍蓮娜電話，所以她知道阿琳的狀況。舍蓮娜已經願意稍微讓步了。阿琳現在可以待到周四，前提是克利絲朵同意搬進舍蓮娜名下的另外一處房產。如果克利絲朵說不，那阿琳隔天就得走人。

麥片統統下肚之後，克利絲朵依舊很餓。她拿了些阿琳的餅乾到烤箱去烤。「親愛的，你要不要也來一點？」她這麼問了小賈法瑞。

「他不吃那玩意兒啦，」阿琳冒出這麼一句。

「妳別把氣出在我身上好嗎？要兇你去兇舍蓮娜。」

「舍蓮娜讓我火大，妳也讓我火大！」

「房東太太怎麼說，我管得了嗎！」克利絲朵態度突然軟化。「我跟你們說可以待到二月啊，怎麼說你們也付了我住到那時的錢。但舍蓮娜……說你們非走不可。這件事又不是『我說了算』，畢竟我不打算因為誰給了我一百五十元就準備去睡馬路。」克利絲朵深吸口氣，然後繼續。「我不打算生氣，也不打算煩惱、失落，也不會打電話給我媽說我不開心，因為我現在心情平靜。這份平靜我想要保持下去。」

「妳平靜？那就不好棒棒，但妳平靜的代價是我跟我兒子要滾蛋。」

克利絲朵咬起嘴唇，看向天花板。

「我可以明天就走，沒差啦！但妳從冰箱哪兒拿我的餅乾，就最好給我放回那兒去。」阿琳氣到用吼的。

克利絲朵搖搖頭，撥電話給舍蓮娜。「妳說妳希望阿琳哪天走？……周一嗎？妳不是說周一嗎？」

阿琳開始在屋子裡走來走去，外加自言自語。「躺著也中槍，我真的超不爽的……這真的太誇張了，我跟上帝發誓，我真的沒遇過這麼瞎的事！」

「我打電話報警不對嗎？」克利絲朵繼續跟舍蓮娜講電話。「克里斯他們在樓上吵得要死，他擺明了就是在揍那個女孩子。」

阿琳跟克利絲朵要電話，但克利絲朵不理她。

阿琳氣到發抖。「妳聽著！我的小孩現在沒有家了！我們沒地方去也沒有錢……我該死，我的小孩也該死。我們都該死就對了！超該死！」

克利絲朵頭一回見識到失控成這樣的阿琳。於是把電話遞過去。

「我的意思是，」阿琳對舍蓮娜說，「他們可以就這樣把我跟孩子扔到外頭喔！我現在明明就拿出錢來了，但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接到警察電話之前，我們在這裡不也待得好好的……我只能說我很謝謝妳幫我跟孩子做了這麼多。周四之前我跟孩子一定會搬走，這我跟妳保證，其他的我沒辦法再給妳什麼！」

阿琳聽了幾秒鐘的回話，接著舍蓮娜話講還沒講完，她就按掉電話。「我覺得我們被利用了。我跟孩子被利用了！」她看向克利絲朵，那天感覺帶著老靈魂、異常冷靜的克利絲朵。「我覺得很無力，」阿琳道歉。「我不應該拿妳出氣的，我剛剛氣瘋了……明明是我的生活，卻都是別人在做決定。」她雙手一攤。

「我知道妳的心情，因為我家裡也是……妳的那些問題，沒有人能幫妳，能幫妳的只有上帝。」

「但我就是沒辦法相信別人，我怎樣都無法相信別人，」阿琳坐了下來。

「妳不應該這樣講，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跑來害妳。」

「但事實上就是每個人都害我啊……妳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妳不知道我經歷過的那些！妳不知道被自己的爸爸毛手毛腳、然後妳媽媽澈底不管是什麼感受！」阿琳說的是那個從她十歲騷擾到十六歲的牧師繼父。

「喔，不不不，我懂，」克利絲朵說。「我懂，我完全懂！因為我還是小女生的時候就被繼父騷擾過，我被送去寄養家庭安置，就是因為這件事。我對上帝發誓，妳經歷過的事情我真的懂！我願意對上帝發誓！」

阿琳把這話聽進了心裡。喬瑞已經帶著賈法瑞進到母子三人的房間，轉開音樂。音樂聲流洩在客廳裡，而客廳現在有兩名一聲不吭、但一瞬間能相互諒解的女人。她們都稍微體會到了彼此的苦。兩名男孩子坐在床墊上跟喵星人小不點玩。阿琳低下頭說，「我不想再受傷害了。」

「可是，妳聽我說，」克利絲朵說，「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參加教會大概一個月的時候吧，聖靈就進入我身上，然後我跟上帝說，『我不想再受傷了，我不想再掉眼淚了，我不想再這麼苦了，我不想再有人傷害我了。』……但這些都是為了造就妳，造就妳這個人。因為像我被傷害、被謊言欺騙、被說閒話、被虐待，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被送去安置，沒有媽媽在身邊，沒有爸爸，兄弟姐妹不管我，阿姨們不管我，叔叔伯伯也不管我，但這些都造就了現在的我……妳要我愛妳可以，但妳不相信我的話，叫我怎麼愛妳？叫我怎麼安慰妳？妳把心關起來，那就沒人有辦法幫妳。妳被侵犯過？我也被侵犯過……十歲的時候我忽然有個印象，我才想起自己五歲時被摸過。我看了看我媽，結果我媽繼續吸她的毒，也還

繼續跟著那個男人……她習慣用菸斗抽快克，而且肚子裡還懷著我。我爸會打我媽，然後我媽後來背上被人刺了十一刀。也是經過這一切，我才知道自己這一生有上帝交付的任務；但那也要我願意才行，不然祂也是無能為力，不是嗎？……教會真的很棒。去那兒我可以看到、感受到上帝的聖靈。我知道聖靈在那個瞬間進到了教會，因為當下真的會有煙。有人會覺得我瘋了，怎麼會相信有這種事情；但，我要說，這就是代表我相信上帝啊……比起我媽，我的牧師更把我當女兒看待。完全不誇張。我不敢說妳對這件事會有什麼感覺，畢竟妳媽媽不在身邊，但我可以說……每個人活著都會經歷很多，而妳未來也還會繼續經歷。妳現在的處境，要塑造妳、造就妳……我這個夏天都在經歷我的部分，當時我覺得我身邊完全沒有人，我差一點就要去吸快克了。但我禱告著，用我牧師兩年前為我禱告的話語禱告，然後我堅信這些話，得到了依靠。而且我根本沒跟牧師提過我媽媽吸快克的事情，是牧師自己過來，把她的手放到我身上說，『妳有個吸快克的媽媽，但妳決不會吸快克。』當下我就哭了。」

克利絲朵吐出的最後一個字在空氣中迴盪著，慢慢消逝在電視發出的噪音當中。阿琳坐著，整个人呆掉了，是電話響了才把她拉回來。電話另一頭，朋友找她，跟她說有間公寓不錯。「房東有要求身家調查那些嗎？」

「妳過來，」克利絲朵對講完電話的阿琳說。阿琳很聽話地湊過去，克利絲朵抱住她。「那兒的房租一個月多少？」

「糟糕，我忘了問。」阿琳打回去，問到了月租是六百美元，然後就掛了電話。「不行，」阿琳指的是價格。

克利絲朵出了門，她要去看舍蓮娜要她搬去的那間公寓長什麼模樣。「別擔心，」她這麼跟阿琳講。「別的我沒辦法保證，但這回一定沒事的，妳聽我的就是了。」

- 1 心理學家已經證實自我保存 (self-preservation) 與同理心一旦狹路相逢而產生矛盾，勝出的永遠是自我保護的生存本能，同理心只有認輸的份。參見 Keith Campbell et al., "Responding to Major Threats to Self-Esteem: A Preliminary, Narrative Study of Ego-Shock,"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2 (2005): 79-96.
- 2 克利絲朵說的是「點你的眼睛」(dot your eyes)，意思是「讓兩眼黑青」或「插瞎你的眼睛」：「Scary」一般是「害怕」的意思，這裡的用法是在說人「膽小，怯懦」。
- 3 譯註：連尿壺跟窗戶都沒有，是英文俚語裡用來形容人一窮二白的說法。
- 4 譯註：Cornbread，美國非常家常的庶民主食，原料是玉米麵粉，美國媽媽多半會用平底鍋煎。
- 5 在二十世紀的流變中，隨著美國的現代化與其警力成長，公民會接獲的指示就是不得在現場逗留且必須要退出到黃色的封鎖線外，由政府來追訴並懲戒行為人。但一九六〇年代，反戰的示威群眾會被制式的警棍打到頭破血流，公民會以高分貝抗議少數族裔社區中的警察暴力，根深蒂固的貪污腐敗會傳遍鄉里，洛杉磯的瓦茲區 (Watts) 會因為暴動而陷入火海，暴力犯罪節節升高。面對接踵而來的社會變遷，美國民眾慢慢開始對刑法的司法體系感到疏離，至於一九七四年發生的事情則算是「最後一擊」，那一年，勞勃·馬丁森 (Robert Martinson) 檢視了兩百三十一筆相關研究，並在《公眾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 期刊上發表了以下的結論：「排除少數個別的特例，見諸於資料的教化／矯正努力都未能使再犯率顯著降低。」「怎麼弄都沒用，」為政者與犯罪學學者只有嘆息的份。感覺權威被打折的司法體系開始反應過度並有點精神分裂，它們一方面賦予警方更大的權力與更多的資源，同時卻又引進了不具司法警察身分的行為人來參與犯罪控制的事業。關於由第三方來維持治安 (third-party policing) 的興起與特性，參見 Matthew Desmond and Nicol Valdez, "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 Consequences of Third Party Policing on Inner-City Wom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 (2013): 117-41; 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Lorraine Mazerolle and Janet Ransley, *Third Party Polic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6 Reinier Kraakman, "Gatekeepers: The Anatomy of a Third-Party Enforcement Strateg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 (1986): 53-104.
- 7 Desmond and Valdez, "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 Table S1. Mazerolle and Ransley, *Third Party Policing*.
- 8 妨害條例還曾經被捧成是反毒戰爭的一大利器。但在二〇〇八到二〇〇九年間，所有告發單中列載的一千六百六十六筆妨害活動裡，僅百分之四涉及毒品相關犯罪。關於導出這些數據的方法論，參見 Desmond and Valdez, "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 122-25.
- 9 在此，「黑人／白人社區」指的是人口普查區塊團體中至少三分之二居民是黑人／白人者。而這裡說「符合開單標準」指的是三十天內曾接獲三通或以上的報案地點。多數的妨害活動告發單都是發到黑人社區的地址，其原因並非黑人社區的犯罪橫行，單純只是因為那兒的人「比較黑」。即便排除了犯罪率，九一一的報案件數，社區的貧窮率跟其他相關的因素來評估，黑白社區間被開單的頻率差距也仍舊存在。你可以想像一下有兩名女子同時打電話報警說被家暴，其中一個住在黑人占八成的社區，一個住在黑人只占兩成的白人社區。第一名女子的房東被開單的機率，活脫脫比第二名房東機率高三點五倍以上，這一點就算排除打家暴報案電話的盛行率與不同社區的家暴率，也不會因此改變。Desmond and Valdez, "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
- 10 這項分析可能會讓人質疑起近期的家暴案件減少，究竟應該歸功於家暴罪刑化的範圍變大，還是應該「歸功」於房屋妨害條例的普及造成大家視而不見，因而導致報案量減少。參見 Cari Fals, "Denying Access to Justice: The Cost of Applying Chronic Nuisance Laws to Domestic Violence," *Columbia Law Review* 108 (2008): 1181-225.
- 11 還有些房東在收到告發單後的反應是叫房客不要老愛打九一一報案。這當中有些房東會叫房客遇到事情不要報警，而要直接打給房東。一名經營供「身心障礙人士」居住的房東貼過這樣的告示在其名下建物四周：「請勿打電九一一報案／您可能因為撥打非緊急電話／而遭到警方罰款／有類似需要請撥 [414-##-####] / 找一位童恩 (Dawn) 先生為您服務。」其他還有房東會用驅離或罰款來威脅房客，不准他們繼續打電話報警。在收到告發單之後，一名房東寄信給所有房客：「房客中若有去電密爾瓦基市警局投訴妨害行為，或是濫用九一一緊急報案電話者，一概罰款……每通五十美元。」
- 12 Wisconsin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Wisconsin Domestic Violence Homicide Report: 2009*

(Milwaukee: Wisconsin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September 2010).

密爾瓦基於二〇一一年修正了該市的自治條例，時間點大概就在我跟警察部門、市府法務部門律師與住房法相關律師分享我的研究發現後不久。現在告發單上會特別強調「妨害行為」的範圍不包含家庭環境中的虐待、性攻擊或跟蹤狂等狀況（編註：作者是希望藉此房東能勇於舉報家暴，或者不會因為房客打九一一電話就將之驅離）。踏出這一步之後，密爾瓦基加入了芝加哥、麥迪遜（威斯康辛州）、菲利普斯堡（Phillipsburg，紐澤西州）與東羅徹斯特村（Village of East Rochester，紐約州）等大小城市的行列，正式在房屋妨害條例中禁止以重複家暴報案為由來發出告發單。但這些地區是少數，是例外。而且光是把家暴報案從妨害行為的名單上「下架」，就足以保障受虐婦女不被法律玩弄嗎？答案幾乎可以肯定是「不可能」，而悲觀的理由有兩個。

首先，家暴案件經常會在警方欠缺細節與脈絡的分類中被隱藏起來。往往分明是家暴，但你在資料中會看到的是「財產損失」（Property Damage）——其實是前男友把門給踹到脫落；或者寫「持有刀械」（Subject with Weapon）——其實是丈夫用兩支美工刀劃傷了太太。家暴、性攻擊與跟蹤狂並沒有辦法被屏除在密爾瓦基原始的妨害行為清單外，是因為這些項目雖然沒有被納入其中，但密爾瓦基的自治法規仍將像人身攻擊（battery）、騷擾與誤用緊急報案電話等情事列在其共計三十二項法律容許告發的妨害事件裡，因此這些分類中仍可能藏有居家環境中的犯罪（家暴）。

密爾瓦基市想用這種「省事」的做法來補破網，但恐怕效果不彰的第二個原因是「寄望房東會舉報家暴行為」。理論上房東如果不揭發妨害行為，那就得面對鉅額的罰款。而有些房東會真的去跟警方反映問題，但也有些房東索性驅離房客，這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一種比較省事的做法。遇到要「改善妨害行為」的時候，十個房東有八個不會去深究當中的人事物或前因後果，他們會直接把房客驅離、或威脅再報案就要申請驅離。其實可以改善此現況的辦法很多——警察可以加強訓練、市府可以讓妨害房屋相關立法只鎖定毒品跟噪音問題——但或許這時我們應該大刀闊斧，不應該用手術刀慢工出細活。妨害房屋的立法不僅本身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同時讓還讓我們看到地方政府在遇到資源不足的時候，是有多麼不手軟地犧牲掉了（弱勢者的）人權與司法上的程序正義。「妨害房客」（nuisance tenant）基本上都蠻無辜，但無不無辜在這裡根本無關緊要——房屋妨害條例的設計就是一種要在法院管轄外運作的政策。而除非房客用力把事情鬧大，否則各種證據根本沒有機會在法庭上公諸於世。除了關於程序正義與人權的這些疑慮之外，司法學者還倡言房屋妨害條例違反了憲法（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保證公民的人身安全及財產免遭非法搜查／扣押）與成文法（《公

平住房法》) 對人權的保障。將近一甲子之前，社會良心與司法學者凱勒·傅特 (Caleb Foote) 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這些惡法之所以能繼續屹立不搖，只是因為在底層居住市場中苟延度日的那些家庭太窮、太弱勢，所以連明擺著是他們權利的東西都沒辦法爭取。」傅特當年用這段話來批判美國的遊民法 (vagrancy laws)，而六十年後我們用同樣的話來批評房屋妨害條例還是相當適切。參見 John Blue, "High Noon Revisited: Commands of Assistance by Peace Officers in the Age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Yale Law Journal* 101 (1992):1475-490; John Diedrich,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in Milwaukee Faced Eviction for Calling Police, Study Finds,"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August 18, 2013; Caleb Foote, "Vagrancy-Type Law and It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04 (1954): 603-50; Karen Phillips, *Preliminary Statement, Grape v. Town/Village of East Rochester*. No. 07 CV 6075 CJS (F) (W.D.N.Y. March 16, 2007)

第十六章

雪地上的灰燼

終於到了月初一日，千位數的逗點再度回到了舍蓮娜的銀行戶頭裡。但這個月一日跟平常稍有所不同，因為這是二月，二月是房客們收到租稅扣抵¹資料、能夠大手筆繳租金的月份。有名房客兌現了退稅支票，付了舍蓮娜兩千三百七十五美元。多琳依照跟房東簽的和解條件擠出了九百五十美元；拉瑪給了五百五十元，但因為他的油漆工作完全是白忙一場，所以對舍蓮娜來說他還是沒把房租還清，拉瑪還是得被驅離。

也許是為了澈底撫平最近「瀕臨破產」的創傷，又或許是單純想去揮霍一下，舍蓮娜跟昆汀空出了周三晚上去賭場玩兩把。舍蓮娜套上了潮牌 Rowan 的紅褐／金色上衣。昆汀的行頭則是黑人饒舌團體「五角兵團」(G.U.N.I.T.) 的皮外套、一頂帽舌平到像被燙過的黑色棒球帽、外加一只偌大的粉紅色戒指。他在離波塔瓦托米賭場酒店主要入口處不遠的地方，找著了一個身障車位，然後把合法的證件往後照鏡上一掛——一名身體不方便的房客送了他這份大禮。

在前往吧檯跟燒烤區的途中，他們經過了周遭茂密一如森林而且還叮噠作響的機台；舍蓮娜同時露出了頑童般的笑容說，「希望你明天不用早起。」她可以在賭場泡一整晚到凌晨三、四點，這時續航力差的昆汀早就回家睡覺了。

舍蓮娜即將簡報一個題目叫做「雙重成交²的套利藝術」，所以夫妻倆這天的晚餐就是討論舍蓮娜

的簡報內容配漢堡跟長島冰茶。晚餐之後他們直奔二十一點。舍蓮娜緩緩步行穿過牌桌，最後決定加入某個已經有兩名白人男性的戰局，其中一人隻身在牌桌上吞雲吐霧，另一人看起來如坐針氈，不過他背後有個在跟人擊掌嗨³的金髮女伴。舍蓮娜擺了一百美元的籌碼在桌上——這兒的賭注是二十五美元起跳，而她很少賭不到一百美元——然後拉出一張凳子，毫不廢話地玩起二十一點：要牌的時候就點一下桌面，想跳過的時候就用兩根手指在空中畫一道線。

在城市的另外一頭、精確地說是在第十八街跟萊特街口，拉瑪發牌的對象是路克、艾迪、巴克跟其他幾個圍在桌邊的社區少年。這一晚冷得刺骨，在場者的體熱讓廚房窗戶蒙上了霧氣。因為卡瑪拉也在場，所以這一晚的牌局節奏顯得跟平常稍有不同，速度慢了一點、氣氛也和緩。自從卡瑪拉搬到樓上之後，拉瑪就一直邀卡瑪拉也來玩黑桃王，但直到這天她才終於說好，為此卡瑪拉找了她爸爸來看著孫女們入睡。卡瑪拉的男友叫迪旺，也就是她孩子的爸爸，但拉瑪照樣有意無意對她放電。房子裡有女人在場，氣氛就是不一樣。在變身成孕婦之前，娜塔莎曾經讓黑桃王的牌桌上充滿了一種詭異的「張力」，但人見人愛的她其實什麼都沒做，只能說正妹的存在就是有這種效果，為此拉瑪只得提前讓牌局喊停，把所有人統統踢出去。所幸孩子們在卡瑪拉的面前算是相當「乖巧」，他們既沒有拿女生當成話題，也沒有叫拉瑪是「猴子屁股」（雖然他們從拉瑪把八字鬚剃掉後就一直這麼喊他）。比起娜塔莎，卡瑪拉的年紀大不了多少，但在少年們的眼裡覺得她比較像個「女士」，這可能是因為她的外在彷彿包覆了一層威嚴與世故的保護膜。³

拉瑪的新年新希望是「敬拜上帝，遠離毒品，找個新居」。舍蓮娜始終沒理會他說房子需要修理：廚房碗槽漏水好幾天了，水都流到地板上。拉瑪盤算著舍蓮娜橫豎不會再讓他待太久，所以就讓水繼續漏，他覺得好像也不錯。或許他的新家也可以繼續是孩子們的庇護所。拉瑪不懂舍蓮娜如此對待他的動

機為何。「別人無意跟她作對，她何必這樣待人？」他十分納悶。好玩的是，舍蓮娜心中的OS也一模一樣。拉瑪說碗槽壞了，但舍蓮娜說碗槽就是他弄壞的。

昆汀沒有跟舍蓮娜一起坐上二十一牌的牌桌。他從來沒有這個習慣。他的習慣是在旁邊遠遠看著，確保沒有人生他老婆的氣，同時也不准有人對他老婆不禮貌。如果說來賭場對昆汀有什麼樂趣可言，那就是看自己的老婆開心了吧。對於賭，昆汀一點好感都沒有。「幹，五十元就這樣飛了，」他小聲咒罵著舍蓮娜剛輸掉的一把牌。

牌不斷落下，黑夜繼續前行。昆汀接了一通電話，掛掉後走向二十一牌的牌桌。他把臉貼近舍蓮娜，用悄悄話告訴她說十八街跟萊特街口燒起來了。她立刻將籌碼收一收，跟著昆汀出了賭場門口。

「是多琳家嗎？」舍蓮娜試著跟上昆汀的腳步。

「不是，是後面那排。」

「拉瑪家？」

「也不是，是拉瑪的樓上，卡瑪拉家。」

昆汀開起快車加速離開賭場。「老天爺啊，拜託，拜託不要燒得很嚴重，」舍蓮娜嘴裡祈禱著，手則緊握Suburban車門。他們抄小路趕往十八街。接著舍蓮娜抬起頭，焦躁不已，「這些人在搞什麼啊……我的房子千萬別燒到面目全非啊。」

正要將車轉進第十八街時，昆汀遇到了路障。「王八蛋，那兒已經燒到他媽的像在過耶誕節了，」他說。他可以看到一輛輛消防車停在房子前面，警示用的紅白燈光朝四面八方閃個不停，但他就是看不到房子本身。昆汀換了第二種路線跟第三種路線想進到現場，但周遭的大街小巷早就被消防車跟救護車塞滿。就在昆汀打著方向盤想找縫隙鑽的過程裡，舍蓮娜從鄰近房屋的空隙中瞥見了現場的火光。最後昆

汀試著開到跟第十八街隔一個街區的某條巷弄。透過休旅車的車窗，首先印入舍蓮娜眼簾的是陰影中的車庫後方，然後是積雪覆蓋的廢棄空地，最終才是卡瑪拉所租的公寓全貌。

舍蓮娜當場忘了呼吸。

「天啊！怎麼燒成這樣！」昆汀第一時間脫口而出。

整棟房屋被火吞噬，陷入一片火海。火舌從屋頂竄出，接著融入乳白色的煙霧與蒸氣裡，高高地消失在冬夜的天空中。昆汀跟舍蓮娜看著消防員的剪影在原本是卡瑪拉的住處衝進衝出。說「原本」，是因為現在那兒只剩下空盪盪的焦黑外殼，就像被開膛破肚過一般。僥倖沒被火焚身的部分，則因為灌救的水結凍於其上而變得濕滑。

昆汀開始朝著房屋前進，舍蓮娜則留在原地。這場火讓她想起某次一個心懷不滿的房貸顧客曾丟土製炸彈到她的居家辦公室窗戶裡。從那之後，任何一點火都會讓她驚呆而瞬間失去行為能力。

昆汀認出了拉瑪的大兒子路克，他把頭埋在兩腿間哭，一名十來歲的少女在多琳的門階上安慰著他。想在現場聽清楚什麼事情並不容易，因為當下實在太過嘈雜：柴油引擎的轟隆聲、抽水幫浦有如鑽地機一般的震動聲、高溫與水接觸時的嘶嘶聲、木頭被斧頭劈開的撕裂聲，全部雜揉一片。派翠絲人也跑到了外頭，但發著抖的她身上只有薄薄一件T恤跟牛仔褲。她用肢體語言指向昆汀，並且拉高聲音對一名消防員說，「房東來了！」消防員點點頭，開始朝昆汀靠近。每每有火焰向外冒出，圍觀民眾的臉就會在黑暗中閃著橘紅。派翠絲忍不住多看了眼聚在救護車後方的急救人員，然後才轉身回到屋內。

辛克斯頓家與拉瑪、卡瑪拉住的後排房屋，只相隔一小片泥巴跟雜草，但這一小塊地卻在此時塞滿了人。多琳坐在離前門不遠的地方，抱著才兩歲的孫女凱拉梅。娜塔莎蓋著毯子躺在地上，露比就在一旁，其餘的辛克斯頓家小孩則在床墊上坐成一排，現實的重量讓他們的眼睛瞪得老大。拉瑪癱在輪椅上

揉著頭，並試著擦去眼中的淚水。艾迪跟巴克站在一旁陪他。帶著工地帽的白人穿梭於人群中，略顯慌張地邊道歉邊蒐集資訊。「不好意思，可以提供一下您的姓名嗎？」

一名消防員扛著用白布蓋著的不知道何物送到救護車上，派翠絲看著這一幕，又看了眼卡瑪拉。卡瑪拉攤在地上扭曲著身子呼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的頭髮已經有一邊被燒掉。她弓起背，把臉整個埋在地上。一名有點年紀但沒人認得的女士試圖抱住她，「好了，」她會在卡瑪拉暴衝時安撫，「好了。」後來這位老人家也累了，於是便放開手。而卡瑪拉就這樣重新倒落於地，繼續哭得聲嘶力竭。

迪旺走進屋內，一手各抱著一名卡瑪拉的女兒，兩位都是才剛會走路的小小孩。他推著驚魂未定的小女孩，穿過警官在她們母親四周圍出的半圓形。卡瑪拉坐起來，接過兩名女兒。她緊抱孩子，在她們臉上親了又親。接著母女三人的頭靠在一起，卡瑪拉的眼淚淌在了女兒的髮上。

一名資深的消防人員踏進辛克斯頓家中，跪在卡瑪拉身邊重複她已經知道的噩耗：她才八個月大的小女兒死了。卡瑪拉人往後一倒，顫抖地發出了一聲難以名狀的哀號。

「他殺了我的寶貝！」卡瑪拉嘴裡嘶吼著，身體則不自主地抽動著。「我要殺了他！我要殺了他！」迪旺開始手握拳頭在房子裡踱起步來。一次又一次低聲說著，「第二個了，這是第二個了。」到了某個點上他停下腳步，低頭俯瞰著在地上的卡瑪拉。除了他們倆，整間屋子只能旁觀而說不出一句話來。迪旺看似已經到臨界點，肢體的宣洩似乎已迫在眼前。但所幸情緒的鋒頭過了，他也只是繼續踱步，口中念念有詞。「這是第二個了。」原來他們一年前才因為死胎而剛失去過一名女兒。她的骨灰就裝在成對的鎖盒裡，每天戴在卡瑪拉跟迪旺的脖子上。

「喔，老天爺啊，」舍蓮娜在聽到昆汀的描述之後說。「他們怎麼會把嬰兒獨自丟在家裡。」舍蓮娜的心思飄回了早年她還身為四年級老師的歲月，卡瑪拉就是她班上的學生。「她在班上一直是個乖孩

子，」舍蓮娜說。

回到家中，昆汀與舍蓮娜嘗試拼湊起事情的全貌。「迪旺跟卡瑪拉……」昆汀開了個頭。

「在樓下，」舍蓮娜接了他的話。

「跟拉瑪玩牌。或許家裡有東西忘了關……然後等他們想起來已經冒火，這時再想上樓處理，已經來不及了。」

昆汀開始敲起鍵盤，他想看這場火有沒有上新聞。結果答案是肯定的。「消防隊抵達現場時沒聽到煙霧警報器的聲音，」他讀起了報導。「廚房裡有裝一個啊，」他說。

「是每個睡覺的區域都要裝一個才對，」舍蓮娜回答他。「我記得我們有裝幾個在樓上啊，不過現在問我，我也想不起來。」⁴

事發的隔天，火場調查員聯絡了舍蓮娜。他說這場火災會燒起來，是因為卡瑪拉的一個女兒下床時踢翻了燈。卡瑪拉的爸爸有可能第一時間就逃命去了，也不管自己有個孫女還是嬰兒。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昨晚根本就三名孫女扔在家裡，一個人溜出門。卡瑪拉跟路克都想要搶救年幼的孩子，但火勢鋪天蓋地，人從外頭根本沒辦法進去。卡瑪拉的另外兩名女兒是自己走出來的，當時火勢還沒有失控。至於煙霧警報器，則完全沒有人聽到一丁點聲音。

火場檢查員對舍蓮娜說，「妳沒什麼好擔心的。」這次的事情她一點責任都沒有。知道自己可以全身而退之後，舍蓮娜追問起火場調查員另外一件事。她想知道自己有沒有義務要歸還卡瑪拉跟拉瑪的租金，畢竟一日才剛過，這個月的房租才交了沒幾天。對方說「不用」，於是她心上一顆大石頭算是底定。「我的錢他們別想要拿回去，」她說。舍蓮娜估計卡瑪拉跟拉瑪都會想要拿回租金，而她猜得一點都沒錯。

舍蓮娜的計畫是把整個地方打掉，然後將保險金放進口袋。「我只能說不幸中的大幸是我可以發筆財，」她說。當然能順便擺脫拉瑪，對她也是「好事一樁」。紅十字會會安置拉瑪跟他兩名兒子，省去了舍蓮娜還得自行驅離他們的麻煩。

當天稍早，巨大的敲門聲吵醒了多琳。她直接穿著睡袍便推開前門，然後發現家門口全是攝影機跟麥克風。在應付記者幾個問題後，她關上門，想著今天絕對到此為止了。她穿過廚房，從後窗看出去，卡瑪拉的二樓公寓看起來彷彿像黑色洞穴。窗戶都破了，屋頂燒去大半，只剩下孤伶伶的梁柱柱著。原本的米色外牆被救災水流刷上一條條灰色的髒污，地上的白雪被餘燼染黑，屋瓦、木條、家具跟各種家用用品殘骸散落一地——這一團扭曲而猙獰的垃圾堆，除了表面焦黑，上頭還覆蓋著消防撤水軟管留下的、已經乾硬的泡棉。樹枝上的水珠尚未滴落，便已凝結成上千個冰球。多琳壓低了視線，看到自家前廊上放著六朵白百合，束著米色緞帶，彷彿凜冬中的春暖日和。

註釋

- 1 譯註：Tax credits，是直接從稅額中扣除的金額，也就是可以退稅的金額。從稅基扣除的（如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扣除額）是 tax deductions。
- 2 譯註：Double Closure，房地產術語，炒房者身兼買方與賣方，以中間人的身分買低賣高來進行套利。雙重成交是因為買賣兩筆合約大約同時完成，所以是一個接近買空賣空的無本生意，同時中間人的交易紀錄也不容易浮上檯面。
- 3 這天晚上我是跟舍蓮娜與昆汀在賭場開始度過的。拉瑪跟卡瑪拉在玩牌的場面是我根據相關資料重建而成，當中我訪問了拉瑪、路克、艾迪與社區少年們，並且檢視過了由法醫跟火場／安全專家所撰寫的報告。至於從賭場回來之後的發展

則都是我親眼所見。

一個世紀前就聽過母親們的哭吼了。當時惡火常會肆虐廉租公寓，而出於成本考量，廉租公寓都不具備防火設計。但沒想到二十世紀都結束了，我們仍能聽見母親們的嘶吼，只是此時此刻換成一座座城市裡的貧民窟竄出火苗，而烈焰焚身之後便是斷垣殘壁。光是在芝加哥，只算一九四七到一九五三年，火災就在貧民窟裡帶走了超過一百八十條人命，其中六十三人是孩子，而且是連十歲都不到的孩子。起火的高風險因子——過於擁擠、粗製濫造的房屋品質——同時也是造成居民無處可逃的原因。從整個一九六〇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都有過房東一把火燒了自己的房子來詐領保險金的事，而且不是個案。可怕的是，這些被房東自行燒毀的房子不見得都是空房，有時候裡頭有住人。時至今日，住在次等房屋中的兒童比起住在正常安全房中的同齡者，前者死於火警的機率高出後者十倍以上。按照美國社會改革家傑可布·黎斯（Jacob Riis）的說法，入夜之後的火警是「人類經驗裡難有可匹敵者的駭人事件。」此言引用自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1890]), 88, but see also 35–36. 關於貧民窟的火警，參見 Jacob Riis, *Battle with the Slum* (Mineola: Dover Publications, 1998 [1902]), 89; Marcus Anthony Hunter, *Black Citymakers: How the Philadelphia Negro Change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ter 3; Arnold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5–26;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7; Beryl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335; Douglas Parker et al., “Fire Fatalities among New Mexico Children,” *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 22 (1993): 517–22.



有時候想起從前的光景、想起失去的一切，他會走出公寓，穿過大樓昏暗有如羊腸般的走廊，來到某個門前。

他會扭開門，突然現身在大賣場的中間，感覺就好像穿過了某種「任意門」。在那瞬間，他想起多年前曾有過的感受、那種城市裡充滿著驚奇與希望的感受。

第十七章

這就是美國

阿琳在第十三街的客廳裡發著抖。她沒有冬天的大衣，所以多套上了一件T恤，外加一件大得過頭的帽T。密爾瓦基的氣象主播這陣子忙得起勁，他們說這會是近十年來最冷的一周，還說風勢恐怕會讓體感溫度下探零下四十度。地方新聞台不斷以快報警告民眾：暴露在外十分鐘就會凍傷，所以建議待在室內，避免外出。但阿琳得在三天內租到房子。

舍蓮娜不想再跟阿琳或克利絲朵多說什麼了。與密爾瓦基警局的一席話讓她嚇到了。她決定要讓郡治安官把阿琳趕走，並且發驅離通知單給克利絲朵。「我可不想讓那些人害我被抓，或害我房子被拿走，」舍蓮娜說。「我受夠這些有的沒的了……阿琳真的超自私的。她根本不管別人，眼裡就只有自己跟小孩。根本不管我的死活。」舍蓮娜傳真了一份要給克利絲朵的驅離通知單到密爾瓦基警局。事隔數日，她收到了回函，「您的書面行動方案已獲警方認可。」

阿琳約了一名女性房東見面。她在房東的公寓社區外頭候著，等著等著，已經遲到半小時的房東終於開著輛速霸陸（SUBARU）姍姍來遲。她身材高挑，是名白人，身穿North Face 的名牌羊毛外套，腳踏嶄新的網球鞋。房東急忙道了歉，然後自我介紹說她叫卡蘿。

卡蘿要出租的是間坪數不大的陽春一房，月租五百二十五美元，地點在密爾瓦基北區的北部。阿琳「足足」花了三十秒掃視室內一遍，就說租了。其實她不喜歡這間公寓，也不愛這一帶的環境，更不開

心一搬家兒子又得轉學，但這些考量現在都是次要的。「管不了那麼多了，」她心想，「現階段有地方住總比沒地方好。」

卡蘿決定當場給阿琳「面試」，她在空無一物的客廳一屁股坐下，然後請阿琳拼出她的姓名，還要了她的出生年月日跟身分證字號。卡蘿問的第一個實質問題是，「妳最近這三年有被驅離過嗎？反正我會去CCAP案件管理系統那兒查，所以妳還是老實點好。」阿琳給了卡蘿真名，而她不確定自己的真名會連結到哪幾次驅離紀錄。所以從被迫搬離那間沒水的房子的事、跟這之後的一切經歷，她都一五一十地跟卡蘿說明。她提到了埃金森大道的毒販、自己好姐妹的死亡。這花了她一些時間，畢竟這當中有多次搬遷跟細節。卡蘿先是聽得一頭霧水，慢慢開始變得不耐煩。最後她直接打斷阿琳，問了她的收入，「妳參加威斯康辛的 \llcorner 有多久了？怎麼會參加的？」

「其實，他們把我放進 \llcorner 是因為……嗯……我因為憂鬱症去做了諮詢，每周我都會跟治療師見上一面。然後他們讓我做職業配對，想要我做好就業的準備，但他們也想讓我去申請聯邦救濟金。」

「最好不要靠這兩種福利過日子，」卡蘿邊這麼說，邊叫阿琳去找份真正的工作。

「我知道，」阿琳答道。

阿琳「灌水」自己的收入，她說自己有在領取育兒津貼。但卡蘿說，「我們這棟都沒有小孩喔。」這之後，阿琳連孩子的事情也說了謊。收入她是以少報多，小孩她是以多報少，只提了賈法瑞。「我得去看妳現在住的地方，」卡蘿這麼跟阿琳說。她說過兩個小時她會繞去第十三街看一下。

回到第十三街的公寓，阿琳把垃圾拎出去，地毯掃乾淨，還把喬瑞的衣服全部藏起來。但浴室她就束手無策了——堵住了的浴缸裡水動也不動，洗臉盆也不通——所幸燈也不亮，也許卡蘿根本不會注意到。來到廚房，阿琳站在洗碗槽旁，眼皮底下是骯髒碗盤堆成的小山。小不點蹭著她的腿，喵喵叫著

喊餓。家裡的洗碗精沒了，所以只得拿克利絲朵的洗衣精湊合著用。水一邊開著，阿琳的雙手在分成兩邊的洗碗槽裡輪流忙著。她邊刷著鍋子邊哭。此時電話響了。「沒事啦，」她對著電話另一頭說。「真的沒什麼，沒事。」語畢她才崩潰地放聲大哭起來。

克利絲朵原本一直坐在沙發上看著阿琳像無頭蒼蠅似的忙進忙出，這時起身給了阿琳一個擁抱。阿琳把頭埋進克利絲朵的肩頭裡哭，克利絲朵也沒有退縮。等阿琳抬起頭來，克利絲朵才對她說，「我跟妳保證，相信自己，妳一定能租到房子的。」

卡蘿終於找上門來了，而公寓看起來馬馬虎虎，還算像樣。阿琳甚至還噴了些Febreze牌的空氣芳香劑。在裡裡外外掃過一遍之後，卡蘿在玻璃餐桌邊坐下來。「我老實說，這裡看起來不是很理想，」她一劈頭就是狠話。「然後，我知道妳好姐妹過世跟生活發生一堆雜七雜八的事，但這些也不是房東的問題吧……？」

「我懂妳的意思。」阿琳總覺得白人喜歡聽到「我懂你的意思」、「我正想辦法要振作起來，不做那些蠢事，」還有「我打算回學校去取得GED」。」然後就是眼神接觸，而且一定要多。

「我不是說妳的這些遭遇沒什麼，」卡蘿接著說。「但我的意思是，我們也有個員工正逢母親過世，然後她也沒有保險什麼的，但政府會付錢。那個，他們會給妳三百美元吧，讓妳去辦後事。我們那個員工就這樣把喪禮給辦了。」

眼神接觸。

「所以妳打算怎麼洗心革面？我可不想才一個月就得出手趕人，」卡蘿點了點筆。

這個節骨眼上，阿琳申請過或去看過的公寓已多達二十五間，卡蘿是她最後一線希望。如今就連這最後一絲希望也即將飄遠，阿琳只好打出手裡的最後一張牌。她主動問卡蘿要不要去跟ㄟ的主管機關

申請成為「廠商支付款」的收受對象，讓房租自動從每個月的租金支票金額中扣除。「這樣我一領到支票，妳就收到房租。」

「這樣好！」卡蘿快人快語，甚至有點喜出望外。「這樣算是大家各退一步。」但馬上又補了一刀，「不能養貓喔。」

「好。」

「我說這話的意思是，妳應該想辦法先餵飽自己跟小孩。」

「我有點想跟妳擁抱一下，還是現在抱好了。」阿琳硬是抱了卡蘿，但這搞得卡蘿臉紅起來。卡蘿倉皇地出了門，像是用逃的一般。阿琳這時改抱克利絲朵，而且邊抱邊跳，手舞足蹈。「我找到房子了，太扯了，我找到房子啦！」

卡蘿跟阿琳說她可以在月初的一日搬進來，在那之前，阿琳打算把家當鎖在出租的倉儲空間，然後自己帶著兩名小孩去收容所暫住。住進收容所的一個好處是她可以領到紅十字會的善款，這樣押金就有著落了。也只有這個辦法，她才能把房租繳清。²阿琳跟住處附近的烈酒專賣店要了紙箱，開始收拾起行李。

「我走的時候別哭哭啼啼的喔，」阿琳邊把餐盤放進紙箱裡，邊跟克利絲朵交代。

「去妳的，妳現在是打算永遠不回來了吧。妳還會回來啊。沒有我妳怎麼活得下去，是吧。」

「妳還不是沒我不行。」阿琳笑了。

克利絲朵開始拍手編起歌來，「我不用搬喔，我不用搬喔。」唱著唱著，她往阿琳的背上拍下去。

「噢，克利絲朵！」阿琳喊疼。兩名女性小小打鬧一番，笑得挺開心。

玩耍告一段落，阿琳接著打包。克利絲朵這次問的是，「妳盤子可以留幾個給我嗎？」於是阿琳另外隔出一些要給克利絲朵用。

周四清晨，天色看來像是沒了氣的啤酒。但上午的天色又成了知更鳥蛋的那種藍色。光禿禿的樹枝紋風不動，看起來就像天空是殼，枝幹是裂痕一般。車子緩緩開在街頭巷尾，車身上積了一層鹽巴跟冬日特有的煤灰。密爾瓦基的公立學校放了低溫假，但反正阿琳也沒打算讓兩名兒子上學。她需要他們幫忙搬家。有朋友跟CIEE搬家公司租了車子，借給他們用，喬瑞負責把東西搬進車後。寒氣襲來，喬瑞的指頭跟耳朵都刺痛不已。冷冽的風灌進嘴裡，喬瑞感覺牙齦硬得跟學校護理室的塑膠模型一樣。他呼出的白色氣息，像厚重的紗布般纏繞在他臉龐的四周。他的笑容穿透霧氣，訴說著覺得自己派得上用場的歡喜心情。

來回幾趟，喬瑞終於把自尊心給嚥下去，套上了克利絲朵的沙黃色大衣。大衣的主人克利絲朵用人捐給教會的毯子裹住身體，席地而坐，並且配電視吃香蕉布丁，電視上正在播脫口秀。

搬家的前夜，阿琳黏上了新的假髮，鞋子也弄得乾乾淨淨。她想盡量看起來年輕一點，說不準她會在收容所或在大眾倉儲（Public Storage）那兒碰見誰。問過的收容所都還沒有回電，所以一家三口要在哪兒過夜，她還全無概念。但這會兒還輪不到擔心睡覺的事情，她眼下只想多塞點東西進個人倉儲。

大眾倉儲的櫃台後面站著一名男員工。他手上戴著尾戒，頂著向後梳的油頭，身上除了酒氣、還混雜著便宜的鬚後水味。阿琳的空間號碼是C33，大小約三平方公尺。「這跟妳的卡車後廂大小一樣，」男櫃員有著尾音拉長的德州口音。「只要妳有創意一點，就一定夠放。」結果櫃員想太多了，東西根本輕輕鬆鬆就都進去了。阿琳湊了二十一美元（為此她賣了些食物券跟一台電暖器），付了一月的優惠價（二月的租金就會跳回四十一美元）。但人算不如天算，阿琳沒想到她還得買鎖頭，外加有八美元的保險費要

付。這些錢臨時叫她去哪兒生？櫃檯那位「德州哥」用飽經風霜的臉龐對她說，他也落魄過，然後他不但替她弄了個鎖來，而且還在保險費上放水。阿琳謝過德州哥，拖著腳步穿過寒冷的水泥空地，關上了C33的橘色鋁門。至少現在她的家當有家了。

後來包括那晚跟那個周末，他們還是回到了十三街跟克利絲朵一起過，睡的是地板。

阿琳又打了電話給包括「旅社」在內的各家收容所，但他們都一如往常地人滿為患。周一早上，她又試了各處家暴收容中心，結果她在她待過的一間家暴收容中心那兒找到了一個房間，多年前她在這裡躲過賈法瑞的生父。阿琳後來打電話給卡蘿，要跟她說收容所的名字，以及商討拿紅十字會津貼當押金的事。沒想到卡蘿說房子已經租給別人了。阿琳沒有多問什麼，但她猜應該是卡蘿找到了更好的房客，收入比她多、又沒有拖油瓶。阿琳有氣無力地長嘆一聲，然後在椅子上將自己縮成一團。「又回到原點了，」她說。

悶壞了的阿琳把十三街公寓裡剩下的東西全收起來，包括拆下窗簾，還想起了在克利絲朵的衣櫃裡有些髒衣服。她跟賈法瑞聯手把小不點抱到樓上給特瑞莎。

「拜託顧好貓咪，」賈法瑞這麼請求。

「我會的，寶貝，我保證，」特瑞莎答應。

他想了想，然後又提醒一句，「要給牠吃的。」

阿琳打算把她的雙人沙發留下，這椅子自從克利絲朵開始將之當床睡以後，已經塌了。除了情人椅跟幾件四散的衣服、毯子，還有壞掉的燈具，整個地方已是一片荒蕪。然後阿琳想起她買過一個五美元的轉接器，能把爐子連接到瓦斯管線。她叫喬瑞把變壓器拆下來，而這樣瓦斯爐就成了一堆廢鐵。

看到這一幕，克利絲朵喊，「這是我家，給我滾出去！」克利絲朵開始撿起阿琳的東西往門外扔。

「妳的爛東西我一樣都不要！弄得我這兒一塌糊塗！」

「臭死人的混帳！」阿琳高聲跟克利絲朵針鋒相對。

「妳說我臭？那妳身上穿的是誰的衣服？我的！我的上衣！……連著三天都穿我的衣服，去妳媽的爛貨！」

「再說我就扁妳的臭嘴！」喬瑞大吼著跑來幫腔。他已經擺好架式，霎時鼻子就要貼到克利絲朵的臉了。

「我隨時都可以收拾妳！」他叫著。「我才不管什麼鬼警察。」

突然間昆汀出現在房裡。他正好帶準房客來看後頭的公寓，聽到這裡吵成一團。看門沒關，昆汀自己走了進來，並且順勢抓住喬瑞的衣領。「嘿！嘿！」他出聲喝斥。

喬瑞朝克利絲朵衝了過去。「來啊！」喬瑞邊喊邊揮舞著拳頭。昆汀把他拉了回來。克利絲朵這時不退反進。「你看看你，小子，」她呵呵笑著說。「你以為自己是狠角色嗎？還早呢！」

「不！不！」賈法瑞連聲喊著。試著幫忙的他，抄了根壞掉的浴簾支撐當武器，往克利絲朵身上打。阿琳抓住賈法瑞，把兒子拉出門外。同時在昆汀的驅趕下，喬瑞也開始往門口移動，只不過途中他還是停下來賞了克利絲朵的落地型電視一腳。

阿琳一家前腳才剛離開，克利絲朵就追出前廊，繼續把一家三口的東西往外丟。門前的草坪上一下子彷彿成為夜市擺攤，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都看得到：學校的課本、美好時光（Precious Moments）公司出產的「水滴娃娃」，外加一罐古龍水。「你們以為自己碰不得嗎？」克利絲朵不罷休地喊著。「搞清楚這裡是美國，是美國！」

阿琳現在的壓力太大了，要不她應該想得到在這個節骨眼上拔掉轉接器，就像當著克利絲朵的面

落井下石，甚至，阿琳不是沒機會把場面圓回來。總之今天大家應該要好過一點才對。她們不是做不成朋友，有飯吃的時候、不那麼前途茫茫的時候，她們其實相處得來。問題就是阿琳身處在城市的壓迫當中，精疲力竭。於是今天克利絲朵的引信一拉，阿琳也只能跟著爆炸。³

克利絲朵有本事一秒變暴力。在認識阿琳的前一年，克利絲朵曾經給臨床心理學家檢查過，結果診斷出她集躁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性依附疾患、邊緣性智能⁴、兒童時期遭忽視與性侵犯的受害者症狀，與具有邊緣性徵狀的初期人格異常傾向⁵，於一身。

童年的陰影在她心裡留下了烙印。「在人際關係上，克利絲朵對任何一絲遭拒絕、拋棄與傷害的可能性都極其敏感，」心理學家在報告裡寫下這樣的評語。「對於生命中重要的他者，她內心深埋著巨大的怒氣。只要察覺到旁人不願意或沒能力回應她對於照料、安全感或自尊心的需求，這股怒氣便會顯露……她對於挫折、焦慮的耐受力不高，而且傾向於不假思索地把心裡的拉扯化為具體的行為……她的狀態，應視為隨時都會崩解。」同一份報告推測克利絲朵的智商在七十，並預期她會需要「長期性的心理衛生治療與支持性的專業協助，才有機會以成年人之姿維繫社區中的生活。」

但現實是，她孤身一人，活在空蕩的公寓裡。克利絲朵掃視了一遍阿琳留下的東西。進了廚房後，她發現喬瑞匆忙中沒來得及拿走瓦斯爐的轉接器，但電線倒是被他給切斷了。克利絲朵心想，反正她今天原本就不打算煮東西吃，牧師已經說了要大家齋戒。

- 1 譯註：全稱為 *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普通教育發展證書），即美國的高中同等學力證明。
- 2 關於如何透過讓自己「無家可歸」來領取津貼，可參見 Adrian Nicole LeBlanc, *Random Family: Love, Drugs, Trouble, and Coming of Age in the South Bronx* (New York: Scribner, 2004).
- 3 人類處於殘酷之中，行為也會殘酷起來。「很多人沒有長期餓過，所以會低估飢餓的影響力，」心理學者 A·H·馬斯洛 (A. H. Maslow) 如是說。「他們」（有得吃有得住的那些人）會被較高層次的需求制約，而這些較高層次的需求感覺會比什麼都來得重要。「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思想家跟所謂的大師跑到貧困的社區裡解釋暴力是怎麼回事，卻沒有思考到在匱乏與苦難中掙扎的人還剩下多少理智可使。
豐收時和平相處、全無齟齬的鄰居，一旦遇到飢荒，一樣會為了從運糧卡車上扔出的麵包相互踐踏撕咬，張牙舞爪。又或者按照馬斯洛的講法，「一旦麵包沒有了，人就會只會為了麵包而活。」在思索低所得社區中的暴力行為時，我們必須同時思考到貧窮對人的壓迫，必須考慮到嚴重剝奪所帶來那股極其沉重的情緒與認知負擔，否則我們就完全妄言，自以為掌握到像阿琳跟克利絲朵這樣的生命經驗。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 370-96, 387, 375. For accounts of human behavior under extreme conditions, see, e.g., Elie Wiesel, *Night*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1960]), 95; Tim O'Brien, *The Things They Carried* (New York: First Mariner Books, 2009 [1990]), 64-81.
人會對結構性的處境產生回應，這包括食物的匱乏或集各類弱勢於一身的狀況。那是一種不由你不信的反應。讓「貧窮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詞眾所周知的人類學家奧斯卡·路易斯（Oscar Lewis），認為那些行為模式跟信仰本身會產生某種「意識」，然後反過來強化一開始催生出這些行為與信仰的環境與條件。就是在這樣一種「意識」的作用下，這些行為與信仰才會被認為構成了近乎於「文化」的東西——所謂文化就是長遠而有共同的觀點與習性，而不會被認為是稍縱即逝或因時勢而生的東西——但這個模型中被忽略掉的一樣東西是，在人類與結構性的處境之間占有一席之地、並且決定了各族群的話言／習慣／信仰系統／行為舉止孰強孰弱（優勢／劣勢）的各種社會與政治體系。

在窮鄉僻壤中，要啥沒啥的學校常使就讀的孩子們落入語言與批判思考技能低下的窘況。未來就算同一批孩子們搬遷到安全而繁榮的社區，這些不足之處也會跟著他們延續下去。把這些因為學校制約而導出的言談模式與信仰體系思考作為「貧窮文化」的證據，是這些貧困家庭自身的發明，就等於是無視低所得家庭歷經失靈文化體系後所遭受的衝擊。

我們不會覺得有錢人之所以有錢，是因為他們發明了某種「富裕文化」吧？他們有錢是因為他們出身於菁英的社會文化體系，而這些體系塑造了他們的行為舉止、習慣與世界觀。這一整套技巧與存在方式的「星系」，隨後又會反過來讓他們順順遂遂地進入其他菁英體系分支。或許，可以被視為是「富裕文化」的東西，不過就是富裕本身。卡洛·史戴克（Carol Stack）在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23. 裡說的非常精闢：「許多據稱可以代表貧窮文化的特質……其實僅僅是貧窮的定義而已。」另參見 Oscar Lewis,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Michele Lamont and Mario Luis Small, "How Culture Matters: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in *The Colors of Poverty: Why 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Persist*, eds. David Harris and Ann Li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76-102; Mustafa Emirbayer and Matthew Desmond, *The Racial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chapter 6; Matthew Desmond, "Relational Ethnography," *Theory and Society* 43 (2014): 547-79.

4 譯註：輕度智能障礙。

5 譯註：具有自殘傾向。

第十八章

用食物券買來的龍蝦

排隊的人龍沿著「社福大樓」延伸了整條維列特街的長度，到了角落後也順勢轉了個彎。路障已經架起，增派的警力也已銜命前來。州長已宣布食物券將發放給受到風災影響的家庭，主要是暴雨造成威斯康辛州部分地區淹水，包含密爾瓦基郡。消息一出不過早上七點，成千的民眾已經排起了長長的隊伍。有人爭先恐後在卡位，有人不得其門而入而打算硬闖。

要用一個字形容瑪西亞·P·卡格斯人道服務中心，那就是「大」。中心是一棟三層樓高的白磚建築，面積有近四千八百坪，光窗戶就有兩百三十二扇。這棟建築原本是舒斯特(Schuster's)百貨公司，但隨著這一帶、乃至與整座城市在二十世紀中期陷入不景氣，舒斯特百貨也無法獨善其身，最終在一九六一年宣布關門，建築本身也賣給了郡政府。進入二十一世紀，經過改裝之後，這地方進駐了四百五十名郡政府的辦公人員。一名藝術創作者遠從加州被延聘來安裝明亮而多彩的磁磚於窗戶上方，呈現出像「思索」與「跳舞」這類字眼。這位女性藝術家給了這裝置藝術一個名號叫做「社區之鑰」。

八點剛過，拉蕊步行穿過排隊的群眾進入室內。無論是巡邏的警衛、或是載人在樓層間穿梭填表/見社工的電扶梯，都幾乎沒讓她抬頭看一眼。她抽了張號碼牌(四〇二三號)，開始等待起來。拉蕊是要來重辦食物券的。沒多久，現場已經座無虛席，一〇二號室迴盪著小孩的嬉鬧與大人的閒聊。一名拄著雨傘的女士昏昏欲睡，一名媽媽在打小孩的屁股，還有人手拿暢銷書《愛過頭的女人》(Woman Who Love

Too Much) 看得入神。就這麼等了一個小時又四十分鐘之後，終於叫到拉蕊的號碼。還不錯嘛，她心想，比好幾次在社福機關泡一整天好多了。²

「我原本跟社工約了這個月的二十日，」拉蕊這麼跟玻璃窗後一心多用但指甲打扮得美美的女子解釋。「但我約好要通電話（確認）的時候正好被房東趕走了。」

「那你得重新約時間，」這是女性公務員的回覆。又一次跟社工緣慳一面，又一個福利被砍不見，全都是因為一紙法院的驅離令讓一切亂了套。女公務員遞了書面資料給拉蕊。「上面列了妳見面時要備齊的東西。」

「但這些東西都不在我身上啊，」拉蕊看了資料上的清單後表示。「大部分需要的文件都放進租來的儲藏室了。」

「這樣啊，妳東西不在身上，那就什麼都無法帶過來了喔。」女子說。

拉蕊有點聽不懂她在說什麼。「那我的津貼還領得到嗎？」

「所以說妳得約好時間來一趟啊……我可以轉介妳到食物廚房。妳要去食物廚房嗎？」

拉蕊乘著電扶梯下到食物廚房，離開的時候手上提了兩口塑膠袋，裡面滿是罐頭牛肉跟腰豆，外加一堆她恨之入骨的食物。有時候，有些不識相的親戚會問拉蕊怎麼不打通電話去跟社工約時間見面，拉蕊只會堆出笑容回應，「喔，你不要打打看？」她每次打都是忙線中。

在後續與社工會面成功後，拉蕊總算在文件不齊全的狀況下恢復了她的食物券額度，一個月八十美元。踏出社福機構，她意興闌珊地緩緩穿過人海，這裡有人百無聊賴而又滿臉倦容，有群人以街道為家且酗酒。拉蕊走進鄰近一家窗戶釘上了木條的家具行，裡頭播放著實驗風格的前衛爵士樂，放眼所見則是亂中有序的一堆懶人沙發、紅木餐桌組，還有黃銅燈具。

操著中東口音的店員起身，拉蕊則開口要看衣櫃。另外她端詳了一組七件式的臥房套件，還瞪著一台六十二吋的電視，一臉不可置信。

「我們也有小一點的電視，」店員機靈地說。

「沒關係，我想要這台！」拉蕊藏不住笑容。

「其實你可以辦理『後取分期付款』³ 喔。」

「你們有後取的分期方案喔？我超愛後取分期的！」

拉蕊在進行的是一種淨身的儀式，她要讓社福機構裡一堆人沒洗澡、全身髒兮兮的烏煙瘴氣退散，取而代之以新沙發的皮革香氣。她正做著一個美夢、一個替自己跟兩名女兒把家弄得漂漂亮亮的夢。潔美好不容易刑滿出獄，在找到公寓之前會跟她還有畢可住一起。梅根搞不好也會回心轉意。拉蕊以前也會分期買女兒的衣服，錢付清就能把新衣給拿回來。

對拉蕊來說，後取的分期付款跟存錢的意思一樣。「反正我不能把錢放在銀行，」她說。「有在領聯邦救濟金的話，你戶頭裡就不能有太多現金，最好不超過一千美元。因為超過這個數目……他們就會砍你的給付，直到你花掉儲蓄為止。」拉蕊說的是聯邦救濟金制度裡的「財力上限」(Resource limit)。其實拉蕊最多可以在銀行裡有兩千美元的餘額，而不是她自以為的一千美元。但要是這兩千美元的天花板不小心被突破了，她的救濟金資格就可能被褫奪。⁴ 而在拉蕊的眼裡，這條規定讓她完全失去儲蓄的動力。「反正錢不能往銀行存，所以我乾脆買些有用的東西……因為我知道只要我錢付下去，這東西就是我的了，沒有人可以搶走，就像我的首飾一樣。」嗯，她可能忘記了把老鷹搬家所需的費用考慮進去。

在拉蕊被掃地出門之前，畢可問過她為什麼不乾脆把首飾賣掉，這樣不就還有錢給托實了。「當然不幹啊，」她說。「我這麼拚命工作，珠寶怎麼可以賣……就算無家可歸或被房東趕走，我辛辛苦苦攢出

來的積蓄也絕不賣人。」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拉蕊不小心跌進了一個小坑，不日就可以爬出泥淖；而是她這輩子都翻不了身，都得跟房租糾纏不清了。如果窮困跟租屋是她的命，那她會希望自己至少還能拿出珠寶來「現」一下。她要新電視、不要連恩跟蘇珊留下來那台又舊又笨重的爛東西。她要沒人睡過的新床。她愛香水，她有本事在路上跟正妹擦身而過，然後馬上告訴你她噴的是哪一款。「就算像我這樣的人，」拉蕊說，「我們也有資格用新的東西。」。

拉蕊那天並沒有用後取分期訂下任何東西。但食物券一下來，她就直奔雜貨店買了兩條龍蝦尾，買了蝦、買了國王蟹腳、沙拉與檸檬蛋白霜派。把所有好料都帶回畢可的拖車之後，她開始料理。她往國王蟹腳加了卡真粉⁶。當調味料，還用攝氏一百七十六度煮了龍蝦尾佐檸檬奶油。煮完後她一鼓作氣，一個人全部嗑掉，配上百事可樂呼嚕下肚。這頓飯用掉她整個月的食物券，但這天是她跟葛倫的周年紀念，她希望特別一點。「我知道我跟他處得不算好，但畢竟是夫妻一場，」她說。「有些疙瘩我永遠沒辦法放下。」顯然龍蝦可以讓好人好過一點。

每次拉蕊像這樣砸錢或花消費券在奢侈品上，周圍的人都會既不解又沮喪。這包括她的外甥女珊米，也就是蘇珊跟連恩的女兒。⁷「拉蕊阿姨是那種看到一瓶乳霜說可以除皺，就寧可沒錢繳房租也要花兩百元去買的人，」說這話的是珊米，而珊米的另外一個身分是密爾瓦基南區一家髮廊的老闆兼設計師。「我不懂她為什麼不願意量力而為。」對此事，戴瑞牧師也「英雄所見略同」。他說拉蕊用一種「窮人心態」在度日，他覺得拉蕊太不把花錢當一回事。

對珊米、戴瑞牧師等人來說，拉蕊會窮是因為她花錢如流水。但真相其實恰恰相反——拉蕊花錢如流水正是因為她窮。

在被驅離之前，拉蕊每個月付完房租還會剩下一百六十四美元。她原本可以不看第四台，不上（威名百貨等）大賣場，這樣多少可以省下點錢。只要每個月可以省下五十美元，也就是所得付完房租後剩下的將近三分之一，那年底就能累積出白花花的六百美元——這已經夠付一個月的房租了。但她也得為此偶爾犧牲一下，包括她得咬牙放棄像熱水澡跟新衣服這樣的小確幸。你會說拉蕊至少可以省下第四台的錢吧。但對一個住在荒郊野外的拖車公園、沒車、沒網路、偶爾才有電話可打、沒工作、時不時會犯纖維肌痛跟叢集性偏頭痛、同時又不年輕的女人來說，電視是她最割捨不了的朋友。

拉蕊所代表的族群處於極其多重的現實夾殺之下，你根本無法想像他們得上進或自制到何種難以想像的程度，才有機會振作起來脫貧。僅僅是從在貧窮中掙扎度日，進步到在貧窮中穩定度日，這當中的尺度就已經遼闊到讓在底層的他們卻步；因為就算是錙銖必較的存下半分錢，他們也毫無勝算能脫離貧窮。於是他們選擇「放棄治療」，選擇在苟活中光鮮亮麗、在磨難中開開心心——尋歡取樂是他們生活的調味劑。他們會吸點小毒、喝點小酒、怡情小賭，會看到電視說買走就買。這樣的他們會把食物券往美食上砸，比方說拿去買龍蝦。⁸

拉蕊亂花錢，不是因為社福的錢讓她手頭闊綽，反而是因為那錢讓她選擇不多。她付掉了龍蝦晚餐的錢，接下來這個月就都得吃食物廚房的東西過活，甚至有時候索性餓肚子度過一天。但這非常值得。「我吃得很有滿意，」她說，「為了那頓龍蝦大餐，其他二十九天都吃麵我也甘願。」

拉蕊從很久以前就學會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為了自己的存在道歉。「別人什麼事情都可以看你看不順眼，」她說。她才不管結帳的店員用奇怪的眼神在打量她什麼，總之無論花十四美元買重口味的義式巴薩米克醋（balsamic vinegar），或肋排、特價牛排或雞肉，那種眼光都會自動落在她的身上。她喜歡下廚，喜歡做菜。「我有權利好好過日子，我有權利安排自己的人生，」她說得理直氣壯。「老是吃一樣的東

西，窮人也會膩好不好。我是吃熱狗長大的啊，但我根本受不了熱狗，所以我會想長大了要吃牛排。那不就是現在嗎？所以我不吃牛排要吃什麼。」

隔月是八月，拉蕊用食物券買了剛做好的馬鈴薯泥、火腿、奶油玉米（粥）給鄰居，原來畢可隔壁的拖車搬來一個時運不濟的家庭。這一家六口剛因為被趕出租屋處，而一下子損失了很多東西，晚上只能睡地板。晚餐一擺好，拉蕊帶著大家禱告。「親愛的天父，謝謝祢賜與我們食物。感謝生命中所有賜福予我的人，感謝祢給了我潔美，感謝祢給了我哥哥畢可。雖然他有時候讓我很氣，但主啊，我還是愛他。請看顧我的哥哥。阿門。」

兩天後，拉蕊聽見有人敲門。上門的是名高大且留著兩撇鬍子的白人男性，他身上那件上班族穿的襯衫好好地塞進褲腰，手上則拎著一紙亮黃色的通知。

「早安，不好意思，我們現在要把妳的瓦斯停掉，」男人說。

拉蕊接下通知。「是喔……」她回答地有點窘迫，有點心虛。

「通知背面有繳費辦法。祝妳今天愉快。」

交代完事項，男人自顧自地帶著工具箱朝拖車後面走去。

「所以畢可都沒有繳瓦斯費？」正在刷睫毛膏的潔美說出了心中的疑問。

「顯然沒有，」拉蕊應聲，同時看著黃色紙張上寫著欠款是兩千七百四十八點六〇美元。

「妳什麼時候才要像個大人一樣繳自己的帳單啊？畢可也是，都長不大，老是那麼幼稚。妳也是，媽。妳花的比賺的多，應該要改了吧。」

拉蕊朝自己的女兒看去。「妳什麼時候變得話這麼多。」

隨著秋天慢慢轉換成冬季，拖車裡再也無法提供足夠的暖意。薄薄的車壁、流理檯面、水、抽屜裡的金屬餐具等，彷彿全套上冰冷的外皮。拉蕊跟畢可窩在一層層毯子底下，毛衣一件不夠就穿兩件，一次開兩台小型的電暖器取暖。兩人因為怕冷，都能睡就睡。拉蕊要是在沙發上睡著，畢可會替她添件毯子。清晨是「決戰時刻」，畢可會如臨大敵地穿上他的厚重大衣，但拉蕊的冬衣正躺在老鷹搬家的擔保倉庫裡。除了他們兄妹，拖車公園裡還有很多房客沒能力在第一場雪降下來前接回瓦斯。托賓雖然不是房客，但他也一樣恨雪入骨。每到冬天，他便會踏上避寒之旅，朝溫暖的地方前去。

勉強還稱得上秋天的某日，畢可突然跟拉蕊說他要搬家。他要去住由聯邦政府補助、專門提供給年長與身障者的起居照護機構。這麼說完的隔天，他人就離開了。這讓拉蕊有點措手不及，他們之間的溝通一直都有問題。

畢可離開後，拉蕊隨即認知到她不能再躲著了。就算不跟托賓打交道，她也得跟新的物業公司接觸，「喬」些事情。因此即便下身穿的是運動褲，黑色羊毛外套上也還有沒洗掉的污漬，她還是鼓起勇氣，走向管理業者的辦公室。

「我得馬上申請緊急救助，」拉蕊這麼跟剛接替連尼的大學生說。「我快冷死了……我需要暖氣，不開不行。」

「是喔，天啊，」大學生頭低低地說。不知所措的他顯然還在摸索這份工作。接著大學生撥了比克管理公司的號碼，接通之後他讓拉蕊跟另一頭的經理葛蘿瑞亞溝通。透過電話，葛蘿瑞亞告知拉蕊她哥哥畢可積欠將近一千美元的房租未繳，瓦斯費不是他唯一沒繳的項目。拉蕊在管理公司的椅子上坐著，手撐著額頭。「求求妳，葛蘿瑞亞，請幫幫我。妳能體諒我一下嗎？」數分鐘後，拉蕊掛上電話。假如她

想留下來的話，只能想辦法說動畢可繳清房租。

畢可的「新家」是柯立吉大道跟第三十五街路口的伍茲公寓（Woods Apartments），對街就是馬德湖（Mud Lake）。白牆讓那地方感覺清爽、有新居的氣味，同時也夠溫暖。拉蕊請畢可去跟比克管理公司把帳清一清，但他說他沒能力兩邊繳租金。拉蕊說她繳不出上個月的房租，因為錢已經拿去付存放費了。到了這個份上，從拉蕊手裡進到老鷹搬家口袋裡的金額已經高達一千美元。魯賓其實還有空間可以放拉蕊的東西，連恩也有輛卡車。但他們倆都給上門求助的拉蕊吃了閉門羹。

「嗯，我覺得妳乾脆去跟妳的行李住一起吧，因為妳就只……」

畢可踩了緊急煞車，把話吞回去。拉蕊看起來可憐兮兮的，眼袋大得跟什麼一樣，頭髮也亂成一團。不過這也難怪，畢竟她已經幾天沒洗澡了。她拉不下臉去跟連恩還有蘇珊借浴室。畢可也知道自己的拖車屋說是廢棄的鬼屋也不為過：暖氣、熱水、電話跟電視都沒了。兄妹間霎時冷場到讓人不知該如何是好。

然後畢可擠出了這麼一句，「妳拿一件毛衣去吧。」

拉蕊得在六天內搬離畢可的拖車。畢可已經寫信給比克管理公司，裡頭是這樣說的，「我要搬家了，拖車就留給比克管理，算是抵我欠他們的錢。除了我搬出來……我妹妹也會走。」拉蕊得知了畢可的背叛（至少她主觀認定如此）是在她去伍茲公寓找畢可的三天後，比克管理的一名物業經理跟她通電話說的。經理請她務必在月初的第一天搬離。她不是沒有苦苦哀求過，「拜託，我真的沒有地方去了，」跟「我不是壞人，」但女經理聽完只給了她這樣的回應，「我了解，我了解。感謝您的配合，祝您萬事如意，上帝保佑您。」拉蕊奮戰過後只得坐下來。「下一步該怎麼走，我真的不知道了，」她說。「我什麼

辦法都想不到了。」

拉蕊開始在其所屬的教會四周尋找新的地方落腳。教會不但是她生活的中心，這會兒也是她找房子時的圓心。她小心翼翼拖著步履，走在冰冷的人行道上，不時打電話給房東。打著打著，她想到可以去她小時候住過的南密爾瓦基公宅社區（South Milwaukee Housing Projects）看看。到那裡，社區辦公室的女士說，他們的戶數已經滿了，也不再接受新的申請，但她倒是給了拉蕊一個地址——HUD辦公室的地址。

HUD就是聯邦住房與都市發展署的縮寫，而密爾瓦基分部就位於市區一座藍色宏偉現代高塔的頂樓，鏡面外牆交錯著一排排藍色糖果般的玻璃。拉蕊穿著濕透了的鞋子，在大廳的磨石子地板上發出「伊呀伊呀」的聲音。門口的總機人員遞了份「多戶住宅存量報告」（Multifamily Housing Inventory）給拉蕊。足足有十三張標準規格（8.5×11吋）的紙張，上頭列出了密爾瓦基都會區所有聯邦補助的租屋處。

「上面有一半的地方我根本沒概念在哪兒，」拉蕊看著落落長的地址與電話咕噥著。但其實她也只是看心酸的，因為大部分的社區都是身障或高齡者優先。事實上，經驗告訴拉蕊，公宅或社會住宅多是老人家的禁嚮。「甚至也不是每個老人，很多老人都租不到要給低收入戶的房子，」她回憶說。「所以我想說，就連他們都沒輒了，我算哪根蔥。」正是這個原因，讓拉蕊之前從沒想過要申請公宅。

搞政治的都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選民討厭養老的社區，但他們更討厭被當成貧民窟的社區。老爺爺老奶奶總是能激發人心裡比較柔軟的那一塊，而銀髮族公宅讓成年子女有了養老院以外的另一種選擇。因此低收入者的公宅鮮少再被興建，但老人的公宅案卻方興未艾。那些同時鎖定一家數口的高樓層建案，不少也被改成了供老人進駐。¹⁰

拉蕊在住房與都市發展署的報告上找到在密爾瓦基市「南部的南部」有兩處社區接受老殘以外的申請；拉蕊不考慮密爾瓦基的中南部，北邊的蛋黃區就更不用說了。申請表上問及她有沒有被驅離過，是

或否，拉蕊圈起了「是」，並在後頭加註：「我跟房東有些過節與糾紛，所以他才驅離我。」

必須得搬離畢可拖車的最後一天，整座城結了冰。十二月的降雪比預期更早落了下來，緊接著融化，氣溫驟降讓水結成冰。在廚房裡杵著的拉蕊聽見外頭彷彿有鋸東西的聲響，那是民眾在擦拭車窗或把冰從車門上弄掉。地板上的垃圾堆成小山，主要都是畢可的Margarita牌香菸空盒跟巧克力牛奶瓶，另外就是廚房水槽裡有一堆髒碗盤沒洗。寒冷讓拉蕊在沙發與毯子之間動彈不得——另外茫然也讓她不想起身。自從入冬之後，她就幾乎沒清理任何東西了。「我無所謂了啦，」她一邊說，一邊把止痛劑跟抗憂鬱症的藥品往嘴裡送。

拉蕊申請過跟看過的公寓累計已經四十間了。其中她在私部門的「打擊率」是零，嘗試全部落空，而公宅的申請則還在「處理中」。拉蕊覺得走投無路。她有考慮找年紀與她相仿、同樣也獨居在拖車公園裡的湯瑪斯幫忙，也想過要詢問住馬路對面的老人家貝蒂女士。拉蕊把剩下的東西收拾好，打算花五十美元租個地方存放這些東西。

那天時間已經晚了，拉蕊才去敲了貝蒂女士的門。她是名嬌小的白人，有雙水晶般澄澈的雙眼，過肩的金髮正慢慢變白，還綁成兩條辮子。坐著吞雲吐霧時，貝蒂太太看來還算年輕，但走起路來卻是十足的老人家，駝背不說，一隻手還常貼著身體。這兩名女人對彼此僅有的認知，只是擦身而過時的點頭問候跟其他時間的流言蜚語。但當拉蕊問貝蒂可不可以借住的時候，貝蒂說了聲「好」。

「妳可以在我這兒住到冬天結束，沒有問題。」貝蒂挑了挑眉頭。「我知道妳沒有他們說的那麼糟糕。」

拉蕊笑了。「我終於可以沖澡了。」她說。

要比亂，貝蒂的拖車恐怕在公園裡數一數二。以空間而言，拉蕊勉強可以擠得進去，但多的就不用想了。貝蒂的桌上堆滿了雜誌、信件、罐頭、醬油，還有糖果。客廳裡有棵樹朝著窗戶彎去，樹葉掉了滿地，架上有幅耶穌的照片，外加一旁散落著各種紀念品——又一個亂中有序。浴室的抽屜讓人想起五金行裡整齊排列的螺絲帽，旅行用的小管牙膏跟髮夾、髮帶、指甲剪，各安其分地待在專屬的隔間裡。來到廚房，貝蒂在那兒掛上了一道標語：「自制就是明明有個人很該死，但你可以忍住不去落井下石。」拉蕊答應每個月付貝蒂一百美元。

搬到貝蒂那兒的幾天後，拉蕊收到了公宅申請的兩筆回音，但兩封信都是壞消息。不管哪一封，上頭都列出了打回票的理由：「威斯康辛州提報欠稅」與申請人「經查有遭驅離的紀錄」。

「經查有遭驅離紀錄」這點拉蕊沒有話講，但州政府提報欠稅卻讓她左思右想。百思不得其解的她最後打了電話，結果對方跟拉蕊說她欠了地產稅。「地產稅！」她笑著掛上了電話。「也太好笑了吧，我倒要看看我這地產稅是怎麼欠的。」¹¹

貝蒂覺得拉蕊應該申訴。她透過大大的眼鏡鏡片看向拉蕊，「拉蕊，妳不能不爭取，就像貧民醫療補助 (Medicaid) 也是我自己爭取來的。」

「我累了，」拉蕊說。「而且我真的不想再申請又被駁回。」¹²

貝蒂點點頭。她懂。

幾天後，拉蕊突然宗教情懷「上身」，教會真理課程的內容歷歷在目。

「看著耶穌，妳看到什麼？」拉蕊問了貝蒂。

「帥哥，」貝蒂一秒不差地脫口而出。急忙之中，一根修長而沒點著的香菸從她嘴唇間噴出來，就像船上彈出的一片甲板。

「拜託，貝蒂！」拉蕊笑得花枝亂顫。
貝蒂晃過去，點了點耶穌的「玉照」。「超帥的，」她顯得欲罷不能。「臉上有毛的男人是我的菜。」

「也太不正經了，貝蒂，」拉蕊毫無火氣地說。
這兩名新朋友有說有笑。直到夜裡，兩人才一同在沙發上睡去。¹³

註釋

- 1 Jason DeParle, *American Dream: Three Women, Ten Kids, and the Nation's Drive to End Welfare* (New York: Penguin, 2004); John Gurda, *The Making of Milwaukee*, 3rd ed. (Milwauke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999]).
- 2 關於等待作為貧窮生命體驗的一環，參見 Javier Auyero, *Patients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Waiting in Argent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 譯註：相對於 installment 是分期付款但將貨品直接取走，「後取（式）分期付款」（layaway）是要等顧客分期付款所
有金額後，才能把東西取走。
- 4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ing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 Resources* (Washington, DC: SSA, 2014).
- 5 「哪天我寫到這段的時候，別人可能不容易看懂，」我說。
「你要把這些寫進書裡喔？」拉蕊問。
「是啊，我是這麼打算的。我猜他們會說，『這人在幹嘛啊？她才剛從租屋處被趕出來，差不多是無家可歸了。她跟自己

的哥哥住在一起，誰知道這種日子能過多久。她才跟剛社工會面完，恢復食物券資格。她憑什麼分期付款訂一台要價一千五百美元的六十二吋大電視？」

「嗯，他們不懂也沒關係。我也不懂很多人在做的事情，但他們也是照做不誤。」

「如果那些人現在就坐妳面前問，「拉蕊，妳為什麼會這麼做？」妳會怎麼跟他們說？」

「我會說我這麼做是因為我想。」

6

譯註：Cajun，美國南部奧爾良特產的調味料，內含茴香、紅辣椒、洋蔥、大蒜等成分，適於烤雞與海鮮調味。

走進低所得家庭裡看到一台大螢幕電視外加門口一雙全新的Nike，可能有些中產階級的朋友會覺得不可思議，甚至火冒三丈地想要生氣。保守派的智庫與媒體會為報導下這樣的標題：「有平面電視的人，還能算窮人嗎？」、「空調、有線電視、Xbox：貧窮在美國究竟如何定義？」自由派會嘗試改變話題，避免去討論到他們希望可以自動消失的這些行為。破公寓裡的超豪華電視機？有錢穿新鞋但中午只能吃學校營養午餐的小孩？但電視跟球鞋的主人很可能還沒有把帳結清，又或者他們不知道退流行的電視機種可以僅花五十美元買到，街角的店裡也找到折扣的Nike球鞋，市區服裝店的標價是用來「噓」不懂殺價的郊區白人小孩。另外因為大螢幕電視太吸睛，可能會讓你看不見房間裡缺乏了應該具備的東西。美國的有錢人有電視，窮人也幾乎都有電視；但有錢人有電腦，窮人卻幾乎沒有電腦可用。拉蕊吃著龍蝦大餐，卻連支電話都沒有。參見Tami Luhby, "Are You Poor if You Have a Flat-Screen TV?" *CNN Money*, August 13, 2012; Robert Rector and Rachel Sheffield, *Air Conditioning, Cable TV, and an Xbox: What Is Poverty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1);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 2012. 這是自由派的古老傳統：無視於貧窮中令人不忍卒睹、讓人坐立難安的那一面。而因為像卡洛·史戴克 (*All Our Kin*, 24) 說的，自由派的名嘴與學者不願意直視貧窮的這些面向，所以這些人只能為了這些不堪的現象道歉。但又像威廉·朱立爾斯·威爾森 (William Julius Wilson argued) 在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987]), 6, 12 所說，「為了不讓窮人覺得不受尊重或被污名化，很多行為都不能提，但這也讓自由派的論述變得隔靴搔癢，效果不彰，」因為美國民眾要的是答案，是這些行為的解決方案。不把人當人有兩種狀況：一種是否定人的美德，另一種是赦免他們所有的罪惡。

- 8 人會因為得到了翻身脫貧的機會，而在行為上改弦易轍嗎？答案是很有可能。行為經濟學者兼心理學家們已經告訴我們一件事情，那就是「貧窮本身就會使人心力交瘁」，心力交瘁代表人會「變笨」，會在衝動下誤判情勢。再者，窮困的家庭一但獲致有意義的經濟援助，他們的反應經常是建立資產跟還清債務。近期一份研究發現，將近四成的為人父母者，若得到的薪資所得稅扣抵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超過一千美元，他們會存下退稅中的一大部分，而將近八成五的人會拿退稅去處理債務。持續的退稅會帶給夫妻們希望，他們會覺得存錢有動力、有目標，覺得脫貧看得到曙光。參見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Scarcity: Why Having S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3), 60, 66; Abhijit Banerjee and Sendhil Mullainathan, "The Shape of Tempt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Economic Lives of the Poo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5973 (2010); Reba Mendenhall et al., "The Role of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in the Budgets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Social Service Review* 86 (2012): 367-400.
- 9 被驅逐出租屋處會讓人花很多錢，房客會因此存不到新家的押金跟第一個月的租金。
- 10 社會住宅或公宅 (public-housing) 的居民主體非老即殘。關於高齡住宅的數量成長，請見 Lawrence Vale, *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ojects: Public Housing and Public Neighb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85-90。關於公宅居民的組成，請見 Alex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chapter 6
- 11 根據遭驅離紀錄或其他未完民事程序來駁回公宅申請 (補助) 的做法，引發了若干不小的爭議。拉蕊後來發現法院紀錄可能有誤，這正好揭露了欠缺正當性的驅離行為，還可能反應了房東的獨斷獨行或片面之詞。其內容看在單親媽媽或家暴受害者等特定族群的眼裡，可說是刺眼莫名。關於民事法庭紀錄令人質疑的準確性，可參見 Rudy Keysteuber, "Tenant Screening Thirty Years Later: A Statutory Proposal to Protect Public Records," *Yale Law Journal* 116 (2006); David Thacher, "The Ri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Screening in Rental Housing," *Law and Social Inquiry* 33 (2008): 5-30.
- 12 有關貧窮的論戰可以更加以著墨的一點是，個體的自信與堅持下去的想法，會因為驅離產生重大的打擊。申請公寓或工作而被連續打槍十次、二十次、四十次，會導致人被磨到疲乏。關於社區選擇或失業的各種理論往往假定低所得者會是

接近「理性的行為人」(rational actor)，認為他們會考量得失做出正確的選擇；但真相是許多低所得者是「疲憊的將就者」(exhausted settler)。在一試再試、接連的失敗之後，他們會「哀莫大於心死」地接受住在弱勢社區裡的破屋，而且不管工作有沒有前途乃至於合不合法都照做。被拒絕的羞辱會逼人去接受不理想的環境，還會消磨他們追求美好未來的動力。關於找基層工作被拒的體驗，可參見 Philippe Bourgois,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ter 4; Katherine Newman, *No Shame in My Game: The Working Poor in the Inner City* (New York: Vintage, 1999), chapter 3.

13

幾個月後，貝蒂收到一封托賓的來信，裡頭威脅她不准收容拉蕊，否則就要換她被驅離。拉蕊回說她願意付托賓自己欠他的租金跟訴訟費用。但托賓說的金額是法庭紀錄上的兩倍。因此為了還錢給托賓，拉蕊拖欠了要給老鷹倉庫的租金，結果她的東西統統被沒收。包括她的家具、照片、(後取)分期付款買來的珠寶，都被拿去公開拍賣，由撿便宜的人用天知道的價格買下。

第十九章

小不點

潘找到最便宜的汽車旅館是每晚五十美元。他們登記入住，並開始打電話給親朋好友，希望有人願意收留他們。但兩天過去了，一點進展都沒有，潘開始擔心起來。「沒有一個熟人敢接我們的電話，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們沒有地方住，」她說。

接著好死不死，奈德搞丟了他在工地的兼差。會被辭退，是因為他花了兩天去幫家人搬離拖車公園，所以沒有上工。失業會導致被房東掃地出門，但反過來的可能性也一樣。¹遭到驅離會占用到房客的个人時間，讓他們被迫得請假或曠職，不然就是導致他們的心理壓力極大，而壓力一大工作就會出包。被驅離的壓力烏雲罩頂，會讓人原本的專業施展不開，並且經常會害人因此愈搬離上班地點愈遠，而這又有如惡性循環地增加了他們上班遲到或曠職的機率。²奈德沒了工作，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但潘也不會因此比較開心，畢竟錢在燒是一項事實。

即便到了這個境地，奈德還是死撐著不打電話給家人。潘想，不愧是奈德。奈德的原則是報喜不報憂，他打電話回家只能是炫耀，不能伸手。潘只好自己打電話，但她打遍了認識的人，包括幾處教會，結果都落空了。最後好不容易才有個朋友答應讓他們的女兒去住，等潘跟奈德度過難關再接回去。他們於是把老大、老二、老三送過去，才兩歲的克莉絲汀則留在身邊，就近照顧。奈德的電話在晚上十點左右響起，打來的是崔維斯。崔維斯是以前在拖車公園的朋友，現已搬去拖車公園不遠處的公寓社區。崔

維斯打來是叫潘跟奈德去睡他家的沙發，潘鬆了口氣，至少她跟寶寶不用回廉價的汽車旅館窩著了。

如果崔維斯為好運開了個頭，那緊接而後的就是德基。德基是名滿身肌肉、一頭白髮的黑手，在自家車庫開了間店面。德基私下發包差事給奈德，工作內容是組裝客人訂做的摩托車。奈德是透過一個也是黑手的朋友認識他的。在崔維斯家睡了一個月的沙發以後，潘跟奈德感覺到了無形的「逐客令」。克莉絲汀身為小小孩，不可能不哭鬧，而她一「開機」，崔維斯就會受不了。崔維斯會板起臉孔，把自己關進臥房裡面，畢竟他清晨四點半就得起床準備上班。崔維斯上一個收留的對象是自己的親兄弟跟姪子，結果這一對酒鬼搞到崔維斯被驅離，連自己租的房子都待不下去。奈德會叫潘「讓妳小孩安靜一點」，但潘會回說「這他媽的也是你的小孩好嗎」。

某天早上，他們驅車前往德基的車庫，克莉絲汀則跟她的彩虹熊熊（Care Bears）一起被綁在後座。潘距離預產期只剩下九天。但從托賓把他們踢出拖車公園的那天以來，他們找新家的進度就毫無進展。他們可能得搬進距離密爾瓦基南區更近的地方，當起墨西哥人的離居。奈德把菸抽光了，主要是為了壓抑他的壓力跟肌餓引起的痛感，潘的菸也愈抽愈兇。另外克莉絲汀因為她心愛的熊熊被送去倉儲而鬧起脾氣。工作上德基要奈德改一個變速箱，這代表他可能得卯起來熬夜加班。自己跟妻女得寄人籬下，讓他心裡很不是滋味。一轉頭聽見隔壁車道傳來轟隆隆的音樂，車上坐著兩名年輕黑人，奈德更加不爽。「幹，去他媽的黑鬼，」奈德恨得牙癢癢的。

幾分鐘後，奈德看到有張告示貼在了白人上班族聚集的西艾利斯（West Allis）有房子要出租。他叫潘抄下電話，但潘沒抄到。

「我不是叫妳要抄嗎？」奈德質問。「我不是叫妳他媽的把電話抄下來嗎，妳連這都辦不到？」

「誰叫你念那麼快！」

「所以現在是怪我囉？」

他們繞回去，抄了號碼。「嗨，我打來是想問你們是不是有七十六街跟林肯大道口的房子要出租？是什麼格局，兩房嗎？」

「是，」回答的是男人的聲音。「房租是一個月六百九十五元，附暖氣。」

潘並沒有聽到房租就掛上電話，她心想搞不好對方可以商量。「好，什麼時候可以入住？」

「現在。」

「真的嗎？太好了。」

「妳會跟誰一起住？」

「我家人。」潘頓了一拍，然後咬牙把有幾個孩子都跟對方交代了。「我現在有三個小孩，肚子裡還有一個，但我們家全部都是女兒！」

「喔，不行，不行，不行。我們只收大人。」

「好吧，謝謝。」潘放下電話。「他們不收小孩。」

奈德身穿一件黑色的奧茲·奧斯朋（Ozzy Osbourne）的削肩T恤，頭上反戴著一頂哈雷機車棒球帽。他用牙齒吹著口哨。

「我就知道。妳一說自己有四個該死的小孩，事情就玩完了。」

潘知道其實不用講到四個小孩，只要一個就夠了。幾天前他們一樣在找房子，兩名房東是只要有小孩都不行，其中一個說，「我們這裡非常怕吵，所以對這點嚴格要求。」

另外一名房東則跟潘說，讓這麼多小孩待在兩房的公寓裡是犯法的。問題是，潘跟奈德就只租得起兩房。

所以現在只要跟房東說話，潘都會自動在小孩的事情上以多報少。她開始納悶找不到房子的真正原因：是自己幾年前有過毒癮？奈德居無定所又沒有穩定收入？他們有被房東驅離的紀錄？他們就是窮？還是因為他們有孩子？

孩子普遍讓房東很頭痛。因為街頭存在暴力犯罪，所以不少住在治安死角的父母會把小孩鎖在家裡。小孩被關在小公寓裡很無聊，就會把窗簾做成披風扮演超人，會把玩具沖進馬桶，會讓水費高得嚇人。小孩可能會被檢查出鉛中毒，然後房東就會被責令要做收費高昂的滅污處理。小孩會被兒童保護局列管，然後社工就會帶著法條上門來巡視公寓的衛生與安全。十來歲的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是吸引警察的磁鐵。

所以這是個行之有年的不成文規定：房東心中自有一道「禁孩令」。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在戰後極為競爭的租屋市場裡，房東普遍拒絕把房子租給有小孩的家庭，房客也不能懷孕，否則會遭到驅離³。這點可以從為人母所寫的公宅申請信裡看得非常明白。「目前，」有一封信是這樣寫的，「我帶著一名一歲大的嬰兒，住在沒有暖氣的閣樓……我幾乎找不到房東願意接受小孩。另外我還有一名十歲的兒子……但我不能把他帶在身邊，因為房東太太反對。您有沒有可能幫我找到個房間或是公寓，不用裝潢，多舊都行，要不然穀倉也行？……我不能繼續住在現在的地方了，不然我怕我會做出傻事。」另一位母親寫的是，「我的孩子生病，體重一直掉……我試過、求過、拜託過，就只希望有個地方給我住，但（回答）永遠都是『租出去囉』或『對不起，有小孩不行。』」還有位母親說，「三周前吧，房東太太把我其中兩個小孩給趕出去，還不准我讓他們回來……但我寧可住車庫也要一家團圓。」⁴

美國在一九六八年通過了《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但國會議員並沒有將有小孩的家庭列為受保護的對象，而這等於替房東開了扇窗，讓他們可以繼續大喇喇地拒人於里之外，或者把有困難的房

客踢出門外。有些不肖房東會漫天喊價並設立入住的門檻，在正常的租金以外加收「孩童損害押金」。華府某開發案要求沒孩子的住戶要付一百五十美元的押金，但有孩子的住戶基本押金卻一口氣爆增為四百五十美元，然後每個孩子再多收五十美元的人頭費。⁵一九八〇年，住房與都市發展署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研究來評估問題的嚴重性，結果發現僅四分之一的房子在出租時沒有對家庭住戶附帶一堆限制。⁶調查結束的八年之後，美國國會才終於禁止因為歧視而使兒童或育兒家庭的居住權遭到損害。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潘的真實體驗說明了法律無法改變什麼，居住歧視仍舊是美國生活的一部分。⁷每十個育兒家庭，就多達七個會在租屋時處處碰壁。⁸

奈德下車，把剩下的麥當勞早餐三明治給了克莉絲汀。「親老爸一下，我去上班了，愛妳。」他沒忘記要潘也親。

潘把手放在額頭上說。「我快要爆炸了。」

「媽媽？有遊樂場耶，要玩！」後座的克莉絲汀按耐不住玩心。

「不行喔，克莉絲汀。媽媽要先找房子給大家住。」

「小孩多大？」房東提出了疑問。

「六歲。」

「妳下個月再打來問。」

阿琳掛上電話。她跑過或申請過的公寓已經多達八十二間，給她肯定答覆的是零。即便在舊城區，大部分的房租也都讓她高攀不起。至於她傾家蕩產才負擔得起的地方，房東則都沒消息。

阿琳重整旗鼓，再接再厲她又撥了三組號碼。第一間太貴，第二間是「語音留言」，第三間則叫她

「周一再打」。阿琳前晚才剛跑過一趟醫院，所以現在非常疲倦。她跑醫院是因為強的松沒了，而賈法瑞又氣喘發作。阿琳要照顧氣喘發作的賈法瑞相當辛苦，因為讓她煩心的事情多得跟什麼一樣。有一回，她找了整天的房子，而且又空手而歸，然後才突然驚覺自己把裝著氣管擴張劑的背包給忘在公車站。還好那天賈法瑞沒有大問題。但兩天之後，賈法瑞一醒來就跟阿琳說，「媽咪，我不舒服。」她聽得到兒子哮喘的聲音，馬上叫救護車，結果這次賈法瑞被轉送到動物園附近的兒童醫院，並留院觀察一夜。這一次，阿琳順利在晚上十點半前趕回收容所，主要是好心的值班社工替他們付了來回的計程車錢。

第八十五號房東接起電話的時候，阿琳的第一句回話已經不是「嗨！你好嗎？」或是「嗨，我打來是想問房子的事情，」而是「你好嗎？」為了換換手氣，她會開始用不同的抑揚頓挫與重音說話。同樣的道理，她會跟前一名房東說東，然後跟下一名房東講西。有時候她會說自己在收容所，有時說在別的地方；她的小孩有時候是兩個，有時候剩一個。有時候她會說小孩在托兒所，有時又不這麼說。也有時候，她會說自己有領育兒津貼，有時又說沒有。總之她會東抓西扯地隨機拼湊故事，看看能不能給她找到一間房子。阿琳很想租屋，但這個體系她始終打不進去。

「妳有男人嗎？」八十五號房東問。

「沒有。」

「會有男人三不五時過來找妳嗎？」

「不會，我就一個兒子相依為命而已。」

「那妳兒子多大了？」

第八十六號房東獅子大開口要月租八百二十五美元，另外加收喬瑞的人頭費二十五美元。但第八十八號倒是讓她感覺不錯。第八十八號物件是個寬敞的三層樓磚造建築，地點在密爾瓦基北部一條死路

的尾端。「我印象這裡原本是某家機構，」管房子的經理這麼跟阿琳說。「好像是安養院什麼的。」

阿琳猜是精神病院。房子裡頭倒是既乾淨又安靜，牆壁不是摻了雜質的白色或米色，而是醫院那種純白色，有錢人牙齒的那種純白。一扇扇深色木頭門板上有銅質的號碼，門後則是天花板挑高的長長走廊。阿琳帶著兩名兒子跟著經理參觀，每踏出一步都會從鞋底傳來地板的聲響。在經理身後的喬瑞朝著弟弟衝過去，讓賈法瑞嚇到跳起來。兩名頑皮的男孩悶著聲呵呵笑，讓現場毛骨悚然感覺去除了不少。

「我是阿薩達，」經理這才自我介紹，「阿薩達的意思是『出身貴族』。」戴著棕色穆斯林蓋頭帽，的阿薩達是名走路抬頭挺胸的黑人，身穿米色長褲跟成套的米色襯衫，釦子一路扣到領口。他帶著阿琳來到第一間房。「我遇過一、兩個問題房客，但其他人就還好。」他說，「有些人就是這樣，他們跟『哈克斯特寶』¹⁰的文化不對盤。他們的文化比較偏美國中南部。我不喜歡那種文化。」

阿琳用目光掃視公寓，零星的家具是唯一的點綴，但那都是些相當「時代感」的家具，《天才老爹》的年代還可能比較新。

「那個……」阿薩達用丟三落四的英文接著說，「生活就是要照規矩，該怎麼過就怎麼過。該付的帳單要付。」他清了清喉嚨，好讓聲音大點。「比如說有固定交往對象就很重要說。我會照顧黑人的小姐。但妳知道的，沒結婚沒男朋友、一個人鬧獨立，看似很了不起……可是家庭的價值要回來啊。妳要是不把家庭當回事兒，不朝走入家庭努力，那就不要說我不照顧黑人姐妹，也不要說我怎麼沒有想辦法幫你們……我這人就是重家庭，重倫理。」

阿琳在阿薩德面前一直掛著笑容，笑到他也注意到了。他這人還蠻好笑的。

「妳喜歡這間嗎？還是妳想看下一間？」

「沒差，我有地方住就行。」

一房公寓的話，月租是五百美元，照明的電費會登記在阿琳的名下。在申請表上的「原始房東」欄位中，阿琳填上的是舍蓮娜·塔佛。而在「搬遷事由」一欄裡，她思索後的回答是「包租婆是個王八蛋」。再來阿琳遲疑了一下，還是問了可不可以養貓。

「房東是說不准養寵物，但我本身是喜歡貓啦。狗我比較受不了。所以我可以幫妳爭取看。」

「那太謝謝了。嗯，那個、我們、嗯……」阿琳望向喬瑞。她爭取養貓，主要就是為了喬瑞。喬瑞對此也心知肚明，棕色大眼睛湧上淚水。「不要哭，喬瑞，你會把我也搞哭的！」於是喬瑞一轉身走向了窗戶。

阿琳決定晃去看她同輩的親戚 J. P.。她喜歡 J. P.，臉大大的，處事又隨和。「我們去看看 J. P. 的房東那邊有沒有搞頭好了，」她說。阿薩達人不錯，但畢竟申請過不過也不是他說了算。阿琳也想順便去探探他兒子波西的狀況。波西隨 J. P. 睡在二十六街跟錢伯斯街口的住處已經一段時間，而那兒簡直是貧民窟中的貧民窟。

賴瑞落跑後沒多久，兒童保護局就從阿琳的手中轉置了傑傑、波西與另外三名子女。「我就這樣放棄了做母親的責任，」阿琳回想當年。「當時賴瑞這麼搞，我真的很受傷，我只恨自己不夠堅強。」接下來幾年，阿琳的孩子一邊成長、一邊在寄養家庭中進進出出。「但波西始終不想回家，」阿琳表示。她記得波西十五歲時幹過一件事，是打電話去給兒童保護局，跟社工說大人把小孩子丟在家裡。「結果兒童保護局就跑來把我的孩子都帶走了。」當時她身邊已經有了兩歲的賈法瑞，喬瑞則是十歲。兩名男生後來回到阿琳身邊，但波西跟另外兩個與賴瑞生的孩子，則繼續在社福體制裡。阿琳不知道原因何在，她只知道這三個小孩的寄養家庭比她有錢，養父母可以買新衣服給孩子，每天晚上讓他們吃得飽飽的，還可以讓他們一人有一張床好睡。但波西跟同樣住在寄養家庭的一個弟弟還有一個妹妹不同，他沒有在社福

體系中停留很久。滿十七歲後，他離開了寄養家庭，從高中輟學。不再讀書的他開始當起了毒販，賣著快克。

樓梯間雖然陰暗，但推開門後的公寓卻採光明亮。這房子算是溫暖，還聞得到雞蛋跟香腸的味道。波西靠坐在沙發上，反戴棒球帽的他顯得消瘦。在看到阿琳跟兩名弟弟之後，他一把抓起了故意「整形」成像點四五手槍的空氣槍，朝著賈法瑞衝過去。波西用槍抵在賈法瑞的背上，然後把他撲倒在隔壁臥房的床墊。那兒有著不知道是誰看到一半的書，用反折來標記閱讀處，那本書是《加州來的私生子》(Bastard Out of California)。原本書在床上放得好好的，就這樣被這對兄弟弄到「啪」一聲掉到地上。賈法瑞笑著扭來扭去，但就是掙脫不了波西。

「老天，有人看過誰才六歲就這麼像出來混的嗎？」波西一邊笑，一邊放開了賈法瑞，最後連槍也遞到弟弟的手裡。

賈法瑞帶著笑意，把槍當成玩具。

「好了小黑鬼，把槍還來。」

阿琳搖搖頭，波西則向自己的母親點頭。阿琳請 J. P. 打電話給他的房東，J. P. 也照辦了。J. P. 的房東說樓下有間房要租人，於是在走之前，阿琳跟他約了隔天看房子。

「波西怎麼這副模樣！」阿琳一離開現場，就忍不住對著喬瑞宣洩。「瘦得跟什麼一樣！他要不是有在吸毒，要不就是他們沒給他飯吃。」她的臉上訴說著為人母的沉重與憂慮。但她趕緊甩開這樣的心情。「我現在沒空擔心這個。」

「妳要租這裡嗎？」喬瑞滿懷期待地試探。

阿琳想了想這裡的樓下。「我不知道，這裡好像太亂了，」她想像著生活中充滿著警察跟毒品。

阿琳繼續跑行程，範圍沒有離開北部。她經過了母親過世的簡陋藍色屋子，還有埃金森大道上被她稱為「快克頭之城」的一批公寓。她去看了已經被宣告為危樓的舊居，第十九街跟漢普頓大道上的這個老家，還是一樣又矮又胖，沒有聲響，油漆也還是只刷到一半。前門張貼了一張告示說：「此建物遭違法占用，不宜人居，違者將予強制撤離。」

「天啊，我好懷念住在這裡的日子，」阿琳有感而發。賈法瑞自告奮勇要去檢查信箱，但阿琳對他笑說，「哪來的信啦，帥哥。」當初她會狠下心打電話給市府，並不是水的問題壓垮了她。供水出問題時，阿琳會想辦法湊合一下，自己辛苦一點，從附近的店家搬幾加侖的水，但後來房東好不容易帶著工具箱來了，他做的事情卻也只是在浴室的牆上到處鑿洞，完全不知道因為什麼讓水管漏水。阿琳打電話跟他抱怨，但她記得房東的回應是，「欸，我要管五十間房子耶，妳要是不想等就搬吧。」阿琳這才同歸於盡，打電話給市府的建物檢查員。「蠢斃了我。」

奈德一整天都在忙變速箱，潘則都在找房子。她的電話已經打到分不清東南西北了，還不只一次自己打去給同一位房東，好讓對方可以拒絕她兩次。這包括在午後一團亂的時候她撥到了西艾里斯的房東號碼。「女士，我們不收妳的小孩，」對方的口氣明顯不悅。

潘決定試一處朋友口中說被「快克跟妓女」占領了的公寓社區，她的如意算盤是那裡的房東不太會調查身家。但她沒想到那兒的三房竟然要八百九十五美元。潘覺得超傻眼，「這種爛地方收這麼多錢？」沒辦法了，潘只好開始看屬於拉丁裔的南部。她驅車前往「便宜租」(Affordable Rentals)房屋公司，並且嘆了口氣，「看來我也沒得選。」

在跑過三十八間公寓之後，潘只約到了兩個地方：一個在卡德希(Cudatny)這個西側以機場為界的白

人勞工階級郊區，另一個則在密爾瓦基南區。卡德希的公寓緊鄰帕克大道，室內是兩房格局，月租六百四十美元含暖氣。剛開始找房的時候，潘想得很美，她當時的預算才五百美元，「我是怕我或奈德的收入出問題，你也知道世事難料。」但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不過，與其住在被黑人團團圍住的街區，她寧可所有的錢都被房東賺去。

奈德跟潘焦急地在帕克大道的公寓外頭候著。奈德叫潘安靜點，由他來發話。潘對此並不在意，隨時都可能再當媽的她只想回家躺平。

「拜託，拜託，拜託，」潘口中念念有詞。

「你不用拜託，世上沒有神可以拜好嘛！」奈德吐槽後吐了口痰。

房東到現場後，奈德開始發揮三寸不爛之舌。「我在建築業幹了二十年」、「你這裡有哪裡需要『動』嗎？」這間公寓乾淨而新穎，臥室也寬敞到五個女兒都「塞」得進去。原本一切都非常順利，但此時房東拿出了申請表。奈德說他要付現金，但房東堅持一定要把申請表填好。

「申請好通過嗎？」奈德不禁這麼問。

「我們會檢查信用紀錄跟各種事項，」房東說。

「可是，我們的信用沒有很理想。」

「這倒還好，只要你們沒有前科或驅離紀錄就行。」

奈德跟潘約的第二個點，在第三十五街跟貝歇街交叉口，這裡主要是拉丁裔的社區，環境算是安靜。三房的房型，房東開價是月租六百三十美元。

「沒問題，」奈德說。「跟黑鬼住我沒辦法，但跟老墨住還OK。黑人跟豬沒兩樣。」

奈德咧著嘴笑，因為他想起了一個笑話。「嗯，潘，妳不會想叫黑人ㄉ開頭，」結尾的什麼東

西？……答案是鄰居！」¹²

奈德笑得超開心，而潘只能勉強擠出笑容來配合。她有時候會為此給奈德臉色看，尤其她不喜歡奈德在布麗絲跟珊卓拉面前這麼講話，也不喜歡他當著她們的面說黑色髻髮醜。但潘並不覺得奈德有說錯什麼事情，至少她確實不想要有黑人鄰居。「我寧可住汽車旅館，也不住貧民窟，」她說。「拖車公園裡至少大家都是白人，他們是白人的垃圾，但再怎麼垃圾，還是白人。」在她眼裡，貧民窟就沒有什麼黑人跟拉丁裔的區別，貧民窟就是一個大「黑村」。

房東來了，是位有著大皮帶扣的銀髮族男士，他招呼潘跟奈德進公寓。公寓本身美輪美奐：拋光木質地板、嶄新的窗戶、新刷的油漆，還有大空間的臥室。潘望出後窗，白人小孩在打理得很好的後院玩耍。房東甚至說願意「附送一些電器」。

奈德跟潘開始在這位「皮帶扣伯」耍冷時放聲大笑，也可以說他們在巴結或拍馬屁。「我看你這裡好像需要一些泥作工程，」奈德說。「我來弄的話品質保證，而且收費合理。」潘也加入戰局，幫腔說他需要找個打掃阿姨，只要等兩周她恢復身體就可以。

等的要填申請表了，奈德又換了一套戰術。「這是什麼，要填信用資料嗎？」他問道。

「你那邊就留空白好了，」房東回應。

「要是我們沒有在附近的銀行開戶怎麼辦？我們才剛從綠灣搬過來。」

「好吧，那就空著。」

揮別了「皮帶扣伯」後，潘轉頭對奈德說，「這一帶爛歸爛，但至少房子是好的。我們住的或許是貧民窟，但絕對是升級版的貧民窟。」

「搞不好我可以順便接到泥作工程的生意呢，」奈德樂觀起來。

「搞不好我可以兼差當打掃阿姨。」

奈德點了一根紅色萬寶路香菸。

「看起來我們的好運真的來了，」潘下了這樣的註腳。

奈德跟潘心意相通。他叫潘不用再抄出租廣告的電話了。「放心吧，潘，我們有地方住了。」

那天晚上，崔維斯跟奈德還有潘說，他們不能再待下去了。兩人於是住進了一家便宜的汽車旅館。他們坐在床邊一件粗糙刮人又洗過太多次的棉被上，潘緩慢呼吸，並對寶寶說話。「再忍耐一下，等我們把租約簽好你就可以出來了，再忍耐一下。」但急著來到世上的寶寶顯然沒把話聽進去。潘的羊水破了，同樣在汽車旅館留宿的一名女士好心載著潘、奈德還有克莉絲汀來到醫院。新生兒重約三千五百克，奈德覺得以女孩兒來說好像還蠻「大隻」的。「看吧，誰說抽菸會讓嬰兒體重不足的。」奈德露出笑容。按照醫囑，他們一家三口在醫院待了兩晚，但還是得付只放了行李的汽車旅館費。

寶寶出生後過四天，「皮帶扣伯」來電說，他們的申請已經通過了。潘「名下」有兩次被驅離的紀錄、有重罪前科，而且還在領救濟金。奈德有通緝令在身，提不出穩定的收入來源，落落長的前科裡有三次被驅離，不只一次因為毒品被判重罪，也曾因危險駕駛跟攜帶槍械而被判過好幾回輕罪。他們有五個女兒。但這樣的他們是白人。

潘原本是比较偏向帕克大道的那間公寓，雖然房子比較小，但那兒畢竟是卡德希街，只可惜房東對他們說不。因為有驅離紀錄跟法院前科，他們進不了白人社區，但卻也陰錯陽差地讓他們來到了密爾瓦基北區人心中的夢幻鄰里。

只可惜奈德又砸鍋了。入住新家才三天，他就醉醺醺地跟樓上的鄰居起了口角。房東要他一周內走人，而他也轉眼就在德基的車庫附近的藍領白人地區找到了一間乾淨的兩房公寓，月租是六百四十五美

元，屋外有棵西洋梨樹。這房子是奈德獨自申請的，租約上沒有提到潘跟兩名黑人女兒。「單親爸爸比較好租房子，」他這麼跟潘說。房東果真接納了他。

「所以房東不知道有我、也不知道兩個女兒的事對吧？」潘不禁追問。

「現在不知道，但慢慢總會知道的啦。先找到房子比較要緊，我也不一周內就搞定了嗎？」奈德把手舉起來，就像在接受表揚似的。「看吧，老天爺不會虧待好人。」

搬進新家後不久，有名鄰居介紹了蓋房子的工作給奈德，而潘則當起了醫療助理。奈德吩咐布麗絲跟珊卓拉，萬一房東問起，要說她們不住在這裡。除此之外，他還對布麗絲與珊卓拉亂說話，「妳們就跟著妳們的老爸一樣蠢」、「妳這半黑鬼的小雜種」。有一天他甚至心血來潮，把女兒統統叫去繞著房子呼喊「白人最強」的口號。

這些行徑讓潘心力交瘁。她只希望奈德這搞法不會在女兒心上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她祈禱上帝可以原諒她這個失職的母親；但她還是覺得情勢由不得她擺脫奈德。「這種生活很糟，」她這麼跟自己說。「我們沒在吸快克了，但我們每天還是得面對一堆亂七八糟、狗屁倒灶的事情……我實在沒辦法說走就走，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她頂多能在沒人打擾時跟女兒們說奈德是惡魔。有些時候，到了晚上、在入睡之前，潘會閃過一個念頭是自己不能就這樣帶著女兒去住遊民收容所，或是去睡高架橋底下。「只要大家能團圓、開心，不會有人惡言相向就好。我只想誇獎女兒們漂亮，因為我的女兒都是世界上最堅強的小女人。」

阿琳又試了銀泉路上的大型公寓社區（八十八號房東阿薩達並未回電）。她撥了號碼，社區經理當場同意帶她看一個物件。

「我們回來了，賈法瑞！」喬瑞又笑又叫。

「不要這麼講話，」阿琳說。

「這是我們的家耶！」喬瑞欲罷不能，邊說還邊肘擊他的弟弟。

「不要再說了！」這次阿琳已經是大聲地在哀求。

又歷經了一次帶看、一次申請之後，母子三人依舊回到人行道上。

「我餓了，」賈法瑞說。

「閉嘴，賈法瑞！」阿琳的理智則瀕臨斷線。

過了幾分鐘後，阿琳掏了掏口袋，攢足零錢，到麥當勞給賈法瑞買了些薯條。

一天下來，阿琳跟兩名兒子開始往在第十三街的老家踏上歸途。阿琳有雙鞋還留在那兒。隨著老家愈來愈近，他們發現小不點在屋外的雪地裡用貓掌拍著門板。喬瑞跟賈法瑞朝著牠衝了過去。喬瑞抱起小不點，然後將牠交給賈法瑞。賈法瑞把貓咪抱進懷裡猛親。

「把貓放下來，真要命！」阿琳大喊。她扯開了賈法瑞的手臂，小不點就這樣掉回地上。

一個人的時候，阿琳偶爾也會替小不點掉淚。但她想教給孩子的是不要太多有愛心，也不要奢望他們得不到的東西。阿琳這是在保護他們，也是在保護自己。不然一個沒辦法讓孩子吃飽穿暖的單親媽媽，還能怎麼樣保護自己呢？做父親的人沒錢，可以像賴瑞那樣一走了之，可以歸零之後再設法重新來過。¹³ 但做母親的人沒錢呢？也只能吞下肚，認命地過下去了吧——至少大部分的窮人媽媽是這樣。

阿琳的孩子不是一直都有家可住，也不是一直都能吃飽穿暖。阿琳並不能給孩子穩定的生活，穩定是一種奢侈品。她沒辦法永遠站在孩子跟危險的街頭之間扮演屏障，那些是屬於她的街頭。阿琳會為了孩子犧牲自己，會盡其所能餵飽他們，也會拚了命讓他們有衣服穿。但遇到他們要的超出她做母親的能

力時，她也會時而委婉、時而不加修飾地讓他們知道，他們沒這個福分。喬瑞如果想要青少年都會想要的東西，比如新球鞋或者酷炫的髮型，她會直接說他自私，說他壞。賈法瑞如果一哭二鬧，阿琳有時候會吼他，「拜託，你真的很難伺候，臉擦一擦不要哭了！」或者「你再哭，等下我打你屁股！我早就覺得你很欠揍了。」有時候賈法瑞餓了，阿琳會說，「別進廚房，我知道你不餓，少騙我！」或跟他說他太肥了，叫他離空蕩蕩的櫥櫃遠點。

「對不起，是我沒用，」說到一定的程度或次數，你會開始覺得自己是個廢物，你會看到自己即將瀕臨崩潰。然後你就會開始反射性地保護自己，替自己開脫，「不，我不幹。」既然我幫不了你，那就當你不值得幫助吧。¹⁴

黑人社區裡那一票牧師跟教會的女士、社工、民意代表、老師跟鄰居、警察跟假釋官會說你的做法正確，他們會說黑人的年輕人跟小孩不分男女，就是需要嚴格管理跟紀律。不要溺愛他們，該罰就罰，該打就打。於是原本只是出於求生本能的做法，慢慢就以文化之名延續下去。¹⁵

他們慢慢步行離開了第十三街，放著小不點、還有他們殘破的家當散落在雪中。這時賈法瑞張開手，露出了掌心裡的一對耳環。

「你從哪裡找來的，賈法瑞？」阿琳問道。

「從克利絲朵那兒偷來的。」

「喔！哇嗚！」阿琳頓了一拍然後說，「這不好玩，也不應該。賈法瑞，你有聽到我說的話嗎？」賈法瑞的臉色一沉。他只是想要替自己的媽媽做點貼心的事而已。阿琳知道他的心意，也覺得感動莫名。她之後會把耳環還回去，但在這個當下，她把耳環帶上去。賈法瑞為此露出了笑意。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地方要去。隨著天色變成墨水般的藍色，氣溫下降，阿琳見了另外一位身穿法蘭

絨襯衫跟工具皮帶的白人房東，他正忙著修理一間兩房的公寓，而且匆忙的程度讓阿琳不禁懷疑是否為了應付隔天的檢查員。她填好了申請表，賈法瑞則跑去使用廁所，這孩子發現水不能沖時已經太遲。阿琳只好謝過房東，牽起賈法瑞衝出去。

但該來的還是要來，幾分鐘後，阿琳的電話響起。「你們有夠差勁的！」房東大吼。「這樣的小孩我肯定受不了！」

阿琳跟兩名兒子能暫待收容所的日子，還剩二十九天。

註釋

- 1 居住正義不能彰顯、住的需求得不到保障，是導致低所得者職場生涯不穩定的一大原因。跟卡爾·葛沈森（Carl Gershenson）一起，我們針對《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的資料組（data set）帶入配對技術與分立的風險模型，結果我發現，如果低所得的勞工並非出於自願失去住處，則他們的失業率也會顯著升高。我們檢視了工作史相對穩定年工作相當不穩定的兩類租屋者，觀察了被驅離對他們造成的影響，結果我們發現，無論哪一邊，被迫搬遷都是失業的一項元兇。Matthew Desmond and Carl Gershenson, "Housing and Employment Insecurity Among the Working Poor," *Social Problems*, forthcoming.

- 2 蒂娜（Tina）的遭遇值得人深思。身為要撫養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蒂娜在一家地景設計公司兼差，工作內容是輸入資料與接聽客服電話。在她收到驅離通知單之後，托賓就開始打電話到公司威脅她要付六百美元，否則就要執行驅離（蒂娜表示自己只欠一百美元）。為了不向驅離通知單低頭，蒂娜好幾次出席法院聽證，有時還為此沒去上班。她的案子雖然尚未定讞，但幾名郡治安官跟一名老鷹搬家的員工已經出現在她的拖車門口。蒂娜十幾歲的女兒擋了他們一陣子，蒂娜才得以趕回來解釋情況。蒂娜已經在找新家，但好幾個房東都不收她，主要是她有驅離官司在打，然後又說她信用不

佳。沒多久，蒂娜的工作表現開始不穩。抑鬱加上事情太多，她開始請病假。就算勉強進了公司，她也會犯像是忘記申請維修等大小差錯。據她說，這是因為驅離官司的壓力太大。有一天在辦公室，蒂娜在辦公桌前崩潰啜泣，同事跟主管就在一旁圍觀。法官認同蒂娜的租金被多收，但她依舊遭到驅離。她開始靠著朋友跟熟人接濟過夜，後來則帶著女兒搬進一個對她有興趣的男人家裡。男人家距離蒂娜的公司很遠，她開的車又經常拋錨。種種情形都助長了她遲到跟缺席的情形，蒂娜的案例顯示了驅離與失業間的多重關聯。驅離的折磨與破壞力影響到她的工作出勤，也打擊到她的工作能力。被迫流離失所加上無力扭轉現實環境，蒂娜只能愈搬（離公司）愈遠，而這又回過頭來增加了她遲到跟曠職的風險。得依靠萍水相逢的男人才有地方棲身，更是額外為她平添了人際關係上的複雜性與需求應付。

3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3.

4 這些母親的信寫於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間，去函的目的是要申請底特律的公共住宅。Detroit Housing Commission, "Children Not Wanted:" *The Story of Detroit's Housing Shortage Victims Told in Their Own Words* (Detroit: Detroit Housing Commission), 1948.

5 Jim Buchanan, *Fair Housing and Familie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ldr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Bibliography # P1732 (Monticello: Vance Bibliographies, 1985).

6 Mary Ellen Colten and Robert Marans, "Restrictive Rental Practices and Theory Impact on Famili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 (1982): 43-58, 49.

7 Edward Allen, "Six Years After Passage of the Fair Housing Amendments Ac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dministrative Law Journal of American University* 9 (1995): 297-359.

8 不同於眾所周知的種族或性別歧視，美國人大多對法律明定不得歧視兒童一事渾然不知。Rigel Oliveri, "Is Acquisition Everything?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Occupants Under the Fair Housing Act," *Harvard Civil Rights-Liberties Law Review* 43 (2008): 1-64, 5. 根據全美樣本所做出的一份報告顯示，大部分的受訪者都知道種族歧視、宗教歧視與能力歧視，但僅百分之三十八的人知道「對育兒或未育兒家庭的差別待遇，被法律明文禁止。」此事可參見 Martin Abravanel and Mary Cunningham, *How Much Do We Know?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Nation's Fair*

- Housing Law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02), 10. 據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Live Free: Annual Report on Fair Housing*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0). Fair Housing of Mari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ies with Children in Rental Housing* (San Rafael: Fair Housing of Marin, 2002); Gulf Coast Fair Housing Center, *An Audit Report on Race and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in the Mississippi Gulf Coast Rental Housing Market* (Gulfport: Gulf Coast Fair Housing Center, 2004).
- 9 譯註：蓋頭帽 (kufi cap) 是西非男性的傳統服飾，甚至是部分非洲國家的國服。在美國，蓋頭帽基本上可跟西非族裔畫上等號。西非裔戴蓋頭帽是一種彰顯自身文化、歷史與宗教的自豪之舉，其中會帶帽的宗教包含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或傳統非洲宗教等都有可能。蓋頭帽可以以各種布料針織或鉤針而成。
- 10 譯註：原文為 *Huxtable*，典故出自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二年間於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 播出的情境喜劇《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戲裡的主角就是「哈克斯特實」一家。因為該戲，所以「哈克斯特實」一詞有時會被黑人用做貶意詞去形容「黑皮白骨」的假白人，也就是中產階級以上、模仿白人生活的那些黑人。
- 11 《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
- 12 奈德確實居無定所，到處遊蕩，但他還是會像非裔美國社會學家暨泛非民權人士威廉·愛德華·伯格哈特·杜波依斯 (W. E. B. Du Bois) 所說，從貶低黑人等行為上得到「心理上的薪資給付」。See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Cleveland: Meridian Books, 1969 [1935]), 700.
- 13 羞辱的重量，一直是社會學家認為窮困黑人社區中許多婚姻失敗的元兇。特別是男人一旦失業，沒錢也沒臉面對家人的恥辱，會持續累積，直到這種心情比拋家棄子更令其不能容忍。留在固定的(婚姻)關係裡，就等於是「終日與失敗共處，日復一日跟自己的不堪面對面……作為一種自我防衛，做丈夫的會朝著街頭撤退。」單親媽媽就沒有這種在街角「當駝鳥」的權利。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135-36. See also Kathryn Edin and Timothy Nelson, *Doing the Best I Can: Fatherhood in the Inner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 14 「母親國」的總統都是這樣跟她們飢渴的孩子公民們說的。Orlando Patterson, *Rituals of Blood: Consequences of*

Slavery in Two American Centuries (New York: Basic Civitas Books, 1998), 134; Nancy Scheper-Hughes, *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76; Carl Nightingale, *On the Edge: A History of Poor Black Children and Their American Drea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76-77; Patterson, *Rituals of Blood*, 133-34. 在奴隸與佃農制度 (sharecropping) 的年代，黑人父母往往以高壓的手段來管教孩子，這是為了讓他們「準備好面對由白人掌權、黑人必須如履薄冰的世界。」 Jacqueline Jones, *Labor of Love, Labor of Sorrows: Black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 revise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96. 後來到了各種「吉姆·克勞」(Jim Crow；黑人的貶意語) 法律的種族隔離時代，黑人父母時不時會訓練子女低聲下氣跟順從命令。「在底層的(黑人)家庭裡，」有人觀察，「孩童所受的教育是他是個『黑鬼』，並且必須好生侍奉白人，因為白人是他們沒得選擇的老闆。」當時的黑人家庭間流傳著一種說法是：「世界屬於白人，你們這些黑鬼跑錯地方了。」參見 Jennifer Ritterhouse, *Growing Up Jim Crow: How Black and White Southern Children Learned Ra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98. 今日的狀況是，窮困的母親面對孩子會比較不支持，也比較沒有得失心，比較不會主動關心孩子有什麼需求，欲望跟夢想。這些母親較少擁抱孩子，也鮮少誇獎他們。受經濟剝奪程度較高的母親會更常打罵孩子。社會學者奧蘭多·派特森 (Orlando Patterson) 甚至直言，「底層非裔美國家庭對兒女的教養，有朝施虐發展的傾向。」這類令人憂心的模式，有一個標準的解釋是：「貧窮會讓做母親的人易怒、抑鬱加上焦慮，進而削弱其以正面與支持的態度教養孩子的能力。雙親一旦易怒、抑鬱加上焦慮，他們面對孩子就會傾向於用處罰代替鼓勵。」可總結為「貧窮」一詞的諸多弱勢與創傷，會吸乾為父母的喜悅。不過，易怒、抑鬱與焦慮的不僅僅是窮困的母親，這些症狀不單是貧窮者的專利，貧窮的專利就只有貧窮而已。像阿琳這樣的母親，會偶爾以照顧者之姿流露出嚴峻的態度，是出於無奈，是因為她得在匱乏中養育下一代。這些母親之所以選擇尖峰相對與冷如冰霜，是出於保護孩子而不得不如此的考量。這種冷酷是面對匱乏的一種防衛機制。Patterson, *Rituals of Blood*, 133. 眾多的文獻都將非支持性與處罰性的教養風格，連結到孩童的低自尊、高攻擊性與反社會行為。可參見 Robert Bradley and Robert Corwy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2002): 371-99; Elizabeth Gershoff, Rashmita Mistry, and Danielle Crosby, eds., *Societal Contexts of Child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Influ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and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Vonnie McLoyd, "How Money Matters for Children's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 Family Processes and Parental Investment." *Health Disparities in Youth and Families* 57 (2011): 33-72. 在開發中國家裡，嬰兒生病的母親會因為匱乏帶來的壓力，而認為她們的寶寶「一心求死」。她們會自我安慰說，「小傢伙感覺不到任何事，」藉以麻醉自己，放任自己漠不關心。「在這裡，」人類學者南西·薛珀·休斯 (Nancy Scheper-Hughes) 寫到巴西的貧民窟 (鐵皮屋區)，「要有超人的努力才能當一位勉強及格的雙親。」Scheper-Hughes, *Death Without Weeping*, 342, 128, 361.

第二十章

顧人怨的北部

「旅社」坐落在第七街跟凡恩街的路口，離舊城區不遠。住友聚集在入口處聊天、抽菸、追著自家孩子跑，這是此處的日常。二月的最後幾天，克利絲朵大部分的時候都待在這裡。在法院發給克利絲朵的驅離通知裡，舍蓮娜勾選了「房東希望回收物業的理由如下：」這一格，然後以書面陳述她的意見：「與樓上跟樓下的房客衝突不斷（均報警處理）。擅自轉租房子給遭到驅離的房客。」克利絲朵看得一頭霧水。阿琳的事情舍蓮娜從一開始就知情，這樣還能主張她是「擅自」當二房東嗎？總之她打好兩包透明的垃圾袋，沒出庭就自顧自走了，她誤以為這樣就可以顧全自己的名聲。

克利絲朵覺得「旅社」吃的東西已經夠爛，還會有些來修繕的男性工友拿乾淨的床單、點心或洗髮精來跟住戶搭訕，看有沒有人要跟他們上床。¹但她喜歡她的房間，溫暖、乾淨且自由。克利絲朵說，「要是沒有一丁點的好處，我才不付五十五元。」再者她需要新朋友，而「旅社」在這方面的功能相當強大。「旅社」會把數十名走投無路的傢伙湊在同一個屋簷下，按照收容所住友的法子是，他們每個人都「有某些事情需要處理」²。

克利絲朵儼然是萬人迷。風趣的她善於跟人打成一片，而且動不動就會鼓掌叫好，甚至連自嘲也很在行。她會漫步走出「旅社」的門口，唱著福音歌曲的她兩手舉得高高的，像在讚美主似的。克利絲朵身邊不乏追求者，但她交新朋友最大的目標、就跟她想從阿琳身上得到的東西一樣：她想要的是母親般

的角色，而這一點她也在凡妮塔身上得償夙願。

凡妮塔·埃文斯從一月開始就待在「旅社」。二十歲的她不比克利絲朵大多少，但她成熟得很快。凡妮塔十六歲時第一次當媽，生下了小坎達爾，隔年生了女兒覃比，再隔年又生了男孩波波。你可以說凡妮塔是在芝加哥不怎麼好拿來說嘴的羅伯特·泰勒國宅（Robert Taylor Homes）長大的，也可以說凡妮塔跟兄弟姊妹壞嘴叫著的「酥餅」（她們精神障礙的母親）帶著兒時的凡妮塔住遍了「伊利諾斯州跟威斯康辛州大大小小的遊民收容所」。克利絲朵喜歡凡妮塔的模樣跟氣質，她不會有那種不知所措的時刻。凡妮塔會把頭髮在後腦勺綁成小巧的馬尾，甚至於會把手機穿在皮帶上，就跟某些房東一樣。凡妮塔黝黑的棕色皮膚跟克利絲朵很搭，沙啞的嗓音彷彿可以在夜店駐唱，但她對孩子幾乎都輕聲細語，很少大小聲。她只要使個眼色，三個小孩就會乖乖排好。小坎達爾如果頑皮，凡妮塔就會作勢要打電話給大坎達爾，也就是孩子的爹。小坎達爾也知道媽媽只是做個樣子，但他還是會因此安靜下來。波波如果癩癩發作，她也會趕緊把他送去醫院。³

這兩名女人開始在香港上互通有無，她們會各自記住給了幾包又收了幾包的 Newport 牌香菸。不久後她們就開始「加注」，循序漸進但也毫無畏懼地朝著互惠的關係前進。她們開始交換點心，然後是小額的鈔票，再來又變成在速食店買的餐點。她們慢慢在閒談中探得了彼此的斤兩——克利絲朵知道凡妮塔從社福體系月領六百七十三美元，外加三百八十美元的食物券，也慢慢知道了彼此的個性與脾氣。克利絲朵跟凡妮塔開始以姐妹互稱。⁴一周後，她們決定一起去找房子。她們打算從遊民收容所內的室友升級成遊民收容所外的室友。

克利絲朵不覺得凡妮塔將至的刑期宣判有什麼好擔心。「禱告有無與倫比的威力，」她說。凡妮塔覺得就算耶穌不插手，她也很有機會可以躲掉牢獄之災，畢竟她是初犯。

凡妮塔會惹上麻煩，起因是老鄉自助餐（Old Country Buffet）砍了她的班表。比起之前一周可以工作五天，她現在一周只剩一天班。經理把責任推給不景氣。問題是這樣一來，凡妮塔就付不出電費了。Energy 能源公司威脅她要付七百零五美元的欠費，否則就要斷電。她怎麼可能付得出這些錢跟房租。但她又怕一旦燈跟瓦斯沒了，兒童保護局會跑來把孩子帶走。一想到可能失去孩子，凡妮塔就痛徹心扉。接著她拖欠房租，然後就收到了驅離通知單。她既無助，又害怕。跟她一樣收到粉紅色驅離通知單的某位朋友也有著相同的感受。有一天，在凡妮塔男朋友在場的情況下，這兩名女人坐在廂型車裡看著另外一對女人，帶著錢包走進了百視達要租片。突然有人提議搶這兩個女人，然後把搶來的錢分了。說時遲那時快，三個人已經變身搶匪。凡妮塔的男友掏出了槍，遞給她的朋友，而朋友則從廂型車裡衝出去，用槍指著來租片的兩個女人。凡妮塔跟在後面，搶過了皮包。警方僅花幾個小時就把他們統統逮捕歸案。⁵

凡妮塔在筆錄中供述，「我急著繳納各種費用，我很緊張、害怕，不希望孩子待在烏漆抹黑的家，也不希望他們流落街頭。」一滿十八歲，凡妮塔就開始登記排隊等公宅。如今有了重罪的案底，她這輩子排到的機率幾乎確定歸零。⁶

在答辯的聽證會中，法官告知凡妮塔她可能會「被判有期徒刑四十年，還可能並併科罰金高達十萬美元。」凡妮塔試著不想這些。聽證會開完她先是丟了工作，然後又從租屋處被驅離。這就是她來到「旅社」之前的背景。

克利絲朵跟凡妮塔說好只在屬於拉丁裔的南部找間公寓。有時若感覺上帝在對著她們微笑，她們甚至也會稍微看一下白人社區。總之她們完全不考慮的是北區。「離這些渾蛋王八蛋的黑人遠一點就對

了，」克利絲朵說。⁷ 大方向釐清之後，她們開始每天搭巴士去南區看招租的招牌。即便現代已有一堆租屋網站，但房屋出租的實體招牌仍是有如「燈塔」一般，舉目可見而且效果不差，在少數族裔的社區裡尤其盛行。黑人房客僅百分之十五透過網路找房。而因為不參考平面或網路媒體的刊登資料，所以克利絲朵跟凡妮塔的選擇僅限於她們肉眼可見的物件，而且眼力還得通過起霧公車車窗的考驗。⁸

這對新朋友看了一間兩房的小物件，最後她們沒有申請的原因是房東禁菸。又有某位房東被她們掛了電話，因為對方開口是用西班牙文說話。「兩房你收一個月六百五十美元，你瘋了嗎？」克利絲朵這麼跟某個房東噏聲。在聯絡了十二個地方之後，凡妮塔提議試試看「便宜租」。這間公司位於國家大道（南區最主要的汽車大道）上的店面超小，你很難想像它們在密爾瓦基是低價租屋市場的巨擘。「便宜租」擁有超過三百個招租物件，其負責管理的物件更接近五百處。⁹

「不要來這兒找貧民窟的房子啦，」凡妮塔在要進門前又提醒了克利絲朵一遍。

但她們還是進了門，繳了押金，然後接待人員從厚玻璃後給了她們主鑰匙，好讓她們可以自己去看房子。就她們看到的部分來說，「便宜租」旗下的房子都偏小但算乾淨，唯一的例外是後院有尿布跟廢輪胎的那間；而最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則是一戶兩房的公寓，不但附浴缸，房租還只要四百四十五美元。凡妮塔一直希望住處有個浴缸讓小孩泡澡，兩個女人於是趕忙回「便宜租」填申請表。這時她們才注意到「便宜租」在牆上用膠帶貼了張審核標準：

符合下列情事之申請者，恕本公司不予出租：

1. 無保人的首次租屋者。

2. 近三個月有遭驅離紀錄者。
3. 近七年遭毒品重罪或暴力犯罪定罪者。
4. 近三年遭毒品輕罪或行為不端起訴者。
5. 無法證明收入或收入不足者。
6. 無法確認租屋紀錄或其房東評價欠佳者。

克利絲朵跟凡妮塔沒把這告示當回事。在共同的租屋申請表上，凡妮塔填上了她的雙胞胎兄弟當推薦人，克利絲朵則填了她在教會的乾媽。

在等待「便宜租」回覆的期間，凡妮塔有想到要不要去看一下超過她們五百五十美元預算的物件，但她其實不想把租金往上加，主要是因為她不知道克利絲朵能不能守得住錢。在「旅社」，她親眼看過克利絲朵把收到的支票砸在買衣服、速食，甚至是賭場的吃角子老虎機上。「小姐，我真的很想往妳臉上打下去，」凡妮塔會氣到這麼說。每個月的第一個主日（周日），克利絲朵還會把不少錢丟到捐款籃裡。

「我這是在積德，是在播種，」克利絲朵說這話的同時，正與凡妮塔在連鎖的喬治·韋伯漢堡店（George Webb）裡。克利絲朵說要請客。她前一晚剛用寄養機構送的四十美元生日禮物當賭本，從波塔瓦托米賭場贏了吃角子老虎機四百五十美元。女服務生送來了克利絲朵要的熱水，她便把自己的鐵湯匙往杯裡一插洗她的餐具。「記得我上次跟妳解釋過的嗎？妳就當自己是個農夫，妳把玉米啊、青菜啊的種子種下去，然後該澆水的澆水、該打理的打理，這樣有天妳就能收成。我在教會就是在播這個種。我有求於上帝，所以我要播這個種……我需要有房子住、我需要發點財、我需要療傷、我需要有人把破掉的我『拼』回去。這樣講妳懂嗎？」

凡妮塔一臉不為所動。「這就是為什麼我不上妳那間教會，他們根本沒東西給妳，但意見又那麼多。我不喜歡那樣。然後妳又跑去他們那邊，跟他們說妳現在多慘又多慘，但他們有在乎嗎？」

克利絲朵看著眼前的食物。「我也不知道，」她說。「我只是等著搬家。」她試著轉移話題。「那個起司蛋糕看起來超棒。」

但凡妮塔沒有就這麼算了。「不要擺臭臉給我看，」她說。「妳在繳『什一稅』¹⁰的時候，教會那些混蛋王八蛋可都笑得合不攏嘴呢。」

「才沒有！才沒有！」克利絲朵搖起頭來。

「妳一直把錢往他們的籃子裡丟！不要說什麼『才沒有！』我周曰去都有看到啊。」

凡妮塔不是不知道教會對克利絲朵來說意義重大。她聽過克利絲朵滔滔不絕地講巴柏牧師傳道時如何，講主教們怎樣怎樣，甚至會講到聖靈。她看過克利絲朵在主日上教會、周二也上教會、周五也上教會，甚至有時候連周六都特別去參加禮拜。如果「各各他山五旬節派教會」¹¹的教區不是克利絲朵的家人，那她在這世上應該就沒有家人了。但克利絲朵的教會也是凡妮塔最大的勁敵。每當克利絲朵將錢丟進奉獻籃裡去積陰德、播下一些「種子」，凡妮塔就少一點跟她把家弄起來的共同基金。凡妮塔原本不曉得克利絲朵有沒有把她說的話聽進去，直到當天稍晚她撞見克利絲朵對著電話另一頭哭，一邊還像是在禱告般地發出「喔，先塔。喔，先塔。」的嚙語。

時間接近傍晚，凡妮塔得回去上高中同等學力的課了。「別走，」克利絲朵開口留她。

「我不能翹課，我想拿到這個學歷，」凡妮塔這麼回應。

「妳真的不能翹課嗎？」

「除非真的有急事。」

「賤人，妳還不是會去找房子，我現在才是真的有急事。」

凡妮塔一笑置之，照常走人。

克利絲朵原本應該繼續去找房子，但她臨時決定改去教會。「各各他山五旬節派教會」位在第六十街跟國家大道的路口，以整個密爾瓦基市來說，是在西南邊的角落，坐公車能抵達。教會外觀看起來是棟討人喜歡的磚造建築，窗戶鑲著彩色玻璃，雨水的排水管則漆成消防隊的紅色。這時是周一晚上，所以教會開了食物廚房。

克利絲朵拿了一袋生活雜貨，從牧師手中接過熱狗。狄克森主教逗了一下克利絲朵，說她怎麼在禮拜的時候傳簡訊；但克利絲朵也不甘示弱地回嗆，他老人家替上帝賜福給那麼多人，牙齒掉光了沒。她叫阿塔雅姐妹把她家的母狗帶來做禮拜。「有什麼不可以？搞不好狗狗很有悟性，聽得懂聖經。」語畢兩人相視而笑。強森長老人也在，而且講道的興致還很高。「我們的靈裡若真有耶穌基督，」他說，「那我就應該要能感受到妳的痛苦，妳也應該要能感受到我的痛苦。」

但話說回來，強森長老其實感受不到克利絲朵的痛苦。這倒不是說他像凡妮塔指控的那樣對人漠不關心，而是他對克利絲朵的痛苦並無所悉。事實上，無論是強森長老、狄克森主教，還是阿塔雅姐妹，他們都不知道克利絲朵待在「旅社」，巴柏牧師是唯一的知情人士。克利絲朵不想被自己教會的成員看不起，不希望他們覺得該可憐她、或覺得她窮苦無依。她希望教會朋友眼中的她是「克利絲朵姐妹」，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¹²，是蒙福被愛的人。每隔一段時間，克利絲朵會收到一袋食物，教區教友會對她敞開家門，讓她住個一、兩晚。但她的教會絕非用來滿足克利絲朵的眾多需求。¹³教會能給的只有一顆平靜的心靈。

「妳有最喜歡的章節嗎，姐妹？」強森長老問這麼問，因為他看到克利絲朵拿起了身邊的一本聖經。

「不要點名我，我會不好意思。」她露出了微笑，「我最喜歡『祂必殺我，我雖無指望，然而我在祂面前還要辯明我所行的。』」¹⁴

克利絲朵跟凡妮塔持續在找房子。有時候凡妮塔會帶著孩子一道去找，有時候她會先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或她姐姐埃柏妮那兒安置。在跟克利絲朵一同造訪第三十二間公寓時，凡妮塔有帶孩子在身邊。第三十二間公寓位在第十五街跟麥迪遜大道的交叉口。房東踏出了他的紳寶房車，給一間格局不大的兩房公寓開了門。今天看房子的行程會排在晚上，是因為房東白天是公務員，而且上班地點在麥迪遜市。他是名健康的波多黎各人，身上穿的是打褶的西裝褲跟上班族襯衫。

這間房有幾個特點是小、悶，外加沒有浴缸。在被帶著走了一圈之後，凡妮塔問房東有沒有其他房子是有浴缸的。他說他有，並且開始大談另外一間公寓。那個地方大些，也比他此刻正在帶看的物件來得舒適，但租金卻是一樣的錢，沒有比較貴。但突然間，彷彿像是忘了該說什麼，房東戛然而止。他的手伸向口袋，講起手機。凡妮塔跟克利絲朵都沒睡，她們都知道電話是假的，房東只是假裝在跟人講話。掛上不存在的電話之後，房東說剛剛有合夥人的插播，而他們那間好一點的大房子剛租出去了。

兩名女人站在外邊，眼睜睜看著紳寶房車的背影離去。克利絲朵掏出了她的MP3播放器，戴上耳機。一旁的凡妮塔則氣到發抖。「氣死我了，」她輕聲說。

「振作起來，你得把心治好。」¹⁵ 克利絲朵唱起歌，眼睛閉著，身體隨著節奏前後擺動。

「這傢伙根本是一副『哎呀，她們不就是兩個黑人，她們來住也只是糟蹋了好地方而已』的嘴臉。」凡妮塔俐落地抹去了一滴眼淚，咬住顫抖的下唇。她的小孩則抬頭看著媽媽，一臉不解。

「振作起來，你可以飛啊飛，飛啊飛，」克利絲朵愈唱愈起勁。

密爾瓦基人大多認為這座城市會有種族隔離，是出於居民的選擇，這就是大家要的。但貧民窟其實一直都是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不是出於誰真的希望弄出一個貧民窟。¹⁶ 貧民窟絕不是現代化城市的副產品。一定要說的話，貧民窟是工業化跟都市化的意外和悲劇，是沒有人可以從中得到任何好處、也沒有人會故意去弄出來的東西。貧民窟始終是土地資本化的一大特色，而對從土地稀缺、房子年久失修、跟種族隔離中看到商機的人來說，資本化的土地正是他們的搖錢樹跟金雞母。

這或許得從十五世紀晚期說起，得從戰爭與武器的演進說起。隨著鐵製砲彈的問世，人類城市再不能單靠壕溝跟最基本的壁壘來抵擋攻擊。複雜的防禦系統必須建立，城市必須在高聳的牆垛後朝著垂直發展。日內瓦跟巴黎古城都有蓋到六層樓高的廉租公寓；愛丁堡更自豪他們的公寓有這的兩倍高。隨著務農的家庭被從平地趕到擁擠的城市裡，人對空間的競逐便衝高了土地的價值與房租。都會區的房東「秒懂」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貧民窟的商機無限，貧民窟就是他們的聚寶盆，「龐大利益之所在，不在於提供第一流的住宿環境給財力無虞者……而在於對著連富人的零錢都擠不出來的傢伙，兜售簡陋而窘迫的棲身之所。」¹⁷ 從十六世紀開始，貧民窟就不只是被放逐者、乞討者與雞鳴狗盜者的專利，而是廣大人口的集中地。

在三步併作兩步的都市化過程裡，美國也把這個模式從外界引進了國內。坐擁土地的英國仕紳的制度跟玩法，被殖民地領主原封不動地從英格蘭移植到美利堅。這當中包括繳租義務的絕對責任制，也就是不管你是火燒還是水淹，反正時間到了就得交錢。綜觀整個十八跟十九世紀，美國窮人所住的不外乎地窖、閣樓、牛圈，或者好幾戶擠在一個無窗可開的房間。¹⁸ 有些貧民窟完全被切斷了基本的城市服務，鄰近的水井也不得其門而入，居民無奈之餘只得為了水到別處乞討。同時間租金水漲船高，屋況卻每況愈下。¹⁹ 直至某一天有人付不起房租，房東就會援引「扣押權」(privilege of distress)：亦即房東會扣

押房客財物並加以變賣獲利，好藉此來補償收益的損失。這種做法一路延續至二十世紀。²⁰

有了種族壓迫的為虎作倀，土地剝削更是大肆擴張。在奴隸制的時代，讓田裡的黑土變黃金的是黑奴，但黑奴卻無法擁有他們辛苦耕耘的沃土。南北戰爭之後，獲得解放的黑人在土地所有權裡看到了真正自由的願景，但戰後的重建期卻只見富有的白人把持著實質上的土地，因為南方邦聯人士被褫奪或主動放棄的土地都還是還諸於原始地主的手中。以佃農之姿重返農園，黑人家庭只是落入了以耕作勉強餬口與負債的無限迴圈，栽培農場的白人業主則有愈來愈多花不完的钱。²¹於是乎黑人的家只能勉強遮風避雨，與農場主的豪宅實不可同日而語。

在二十世紀的前幾十年內，嚮往自由與好工作的非裔美國族群加入「大遷徙」(Great Migration)的行列，無數個家庭舉家從屬於南部的鄉下北上到芝加哥、費城與密爾瓦基等都會。但前腳一踏入這些大城市，後腳就被趕到貧民窟裡，而且絕大多數都開始為了租房而仰人鼻息。²²貧民窟的房東底下有一群黑白隔離而且無處可去的房客，改善殘破的屋況對他們來說無利可圖；真正有利可圖的事情，是把房子隔成一間間像「小廚房」一樣的單位。三夾板的薄牆一片片豎起，把原本的公寓搞得像「狡兔三窟」似的。沒有暖氣不足為奇，水電管路做一半也是家常便飯。於是乎黑人家庭舉凡做菜吃飯都會穿著冬天的大衣，想上廁所則只能去戶外的廁所或靠自行拼裝的馬桶。²³他們與結核病的哮喘聲朝夕相處，完全不陌生。一九三〇年代，密爾瓦基的黑人死亡率比全市平均高將近六成，元兇正是居家環境惡劣。²⁴「新政」²⁵讓美國自立國以來，白人家庭第一次真正有機會晉身為屋主，但黑人家庭卻享受不到這樣的德政，原因是聯邦政府認為擔保黑人社區貸款的風險太高，又或者某些忠於「吉姆·克勞」²⁶法律的官員從中作梗，讓非裔退伍者無法申請軍人優惠房貸。²⁷經過三個世紀的系統性土地剝奪，我們看到的就是一群「準世襲」的黑人租屋階級，舊城區的公寓需求則被人為衝高。²⁸

一九五〇年代，白人的房仲界裡出現了一種「先進」的剝削技巧。這種做法主要針對被擋在房市外的黑人家庭。看準了黑人居多的社區裡的白人住戶會急於脫手，房市的炒手會先以低廉的成本囤屋，然後把這些房子以「簽約」的方式賣給黑人家庭，索價則是鑑價的兩到三倍。黑人買方必須籌措出一筆不小的頭期款，金額通常在灌水後總價的兩成五左右。入住以後，黑人家庭得全權負責屋主的各項義務，但完全沒有權益。一旦月繳變多或持有房屋的開銷讓他們無力負擔某期房貸，黑人屋主就會遭到驅離。不少人的房子就是這樣被查封、頭期款也被沒收的。這當中的利益之龐大會讓人膝蓋發軟。一九六六年，芝加哥一名房東在法庭上供述他每一處房子可賺進租金四萬兩千五百美元，但維持屋況的支出卻只需兩千四百美元。對於暴利的指控，該房東只輕描淡寫地說，「沒暴利我幹嘛買這房子。」²⁹

一九六八年的民權法案將居住歧視打成非法，但隱性的歧視還是無孔不入，防不勝防。克利絲朵跟凡妮塔也想離開貧民窟生活，但像第十五街的那類房東就會給她們釘子碰。有些房東跟「便宜租」這一類的物業管理公司會懂得如何避開歧視的地雷——他們會白紙黑字把遊戲規則寫明，然後對所有的申請人一視同仁。但這樣的「一視同仁」，放在不平等的大環境裡面，最後得到的仍舊是一個不平等的結果：黑人男性坐過牢的比率遠高於白人男性，黑人女性有遭驅離紀錄者也遠多於白人女性，因此「一視同仁」地駁回有前科或驅離紀錄者的租屋申請，到頭來打到的幾乎都還是非裔美國人。克利絲朵跟凡妮塔收到「便宜租」的回覆是申請被拒，理由正是兩人被查到曾遭逮捕跟驅離。

驅離本身就可以說明何以有些家庭住在安全的街區，有些家庭則願意跟危險當鄰居。為什麼有些小孩上的是好學區，有些孩子卻得去上運作不彰的學校，背後也是同樣的道理。基本上頓時失去家的創傷、被註記曾遭驅離的污點、乃至於急著找到地方棲身的巨大壓力，都會推著房客去將就城市裡的灰暗角落，硬著頭皮與危險共處。³⁰ 儘管這樣的現實還沒有陷進凡妮塔跟克利絲朵的心坎，她們兩人才剛經

歷找房子第一階段的新鮮感；但等到找超過五十間房子，她們會知道痛，會開始勉為其難地考慮破落的舊城區。這對新好朋友正在繞回貧民窟的路上，她們只是還沒準備好就此絕望。

克利絲朵很努力壓抑自己的情緒。為此周一晚上她沒有去找房子，而是走了趟教會。也為了壓抑情緒，她才會在第十五街的房東走人以後抓起音樂猛聽，甚至還唱起歌。「我真的受不了了，壓力太大了。但我才不會就這樣倒下呢，」她說。克利絲朵後來真的情緒爆炸，她發脾氣的對象是收容所的一名工友，觸發點則是她要乾淨的床單，對方不給。她已經因為在強制規定要上的職訓課上睡著而被盯上了，但克利絲朵將此歸因於她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在跟工友吵過之後，克利絲朵被通知請她隔天早上前搬走。

隔天克利絲朵一直在打電話。她拚命找看沒有人能收留她。但每通電話都沒有下文，天色又慢慢變暗。她嘆了口氣，打電話給巴柏牧師。果然巴柏牧師從教區中替她找到了一對老教友夫婦，他們願意救急。克利絲朵那天晚上的床，就是老夫婦的懶人躺椅。

再隔天的晚上、在各各他教會的讀經班結束後，克利絲朵回到了老夫婦的家。傾盆大雨下在灰暗而空蕩的街上。冬春之交、冰雪開始融化，會下的就是這種刺骨而愁苦的冷雨。克利絲朵敲門，老先生讓門露了個縫，但並沒有把鍊條放開。這對教友的家在第十四街跟伯雷街的交會口，算是密爾瓦基蠻出名的犯罪死角。看到是克利絲朵，這位丈夫把鎖鍊的縫拉到最寬，遞出了一小袋克利絲朵的個人物品，接著就把門關上了。

克利絲朵想說對方會有這種反應，應該是因為她一點「表示」都沒有吧，但她真的一毛錢都沒有了。原本在賭場贏到的錢，在借了四百美元給她一位平輩親戚繳房租後，也大致沒了。凡妮塔一聽說有這種事情，她的反應是：「還好我不在現場，不然我一定會當場把你打醒！妳自己都沒地方住了！我不

管那些人是妳的家人還是什麼，妳自己說妳無家可歸多久了？妳是不是應該先讓自己有個窩再說？」

但有時候，克利絲朵就是攔不住自己，就像她有一次跟凡妮塔在麥當勞吃午餐，一名小男生走過來。看起來九歲或十歲的他衣服骯髒，頭髮亂成一團，臉還腫了一邊。男孩沒有往櫃台的方向走，而是緩步在座位間穿梭，看有沒有人吃剩什麼。

克利絲朵跟凡妮塔注意到他。「妳有錢嗎？」克利絲朵邊問邊翻找起自己的口袋。這兩名女人最後湊了身上的錢，給小男生買了晚餐。克利絲朵一邊仰著頭看菜單，一邊像大姐姐般用一隻手環抱著小弟。確認過他一切OK，把餐點交到他手裡，還在道別前給了他一個擁抱。

「好像我們小時候喔，」凡妮塔話裡帶著悸動。

克利絲朵看著男孩衝過馬路。「如果我給自己買棟房子，一定讓他住進來。」

在伯雷街上，雨被風吹得斜斜落下。在街燈的黃色光束裡，雨滴彷彿無垠的銀色魚群，前仆後繼，先是條地穿過燈光，又霎時消失在周圍的黑暗裡。快晚上十一點了，克利絲朵想起她的手機，撥了個號碼。欠她錢的親戚沒接。她又撥了個號碼，寄養家庭的媽媽說她家住不下了。她再撥了個號碼。就這樣撥了又撥，撥了又撥，撥了又撥……。

註釋

- 1 我從未親身觀察到有工友找砲友找到收容所的住友上，但克利絲朵、凡妮塔與其他我在「旅社」認識的女士都說這是真的。在後續的訪談中，救世軍的工作人員表示未聽聞住友跟工友間有曖昧的互動。

- 2 窮困者的管理機構在將「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窘迫個體湊在一起之餘，也會成為「露水姻緣」的發展溫床。社福辦公處、食物廚房、求職中心、匿名戒酒社團、美沙酮門診、遊民收容所，甚至是驅離法庭中用來等候開庭的區域都屬於這類例子。難以長久的關係會在這些場所中擦出火花。關於機關團體在形成人脈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參見 Mario Smail, *Unanticipated Gains: Origins of Network Inequalit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 按照凡妮塔的說法，波波會開始有癲癇發作的症狀，是因為被日托中心的員工摔到頭。
- 4 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Matthew 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2012): 1295-335.
- 5 這段落是根據凡妮塔的法庭紀錄跟她自身的陳述。
- 6 在「國宅錄取與續住政策說明書」(Admissions and Continued Occupancy Policy, 2011)中，密爾瓦基市府的住房管理局宣稱其「對於任一家庭成員有犯罪活動紀錄，當中牽涉到暴力、傷害、毀損或其他類型犯罪活動者……的個人，住房局將不負有協助申請的需要與義務。」(第十六頁)。無論法官最後宣判的刑度為何，凡妮塔都將一輩子背著重罪的前科。她原本就是因為弱勢才會鋌而走險，如今她更將在弱勢的「無期徒刑」裡永世不得超生。
- 7 關於民眾對於種族融合的接納或排斥，我們現有的知識大多來自於發生在實驗室裡的小品研究(vignette studies)。這些研究很一致地顯示黑人是種族融合的堅定支持者，而白人則主張有所區隔。一份研究裡的多數黑人受訪者表示，他們理想中的社區是黑白人口各半，而多數白人受訪者則說，他們會搬離黑白各半的鄰里。走出實驗室去看看真正在找房子的家庭，你會發現令人不安的真實面貌。白人在搬家時會極度排斥住在黑人社區，這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連黑人自己也是一樣的心態。我從來沒遇過黑人房客說想搬進「黑白融合的社區」，諷刺的是，他們覺得只要搬離黑人多數的社區，就等於是為種族融合進了份力。我聽到的實際狀況，黑人會想著「離這些渾蛋王八蛋的黑人遠一點就對了」，就像克利絲朵說的那樣。在舊城區以外找房子的時候，阿琳也說過這樣的話，「我唯一有意見的人，就是跟我同膚色的人。」娜塔莎也說過，「黑人根本不懂規矩……只要有得選，我一定也會搬走(到郊區)！鬼才想留在這裡，一天到晚聽得到槍聲砰砰響。」從這些發言所表達的情緒裡，你找不到一點(正面的)黑白融合的欲望，看到的只有

(負面的)對黑人為主社區的排斥。關於以種族偏好為題的小品研究，可參見 Reynolds Farley et al., "Stereotypes and Segregation: Neighborhoods in the Detroit Are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1994): 750-80; Reynolds Farley et al., "Chocolate City, Vanilla Suburbs: Will the Trend toward Racially Separate Communities Continu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7 (1978): 319-44.

8 在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一年間，密爾瓦基有五成的房客是透過人脈找到租屋處，百分之四十五的房客是憑著一己之力找到房子，經由住房管理局或其他社福機構找到住處的，僅有百分之五。在靠自己找到房子的族群當中，約半數白人房客憑藉的是網路的力量，另外有三分之一是先看到招租的招牌。在靠自己找到房子的黑人房客中，三分之一是看到招租的招牌，另外三分之一是透過報紙或各地公寓協會出版的紅皮書等其他平面媒體，上網找的黑人只有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說，對黑人而言，租個公寓房子屬於「離線作業」。百分之五十八的黑人房客是透過人脈找到租屋處，白人房客則只有百分之四十一。絕大多數房客所依賴的「人脈」都是親族跟朋友，其中白人房客靠朋友的機率是靠家族成員的兩倍。有研究顯示，比起其他族群，黑人求職者受到人脈協助的程度較低，《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的證據卻大異其趣地發現，黑人在找房子時倚賴人脈的程度最高。Cf. Sandra Susan Smith, *Lone Pursuit: Distrust and Defensive Individualism Among the Black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7).

9 根據負責人提姆·波勒林 (Tim Ballering) 所說，「便宜租」旗下有三百二十二間房提供出租，受託管理的物件則有四百八十四間 (截至二〇一四年七月)。

10 譯註：基督教信仰的傳統宗教奉獻，本質上屬於歐洲封建時代對成年人課徵的宗教稅。

11 譯註：Mt. Calvary Pentecostal，各各他山意為「髑髏地」，羅馬統治以色列時期耶路撒冷城郊之山，新約全書記載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曾被釘在十字架上，而十字架就是在各各他山上。「各各他山」跟十字架一樣，都是耶穌受難的象徵。而五旬節教會則是二十世紀初根據使徒行傳第二章一至五節發起的新教教派，屬於聖潔運動 (Holiness Movement) 裡較激進的一支，其一項特色是強調以無人通曉的「古老方言」與上帝對話的能力，也就是一般認知中的「胡言亂語」(Glossolalia: speaking in tongues)，這在語言學上的定義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發出流利的音節，但不具有可供理解的意義。

12 譯註：基督教徒視教會為基督的身體。

- 13 「我們的政府存在並不是為了要照顧窮人跟沒飯吃的人，那是教會的工作，」拉蕊很尊敬的戴瑞牧師如是說。政壇的保守派人士也經常呼應這樣的看法。二〇一三年，共和黨國會議員道格·拉瑪爾發 (Doug LaMalfa) 的發言代表了黨內不少同志的心態，當時他主張低所得的美國人應該接受的是「教會的援助」，因為教會的援助「發自內心……而不是因為公僕的身分或職權所迫。」但在看到像拉蕊跟克利絲朵這樣的人向所屬的教會求救之後，我們不禁要思考人心是否蘊藏足夠的無私與善意，可以擔起永遠幫忙不完的重擔。要知道窮人需要的可不只是隔幾天發幾袋生活用品、也遠遠不是三不五時的幾百美元可以打發的（「我對社會工作的所知等於零，」戴瑞牧師承認）。按照聖經裡的描述，早期教會可以扶弱濟貧，前提是信徒「賣了田產、家業，照個人所需要的分給各人」（使徒行傳第二章四十四節）。現代的基督徒即便會上教堂做禮拜，也不像古人有那麼大的熱忱去做如此的犧牲。戴瑞牧師對他口中拉蕊的「窮人心態」(poverty mentality) 很失望，也對拉蕊不能「努力工作，量入為出」感到痛心疾首。巴柏牧師常點名克利絲朵，罵她老做些十八歲年輕人本來就會做的事情，像是夜遊什麼的。戴瑞牧師跟巴柏牧師都是神職人員，也都在過去對窮人伸過援手，但如今這兩位懷著理由認為自己不應該再這麼幫下去。政府的政策或補貼或許未臻完美，但至少這兩樣東西不會考驗人性悲憫的極限。拉爾瑪發的發言引自 Michael Hitzik, "Families on Food Stamps Would Suffer while Farms Get Fat,"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4, 2013. 關於今日黑人教會在舊城區所扮演的角色，參見 Omar McRoberts, *Streets of Glory: Church and Community in a Black Urban Neighborho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關於宗教性的體驗，參見 Timothy Nelson, *Every Time I Feel the Spirit: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Ritual in an African American Church* (New York: NYU Press, 2004).
- 14 譯註：原文為「Though He slay me, yet will I trust Him」，出處是約伯記十三章十五節 (Job · 13:15)。約伯在此責備有人不應假上帝之名來定他的罪，他還是要大聲替自己辯護，因他還是相信上帝。
- 15 譯註：Get it together, you have to heal your heart，出自美國黑人靈魂女歌手印蒂雅·艾瑞 (India Arie) 的單曲《振作起來》(Get it Together)。
- 16 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amille Zubrinsky Charles, "The Dynamics of Racial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2003): 167-207.

- 17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MJF Books, 1961), 417. See also Lewis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Hart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 18 Elizabeth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1785-18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9.
- 19 Mumford, *City in History*, 462-63;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1890]).
- 20 房東執行這項特權的程度之澈底，讓法官不得不出手讓某些謀生工具被排除在可扣押的範圍之外。tools used to earn a living. Frank Enever, *History of the Law of Distress for Rent and Damage Feasant* (London: Routledge and Sons, 1931); David Caplovitz, *The Poor Pay Mo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162-63.
- 21 Jacqueline Jones, *The Dispossessed: America's Underclasse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chapter 1.
- 22 In 1928, 99 percent of Milwaukee's blacks rented. Joe William Trotter Jr., *Black Milwaukee: The Making of an Industrial Proletariat, 1915-45, 2nd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70.
- 23 Arnold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 1; Marcus Anthony Hunter, *Black Citymakers: How the Philadelphia Negro Change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ter 3; Allan Spear, *Black Chicago: 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 189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chapter 8;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1-55; Alex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1.
- 24 Beryl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6; see also Spear, *Black Chicago*, 148; Trotter, *Black Milwaukee*, 180.
- 25 譯註：New Deal，一九三三年，小羅斯福總統上任後實施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三項主軸為Relief（救濟）、

- Recovery (復甦) / Reform (改革)。
- 26 譯註：Jim Crow。「吉姆·克勞」是對黑人的蔑稱，吉姆·克勞法則是美國南部各州在南北戰爭後的重建期設置的種族隔離法案總稱，一九六五年後才正式廢止，距離內戰解放黑奴剛好約一百年。
- 27 Michael Bennett, *When Dreams Come True: The GI Bill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McLean: Brassey's Publishing, 1966); Ira Katznelson, *When Affirmative-Action Was White: An Untold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2005).
- 28 今日黑人的房屋自有率為全美最低的百分之四十三，白人則以百分之七十三排名族群第一。Robert Callis and Melissa Kresin, *Residential Vacancies and Homeownership in the Third Quarter 2014*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October 2014), Table 7; Ta-Nehisi Coates, "The Case for Reparations," *The Atlantic*, June 2014.
- 29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430n7.
- 30 以《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年)作為資料來源，崔西·薛倫伯格(Tracey Shollenberger)跟我設計了一個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的「落後簡單迴歸分析」模型來估計租屋者現居社區的貧窮程度與犯罪率，而我們回推的根據正是他們之前居住社區的貧窮程度與犯罪率。在針對所有兩年內搬過家的租屋者、檢視過他們最近一次的搬家狀況後，我們在估計中反映了幾項重要的人口組成面向——種族、教育程度、家庭結構、住房補助的有無，乃至於一些有可能影響居住地選擇的人生變故或轉折：失業、孩子出生等。雖然已加入了若干重要因素與之前居住社區的狀況考量，被迫遷仍造成了貧窮程度跟犯罪率超過三分之一個標準差的增幅(較之自發性遷徙)。

第二十一章

大頭男寶寶

舍蓮娜把拉瑪跟卡瑪拉被燒掉的房子用推土機剷平了。她用保險金買了兩棟新的雙拼別墅：她燒掉了兩個出租單位，卻又增加了四個單位。辛克斯頓一家看出後窗，眼前只剩空地。那天晚上僅存的痕跡，只有卡瑪拉跟家人一起搭的簡陋紀念碑：填充動物玩偶跟照片被用一條棉質的童軍繩綁在樹上。最突出的一張照片是寶寶身穿復活節的服裝，一雙大眼嵌在小巧的臉蛋上。他們挑的動物玩偶有兔子、熊寶寶、一隻鵝、一隻浣熊、還有一隻河馬。玻璃花瓶裡的蠟燭跟可樂罐在樹的基底圍成一圈。

娜塔莎在垃圾袋裡翻找，裡面裝的是朋友在教會食物間撿來的童裝。她用手溫柔地在衣服間挪移，每件迷你的小衣服都可以勾出她的笑意。即將為人母的念頭開始在她的心裡萌芽。

「我要我的寶寶像我，」娜塔莎說。「我不要寶寶像馬立克。他那雙眼睛太凸了。」

「妳好壞喔！」多琳說。

「他會是全黑的。」

聽到聊天的聲音，穿著 Cousins Subs 潛艇堡制服的派翠絲來到餐廳。「那妳的寶寶生出來會像很多人喔！」她加入戰局。

「才不會咧！」娜塔莎笑了出來。

派翠絲嘆口氣，改變話題。「大家，我們得想辦法把馬桶修一修。」馬桶又堵住了，廚房水槽也是，

排不下去的灰暗水面上浮著層鐵鏽般的橘色油膜。每隔一段時間，就得有人用水桶舀水去倒。這讓洗東西變得很麻煩，流理台上開始積了一堆髒碗盤。蟑螂跟各種蚊蟲也聞風而來。

多琳沒有為了水管不通的事情打電話給舍蓮娜。一來她不想被叨念，再者她不覺得這事舍蓮娜會幫忙解決，畢竟辛克斯頓家還欠繳房租。她也沒有打電話找師傅。就算能湊得出錢來，她也不甘願讓舍蓮娜撿便宜。辛克斯頓家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想給舍蓮娜方便，畢竟法庭幾天前才寄了封信給派翠絲，裡頭提到她欠了兩千四百九十四點五美元——這是第二與第三請求權聽證會後的結論。¹

「我在那間房子才住了四個月，」派翠絲說。「她竟然說我欠她兩千四百美元！」

「所以她就是說妳一毛房租都沒付過的意思，」多琳說。

「不會吧！這是哪門子的算法！」派翠絲不可置信地盯著這份「帳單」。

她還以為自己欠大概九百美元。

「妳打算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能怎麼辦。」

辛克斯頓家原本還對房東的良心有一點期望，畢竟他們也付了不少錢。他們最大的一筆生活支出就是房租，而花費第二高的項目根本與房租沒得比，所以說，他們當然希望房子能像個樣，東西該亮的要亮、該響的要響。他們會希望東西壞了能報修。但如果舍蓮娜身為屋主都不打算修自己的房子，那辛克斯頓家也不打算越俎代庖。房子先對房客不仁，就別怪房客對房子不義。²

當租屋處的屋況每下愈況，辛克斯頓家的每位成員就愈是退縮而消沉，這也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娜塔莎待在馬立克家的時間愈來愈長，多琳也不煮飯了，小孩晚餐都只吃早餐麥片。派翠絲開始愈睡愈久，小孩的功課差到麥基的老師來電說他可能得留級，主要是他缺交太多作業。另外，大家都不打掃

了，廚房的地板上鋪滿垃圾。整體而言，水準低下的居住環境會打擊人的心理健康：這不僅僅是因為潮濕、黴菌跟擁擠會壓抑人的心情，更是因為危險與低落的生活環境會讓人自慚形穢。有一說是窮人「會每分每秒被提醒自己的無關緊要與微不足道」。³在窮人之中，非裔美國家庭又是慘中之慘——他們所居住的社區暴力犯罪率之高、與窮人之密集，連最差的白人社區也難以望其項背於萬一，而住在犯罪熱區中的破屋裡，就像污名化被加上粗體，社會上都會知道你從哪裡來，該到哪裡去。⁴「老實說，這地方爛透了，」多琳曾說。隔沒多久，露比就跑去跟多琳講，她聽說「有個男的在店門口被殺了」。以破屋為家，在貧民窟長大意味著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不但得學著去承受這樣的環境，同時你還得對有人含著金湯匙出生這點心知肚明。當有天你看到自己的家就討厭、對自己的家充滿無力感，但卻又得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砸在上面的時候，你就會愈來愈不去想自己的事情。⁵

孩子大一點了會發現若家裡讓人窒息，他們可以去中央街的公共圖書館喘口氣。C. J.、露比跟麥基最愛在圖書館玩電腦。露比上圖書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巡視她的房子」。沒錯，免費線上遊戲「磨坊莓果」上有個她一手打造而且細心呵護的房子。雖然這只是個遊戲，但「磨坊莓果」其實也是「通用磨坊」公司。開發的一款行銷工具。露比的虛擬房屋位於「黃金谷」的「豐饒大道」上，房子裡有乾淨到可以當鏡子的地板，有床、床單跟枕頭套，還有一張可以用來寫功課的書桌。多琳或派翠絲原本可以走路到圖書館去上網找（真的）房子，但她們之所以從來沒這麼做，部分原因是為了還舍蓮娜錢，讓她們沒有多餘的錢可以搬家。另外一個原因是她們是黑人，而黑人普遍不習慣上網找房子。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全家已經陷入了內心的陰鬱當中，眼前一片模糊。

派翠絲感覺到房子正在榨乾他們的精力。「我們住在這裡，就像一頭陷進泥巴坑裡，」她說。「沒有人在努力，搞得我也不想上進了。妳身邊的人都宅著不動，久了妳也會被感染而不想動。」一天天過

去，她開始覺得田納西聽起來也沒那麼差。

下班時間一到，馬立克就衝去找娜塔莎：地點是錢伯斯街跟第四十五街口，惠頓·方濟會醫療集團旗下的聖約瑟夫院區（Weharon Franciscan—St. Joseph Campus）。娜塔莎看起來已做好心理準備，但同時也很害怕。她一手抓著床的欄杆，另一手抓住馬立克的手。馬立克一想要站起來，娜塔莎就會把他拉回來。他會笑著替她揉背，她則專注在呼吸上，就像小倆口在分娩課裡練習過的一樣。多琳把兩臂交叉在肚子上，一副過來人的模樣，在搖椅上看著。

寶寶在夜間十一點十分來到世上，體重超過三千七百公克。這小子有著圓臉蛋跟一頭亂髮，透著粉紅的棕色肌膚，外加辛克斯頓家特產的寬鼻子。

隔天早上，娜塔莎人還在床上睡。派翠絲湊近她耳邊說了聲「嘿，媽媽。」她還沒有睜開眼，笑意就先在她的臉上浮現。

寶寶一個不滿意，大家就會輪著抱來抱去，但娜塔莎其實超捨不得。一整天下來，她不知道多少次重複把他抱到眼前，輕吻他的鼻子跟額頭。從馬立克臉上，派翠絲看得出這個新手爸爸有多驕傲，當下她就決定要給寶寶起名叫小馬立克。

隔天娜塔莎把寶貝兒子包在襁褓中，帶著他回到了自己的鼠窩。

註釋

1 舍蓮娜開口向派翠絲索取了「雙重損失賠償」（double damages）。密爾瓦基的房東有權對在驅離命令到期後滯留的

房客索討雙倍的日租金（威斯康辛州法 704.27）。這項規定的設計是要讓房東可以回收房屋遭占據而無法另外租人的租金收入損失。舍蓮娜並不常使出這道殺手鐮，但她為派翠絲破了例。原因是什麼？「因為她讓人大氣不過了！她太會耍嘴皮子了，」舍蓮娜說。

- 2 Cf. 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63. 與居家屋況太差有關的疾患包括氣喘、鉛中毒、呼吸系統併發症、發展遲緩、心臟病與神經系統失調，而這點也促使某知名的醫療期刊稱呼不理想的屋況是「公衛危機」。只要住過一段時間水準不夠的居住環境，對健康造成的危害都會相當久，孩子在這方面更是弱勢中的弱勢。關於屋況與人體健康間的關聯，參見 Samiya Bashir, "Home Is Where the Harm Is: Inadequate Housing as a Public Health Cri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2 (2002): 733-38; Gary Evans, Nancy Wells, and Annie Moch, "Housing and Mental Health: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a Methodological and Conceptual 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9 (2003): 475-500; James Krieger and Donna Higgins, "Housing and Health: Time Again for Public Health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2 (2002): 758-68; Wayne Morgan et al., "Results of a Home-Based Environmental Intervention among Urban Children with Asthm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1 (2004): 1068-80; Joshua Sharfstein et al., "Is Child Health at Risk While Families Wait for Housing Vouch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 (2001): 1191-192.
- 3 Lee Rainwater, *Behind Ghetto Walls: Black Family Life in a Federal Slum* (Chicago: Aldine, 1970), 476.
- 4 Robert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atrick Sharkey,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 5 Julie Clark and Ade Kearns, "Housing Improvements, Perceived Housing Quality and Psychosocial Benefits from the Home," *Housing Studies* 27 (2012): 915-39; James Dunn and Michael Hayes, "Social Inequality, Population Health, and Housing: A Study of Two Vancouver Neighborhood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1 (2000): 563-87. On "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 see Loic Wacquant, *Urban Outcast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8), chapter 6.

6 譯註：General Mills。財星五百強，全球第六大食品公司，旗下有哈根達斯、綠巨人玉米與灣仔碼頭水餃與早餐麥片等品牌產品。

第二十二章

如果他們要處罰媽媽

時序進入四月，凡妮塔在「旅社」四周藏了糖果做的復活節蛋，讓她的小孩可以找出來。小坎達爾把這事兒交給了覃比跟波波去忙。這孩子偶爾會給人一種童年已提前結束的感覺。才四歲，他就不肯牽凡妮塔的手，在幼稚園班上也不喜歡唱歌。小帥哥的他有著精緻的嘴唇跟濃縮咖啡般的黑色眼睛，直覺告訴他媽媽為了生活已經夠煩了，而這當然也讓凡妮塔非常擔心他。

復活節的前幾天，覃比拉開了火警的警報器。管理處的人發現「兇手」是誰之後，要凡妮塔隔天走人。為此凡妮塔並沒有浪費太多時間抗議。她很務實地直奔貧民窟的核心，開始一間間找起公寓。絲毫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出租招牌，屋況或社區環境也都不在她的顧慮之列。她看上一間公寓，除了髒，牆壁還有一大片龜裂、天花板有油污，外頭的街上還不止一處在紀念兇殺案的死者。她咬著牙，填好申請表。

「這位小姐妳這麼能忍，是為了小孩吧？」克利絲朵忍不住想問。那個寒冷的夜裡，在前廊上，克利絲朵終於找到一位好心的平輩親戚，而對方也答應讓她過上一夜。這之後克利絲朵就開始睡在聖約瑟夫院區的候診室裡。她都管那個地方叫「聖約瑟夫醫院」。另外她也會假裝是等車的旅客，混在人群中，藉此睡在美國國鐵剛裝修過的舊城區車站。有一天在公車站，她遇到一名叫派翠莎的女人。那天要結束之前，她們就成了室友。克利絲朵需要有地方住，派翠莎則計畫了好久要遠離她那會暴力相向的老公，因此派翠莎需要一份可以不靠老公的收入。派翠莎的年紀是克利絲朵的兩倍，身邊有名十幾歲的女

兒她在北區相對安靜的一隅，有間獨門獨院的房子。就這樣，克利絲朵開始叫起派翠莎「媽媽」。

隔天凡妮塔搬出了「旅社」，東西則帶到她姐姐的公寓放著。埃柏妮住在拉丁佈道院附近的果園街，算是住宅區。一起住在這三房兩樓的小公寓裡的，還有埃柏妮的丈夫、三名孩子，以及凡妮塔的妹妹。這個家雜物不少，房子本身也相當陳舊，米色的地毯看得到污漬，幾乎每個房間都有床墊，最深處則塞了一個小廚房。凡妮塔並不算久待，她塞了五十美元給姐姐，把自己的孩子安置在其中一個小房間裡，然後動身前往市區的法院出庭。這天要開的是迪雄的回監服刑聽證。

迪雄是波波的父親，而凡妮塔覺得自己還愛著他。不喝酒的時候，他真的是個好爸爸。半年前警察逮捕他，是因為他遭控持有毒品，因而違反了假釋令。法官在審酌案件的事證時，援引了凡妮塔在迪雄動粗時打的九一一求救電話紀錄。「十月十日，凡妮塔·埃文斯打了一通電話。然後十月十九日，埃文斯女士又打了一通電話。」十足煎熬的凡妮塔用手遮住了臉，開始掉淚。那些電話、跟她把迪雄踢出去之後的事，她都記憶猶新。他後來又喝了個爛醉跑回來，把門砸到稀巴爛，接著又毒打她一頓。事後凡妮塔記得房東一手收走她繳的租金，一手把限期二十八天的「無理由」驅離通知單交到她手裡。回監服刑的聽證會結束，法官判迪雄十八個月的刑期。凡妮塔本來是幾乎不喝酒的人，但那天晚上她買了瓶新阿姆斯特丹牌琴酒，在小孩的身邊喝到不省人事。

這麼一睡，克利絲朵的電話她也沒接到。克利絲朵掛上電話，改撥給她的親戚跟寄養家庭的姐妹。她跟派翠莎「互惠關係」已然崩解，主要是派翠莎十四歲的女兒把克利絲朵的手機拿到學校，也不知道是搞丟了還是賣掉了。克利絲朵要派翠莎賠，但派翠莎不肯。「我要把妳趕出去！」派翠莎大吼。派翠莎剛喝了葡萄酒跟E & J白蘭地，而混酒讓她滿是醉意。克利絲朵打電話摺人來壯聲勢，一幫人現在在車上等著。這場兩個女人的戰爭來到屋外，而派翠莎一個踉蹌，跌到地上。居高臨下的克利絲朵順勢提起

腳往派翠莎的臉上踢去。氣頭上的她一蹬，又蹬，再蹬。看到失控的這一幕，克利絲朵的「好姐妹」衝上來，一槌子就往派翠莎的方向招呼。「賤人，妳再這樣試試看！」加入戰局的姐妹先吼了這麼一句，然後拉著克利絲朵離開。派翠莎痛到縮著身體，一動不動在人行道上躺著。克利絲朵請朋友在「聖約瑟夫醫院」讓她下車，她那晚要在那裡過夜。²

在試過七十三個地方以後，凡妮塔跟克利絲朵終於申請到了一個月租五百美元的兩房公寓。一邊是急著找到房子、房子年久失修可以睜隻眼閉隻眼的房客；一邊是急著要有人租，驅離紀錄跟前科可以當作沒看到的房東。兩邊一拍即合。這間公寓的木頭地板黏黏的，原因是污垢積太厚；另外前門也鎖不太起來，房間小到放張雙人床就幾乎滿了；到廚房一看，碗槽水管不通，地板磁磚也東破西破；牆上的櫥櫃被用護貝紙給封死；原本該放瓦斯爐跟冰箱的地方空著。但這樣一個地方卻有浴缸。這間公寓位於第七街跟梅伯街的路口，算是南區的邊緣：從廚房的窗戶，你得到聖史丹尼斯勞斯天主堂的一對尖塔。凡妮塔知道這裡不算安寧，轉角的毒販她從小認識。「這不是個正經的地方，但我真的沒力氣再找了，」凡妮塔實話實說。「我不想租這裡……但我還有得選擇嗎？」

這對新好朋友搬進了這間公寓，他們僅有的「行李」是幾個垃圾袋的衣服跟玩具。克利絲朵一堆東西都留在了派翠莎的家裡，她也不指望能拿回來了。這裡唯一的家具是不知道哪任房客留下來的老搖椅沙發。

凡妮塔跟克利絲朵的計畫是在這裡待上一年。但人算不如天算，她們才剛搬進來沒多久，兩人在「旅社」的舊識卡拉就跑來用光了克利絲朵的手機儲值，為此克利絲朵只好打破窗戶爬窗偷接電話線。警察找上門來的時候，克利絲朵給自己做了兩個三明治在路上吃。凡妮塔拿出所有在收容所存下的錢來

賠償被打破的窗戶——並且叫克利絲朵不要再回來了。只有做到這個程度，房東才答應放凡妮塔一馬，讓她跟孩子能留下來。

事隔數日，兒童保護局的人打電話到埃柏妮的公寓，指名要找凡妮塔。³埃柏妮打電話去警告凡妮塔，凡妮塔馬上想到的就是克利絲朵。「我要宰了那個賤貨，」她對著媽媽「酥餅」怒吼。「那個賤人竟然向社福單位舉發我！」

「妳拿她開刀，她現在就拿妳開刀啊，」酥餅說。

「誰叫她先拿刀對著我的小孩！」凡妮塔順著酥餅的比喻大喊。

兒童保護局要來的消息讓凡妮塔失了方寸。她不覺得兒童保護局的人會讓小孩待在連瓦斯爐跟冰箱都沒有的地方。凡妮塔真的一毛不剩了，但她還是去了一家位於轉角的二手家電行。那兒播放著西班牙文的音樂，有一堆用過的洗碗機、烘碗機跟林林總總的舊家電。老闆羅德里蓋茲先生是個體態發福、髮量頗豐的墨西哥人。他拿著手杖，洋洋灑灑地點名店裡堆著哪些待價而沽的二手產品，活像老師拿著伸縮棒在上課一樣。

「你這邊最便宜的瓦斯爐跟冰箱多少錢？」凡妮塔直接問了。

「妳要烤東西，還是不烤東西？」羅德里蓋茲的口音超重。

凡妮塔搖頭表示她不烤東西。她只是要做做門面，烤箱不能用也沒關係。

羅德里蓋茲用他的手杖指了指一台小瓦斯爐。

「多少錢？」凡妮塔問。

「九十美元就好。」

她又搖搖頭。「太貴了，你說要多少？」

羅德里蓋茲聳聳肩。

兩人於是開始討價還價，最後凡妮塔終於說服羅德里蓋茲降價到八十美元，還附送他原本想要單賣的瓦斯管接口。她在另外一家店找到個冰箱，也跟老闆殺價到六十美元。她跟一名朋友借錢買這兩樣東西，答應對方下個月一日還，然後在阿爾迪量販店 (ALDI) 為這天的血拚畫下句點。在結帳櫃台，她讓冰淇淋三明治等垃圾食物在放在輸送帶尾端，這樣萬一食物券不夠用的話，她會比較方便把東西擺回去。

擱下雜貨之後，凡妮塔疲憊地攤在搖椅上，點起一根菸。這下子，就算兒童保護局找上門來，她也可以接招了。

但她馬上就意會到自己放心得太快了。她還沒想好萬一自己真的因為搶劫被抓去關，小孩子要交給誰顧？最近她是比較屬意日托中心的一位女士。「我可能會瘋掉，但至少我可以放心他們有人照顧。」凡妮塔這麼跟自己說。然後是小坎達爾的幼稚園畢業典禮快到了。凡妮塔想要盡可能籌出錢來，替他買雙特殊日子能穿的新鞋。她希望坎達爾可以有一種自己很特別、達到小小里程碑的感覺。在舊城區生活，前面的里程碑愈早慶祝愈好，因為後面的那些，你不一定過得到。

宣判聽證會的早晨，凡妮塔把小孩統統叫起來，餵飽他們之後，又讓他們把衣服穿好，最後才開始在客廳的地上重燙自己要穿的服裝。除了裝爐子跟冰箱以外，她沒能在公寓裡下太多的功夫。這兒給人感覺仍是個空蕩而沒有生活感之處。坎達爾走進凡妮塔所在的客廳，兩手插著腰的他，在黃褐色的晨光裡站著。她讓坎達爾穿上了紅領的襯衫跟他的新鞋。幾英尺外的壁爐架上有一幅幼稚園畢業典禮的照片，照片裡的坎達爾身穿小小的學士帽跟學士袍。

「媽媽，」坎達爾開口，「小孩子不應該去法院，小孩子應該去托兒所或上學。」這麼說的他並沒有

臭臉，他只是觀察到這世界有點奇怪，好像有哪裡不對勁。他說這話的口氣，就像他在說「狗狗不應該喜歡貓貓」或「四月怎麼會下雪」一樣。

凡妮塔放下熨斗，深吸口氣。「坎達爾，你可以來法院陪我嗎？」她重問了一遍昨晚的問題。坎達爾看得出媽媽需要他。「媽媽，我跟妳去法院，」他說得義憤填膺。

「如果他們要處罰媽媽，你應該怎麼做？」

「像一家人一樣照顧弟弟妹妹，聽阿姨的話。」

在最後一刻，凡妮塔決定在萬不得已的時候請她的親姐妹照顧孩子。為什麼她也說不上來。

凡妮塔早早來到了法院，安靜地在身上那套保守的黑色毛衣跟長褲底下發抖。她化了妝、戴上耳環，頭髮也緊緊地盤了起來。她在走廊上踱步。除了苦思著可以跟法官說什麼之外，她還隔段時間就停下來看橘色囚衣底下戴著腳鐐、步履維艱的黑人受刑人。酥餅戴著毛帽，身穿冬日大衣來到法庭，一道前來的還有凡妮塔的雙胞胎兄弟跟妹妹。埃柏妮留在家裡照顧覃比、波波跟其他小孩。再後來，凡妮塔所屬的全聖經浸信教會（All Bible Baptist Church）也來了，來的人有牧師太太跟教區另外一名白人女士。這幾位都身穿針織毛衣，頭戴厚重的眼鏡。

時間一到，凡妮塔在公設辯護人的身邊坐下。點著腳的他名身穿全黑西裝的白人。真正的法庭跟電視上演的不太一樣。電視上的場景像露天戲院一樣有包廂，天花板有巨大的吊扇，旁聽席的木椅也會坐得滿滿的。但這天的法庭只是個狹小的空間，旁聽席也被以厚實的玻璃牆隔開——「實況轉播」靠的是天花板上的擴音器。

先進行論述的檢方代表是名看起來有運動習慣、臉色紅潤的地區助理檢察官。這位檢察官的髮量稍嫌稀薄，但鬍鬚修整地頗為講究。他留意到凡妮塔的不少事情。首先是凡妮塔是初犯，而且「有過一些

就業紀錄」。「她顯然有上學到十一年級，這教育程度算不錯了。雖然有點悲哀，但這已經比我們看到的多數被告好了，」他起了個頭。「她有家庭的支持，這點很好……可惜的是她這次犯案的時候，情感跟家庭的支持顯然效果不夠……我相信她此次走偏了路，背後必然有被現實所逼的因素。但被告再怎麼不得已，受害者因此的傷害也不會減少一分。」關於後面這一點，助理檢察官表示有一位受害者已經出門都不帶錢包了，因為她眼中的社區不再安全。「州政府的立場是我們要樹立觀念，要讓人知道你不可以拿槍去搶人的東西，否則就要坐牢。」

凡妮塔的公設辯護人接著發言。他雜七雜八地講了一堆希望法官輕判，但給人言不由衷之感。他說凡妮塔對所作所為坦承不諱，而且本人深有悔意。他說還年輕的她不像其他在外頭混過的共犯那麼「複雜」。他說拿槍的並不是她，而是她的朋友。而且這宗犯罪實在是被生活所逼。「我認為處罰可以在社區裡進行，」公設辯護人做出結論，「法官大人不需要把她送去坐牢。」

換到凡妮塔自白，她說她為自己的行為「負完全的責任」，並且當場向受害者跟法庭致歉。「事情發生的當時，我跟孩子的日子都很難過。我們幾乎要被從租屋處趕走，晚上也快要沒電可以點燈。我是被逼到，才會一時糊塗。當然這不是我做錯事的理由……我現在只能請求您能對我從輕發落……尤其是看在我孩子的份上。」

再來有一堆人輪番上場替凡妮塔講話。牧師的太太說，「環境很艱苦，但我看得出她有一顆沉靜的心。」酥餅貢獻了四句話。凡妮塔的雙胞胎兄弟說他們「才剛滿二十一歲而已，」還說，「他外甥跟外甥女每天醒來看到的不應該是哪個阿姨或舅舅，應該是自己的媽媽。」

最後終於輪到法官說話。這位年長的白人男性法官一開口，就先整理了他一路聽下來的內容。「所以說，諸位整體性的討論到了這宗犯行的本質。基本上，這是被告誤入歧途……是被現實逼到沖昏了頭。

我有認知到這個角度。但我也注意到從事發到現在，情況並沒有任何改變……我是說被告整體的經濟條件並沒有變得比較好。大律師，我沒說錯吧？」

「確實沒有，」公設辯護人只能據實回答。他曾主張凡妮塔有去找工作，但他沒有點出即便凡妮塔已經每天都清晨五點就爬起來，但扣掉找房子、上同等學力課、跟照顧孩子的時間之後，她剩不到多少時間可以求職。他也沒有指出做老闆的通常都不會雇用白白曾犯下重罪的人。

「你說得不錯，」法官順著辯護人的話說。「而且老實講，除了看不出來被告的狀況有變好外，甚至就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情而言，被告到處跑來跑去、搬來搬去，我還覺得她的處境有一點變差。」

法官說的這一大段，基本上的意思是：我們都同意妳很窮、很害怕，所以才會犯下如此暴力跟傷害人的行為，也同意如果你能繼續在老鄉自助餐一周工作五天，無論是把空了的湯鍋倒滿、還是把被灑到地板上的冷凍優格給抹乾，我們今天就不用湊在這裡大眼瞪小眼了。搞不好妳已經存夠了錢，搬到一間除過鉛又乾淨的公寓，出門時不會看到有人販毒、學區又很安全的鄰里。假以時日，妳甚至可以讓波波去接受癲癇治療，妳自己則可以去夜校接受護理訓練，圓自己長久以來的護士夢。誰知道呢，搞不好有朝一日，妳真的會以護士的身分在社會上生存，妳會有自己的護士帽、護士袍，各種配備都一應俱全。既然當上護士，妳自然可以讓孩子過起完全不同的童年，不用像妳一樣得忍受酥餅給妳的人生。果真如此，妳就能抬頭挺胸走在這個冰冷的城市，甚至終於覺得自己有點價值，覺得自己可以找個男人，他不光是給妳把槍讓妳去搶，而是真的與妳苦樂共享。或至少妳能找個不會把妳的門給打破、也不會當著小孩面打妳的男人。運氣好一點，妳可以找到一個工作穩定的對象。結婚時你們可以訂一間小教堂，然後坎達爾可以有面子地挨著新郎，覃比可以穿上蓬蓬裙當花童，波波就負責咧嘴笑，並且腳步晃晃顛顛地遞上鑽戒，就像妳曾夢想過的那樣。從那天起，你的新郎會開口向人介紹妳是「我太太」。當然

這些都只是一場夢。現實是妳的班表被砍了、妳家快要被斷電了、妳跟妳的小孩就快被掃地出門，餐風露宿。就在這時，妳趁朋友拿槍指著別人的臉時，一把搶走了別人的錢包。如果說讓妳理智斷裂的是貧窮，那現在跟當時又有何不同？誰敢保證同樣的流程不會重新來過？案發時妳窮，現在難道就不窮？大家都清楚問題的根源，我們在這法庭上天天都能看見；但法院就是法院，法院不是慈善機關、不是就業輔導處，也不是密爾瓦基市的住房管理局。違法亂紀我們或許沒辦法除根，但至少也得盡可能斬草。

法官嘆口氣，緊接著現場沉默起來。法庭速記員的雙手在鍵盤上「凍結」，伺機再度啟動。坎達爾在外婆酥餅的膝上睡去，一呼一吸幾乎沒有聲音。法官最後宣判：「本案不符合……：緩刑條件。我判被告由國家監所體系管制八十一個月（六年九個月），其中前十五個月（一年三個月）為先期拘禁，後六十六個月（五年半）為延長監管。」⁴

法警上前，並告知凡妮塔站在原處配合上銬。

「喔，天啊，」酥餅忍不住叫出聲。她搖醒了坎達爾，拉著他到玻璃前。「快跟媽媽揮手說再見。」手被銬在背後的凡妮塔轉過身來，臉上淌著兩行眼淚。坎達爾木然地直視著她，就像媽媽教過他的那樣。

在跟教友、主教，甚至是自己的牧師衝突好幾次之後，克利絲朵告別了各他山五旬節派教會。她跑去加入了國際恢復（Restoratio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這是間位於舊城區四十一街跟伯雷街口的教會，辦公處外觀是棟不起眼的二樓建築。

某個主日，克利絲朵坐在教會前面數來第三排的位置，跟著音樂鼓掌。她身穿黑色襯衫，底下是綠色的褲子。但衣服不夠大，襯衫的釦子跟褲子的拉鍊都只能分別扣跟拉到一半而已。負責主持的黑人女

牧師有著氣勢十足的蓬鬆髮，垂在她的肩上，身上穿的是點綴著金色細節的白袍。她走起路來像女王一般能震懾全場，停下腳步又彷彿有聖靈的指引。「上帝說祂是真理與世界的光，」她說。鋼琴前的年輕人飛速動著手指，音符隨之流瀉，爵士鼓後的年輕鼓手則輕弄起鈸。「真理！世界的光！我的話你們聽見了嗎？」

「阿門，」克利絲朵說。

在被踢出原本與凡妮塔同住的公寓之後，克利絲朵先是住進了一間遊民收容所。然後在交上朋友、利用朋友、失去朋友的反覆循環折磨之中，克利絲朵只能很偶爾地找到乾淨而溫暖的地方睡覺。這些短暫有地方睡的時光就像橋一樣，橋梁一斷，她又會墜回在街上無家可歸的深淵，又只能在聖約瑟夫醫院或美國國鐵車站過夜。有時候她會走上一整夜，然後天一亮就在公車上睡。但無論是在橋上還是在橋下，做禮拜時她幾乎都會出現。

「夏·拉·拉·拉·雅巴·秀·塔·塔嗎·嗎·嗎·嗎，」女牧師朝著麥克風進行「方言禱告」。她口中有如嚙語般的「方言」是與上帝溝通的語言，聽起來有著像心電圖一樣的抑揚頓挫：短促的開場，接著快速拔地而起，然後是顫抖著拉出長尾。「你也是槽中被榨著的葡萄嗎？⁵你也在人群中擠著向前，想要看見耶穌基督嗎？哇嗚！」她向後退一步，好像被什麼看不見的力量反彈回來一樣。

「說得好，牧師！」克利絲朵熱切地回應著。她一直都覺得聯邦救濟金是比薪水更穩定的收入。你不會被聯邦救濟金背叛，你的班表也不會被砍。「聯邦救濟金就是這樣，該來的時候一定會來，」她斬釘截鐵的說。但有一天錢就真的沒有進來。原來她領錢的資格是成年前申請的，而她成年後的重新審核沒通過。這樣一來，食物券就成了克利絲朵僅剩的所得。⁶她想捐血漿換錢，但是她的靜脈太細了。她找屬靈的媽媽、寄養家庭的媽媽，甚至是親生的媽媽幫忙，但她們都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窮。她倒是沒有跟

教會開口，因為這種事每次都會弄得大家不愉快。最後實在走投無路了，克利絲朵只好去出賣靈肉。克利絲朵一向不是能早起的人，但她入行沒多久就發現早上的「客人」最好拉，男人喜歡在上班途中來一發。

「嬷嬷還好嗎？」女牧師表達了關心。她口中的嬷嬷，是被一左一右攙住的一位老太太。

「不太好。」

「那我們就要放下所有的事情，替她禱告。」女牧師在老太太面前跪地。十多名來做禮拜的教友將她團團圍住，有些跑到椅子上站著，有些人把雙手往在老太太的頭上一按。「把手伸過來，我們一起禱告！」牧師指揮若定，教友們也言聽計從，就連當中還是孩子的教友都沒有異議。「喔，耶穌！」女牧師宏亮的聲線傳入麥克風。「喔，憑著耶穌的寶血，喔，你這死亡的邪靈，你這使人中風的邪靈，出來吧！」

跳動的克利絲朵雙手在肩膀與屁股上來回揮舞，手舞足蹈地複誦著，「憑著耶穌遭到鞭笞的痕跡，主啊，靠著祢身上的鞭痕。」

「憑著耶穌的寶血，」牧師欲罷不能。「寶血！沙巴巴馬秀塔拉！我綁住你了。回來吧，嬷嬷，快回來！」

背景音樂低調地延續，等待著時機。把嬷嬷跟牧師圍成一圈的教友打開了缺口，讓人看到了嬷嬷癱軟而血色盡失的臉龐。她彷彿像睡著了，但又像沒了氣息。然後圍觀者又闔上了圈圍。幾分鐘後，群眾的聲音慢慢變大，開始向外走，旁人這才看到女牧師鎖定嬷嬷的臉跟手在親吻。只見嬷嬷站起身來，連帶著周遭的掌聲響起。

「讚美主！」女牧師說。她有如得勝般朝麥克風發出尖叫，雙膝一軟但仍不放棄禱告。原本退居

幕後的鋼琴與鼓鉞開始大作，教會全體陷入轟動。有些人開始在座椅間的走道上跑來跑去，其餘人則放聲呼喊，或者引吭高歌。不知道誰找來一個鈴鼓，順勢拍擊起來。轉頭看鼓手正拚命打著鉞，鋼琴則無高音不歡，非高八度不彈。有名女人一邊大叫，一邊在原地作勢奔跑，汗如雨下。「今天的喪禮正式取消！」牧師自鳴得意。

這時的克利絲朵高舉雙手，五指分開，臉上是藏不住的笑意，腳下是停不了的舞興。「主眷顧我，」她嘶吼著。「主會眷顧我！」

註釋

1 跟派翠莎同住的期間，克利絲朵會跟提問的每個人說她跟「媽媽」住。理論上她會對所有做訪談的研究者都這麼說。我們現有的分析工具，即便包裝著人脈分析的華麗白人用語，都遠不足以掌握克利絲朵這群人深陷的人際關係複雜性。

See Nan 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rio Small, *Unanticipated Gains: Origins of Network Inequalit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tthew Desmond,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2012): 1295-1335.

2 我沒有親眼目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而是根據多次訪問克利絲朵重建當時的狀況。當準陌生人間虛無飄渺但又張力十足的關係來到這樣的勁爆結局——包括大打出手（而且頗常見），結果往往就是同儕與街坊間會產生深沉的嫌隙，進而侵蝕到社區與人際網路的穩定。一旦遭受過「免洗朋友」利用或欺負，這種經歷會讓人失去對人的信任。所以得寄希望於「免洗朋友」的現象，既是社會不穩定的「惡果」，也是社會不穩定的「成因」。克利絲朵的親戚跟寄養家庭的姐妹都跟她年齡差不多，所以也不可能收容她或資助她，這些平輩能做的就是要幹架的時候來挺她。

- 3 關於兒童保護局在窮困黑人家庭的生活中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參見 Christopher Wildeman and Natalia Emanuel, “Cumulative Risks of Foster Care Placement by Age 18 for U.S. Children, 2000-2011,” *PLoS ONE* 9 (2014): 1-7; Dorothy Roberts, *Shattered Bonds: The Color of Child Welfa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4 譯註：有鑑於假釋制度造成法官判刑與受刑人實際服刑期間差距太大，「量刑確定制」(Truth-in-Sentencing)之改革取消假釋制度，而將刑期區分為前期的「先期拘禁」(入監服刑)與後期的「延長監管」，以免相互干擾。其中後者類似於假釋的「受監控釋放」(supervised release)。
- 5 譯註：啟示錄第十四章第十九節提到：「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醉中。」這個意象裡的葡萄就是接受審判的人類，而酒醉就是神審判的怒火，榨出的汁就是人的血。
- 6 二〇一〇年，《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每五十名美國人，就有一人住在食物券是全家唯一收入的家庭裡。Jason DeParle, “Living on Nothing but Food Stamp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2010.

第二十三章

寧靜俱樂部

來到寧靜俱樂部的這天，是史考特連續清醒的第八天。匿名戒酒會旗下的寧靜俱樂部，是一家木板內裝、「菸」霧瀰漫的飲料吧。想喝不新鮮的咖啡或麥根沙士做成的飄浮冰淇淋嗎？那你就來對地方了。「這寶貝會上癮，」在警局前科累累的一名常客這麼推薦著，「但我不會為了它去搶啦。」到了夥伴要一上台分享的時刻，一名膚色不深、脖子上圍了一條黑色方巾搭配黑膠亮面外套的波多黎各女子，站上講台。登場的安娜·阿迪亞曾是個既吞迷幻藥又吸古柯鹼、個性則如牛皮般強悍的重機妹，但轉性後她現在是匿名戒酒會的「大姐頭」。她再幾個月就服務滿十年，曾幫助過不下數十名酒鬼完成課程。而在這天的談話中，她特別介紹她剛接下的新個案。

「我愛你喔，史考特，」她說。「不可以不來喔，事在……」
「……人為，」現場異口同聲地回答。

時間回推到一周前，史考特剛從長達三天的爛醉之中醒來，一文不名而且宿醉未退。他想力圖振作，穿好衣服，離開公寓。這時是周六早上，史考特走在依舊沉睡的密爾瓦基街頭。他來到了皮托的家中，把他也給挖起來。已經戒酒兩年的皮托是過來人，很清楚戒毒中的酒鬼需要哪些「法寶」：水，很多的水，很多的咖啡、維他命、香菸、食物，當然最重要的是有人盯著。皮托一整天都跟史考特形影不離，晚上還帶著他去見他的親兄弟大衛（戒酒已十四年），而大衛的太太安娜在他們家後院的火坑燃起

火，陪著史考特熬到半夜兩點，直至所有的酒吧統統關門。這一天極其反胃、痛苦且漫長——也是史考特多年來第一天沒有吸毒。

第五天仍舊非常痛苦，但那是種不一樣的痛苦。史考特在皮托家嗚咽了一整天，可以說是淚如雨下。「我可以感覺到身體在恢復，在變好，」他說，「但畢竟你一、兩年，或者很多年都因為酗酒吸毒而麻痺了，所以這對身體的衝擊不小。」

為了這些剛要開始「醒酒」的夥伴，匿名戒酒會也算得上緊迫盯人：九十天聚會九十次，彷彿像上了癮。這麼拚命的目的在於「新生兒」得二十四小時有人陪，而新加入的成員就是他們的寶貝。戒酒會用自身的支持體系淹沒掉個案原本的酒鬼人脈，總之陪伴不能有缺口就是了。就這樣，每天早上，史考特會在酒商八點開店前到皮托家報到，晚上則會在安娜的火坑前等到酒吧不再接受點單。

房東叫史考特走人，是他去戒酒會快要第三周時。D. P. 新養的鬥牛梗先是跑了出去，後來又不知怎麼地潛入樓下鄰居的公寓。最後是鄰居們報警，警察通知房東，而想留住長期房客的房東便對史考特跟D. P. 下了「逐客令」。所幸到了這個節骨眼上，史考特已經算住在大衛跟安娜家了。大衛跟安娜於是叫史考特乾脆連睡覺也在他們家搞定。

大衛跟安娜這兩名受薪階級的住家，是那種大家都可以來來去去的「交誼廳」。一堆人會大大方方走進他們家，連敲門都省了，而且就連開冰箱都不先問。「這裡是阿迪亞的康復之家，」安娜自己都這麼說。「要不是隨時有人在，要不就是電話會一直響。」她會在家裡準備一大碗一大碗的米飯跟豆子，門也從來沒鎖過。

史考特開始睡在阿迪亞家的沙發上，並且在放學的時候接他們家的小孩下課。沒多久，他正式跟著身為泥水師傅的大衛做起工程。要是遇到淡季，他也會去回收金屬賺錢。史考特喜歡工作，尤其是到處

把廢鉛跟廢鐵當成獵物在找，對他來說就像是在都會裡探險一樣。即便偶爾得縱身「潛入」行動垃圾車裡，他也完全可以忍受。笑臉常開的大衛是身材精壯、卻有雙眯眯眼的波多黎各男性，他不見得每次都會付薪水給史考特，但史考特對此並沒有怨言。大衛跟安娜為他付出了這麼多，他還有什麼可以抱怨？

一開始，史考特只是單純喜歡打掃寧靜俱樂部。時薪是稀少的七點一五美元，這讓他每周有大概有一百美元的收入，但因為他工作的時候是獨自一人，而且大部分的日子都是從晚上十點做到半夜一點，所以他正好可以邊工作邊想事情。比如說，他想到自己好像應該找個對象，只不過除了去同志酒吧，他也不知道能從哪裡找起。也許上網去分類廣告網站 Craigslist 上看看？他想到自己妹妹的婚禮，也許他可以為了這個場合回家。他祈禱，「請讓我明天不要吸毒。」

但他最希望的，是夢想著可以回到老人安養院工作。他想這會是個「讓自己保持清醒的好辦法，因為你會開始替別人著想，放下自己那些可憐兮兮、亂七八糟的事情。」問題是這條路並不好走，護理委員會不僅撤銷了史考特的執照，而且也還算合情合理地設下重返職業的高門檻。如今史考特必須要「每年接受不下五十六次的尿液檢體檢驗」，這要求不僅麻煩，費用更會高達數千美元。他必須要滴酒不沾五年，並且每周要出席匿名戒酒會兩次。「史考特對自己的軟弱心知肚明。就算護理委員會沒有讓重新核發牌照變得遙不可及，他也不敢說當年的自己一定會努力做到。但可以確定的是，當目標難到一個程度，人真的可以說放棄就放棄。」

「能力受損專業人士」的聚會，也讓他更加心灰意冷。與會的一名護士說，她先用上接近兩年的時間戒酒、外加達成所有規定，然後又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找到工作。話說，跟史考特相比她還有碩士學位的優惠。

要從被撤銷的護理執照爬回到全面性的復職，這當中必須歷經很多階段。而領著職權受限的執照

（比如麻醉藥品不可以碰），想要在護理界求得一職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史考特還算有些人脈。多年來他跟幾名護理界的親友沒有斷了聯繫，其中有些人還頗為飛黃騰達。就拿他的一個阿姨來說，已是鄰近一所州立大學的護理學院院長。只不過，史考特能跟這些人保持聯繫，代表關於他吸毒又沒錢的事都瞞著他們，所以要他突然去找這些人幫忙，沒有想像中容易。史考特曾跟一名身為地方性安養院負責人的朋友說他過得不錯。「所以現在我必須跑回去說，『喔，沒有啦，其實我過得離不錯差得遠呢。我吸毒又酗酒，之前完全是在騙你的……』」我想我很多顧忌就是這樣來的。」史考特並不覺得他有任何後門可走。²

在俱樂部打掃了四個月，只休過一個晚上，史考特開始倦了。他很清醒，但也百無聊賴。他每晚的工作就是倒菸灰缸、刷馬桶、收工時給自己打個分數：A⁻或C⁺。然後休息二十一個小時之後，這一切又會重新來過。他是個廢人的時候，至少感覺人生還有個方向：把毒品弄到手。但現在的他只覺得自己在繞圈，而且是一個又小又單調的圓圈。安娜開口要史考特為他晚上睡沙發付兩百美元的月租，還要他記得用食物券去買自己的生活所需，但這樣一來，他就存不了多少錢了。

他煩的還不只是在俱樂部工作。酒醒的高峰期一過，史考特開始愈看匿名戒酒會愈不爽。這種「蜜月期」過後的感覺並不罕見，否則匿名戒酒會裡也不會有種說法叫這是「從粉紅雲端上跌下來」。

「不置可否開始變成心有不滿，」史考特說。晚上動不動得跑去跟廢物般的酒鬼或古柯鹼成癮的傢伙打交道，一夥人坐在連成半圓形的摺椅上，用保麗龍杯子喝佛格斯牌的即溶咖啡，輪流講一些聽了會做惡夢的故事，他覺得很丟臉。史考特開始憎恨這樣的「禮禮如儀」，他討厭讓陌生人搭肩，討厭那些老掉牙的正向語言——「倚靠上帝的恩典」、「放開手讓上帝接手」——更別提寧靜俱樂部的觀念是：用美沙酮等處方藥來戒毒是作弊的行為。史考特考慮要到郡立診所拿藥來舒緩渴求與抑鬱等戒斷症狀，但這樣的想法他沒辦法對安娜或大衛開口。這段時間為了讓身體排毒，史考特吐過、抖過、哭過，但這樣努

力過後，他環顧四下，看到的依舊是身無分文又無家可歸的自己，從早到晚除了莫名其妙在累積匿名戒酒會的時數，就是三更半夜將拖把放進水桶裡又拿出來。「去你媽的毒蟲跟酒鬼，」他會在人已經走完、但摺疊椅還沒歸位的房間裡大吼大叫。「我要發瘋了！」

早上七點三十七分，史考特到了「密爾瓦基郡立行為服務部門推廣門診」(Milwaukee County Behavioral Services Division Access Clinic) 報到。這間診所服務的對象是沒有保險、或只有密爾瓦基郡公共健保 (General Assistance Medical Program, GAMP) 的居民。牆上的告示寫的是：「您的第一次門診會歷時三到五個小時。沒有錢的話，您可以選擇當志工來抵醫藥費。」忙碌的護理師跟社工繞過在走廊上漫步的病人，等著看診的病人們顯得無所事事。史考特不介意在診所工作，畢竟他也蠻耐操的。但他那天不是來當志工，而是來拿藥。對他來說，那些匿名戒酒會的傢伙沒吸過海洛英，所以他們不會懂他有這樣的生理需求，他的身體需要某種引信來推一把，讓他產生前進的動力。他今天的「第一志願」不是美沙酮，而是用來治療鴉片類成癮的「舒倍生」(Suboxone)。在經過近三個小時的等待後，史考特的名字終於被叫到了。於是他站起身來，心中的大石頭落下。

幫他看診的精神科醫師是名高瘦的亞裔人士，理著黑人那種飛機場似的平頭，講話聲音只比悄悄話稍微大聲一點。他領著史考特進了間無趣至極的房間，長方形的格局讓人有闖進超大型衣櫃的感覺。史考特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醫生則趴在老書桌上讀起史考特的檔案。書桌緊靠著牆，所以史考特一抬頭，便能看到醫生的側身輪廓。

「你憂鬱多久了？」醫師嘴上這麼問，但眼睛卻緊盯病歷。

「很久了，」史考特答道。

「所以你有哪些症狀？」

「就是整個人懶懶的，提不太起勁……我在想要不要試試舒倍生。不知道這是不是戒斷後的現象。」

「你有毒品問題多久了？」

「嗯……大概七年吧。」

「那你戒掉多久了？」

「四個月。」

史考特一五一十地把他吸毒的事情交代了，醫師頓了一下，才又接著往下問。「嗯，」他稍微轉了個話題，「這裡說你小時候被性虐待過。」

「沒錯，」史考特有點不悅。

「那是你幾歲的事情？」

「我那時候很小。從四歲開始吧，直到……」史考特想了一下，「……十歲。」

「虐待你的是誰？」

史考特對醫生說了實話。

「事情是怎麼解決的？有通知大人嗎？」

「沒有，我誰都沒有說過。」

「你有為此接受過治療嗎？」

「沒有。」

「你有興趣接受治療嗎？」

「沒有。」³

史考特走出診所，手上則多了兩瓶抗憂鬱藥品。醫囑是每天服用兩次一百毫克的「樂復得」(Zoloft)，外加睡前五十毫克的阿米替林(Amitriptyline)。⁴ 史考特問醫生，「當癮頭來了您有什麼藥可以開給我嗎？」對此醫生只講到有相關的治療計畫，對舒倍生則隻字未提。這樣史考特有點悶，但「三次打擊有兩支安打」也不能算差了，畢竟他還是要到了兩種藥。外頭寒意十足，溫度計上是零下一度，更別提體感溫度了。寒天之中，雪片在史考特的靴底呀呀作響。

三個月後，大衛跟安娜的十二歲女兒翻著衣堆找零錢，卻在史考特的游泳褲堆中翻出了注射用的針筒。最近才剛搬回家住的奧斯卡是阿迪亞家的大兒子，他認為這可能是個舊針筒，而這完全說得過去。史考特剛搬來的時候，自己都時不時會在好久沒穿的上衣或牛仔褲口袋裡發現「紀念品」。他甚至找到過吸食快克的菸斗，看著看著才想起來那是做什麼的，就像你在洗過的衣服裡找到褪色的電影票根一樣。但大衛跟安娜對這種說法並不買帳。當天晚上，在史考特打掃完寧靜俱樂部之後，他發現自己的東西堆在了阿迪亞家的前廊上，上面還附了張便條。他試著推門，但門從裡頭被鎖上了。這個住了七個月的「家」，如今他已不得其門而入。

史考特沒有為自己辯解。他一方面不想起衝突，另一方面也不覺得大衛跟安娜會願意聽。「他們寧願相信是我自甘墮落，也不願去想這針筒可能是自己兒子的，」史考特是這麼想的。除此之外，現在也不是奧斯卡可以去戒毒的時機，畢竟他才剛當爸爸。史考特心想，自己應該大方一點，就讓奧斯卡留下來陪他的女友跟剛出生的女兒吧，他要繼續吸毒就讓他吸吧。

史考特會知道針筒是奧斯卡的，是因為史考特跟他一起注射過毒品。史考特不會說這是「毒癮復發」，他會說，「吸毒讓我正常。」

好幾件事情同時發生。首先是史考特發現他耐著性子撐過的匿名戒酒會，與他更是恨之入骨的團體治療課程，兩樣他都白去了，因為護理委員會都不認帳。說到要恢復護理執照，委員會有自己的程序跟玩法，而史考特都沒有乖乖照辦。此外關於尿檢，委員會也有自己的實驗室，所以自從史考特沒吸毒之後的所有合格檢體，在委員會眼中都一概不算數。「我跑了那麼多趟，尿了那麼多個杯子，連著配合好幾周，最後跟他們聯絡想確認一切沒問題，他們卻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就在此一挫敗的幾天之後，史考特在加油站遇見了海洛英蘇西跟比利。他們拿出東西，說是讓史考特靜靜地「叛逆一下」，而史考特也默默地收下了。這或許能以個案視之，就像他在攀岩時腳滑了一下般，但好死不死，奧斯卡在這個時候搬回了爸媽家，而奧斯卡可是貨真價實地有吸毒的習慣。自此每逢周末，這兩個人就會湊在一起「嗨」。史考特會在周一前暫停吸毒，這樣周五的驗尿才會過關。這段期間，心理輔導跟匿名戒酒會的活動他都還是照去。但他只又多撐了幾個月，這樣的修行就無以為繼，他開始肆無忌憚地想嗨就嗨。

凌晨兩點，站在阿迪亞康復之家的門廊上，史考特只剩下一袋衣服跟他的記憶盒。他走上了很自然的下一步，那就是打電話給海洛英蘇西跟比利。他那一晚就睡在這兩人的拖車裡，一切彷彿繞了一圈又新歸零。

事隔數日，蘇西正在烤蘋果派，史考特打了電話給他的媽媽瓊。他決定試試看美沙酮的療法，而為此他需要兩樣東西：一樣是他身體裡的海洛英，這點沒有問題；另外一樣則是一百五十美元，這他拿不出來。一個月之前，史考特曾經回老家待了兩天，住在他媽媽不大但還蠻有面子的房子裡。這兩天他去安養院看了外婆，跟他十幾歲的姪女一起打電動，還看他妹妹試穿新婚紗。史考特已經兩年沒見到他媽

媽了。「我要是可以在市區開車，我早就去看你了，」瓊給了這麼一句不像道歉的道歉。這趟回家算是很開心，史考特感覺既放鬆、心情也很平靜，不像上次在瓊的眼裡，史考特緊張得像隻被關進籠子的兔子。「他的腿抖得跟什麼一樣，」瓊記憶猶新。瓊特意安排了一頓午飯跟一場盛大的晚餐，主要是讓親戚們都可以跟史考特見面。就這樣，他懷著被愛的心情回到了密爾瓦基，而就是因為有過這樣的心情，他才有辦法打這通電話。

「那是問美沙酮療法的診所，」史考特說。「妳知道我在說什麼嗎？……我會每天過去拿藥，然後我的鴉片型毒癮跟憂鬱症都會好轉一點……：我想要靠自己努力把毒癮給戒掉。本來我不想讓醜事都攤在你們的眼前，但這樣好像真的行不通。」說到這裡，史考特吸了口氣。「媽，我這樣說妳懂嗎？」

瓊只懂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兒子很少開口要求什麼東西，而這天他開口了。為此她拿出了一百五十美元。

隔天早上，史考特坐在第十街美沙酮診所裡等待叫號。在這間診所看診一共分成四站。掛號處收錢、收件處收受你的尿液。遇到熟面孔，護士會在打招呼時喊出他們的綽號或編號。「嘿，院長早！」「今天紅光滿面，運氣應該會不錯喔，三三二二號。」第三站是廁所，廁所裡裝有監視器避免你把尿液掉包。最後一站有一道厚重的門，門上貼了一篇從《洋蔥報》⁵上剪下來的文章，標題是〈怎麼這麼慢〉(Everything Taking Too Long)，文章附上的照片是一名男子盯著微波爐，面露不耐。這扇門後就擺著美沙酮的配發機台。一旦獲得放行，病人就可以進門用自己的號碼「打卡」，然後配發機就會在塑膠杯裡噴出苦苦的紅色液體。

要比在密爾瓦基什麼場合更三教九流、龍蛇雜處，史考特心中的第一名絕對非早上七點鐘的美沙酮診所莫屬。同樣的幾扇門，可以走進來以下這些人：濃妝豔抹、手拿設計師包包的二十來歲白人女性；

完全不懂什麼叫輕聲細語、非靠助行器才能前進的墨西哥男性；手抱新生兒的白人婦女；帶著耳環、讓史考特看得津津有味的大個子黑人男性；胖到一個境界的畫家；粗壯的肌肉型工人；身穿粉紅女款襯衫、套裝長褲燙得超平的白人女性；西裝筆挺，看起來像是會計師的男性。最後是一位背駝到整個腰都彎了的華裔女性，拖著腳步走進診所，她看起來有八十多歲了。這位華人婆婆一進門，另一名拄著拐杖的波多黎各女性就迎上前去，用擁抱表示歡迎。

「你第一次來？」有人問了這麼一句。

史考特一轉頭，映入眼簾的是一名年輕的白人小姐。看起來才十八歲的她綁著馬尾，臉上有雀斑，嘴裡則是兩排矯正過的白牙。你說她剛剛在東區高中田徑隊裡練習完畢，也沒有人會懷疑。

史考特點點頭，算是回答了問題。

「嗯，聽我一句建議，」年輕女孩湊近說，「我自己是不會想吃這種藥的。我是說，他們說要把你們先『拉進來』，再把你們『帶出去』，但這些鬼話聽聽就好。他們只是想賺你們的錢。我自己用多久的美沙酮都快想不起來了，現在還不是永遠服一百毫克的劑量。」

史考特眉毛一抬，想起了他上次嘗試美沙酮，最後讓他被送到醫院的劑量就是一百毫克。他印象中當時的自己混合了健得靜⁶，與美沙酮後離開診所，馬上忍不住來了杯雞尾酒。不勝「藥力」跟酒力的他闖進了迎面而來的車流。來到現場處理的警官給他注射了納洛酮（Narcan）來中和藥效，但也讓他因為戒斷現象而抽搐不止。再來他就被送進了加護病房。

「妳付多少錢？」史考特問。

「三百七十元，」她說的是每個月。

他點點頭，納悶起下個月的藥錢要從哪兒來。

輪到史考特，他吞下了紅色的美沙酮，加了點水到杯子裡晃了晃，然後把這「洗碗水」也給喝下去。如果現在少喝了，晚點感覺可能會差很多。

離開之前，史考特跟美沙酮的諮商師見了一面。對方是名黑人，年紀跟他差不多。

「最近三十天，你用了幾次海洛英？」諮商師問。

「三十次。」史考特接著把媽媽借他一百五十美元的事情也說了出來。「我想是我的錯吧，我不應該對她期望那麼低的，」他說。「也許我太拒人於千里之外了。」

「祕密的多寡，決定了人健不健康，」諮商師說。

單靠在寧靜俱樂部裡賺的錢，沒辦法同時負擔美沙酮跟房租，於是史考特被迫無家可歸。他住進了一間八十六床、名叫「賓館」(Guest House)的收容所。每天早上會搭公車去美沙酮診所，然後晚上跟其他遊民睡在大房間裡的上舖或下舖。美沙酮的副作用包括盜汗跟變胖，另外他的性欲也跟著變得模糊。但的確有戒毒效果。⁷

大部分人即便開始了美沙酮療程，也都撐不到一年。⁸但史考特沒有放棄。一段時間之後，他搖身一變成了「賓館」的一名住房經理，這代表他又開始幫助人了。一周有四天的時間，他會出現在「賓館」的一個衛星收容所裡工作。這間衛星收容所隱身在南區的一個安靜社區裡，是棟平凡無奇的三層樓房，但有外推的凸窗。他的工作包括用漂白水刷洗一間間臥房，還有帶老鳥到後院的野餐桌邊。那裡有地方讓他們坐著抽菸，有空的佛格斯即溶咖啡罐接他們的菸灰。

堅持了一年的時間，外加自費四千七百美元之後，郡政府終於同意幫忙史考特出美沙酮的錢，他每個月只要自費三十五美元。然後透過「賓館」所提供的一個永久性的居住方案，史考特順利搬進了屬於他自己的窩，房租只要他所得的三分之一。他選的是在威斯康辛大道上的「尊爵工業風公寓大樓」⁹，一

旁的葛蘭德大道上就有賣場。他一直都住在鬧區，更從初次來到密爾瓦基後，就是這間賣場的常客。對於他這個來自愛荷華州農場的小孩來講，這間賣場簡直就是人聲鼎沸的市集。十四層樓的尊爵大樓建於一九〇八年，原本是作為公司辦公跟雜耍劇場之用。在改裝成公寓建築案之後，建商在此裝設了健身中心，室內籃球場、小型的社區劇院，還用人工草皮鋪設了果嶺。

史考特的公寓位於十樓。除了乾淨不說，這地方還有小麥色的地毯、純白無瑕的牆壁，與人等身高的玻璃上有著迷你百葉窗，還有寬敞的浴室、有火的瓦斯爐、跟會冷的冰箱。「賓館」還附贈了深棕色情人椅、以及一張跟椅子成套的沙發、幾盞史考特捨不得把塑膠套從燈罩上撕下來的檯燈、還有張史考特幾乎沒用上的大床——主要是倒在沙發上睡的習慣已經改不過來。屋內甚至有組直立式的洗烘衣機。這一切都好得沒話說。一開始史考特還半信半疑地等著「賓館」隨時打電話來說是他們搞錯了。這公寓的月租行情是七百七十五美元，但史考特只需負擔一百四十一美元。

過了整整一個月，史考特才真正意識到自己住在這裡，這公寓是自己的。終於進入狀況後，他立刻給屋裡添了張浴室用的地毯、海軍藍的床單、手工肥皂、香氛蠟燭、抱枕、漱口水、碗盤，外加門口用來放鞋的「歡迎光臨」踏墊。住進這處公寓，史考特感覺踏實多了，他開始覺得自己值得用好好住好，心裡燃起了向前的動力。這天，史考特用從基督教「聖文生善會」(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拿來的磁鐵，在冰箱上黏了一張字條：

五年計畫

重返護理界

要賺很多錢

生活盡量省

開帳戶存錢

在失去執照的兩年又三個月之後，史考特終於有辦法靠省吃儉用來存重新核發牌照所需的檢驗費用。為此他甚至開始蒐集零錢，丟到廚房裡一個專門的罐子裡。

在拖車公園裡，史考特感覺自己卡住了。「我不知道該怎麼樣把自己修好，」他回想。「在那裡生活，感覺就像天塌下來一樣，就像外面的城市都消失不見了一樣。」那段歲月裡，史考特常常會有自殺的念頭，事實上他都想好了要用超多的海洛英一口氣「爽死」，只可惜這麼奢侈的死法他根本沒錢負擔。如果說從前住的拖車代表著地獄，那現在的新家就簡直是天堂。這兩者差距之大，他開始覺得從前的日子是遠離塵囂、遠離文明的「一場超大的宿營」。有時候想起從前的光景、想起失去的一切，他會走出公寓，穿過尊爵大樓昏暗有如羊腸般的走廊，來到某個門前。他會扭開門，然後突然現身在葛蘭德大道賣場的中間，那感覺就好像他穿過了某種「任意門」。走在賣場的地面上，史考特會盡興地沉浸在燈光、音樂、食物的香味跟人群的感覺當中。一瞬間，他會想起多年前曾有過的感受、那種城市裡充滿著驚奇與希望的感受。

1 資料來源是史考特在威斯康辛護理委員會 (Wisconsin Board of Nursing) 前接受的懲戒議程。

2 許多影響重大而所費不貲的決策，其根據的成見往往是窮人的親友工作平凡無奇、沒受過大學教育，而且住在不屬於他們的地方。讓人打散所得「混居」(mixed-income housing) 的用意即在於「讓低所得的居民有機會觸及就業機會跟社會角色的榜樣。」鄰里的重置計畫，包括「搬向希望」(Moving to Opportunity)，其設計宗旨是要讓低所家庭連結到「社會化與富裕程度較高的社會網絡」；但其實很多窮人都不乏向上流動中的人脈。密爾瓦基大約每六名租屋者，就有一名雖住在貧困社區，但他或她的人脈卻可深入弱勢程度在平均以下的社會網絡。不過光是跟中產階級有某種連結是不夠的。或許是因為「社會資本」一詞太紅了，所以許多學者會傾向於把認識有錢有權者等有利於社會化 (prosocial) 的人際連結，想成是一種可以「擁有」的東西，一種跟錢一樣可以想花就花的資源。但以史考特的狀況為例，真相是這些人脈究竟能否派上用場，還得視你的本事而定。關於為了打擊「社會孤立」而設置的社會方案，可參見美國住房與都市發展署的 *Moving to Opportunity for Fair Housing Demonstration Program: Final Impacts Evaluatio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2011);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Mixed-Income Housing and the HOME Program*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2003)。關於認為空間孤立 (住宅區的貧民窟化) 會造成社會孤立 (人脈網的貧民窟化) 的各種貧窮與社區生活理論典型，可參見 William Julius Wilson argued i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987]); 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關於鄰里與人脈弱勢的細部分析，參見 Matthew Desmond and Wehwa An, "Neighborhood and Network Disadvantage among Urban Renters," *Sociological Science* 2 (2015): 329-50。

3 明明是在吸毒，但史考特有時候會說他是在「自行施藥」，護理師的術語可不是這樣用的。太多的單字跟片語被濫

用來掩蓋問題根部的爛瘡。天知道有多少在生活壓力下來自我麻醉 (coping) 的做法，被美其言稱為「文化」(culture)。

4 精神科醫師問史考特，「你會想『直上』一天兩百毫克的樂復得，還是你想看狀況再加？」「就直接兩百好了，」史考特答得斬釘截鐵。兩百毫克雖然是蠻高的劑量，但他以前也不是沒這麼用過，現在降下來實在沒有道理。

5 譯註：The Onion。一九八八年創立、總部設於芝加哥的小報，特殊之處在於非傳統的諷刺風格，其幽默之處在於以超現實的眼光將日常的俗事做成警世的重大新聞。二〇一三年停止印刷，轉型為數位媒體。

6 譯註：Xanax。治療憂鬱症的鎮定劑，其他的商標名還有贊安諾、靜安定等。

7 美沙酮只要上了新聞，那畫面經常都是慘不忍睹。史考特展開治療計畫的那一年，美沙酮占鴉片型止痛劑處方箋量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二，但鴉片型止痛劑造成的用藥過量死亡率竟高達三分之一是由美沙酮造成。醫界認為，美沙酮涉及的死亡案例之所以會令人怵目驚心的增加，是因為愈來愈多人拿治療毒癮的美沙酮來止痛。自一九六四年啟用以來，純論治療海洛英毒癮與降低海洛英對社會的整體衝擊，美沙酮的效果相當值得稱許。作為一種「鴉片類全促動劑」(full opioid agonist)，美沙酮滿足了個案的癮頭。劑量拿捏得宜的話，患者可以恢復完全的生活機能運作。一致的證據顯示，美沙酮降低或消除了海洛英的使用，減少了吸毒過量或吸毒造成的犯罪案例，增進了病患的健康，也幫助不少人活出更充實、更有意義的人生。說到海洛英成癮的治療，美沙酮的效果絕對「樂勝」匿名戒酒會等只靠意志力 (abstinence-only) 的輔導課程。「美沙酮的壞事在外面傳得沸沸揚揚，」一名專家說，「但那些因為每天服用美沙酮而可以好好工作、慢慢克服惡習，進而恢復正常生活的病患上有萬人甚至數十萬人，只是他們的故事卻從來沒人報導。」史考特也正加入這幾 (十) 萬人的行列當中。發表上述論點的專家是彼得·弗烈德曼 (Peter Friedmann)，引用自哈洛·波列克 (Harold Pollack) 撰稿，「This Drug Could Make a Huge Dent in Heroin Addiction. So Why Isn't It Used Mor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3, 2013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華盛頓郵報報導) 這篇文章可以重創海洛英的毒癮，不盡量使用是什麼道理。》。亦可參見 Herman Joseph, Sharon Stanciff, and John Langrod,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MMT): A Review of Historical and Clinical Issues," *The Mount Sinai Journal of Medicine* 67 (1999): 347-64.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Vital Signs: Risk for Overdose from Methadone Used for Pain Relief—United States, 1999-2010,"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61 (2012):

493-97.

- 8 Sally Satel, "Happy Birthday, Methadone!" *Washington Monthly*, November/December, 2014.
- 9 雜誌：Majestic Loft Apartments。Loft 是閣樓，但 loft apartment 是輕工業建築改裝成的公寓住宅。

第二十四章

地獄倒楣鬼

阿琳一邊撥電話，一邊對喬瑞做個「一起加油吧」的招牌表情。第九十號的房東在語音信箱留了訊息，要阿琳回電給他。留話的是其實是房東的兒子，也就是之前帶阿琳看房子的人。二十歲出頭的房東兒子反戴著棒球帽，頭髮則編了辮子又綁成馬尾。「叫我帕納，」他說。阿琳還記得二〇〇三年當過他爸爸的房客，當時她以月租五百三十五美元，租了一間兩房的房子，現在則漲到六百二十五美元。所以阿琳這次申請的是月租五百二十五美元的一房。她無法跟著這六年的租金漲幅一起躍升。

電話響起，阿琳想起了她是怎麼跟帕納說的。關於月收入她說了謊，騙帕納說每個月有兩百五十美元的育兒津貼，但被驅離的事情她倒是坦承不諱。一言以蔽之，她簡直是在求他租她，甚至說連看房都免了，無論是社區的環境或房子的屋況她都不怎麼在意。「有什麼住什麼，」是她的想法。「我現在可是待在收容所，所以怎樣都可以，」她是這麼說的。

帕納也給了答覆。「嗯，我們有去核對妳的資料。妳還蠻老實的，那我們就合作愉快囉。」

阿琳跳了起來，不出聲音地喊了一句，「太好了！」

「不過別忘了，妳一點錯都不能犯喔。」

「我知道。」

「妳的收入很固定，所以妳一定要準時交租，也絕對不能惹上任何麻煩。」

阿琳先在電話上謝過帕納，講完電話後又謝了上帝。一旦有了笑容，阿琳看起來就判若兩人。雖然依舊處於葡萄榨桶當中，但壓力總是小了一點。至此她跟房東的交手紀錄是八十九負，外加這天寶貴的一勝。

喬瑞回應了媽媽伸出的手，母子倆擊了掌。他跟弟弟得為了搬家而轉學，但喬瑞對此不以為意。轉學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光是從七年級到八年級，他就一共換了五間學校——但他也不是天天都上學，光算在家收容所的期間，喬瑞就有連續缺席十七天的紀錄。在阿琳的眼裡，上學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是至少也得先找到房子才會考慮的問題。再說，喬瑞是她身邊最好的幫手，他可以跑過一整條街，一口氣記下所有招租電話，也可以在她帶著筆記本去找房子時當買法瑞的保母。喬瑞還是個開心果。遇到不順的時候，他會想逗媽媽笑。他的絕招是即興編歌，雖然不是很精通，但隨著密爾瓦基的街景在公車窗外流動時，他會像下面這樣唱起來：

欸、欸、欸

替我找間房子，讓我可以搬進去吧

剛剛那是我讀過的學校

剛剛那是我住過的街坊

剛剛那是我熟悉的加油站

我們在找房子喔

很難講喬瑞究竟擔不擔心找房子的事，因為他不會把心情寫在臉上。

離開收容所的時候，賈法瑞哭了，但手上還是緊抓著社工說辦辦時送給他的遙控車跟《芝麻街》的艾摩（Elmo）娃娃。「我不敢看，」賈法瑞在車子開走時說。阿琳揉了揉小兒子的頭，告訴他能離開收容所是好事情，應該高興。賈法瑞不懂媽媽高興的原因是什麼，收容所明明就不會吵、又很暖和，更別提有很多玩具。

母子三人的新公寓在條頓尼亞大道跟銀泉路的繁忙路口，位置算是北區一個比較偏工業區的地帶。阿琳爬上階梯，來到了這棟三層樓的公寓，而喬瑞跟賈法瑞則嘻笑地搭著發出啞呀聲響的電梯。到了屋裡，第一眼就能看到牆壁新粉刷過，灰色的地毯厚實而乾淨。屋內有一台小型的空調，每個燈泡上都有燈具。小巧的廚房裡有輕木櫥櫃，而且每個櫃子都有完好的把手。阿琳慢條斯理地檢查了一輪，完全挑不出毛病來。她打開窗戶，看著窗外駛經的一輛輛車，遠一點則有對街的奧爾空調能源器材（Auer-Steel & Heating）的配送中心。她覺得一切都很好，只是有點累。

等所有垃圾袋裡的衣服以及一箱箱的罐頭食物都搬進去後，阿琳坐在地上。她找到一個軟軟的袋子，用背靠著。她覺得很平靜，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她跟舍蓮娜的驅離聽證會是兩個月前的事了。喬瑞在阿琳身旁坐了下來，歪著頭靠著她的肩膀。賈法瑞也有樣學樣，身子縮在阿琳的腿間，頭則躺在媽媽的肚子上。母子三人維持這樣的姿勢，依偎了好一會兒。

經過幾天的風平浪靜之後，阿琳收到了一個噩耗：大家口中的T死了。T是泰倫斯，是賴瑞那邊阿琳唯一還有聯絡的家人。而且用槍把T射死的不是別人，是阿琳也很愛的P.A.。同輩的P.A.跟T是親戚、是一家人，但爭執中T拿斧頭的握柄打了P.A.的頭，而P.A.一氣之下拿了把槍。在拿槍找T算帳之前，P.A.還先打電話給T的媽媽說他現在要去宰了她兒子。結果他不是開玩笑的。

丁一死，阿琳的生活不意外地亂了套。她為了丁的死以淚洗面，也為了緬懷丁而跟老朋友們聚在一起。她安排賈法瑞在辦理後事的期間住到他以前寄養媽媽的家裡，像他這麼小的孩子，不適合去那種場合，阿琳是這麼想的。有些人聊到要在告別式後去龐德羅莎牛排館，沒錢的人只好賣血漿才能跟著去吃。

丁在街邊的告別式辦在密爾瓦基西北區的芳杜拉大道旁。跟喬瑞抵達現場後，阿琳把花跟動物造型的填充娃娃給擺整齊了。以喪禮來說，這排場算得上「備極哀榮」了，豪氣的乳白色緞帶、題詩、假玫瑰花跟幾束黃白雛菊、康乃馨跟百合的花圈都一應俱全。阿琳步行到丁的家門口，在階梯上站了會兒，又步行回到告別式的場地，然後再一次走回到丁老家的階梯。

「大家都說時間過得很快，對吧？」喬瑞若有所思地說。「但我賭告別式上的時間會非常慢。」到了告別式的清晨，阿琳穿上了深色的牛仔褲，上身則是 Rocawear 牌的襯衫外加藍色的帽丁。在從樓梯走下來要出門時，她跟喬瑞遇到了要上樓的帕納。

「我有話要跟妳講，」他說。「是關於前天晚上的事情。」

阿琳開始快速搜尋起兩天前的記憶。是了，前天晚上她打了九一一，因為賈法瑞的氣喘犯了。

「我們是別人眼中的妨害設施，」帕納說。「我們不能讓警察跑來這裡。」

「來的只有消防隊跟救護車而已，」阿琳解釋。「光憑氣喘叫不動警察的。」

問題是，阿琳打電話給九一一並不是唯一的問題。有名鄰居抱怨阿琳的朋友竟為了要大麻而去敲他的門（這名朋友是特瑞莎。她那天在當喬瑞跟賈法瑞的保母）。另外就是賈法瑞有次被抓到從三樓的窗戶丟了不知道什麼東西下來。「情況要是不能改善，你們就得搬家。」

到了屋外、前往新匹茲殯儀館（New Pits Mortuary）的路上，阿琳搖起頭。「一會兒這裡不對，一會

兒那裡又出問題，」她說。除了擔心怕會惹毛帕納以外，阿琳的食物券也出了狀況。變更住址該交的表格跟資料她都交了，但審核過程似乎不太順利。然後就是她得把東西從倉儲那兒清出來，而且要快，否則月初一到，她就會為了錢左支右絀——如果錢拿去付倉儲費，那就沒錢繳房租了。死了的T固然不在，活著的P.A.對她來說也等於沒了。貧窮只會愈堆愈高，愈來愈看不到盡頭。所謂貧窮，常常意味著禍不單行，意味著不幸的事件會交纏成糾結的樹叢將人團團包圍，活在其中只能鑽縫、或者千方百計讓自己不要發瘋。歲月總是有讓人可以喘口氣的時候，但加加減減下來，貧窮仍註定你關關難過，卻不一定能關關過。¹現階段阿琳只能慶幸自己還有家可以待，有自己的地方可以睡。

阿琳在殯儀館的門口猶豫起來。在西開彼托路上、建於一九三〇年代的匹茲殯儀館，是威斯康辛北部的地標。設計採取法式折衷主義風格的匹茲殯儀館，是棟蘭農石（Lannon stone）的建物，外觀上的特點包括八角形的樓塔、纖細而雅致的窗戶、深紅褐色的入口有延伸整條走道的天棚，另外就是有陡峭的屋頂線條，跟居高臨下的煙囪。喬瑞緊跟在母親的身旁，兩人一道走進去。靈堂內站滿了人，三五成群的大小孩子們身穿個人化的T恤，上面印的人臉若不是T、就是其他同樣「英年早逝」的朋友。祖父母跟外公外婆穿著乳白色或棕色的西裝／套裝出席，頭上還頂著搭配得宜的呢帽。T的親兄弟大C坐在最前排，身穿亮眼的藍色T恤，外加頭上綁著同色系的頭巾、臉上掛著一副太陽眼鏡。叔叔林克現身時，耳朵上夾了一根抽到一半的香菸，身材壯碩的他緩緩走在靈堂的通道上，他太太則把臉靠在他的背上啜泣。阿琳在後排找了個位子坐下，她對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有自知之明。

T的遺體穿上黑色長袖T恤，以及全新的奧克蘭突擊者隊棒球帽，讓他看來頗為安詳。T差一點就滿四十歲了。而低頭俯視他的，是打著胖胖溫莎結領帶的牧師。「怎麼我每次來到這裡，看到的都是我長得差不多的人躺在棺材裡，年紀輕輕就離開了我們，」他邊說邊搖頭。下一秒他開始爆發，尖銳的

口吻中冒著看不見的火光。

「我們之間的愛到哪兒去了？我們對人的關懷到哪裡去了？……除了自己，還有誰能幫助我們，我們能靠的只有自己！」

「繼續講！」

「說得對！」

「那是我的寶貝啊！」

儀式結束之後，阿琳在外頭加入了叔叔林克跟其他幾個人的談話。有人遞了罐老英國牌啤酒（Old English malt liquor）給她，她在雪地上倒了琥珀色的一圈，算是敬「一杯」。葬禮後的家宴辦在第十三街跟維列特街口，威斯康辛非裔美國女性中心（Wiscons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Center）的地下室裡，吃的是炸雞配麵包、青菜，還有起司通心麵。整頓飯吃下來，親戚們對阿琳非常歡迎，又抱又親。她有種被家人簇擁的感覺。這些人不會收留你，也不會借你暖氣費，但說到要把喪禮辦得熱鬧鬧，他們真的是一群達人。

隔天，沒有電話聲響起，於是阿琳繼續操作家務，希望把這裡打理得更像家。她給兩名兒子註冊了新學校，把東西從倉儲領出來，又在家裡牆壁掛上相片。一名好心的鄰居送了張沙發給她。先前，阿琳在第十三街的老公寓總是一團亂，是因為掃也是白掃：窗戶裂了、地毯被蹂躪得一塌糊塗、浴室能壞的也都壞了。但帕納的父親把屋況維持得很好，只要阿琳也加把勁，那這地方絕對像樣。而阿琳也沒有錯過這樣的機會。她在洗碗槽的上方貼了張小字條給喬瑞：「自己的碗自己洗，沒洗的話就走著瞧。」而在流理台上她擺了個蠟燭給逆境中的守護神聖裘德。看到阿琳的公寓，一般人都會說，「妳的房子真美。」

甚至有人開口想當室友。面對這種要求，阿琳當然會讓對方碰釘子，但她的這聲「不」字會說得非常驕傲。

喬瑞很努力想適應新的學校。理論上他是八年級的學生，但之前的課程落後太多，所以他等於只有七年級的程度，學習之路挫折感十足。除此之外，T的死也撼動了他的內心。後來傳說，P. A. 打電話給T的媽媽，用的是賴瑞家的電話，所以警方也把賴瑞找來偵訊，之後便無保請回。但喬瑞仍為此非常糾結。案發的那一夜，自己的爸爸為什麼會跟P. A.「一起」？告別式之後剛好過了兩周，一名老師對著喬瑞發飆，而喬瑞也不甘示弱地反擊：氣頭上的他往老師的小腿踢下去，接著跑回家。接到老師報案的警察於是找上門來。

一聽說發生了這種事情，帕納就跟阿琳打了商量。如果她可以周日之前走人，那他就把租金跟押金還給她。她要是賴著不走，那帕納不但會把錢扣下，而且還會申請驅離她。所以說，有小孩不是對抗驅離的免死金牌，小孩反而是創造驅離條件的「平台」。²

阿琳接受了帕納的條件，而帕納也算是蠻好心地幫她搬了家。她把碗盤從乾淨的壁櫥中抽出來，牆壁上的裝飾一一卸下。等阿琳把所有家當都捆進垃圾袋裡或回收箱中，帕納就把東西搬上卡車。他會開車把阿琳的東西送回倉儲。

阿琳就這樣無奈地失去了她漂亮的房子。³「我是不是被下了降頭啊，怎麼會如此倒楣？」她納起不已。「明明我已經很努力了。或許好運跟我絕緣了吧。」

阿琳打了電話給特瑞莎。她騙特瑞莎說房東氣炸了，因為他發現她挨家挨戶問有沒有人可以讓她合租。讓阿琳被趕的致命一擊固然是找上門來的警察，但在外頭打滾這麼多年，阿琳也學到幾招。她知道

要求人事情，大絕招就是要讓對方認為你對不起她。她會把事情講得好像非得幫忙她不可，不然你就是個沒血沒淚的王八蛋。⁴「如果投訴我的是妳、害我住不下去的是妳，那妳起碼現在要幫我一把吧。」

特瑞莎對阿琳說，「快過來吧。」

第十三街邊又有新的告別式舉辦。賈法瑞也注意到了。「又有人中槍了，」賈法瑞用他六歲的嗓音說著。回到舊家，兩名男生就衝去特瑞莎的公寓找小不點，但小不點已經死了，牠被一輛車子輾過。特瑞莎親口把這壞消息告訴喬瑞，喬瑞只能忍住不哭。他一邊在特瑞莎的公寓四周走來走去，一邊用袖子抹去止不住的鼻涕。走著走著，他找到一個泡棉的假人人頭，特瑞莎住處的四周就是會有這些奇怪的東西。喬瑞跪在假人頭的旁邊，把臉翻成正面，然後開始握緊拳頭對假人「打臉」。他一直打、一直打，並低聲發出怒吼。一拳拳愈揍愈快，愈來愈重，愈來愈響，阿琳跟特瑞莎這才大喊要他住手。

特瑞莎不諱言她開始詐騙，因為她也藏不住自己的所作所為。男人會送上門來，然後特瑞莎會帶他們進到她的「閨房」，並且跟阿琳說，「妳看著，我要來替我們賺些香菸錢了。」等會兒特瑞莎再出現，手中就會多了十美元或八美元。有一次喬瑞誤闖了特瑞莎的房間，他看到的光景是有名男人跟特瑞莎在一張床上，男人的褲子脫到了地上，特瑞莎的口紅則糊在臉上。房子擠了太多人就是這樣，個人空間蕩然無存，小孩也很快就知道了大人的行為。

直到她的新男朋友入住，特瑞莎都沒有停止這門「生意」，阿琳甚至察覺到這位「男朋友」根本就在背後鼓勵特瑞莎。她還發現，特瑞莎把阿琳的房租從每月六十美元漲到一百五十美元，應該也是特瑞莎男朋友的意思。這個男人在外頭打滾的綽號有一長串。特瑞莎稱他是桑尼，而桑尼大約三十歲左右，剛因為販毒服完五年的有期徒刑。他個子消瘦，但走起路來健步如飛，還會大言不慚地說自己跟五個女人生了九名孩子，也會開黃腔說他帶了根「鍋鏟」來給特瑞莎。桑尼會拿走特瑞莎從恩客們或社服機構

那裡攢到的錢。要是特瑞莎在路上叫他，他會先當作沒聽到，然後再找時間兇她，「在外頭不要叫我『寶貝』。」委屈的特瑞莎會穿著衣服蜷曲在被窩下，或者她會坐在窗台上點起香菸，而升起的煙霧就像氣憤的靈魂一般活了過來，那是一種知道自己只有幾秒可活的怒火。

在阿琳搬進特瑞莎的家之後，桑尼的父親也帶著一名女兒住了進來。特瑞莎小小的公寓只有一間房，而且屋況原本就不佳。如今八個人同處一個屋簷下，簡直快要把這地方壓垮。首先撐不住的是馬桶，然後廚房碗槽也開始漏水，最後情況惡化到地板上淹起水來，喬瑞一踏進廚房就會興起漣漪。他不得已還得把舊衣服鋪在地上吸水。

「愈看愈像貧民窟，」阿琳說。「廚房亂七八糟、地板亂七八糟，浴室也是。」她開始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辦。「這之後會是什麼？未來是什麼？不會比這更糟了吧。」

接著兒童保護局的社工找上門來，一開口就問，「貝爾女士在嗎？」這天來的不是平常跟阿琳接觸的社工，而是一張完全陌生的面孔。這位社工小姐知道阿琳住在這裡（這點連舍蓮娜都不知道），還知道馬桶跟碗槽壞掉的事情。社工打開冰箱，皺起了臉。阿琳連忙解釋是月底的關係，冰箱才會空空的。她不是沒去補貨，但怎麼買也填不飽八個人的胃口。⁵

兒童保護局的人說她會再來看。阿琳為此焦慮到反胃，她懷疑是特瑞莎去跟兒童保護局告狀的。她得逃，得趕緊動腦。有了這種想法的她打電話給 J. P.，而身為親戚的 J. P. 也沒讓她失望，立刻就去接她，還替她捲了一根大麻。抽大麻果然有用，於是他又捲了第二根給她。「J. P. 總是為我著想，讓我不會那麼煩，」隔天阿琳是這麼說的。

最後，春天終於降臨到密爾瓦基。雪融了，留下的是濕答答的街道跟街邊被泡軟的垃圾。同一天，

整個貧民窟都意會到出門不用再裹得緊緊的了。大家開始不知後悔為何物地反應過度。男孩子打起赤膊、女孩子抹起防曬油，在還遠遠談不上熱的天氣裡露出腿，做起日光浴。椅子跟笑聲收復了門廊，小孩們也翻出了跳繩。

這之前的幾天，阿琳跟兒子們單獨待在特瑞莎的公寓裡。她很珍惜這份平靜與祥和。特瑞莎跟桑尼還有桑尼的家人不知道去了哪裡，阿琳對此沒有多猜，只想著他們大概找親朋好友串門子去了。但五月一日那天，搬家工人突襲了特瑞莎的公寓。這些工人帶好手套，一幅躍躍欲試的樣子，到了現場，他們卻狐疑地你看著我我看著你，顯然不確定什麼東西該包起來、什麼又是該丟的垃圾。這些工人跟貝琳達簽了約，貝琳達等等會開著全新的福特 Expedition XLT 休旅車來察看進度，那車會新到還掛著由經銷商申請來的臨時車牌。已經被放出來的克里斯也到公寓來找他的特瑞莎。貝琳達開始擔心起她的案主，第十三街感覺已經不再安全。

阿琳盯著前窗。「我真的受不了了，」她喃喃自語。這是她跟特瑞莎同住一個半月的心得。

髮辮垂到一邊的賈法瑞放學回到家，就見著工人拖出了床墊跟五斗櫃，衣服也一團團被塞進黑色的垃圾袋裡。面對這樣的光景，他倒沒有什麼反應，既沒有哭，也沒有問問題，也沒有衝去看自己的某樣寶貝還在不在家裡。他很平靜地轉過身，進了家門。

他們在阿琳的妹妹家待了一段時間，妹妹跟她收一個月兩百美元，但阿琳跟兒子都沒有自己的房間。也在這段期間，阿琳失去了她放在倉儲的所有東西：她的玻璃餐桌、在第十三街買的衣櫃跟五斗櫃、她的空調主機。她有拿錢給兒子波西繳倉儲費，但也知道那錢是他掉了、還是偷了。然後阿琳的社福檔案也被關閉了，主要是她太多次約見都沒來。跟之前一樣，通知信函又寄到了她之前被趕走的舊家地址。「補助會停掉是有原因的，」她說。阿琳最後在第十三街跟克拉克街口找著了另外一間破舊的公

寓，就在麥斯特鎖（Master Lock）公司的工廠旁邊。「希望事情可以到此為止，」她這麼跟自己說。因為覺得比較穩定了，所以阿琳開始找工作。但有天去阿比漢堡面試完沒多久，她跟兩個兒子就被搶了。兩名男人闖進了她的公寓，用槍抵住喬瑞的臉。阿琳的社工跟她說這地方已經不安全了，於是阿琳只好又逃回某個收容所。房租不斷上漲，阿琳好不容易找到的新公寓竟然要月租六百美元，而她一個月收到的社福支票也不過才六百二十八美元。這樣一來，她被斷電只是遲早的問題。到了沒電的那一天，喬瑞就去跟賴瑞住了。賈法瑞則被兒童保護局安置到阿琳的妹妹那裡。

阿琳開始垮下來。「我的心裡亂成一團，」她說。「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的身體會抖。我累了，但又睡不著。我快要精神崩潰了。我的身體像是要關機一樣。」

但阿琳又站了起來。她跟茱瓦阿姨借了錢，恢復了家裡的供電，於是兩名孩子又回到了她身邊。她另外在塔瑪拉克街找了間公寓，距離塔伯納可社區浸信教會（Tabernacle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不遠。這間新公寓沒有爐子也沒有冰箱，但他們會用插電的慢燉鍋煮熱狗，要不然他們也可以到聖本篤教會（St. Ben's）的供餐處去吃俄羅斯酸牛奶，那兒還有酒友可以當他們的臨時飯友。

有時候阿琳會跑去食物廚房，然後賈法瑞會問，「媽，妳可以幫我拿一些蛋糕嗎？」

阿琳會笑著說，「他們有的話，我一定會幫你拿啊。」

另一邊，喬瑞思考起自己的未來。他想要當個木工，因為他想幫阿琳蓋間房子。「別人都覺得我沒有辦法。但你們等著瞧吧，」他說。

阿琳看著喬瑞，露出了笑容。「我希望自己能有個不一樣的人生，」她說。「希望變成歐巴桑的時候，我可以輕鬆地翹著二郎腿看著我的孩子。我希望他們到時候都能長大，然後你知道的，可以成為有用的人，比我有用的人。而且我們可以團聚一起生活，每天開開心心。我希望我們有天回憶起現在，可

以把這些遭遇都當成趣談，當笑話看。」

註釋

- 1 這說明了一點，那就是想把都會區的窮人按照「不穩定／穩定」、「無可藥救／還有得救」、「可以溝通／只適合混街頭」這樣的標準來一切為二，很可能讓本來只是暫時性且會異動的事，遭到誤認為會永遠如此。穩定跟不穩定對窮人家來說，都不會是固定的，而是時長時短の間歇狀態。人生的困境與問題之間常存在著連鎖反應，親人被殺的傷痛會讓人陷入憂鬱，憂鬱會因此失業，失業會造成被驅離，被驅離就會變成無家可歸的遊民，而無家可歸又會加深憂鬱，以此類推。為政者跟他們的幕僚會有一種迷思，那就是想要「一槍斃命」地擊破某些問題，但其實用散彈槍「一網打盡」的效果可能更好。關於連番厄運如何讓低收入戶「沒有最慘，只有更慘」，參見 Timothy Black, *When a Heart Turns Rock Solid: The Lives of Three Puerto Rican Brothers On and Off the Streets* (New York: Vintage, 2009); Matthew Desmond, "Severe Deprivation in America," *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orthcoming; Kristin Perkins and Robert Sampson, "Compounded Depriv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The Intersection of Ra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among Chicagoans, 1995-2013," *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orthcoming; Bruce Western, "Lifetimes of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Released Prisoners," *The 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orthcoming.
- 2 在密爾瓦基的各社區裡，驅離件數也會跟小孩的人數呈正比。即便是將貧窮家庭的比率、種族的構成情形等各項因素予以排除，這樣的正比關係也依舊成立。二〇一〇年，在小孩占人口總數不到一成的社區裡，租屋者被驅離的比率是一百二十三分之一。但在小孩占比率四成或以上的社區當中，租屋者被驅離的比率會變成十二分之一。在其他條件相同的前提下，社區人口中的兒童比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租屋者遭驅離的案件數就會增加百分之七。這些估計是根據法院發布於密爾瓦基郡的驅離紀錄做成，統計的期間是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用以評估「兒童占人口比率」

與「驅離案件數量」間相關性的統計模型，是「零膨脹卜瓦松迴歸」(zero-inflated Poisson regression)，其細部的描述可參見 Matthew Desmond et al., "Evicting Children," *Social Forces* (2013) 92: 303-27.

- 3 這種無奈的心情可能會從短期變成慢性。在被驅離後至少兩年以內，跟阿琳有同樣遭遇的母親都還會有比同儕高出許多的憂鬱比率。參見 Matthew Desmond and Rachel Tolbert Kimbro, "Eviction's Fallout: Housing, Hardship, and Health," *Social Forces* (2015), in press. See also Marc Fried, "Grieving for a Lost Home," in *The Urban Condition: People and Policy in the Metropolis*, ed. Leonard Duhl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151-71; Theresa Osypuk et al., "The Consequences of Foreclosure for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nnals of Epidemiology* 22 (2012): 379-87.

- 4 另外一招是要在出手前先調查對方有哪些「資源」。在窮困的社區裡，面對有人上門要求幫忙，最好用來拒絕的說法就是，「我很想，但是我沒辦法。」但也有人會高招地讓你沒機會說這句話。這些高手不會問，「你可以載我嗎？」他們會問，「你車裡有油嗎？」他們不會問，「你可以分一點食物給我嗎？」而是問，「你吃過了嗎？」對方如果知道你車子有油、冰箱裡有吃的，你就很難說出理由趕人家走。在日常的互動中，窮人摸索出了這種生存之道，而這跟政治圈或教育界花了幾百萬才發現的募款祕訣其實在本質上並無二致：開口要東西是一門「藝術」。知道如何要到東西——乃至於自己什麼時候可以幫人、什麼時候要稍微狠一點，都是在貧窮裡打滾的重要技巧。當然如果你求助的對象是社工，那就又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規則。你不會想要客氣，因為客氣會被當空氣。但你也不能太貪心、太積極、太走偏鋒，因為兒童保護局會上門來查你。我遇過一位愛喝酒的三十三歲女士，是兩名少女的媽媽，她說自己酗酒是因為小時候有過創傷。「我記得，連當時聞到的味道都還記得，」她說。「妳有讓諮商師輔導過嗎？」我問。「沒有，雖然有想過，但他們會問太多、管太多。我遇過有人莫名其妙去加州的兒童局舉發我，他們沒有抓到什麼證據或把柄，但被人這樣侵門踏戶……跟我的孩子說三道四，我還是非常受傷。」這位媽媽要是把自己的生活慘狀跟用酒麻痺自己的事都一五一十地告訴公部門，她的孩子還能保得住嗎？這位媽媽真的不敢想，也不想賭賭看。

- 5 我沒有親眼目睹這段互動，書中我所寫的是根據阿琳的轉述。

一個家，一個希望

家，是人生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風港，是我們工作操勞完，在學校緊張跟專心完，在街頭種種歷劫歸來後可以返回的去處。有人說在家裡，我們可以「做自己」。只要離開家，我們就會化身為另外一個人。只有回到家，我們才能褪下面具。

家，是人格的泉源，是我們的身分可以生根、可以開花結果的地方。童年的我們會在家裡做夢、玩耍、打破砂鍋問到底。青少年的我們會退而在家整備，進而離家冒險。再長大一些，我們會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庭來生兒育女，在工作上努力。家就是這樣的基地。說到要了解自己，我們往往都會從自己出身於什麼樣的家庭說起。

在世界上許多種語言裡，「家」的涵義不只是遮風避雨，這個字更會讓人聯想起溫暖、安全感與親情——就像是母親的子宮一樣。古希臘文裡，「家」的象形文字常被用來代換「母親」。中文的「家」這個方塊字有兩層涵義，是家人，也是房子。英文裡的「Shelter」是由兩個拉丁文拼成：scild（屏障）與tuma（團隊），合起來就是一家人共同聚集在保護傘下的樣子。¹從古至今，家都是生命的基礎。家是分享美食的廳堂，是培養靜態興趣的地方，家人間會在這裡傾訴夢想，建立傳統。

都會的生活也始於萬家燈火，家讓我們落地生根，讓我們把家家戶戶集結成屬於大家的社區。以家為單位，我們會參與地方政治，會以團結並以「遠親不如近鄰」的心情跟鄰居交心。「要逼著一個人

站出來去關心整個國家的事情，絕非易事，「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如是說，「但如果說到要在他家門前開一條路，那他就立刻感覺到這件公眾的小事會對他切身的利益產生巨大的影響。」²。一定要等到某條街變成我們的那條街，某個公園變成我們的那個公園，某間學校變成我們的那所學校，我們才會真正進化成為公眾事務為己任的公民，才會願意投入時間跟資源到我們肯定的價值上：無論是要巡守社區、當美化兒童遊樂場的志工、還是要競選加入在地的教育委員會，來自於家的認同，都是最重要的契機。

想為了公益去貢獻一己之力，是民主的引擎，也是社區、城市與各州的生命所繫——最終也是我們立國的根基。瑞典經濟學家岡納·莫道爾（Gunnar Myrdal）曾寫道，為了公益而付出，代表著「從美國人心中湧出的理想主義與道德情操」，³ 這股衝動有過很多名字，有人說這是「國家之愛」、是「愛國主義」、是「美國精神」。無論掛上什麼樣的名號，換上什麼樣的臉孔，其底蘊都同樣是「家」。國家是什麼？不就是都市與城鎮的結合嗎；都市跟城鎮是什麼？不就是鄰里的集合嗎；鄰里是什麼？不就是一個個家的組合嗎。

美國理應是個我們可以一天天讓自己更好、讓自家更好，讓社區更好的地方。但要擁有這樣的美國，我們首先要有一個安穩的家。要不是先透過「賓館」的永久住屋安置計畫，得到了一個價格合理的公寓，史考特怎麼能跟海洛英畫清界線？怎麼能找到在遊民收容所擔任住房經理這樣一份有意義的工作？又怎麼能開始踏上獨立自助之路？這之後的他，一直保有居住的穩定與清醒的神智。然後是辛克斯頓一家。在小馬立克出生之後，派翠絲跟多琳終於搬到了田納西州的布朗斯維爾，人口數大約是一萬人的小鎮。他們找到了一個舒服的三房之家。從原本的狗窩裡出發，派翠絲通過了GED考試，取得了高中同等學力，老師佩服得不得了，她也成了那一屆成年學生裡的模範生。派翠絲再接再厲，繼續在當

地的社區學院裡選修了線上的電腦跟刑法課程，為了想成為假釋官，她必須以此鋪路。她常半開玩笑地說，「我好多朋友都是犯人，將來他們都會是我的客人！」

貧窮在美國之根深蒂固與殘酷兇狠，很難不讓人心灰意冷、讓我們斷念放棄想讓世界更美好的夙願。但史考特派翠絲就是兩個最好的證人，他們會告訴你家就是最堅實的踏板。家，可以住人的家，讓他們在蛻變成好爸媽、好員工跟好公民的路上愈走愈穩。

要不是阿琳跟凡妮塔得把所得的七、八成都拿去繳租，她們就不會沒錢讓孩子得到溫飽與擁有一個家。不用被房租壓著，她們就可以找個社區安頓下來，不用一天到晚讓孩子轉學，孩子就會有機會交到一輩子的朋友，可以讓身旁慢慢聚集處世的榜樣跟良師益友。她們會有餘裕去銀行開帳戶儲蓄，可以給孩子買書或玩具，甚至於可以添台電腦放在家裡。為了準時交租、拖延被驅離的命運直到最後一刻、也為了在流浪時趕緊找到下一個落腳處，她們不知付出了多少的時間跟精力，而這些時間跟精力原本可以用來充實她們的人生：她們原本可以去讀社區大學、可以去運動健身、可以去職場上闖蕩，更可以去找個好對象。

但我們的現況卻「把生來理應不只如此的人給貶入貧窮。」⁴將近一百年來，美國有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家庭的居住支出要以在三成以下為宜。⁵而直到不久之前，這確實是一個多數租屋家庭都達得到的目標；但此一時彼一時——如今在密爾瓦基乃至於整個美國，狀況已經惡化到難以收拾。美國每年從自家被驅離的戶數，已不是幾萬戶的問題、也不是幾十萬戶的事情，我們看到的是每年有幾百萬幾百萬的人流落街頭，或被迫委身在收容所。⁶

沒多久之前，很多人還不知道問題有多麼誇張，也不知道居住問題會造成什麼樣的嚴重後果。唯一

知道問題嚴重性與後果的那群人，只有親身受苦的那群人。學界、媒體、主政者多年來的一個共通點，就是對驅離問題視而不見。而這三方無視的結果，就是驅離明明影響了廣大窮困家庭的人生，卻在社會學的研究工作上付之闕如。所幸隨著資料的浮出與新研究方法的問世，我們已經有能力評估驅離的氾濫程度，同時將其產生的效應做成紀錄。包括驅離與窮困社區之間形影不離的關係，乃至於驅離讓家庭、社區與孩子所付出的慘痛代價，我們都已經了然於胸。

人先要能安居，心理才能安定。心定，人才能花心思在持家與人際關係上。安居，孩子才不用東奔西跑，才更有機會在學業上精進及累積。人能安居，社區才會穩定，街坊之間才能培養感情，守望相助的觀念才能成形。⁷但對於窮困的家庭而言，所謂的安定根本遙不可及，他們太常從租屋處被驅離了。低收入的家庭常搬家，是社會上的常識；但他們為什麼這麼常搬家，則是學者跟當政者都搞不清楚的東西，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把低所得社區的驅離頻率放在眼裡。⁸從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一年，凡是密爾瓦基最窮困的租屋者搬家，大約四分之一的案例都非出於自願。若是排除掉這類（被房東驅離或被法院查封等的）非自願狀況，則低收入家庭的搬家頻率其實與一般人無異。⁹大家要是去查一下其他城市的驅離案件開庭紀錄，會發現真相就是這麼離譜。以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三年間的密蘇里州為例，郡境涵蓋半個堪薩斯城的傑克森郡（Jackson County），平均每天有十九處的租屋者遭到驅離。二〇一二年，紐約市的法院每天得以未繳租為由，判出將近八十筆驅離令。同年克里夫蘭有九分之一、芝加哥有四分之一的租屋家庭，會收到驅離法庭的出庭通知。¹⁰人窮，不代表不能過穩定的生活；但窮人會搬來搬去經常是被逼的。

除了剝奪生活的安穩之外，驅離也會導致身家財產的損失。住戶不僅會因為遭驅離而告別自在的住家、鍾愛的母校跟熟悉的街坊，他們還會因此失去有形的財產：家具、衣服與書本。要建立一個家談何

容易，金錢跟時間的付出都必然相當可觀，但驅離卻可以將之一筆抹煞。阿琳就這樣失去了一切，拉蕊跟史考特也同病相憐。驅離會讓人失業，人被解雇的機率會在遭驅離後提高百分之十五。若說人無法安居在前、不能樂業在後，其原因就在於失去家所造成的壓力與陰影，會嚴重衝擊到勞工在職場上的績效表現。¹¹ 租屋的家庭還常常會因為驅離而失去入住公共住宅的資格，因為密爾瓦基市的住房管理局，會在審核租屋申請時計算遭驅離的次數與欠繳的房租，亦即有所謂的「三振條款」。換句話說，被租金壓得喘不過氣跟被驅離逼到絕境的家庭，照理講應該是最需要政府伸出援手的人，但體制卻將這群人擋在了門外。¹²

財產、工作、住家被從身邊奪走，找上公部門卻又求助無門，也難怪驅離會讓社會學家口中「物質上的匱乏」所評估的是家庭有沒有因為負擔不起食物或醫療而體驗到飢餓或病痛，或者有沒有因為付不出錢來而沒有暖氣、沒電開燈或沒電話打。據統計，在遭驅離的隔年，這類家庭會比未遭驅離的類似條件家庭，體驗到高出百分之二十的「物質困苦」。他們會飢寒交迫或病痛纏身。被驅離的家庭會在物質困苦上持續高出平均，維持時間可能長達驅離事件後的起碼兩年之久。¹³

這些家庭會被迫接受次等的居住環境。在密爾瓦基，相對於條件相同但搬家因素不那麼嚴峻的家庭而言，最近一次搬家屬於非自願性質者，會有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的機率陷入長期的住房問題中。¹⁴

家庭被從原本的租屋處趕出，代表著他們在城市中的立足之地會從普通窮變成非常窮，他們會從治安死角搬遷到罪惡的淵藪。這是一個「沒有最糟，只有更糟」的概念。阿琳原本最喜歡的住處藏身於基層勞力工作者的黑人社區。在市府宣告其不適人居住、並使她遭到迫遷的命運之後，阿琳搬進的新家是一個充斥著毒販的公寓社區。就算排除許多重要變數的影響力，我們也可以看出比起自願搬家者而言，

遭迫遷者會愈搬愈糟。¹⁵集中的貧窮與暴力又會形成新的問題，並在弱勢者的傷口上灑鹽。畢竟鄰里決定了我們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從大人能接觸到什麼性質的工作機會、到小孩得在什麼樣的學校上學，都在這些切身的事務之列。¹⁶

然後是驅離對人精神面的斲傷。迫遷是一種暴力，這種暴力會把人逼著走上憂鬱一途，嚴重時更會讓人想不開而自殺。以近期剛遭到驅離的家庭而言，當中的每兩位母親就有一位表示發生臨床憂鬱症的各种症狀，這比率相當於未遭驅離但其他條件類似者的兩倍。即便經過了好多年，有過驅離記憶的母親跟同儕比起來還是會顯得悶悶不樂、提不起勁或不夠樂觀。¹⁷一群精神科醫師曾表示，有數名病人在他們將遭驅離的前夕自殺。悲劇發生之後，這群醫師共同在《精神醫學服務》(Psychiatric Services)上發表了公開信，直指驅離是「自殺的顯著前驅物」(significant precursor of suicide)。信中強調這些病人不至於因為遭驅離而無處可住，所以他們只得合理地把自殺歸咎於驅離本身。「驅離必須被視為一種對人的拒絕，這是一種會讓人留下創傷的行為，」醫生們寫道，「驅離是人最基本的需求遭到了否定，是極盡羞辱之能事的體驗。」被認定是因為租屋遭驅離或房屋遭查封而產生的自殺件數，在二〇〇五到二〇一〇年間成長了一倍，而這也剛好是居住成本狂飆的年份。¹⁸

驅離甚至於會影響到迫遷家庭所揮別的社區。鄰居之間可以彼此合作，培養互信，而合作跟互信會讓社區更加繁盛安全，但這需要時間。社區意識的建立跟各種資源的投入，都會因為居民的高流動率而受阻。也就是說，驅離會讓社區的「一體感」遭到拉扯與撕裂。只要驅離存在的一天，雞犬相聞的鄰居們就會保持陌生，原本可以合力打擊犯罪跟促進公民參與的潛力也會原封不動地荒廢。¹⁹密爾瓦基的各社區中，凡是某一年的驅離率升高，隔年的暴力犯罪率也會同步飆高。這一點即便排除掉之前的犯罪率或其他相關因素的影響，也不會有所改變。²⁰

失去住處與身外之物、更經常失去工作、烙印上被驅離者的標記、被剝奪政府在居住上的奧援、被迫搬到更窮更危險的地方、得忍受物質上更深的困苦、沒地方搬就得無家可歸、憂鬱（症）與身體病痛等——這些就是驅離後遺症的「懶人包」。驅離不只是讓窮困家庭陷入灰暗的低潮、也不只是人生辛苦但短暫的偏離軌道那麼單純，驅離會從根本上讓人生的道路一去不回，被驅離者會從此踏上一條艱辛的不歸路。驅離不是貧窮造成的結果，而是開啟貧窮的原因。人不是因為窮才被趕，而是因為被趕才一路窮。

驅離的殺傷力不分老少，也不分病懨懨或身強體壯。唯獨對於窮困的有色人種婦孺而言，驅離已經是他們習以為常的事。走進美國任何一間都會區的住房法庭，你都可以看到媽媽帶著孩子大排長龍地在冷冰冰的板凳上，等著叫號出庭。在密爾瓦基的租屋者當中，超過五分之一的黑人女性表示曾經在成年之後有過遭驅離的經驗，這比例遠高於拉丁裔女性的十二分之一、與白人女性的十五分之一。²¹

密爾瓦基多數被驅離的家庭都有小孩，而綜觀全美，許多被驅離家庭的孩子都會落得無家可歸的下場。出於無奈，許多遭驅離的家庭只能委身於不及格的屋況與不安全的環境裡，而這兩者都會打擊孩子的身體健康，損及他們的學習能力，乃至於貶低他們的自我價值與自尊心。²² 驅離會讓身為母親的憂鬱症惡化。長此以往，媽媽會提不起勁也無法開心，最後就連孩子們都能感覺到這股寒意。阿琳·凡妮塔乃至於許許多的父母親都想給孩子一個穩定的生活，但驅離是一道跨不過的鴻溝。驅離讓孩子們在一所學校間進進出出、讓孩子漂流於一個個的社區裡。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住，這些家庭還是免不了得把大部分的收入「進貢」給房東，能用在孩子身上的數目少得可憐。愈多錢得花在「住」上，爸媽就愈沒有錢能給孩子花。²³ 窮人過日子原本就已經是入不敷出，儘管繳不起房租，但人總是得有地方住，但問題是他們住的盡是些別人撿剩的破爛房屋。²⁴ 我們的城市裡已沒有窮人的立錐之地，而這在下

一代的心上留下了又狠又深的傷痛痕跡。

他們受到的這種磨難，讓我們內心有愧，主要來自這些事情明明可以避免。不過，正因為問題可以避免，所以尚存希望。這些問題既非不治之症，也不會永世常存。我們的社會絕對有能力煥然一新，因為眾人合作的力量不容小覷。

但有力量之餘，我們也得拿出辦法。我們不能迴避的一個問題是：我們不相信居住正義是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

美國有著崇高的立國精神。開國先賢們高喊人人平等，不容褫奪「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種精神緊扣美國，先烈們直呼是上帝賦予的人權，而穩定的家是三者共同的起點。

生命與家是一體兩面，幾乎無法拆開而獨立存在。有家才有隱私跟安全感，人才能獲得保護跟滋養。自由作為一種概念，其內涵始終不僅限於信仰自由與人身自由，也包含我們能出人頭地的自由：我們要能選擇喜歡的職業謀生、要有機會習得新的技能。穩定的家讓我們能藉由努力達成經濟自主，也讓我們有條件表達自我。我們要能以合理的報酬受雇，也要能享受屬於個人的自由。

那幸福呢？看到阿琳給他買了雙球鞋，喬瑞臉上閃過的笑容就是幸福；一邊哼著讚美詩、一邊煮了頓好料的拉蕊正品嚐著幸福；因為某人被作弄成功而爆笑成一團的辛克斯頓一家，他們身邊也環繞著幸福。所謂對幸福的追求，無疑地也包括物質上的追求：起碼要能夠確保基本的生活所需。你可曾想過只因為貧窮在美國是這樣地鋪天蓋地、只因為我們共同做了一個不照顧所有公民，不保證所有人都能安居的決定，導致多少的幸福與才能皆無疾而終。

在美國，我們保證了「老有所養」、保證了十二年國教、也保證了給所有公民的基本營養，我們認定

這些是生在美國的基本權利。我們會保證這些事情，是因為我們知悉必須確保供給基本的人性需求，如此一來追求活著的尊嚴才不會是緣木求魚。而誰能說居住不是基本的人性需求？屋況合宜、價格合理的居住環境，絕對應該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而且原因一點都不費解：要是連住得安穩都談不上，其他的事情都會像蓋在流沙上一般。

如果讓人人有屋住是我們的義務，那我們該如何踏上執行之路？好消息是我們其實已經做了很多，終點距離我們並不遙遠。談到滿足民眾居住的需求，多年來美國的努力成果豐碩。往前回推個幾代，美國的窮人會擠在破敗的貧民窟裡，當中公寓若不是沒有浴廁、就是缺乏熱水，更不是每家都有暖氣跟窗戶，²⁵ 疾病與死亡在其間橫行無阻。經過幾個世代的努力，居住品質有了長足的進步。而為了提升民眾的負擔能力，大膽而有效的方案應運而生。在二十世紀中期，居住問題絕對是美國追求進步與發展的首要課題，高樓大廈紛紛拔地而起，取代了原有的貧民窟。「在當時，為新的公宅建築案剪綵是喜事，」已故的住房經濟學者路易斯·溫尼克（Louis Winnick）曾如此說。「大城市的市長與議員會為了笑納選票而大開選舉支票，他們會要某個選區蓋很多層樓的公宅。」等到公宅的居民一看到自己的新家竟然能斬新無比而且通風透氣，社區周遭還能綠草如茵，外加有許多遊樂設施——他們都高興到快忘記呼吸。「這地方超美，」有人這麼形容，「就像個度假勝地。」²⁶

只不過夢醒時分很快就來臨。公宅原本是要擔任貧民窟的替代品，沒想到卻慢慢成了貧民窟的接班人。隨著政治人物掐死了資金的挹注，公宅的狀況便開始年久失修而陷入萬劫不復。屋內窗戶破損、許多水管不通，電梯日益老舊。出得門外，污水的開口敞開在光天化日之下，沒人收的垃圾也愈疊愈高。有能力搬的住戶都搬走了，沒走的剩下弱勢中的弱勢。就這樣，未經多少時日，公宅社區便陷入了暴力

的深淵與亂局。就以聖路易 (St. Louis) 為例，著名的「普魯伊特—伊戈公寓大樓」(Pruitt-Igoe Towers) 才蓋好短短十八年，就在電視上實況轉播被炸到灰飛煙滅。為什麼？因為那地方可怕到連警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放眼全美國，拆屋用的鐵球跟炸藥可以說到處「為民除害」。其他像芝加哥的「羅伯特·泰勒之家」(Robert Taylor Homes) 跟亞特蘭大的「麥可丹尼爾—葛倫之家」(McDaniel-Glenn Homes) 在被夷平之前，也都曾了無生趣地在黑白隔離且杳無人跡的腳底投射出長長的身影。兩座城市就這樣蒙上了陰影。以這些建案末期的狀況而言，把它們給轟掉不僅省錢，也比較不那麼殘忍。你可以想像這跟「一間房子發生過令人難以啟齒的事情，索性用推土機把它給剷掉了，」是同一種概念。²⁷

從這些公共住宅的瓦礫當中，「租屋券」有了萌芽的機會。無論租屋券是好是壞，都不會讓普魯伊特—伊戈公寓或羅伯特·泰勒之家重蹈覆轍，美國也終於可以跟這些與公宅畫上等號的都會暴力、一窮二白與政策失能等問題分道揚鑣。時至今日，由官方編預算支應的「聯邦抵用券租屋方案」(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 幫助過不知凡幾的家庭在商業租屋市場中求得容身之所。在讓兩百一十萬戶美國人受益後，「租屋券」計畫已經是美國政府給予中低所得家庭最大手筆的居住補貼方案，此外還有一百二十萬戶美國家庭住在公宅之中。²⁸ 費城、西雅圖與奧克蘭等城市翻轉了公共住宅的設計概念，新的做法是樓層不用太高、但房子要蓋得美觀，並且要打散分布在不同的社區當中。整體而言，無論是選擇住公宅或領租屋券，弱勢者都可以把租金占所得的比率降到三成，等於另外七成由公部門吸收。²⁹

以公共政策的力量去提供條件合宜、價格合理的住房給低收入的美國家庭，絕對有其重大的意義，也能為打擊貧窮出一份力。雖然公宅的住戶或租屋券的領取者並非個個都是窮人——當中不乏年長者或身障朋友，也有一些中等收入的民眾——但年復一年，各種租屋補貼方案讓每年兩百八十萬名的美國人得以從貧困中脫身是不爭的事實。這些方案讓更多人不再無家可歸，讓家庭可以騰出資源而不會沒錢看

病、沒錢付交通費，或者連吃飯都成問題。³⁰ 我看到很多家庭排隊排了好多年，終於領到租屋券後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衝到雜貨店，用他們「突然多出來」的錢去買東西。就這樣，他們的冰箱跟櫃子不再空空如也，他們的孩子也不再弱不禁風、營養不良，或者長期貧血。³¹

不過，這些人畢竟是少數的幸運兒，更多的家庭沒有這種運氣。許多孩子——我說的是像喬瑞、小坎達爾跟露比這樣的孩子——沒辦法好好吃飽，就因為租金過高。二〇一三年，租屋的窮人有百分之一住在租金管制的房子裡、百分之十五住在公宅、百分之十七領取以租屋券為主的政府補貼，其餘的百分之六十七，也就是三分之二的貧困租屋家庭拿不到聯邦補助的任何一分錢。³² 這種政府在伸出援手時的巨大落差，加上房租與水電瓦斯價格上漲（但所得並未上漲），也難怪貧困家庭普遍被食衣住行裡的「住」給榨到身無分文了。³³

你能想像我們把大部分失業救濟跟社福安全網給收起來，不給那些有需要的家庭嗎？你能想像我們讓來申請食物券的家庭一個個餓著肚子吃閉門羹嗎？你知道面對需要棲身之處的貧困家庭，我們正在做的就是這樣狠心的事情嗎？

貧窮者的居住正義是一個重大的危機，因此我們必須盡全力解決。這個問題絕對是美國內政的當務之急——因為居住問題不但把許多底層家庭逼到瀕臨財務崩潰，甚至中等所得的家庭也開始陷入泥淖。把當前美國所有的租屋家庭都算進去，有超過五分之一的家庭，房租就占了所得的一半。³⁴ 再一次讓城市恢復生氣，讓大家「住得起」，是美國沒有理由不做、也沒有理由做不到的事。

有意義的改變不限規模大小，辦法也不只一種。有些解決之道得細火慢熬，而且所費不貲，這類做法主要是想釜底抽薪，從根本開始改革。還有些方法的規模不那麼浩大，比較可以即知即行。比方說司

法，就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

提供給窮人的法律扶助，自雷根時代開始走下坡，到「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³⁵ 時期整個潰不成軍。結果是現今全美眾多的住房法庭裡，九成的房東都備有律師，而九成的房客則孤身一人。³⁶ 瀕臨驅離邊緣的低所得家庭得不到公設辯護人的幫助；但其實只要有律師的協助，他們能續住的勝率就會提高非常多。³⁷ 在住房法庭內提供弱勢的低收入家庭由政府資助的法律扶助，會是效益極高的做法——流落街頭的憾事可以避免、驅離可以減至最低、窮人家庭可以得到公平的立足點。

在一九六三年，劃時代的「吉迪恩控告溫萊特」(Gideon vs. Wainwright)³⁸ 一案裡，最高法院一致通過在刑事案件的審判上，無力負擔律師費的被告應有權獲得公設辯護人的代表，理由是確保審判的公平。事隔十八年，法院審理了艾比·蓋爾·拉瑟特 (Abby Gail Lassiter) 的案子。出身北卡羅萊納州的艾比·拉瑟特是名一文不名的黑人母親，而在沒有律師代其辯護的狀況下，她在民事法庭上遭到終止親權。這一次法院的見解出現了分歧，而最終的結論是：民事被告只有在人身自由可能不保時，才能申請公設辯護。羈押當然很慘，但民事案件的判決也可以讓人傷心得死去活來，不信你可以去問問失去孩子監護權的拉瑟特。房客經常無法為自己據理力爭，非得由律師出面不可，原因是房客可能欠缺相關的法律素養，所以不知道該以哪些法條為自己辯護，這時就得有個律師來提出各種抗辯理由。另外一種狀況是像阿琳那樣會緊張過度、或者被法院環境嚇到說不出話來的人，若有律師在座，房東就較沒空間小題大作，房客則比較不會被欺負或誤簽「不平等條約」。要不是驅離真的太容易成立，像多琳跟派翠絲等房客怎麼會因為怕被報復而不敢舉報屋況不安全或不合法？如果有律師幫忙，房客甚至根本不用自己上場。不用出庭的他們可以照常上班、或者在家照顧小孩。主張權益原本就是律師的專業，律師說一句的勝率贏過他們說十句。

對於大部分房客一遭遇驅離就放棄不出庭，法院看起來並沒有什麼興趣處理。真要說，法院還蠻希望他們不要出現，主要是驅離的案子每天都有一大疊。在住房法庭工作的人就算同情房客，也只能先擔心自己能不能把當天的案件處理完。萬一處理不完，明天又會送來新的一堆。所謂的「程序正義」，最後往往只剩下程序，看不見正義：總之先把案子處理完就是了。這一點，只要我們讓房客有律師，就可以改變。這會花納稅人的錢，因為我們不僅得付律師薪水，還得因應業務量的增加來雇用更多的特聘法官、法官與法庭書記。住房法庭得有充足的預算，才能名副其實地發揮法院的功能，但現在的住房法庭則比較像驅離令的生產線：每天只是不停的蓋章、蓋章、蓋章。

把錢用來拯救我們的城市跟孩子，絕對是非常划算的投資。只要提供幾個小時的法律扶助，在問題上游花費功夫，就可以在下游省下許多社會成本。比方說在二〇〇五到二〇〇八年間，紐約市的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就推動過一個計畫來提供法務扶助給超過一千三百個家庭，結果成功讓百分之八十六的驅離申請遭到駁回。這樣的努力花了紐約市府大概四十五萬美元的經費，但後續省下的經費光只算收容所的開銷，就省了超過七十萬美元。³⁹ 驅離的後遺症不可勝數——對公家預算也造成很大的負擔。⁴⁰

在民事案件上獲得公設辯護的權利已經在世界各國普及，而且不只法國、瑞典，就連亞塞拜然、印度、尚比亞與其他許多我們看不起、覺得比美國落後的國家，都已經在人權的保護上做到這個程度。⁴¹ 美國要是能把公設辯護的範圍擴及住房法庭，那在社會公義的追求上絕對稱得上一大勝利。但話又說回來，光是靠律師，並不能根除美國租屋驅離的弊病，因為問題的根本在於房租的飆漲不止，窮人租得起的房子瀕臨消失。

若認定「有地方住」是美國人應該一律享有的基本人權，那我們就得思考另外一項大家受損的權

利：把租屋者當成牟利的對象——愈弱勢的人，就愈是包租公（婆）拔毛的目標。美國自立國以來，就不乏具遠見者呼籲在公義與私利間找到平衡。這種平衡在保護國民不被追求私利的動機所傷害的同時，「並不是要摧毀個人主義，」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說，「反而是在保護個體的利益。」⁴² 限制與保障童工的專法、最低工资、職場安全規範與種種我們現在覺得理所當然的保護傘，都是出於人身幸福的重要性遠大於囤積財富的判斷。

這不是個雙贏的局面，有人會輸是因為有人在贏。「任何一種狀況會存在於世上，」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曾寫道，「都只是因為這種狀況的背後有人得到好處，而貧民窟就是這種經濟剝削的結晶。」⁴³

說到剝削，「剝削」是個從貧窮辯論中被抹去的用語，⁴⁴ 是直指貧窮不光是低所得所致的證據。確實，貧窮不只是因為人的所得低，也是因為商業市場的巧取豪奪。當然透過調整基本工資跟增加社會福利來提高窮人的所得，絕對是重要且必要的政策；問題是，這些多的錢不見得都能留在窮人的口袋裡。要是房租也一起漲，那薪資上漲的意義就會被削弱，就像舊城區的雜貨店一漲價，食物券的購買力就會變差——而這其實是一個正在發生的現象，一項統計是說雜貨價格上漲了四成多。⁴⁵ 貧窮是一體兩面造成的結果，收入與支出，所得與費用。而只要剝削存在這個世上一天、只要我們不雙管齊下去處理貧窮問題，那現實肯定不會有明顯的好轉與改變。

歷史說明了一切。美國的工運曾在二一三〇年代風起雲湧，當時勞工訴求的一樣是調薪。有趣的是，在當時，土地資本（地主）並沒有跟工業資本（資方）站在一起，他們反而支持勞工。地主當時的想法是：勞工賺得多，他們收的租金也會變多。一百年之後歷史重演，但勞工透過罷工所爭取來的薪資漲幅，只夠快速上漲的房租塞塞牙縫。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子裡，製造業的就業市場擴

張，但房市供給（特別是給黑人住的地方）並沒有增加，而這又讓房東有機會可以占勞工所得成長的便宜。如果說每年二月是驅離的「淡季」，那只是因為城市的窮忙族把「薪資所得租稅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也就是政府給低收入家庭的退稅額度)的一部分或全部，拿去補貼積欠的房租。在不少案例中，這每年一度的補助雖說是想讓低收入家庭不無小補，但同時也拐個彎肥了房東。⁴⁶ 在我們幾乎把整個精神都放在思考窮人跟貧困社區缺乏何者的同時，我們只看到了他們需要好的工作、需要一張更強的社會安全網、需要好的學習對象；但我們卻忽略了剝削也是貧窮無法根除的元兇。房東未曾忘卻的一件事是：窮人的錢好賺⁴⁷，但我們卻視而不見。爛社區是門好生意，但在政府眼中卻是一片太平。

剝削最好見縫插針的地方，就是生活必需品，比如住跟吃。有多達一千兩百萬名美國人去辦同等於高利貸的「發薪日貸款」，而他們借錢可不是為了「打腫臉充胖子」買奢侈品、也不是因為臨時有意外的支出，而是因為他們有房租、油錢、餐費，或其他的固定帳單要付。發薪日貸款只是五花八門的財務吸血鬼中的一隻，其他像信用卡的循環利息、或為了就學的而辦的學貸，統統都是在打窮人口袋的主意，即便他們的口袋已經不深。⁴⁸ 窮人如果住、吃、耐久財(Durable good)或貸款利息的負擔變重，然後洗學歷跟繳房貸的「報酬率」又不高（甚至於完全沒有任何效益），那他們的實質所得就會比帳面數字更少。這是怎麼說都非常不公平的狀況。

因為這種不公平的狀況而有利可圖者、或是對其無動於中的人，會說我們應該尊重市場機制，應該放手讓市場自己調整。但這麼說的人其實言不由衷，因為住屋市場中的剝削，其始作俑者或背後的靠山根本就是政府，讓房東能合法漫天喊價、肆無忌憚的，不就是政府自己嗎？政府補貼高級公寓的興建，讓房租愈喊愈高，讓窮人的選擇更少；在房客繳不出錢的時候，用一次性或持續性的租屋補助代墊給房東的，也是政府；只要房東申請，就會派執法人員去強制驅離的，還是政府；

把驅離紀錄登記在案、還昭告天下，等於是在服務房東跟討債公司的，依舊是政府。如果說警察跟監所是把舊城區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弊病（如治安惡化或黑市）進行「傷檢」跟處置，那民事法庭、郡治安官還有遊民收容所，就是在吸收都會窮人居住成本飆漲跟底層住屋市場遭私有化的各種後遺症。⁴⁹

房東很喜歡把自己說得與眾不同，但他們做的事情跟其他賺窮人錢的人沒有兩樣，說起來他們也就是一般人。他們只是在歷史與社會結構的劇變中恰巧撿了便宜，賺了些錢，甚至有人因此致富，但他們也就是合法地把房子租給載浮載沉的家庭而已。試問今天當房東的是我們，這錢我們賺或不賺？我們會遇到窮人就佛心地把租金打五折嗎？當租金的支票跳票，我們會損失幾千美金也都無所謂嗎？雖然我在這裡強調剝削的嚴重性，但這並不表示我們要鬥爭房東，把他們打成貪得無饜跟狼心狗肺的人。強調剝削，是要凸顯社會在處理貧窮問題時的矛盾與效率不彰，我們不能光說要幫助窮人，卻不去處理他們陷入貧窮的根本原因；強調剝削，是希望大家共同去了解房東跟房客，乃至於我們每一個人，為什麼會眼睜睜地看著極度的不平等在社會上發生而無動於中。

姑且無論房東是怎麼變成房東的——有人辛苦打拚、有人聰明才智過人、有人繼承財產、有人走運、有人詐欺，但不變的是房租每漲一元，房東就多賺一元，而房客就得多付出一元。房東跟房客的命運綁在一起，但利益卻相互對立。都會區房東的利潤如果合理，那是一回事，問題就在於他們賺的往往是暴利。在美國第四窮的城市裡開設爛透了的拖車公園收租，其年所得竟然是房客全職領基本工資的三十倍，是房客領取救濟金或身障補助的五十五倍。在這兒相互槓上的是兩種自由：房東靠租金賺錢的自由，對上房客有能力讓家人住得安全的自由。⁵⁰

要讓這兩種自由再次平衡，是有辦法的：大幅提高租屋券計畫的規模，把低收入家庭一網打盡，讓受益者不再出現漏網之魚。我們真正最需要的居住政策，必須得能照顧到不幸的大多數。在數以百萬計的貧困家庭掙扎而無助的此時、在他們於私人租屋市場中不知所措的此時，我們需要這樣的政策方案來凸顯美國的主流價值：安全、公平、機會平等。在房東想要賺錢的心願跟房客希望有個容身之所的心聲之間，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住房政策將為我們開闢出一條中庸之道。

這背後的设计並不複雜。每個家庭只要所得低於一定水準，就有資格領取租屋券。拿著租屋券，他們可以自由選擇想住的地方，就像食物券幾乎像現金般暢通無阻。只要想住的地方不是太貴、太大、太奢華或反過來太簡陋、太破爛，我們都應該讓租屋券能派上用場。合理的住房要有不過度講究但水準以上的屋況，價格也要合理。政策的主事者可以借鏡民間租屋市場中常用的算式來開發精算跟分析的工具，藉此避免房東超收或防止房客揮霍。這個方案可以控制領券的家庭把三成所得花在居住上，其餘的則由租屋券支應。

廣發租屋券可以讓美國的房地產面貌一新。驅離件數會直線下降，變成難得一見，無家可歸也會逐漸絕跡，家庭對於所得的實質增加會立刻有感。重生的家庭會騰出錢來吃飽一點、投資孩子的教育或自己的專業，也開始儲蓄。他們會找回安定的生活，重拾對家跟鄰里的歸屬感。

放眼已開發國家，這樣的全民居住方案已經有許多成功的先例。任何國家只要有推行這類方案，其國內收入在一定標準以下且符合基本要求的家庭，都可以領取租屋補助。英國的「租屋補助」(Housing Benefits)之普及，已經讓最近的一篇新聞寫到：「好像問『誰沒拿到』會比較快一點。」「確實是比較快一點，」記者自問自答地說。英國這項(大部分都是直接轉帳給房東的)福利確保了一件事，那就是家庭不會為了付房租而搞到一窮二白。荷蘭的「房租津貼」(Housing Allowance)也透過類似機制，提供了理想

的房屋給全國將近三分之一的租屋者，這政策尤其大大地嘉惠了低地國度裡的窮中之窮。⁵¹

這些國家會祭出租屋券來處理問題是有原因的。雖然租屋券並非放諸四海都是最有效率的選項，特別是在生活費偏高的城市裡；但透過租屋券，我們確實能把全國性的政策方案實施到最徹底。理論上，要解決底層的居住問題，我們可以增加公共住宅、提高弱勢者的免稅額、協助民眾購屋、鼓勵建商蓋屋，但這些選項都會立刻遇到一個瓶頸，那就是規模的問題。相較於蓋新的公宅或補貼民間開發，發放租屋券顯然是事半功倍的做法。要靠蓋房子，居住問題永遠沒有解決的一天。考量到法規管制的日趨嚴峻與興建成本的不斷高漲，要讓每個低收入家庭都能住進公宅，納稅人的負擔會是天文數字。就算我們花得起這些錢，廣建公宅也會冒著重蹈覆轍的風險，從前有多少公宅把窮人拉到同一個屋簷下，而這等於是創造出人為的貧民窟。這不僅讓種族隔離問題雪上加霜，社會問題也會因為貧窮的集中而發酵。⁵²

會不會有人因為政府廣發租屋券而好吃懶做呢？問得好。有項研究顯示租屋補助會導致工時跟獲利的溫和下降，但其餘的研究則顯示不出有什麼影響。⁵³老實說，對於想讓民眾自給自足的目標而言，「維持現狀」的威脅絕對比任何一種政策方案都大。被高房租（價）壓垮的家庭不可能有閒錢讓成人去學習一技之長、也沒辦法讓孩子多受點教育，累積未來用得上的才華。還有重複搬家也會讓人沒辦法穩定在同一處任職。讓人有地方可住，跟職訓或教育一樣，是一種人力資源的投資，美國勞動力的素質將因此獲得穩定的提升。整體而言，窮人並不想一直窩囊下去，他們並不想鑽漏洞、走後門，或是苟延殘喘地活著。他們想要發光發熱，想要美好的人生，想要當一個「有用的人」：他（她）們很多人想當護理師（這也是凡妮塔的夢想），想經營自己的慈善事業（阿琳的夢想）。一個穩定的家，就是讓這些夢想有機會開花結果的肥沃土壤。

美國大部分的州，都沒有規定房東有義務要接納持租屋券的家庭，並且許多房東看到租屋券就躲，

理由是他們不想淌額外建築法規的渾水、要不就是嫌行政程序麻煩。如果想讓租屋券政策在全美通行，則房東的這種心態與疑慮必須考慮進去。有些建築法條的確能確保住家的安全性與屋況品質，但也有些可有可無。對於持租屋券能入住的公寓施以嚴格的建築法管理，可能對房東造成不必要的負擔，進而使得維護成本高漲。⁵⁴ 但即便是執法跟行政流程調整得更加合理跟「親民」，讓房東更好做事，總還是會有些屋主（特別是房地產位於精華區的房東）會堅持不收持租屋券的民眾。他們就是不想讓「這些人」住進來。如果我們繼續坐視這種歧視橫行，那就是在把持租屋券的人往特定的鄰里趕。這麼做不僅剝奪了低收入家庭進駐中產以上社區的機會，也會削弱我們拿社會政策來促進種族融合的能力。因此，通行全美的租屋券計畫不僅要努力要讓房東有參加的誘因，還要在執行時拿出公權力。如果種族或宗教歧視是法所不容的，那全國性的租屋券政策應該也要有不得歧視的配套。

完善而周詳的租屋券方案，應該要確保租金水準合理，包括調漲房租要以通貨膨脹率（物價年增率）作為依據，並且應該要有彈性的條款來確保房東有合理的投資報酬率。租屋券的政策執行，理應讓房東享受到穩定的租金收益、較低的房客流動率，以及較少的驅離件數。我們若是希望由民間租屋市場來吸納多數的低所得家庭，那首要之務就是得讓房東有利可圖。「讓窮人有得住，說到底必須得是門生意。」傑可布·瑞斯（Jacob Riss）在一百一十五年前說過，「畢竟他們現在會身在此處，就是因為我們的祖先做了筆生意。如果是當成慈善事業、或者業餘的消遣、甚至像是在趕流行，這項事業都會慘遭失敗，而且是在任何時候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成功。」⁵⁵ 但話說回來，居住也是生而為人的基本需求，是兒童健康與發展的關鍵要素。對發展經濟跟穩定社區這麼重要的一樣東西，我們實在沒本錢將之單純視為一門生意。我們不能看著租屋變成一種露骨的投資工具，一種「搖錢樹」或「金雞母」似的存在。

要讓租屋券政策通行全美而且效益能最大化，我們必須要從成本控管下手。光是廣發租屋券而沒有

配套去穩定租金，就形同是全民買單，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全美房東的獲利。⁵⁶目前的狀況是，房東之所以會對持有租屋券的房客超收房租，是因為對方也無力反抗。按照政策主管機關所制定的都會房租上限，在租屋券房客集中的貧困社區裡，市場租金行情往往低於房東向租屋券持有者收取的房租。而既然法律都規定可以多收了，房東豈有把錢往外推的道理。於是，「聯邦抵用券租屋方案」可能會花政府不是幾百萬或幾千萬美元，而是幾十億元的税金，進而讓數十萬家庭莫須有地失去了獲得補助的機會。但真相是，經濟學者主張在不用多支出任何一毛錢的狀況下，現行的租屋券計畫就可以擴大服務到全美所有的貧困家庭，我們要做的只是打擊超收，讓政策的執行更有效率就行。⁵⁷

其實就算我們什麼都不做，也不去管現行的租屋券計畫效率彰顯與否，我們都還是有能力提供這項至為關鍵的福利給美國所有的低收入家庭。二〇一三年，跨黨派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估計，擴大租屋券計畫到各地所有收入低於中位數所得三成的租屋家庭，需要的額外支出也只有兩百二十五億美元，租屋補助的整體支出只會因此增加約六百億美元。實際數字應該會比這個低，因為跨黨派政策中心並沒有考慮到擴大租屋券的發放可以省下的錢。不用照顧那麼多無家可歸的人，就可以省下一筆開銷；醫療成本的減少，也可以省下一筆開銷；居住正義危機的解除，更可以為我們避開種種非常花錢的後果。⁵⁸廣發租屋券絕對不便宜，但美國不至於付不起。

這個錢我們拿得出來，而且關於錢該怎麼花，我們還做過不少決定。這些年下來，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國會議員都曾經限縮過給窮人的租屋補助，而且反過來「劫貧濟富」地把福利以稅務優惠的形式加到擁屋的富人身上。⁵⁹到了今天，持有房屋的稅務減免支出已經遠超過租屋補助。以二〇〇八年、也就是阿琳被從第十三街驅離的那年而言，聯邦政府花在直接租屋補助上的費用不到四百零二億美元，但屋主拿到的稅務優惠竟超過一千七百一十億美元。這個數目，相當於美國教育部、退伍軍人部、國土安全

部、司法部與農業部在二〇〇八年的預算加總。⁶⁰ 美國每年花在給屋主津貼上的錢，包括房貸利息扣抵與資本利得豁免的錢，已經是全美租屋券政策成本預估的三倍。

聯邦房屋補助最大的受益者，是年所得達到六位數的家庭。⁶¹ 如果我們要把公帑都砸在有錢人身上——像對屋主們的優渥待遇這樣，那我們就應該敢做敢當地承認，而不應該學政客扯謊，說美國這個世界上數一數二有錢的國家沒辦法為窮人做更多。貧窮在美國多延續一天，都是因為我們不願花這個錢，而不是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資源。

通行全美的租屋券計畫只是可行的政策之一。我希望看到眾多意見能被提出，讓美國成為一個居住正義以及於每個人的國度。成功不必在我，或許也不應該在我，因為凡事都應該要因地制宜。適合紐約的做法不見得能在洛杉磯行得通，居住問題的解決在繁榮的休士頓、亞特蘭大，或西雅圖，不會跟在美國東北部鐵鏽工業帶（Rust Belt）上的都會區、或佛羅里達的赤貧郊區、或美國地景上的點點小鎮一樣。一個城市可能需要大型土木工程以興利，另一個城市則可能必須拆屋還地來除弊。美國的都市跟城鎮原本就是形形色色各有千秋——不同的本質與風情、天賦與問題，救贖之道自然也不會千篇一律。

無論這團亂局的出口在那裡，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確定：美國的現狀是一種極度的不平等、是不給人機會翻身、是對人類基本需求的否定與無動於中、是在看著人無端受苦還去當幫兇——這種現狀對比美國高舉的任何一項價值，都是莫大的諷刺。任誰都不可能找到一派道德、一款倫理、一部宗教經典，或任何一篇聖者的教誨，可以搬到美國現狀的面前，然後告訴我們這樣沒有什麼不對。

- 1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MJF Books, 1961), 13; 關於字源學 (etymology) 的見解，在此特別要感謝羅文·富拉德 (Rowan Flad) 與沙穆斯·汗 (Shamus Khan) 的恩惠。
- 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rennial Classics, 2000), 511.
- 3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Volume 2, The Negro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ers 1964 [1944]), 810.
- 4 Plato, *The Republic*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87), 312. 原文是 men (男人)・我將之改成「people (人)」。Mary Schwartz and Ellen Wilson, *Who Can Afford to Live in a Home? A Look at Data from the 2006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2007)
- 6 Chester Hartman and David Robinson, "Evictions: The Hidden Housing Problem," *Housing Policy Debate* 14 (2003): 461-501.
- 7 Gary Evans, "The Environment of Childhood Pover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 (2004): 77-92; Shigehiro Oishi, "The Psychology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Sel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 (2010): 5-21; Robert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 8 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濃厚的中產階級偏見存在於學者當中。他們會想當然地認為搬家一定是計畫中的事情。關於居住流動性研究中存在的「故意性偏見」(intentionality bias)・進一步說明可參見 Matthew Desmond and Tracey Shollenberger, "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 Prevalence and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 *Demography*, forthcoming. 關於窮人在居住上的高流動性・參見 David Ihrike and Carol Faber, *Geographical Mobility: 2005 to 2010*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12); Robin Phinney, "Exploring

Residential Mobility among Low-Income Families,” *Social Service Review* 87 (2013): 780-815.

9 這項發現源自於一個「負二項迴歸模型」(negative binomial model)。該模型估算了租屋者回推兩年的搬家次數，並將家庭所得、種族、教育程度、性別、家庭狀況、年齡、犯罪前科，乃至於近期是否歷經三種重大打擊(失業、分手/離婚、遭房東驅離)都考慮進去。分析發現低所得與流動率固然存在正相關，但那是手排除「非自願遷移」這項變數之前。研究發現在所有其他條件一樣的情況下，歷經迫遷的房客會在流動率上高於能避免迫遷命運者的一點三倍。

參見 Matthew Desmond, Carl Gershenson, and Barbara Kiviat, “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Social Service Review* 89: 227-62. 我說「密爾瓦基最窮困的租屋者」，指的是所得分布上屬於底部四分之一的租屋家庭(即年所得低於一萬兩千四百零四美元)。《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

10 關於密蘇里州傑克森郡的狀況，參見 Tara Raghveer, “We Be Trying”: A Multistate Analysis of Eviction and the Affordable Housing Crisis B.A. the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Committee on the Degrees in Social Studies, 2014). 二〇一二年，紐約市的各住房法庭經手了兩萬八千七百四十三筆驅離判決，外加二十一萬七千九百一十四筆以未繳租為由提出的驅離申請。參見 New York City Rent Guidelines Board, *2013 Income and Affordability Study*, April 4, 2013. 克里夫蘭作為一個有九萬五千七百零二戶租屋家庭的城市，分別在二〇一二與二〇一三年累計有一萬一千零七十二筆與一萬一千零三十一筆驅離申請——這代表每年有將近百分之十二的租屋家庭會收到驅離法庭的開庭通知。參見 Northeast Ohio Apartment Association, *Suites Magazine*, “Eviction Index,” 2012-201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13. 二〇一二年，芝加哥估計有三萬兩千兩百三十一筆驅離申請，相當於該市租屋存量的百分之七；參見 Kay Cleaves, “Cook Eviction Stats Part 5: Are Eviction Filings Increasing?” StawStickStone.com, February 8, 2013.

11 Matthew Desmond and Carl Gershenson, “Housing and Employment Insecurity Among the Working Poor,” *Social Problems*, forthcoming.

12 驅離也會使租金升高，讓整個局面更形惡化。簡單講，房東會把受租金管制的房子裡的房客趕走，好方便他們用較高的市場行情去出租房子。但即便是沒有租金管制的出租單位，房東也會照樣趕人，因為新房客的租金比舊房客更容易漲價。以密爾瓦基的公寓而言，租屋者每多住一年，他所繳的房租就會比其他條件相同的房客減少將近七十美元。流

- 動促進漲租，而驅離正可以創造出流動。Matthew Desmond and Kristin Perkins, "Are Landlords Overcharging Voucher Holder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2015. 在舊金山，根據《埃利斯法案》(Ellis Act) 所做成的驅離案件數——屋主常根據《埃利斯法案》將受租金管制的房子，改登記成獨立產權公寓(condo)，或可按市價收租的單位，在二〇一〇年三月到二〇一三年二月間成長了百分之一百七十。Marisa Lagos, "San Francisco Evictions Surge, Report Finds," *San Francisco Gate*, November 5, 2013.
- 13 Matthew Desmond and Rachel Tolbert Kimbro, "Eviction's Fallout: Housing, Hardship, and Health," *Social Forces* (2015), in press.
- 14 Desmond et al., "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就理論上來說，「落後應變數迴歸模型」(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regression models) 的結果顯示，比起自願搬遷者而言，迫遷的體驗讓超過三分之一的社區窮困與犯罪率數據產生了一個標準差的增幅。不分模型，社區生活品質隨搬遷下降的預測指標中，都以種族(租屋者是否為非裔)與搬遷性質(被迫與否)的信度跟效度最高。Desmond and Shollenberger, "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
- 16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Patrick Sharkey,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 17 這項發現載於名為《驅離的影響所及》(*Eviction's Fallout*)，是我跟瑞秋·金布羅(Rachel Kimbro)列為共同作者的一項研究當中。在這份研究裡，我們靠一個「二分指標」(dichotomous indicator)去測量母親身上的抑鬱症狀。身為母親者會接受我們根據「複合國際診斷訪問簡表」(the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Short Form (CIDI-SF))詢問有關於十二個月生活的一系列問題。受訪者會被問到她們過去一年中是否曾連續兩周或以上的時間出現「煩躁不安」(dysphoria：憂鬱症的狀態)或「失樂症」(anhedonia：無法感受到正常人認知中的愉悅)。如果有的話，我們會追問這些症狀是否會在這兩周內天天發生，而且每次發生都延續將近一整天的時間。如果得到的依舊是肯定的答覆，那麼我們會再問得更細。這時受訪的母親們會被問到的主題包括：(a)對事物失去興趣、(b)感覺疲憊、(c)體重變化、(d)失眠、(e)無法專心、(f)覺得自己沒有價值、(g)有想死的念頭。受訪的母親如果自認有煩躁不安或失樂症的其中一項，再加上符合第二階段a、b、c、d、e、f、g七個症狀中的兩個，而造成「複合性國際診斷訪談表」短版1重度憂

- 鬱分數」(CIDI-SF MD) 達到三分或以上，就會被歸為疑似憂鬱症的個案。我們發現無論是對於改變憂鬱量表的截距 (cut-point) / 或是對估計受測者自陳憂鬱症狀的負二項模型而言，訪問的結果都呈現「穩健強勁」(robust)。參見 Ronald Kessler et al., "Methodological Studies of the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CIDI) in the US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N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thods in Psychiatric Research* 7 (1998): 33-55.
- 18 Michael Serby et al., "Eviction as a Risk Factor for Suicide," *Psychiatric Services* 57 (2006): 273-74. Katherine Fowler et al., "Increase in Suicides Associated with Home Eviction and Foreclosure during the US Housing Crisis: Findings from 16 National Violent Death Reporting System States, 2005-2010,"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5 (2015): 311-16.
- 19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 20 這個結果所參考的是密爾瓦基在二〇〇五年到二〇〇七年間的鄰里層級資料。利用落後反應模型，我對特定鄰里一整年的暴力犯罪率做出了預測。當中我控制不變以排除其影響的因素包括該鄰里前一年的暴力犯罪率與遭驅離比率，也包括貧窮家庭的比率、非裔美國人的人口比率、年齡在十八歲以下的人口比率、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人口比率、領取租屋補助的家戶比率。最終的模型紀錄顯示鄰里的暴力犯罪率與其前一年的驅離比率間存在顯著的關聯性 ($B = .155, p < .05$)。見 Matthew Desmond, "Do More Evictions Lead to Higher Crime?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 of Forced Displacement,"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August 2015.
- 21 《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 2009-2011.
- 22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 *Hunger and Homelessness Surve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 2013); Martha Burt, "Homeless Families, Singles, and Others: Findings from the 1996 National Survey of Homeless Assistance Providers and Clients," *Housing Policy Debate* 12 (2001): 737-80; Maureen Crane and Anthony Warnes, "Evictions and Prolonged Homelessness," *Housing Studies* 15 (2000): 757-73. 關於居住品質不良與環境治安不佳對於兒童健康的影響 - 參見 Julie Clark and Ade Kearns, "Housing Improvements, Perceived Housing Quality and Psychosocial Benefits from the Home," *Housing Studies* 27

(2012): 915-39; Tama Leventhal and Jeanne Brooks-Gunn, "The Neighborhoods They Live In: The Effects of Neighborhood Residence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Outcom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2000): 309-37.

Joseph Harkness and Sandra Newman,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Children's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s Families," *Housing Policy Debate* 16 (2005): 223-55; Sandra Newman and Scott Holupka,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Investments in Children,"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24 (2014): 89-100.

換到其他的市場，遇到某項商品太貴，民眾可以選擇不買或買少一點。遇到油價大漲的日子，百姓可以選擇少開車。玉米歉收讓牛肉價格上漲，一般人可以少吃點漢堡。但遇到房租或水電價格上升，大部分貧困的美國人並不能換住便宜一點或小一點的房子，因為他們居住的城市中並不存在這樣的選項。根據二〇一三年的《美國住房調查》(American Housing Survey, 表 C-02-RO)，大約百分之九十八貧窮線下的租屋家庭，住在至少有一間臥室的公寓裡頭，百分之六十八住在兩或兩間以上臥房的公寓。在密爾瓦基，整整百分之九十七的租屋者住在一、二或三房的公寓裡。《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較小的房型在美國的城市裡已經絕跡。在一九七〇跟一九八〇年代，超過一百萬間廉價單人房(SRO)旅館，因為新建築標準的頒布與適用而消失，或被裝修得更豪華來提供給負擔得起的房客。詳見 Whet Moser, "The Long, Slow Decline of Chicago's SROs," *Chicago Magazine*, June 14, 2013; Brendan O'Flaherty, *Making Room: The Economics of Homeles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2-47; James Wright and Beth Rubin, "Is Homelessness a Housing Problem?" *Housing Policy Debate* 2 (1991): 937-56; Christopher Jencks, *The Homel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6. 如果不想搬離他們的工作、朋友、家人與熟悉的社區，低收入房客就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讓人均住房的面積縮小，那就是當起「二房東」，接納額外的房客。但許多房東會直接打槍這種變通的辦法。就算房東願意對法規規定的入住人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公寓人越多，就代表維修成本會成正比，水費也肯定會「水漲船高」。密爾瓦基大部分(百分之七十五)的租屋家庭都不負擔水費。關於房東與物業經理如何看待居住人數、維修成本與水費帳單之間的關聯，我們可以參考下面這段話。說這話的人是喬·帕拉沁斯基(Joe Parazinski)，這位生活與工作都在舊城區的白人管理者，「如果我讓(更多人)人搬進來，那有可能房子裡突然間就擠了十個人。嗯，十個人就要沖十次澡……然後還有馬桶，原本一天要沖二十次的馬

桶，現在會變成要沖兩百次。還有洗衣機呢？洗衣機現在要多洗多少人的髒衣服？……這些小事一樣樣加起來，小問題也會變成大問題。」倡議居住權的社工（housing advocate）往往認為人多是個問題，但租房子的窮人卻覺得人才能解決問題——因為雖然住得太擠也不行，但對窮人來說，更嚴重的問題是住的地方「不夠擠」——意思就是他們被迫花錢住他們住不起的大房子。美國大多數貧困的租屋家庭都「不夠擠」：這些家庭裡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居住密度是每間臥房只住比一點五個人多一點。密爾瓦基全數的租屋家庭中，僅有百分之八居住密度達到每間臥房住兩個人以上。按照每間房住超過兩個人就算是「擁擠」的定義來看，密爾瓦基僅有百分之四的白人房客、百分之八的黑人房客與百分之十六的拉丁裔房客，生活在擁擠的公寓裡。密爾瓦基將近半數的成年房客未與其他的成人同住。說起人口的配置，密爾瓦基的非裔美籍房客算是最孤立的一群：他們當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與另外一名成人同住，遠低於白人房客的百分之五十八與拉丁裔房客的百分之六十九。在密爾瓦基的全體房客中，百分之三十二的人獨居，百分之十六的人只跟孩子同住，百分之五十三的人跟另外一名成人同住。黑人房客中有百分之三十九獨居，高於白人的獨居比例約百分之三十三，以及拉丁裔的獨居比率為百分之十四。黑人房客中有百分之二十六只與孩童同住，顯著高於白人房客的百分之九與拉丁裔房客的百分之十七。不過，部分受訪的房客，可能會刻意隱瞞跟其他的成人同住，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房東可能不知道有這件事情。在《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2011 裡，受訪的房客被要求列出所有與他們共同生活或他們收留的成年人。在解釋過所有資料都會保密之後，進行訪談的人告訴受訪者說，「你可以說說跟你同住或你收留的所有成年人嗎？包括租約上沒有載明的那些，也包括你房東不知道的那些。」這群房客在驅離法庭上共列出了三百七十五名共同居住的成年人，包括有七十名與租約無關的人。在傳票與訴狀（Summons and Complaint）上未列出的成年人當中，以黑人男性為最大宗（總數為三十二人），再來是黑人女性（總數為二十四人）。這樣說起來，我對於黑人房客獨居（或未與其他成人同居）的比率預估應該有「灌水」之嫌，實情應該沒有那麼高才對。但這並不會改變我認為「租屋處普遍擁擠」跟「為政者跟專家們對擁擠的擔心」兩者其實對不起來的看法。《美國住房調查》2013, Table C-02-RO:《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2009-2011. 研究資料中已經顯示擁擠與負面結果間存在某種關聯性，但並沒有很強力的證據顯示擁擠是某種惡果的成因。見 Gary Evans, Susan Saegert, and Rebecca Harris, "Residential Density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Children in Low-Income Famili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3 (2001): 165-80; Dominique Goux and Eric Maurin, "The Effect of Overcrowded Housing on Children's Performance

- at Schoo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2005): 797-819; Claudia Solari and Robert Mare, “Housing Crowding Effects on Children’s Well-Be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2012): 464-76.
- 25 Alex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3.
- 26 Louis Winnick, “The Triumph of Housing Allowance Programs: How a Fundamental Policy Conflict was Resolved,” *Cityscape* 1 (1995): 97. 引言來自於查德·費迪里希 (Chad Friedrichs) 導演的紀錄片《普魯伊特-伊夫的迷思》(The Pruitt-Igoe Myt, 2011)。
- 27 Alex Kotlowitz, *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 The Story of Two Boys Growing Up in the Other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Arnold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8 公共住宅的存量自一九九一年以來，已經下降了大約百分之二十。Peter Marcuse and W. Dennis Keating, “The Permanent Housing Crisis: The Failures of Conservatism and the Limitations of Liberalism,” in *A Right to Housing: Foundation for a New Social Agenda*, eds. Rachel Bratt, Michael, Stone, and Chester Hartm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9-62; Rachel Bratt, Michael, Stone, and Chester Hartman, “Why a Right to Housing Is Needed and Makes Sense: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Ibid.*, 1-19;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 29 技術上來說，租屋券可以補足房客無法支付的金額直到「支付標準」(payment standard)，這是由發放租屋券的在地住房管理局所設定的補貼上限。這個方案會將每四張可供發放的租屋券的其中三張，發給所得低於該地區中位數所得三成、或低於貧窮線的家庭(低於其中之一即可)，剩下的那一張則會分配給所得低於該地區中位數所得八成的其他家庭。
- 30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America’s Rental Housing: Evolving Markets and Nee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13); ABT Associates Inc. et al., *Effects of Housing Vouchers on Welfare Famili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evelopment, 2006); Michelle Wood, Jennifer Turnham, and Gregory Mills,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Family Well-Being: Results from the Housing Voucher Evaluation,” *Housing Policy Debate*, 19 (2008): 367-412.

- 31 ABT Associations Inc. et al., *Effects of Housing Vouchers*; Alan Meyers et al., "Public Housing Subsidies May Improve Poor Children's Nutr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3 (1993): 115. See also Sandra Newman and Scott Holupka,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Investments in Children,"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24 (2014): 89-100.
- 32 《美國住房調查》，2013, Table C-17-RO. 這些估計排除了被歸類為有「其他收入證明」(other income verification) (占低於貧窮線租屋家庭的百分之三) 與「補貼未申報」(subsidy not reported) (占低於貧窮線租屋家庭的百分之二) 的這兩類家庭，因為要確認這些家庭有沒有領取補貼困難。Matthew Desmond, "Unaffordable America: Poverty, Housing, and Eviction," *Fast Focus: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22 (2015): 1-6.
- 33 關於公共住宅的資金需求，參見 Meryl Finkel et al., *Capital Needs in the Public Housing Program*, Contract # C-DEN-O2277-T0001, Revised Financial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ABT Associations Inc., 2010).
- 34 這項估計值在全美多個範圍內的資料組都能保持一致，這包括美國住房調查 (American Housing Survey) 、美國社區調查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所得與社福參與調查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與消費者支出調查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 Frederick Eggers and Fouad Mounem, *Investigating Very High Rent Burdens Among Renters in the American Housing Surve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0). 住不起房子的問題不是美國的「專利」。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有數百萬人從鄉村與小鎮中遷出。一九六〇年，大約三分之一的地球人口住在都會區，如今已經超過半數。城市的實質所得大幅提升，結果是全球貧窮現象的大幅縮減。但這其中有個問題，那就是都市的成長也會伴隨著地價與房價的飛漲。都市居住成本上漲是全球性的現象，這點在「超級巨星級」的城市裡又格外明顯。國際級的大都市會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熱錢會墊高房價，然後低收入居民的生存就會遭到排擠。在非洲最大的城市拉哥斯 (Lagos, 位於奈及利亞)，百分之六十的居民需要拿收入的五到七成去繳納房租，但其實大部分人的住處也只是一房而已。印度德里的商業區租金已經可以跟紐約曼哈頓的中城分庭抗禮。一份近期的研究估計，以全球而言，居住負擔能力與實際房價(租)的差額 (housing affordability gap) 達到六千五百億美元，也是全球所有國家國內生產毛額 (GDP) 總額的百分之一。

- 全球大約有三點三億個都市家庭得支出超過三成的所得在居住上，但這些超出他們負擔能力的房子卻有著不及格的屋況。按照目前的都市化趨勢與全球所得發展，預估到二〇二五年，花大錢住爛屋的家庭會來到四點四億戶，相當於十六億人口。就在都市化的浪潮中，住不起都市的人也以百萬為單位，變得愈來愈多。見 Joseph Gyourko, Christopher Mayer, and Todd Sinai, "Superstar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5 (2013): 167-99;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 Blueprint for Addressing the Global Affordable Housing Challenge* (New York: McKinsey, 2014); Pedro Olinto and Hiroki Uematsu, *The State of the Poor: Where Are the Poor and Where Are They Poores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overty Reduction and Equity, 2013).
- 譯註：始於美國次級房貸違約，二〇〇七年下旬開始橫掃全球的金融海嘯。
- 36 Russell Engler, "Pursuing Access to Justice and Civil Right to Counsel in a Time of Economic Crisis," *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 Law Review* 15 (2010): 472-98; Russell Engler, "Connecting Self-Representation to Civil Gideon," *Fordham Urban Law Review* 37 (2010): 36-92.
- 37 D. James Greiner, Cassandra Wolos Pattanayak, and Jonathan Hennessy, "The Limits of Unbundled Legal Assistance: A Randomized Study in a Massachusetts District Court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Harvard Law Review* 126 (2013): 901-89; Carroll Seron et al., "The Impact of Legal Counsel on Outcomes for Poor Tenants in New York City's Housing Court: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Law and Society Review* 35 (2001): 419-34.
- 38 譯註：吉迪恩於一九六一年因闖空門的罪名遭判刑五年，審判中法官當庭駁回他根據美國憲法第六條修正案（即獲得公平審判與律師代表）提出的公設律師申請。他入監服刑後就此點上訴至最高法院，溫萊特是後來成為被告的典獄長。
- 39 Seedco, *Housing Help Program, South Bronx, NYC* (New York: Seedco Policy Center, 2009).
- 40 密爾瓦基將近半數的迫遷都沒有經法庭處理，並做成紀錄。非正式驅離已經是房東心中最愛的趕人方法。但如果貧困的租屋者可尋求法律扶助的話，那房東就不太願意上法庭了。房客不是不能堅持開庭，但不少人寧可跟房東私了，理由是他們不想身上背負「前科」。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應該重新檢討現行的法律扶助工作。目前，法庭的驅離紀錄是公開可查閱的，這讓司法體系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影響所及是驅離紀錄變成了一種日常的「武器」，法庭內的法官跟法庭外

的房東，都會以此來要脅房客，目的是要他們放棄自己說話的權利。比起上法院去據理力爭，租屋者的最佳選擇是跳過司法程序，房東要你走，就靜靜地走。而如果说出庭只能換得法院下令趕人外加自己被留下驅離紀錄，那我必須說這種法律流程真的大有問題。梅莎 (Meysa) 跟卻斯特 (Chester) 是一對貧困的黑人夫婦，房東太太已經訴請要將他們驅離那間問題雜生、危險破落的房子。房客這邊的說法是，房東說在她把房子修好之前，他們可以免費住在這裡；房東則說才沒這回事。雙方唯一的共識是屋況極糟：電線外露、部分房間地板凹陷，天氣差的時候還會有水灌進屋裡——看了屋子的照片，臨時法官把案子上呈給正牌的法官。等到正式開庭的那天，房東太太帶著律師，拿出一份民事契約要他們簽，裡頭寫著要他們盡速搬離。但梅莎與卻斯特有兩名十多歲的女兒還在讀書，所以他們比較希望能住下來等房子修好。出於這種想法，他們考慮要在陪審團面前爭取留下來的機會。法官解釋說，他們的選擇如下：如果他們簽約同意離開，(房東太太)會略過(本文中提及)驅離的部分，所以在公開紀錄上不會記載你們是被驅離……。如果覺得自己該付的租金都付了、或是有其他的理由可以在法律上為自己辯護，你們可以一五一十地跟我說。這是一條路。另外一條路是跟房東簽約，自己離開，這樣房東跟你們都可以省些麻煩。因為……如果租約到期了，你們不搬離，而(房東)得掏腰包找郡治安官來把你們的東西移到街上的話，那房東太太會把這筆費用算到你們欠的帳上。真的到了那一步，你們會非常辛苦、遺憾、不舒服，而且很殘忍。」「我想請問，」卻斯特開口。「如果我們有合約說，我們在她修好房子前不用付房租呢？」「那，這樣的話，我們就要開庭來審審看，判斷合約的真假，法律上有沒有效力，」法官答道。梅莎與卻斯特跟法官要了幾分鐘讓兩人討論。「我們打官司也不會贏的，」梅莎小聲地說。「輸多少的問題而已。」「最後他們接受了房東太太的條件。很多人沒有被驅離過或逮捕過，因此這些人會主張法庭紀錄應該要攤在陽光下，這才有利於我們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他們認為限制法庭紀錄是在替不民主的政府操作鋪路：秘密警察、私下抓人、黑牢，還有你想得到與想不到的各種狗屁倒灶的事情。相對於紀錄遭濫用是如何扎扎实實地摧殘著許多家庭的生活，這些憑空想像的疑慮只能形容為「虛無飄渺」。許多貧窮的美國家庭，包括許多清白、從未犯法的美國家庭，都因為法庭的驅離紀錄而被逼得走投無路。我們應該先好好處理眼前這個確實存在的問題，而不應該杞人憂天地去擔心那個只存在於我們腦子裡的問題。

41 Martha Davis, "Participation, Equality, and the Civil Right to Counsel: Lessons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Yale Law Journal* 122: 2260-281; Raven Lidman, "Civil Gideon as a Human Right: Is the

- U.S. Going to Join Step with the Rest of the Developed World?" *Temple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 Law Review* 15 (2006): 769-800.
- 42 可用於 Cass Sunstein, *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 FDR's Unfinished Revolution and Why We Need It More Than Ev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3.
- 43 Beryl Satter, *Family Properties: 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215.
- 44 「剝削」(Exploitation) 一詞只在威廉·朱立爾斯·威爾森 (William Julius Wilson) 的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987]) 中描述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時出現過兩次。另外又出現兩次是在威爾森的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1996)，這回是他在描述黑人如何排斥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在洛伊克·瓦匡特 (Loïc Wacquant) 的 *Urban Outcast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8) 裡，四處都有寫著「剝削」一詞，但其中僅有一處是在指「窮人被富人剝削」(123n7)。「剝削」在 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s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裡只「登場」一次，是在第一百七十六頁，指的是舊城區居民間的不法性關係 (sexual liaison)，另外在 Sudhir Venkatesh's *American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 Modern Ghett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裡，「剝削」也只在一百五十頁出現過一次，指的是住尾區的租屋者遭到幫派份子剝削。另一本「剝削」也只出現一次的著作是 Harrington's *The Other America* (page 32)。至於其他內容在探討窮人的苦難，但卻從未出現「剝削」一詞的現代經典有 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s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與 Charles Murray's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 45 關於貧困社區中的食物售價，參見 Chanjin Chung and Samuel Myers, "Do the Poor Pay More for Food? An Analysis of Grocery Store Availability and Food Price Disparities,"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33 (1999):

276-96; Marianne Bitler and Steven Haider, "An Economic View of Food Dese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0 (2011): 153-76.

46 Elizabeth Cohen, *A Consumers'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Knopf, 2008), 40; Elizabeth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1785-18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7-38;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1890]), 30; Allan Spear, *Black Chicago: 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 189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在許多人之中，民主黨前參議員，也具有社會學家身分的丹尼爾·派翠克·莫伊尼漢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可說慧眼獨具。他體察到若我們要了解都市貧窮為何揮之不去，「剝削」絕對是問題的核心。在他對美國勞動部 (US Department of Labor) 一份震驚全場的報告中，曾如此寫道，「對於黑人的處境，白人眼裡往往只看得到他們被歧視以及貧窮的現況……但對於白人來說真正有難度的，是理解長達三百年的剝削對黑人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扭曲……黑人社會的本質才是真正的傷害所在。除非此一傷害可以獲得弭平與修復，否則再多的努力也難以終結美國社會上的歧視、貧窮與不公不義。」Daniel Patrick Moynihan,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65, emphasis mine).

47 我沒想到這點得歸功於

48 關於這些搶錢吸血的勾當，詳見 Alan Andreasen, *The Disadvantaged Consum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Michael Lewis, *The Big Short: 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 (New York: Norton, 2010), 20; David Caplovitz, *The Poor Pay Mo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發薪日貸款如何運作，詳見 Pew Charitable Trust, *Payday Lending in America: Who Borrows, Where They Borrow, and Why* (Washington, DC: Pew, July 19, 2012); Gary Rivlin, *Broke, USA: From Pawnshops to Poverty, Inc.* (New York: Harper, 2010).

49 關於市場跟政府、社會關係的密不可分，參見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 Karl Polanyi, *The Great*

-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1944]). 關於貧窮與警方執法間的關聯，詳見 Megan Comfort, "When Prison Is a Refuge: America's Messed Up,"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December 2, 2013; 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Loic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uce Western, *Punishment and Ineq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Alice Goffman,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 50 Oliver Cromwell Cox, *Caste, Class, and Race: A Study in Social Dynamics*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48), 238.
- 51 Katie Dodd, *Quarterly Benefits Summary* (Newcastle-upon-Tyne: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5); Hugo Priemus, Peter Kemp, and David Varady, "Housing Vou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Housing Policy Debate* 16 (2005): 575-609; BBC News, "Housing Benefit: How Does It Work?" November 9, 2011.
- 52 相較於租屋券，尚無研究顯示以專家方式推動的補助計畫可以讓入得到更「物美價廉」的居住環境。關於公共住宅與租屋券的政策成本比較，詳見 Janet Currie, *The Invisible Safety Net: Protecting the Nation's Po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4; Amy Cutts and Edgar Olsen, "Are Section 8 Housing Subsidies Too High?"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11 (2002): 214-243. 關於租屋券持有者與公共住宅區住戶的比較，見 Sandra Newman and Ann Schnare, "...And a Sui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Failure of Housing Programs to Deliver on Neighborhood Quality," *Housing Policy Debate*, 8 (1997): 703-41; Edgar Olsen, "Housing Programs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in *Means-Tested Transfer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Robert Moffit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365-442.
- 53 Brian Jacob and Jens Ludwig, "The Effects of Housing Assistance on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a Voucher Lotte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2012): 272-304; Mark Shröder, "Does Housing Assistance

Perversely Affect Self-Sufficiency?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11 (2002): 381-417; Sandra Newman, Scott Holupka, and Joseph Harkness,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Housing Assistance on Work and Welfare,"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8 (2009): 81-101.

54 大家知道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住房方案的國家，是沒有最低屋況標準的，這點跟美國有條件推行租屋券的狀況不同。如

果所有國民都租得起像樣的房子，那政府就沒有必要要求起碼的屋況，因為強勢的房客可以拿著租屋券去住別的地方。Priemus et al., "Housing Vou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582.

55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201.

56 即便讓租屋券方案通行全美，我們的問題也沒辦法全部解決。尤其是以供需吃緊的市場來說，租屋券無法完全將租屋

者納入其羽翼之下，呵護他們不受租金上漲的侵襲。唯有政府的大動作干預（如租金管制），或是市場的平衡有所變動（如擴大住房供給），保護租屋者的目標才有可能達成。事實上有一些（不算多的）證據顯示，我們目前的租屋券方案可能正在推高所有人的房租——包括租屋券的持有者跟一般租屋者的房租都變貴了。原因很簡單：如果數以百萬計的窮人選擇離開民間租屋市場而改尋求公宅，民間的租屋需求就會下降，由此基層的租金也會同步下降；如果這些人重新被導回民間租屋市場，而且手握租屋券，那麼民間租屋的需求就會增加，而房租也就會因此同步增高。一項研究發現，在租屋券流通較多的城市裡，租金的漲幅也比較陡峭，且整體而言租屋券對一般租屋者造成的負擔，會大過租屋券對弱勢族群的幫助（見 Scott Susin, "Rent Vouchers and the Price of Low-Income Hous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3 (2002): 109-52）。而許多「房東指南」都有提到這一點：「房東也應該要確認公宅目前的租金行情，包括政府出資的租金補貼水準，以此作為租金參考的一項指標。」(Bryan M. Chavis, *Buy It, Rent It, Profit!*; *Make Money as a Landlord in Any Real Estate Market* [New York: Touchstone, 2009], 70.) 但也有些研究顯示，租屋券持有者的集中跟整體租房價格水準並無關聯。比方說「實驗性住房補助方案」(Experimental Housing Allowance Program, EHAP) 發現租屋券對於市場租金的影響微乎其微。威廉·阿普加爾 (William Apgar) 將這種結果歸因於租屋券在市場內的飽和度並未達到百分之百，同時租金在研究期間遭到人為壓抑。以 EHAP 的資料為本，分別由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與都市研究機構 (Urban Institute) 兩個智庫所支持的模擬研究結果顯示，「住房補助確實會造成領取者與非領取者的租金雙雙顯著上揚，同時還會導致房東減少投資

或放棄未達補貼方案標準的出租單位。」見 William Apgar Jr., "Which Housing Policy is Best?" *Housing Policy Debate* 1 (1990): 1-32, 9. 另見 Michael Eriksen and Amanda Ross, "Housing Vouchers and the Price of Rental Housing," University of Georgia: Working Paper, 2015.

57 Matthew Desmond and Kristin Perkins, "Are Landlords Overcharging Voucher Holder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2015; Cutts and Olsen, "Are Section 8 Housing Subsidies Too High?"; Olsen, "Housing

Programs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關於居住成本的法律規定，參見 Tommy Andersson and Lars-Gunnar Svensson, "Non-Manipulable House Allocation with Rent Control," *Econometrica* 82 (2014): 507-539; Richard Arnott, "Time for Revisionism on Rent Control?"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1995): 99-120. 美國住房與都市發展署於近期公布了一項計畫，要提供「更能如實反映當地租屋市場現況的補貼」給租屋券持有者。該單位於這個計畫中提出的「小區域公平市場租金」(Small Area Fair Market Rents)，會「隨各州的郵遞區號 (ZIP code) 變化，並且可以對應到較現行規定下更大範圍的給付標準」。參見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a More Effective Fair Market Rent (FMR) System: Using Small Area Fair Market Rents (SAFMRs) in 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 Instead of the Current 50th Percentile FMRs; Advanced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Federal Register* 80 (June 2, 2015): 31,332-336.

58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Housing America's Future: New Directions for National Policy* (Washington, DC: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2013), chapter 4. 對於推估政策成本的技術面過程，參見 Larry Buron, Bulbul Kaul, and Jill Khadduri, *Estimates of Voucher-Type and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for Unassisted Households* (Cambridge, MA: ABT Associations, 2012). 二〇一二年，聯邦預算花在擁屋者身上的費用累計高達兩千億美元。可參見 Will Fischer and Barbara Sard, *Chart Book: Federal Housing Spending Is Poorly Matched to Need*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13). 針對公開開放登記的租屋券計畫，另外一筆研究也試著進行成本推估，參見 William Grigsby and Steven Bourassa, "Section 8: The Time for Fundamental Program Change?" *Housing Policy Debate* 15 (2004): 805-34. 這項研究推估若將租屋券計畫擴大到各地中位數所得五成以下的租屋家庭，需要增加的經費會額外增加四百三十億美元，這在當時等於聯邦支出的百分之二點五。

- 59 Schwartz,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45-47.
- 60 Ibid.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08*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2008).
- 61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157-58. A. Scott Henderson, *Housing and the Democratic Ideal: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rles Abram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eter Dreier, "Federal Housing Subsidies: Who Benefits and Why?" in *A Right to Housing: Foundation for a New Social Agenda*, eds. Rachel Bratt, Michael, Stone, and Chester Hartm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5-38.

關於我的故事——研究始末與回顧

從小我有一名牧師父親，而四處打工的母親則是標準的勞碌命。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寬裕，有時候瓦斯會被切掉，母親就會在燒柴的爐子上弄晚餐。對於如何持家她心裡有數，畢竟她幼時在喬治亞州哥倫布市（Columbus）的家對門就是個垃圾場，後來甚至連舊金山惡名昭彰的福特飯店（Ford Hotel）¹她都住過。她沒有自甘墮落，也希望我們這些孩子們可以奮發向上。雖然她跟父親都沒有能力幫忙出錢，但她還是希望我們可以念到大學。我父親會以他的方式，讓我們把這點牢記在心。每當我們開車經過一排彎著腰在烈日下揮汗做著「爛」工作的人，父親就會轉頭問我們，「你們會想一輩子那樣嗎？」

「不想。」

「那就要讀大學。」

而感謝有就學貸款及一些獎學金，讓我成功進入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從我家溫斯洛（Winslow）開車到學校要四個小時。當時我想當名律師，所以選了傳播、歷史與司法等課程。在這些課堂上，我開始學習到很多事情，我發現世界上有兩個美國，一個是爸媽、主日學老師、童子軍隊長說給我聽的美國，一個是我在課堂上學到的美國。而這兩個美國彼此格格不入。貧窮滲透美國之深，蔓延之廣，真的在已開發國家中「無人能出其右」嗎？美國夢真的已經變成了少數幸運兒的專利了嗎？有了這種疑問的我開始在工作或研究之餘翻找圖書館裡的資料，我想知道美國作為我的家鄉，究竟還是不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國家。

也差不多在此時，銀行奪走了我從小長大的家。一個朋友跟我開了四個小時的車回到老家，就為了幫我爸媽搬家。我記得那股深沉的哀傷與難堪，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一切。但或許是有某種東西開始在我內心發酵，於是在返回校園後，我發現自己竟花了幾周的時間加入當時女友的行列，跟慈善組織「國際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一起蓋房子；然後我開始每周有幾天晚上跟在坦佩市(Tempe)米爾大道(Mill Avenue)上的遊民混在一起。在街上，我認識了老老少少的朋友，他們風趣、真心、苦於各自的問題。畢業之後，我感覺一股使命要了解美國的貧窮問題，因為在我眼中，貧窮才是許多問題與苦難的核心，而社會學又應該是最適合研究這一點的領域。於是我申請進入威斯康辛大學的博士班。威斯康辛大學的所在地是麥迪遜，也就是老密爾瓦基人口中「被現實包裹住的方圓三十英里」。

在開始以博士生的身分研究貧窮之後，我發現大部分的文獻在描述貧窮、解釋不平等的時候，都把矛頭指向兩點。其一是我們看似無法控制的「結構性因素」(structural forces)：比方說種族歧視的「歷史共業」，或者是經濟上的轉型與變遷。第二點則強調「個人的不足」——這包括文化上的習性，例如未婚成家，或是「人力資本」的匱乏，比如教育程度偏低。自由派人士比較青睞第一種解釋，而保守派則鍾情第二種。對我來說，兩種解釋都沒有搔到癢處。我認為這兩種看法無論哪一方，都把低所得的家庭當成「檢疫中的動物」看待。在許多以單親媽媽、幫派成員、無家可歸者為題的著作裡頭，社會學者跟記者筆下的窮人都好像獨立於社會存在一樣。窮人被說成是「透明人」，或者會被歸為「另一個(平行)美國」的存在。貧民窟就像是「城中之城」。窮人被屏除在不平等的討論範圍之外，彷彿我們覺得富人中產階級的生計息息相關，而其他人包括窮人則可以忽略不計似的。那些隨便一個動作就能影響到低所得家庭跟窮困社區的富人，他們在哪兒？那些拿窮人開刀而致富的人，他們在哪兒？我納悶我們是不是光芒著記錄窮人如何打平收支，卻忘了問：他們的帳單金額為什麼如此之高？也忘了問他們的錢都流到

哪裡去了？

我想要寫一本書談貧窮，但我不想把重點只集中在「窮人」跟「窮地」之上。我想貧窮是一種關係，而這關係裡既有窮人，也有富人。對我來說，想了解貧窮，就不能不了解這段關係。這樣的想法讓我出發，踏上了探尋之旅。我開始思考有沒有有一種過程將窮人跟富人聯繫一起，有沒有一種過程裡可以觀察到窮人與富人的相互依賴與掙扎。驅離，就是這樣的一種過程。²

二〇〇八年五月，我搬進了托賓的拖車公園，機緣是我在報紙上讀到裡頭的居民將面臨大規模的驅離。後來事情並未如此發展（托賓最終將拖車公園出售，連尼跟辦公室蘇西則搬往別處）。儘管如此，但我還是在那兒待下來，因為我發現在那裡可以認識很多收到粉紅色驅離通知單的朋友。還有就是住在那裡方便我追蹤托賓跟連尼的行動。

我的拖車在公園裡是公認的「高檔」貨。除了乾淨以外，我的「家」還有木作的外牆跟厚實的鏤橘色地毯。問題是，我在那兒住了四個月，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熱水。為此我反應過不止一次，但托賓跟連尼始終不當回事，我熱水器的煙囪就這樣一直沒人去修。我甚至挑明了我是名作家，而且會將他們跟拖車公園寫入書中，但他們還是依然如故。要是我硬開熱水器，那一氧化碳就會直接灌進拖車裡。辦公室蘇西有試著修過一次，她拿了片木板往煙囪底下一卡，然後就叫我可以安心了，但其實熱水器跟煙囪之間還有約五公分的空隙。

對我來說，民族誌（ethnography）是你想要了解某群人時所做的事情。你要讓他們的生活變成一個模子，然後讓你的生活完全變成他們的形狀。要做到這樣，你首先要跟你想了解的族群打好關係，長時間追蹤、觀察、體驗他們在做什麼，包括跟他們一起工作、玩樂，盡可能把他們的行動與人際互動記錄

下來，直到有一天你走路像他們、說話像他們、思考像他們、對事物的感受也像他們為止。在我「這一行」裡，直接住在你要調查的「田野」裡，對工作的成果會有很大的助益。只有住在現地，你才有可能身歷其境地獲得浸入式的體驗。說得更實際一點，你永遠不知道現場會發生什麼大事。租一輛拖車，我可以認識一大群人，可以聽到許多八卦傳聞，可以對住戶擔心的事情感同身受，還可以學著從他們的角度看待事物。總歸一句，我可以全天候觀察這群人的日常生活。

為了展開在拖車公園裡的田野調查，我第一站就是去辦公室裡待著。事實上我很多拖車公園的鄰居也都會在那兒消磨大半天。拉蕊手握郡治安官發的驅離令、發著抖走進來的那天，我也在辦公室裡。我看著拉蕊把能付的錢都給了托賓，又看著她拖著身子走出去。她前腳剛回到自己的拖車，我後腳也跟過去。拉蕊給我開了門，另一手則把襯衫拉起來擦眼淚。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在傳出我有興趣跟遭逢驅離經驗的人聊聊之後，潘要到我的號碼，然後自己打電話過來。我們見面的幾天後，我開始追蹤她的狀況，主要是看她一家如何找新地方住。潘跟史考特提起我的研究，然後史考特要我去他的拖車面談。某天早上我去赴約，只見史考特踏出門外說了句，「我們去散個步吧。」然後他又說，「嗯，我就挑明了說。我當過十年的護理師，但後來我染上了止痛劑的毒癮，然後就失去了全部：我的工作，我的車子，我的家，全都沒了。」

怎麼會有人在一個拿著記事本跟原子筆的陌生人面前，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醜事，至今仍是個謎；怎麼會有人自己敞開大門給人進去，我到現在也還弄不清。對於處在流浪邊緣的房客而言，好處是除了實質的東西，像是有電話可打或有車可用以外，還有一種是無形的、心理上的好處。好幾個當事人管我叫他們的「心理醫生」。但讓他們掏心掏肺的心理閥門較低，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底層的人常覺得自己已經一無所有了，講再多也不會怎樣。有天晚上在阿迪亞康復之家，也就是史考特清醒地住

過好幾個月的那個地方，史考特以頭指向在記事本上振筆疾書的我，丟了個問題給匿名戒酒會的鐵桿成員安娜·阿迪亞，「馬修在這兒會讓妳緊張嗎？」

「三八，不會啦，」安娜說。「我早就沒祕密了啊。」

史考特呼應說，「我也沒有，妳懂的。什麼尊嚴，啥都沒了還管什麼尊嚴。」

到了秋天，目送史考特、拉蕊跟潘還有奈德被從拖車公園驅離之後，我開始在密爾瓦基北部找新的地方落腳。有一天我把這事說給保全員伍哥（Officer Woo）聽，他是托賓為了安撫威科夫斯基議員而不得不雇用的其中一名保全。伍哥的本名是金波（Kimball），但他逢人都讓人以小時候的綽號叫他。伍哥是個很容易跟人混熟、也想跟拖車公園裡的每個人都當朋友的的黑人。他習慣穿著 6XL 的特大號 T 恤，上面還掛著他從軍需品店買來的勳章。

「你說你想搬去銀泉（Silver Spring）那邊嗎？」伍哥問，他講的是密爾瓦基從黑人舊城區過渡到北邊郊區、像格倫岱爾（Glendale）與布朗迪爾（Brown Deer）的地區。

「我想去的是舊城區，」我澄清了一下。

「你想去住馬凱特（Marquette）那邊？」伍哥不可置信地追問，馬凱特是指鬧區那間由耶穌會創辦的馬凱特大學。

「不是馬凱特，我是想找個舊城區的社區來住。」

伍哥眯起眼睛看我，他大概想自己是聽錯了吧。這之後我們又聊了好幾次，伍哥才弄懂我是真的想要住在北區，而且是想要去住他出身的那種社區。那種社區的路標放眼望去都是綠色的，不像密爾瓦基西北郊區的沃瓦托薩是用藍色的路標。了解我想幹嘛之後，伍哥就問我要不要去第一街跟洛克斯特街

(Locust Street) 口的分租公寓當他的室友，租金含水電是四百美元。我接受了他的提議，把錢付給了房東跟房東太太：昆汀與舍蓮娜。

我的雅房位處一棟雙拼公寓的二樓，白色的外觀有著綠色的輪廓。伍哥跟我共用同一個客廳、浴廁還有廚房。怕室友「誤吃」你食物的話，廚房裡的壁櫥可以加上掛鎖。我的房間有窗，窗上覆蓋著厚毯當成簾子。一張大床底下讓我翻出了喝完的「經典冰啤」(Classic) 鋁罐、匿名戒毒會的宣傳手冊、(腳) 趾甲剪跟一台被裝入硬塑膠提箱的打字機。公寓後面是條巷子，牆上標記有「幫派弟子」(Gangster Disciples) 塗鴉，然後就是一個雜草叢生的小後院，跟一棵五月一到就會下起輕柔花瓣雨的櫻桃樹。從那時開始，到二〇〇九年的六月為止，我都以這間公寓為家。

伍哥跟舍蓮娜說過我「在寫一本講房東與房客的书」。舍蓮娜答應讓我訪問，而訪到最後我也提出了我的訴求。

「舍蓮娜，我有點希望能當妳的學徒，」我說。怕她不懂，我進一步解釋說自己的目標是要「盡可能進入她的世界，從她的角度來看事情。」

舍蓮娜非常配合。「我答應你，」她說。「就照你的意思。」她熱愛她的工作，也以這份工作為榮。她希望外界知道「房東的辛苦之處」，她希望更多人停下腳步想想房東的行為意義。

我開始亦步亦趨地當起舍蓮娜跟昆汀的影子。這之後他們無論是買新房子、篩選房客、把阻塞的污水管道通好，還是遞送驅離通知單，旁邊都有我的一雙眼睛。這跟我當托賓與連尼的跟屁蟲是同樣意思。經由舍蓮娜，我認識了阿琳、拉瑪跟辛克斯頓一家。然後透過阿琳，我認識了克利絲朵，透過克利絲朵我認識了凡妮塔。孤單的多琳很開心我願意坐下來跟她聊天。在我捲袖子幫忙粉刷派翠絲的舊公寓之後，拉瑪跟我之間也開始有「融冰」的現象。而最後我能跟拉瑪「破冰」成功，是因為我打得一手好

「黑桃王」，怎麼說在大學時代當消防員時我也玩了不少回。

阿琳算是比較棘手的案例。起初她拒我於千里之外，我跟她解釋書的時候她會一聲不吭。等我想說點什麼來避免冷場，她又會打斷我說，「你不用一直講個不停。」她最擔心的事情是我是兒童保護局的臥底。「我不喜歡跟你講話，」阿琳在我們剛認識時的某次交談中提到，「不是因為你這個人怎樣，而是因為我過去的遭遇。我跟（兒福）體系交手太久，所以我現在誰都不相信。」對此我回她說我了解，然後拿了自己以前出過的書給她看——經驗告訴我我要在車上放一些自己的舊作，遇到這種想爭取信任的狀況會非常好用。這之後，我開始用緩慢漸進的速度跟阿琳互動，包括規定自己每次會面時的問題不能太多。

其他人以為我不是警察、就是議員派到拖車公園的「特務」。還有些人想說我是毒蟲或嫖客（在分租公寓裡，伍哥跟我有過些性工作者的室友）。舍蓮娜會介紹我是她的助理，而對托賓來說我什麼都不是。

有些房客懷疑我跟房東串通，有這想法的人對著我說房東是「你的朋友」。不止一次，他們想聽我親口說出他們的房東有哪些不是，像拉瑪有一次就逼著我承認舍蓮娜是「土霸王」（sunbitch）。我一拒絕，拉瑪就給我貼上了「房東同路人」的標籤，指控我是她的眼線。有些房東會拒絕談論特定房客的細節，或者會反過來要我對特定的案例發表意見。對此我一貫立場是盡可能不插手事件（雖然下面我會講到我曾兩次「破戒」），但房東往往會逼著我選邊站。就我所知，我唯一一次「公親變事主」、對案件造成影響，是舍蓮娜一再問我她應不應該打電話給郡治安官去告阿琳的狀。被問到最後，我只得擠出一個「不」字，而舍蓮娜也果真沒這麼做。事後舍蓮娜向我承認，「要是沒有你的那聲『不』，講真的，執行令應該已經申請下去，在現場等郡治安官大駕光臨了……要是你沒插手，阿琳早就玩完了。」總之阿琳因此沒讓老鷹搬家收走她的東西，而可以把身家存放在大眾倉儲裡。只不過到最後，東西還是因為欠

款而被當成廢棄物處理。

一段時間後，房客跟房東都慢慢接受了我的存在，繼續過他們的日子，真要說，他們也沒那麼多閒功夫管我。我會跟著房客去驅離法庭，開庭時我會坐在他們的身邊；我會幫忙他們搬家，跟著他們去收容所或荒廢的房子；我會幫忙看孩子，跟他們吵架，睡在他們家。他們無論是上教堂、去心理諮商、出席匿名戒酒會、參加告別式、迎接新生命，我都無役不與。這當中我曾跟著某家人去到德州，也跟著史考特去了愛荷華州。人跟人相處久了總會感情，於是我們之間產生了某種姑且可稱之為信任的東西，只不過就算是信任，這也是一種極其脆弱與充滿條件的信任。⁴ 事隔多年再見，阿琳還是會在某個沉默的瞬間問起我是不是在替兒童保護局工作。

前面說過，我搬到北區的決定，伍哥一時間無法理解，但真正為此感到不安的是我拖車公園的鄰居們。我把這件事跟拉蕊說的時候，她幾乎是用喊的，「不不不，麥特，你不知道那裡有多危險。」畢可也在一旁附議，「他們那兒可不買白人的帳。」

不過實際上，白人在貧民窟裡還是享有一些特權。比如說明明兩宗獨立的槍擊案才剛在我的門前發生，警察對我還是比較客氣而且速戰速決。後來我看著一名警官把巡邏車開到阿琳大兒子傑傑的身旁，他說話的口氣馬上變成，「老兄，你怎麼這副德性！」（傑傑有學習障礙，所以走路慢，說話也慢）。我走出公寓想看個清楚，那位警官往我這兒看了一眼，隨即驅車離開。要不是他看到現場有一名白人男性手拿記事本，很難講事情接下來會如何發展。

像這樣的場面是常態而非例外。就拿克利絲朵跟凡妮塔跟第十五街那位歧視人的房東來說，雙方交鋒時我就在外頭的車上照顧凡妮塔的小孩。克利絲朵跟凡妮塔一回來，立刻向我轉述了事情的經過。

我從出租招牌上抄下了房東的電話號碼，然後隔天打電話過去。我跟男房東約在跟克利絲朵、凡妮塔同樣的地方，然後我報我的月收入是一千四百美元（跟凡妮塔與克利絲朵加起來一樣）。我另外說自己有三名小孩（跟凡妮塔相同），還說我想租有浴缸的房子。聽完，房東說他有另外一間房子要租，甚至還開他的紳寶載我過去。我向民間組織「公平住房委員會」（Fair Housing Council）檢舉了他，但對方受理後沒有下文，也沒有回我電話。

舊城區的朋友對我算是呵護備至，生怕有人會欺負我。拉瑪會飆罵他身邊那群像他孩子似的年輕人「鬧夠了沒！」意思是叫他們不要再跟我要錢了（雖然只是一美元）。有一天在分租公寓，樓下一個叫C. C.的鄰居問我有沒有幾美元可以借她，她要買垃圾袋。我給了她，然後不以為意地回家寫稿。但這事讓伍哥的年輕姪女、也就是當時跟我們住在一起的凱莎（Kisha）給看到了。她盯著C. C.離去，然後自稱看到C. C.打電話給藥頭。我對這情形並不清楚，一會兒也就自顧自地去買東西。伍哥回到家，從凱莎那兒聽到這個情形，立刻氣沖沖地打電話給我。「麥特，你不准再給她一毛錢了！」他劈頭就說。「他們覺得因為你跟我们不一樣，你不出身這附近，所以他們就可以這樣揩你的油……我這就他媽的去樓下叫他們把錢還你。」

「那個，伍哥，是這樣……」

「就這樣了，麥特。」

伍哥掛上電話。我不知道他後來跟C. C.說了什麼，但總之我回到家後，C. C.在門外等我。她戴著假髮、穿著遮不了多少肉的削肩小可愛與七分褲，還有綁帶多到像羅馬鞋的高跟鞋。她把錢還給我，而我並沒多問錢是怎麼來的。

我感覺心如刀割。「你太保護我了，」上樓之後我這麼跟伍哥說。

他人趴在廚房的洗碗槽上方，裸露著雙臂洗碗。「你是郊區的白斬雞，我們是貧民區的土雞，」他開口，低沉的嗓音就像爸爸在對兒子溫情喊話，給人一種「這一刻他等了很久」的感覺。「而你願意來到這裡，冒險跟我在這種地方生活，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光榮，所以我覺得自己有責任照顧好你，我不希望你出任何事情。」

我這麼個白人住進舊城區，把舊城區寫進書裡，但我不但沒有在這裡感覺危機四伏，反倒是備受呵護。但這也造成了一種隔閡。一查覺到環境裡有我的存在，有些舊城區的居民就會拘謹起來。很多人在跟我的「第一類接觸」時會連忙把地方弄乾淨並道歉連連。有年輕酷哥教我，當被尊稱「先生」(sir)的次數達到一個程度，我就能領到所謂的「免死金牌」(gangster pass)，當地的幫派才不敢動我，而我被尊稱「先生」的次數早就海放這樣的低標，而且考量到當時我是個還不滿三十歲的白人，這樣的待遇更是誇張。對於一個想要把人生如實記錄下來的人來說，這些禮遇其實造成了我不小的問題。要突破這樣的隔閡，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腳踏實地在此生活，盡可能讓自己從一個莫名的外來者變成一個理所當然、趕都趕不走的外來者。時間久了，大家自然會卸下心防行動。不過，只要一發現苗頭不對，他們的「防護罩」還是會瞬間拉起。

另外要跟像凱莎這樣的「師傅」學習觀察事物的功力，需要時間累積。凱莎身上有「雷達」會讓她知道何時要豎起耳朵，哪裡又有重要的線索。我在密爾瓦基遇到的師傅不只凱莎一位，很多人都為我示範過該如何用眼睛去看事情，又該如何理解自己看到的事。但即便如此，我知道自己還是沒抓住很多東西，特別是在剛開始的階段。這除了因為我始終是個外人，也是因為我老是會「過度分析」。小劇場會把我的注意力轉至自己的內心，讓我沒辦法注意到眼前上演的人生百態。從自我保護的觀點來看，這樣確實比較安全。成見對人來說是社交生活的潤滑劑。我們抱著各種分類與理論，分門別類各種生活中的

互動，把每件事整理得井然有序。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警告過這種自我感覺良好會「掏空這個世界」，阻礙我們睜開雙眼。⁵

這本書背後的研究工作，牽涉到長時間與女性（在她們的家中）相處，而這自然會引發一些疑慮。事實上我曾經兩次遭書中的男性指控與他們的女朋友上床。第一次是在奈德跟潘酒後起爭執時，奈德脫口而出，「妳不是很愛跟麥特講話嗎？妳不是當他是他媽的心理學家嗎？……妳幹嘛不去跟他做！」奈德氣沖沖地離開之後，潘才跟我說，「他以為我們有一腿，這人沒救了吧？」吵完氣消，奈德也沒有繼續談這件事情。但事發經過幾周，我便開始跟潘保持距離，並且盡可能都把時間花在奈德身上。另外一次是我去找凡妮塔，那是她被判刑前一個月的事情。當時除了她，還有她在「旅社」認識的一名年長男性厄爾（Earl）。厄爾像個男人一樣地迷上了凡妮塔，而凡妮塔也不討厭對方。這樣的厄爾見到我自然不會很開心。為了「宣示主權」，厄爾曾衝著我說，「聽清楚，她是我的女人，我有權知道自己的女人在做些什麼事情。」我於是花了點時間跟厄爾解釋我的工作，也拿之前的著作給他過目。我評估他有可能會傷害凡妮塔——前科累累的他有過家暴的紀錄，或至少有可能甩了她，連同他軍人的退休俸也一併帶走。厄爾向我道歉，但這場風波令人深感不安。走的時候我拜託凡妮塔的姐姐埃柏妮要看好凡妮塔，而埃柏妮也照辦了。隔天早上我打電話去確認一切平安。「我不怕他了，」凡妮塔對我說。但我認為還是該稍微提防一下。凡妮塔在出獄後跟厄爾分手，而不知道是誰對埃柏妮的公寓開了槍，當時凡妮塔跟孩子正住在那兒。大家都覺得這應該是厄爾幹的。

身為從事民族誌的學者，我一直覺得自己研究時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確保不要讓我敞開大門，讓我進入他們人生的人受到傷害。但實際上這個問題相當複雜而敏感，要確實做到並不容易。⁶尤其在貧

困的社區裡，「不用錢」是一種不存在的概念。你為誰做了什麼事情，就代表你一定得到了某種好處。你們之間一定有某種交換條件。所以奈德跟厄爾覺得我一分不收地開車載他們的女朋友去找房子或辦事，一定是因為我「有所圖」。我確實有所圖，我圖的是他們女朋友的「故事」。他們覺得我怪，對我有所質疑，完全說得過去，而我也帶著誠意回應他們。

在我面前的行為舉止與言談方式會因為性別而產生差異，我還可以舉出其他的例子。出獄後的凡妮塔在賣漢堡的喬治·韋伯連鎖餐廳找到了一份外場的工作，同時還認識了一個叫班(Ben)的男人。班當卡車司機。有天晚上在他們的公寓裡，班突然閃人。「你們還好吧？」我好奇地問。

「不好，」凡妮塔嘆口氣說。「他覺得我太像男人了。」

「什麼意思？」我真的不懂。

「就是說我好像懂太多了……他好像是在說，『妳像個男人一樣，什麼事情到妳那兒都一定會有個答案。』」

「妳有明明知道答案但裝傻過嗎？」

「偶爾。」

我第一時間就納悶起凡妮塔有沒有在我面前裝傻過：裝呆以更像名女孩，是不是她的習慣呢？

你的一切——你的族裔、性別、出身背景、脾氣與秉性，會決定你身邊是哪些人，別人會跟你分享哪些祕密，讓你看到什麼東西，乃至於你會如何去解讀你眼前所見。我的身分有時像把鑰匙，為我開了些門；也有時也像鐵鞋，讓我在某些狀況下舉步維艱。說到最後，我們都不可能改變自己是誰，只能盡力而為，盡量盯著自己的每一種特質如何跟工作產生化學作用，只能盡可能不要忘記初衷，把想問的問題牢牢記在心裡。⁷

在密爾瓦基的那段日子，我過的是全職田野調查者的生活。大部分時候我只要醒著，數位攝影機都會跟我形影不離，而且永遠開著。不關電源的好處是，我可以原封不動地把某人說過的話給記錄下來。我會另外隨身帶著記事本，記下形形色色的觀察與對話，而且我通常可以做到在事件發生的當下就寫完。我從來不忌諱讓人知道我就是來寫書的，也不怕人知道我會寫下每個細節。我會利用晚間跟清晨一寫好幾個小時，除了把筆記本上的東西打進電腦外，我還會把當日或昨日發生的事情寫成文字。要說我拍過的照片，總數恐怕不下數千張。光是書裡沒登場的對象，包括三十位房東，我採訪的次數就超過一百場。我對談與觀察過的角色有法院的法警、社工、建物檢查員、物業經理，還有以拖車公園或舊城區為家的居民。

脫離被稱為「田野」的訪查現場之後，事情並未結束。事實上這時我才開始進行將各種紀錄打成文字檔的「長期抗戰」。這方面我稍微請了幾位高手代勞，但我自己也做了不少。等到所有東西都有紙本之後，我發現自己記下的東西即便縮到單倍行距，頁數也超過五千。我開始爬梳這些資料，把照片跟文字配對，也開始無論早晚通勤或搖我剛出生的女兒入睡時，耳裡也一邊聽著我錄下的實況。在正式動筆前，我一定都先把所有資料來回讀過幾遍。⁸我希望能在文字與影音中重溫現場體驗，然後再盡我最大的力量讓事實在中還原。還有就是我真的很想念大家。從密爾瓦基的北部跳到麻州的劍橋（Cambridge, Massachusetts）——前者是什麼模樣大家清楚，後者則是養尊處優的天龍國——讓我有一種天旋地轉的感覺。一開始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想要回去。我想回到拖車公園或密爾瓦基的舊城區。事實上，我也找了很多理由重遊舊地。

身為本書的作者，我看重的是第一手的觀察。遇到我沒能親眼見證的重要事件，我會盡量跟不只一位當事人或目擊者對談，然後再去找新聞報導、病例、法庭紀錄或房貸文件來交叉比對。書中的任何

事件，如果是根據二手資料寫成，我都會在註解中標明。文中如果提到有人「覺得」怎樣或「認為」如何，那都是她或他親口這麼對我表示過，我只是如實轉述。寫到過去發生在某人身上的事情，我會說他或她「記得」或「回想起」怎麼回事。為了檢查這些細節的真實性，我會在數年的時間內多次問到同樣的問題，看看當事人的說法會不會前後矛盾。這個辦法非常好用，因為很多當事人原本跟我說的是一套，但事實常證明他們的描述並不完全準確。真相的浮現，有時候需要一點時間。

為了查證書中資料的真實性，我一直很努力地與第三方接觸。這代表我不但會去了解事情本身的過程，有時我還會順便確認這件事到底是否空穴來風。比方說我就跟威斯康辛州兒童家庭署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確認過阿琳遇到的社福制裁 (welfare sanction) 是不是真的那麼常見。我曾偶然聽到阿琳向舍蓮娜解釋這種制裁是什麼東西，也曾陪著阿琳去社工那兒把事情釐清，但因為這件事的查證並不麻煩，我只要寫幾封 email、打幾通電話就可以搞定，所以我就順手這麼做了。畢竟說到底，眼見也不見得為憑，目擊也不見得可以完全相信；不信你可以找辯護律師詢問，他們一定會說我沒說錯。太多時候我們會對眼前的真相視而不見，太多事情會誤導我們的想法。實在確認不了的事情，我就會忍痛捨棄。曾經娜塔莎·辛克斯頓跟我說過她之所以從高中輟學，是因為學校自助餐裡發生了槍擊案。在跟多琳確認過有這回事後，我其實很喜歡這個故事，想在書裡找個轉折處放進此事，但我後來發現像這種衝動真的應該避免。總之，後來我還是又分別找了三位在密爾瓦基公立學校系統中服務過的高層了解，結果這三位前教職員都沒辦法證明有槍擊案發生在娜塔莎說的時間點上。真相可能是真的發生了什麼，而這三位主任級以上的老師都搞錯了；也可能是娜塔莎說了個大概，但沒把細節交代清楚；再不然也可能是娜塔莎說的全部都錯。在考慮過種種可能性之後，最後我決定放棄娜塔莎的故事，就像我放棄了另外兩個「羅生門」的故事一樣。經過一番折騰，書的完整初稿終於出爐，然後我花錢請了一位

校對。但我自己也沒有閒著，親自跑了趟密爾瓦基跟田納西州的布朗斯維爾去確認一些事實。¹⁰

我經常被問到我如何「消化得了」這項研究。問我的朋友意思是：目睹這種程度的貧窮與苦難在眼前上演，我作為一個人的內心受到了什麼樣的衝擊？在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有多麼觸及我內心最軟弱而最不設防的角落。為此我編了一些言不由衷的制式回答來敷衍大家。如果我是魔術師，那這些回答就是煙霧彈。煙霧一出，我就可以悄悄走下舞台，不被人看出我的破綻。但如果認真回答這個問題，我會說這項研究讓我心碎，也讓我與憂鬱為伍了許多年。看著他們努力活著，我也學會了要咬牙撐住。好幾次聽過他們說，「不要這樣看我啦！」之後，我學會了在傷痛面前壓抑自己的驚恐，學會從貧窮的細縫裡看到貨真價實的危機。我知道有些事在錦衣玉食的菁英眼裡叫做懶散或不求上進；但真相是，窮人也需要配速跟調劑，不然日子真的會過不下去。對克利絲朵或拉蕊來說，不能把心力都花在今日的危機上，因為明天還會有新的問題。在拖車公園跟密爾瓦基的舊城區，我見證了人的韌性、衝勁與聰明。我聽到了許多歡笑，但也目睹了很多傷痛。在田野調查進入尾聲之後，我在日記上是這麼寫的：「我覺得自己很污穢，我竟然在蒐集這些悲慘的故事與別人的苦難人生，就像在蒐集獎盃一樣。」這種在田野調查中所感受到的罪惡感，不但沒有隨著我的離開而消散，反而還變本加厲地在我的內心打轉。我覺得自己是個騙子，是個吃裡扒外的傢伙，我希望有人能過來隨便指控我做錯了什麼，我打算統統都招認。參加大學應酬時看到我面前放了瓶酒，或是收到日托中心每個月寄來的帳單，我都會下意識地想到這筆錢可以在密爾瓦基變成租金或保釋金。光是研究這些人的生活，就能在我的心上烙下痕跡，你可以想像這樣的真實人生會有多麼辛苦。

隨著我與房客跟房東的相處時間愈來愈長，我發現自己心中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但田野工作

無法回答這些疑慮。驅離到底是個多麼嚴重的問題？驅離會產生哪些後果？被驅離的都是什麼樣的人？既然窮困的家庭花了這麼多錢在居住上，那他們犧牲掉的是哪些東西？我開始去找可以回答這些問題的研究。都市貧窮、社區與貧民窟，這些主題一直都在美國的社會學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我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定有人跟我問過相同的問題。

但結果是沒有。我找不到研究或現成的資料可以充分回答我內心的疑惑。這讓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畢竟我目睹著這樣的情形在密爾瓦基天天上演。我納悶的是，這明明是美國貧窮問題的一大病灶，但（美國）國內的學術界卻能對此視若無睹：我說的是私人租屋市場的發展動態。我後來認知到會有這種令人不解的現象，其原因在於我們研究住房問題時的策略。整體而言，研究貧窮的學者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住宅或其他的住房政策上，又或者他們會從根本上忽略住房問題，因為他們更有興趣的是都市社區的特性——比如說不同程度的種族區隔與居民對都市更新與「仕紳化」（gentrification）的抗拒。¹¹但其實私人租屋市場是不容我們忽視的存在，因為這裡是窮人的大本營，租屋對這群人的生活產生著莫大的影響力。密爾瓦基許多（我認識的）家庭都有著同樣的命運，他們因為租屋而被吃掉大部分的收入，因為租屋而在貧窮與剝奪的泥淖中愈陷愈深，因為租屋不成而遭到驅離、失去安全感、淪落至無家可歸。租屋問題決定了他們只能住在哪裡，只能跟哪些人「共組家庭」，也徹底決定了他們身處社區的屬性與穩定。但因為這件事情鮮少被研究，所以狀況都被蒙在鼓裡。

我曾想當作沒看到這個問題。我想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跟房東與房客的實際相處上。但當我發現問題不會因此而消失、並且我還是非常在意之後，我決定自己來蒐集相關的資料。我踏出的第一步就是自己設計問卷來訪問密爾瓦基私人租屋市場中的房客。訪查的規模一開始並不大，但因為有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的義助，我的訪問開始有了突破。我們把這項研究稱為「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

研究」，簡稱「MARS」。從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一年，大約有一千一百名租屋者在家中接受了我們專業訪談人員的詢問。稱得上專業，是因為這些直接向我負責的訪談人員，背後有威斯康辛大學民意調查中心（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urvey Center）的訓練與督導。為了讓研究的資料具有代表性，我們讓訪查人員走遍整座城市，所有的租屋人口與家庭都是我們鎖定的對象。人手一片手寫板與一台聯想 Thinkpad 筆電的同仁們，勇闖密爾瓦基最讓人膽寒的社區，包括一位夥伴被惡犬咬傷在前、被人搶劫在後。

就因為有廣大的民調人員如此「英勇」的表現，《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達成了高達百分之八十四的高回應率。能在這個居無定所而且錢是一大問題的族群裡達成這樣的成績，他們的表現讓人肅然起敬。我在田野工作中取得的成果與心得，大大充實了《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的兩百五十個問題：重點不只在於我問了什麼，也在於我的問法。比方說在拖車公園生活的期間，我就學到了要問清一個人為什麼搬來，其實沒有想像中容易。租屋者往往會搬出一套說法來強調他們是出於自願與選擇。而要詢問人為什麼被迫搬遷，那又有一整套其專屬的「眉角」，主要是房客對「驅離」一詞往往有其獨特而嚴格的定義。就拿我在拖車公園的鄰居蘿絲與提姆為例，他們被迫搬離拖車是因為提姆工作時傷了背部。他們並沒有為了這事上法庭，但他們無疑遭到了驅離（他們的姓名出現在驅離紀錄裡）。儘管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但他們還是不覺得自己屬於被驅離的一群。「聽到你說『驅離』，」蘿絲解釋，「我會想到的是郡治安官跑來趕人換鎖，然後老鷹搬家會把你的家當扔到路邊。那才叫驅離。我們可沒有被驅離。」如果蘿絲跟提姆在受訪時被問到，「你有被驅離過的經驗嗎？」他們會答「否」。也因此這麼問的訪查就會嚴重低估了非自願搬遷的普及率。經驗告訴我問題的措辭是一門學問，你得考慮到租屋者對驅離的理解，才能設計出有效的訪談問題。

這項調查蒐集了關於住房、居民流動性、驅離與都市貧窮等方面的資料。說到要對都會租屋者遭迫

遷的頻率進行廣泛的預估，這項調查是我們僅有的資料。在跑這些數據的時候，我很驚訝的發現在密爾瓦基，每八名租屋者，就有一名至少在受訪的近兩年內有過一次遭迫遷的經驗——這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驅離，房東的房子遭到查封，或是房子被宣告為危樓、或不適合居住。

這項調查還顯示將近半數（百分之四十八）的迫遷案例屬於非正式的驅離：沒有經過法院處理，所以紀錄上查不到。這包括房東給錢叫你滾，或者是花錢請幾名壯漢把你往街上扔。正式的驅離相對比較少見，占整體迫遷案件數的百分之二十四。另外有百分之二十三的迫遷是肇因於房東的房子被查封。最後的百分之五則是建築物被宣告為危樓而不得居住。¹²

換句話說，我們每見著一件由司法體系認證的驅離判決，其背後就有兩件法院管不到、什麼程序正義都談不上的驅離悲劇。這代表著要是不把非正式的驅離給列入計算，我們就會嚴重低估美國城市裡正在發生的危機。如果為政者看了低估的報告而做成決議，進而導致資源無法投入、輿論也不予關注，那這些因為人為誤判而讓驅離數據不能反映實情的研究報告，就不只是學術上的對錯，而是有多少活生生的人會因此受到傷害的問題了。

因為《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的完成，我們掌握了許多新發現，其中驅離會產生的周邊效應就很可能得重視。相關的資料將驅離連結到居住的不穩定性、水準欠佳的屋況、鄰里品質的下降，甚至是失業都可以歸咎於驅離。在這些發現的基礎上，我進一步在一個具全美代表性的資料組、即《脆弱家庭與兒童福祉研究》（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中分析了以驅離作為成因的後果，結果顯示遭驅離的家庭會吃到的苦頭還包括「物質困苦」的惡化，與身心健康的低下。

但即便把氾濫的非正式驅離都排除在外，法庭的正式驅離紀錄還是可以讓我們觀察到不少事情。官方紀錄精確地記載了城市裡成立驅離案件的頻率與位置。於是我不客氣地抽出了從二〇〇三到二〇一三

年所有發生在密爾瓦基的驅離案件，這總數有幾十萬筆。按照這些政府紀錄所列，年復一年都有近半數由法院正式下令進行的驅離發生在密爾瓦基以黑人為主的社區當中。同時，在這些社區中，女性遭驅離的機率又是男性的兩倍以上。以密爾瓦基最窮困的各黑人社區而言，每年經由法院系統背書驅離的男性比率是三十三分之一，女性則一口氣跳到十七分之一。對照密爾瓦基最窮困的白人社區，同一項數據是男性僅一百三十四分之一，女性更低到只有一百五十分之一。¹³

最後我另外設計了一項調查來幫助我了解何以有些人可以逃脫驅離之手，有些人則只能被命運捉弄。為期六周的《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在二〇一一年一月與二月，面對面訪查了兩百五十名出席驅離法庭的租屋者（受訪率有百分之六十六）。這些緊接著公聽會後進行的訪問，讓我們得以一窺密爾瓦基遭驅離族群的處境與心境。這項訪查的資料顯示密爾瓦基驅離法庭上的中位數房客，年齡為三十三歲，其中最年輕的僅十九歲，最年長的高齡六十九歲。這群人的中位數家庭月收入為九百三十五美元，中位數的房租積欠金額也差不多是這個數目。驅離法庭上的調查還顯示橫在驅離命運兩端的，不只是租金的賒欠而已，事實上這一喜一悲之間的差別很多。在分析過資料之後，我們發現就算把房客欠房東金錢的影響加以排除，也把像家庭所得、種族背景等個別因素考慮進去，孩子的存在都會讓房客收到驅離判決的機率變成將近原本的三倍。在驅離判決上與孩子同住的效應，大約等同於拖欠四個月的租金。¹⁴

本書用到了各種研究方法與不同的資料來源，而彼此間相輔相成的效果也相當顯著。我一開始投入這個計畫，在前方拉著我的是一整組的疑問，但隨著田野工作開展，各條線的地位也開始有漲有跌，甚至有些是在我跨進現場前完全欠缺的概念。所幸在分析過法庭紀錄與訪查資料之後，我終於能從制高點觀望整個局面，也更能體會驅離在弱勢社區裡的嚴重程度。我終於能查覺到社會上存在的差異，也不會把不同性質的遷徙統統混為一談。經由在質性研究上的努力，我也得以知悉自己的觀察具有何種程度的

代表性。只要情況允許，我會盡量讓自己的基層研究接受統計學上的稽核，藉此判定我眼前所見是不是也會在更廣大的人口範圍內出現。每當大數據的比較釐清了或濃縮出了一個觀念，我就會回到自己的田野筆記裡去確認這些數據背後是何種機制在運作。不同研究方法間的「團隊合作」，發揮了「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而且也讓單一方法可能有的盲點被一一突破。

除了這些由上而下所進行的努力——包括執行原創的訪查，並分析法庭紀錄的大數據——我也尋求了各式各樣的證據，一方面鞏固我觀察的效度（validity），一方面深化我對於各項議題的理解程度。我分析了兩年份來自密爾瓦基警局（Milwaukee Police Department）的「妨害設施告發單」（Nuisance Property Citations）資料，取得了密爾瓦基超過一百萬筆「九一一」的緊急報案電話紀錄，蒐集了房東名下的物業跟收租明細、法律文件謄本、公共不動產紀錄、學校入學檔案與心理評估結果。

這種種資料加在一起，拼成的是一幅前所未見的浮世繪。看著這些資料所交織出的光景，我們可以感受到私人租屋市場是一股多大的力量，也可以了解到這股力量是如何形塑著窮人的家庭與社區生活。看著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知道藉由貧窮傳播的各種問題——無法安居、嚴重的剝奪、弱勢鄰里的集中、個人健康的落差、就業的困難——都源自於美國城市裡欠缺足夠且窮人負擔得起的住房。透過哈佛數據空間網（Harvard Dataverse Network），我已經將所有的訪查資料公諸於世。¹⁵

這本書的核心是密爾瓦基。威斯康辛州的第一大城固然不是一般的城市，但比起為數不多但獨具特色或甚至於得天獨厚到足以代表美國都會經驗的一線城市而言，密爾瓦基倒也沒有那麼特別。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態系」，但每個的獨特程度確實參差不齊。這麼說起來，密爾瓦基是個相對典型的中型都會城市，有著相對典型的社會經濟背景與住房市場，提供著相對典型的租屋者保護措施。¹⁶ 比起其他的一些選擇，密爾瓦基更能反映城市居民生活在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

巴爾的摩、聖路易、辛辛那提、蓋瑞（Gary）、羅里（Raleigh）、由提卡（Utica）等不會讓所有美國人琅琅上口的地方會是什麼樣的一種體驗，畢竟這些城市不是美國的驕傲（舊金山、紐約市），也不是美國心中的最痛（底特律、紐華克）。

但話又說回來，我在密爾瓦基所發現與記錄下的這些狀況，究竟能不能反映其他地方的實情，最終還是要交由未來的學者與研究去檢驗與證明。我回答了很多問題，但也留下了更多的問題。我們需要強有力的社會學把住房當成主題，並且將關注的範圍擴大到狹隘的政策面與公共住宅以外。我們需要一個嶄新的社會學分支去研究遷徙，去記錄下驅離行為的氾濫程度與前後果。然後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一個有使命感的社會學去研究社會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要板起臉來面對私人租屋市場中剝削與吃人不吐骨頭的問題。

但時不時當我自問「我的發現能不能代表其他地方的狀況？」時，我還是會納悶：我到底想問的是什麼？我是真心相信這些事情會發生在匹茲堡，卻不會發生在阿布奎基（Albuquerque）嗎？我真的以為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是曼菲斯的專利，而絕對不會在迪比克（Dubuque）上演嗎？壓倒性的證據讓我們沒辦法這麼天真爛漫，尤其我們在此討論的是像都市貧窮跟居住（不）正義這麼嚴肅而普遍的問題。這項研究坐落在美國有頭有臉的城市的核心，密爾瓦基可不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中歐波蘭聚落，不是蒙大拿州某個人煙罕至、草木也稀稀落落的小鎮，更不是才幾個人去過的月球表面。¹⁷密爾瓦基的驅離件數，絕對可以跟其他城市的狀況分庭抗禮；在密爾瓦基被召喚到住房法庭出庭的人數，看起來跟查爾斯頓（Charleston）或布魯克林（Brooklyn）大同小異。或許在我們自問「一份研究能不能概括其他地方的狀況」時，我們真正想問而沒有明講的是：其他地方的狀況是不是也如此糟糕？又或者我們真正應該問的是：我們是不是已經到了不能再假裝沒事的時候了？

近來的民族誌，幾乎都是採取第一人稱。這是一種單刀直入的書寫策略，並且效果也相當突出與顯著。對希望自己的民族誌作品能被當回事的作者來說，文化人類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這麼說過：作者必須讓讀者相信他們曾真的「親歷其境」。「話說，」格爾茲說，「作者要讓人信服在舞台下曾真的發生過這麼個奇蹟，就一定得靠手中的筆。」¹⁸ 說服讀者的重責大任，我們交到了「第一人稱」的肩上。我在現場，我親眼看著事情發生。而正因為我親眼看著事情發生，你也可以相信事情曾真的這麼發生。民族誌的作者會在現場把自己縮到最小，但卻會在書裡把自己放大。我們這麼做，是因為第一人稱可以傳遞經驗——而經驗可以傳達（目擊者的）權威。

但第一人稱的敘事並不是僅有的選擇。¹⁹ 事實上，若真的想捕捉社交世界裡的精髓，第一人稱或許是最應該避免的一種選擇，因為「我執」的存在，就像一個無所不篩的濾鏡一般。在第一人稱敘事中，主人翁們跟作者會永遠保持在彼此的視線範圍內，所以作者的任何觀察都會緊跟著當事人對於作者的反應。無論作者如何小心翼翼，第一人稱的民族誌都一定不會單純只是作者的所見所聞，這東西裡也一定會摻入作者本身的靈魂。我參與過不少以民族誌或報導文學為題的對話，結果過程中沒有人在談作品的主題，反而都在談作者的決策或誤判或「倫理人格」。另外每一次以本書為題做完學術演講，我幾乎都會被問到幾個問題，這包括：「你看到那個場面時的感覺如何？」、「這種管道你是怎麼取得的？」這些問題都是好問題，但我們還有更應該瞄準的問題。這片土地儘管如此富裕，上頭的痛苦與貧困卻仍舊一望無際。在這片不公不義的人間煉獄裡、在飢餓與無家可歸仍是許多美國人日常的此時此刻，我真正想看到的是一場更迫切需要關注的對話。「我」不重要，一點都不重要。我衷心希望大家若是跟人聊起這本書，你會說到舍蓮娜與托賓、阿琳與喬瑞、拉蕊跟史考特跟潘、克利絲朵跟凡妮塔——是在你居住的都市裡有那麼一個角落、那樣一個家庭，才剛從他們的住處遭到驅離，路邊正堆滿著他們的東西。

把這第一人稱的立場也拋棄，是要付出代價的。在本書的脈絡裡，拋棄第一人稱的意思是低調地出手干預，然後假裝沒有事情。我自己招了：這在本書裡發生過兩次。書裡說有「朋友」替阿琳租了一輛CJail卡車，讓她可以從第十三街搬出去，還說凡妮塔跟「朋友」借了錢買爐子跟冰箱，好讓自己在要上門的兒童保護局面前增加印象分數，其實我就是她們的「朋友」。還有一點很重要是，書裡的所有當事人都沒有車子，我有，而我有時候會充當他們的司機，載著他們到處去找房子。不能依靠我的時候，他們會搭密爾瓦基班次很不穩定的公車系統，要不然就是靠自己的一雙腳走來走去。如果沒有我的車子（或手機），這些人找房子會更花時間，更費力氣。

任何人接受我的訪問或花時間回應我的需求，都沒有從我這兒領到一毛錢。即便他們開口向我要錢，那也是因為他們逢人就開口要錢。為此我養成了不帶皮夾出門的習慣，也學著跟身邊的所有人一樣把「不」字掛在嘴上。要是我剛好有幾塊零錢在身上，有時候我會順手給人，但不給大錢是我必然的原則。

說起來在密爾瓦基，真正的生活是別人會買吃的給我，我也會買吃的給他們。他們會買禮物送我，我也會買禮物送他們。辛克斯頓一家曾把我拐到地下室，說什麼希望我伸手打一打故障的鍋爐，或許鍋爐就因此恢復了。想也知道我沒這個本事。但等我「鍛羽而歸」回到一樓的時候，在等著我的卻是我為我準備的生日蛋糕。還有一次是阿琳買了一罐餅乾給我，上面還附了張那種會播音樂的卡片。我們決定把卡片放在我的車上，需要笑的時候就拿出來放一下。史考特到現在還會寄生日卡片給我。他會在裡頭夾一張十元美鈔當作心意，這是他從無家可歸時就開始做的事情。

對任何一位田野工作者來說，難的都不是出發，而是揮別。而重中之重的道德兩難不是被要求出手相助時你該如何回覆，而是面對人的無私與付出，你要如何能心安理得地自處。我很幸福可以在密爾瓦

基遇到一個又一個慷慨的好人，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沒有理由地幫助了我。每當他們這麼做，我都會想起他們拒絕屈服於困苦的美好身影。貧窮再不堪，也動搖不了他們內心深處的人性良善。

註釋

- 1 譯註：建於一九二五年，加州以販毒氾濫著稱的貧民窟旅館，有「來自地獄的飯店」之稱，唯所在地應該是洛杉磯，舊金山可能是作者的誤植。
- 2 更完整的說明，詳見 Matthew Desmond, "Relational Ethnography," *Theory and Society* 43 (2014): 547-79. See also Mustafa Emirbayer, "Manifesto for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997): 281-317; Eric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a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Stanley Lieberston, *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3 譯註：源自芝加哥（伊利諾斯州），是當地以非裔為主、最大的黑人幫派。除暴力犯罪外，運（販）毒、性交易、甚至偷搶樣樣都來。威斯康辛就是伊利諾斯北方直接接壤的鄰州。
- 4 Mitchell Duneier,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337-39.
- 5 有一派觀點認為民族誌是一種「方法」。用這種觀點去看事情，我們就會問出很多跟方法論有關的問題。我要如何讓所屬機構的審查委員會（IRB）通過自己的計畫？我要如何撰寫田野筆記？我自己是傾向於把民族誌想成是一股感性，一種人類學家哈利·沃考特（Harry Wolcott）所說「看事情的方法」。這意思就是民族誌不是一種我們可以「去做的事情」，而是一種「我們活在世上的根本狀態」。要是能這麼思考民族誌，我們就會問出一些不同的問題。我要怎

- 麼樣才能讓人跟我開口講話？我要怎麼樣才能觀察得更敏銳，更深入？要是能把民族誌當成一種「感性」去切入，我們就會懂得要先培養出一門技巧或紀律，然後再慢慢利用這組技巧與紀律進入我們想要探索的領域或範疇。我們可以日起有功，日復一日地鍛鍊自己，讓自己蛻變成一個民族誌的研究者，然後等到某天時機到了，你真正踏進觀察的場域時，才能駕輕就熟而不會手忙腳亂（把手機戒掉就是我很推薦的開始）。Harry Wolcott, *Ethnography: A Way of Seeing* (Lanham: Rowman Altamira, 1999). 關於這種「在解讀中展現的暴力」，參見 Susan Sontag, "Against Interpretation," in *A Susan Sontag Read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2), 99.
- 6 住在拖車公園的期間，我並不知道史考特憂鬱到想吞藥自殺。他曾經向我開口借一大筆錢，我當下拒絕了他，但後來我覺得還滿可怕的，因為我差一點就把錢借他了。
- 7 參見 Mustafa Emirbayer and Matthew Desmond, "Race and Reflexiv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5 (2012): 574-99.
- 8 我並沒有使用任何處理質化資料的軟體。
- 9 這位校對是吉莉安·布拉希爾 (Gillian Brassil)。在她簽完保密條款之後，我便將所有的田野筆記都託付給她。為了確認所有的描述為真，吉莉安完成了背景調查（包括警方的資料、各種法律地位等等）與近三十次獨立的訪談。她檢視過了公共紀錄與我所提供的田野筆記、照片與數位錄音的謄本。她要求我提出書中所載若干細節的文件紀錄，還隨機抽選了本書一成的手稿，要我指出當中的場面跟觀察位於田野筆記中的何處。多數情況下，她會要我提出照片或官方的文件來佐證我主張的事情。
- 10 我提供了（全書或部分有關的章節的）稿子給所有在書中登場的人。某些狀況下我會把相關的段落念給當事人聽，以確認細節。
- 11 對愛鑽技術面牛角尖的政策學者與研究貧窮的學者而言，把住房政策的一條條細節拿出來辯論是他們怎麼也玩不膩的遊戲。一項政策就算只照顧到在比例上微乎其微的都市窮人，他們也可以問上一百個問題。搜尋 Google Scholar (Google 學術搜尋) 的結果顯示，有超過四千八百筆學術文章與著作中提到了由美國住房與都市發展署所主持的「朝機會遷居」(Moving to Opportunity, MTO) 計畫。這項遷居計畫的宗旨在於讓家庭脫離弱勢鄰里，而這是一項相當大手筆且重要的計畫——觸及的家庭大約四千六百戶。換句話說，從比率上來看，每個參與 MTO 計畫的家庭都可以

- 分到至少一項研究。我們對於服務到僅百分之二人口的公共住宅所知甚多，對舊城區房東與他們所持房產的了解卻相形見绌，但後者才是貧民窟窮人居住的主力。對於少數幸運低收入家庭才能享受到的租屋券，我們了解較多；但對於多數低收入家庭如何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下於民間租屋市場中苟活，我們卻沒更深入地研究。一九九五年，理查·阿爾諾特 (Richard Arnott) 觀察到經濟學者「對於租金管制的關注讓世人忽視了其他更重要的住房政策議題……近十年來，重要的學術期刊上沒發表過任何一篇論文在討論低收入家庭的困境。」Richard Arnott, "Time for Revisionism on Rent Control?"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1995): 99-120, 117.
- 12 Matthew Desmond and Tracey Shollenberger, "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 Prevalence and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 *Demography*, forthcoming.
- 13 Matthew Desmond,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2012): 88-133. 提到「最窮困的」社區或鄰里，我指的是至少四成家庭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普查區塊團體 (census block group)。提到「白人／黑人社區」，我指的是至少三分之二的居民同屬白人或黑人的區塊團體。
- 14 各種「雙重穩健邏輯迴歸」(doubly robust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跟若干配套的分析，被用來評估了接獲驅離判決的機率。《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 2011. For models, see Matthew Desmond et al., "Evicting Children," *Social Forces* (2013) 92: 303-27.
- 15 可前往網址：<https://thedata.harvard.edu>.
- 16 在密爾瓦基的住房單位裡，恰好有一半以上住的是租屋者，比例與（芝加哥、休士頓、巴爾的摩等）其他城市相當。就中位數房租而言，密爾瓦基都在美國與屬地波多黎各一共四千七百六十二個郡裡排名第一千四百二十名。與密爾瓦基有著類似租金分布的城市包括波特蘭（奧勒岡州）、夏洛特（北卡羅萊納州）、蓋瑞（Gary，印地安納州）與巴頓魯治（Baton Rouge，加州）。在密爾瓦基這樣多數中上階級家庭都已經買房的城市裡，租屋者的處境就會較為弱勢跟艱難。相對之下，在波士頓、洛杉磯等具有租屋者團體 (tenant union) 傳統且租屋人口之經濟條件較多元的城市當中，房客可以獲得較有感的保障。唯儘管如此，美國大部分城市對租屋者的保護會比較接近密爾瓦基的狀態，波士頓跟洛杉磯則較像是特例。參見 National Multifamily Housing Council, *Quick Facts: Resident Demographic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Multifamily Housing Council, 2009);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50th*

- 17 *Percentile Rent Estimates for 2010*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0).
- 18 此處我轉述了別人說過的話，出處是 Elliot Liebow,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15.
- 19 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第一人稱民族誌敘事的興起，是人類學朝後現代轉向的產物。人類學の後現代轉向，把關注重點放在作者的政治立場與偏見上。在這之前，民族誌的主流是以第三人稱書寫。你幾乎看不到 *Taxi Dance Hall* (1932) 或 *Street Corner Society* (1943) or even *Tally's Corner* (1967) 的作者在字裡行間現身。

誌謝

給在密爾瓦基的認識的每一個人：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幫忙。謝謝你們大方地讓我觀察你們的家與職場，我從你們身上學到的東西，遠超過這本書所能表達。謝謝你們的耐心、勇氣、慷慨與坦誠以對。

我的編輯阿曼達·庫克 (Amanda Cook) 先把初稿來回讀了幾遍，然後給我用單行間距寫了份三十頁的建言。謝謝你，阿曼達，感謝你精闢的解讀、寬廣的視野、毫不保留的付出，以及最重要的——謝謝你懂得我想表達什麼。我還想要感謝皇冠 (Crown) 出版集團的其餘團隊，包括對嚴肅的非文學作品認真以待的茉莉·史登 (Molly Stern)，以及看稿眼睛銳利的艾瑪·貝瑞 (Emma Berry)。

吉兒·尼霖 (Jill Kneerim)，我凡事深思熟慮而且做事很有決心的經紀人，謝謝妳與我並肩作戰把出書企畫弄出來，這是個艱辛而讓人看清很多事情的過程。我欠吉兒一分情，也欠所有在尼霖與威廉斯 (Kneerim and Williams) 版權代理的每位同仁一份大大的感激。

開始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還在麥迪遜 (Madison) 的威斯康辛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攻讀社會學。我的論文指導教授穆斯塔法·艾米爾巴耶 (Mustafa Emirbayer) 是名徹頭徹尾對得起社會學家四個字的老師。他花了無以計數的時間看我的論文，並且不斷地鞭策我向前。謝謝你，穆斯塔法老師，謝謝你把社會學的許多本事傳授給我。羅伯特·豪瑟 (Robert Hauser) 在各方面給了這本書支持，包括資助我在威斯康辛大學就讀的最後一個學期。茹絲·羅佩茲·忒利 (Ruth Lopez Turley) 與菲立克斯·艾爾沃特 (Felix Elwert) 讓我在統計學跟許多事情上受益良多。提摩西·史密丁 (Timothy Smeeding) 協助我把許多想法跟觀

察連結到公共政策上。查德·葛柏格 (Chad Goldberg)、麥拉·馬爾克斯·菲芮 (Myra Marx Ferree)、道格拉斯·梅諾 (Douglas Maynard) 與潘蜜拉·奧立佛 (Pamela Oliver) 都提供了他們寶貴的時間與意見。

威斯康辛大學訪查中心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urvey Center) 幫助我設計並執行了《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 與《密爾瓦基驅離法庭研究》(Milwaukee Eviction Court Study)。我想感謝訪查中心的所有同仁，特別是凱莉安·迪洛瑞托 (Keryann DiLoreto)、查理·帕立特 (Charlie Paltr)、潔西卡·普萊斯 (Jessica Price) 與約翰·史蒂文森 (John Stevenson)，他們的付出遠超過自身的職責所在 (與我的預算)。

在寫這本書的過程當中，哈佛大學的老師與同學們讓我獲益良多，為此我想感謝布魯斯·威斯頓 (Bruce Western) 從頭到尾讀了我的稿子。他從根本上塑造了我對於美國貧窮現狀與司法體制的認知。我要謝謝羅伯特·山普森 (Robert Sampson) 深化了我對於城市、犯罪與社會科學之功能的見解，要感謝威廉·朱立爾斯·威爾森 (William Julius Wilson) 為我設定議題，並且一路上不斷給我鼓勵。我要感謝凱瑟琳·艾丁 (Kathryn Edin)，謝謝她不但給我可靠的建議，還讓我感染了她的樂天心情。謝謝克里斯多福·詹克斯 (Christopher Jencks) 不准我抄捷徑打混，謝謝德瓦·佩哲 (Devah Pager)，他看事的澄澈與待人的慷慨讓我十分受用。感謝克里斯多福·溫席普 (Christopher Winship) 點燃了關於理論與研究方法的許多對話，沒有他這研究就不是現在的模樣。感謝蜜雪兒·拉蒙特 (Michele Lamont) 延伸了我對不平等的理解到美國以外。其他不吝於提供我思考角度的還有威廉·艾波加 (William Apgar)、瑪莉·裘·貝恩 (Mary Jo Bane)、傑森·貝克菲爾德 (Jason Beckfield)、勞倫斯·波波 (Lawrence Bobo)、亞歷山大·基勒沃德 (Alexandra Killewald)、珍·曼斯布里吉 (Jane Mansbridge)、奧蘭多·派特森 (Orlando Patterson)、詹姆斯·奎恩 (James Quane)、馬力歐·史莫 (Mario Small) 與瑪莉·華特斯 (Mary Waters)。黛博拉·德·羅瑞爾

(Deborah De Laurell) 給了我數不清的幫助，包括就書稿給我意見。南西·布蘭柯 (Nancy Branco) 與道蒂·路卡斯 (Doty Lukas) 是替我申請研究經費補助的好幫手，謝謝兩位。另外我還要特別謝謝一位布里斯本的計程車司機。

為了這個研究，我有幸與許多極優秀的研究助理與教師同仁合作。為此我想感謝安衛華 (Weiha An)、莫尼卡·貝爾·湯瑪斯·費里斯 (Monica Bell Thomas Ferriss)、卡爾·葛申森 (Carl Gershenson)、瑞秋·托伯特·金柏洛 (Rachel Tolbert Kimbro)、芭芭拉·奇維亞特 (Barbara Kiviat)、強納生·米吉斯 (Jonathan Mijis)、克莉斯汀·柏金斯 (Kristin Perkins)、崔西·余倫伯格 (Tracey Shollenberger)、亞當·崔維斯 (Adam Travis)、尼可·瓦德茲 (Nicol Valdez)、奈特·維爾莫斯 (Nate Wilmers) 與瑞雪兒·溫克勒 (Richelle Winkler)。潔思敏·仙德爾森 (Jasmin Sandelson) 對我整份稿子提出了很有見地的觀點。

哈佛學人協會 (The 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 對我而言除了是個溫暖而充滿活力的求知環境，更是我能思考與寫作的園地。在協會裡我特別想致意的有丹尼爾·艾倫 (Daniel Aaron)、勞倫斯·大衛 (Lawrence David)、華特·吉伯特 (Walter Gilbert)、喬安娜·高迪 (Joanna Guldi)、諾亞·費爾德曼 (Noah Feldman)、莎拉·強森 (Sarah Johnson)、凱特·曼恩 (Kate Manne)、伊蓮·史嘉里 (Elaine Scarry)、阿馬提亞·森 (Amartya Sen)、茂拉·史密斯 (Maura Smyth)、瑞秋·史登 (Rachel Stern)、威廉·陶德 (William Todd)、葛倫·威爾 (Glen Weyl)、威妮·王 (Winnie Wong) 跟努爾·雅爾曼 (Nur Yalman)。凱利·卡茲 (Kelly Katz) 與黛安娜·摩爾斯 (Diana Morse)：謝謝你們的熱情招待，讓我可以綠屋咖啡 (Green House) 寫出這本書。

在哈佛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艾斯米·卡拉梅洛 (Esme Caramello) 與已故 (但令人緬懷不

已)的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教會了我貧窮專法(poverty law)的利弊。安妮·哈靈頓(Anne Harrington)、約翰·杜蘭(John Durant),乃至於福茲海默宿舍(Pforzheimer House)裡的每一位,都是我跟我家人歸屬感的來源。

這本書能順利成形,出力甚多的有推動「住有多重要?」(How Housing Matters)計畫的(約翰·D與凱薩琳·T)麥克阿瑟基金會(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有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國住房與都市發展署、荷洛維茲社會政策基金會(Horowitz Foundation for Social Policy)、貧窮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威廉·F·米爾頓基金(William F. Milton Fund)、聯合住房研究中心(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哈佛大學文理學院(Harvard University's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與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馬爾坎·維納社會政策中心(Malcolm Wiener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法庭資料科技有限公司(Court Data Technologies)的貝瑞·維德拉(Barry Widera)協助我蒐集了數十萬筆驅離紀錄。哈佛大學地理分析中心(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的傑佛瑞·布勞森(Jeffrey Blossom)完成了龐大資料組的地理編碼,並在其中融入了人口估計值。

克利西·葛里爾(Chrissy Greer)與麗莎·卡拉卡西安(Liza Karakashian)很精準地抄寫下了深具難度的民族誌資料內容。對於在威斯康辛期間給我的各種指導,我想要感謝的有提姆·波勒令(Tim Ballerig)、大衛·布里屯(David Britain)、艾波·哈特曼(April Hartman)、麥可·齊耶尼茲(Michael Kienitz)、莫德威勒·克肯道爾(Maudwella Kirkendoll)與布萊德利·沃更茲(Bradley Werginz)。

吉莉安·布拉希爾(Gillian Brassil)是位像有強迫症又像機器人般永不疲倦的資料校對,她的付出讓

這本書更加出色。麥可·卡爾萊納 (Michael Carliner) 為我解答了許多關於住房資料與政策的問題。瑪莉詠·佛卡德 (Marion Fourcade) 在巴黎政治學院 (Sciences Po) 招待了我一周的時間，而我正是在作客期間對著大張紙勾勒出這本書的輪廓。一路上許多人為我指點迷津，同時還不忘給我打氣，為此我想要感謝伊萊珈·安德森 (Elijah Anderson)、哈維爾·奧耶羅 (Javier Auyero)、傑可布·艾弗瑞 (Jacob Avery)、薇琪·畢恩 (Vicki Been)、羅傑斯·布魯貝克 (Rogers Brubaker)、梅根·康福特 (Megan Comfort)、凱爾·克羅德 (Kyle Crowder)、約翰·迪耶德里 (John Diehrich)、米契爾·杜尼耶爾 (Mitchell Duner)、英格麗·古爾德·艾倫 (Ingrid Gould Ellen)、羅素·恩格勒 (Russell Engler)、小喬瑟夫·「皮可」·伊伍齊耶 (Joseph "Piko" Ewoodzie Jr.)、丹尼爾·菲特 (Daniel Fetter)、蓋瑞·阿倫·范恩 (Gary Alan Fine)、赫伯·甘斯 (Herbert Gans)、菲利普·葛夫 (Phillip Goff)、馬克·葛蘭諾維特 (Mark Granovetter)、蘇齊·霍爾 (Suzi Hall)、彼得·哈特－布林森 (Peter Hart-Brinson)、卻斯特·哈特曼 (Chester Hartman)、克里斯多福·赫伯 (Christopher Herbert)、尼爾·富里格史坦 (Neil Fligstein)、柯林·傑洛麥克 (Colin Jerolmack)、妮基·瓊斯 (Nikki Jones)、傑克·卡茲 (Jack Katz)、沙默斯·汗 (Shamus Khan)、艾瑞克·克林能伯格 (Eric Klinenberg)、艾沙·克勒－豪斯曼 (Isa Kohler-Hausmann)、約翰·勒維·馬丁 (John Levi Martin)、凱特·麥可伊 (Kate McCoy)、亞莉山卓·墨菲 (Alexandra Murphy)、提姆·尼爾森 (Tim Nelson)、阿曼達·帕雷 (Amanda Pallais)、安德魯·帕帕克里斯托 (Andrew Papachristos)、瑪莉·帕提佑 (Mary Parillo)、維克忒·里歐斯 (Victor Rios)、艾娃·羅森 (Eva Rosen)、梅根·桑戴爾 (Megan Sandel)、芭芭拉·薩爾德 (Barbara Sand)、希拉蕊·希爾沃 (Hilary Silver)、亞當·司列茲 (Adam Slez)、黛安·馮恩 (Diane Vaughan)、洛伊克·瓦匡特 (Loic Wacquant)、克里斯多福·威爾德曼 (Christopher Wildeman)、艾娃·威廉斯 (Eva Williams) 與羅伯特·維勒 (Robb Willer)。

我要感謝所有看過《下一個家在何方？》並不吝於給我指教的書評，以及數十名看過本書相關學術論文但我叫不出名字的讀者。我很感激有機會能在許多機關團體簡報了這本書的部分內容，並且在交流當中得到了許多寶貴的意見與回饋，為此我要感謝的有：公共政策分析與管理協會（Association for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大英社會學協會（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住房政策中心（Center for Housing Polic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哈佛公衛學院（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居住正義網（Housing Justice Network）、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美國國家低所得住房聯盟之住房立法論壇（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Housing Legislative Forum）、密爾瓦基的馬凱特大學（Marquette University）、麥克斯·普朗克—巴黎政治學院中心（Max Planck-Sciences Po Center）、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紐約法學院（New York Law School）、紐約大學法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美國人口協會（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巴黎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丹麥奧胡斯大學（University of Aarhus）、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暨伯爾特法學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 Boalt Law School）、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賓夕維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約克大學 (University of York) 、都會事務協會 (Urban Affairs Association) 、西岸貧窮研究中心 (West Coast Poverty Center) 、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與耶魯大學法學院 (Yale Law School) 。

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我的妹妹蜜雪兒 (Michelle) 。她的存在帶給我源源不絕的靈感，因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純然的求知欲與對貧困者的惻隱之心。我要向戴斯蒙家的莎凡 (Shavon) 、尼克 (Nick) 與梅根 (Megan) 說聲謝謝，謝謝你們總是支持著我，愛護著我。還有我要謝謝兩個小不點，史忒林 (Sterling) 與華特 (Walter) ，你們是我的光，是我生命中的喜悅。泰莎——我還能說什麼呢？謝謝妳成為我在風浪中的支柱，是妳給我力量完成這本書。任何時刻我有需要，妳都守在我的身旁，對於妳的智慧、犧牲與愛情，我只能回應以難以言喻的感激。「妳的堅定造就了我完美的圓圈／讓我的終點也同樣是我的原點。」¹

註釋

- 1 譯註：原文為 *Thy firmness makes my circle just / And makes me end where I begun*。出處是約翰·唐恩 (John Donne) 的《我將遠遊，別為我哀傷》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 。這裡是將妻子比喻為堅定的圓心，牽引著丈夫在圓上繞了一周後又回歸原點。

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 / 馬修·戴斯蒙 (Matthew Desmond) 著；胡訢諄，鄭煥昇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7.06

面；公分。-- (文化思潮；8)

譯自：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ISBN 978-957-13-7010-1(平裝)

1. 貧窮 2. 報導文學 3. 美國

551.84

106006947

Copyright ©2016 by Matthew Desmond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New York, New York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7010-1

Printed in Taiwan

文化思潮 008

下一個家在何方？ 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作者 馬修·戴斯蒙 Matthew Desmond | 譯者 胡訢諄、鄭煥昇 | 副主編 陳怡慈 | 美術設計 許晉維 | 內文排版 薛美惠 | 董事長·總經理 趙政岷 | 總編輯 余宜芳 |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 240 號 4 樓 發行專線——(02)2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0800-231-705·(02)2304-7103 讀者服務傳真——(02)2304-6858 郵撥——19344724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 79-99 信箱 時報悅讀網——www.readingtimes.com.tw | 電子郵件信箱——ctliving@readingtimes.com.tw | 人文科學線臉書——http://www.facebook.com/jinbunkagaku | 法律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 印刷 勁達印刷有限公司 | 初版一刷 2017 年 6 月 | 定價新台幣 480 元 |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 80 號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成立於一九七五年，並於一九九九年股票上櫃公開發行，於二〇〇八年脫離中時集團非屬旺中，以「尊重智慧與創意的文化事業」為信念。

2017年普立茲獎 |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好書 | Amazon年度TOP20 | 《出版人週刊》十大好書 | GoodReads年度好書 | 《柯克斯書評》年度好書 | 《歐普拉雜誌》10本必讀佳作

屋況合宜、價格合理的居住環境，絕對應該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

- 阿琳是一位單親媽媽，被房東逐出家門後，發現新家的租金得花上月收入的八成……
- 帶著孩子的凡妮塔租屋時處處碰壁，只能住進毒蟲與幫派氾濫的社區……
- 多琳一家九口窩在兩房公寓裡，當房屋漏水、堵塞，房東卻相應不理，他們決定也放爛這間房子……
- 拉瑪想幫房東工作以抵房租，只可惜房東覺得他的付出一文不值……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為了書寫貧窮的真相：是何種經濟體系聯繫起貧富兩者？貧者為什麼難以脫貧？哈佛社會學者馬修·戴斯蒙住進兩個底層社區，花費數年，採訪三十多名房東、記錄數十萬筆驅離資料，找到牽繫起貧富兩者的經濟體系——租屋市場。只是，他發現兩種自由在此互槓：房東想靠租金賺錢，房客希望有能力讓一家住得舒適安全。

貧困之加上「大敗名」的標籤，讓貧窮不再是一個「生計」問題，更成為一種「社會」問題。馬修·戴斯蒙將自己多年來的研究化身為八個貧困家庭與他們兩名房東的故事，從中揭露底層剝削的認識。正如《紐約時報》盛讚本書，「不談論居住議題，就談論底層剝削。」書中貧困家庭的希望、難忘的驅離場景，提醒了我們：失去一切，唯有存穩的居所，是生計一切的根源。

，人就失去



時報悅讀網

97-13-7010-1 (551.84)

90 NT\$480